

从儿童团员到造反派 —— 高飞回忆录

这部回忆录用生动的笔触记叙了作者从一个儿童团员成长为革命者，并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成为“造反派”，“粉碎四人帮”后被作为“三种人”整肃，身处逆境仍牢记毛主席教导，坚持以写作的方式“继续革命，永不投降”的曲折历程。



高飞 著

作者简介

高飞，学名高恩泽，1936 年 3 月生于河北省任邱县（今任邱市）出岸镇袁果庄村，1953 年 17 岁时在任邱师范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留校做共青团委专职干部。从 1958 年开始，先后调任《任丘日报》、《沧州日报》和河北人民广播电台编辑兼记者。文化大革命的 1967 年 3 月，当选为河北省广播局（台）革委会副主任，进而兼任党委和党组副书记。1968 年 2 月当选为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1967 参加国庆观礼。1969 年再次以优秀知识分子的名义参加国庆观礼，应周恩来总理邀请参加国庆廿周年国宴，并随后同全国观礼代表一起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目 录

第 1 章 简述家史.....	3
第 2 章 儿童团的学习生活和社会活动	9
第 3 章 日寇“新国民运动”的破产	18
第 4 章 日本特务头子 山奇的疯狂和覆灭.....	26
第 5 章 逃出魔窟的父亲.....	36
第 6 章 不动一枪一炮 端掉出岸炮楼.....	41
第 7 章 感触革命路上的一段曲折.....	45
第 8 章 冲开小农经济的羁绊	52
第 9 章 十七岁上加入中国共产党.....	60
第 10 章 前进路上突降重任.....	73
第 11 章 反右派和大跃进中的我	82
第 12 章 当记者和当社员的一些回忆.....	92
第 13 章 “告急县”的斗争和精神.....	102
第 14 章 我随张书林书记下乡.....	109
第 15 章 我当地报记者的头三脚	119
第 16 章 来到广播记者的新阵地	131
第 17 章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我.....	146
第 18 章 我当选为革委会副主任	161
第 19 章 我亲自经历和听到的难忘新闻	178
第 20 章 面对“内战”，我提了个惊人的建议.....	191
第 21 章 同地方和军队领导交往的故事	203
第 22 章 没有想到的任命	213

第 23 章 三次难忘的公差	222
第 24 章 在“既不脱产又要工作”的道路上.....	231
第 25 章 突然迎来筹建河北电视台的光荣任务.....	247
第 26 章 记忆犹新的一连串“事变”.....	260
第 27 章 严守对空宣传口径是广播的第一准则.....	279
第 28 章 奋战在唐山抗震前线.....	288
第 29 章 感触党内斗争的点点滴滴.....	297
第 30 章 记下两段难忘的经历.....	333
第 31 章 参加外事活动的若干片断.....	343
第 32 章 恶运向我悄悄袭来.....	365
第 33 章 在当出版编辑的岗位上	374
第 34 章 我在政治阴影下的奋进	388
第 35 章 我终于在劫难逃	400
第 36 章 迎战“灭顶之灾”的斗争	414
第 37 章 政治品质不同，思想感情迥异	436
第 38 章 攻下长篇小说 引出苦涩的思考	457
第 39 章 解读河北的权力斗争和民心向背	474
第 40 章 创作丰收 引出老将军访谈录.....	481
第 41 章 晚年再一次战斗在“反修”的阵地上.....	490

第 1 章 简述家史

1936 年农历 3 月 13 日，我出生在一个比较殷实的农民家庭。这个家庭就在河北省任丘县（今任邱市）城西 15 华里的袁果庄村。因为上边有一个哥哥、四个姐姐，我被称为晚来的姣姣者，伯母便给我起了个亲昵的奶名“老民”。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老人们就传说，袁果庄最早称为“袁杜张村”，是明朝从山西省洪洞县迁来的袁、杜、张三户在此开荒种地。后来袁姓居民搬到西边四里的东良淀村落户。三户少了一户，杜、张两户不知为啥就把村名改成“袁果庄村”啦！别看这袁果庄村只有两户，可地处赵王河和小白河之间，两岸都是肥沃的宝地呢！只是明朝这当儿出了大事变：封在北京的燕王朱棣突然起兵，向南京的朝廷进发，要夺权当皇帝呀！他为了扫清南进的障碍，搞起了“燕王扫北”战役，一打就是三年，杀人很多。使得这块宝地变得人烟稀少，土地荒芜。等到燕王朱棣打败了朝廷，当上了“永乐皇帝”，他不得不循着开国父皇朱元璋的作法，继续下令全国向河北移民。于是，这个小得只有两户的袁果庄村，便又有高、董、李三姓陆续迁来袁果庄村居住。因为这后来者繁衍极快，人丁兴旺，到 1946 年，我数算得清清的：全村顶门立户者已达到百十家，计有高姓 46 户，董姓 20 户，李姓 21 户。不过，原住民杜姓和张姓仍然繁衍缓慢，杜姓只发展到 4 户，张姓却只发展到 2 户。后来，虽然又陆续有王姓 4 户、刘姓和曹姓各一户迁来，但繁衍也不快，到我成年的时候其户数都没有增加。袁果庄村尽管后来发展到百十来户，但和周围的村相比，仍被四方呼为“小袁果庄”。 为这个“小”

字，老人们都有点自卑，便自壮门面给自己编了这样一个歌谣：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数了南北二京，就数咱‘大’袁果庄！”

当然，说是村小却也有着比大村优越的特点：比如，村里对外遇到这样或那样的争议，全村总会抱得紧紧的一致对外。对内呢，虽然全村发展到七、八个不同的姓氏，大家却一向互敬互让、友好相助，团结得很好。后来这些不同的姓氏竟有不少户结成了儿女亲家。

1943 年，我 7 岁上进入本村抗日小学的时候，家里有几样东西总是给我带来格外的新奇：一是那罗装订得很细致的线装本药书和幽黑的由一格一格小抽屉组成的药厨，二是那烧砖用的一摞一摞的作工精细的木制模具。我就问爹：“这些东西是咋回事呀？”爹平时就是那种默默劳动的农民，平时很少讲话，但这次却回答得十分敞亮。只见他闪烁着风光的眼神说：“那都是你爷爷留下来的遗产呀！你爷爷叫高炳辛，清朝末年他参加了朝廷的童子试，因为成绩考得好被选评为‘秀才’，也算是皇上给的一种功名呢！你爷爷学问很高。他通中医，还会看风水。当时咱家里开着小药铺，门上挂着“滋绪堂”的牌子。你爷爷每天坐堂给人们看病，有时还被请去出诊，，名望不低哩！那一格一格的抽屉就是放各种药的厨柜呀！除了这个，你爷爷还时不时的被大户人家用马车请去看风水，帮人家调理阳宅、阴宅的建设。就因为有这样的名气，周边的人们都尊称他为“高先生”。至于那一摞一摞的模具么，那是烧砖脱坯子用的呀！当时咱家有一座占地 40 亩的砖窑，座落在村西三里的千里堤下，由你伯父和我管理，买卖曾经很红火。后来分家就列在我的名下。没有几年，就到了民国 26 年（即公元 1937 年）北京芦沟桥发生了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七七”事变，小日本很快就打过来了。这日本鬼子可恶极啦！，到处烧杀抢掠。民国 28 年（即 1939 年）

日本鬼子竟丧心病狂地扒开千里堤放大水，一下子就淹了任丘、文安、大城和青县。咱那砖窑也被冲毁，四十亩窑地变成了水洼。从此，咱家的日子便开始没落，就只能靠着 30 亩地支撑着过了……

“爹第一次郑重其事地向我讲述了这段家史，在我那幼小的心里留下了难以忘却的记忆。只是家中曾经留有爷爷高炳辛的照片，战乱中不幸丢失了。

爹的奶名叫“垆子”，大名高胜甲。长得一米八的大个子又膀宽腰圆，在村里有“大力士”的威名。他小时候，上过一段私塾，粗通文字，竹算盘打得也好。就因为管着 30 亩地和一座砖窑，爷爷善中医和懂风水的整套本领他都没有继承下来。只记住了爷爷一个治“瘰癧脖子”、俗称“老鼠疮”（西医叫“淋巴结核”）的特效秘方，他运用得十分熟道。后来竟发展到能治好各种有名的和无名的恶性毒疮，在周边也积累了一占了点小小的名气，常有人前来投医求药。就是到他患了血癌还能动点手脚的虚弱时刻，也就是在他 1959 年 66 岁逝世前的一段时间，仍在坚持为周边患此病的人做“治一个好一个”的服务。他服务的章法有自己的特点，即自己只管开处方，由患者到外边的药铺取药，然后把药交给他，由他秘密熬成一种清香扑鼻的黑亮色药膏，再转天交给患者敷用。这是旧社会一直沿续下来的保护祖传秘方不外泄的巧妙办法。不过，在他每每把熬好药膏交给患者的时候，总要有个口头禅：“治好了病不求别的，给我传传名就高兴呀！”当然，如果有患者为表谢意给他送包点心来回报，他也沿用爷爷的作法并不拒绝。他还有一手为人称道的服务，就是平时总要熬出两大瓶膏药，免费送给前来求治、生活却又十分困难的患者。其他患有毒疮前来求助的人，他也高兴地用小瓶或小碗拨点药膏送给人家。曾有“明白人”说他太傻，竟毛遂自荐

愿做他的代理人，要他在集市上戳起“包治‘鼠疮脖子’和各种恶性毒疮”的旗帜，招揽客户，扩大赚利，却被他断然拒绝。最令我欣慰的是：他握有的这个极具特效的祖传秘方，并没忘了提前传给后代。先是我参加革命的大哥高恩普（革命后化名高枫）和在医院工作的四姐高秀珍熟练掌握了，再后边我那学医的大儿子高建军也接班熟练掌握了。他们都经常使用这个秘方为周围的患者服务。

我对祖先历史沿革的了解，缘于我上高小的时候，看到祖坟尚存的大曾祖高秀峰和二曾祖高瑞峰的墓碑（注：后来合作化的时候农业社把这墓碑拆走修水渠了）。当时我只用心地记下了墓志铭上写的这么几句话：“始祖山西平阳府洪洞县小兴州人，明永乐二年奉旨迁来高阳县龙化社为第七甲，后徙任邑（指任丘县）城西五里长洋店村，村北偏西有坟焉。至十四世高高祖又迁来高阳县袁果庄（后改属任丘县）居住”。因为这几句话我一直牢牢的记着，后来随着我知识和阅历的增加，便亲自到山西洪洞县做了一番考察，并为此查看了《明史》，发现墓志铭所言“始祖为山西洪洞县小兴州人”的表述有误。洪洞县从来没有“小兴州”这个地名。倒是《明史》上记着：承德滦平县的兴州河畔，有大、小兴州城，时为北方重镇。《明史》更清楚地记着：明洪武和永乐皇帝年间，曾迁兴州民于内地。而这个内地系指河北省的高阳、河间、任丘等地。朱皇帝缘何要迁塞外之民来内地呢？《明史》还特别指明是想阻断北元残余势力的骚扰。那时元朝的残余势力虽被赶到了漠北，但仍仗着骑兵的优势，经常南下突袭明朝，大肆抢掠。朱皇帝就来了迁塞外之民于内地这么一招，形成了一个无人区的隔离带，使北元骑兵断了可能的接济，从而遏制了北元骑兵的南侵，保证了北方边境的安全。

2006 年夏天，老家从地下意外地挖掘出了两曾祖的墓碑，侄孙高光泰时任村中共党支部书记，他便拓印了一份墓志铭送过来，我才算进一步比较清楚地了解到曾祖的一点情况。墓碑是民国 13 年（公元 1924 年）7 月 10 日立的。铭文之下款署：“侄炳辛撰，男炳森书，孙清吉立” 由此证明我的爷爷高炳辛和堂爷爷高炳森，都是有着相当文化基础的。墓碑正面分别书“源远流长，万古留芳”。大曾祖名下写着：“皇清徵处士，考讳秀峰，赠孺人妣王、崔、孙太孺人之墓”；二曾祖则是：“皇清待徵处士，考讳瑞峰，妣张、张太君之墓。处士者，古指有才德而隐居不作官的人。孺人者或太君者，皆妇人之尊称也。可见大曾祖和二曾祖当时也属有一定文化的人了。铭文中提到：“十四世高高祖于清道光二十四年（公元 1844 年）迁来袁果庄后，一直照例归葬长洋店村北之莹地。到大曾祖秀峰时已经四代”，便因“坟远路遥，诸多不便”，由大曾祖提议“求新莹于近地”。铭文还说：“先伯父讳秀峰嗜堪輿之书，精通风水学问”，因之“成竹在胸，同二弟瑞峰、三弟昆峰、四弟晓峰议定南莹地八亩”，“后又议定北营地八亩，四支公修公用”。从这里我才知道，曾祖是兄弟四个。而据铭文所载四位曾祖之下的儿孙序列中，我始知自己的直系曾祖是三曾祖高昆峰。

应该说，1937 年北平芦沟桥“七七事变”爆发的日本侵华战争，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担起了领导全民抗日的重担，极大的改变了我家那种封建社会通行的“交了公粮自在王”的小农经济观念，第一次把个人的家庭利益和祖国存亡的最高利益结合在了一起。当时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军队一路南逃，任丘县国民党部和县政府也跟着跑了。全县一下子变成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的世界。1939 年初，我的姑表兄王奉军——任丘县王家坞村一位早期的中共党员

（化名王万龙），来到我家动员哥哥高恩普（参加革命后化名高枫）参加抗日的游击军，17岁长得很高大的哥哥不仅高兴地参军，还被表兄吸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哥哥又被中共任丘县委委任为任丘县二区（即通称的青塔区）武委会主任。由于哥哥的组织发动，我的三姐高恩荣、四姐高秀珍和二堂侄高世杰也都先后参加了共产党。1942年他们在我家东仓房下挖了秘密地道。从此爹和娘除了忙活种地和家务，就是接待和保护抗日游击队和县、区干部，成为村里第一家有秘密地道的堡垒户。我则成为“青抗先”（即青年抗日救国先锋队的简称）领导下的儿童团员，担任站岗、放哨、查路条的任务。我的六堂侄高世卿，长我四岁，一直担任村儿童团长，因为抗日成绩突出，被任丘县抗日政府评为“抗日小英雄”。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哥哥高枫由北漕口高小校长升任任丘县人民政府教育科长。后又先后调任天津专区基层干部学校校长和师范学校校长兼党委书记，享受地厅级待遇。三姐高恩荣（1942年入党）曾担任天津纸箱厂党支部书记。四姐高秀珍（1947年入党）成为河南鹤壁市人民医院医生。二堂兄高恩波在务农的同时接了爷爷看风水的班，而二堂侄高世杰却投入了革命，他1942年入党，担任了村抗日武委会主任。1946年光荣参军，担任炊事班长。复员后长期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六堂侄高世卿大城师范学校毕业后做了多年的小学中心校长，后升任任丘县王家坞乡副乡长。侄女高兰萍妇产科学学校毕业后，一直担任妇科医生。我的大堂兄高恩泉，则一直是有相当名望的木匠。大堂侄高世昌是农业上的能手。堂孙高安泰则走出家门，成为任丘县机械厂的工人。总之，第三支曾祖之后辈，不论是为农，还是做其他革命工作，都在毛主席开创的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大道上，努力耕耘和奋进着。

第2章 儿童团的学习生活和社会活动

在我幼小的记忆中，万恶的白本鬼子侵略中国的野蛮暴行，最是刻骨铭心而无法忘记的。在我六、七岁上，正是日寇占领大半个中国的1942和1943年。这两年的形势，日本鬼子是最最疯狂和残酷的。为了躲避鬼子烧杀抢掠的大扫荡，我三六九的要跟着爹娘和姐姐逃难。那时家里的一辆自行车和鸡、羊、猪早叫鬼子、汉奸抢走了，唯一没抢走的，一是埋在地下大缸里的粮食，二是那个耕地拉车最有劲的老黑牛。爹每次逃难都牵着它。老黑牛好像也懂得日本鬼子的暴虐，平时走路总是慢悠悠的，一喊鬼子来了，它便会意地颠呀颠的跟着跑。好在那时逃难的地方并不远，不是到二里开外赵王干河北岸田各庄的“张家大坟”，就是二里开外小白河畔的出岸村的王家大坟。这里坟场广大，古柏参天，蒿草茂密。鬼子不知是惧鬼神，还是怕中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埋伏，它们出发扫荡往往避开坟场。所以，这两个坟场就成了逃难者比较安全的宝地。我们有时上课遇到敌情，也会转移到坟场继续上课。

在坟场避难也有方便的条件，那里常有收割下来的玉米秸和高粮秸成捆的放着，抱来几捆“人”字型地一戳，就成了一个简易的窝铺，在铺底垫上一层干叶子就可以在里边睡觉了。白天娘担心我到处乱跑，就吓唬我说：“你可千万不要乱跑呀！碰上那‘拍老花’的，就把你拐走了。”

“‘拍老花’是什么‘玩意’？它为啥要拐小孩？”我疑惑不解地追问着，娘神秘兮兮地说：“那‘拍老花’的乍看就像个老百姓，可它手里攥着一把迷魂药，往你身上一拍，趁你回头的工夫，

往你鼻子上一抹，你就迷失方向了，只得乖乖地跟它走，走到很远的地方，它就像卖小猪一样的把你卖掉，你就永远回不了家啦！”

“啊？”“我惊悸地叫了一声，还真有点怕了。”

晚上，我总要缠着爹讲故事，娘被我吵烦了，就又神秘兮兮地吓唬我说：“别闹了，快睡觉。再闹腾就把‘老毛猴’引来了，好厉害呢！”

“老毛猴？老毛猴什么样？我怎么没见过？”

娘顺着我的追问渲染道：“那老毛猴呀，浑身长着长长的黑毛，吐着血红的舌头，张牙舞爪，专门拔下小孩的脑袋，对着脖腔子喝血，等把血喝干了就吃小孩的肉。你可千万要听大人的话，别在夜里闹腾。真要把那吃小孩的老毛猴引来了，爹和娘都救不了你。”

“啊？这老毛猴比那‘拍老花’的还厉害哟！”

我心里害怕地敲着小鼓，只得把嘴闭上。娘就这个劲儿，紧紧搂着我。接着，用手掌轻轻地拍着我的后背，细声哼起催眠的歌：

噢——噢——噢——宝贝睡着了。

睡得香，睡得甜，长大作状元；

睡得美，睡得实，长大当高官。

噢——噢——噢——

乖乖睡着了……

在这风餐露宿的日子里，吃的就非常简单啦！常常是带一兜玉米面做的菜团子，或带一包葱花饼，这东西又有面又有菜，吃起来还蛮香呢！等听说鬼子撤回据点了，爹和娘就忙着赶回家去，看看家被烧了没有？家里少了些什么物件？接着就是趁机在家忙活两天家务或农业上的活计。1943开春，刚满七岁的我便进入了村里的抗日小学。那时的抗日小学，读的都是共产党抗日政府编的课本。

但鬼子据点编的课本发来，我们也装模作样的收下，放进书桌的抽屉，如果哪天躲不开，被鬼子、汉奸撞上了，就拿出鬼子发的课本应付一下，小鬼子和汉奸被我们骗得硬是没办法。小学的校址说来寒苦，因为村小没有公房学堂，就设在李老红家一处闲房院里。1、2、3、4这四个年级，百十个孩子，只有一个老师，实行复式教学。学校没有学生会，只有抗日的儿童团。团长、副团长分别是高年级的高世卿和董迷。老师也只有一位，开始是本村的李文富，后边接着是高凤兆，再后边是东邻一里地北漕口村的张炳文先生。数张老师学问高，能写一手很漂亮的毛笔字。不论是学生和家长都非常佩服他。我和张老师接触较多，因为他常给我当区武委会主任兼袁果庄“村长佐”（即副村长的代称）的哥哥高枫写信，信总是由我秘密转交。哥哥的回信也由我秘密交给张老师。不过，张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热爱。那时不知他从哪得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两张伟人像。毛主席头戴八角帽，慈祥的脸庞闪着英气。朱总司令头戴军棉帽，厚道的面容透着武威。每逢讲课前张老师总是先把两张伟人像挂在讲台后边的墙上。接着，他向大家宣呼：“起立，敬礼，坐下！”坐下之后，他仍然不讲课文，要严肃地讲这么一段话：“同学们，你们要清楚地记住，日本鬼子已经占领了我们大半个中国，稀泥软蛋的国民党蒋介石，已经逃到南方去了。现在是共产党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领导的八路军及游击队在英勇地抗击着敌人。今天，你们已经不单单只是个学生，一到七岁就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儿童团员了，除了好好学习，还要配合‘青抗先’站岗、放哨、查路条，做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小战士，我讲的话记住了吗！”

“记住了！”

大家同声响亮的回答着。张老师仍然不讲课文，只见他郑重地把两张伟人像摘下来，小心地卷好，放进一个他经常挎着的大文件包里，才让大家翻开课本。张老师为啥要把伟人像收藏起来呢？因为那时经常发生敌情，有时开课十几分钟，就有游击队侦察员报敌情来了，大家便跟着张老师立刻转移。转移的地方和家长逃难的地方一个样，不是赵王干河北岸的张家坟，就是小白河畔的王家坟。大家在树底下一坐就继续开课了。那时的抗日课本都是毛白纸装订的油印本，虽然比较粗糙，但课文却十分生动又很有韵味，思想性和战斗性特别强，如今六、七十年过去了，我还能背过其中的一些课文：

“哥哥大，弟弟小，哥哥骑竹马快快跑，弟弟玩木刀哈哈笑！”；

“小朋友，快起床，起来看太阳！”；

“中国有个大救星，共产党毛泽东；
中国有了子弟兵，八路军朱老总”；

“汪精卫这孽丈，不去抗战投了降；
全国老少齐抗日，杀死汉奸狗豺狼！”

“马占山真爱国，打死日本一大伙。
东三省去抗战，打死日本一大半！”

那个时候的学习用具可以说再简陋不过了，没有书包，就是一块陈旧的毛巾或一块陈旧的方块布，把书一包就成了。没有自来水笔，就连铅笔也极少。练习本更谈不上，每人只有一块半尺见方的青石板。写字用一种有点软的石棍做笔或自己用胶泥烧制的土笔。有的同学买不起那块青石板，就用小木棍在地上写。虽然学习条件很艰苦，但大家都学得很有劲，很认真。白天学了，晚上还要自习。

自习用的灯就更原始了，一个高台灯碗倒入半碗黑油（棉籽炼出来的），用一撮旧棉絮捻成一个筷子粗细的一条灯绳儿，偎在灯碗里，等被油浸透了，再拉出绳头儿，枕在碗沿上，用火一点就亮起来了。那时候点火也很不容易，因为，当时的中国还不会生产今天大家看到的那种火柴，因此，国人只能用外国进来的“洋火柴”，俗称“洋火”，而这时由于日本鬼子的封锁，就连“洋火”也见不到了。怎么办？共产党的抗日政府就发动群众，用土办法制造火种。这种火种俗称“大取灯”。具体作法是：即先从山上取一种固有的火石，然后取一小撮火绒，用手按在火石上，在用铁匠打造的一片适合手握的像半截镰刀一样的金属，俗称“火镰”，进行撞击，火花就爆出来了，这时火花点燃火绒，再取一种蘸了硫磺的用麻杆做成的小手指粗的半尺长的小棍，往已经点燃的火绒上一触，那麻杆小棍就燃成火苗啦！既可以点灯又可以点火做饭。其实，那工夫，八路军和游击队在同日本鬼子作战中也曾缴获过部分煤油，俗称“鬼子油”。这种油点“炮子灯”和汽灯都非常好，只是当时舍不得用呀！因为我们要烧毁敌人的炮楼正离不开它呢！

在对敌斗争十分残酷的情况下，抗日小学仍有自己活跃的文艺生活和课外活动。唱歌、跳舞自不必说，就是踩高跷、耍霸王鞭这些要求比较高的文艺表演，我们都能整体有序、变着花样的进行。我本人就曾经是领头的高手，到周边村还参加过比赛呢！此外两人、仨人玩的小游戏，比如戳刀、跳绳，踢毽子、抓子、跳房子、掰腕子、撞拐……等等也都玩得热闹开心。以女生爱玩的“抓子”游戏为例，我这个当时爱看的男孩，至今还能背过那支《抓子歌》呢！你瞧瞧这庄稼味的词儿：

“抓呀，抓单，抓三，抓两呀连抓！连抓，豆仨。爪合呀，一

罗呀！两开呀一支，豌豆呀溜绿。抓呀，抓单，抓三……

那时候的舞蹈，主要是“跑跳步”和扭秧歌。秧歌有两种：一种是冀中定县“进两步退一步”的跳跃模式。传说是宋朝大文学家苏东坡做定州太守时，根据农民插稻秧的动作编创的；一种是“走菱型点”两胳膊甩“横8字”的陕北秧歌。据说是1939年贺龙率120师来到任丘时，和群众联欢教给大家的。这两种秧歌都是手执红绸甩动，步法欢快而又极具美感。扭起来，不论是扭的还是看的，都有一种美滋滋的陶醉。那时的歌曲呢，除了流行全国的《义勇军进行曲》、《八路军进行曲》、《游击队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我们战斗在太行山上》等主流歌曲，还有风行冀中的抗日歌曲。这些歌至今我还能哼唱一、二：

“老乡们，老乡们！大家要想得解放，快来参加八路军，快来参加八路军……”：“八路好，八路强，八路军打仗为的老乡……”：

“1943年呀！环境大改变，白洋淀的炮楼端了多半边呀！，日本鬼子快完蛋……”

……

除了课内外的读书和文艺、健体活动，同学们的社会活动也是很活跃的。最重要的社会活动有这么几项：一是八路军和游击队打了胜仗，在“青抗先”指挥下，儿童团要帮助打扫战场；二是参加军民联欢庆祝活动。1944年冀中军区火线剧社来任丘农村巡回演出，就跟我们儿童团搞了一次联欢。，他们见我霸王鞭耍得好，竟高兴的赠给我一杆木制的“三八大盖”，代替原来的红樱枪。希望我能带头搞点瞄准、刺杀的军事练习，为将来参加八路军做好准备，我当时高兴地不知说什么好，就学着八路军的样子，来了个立正敬

礼，引出了一片掌声；三是和周边村的学校一起，共同集会纪念庆祝儿童节。那时的儿童节国家定在四月四日。纪念或庆祝的形式，除了开场的主题讲话，主要是各村的歌舞比赛。完全是“拉拉队”式的的友谊较量。比方说，张村的儿童团长叫道：“李村的同学先唱一支好不好？”双方都齐声回答：“好！”李村的儿童团长就大步向前一个立正，起个歌头，便挥舞双手打着拍子唱起来。唱完，张家村的团长就吊胃口道：“唱得好不好？”大家齐声答：“好！”张家村团长接着又吊胃口道：“唱得妙不妙？”大家又齐声说：“妙！”这时张家村团长便攻上一句：“再来一支要不要？”大家齐声回答：“要！”就这么着你来我往，直到各村同学都唱到最后舞到最后，来个尽兴结束。不过有些重大联欢庆祝活动，比如，任丘县城 1945 年 4 月 30 日举行庆祝胜利解放的大会。当时县政府只规定城关区高年级同学参加，其他区、村则只派儿童团代表与会。我的四姐高秀珍和儿童团长高世卿去了，我因为不够资格去不成，还为这哭了一鼻子呢！除了这些革命性的社会活动，儿童们还有三个千盼万盼的传统社会活动：一个是过大年。“玩心”大的儿童们都是数着日子盼的。到时候总有些好吃的自不必说，到各家拜年磕头、捞点压岁钱更是少不了的。农村过大年曾有这样的谚语：“姑娘要花，小子要炮，老头要个新毡帽，老婆要个裹脚条”。到年根底下，我就总求爹给买几包小红鞭，噼哩叭嚓地——一直要放到正月十五元宵节，才算过足了瘾。二是过庙会。传统的庙会是每年农历的 3 月 3 日或 4 月 4 日，周边大村都要举办。因为这个传统根深蒂固，就是日本鬼子打过来，这庙会也没完全停下来。不过，像我们袁果庄这种百户的小村就办不起了。只有去周边大村去享受。这过庙会的内容要比过大年丰富得多哩！可以看大戏，听大鼓书，瞧

木偶“耍傀儡”……，有时还能看到马戏表演、变魔术、耍猴儿，真叫人看花了眼呢！老辈人传下来这么一个风光而又滑稽的段子，我至今记着，你听听：“大庙会，好热闹，也有老来也有少，还有那烧饼果子——果子烧饼大炸糕。吃饱了喝饱了，徒弟们带马——我走上一遭！”三是赶大集。这也是社会流传下来的老皇历了。农村集市，都按传统固定的日子进行，不管鬼子怎么扫荡，是从来没有停顿的。比如我们东邻村就是“四、七、十漕口集”；西邻村就是“一、六出岸集”；北邻就是“一、二、八赶青塔”，南邻村是“二、七赶固贤”。孩子们跟着家长到集上，东转西逛总会见到一些新奇的东西：比如交河县的“铸犁铧”、“安平县的“织马尾罗”、景县的“磨剪刀”、饶阳县的“剿公猪”、辛集的“皮货”等等。还能看到一些民间艺人的小杂耍，比如耍武术、拉大片、听竹板书……这些都会扩大我们的眼界，增加知识的积累。就说这听竹板书吧，它有两段开场白，很是逗趣。我听了几回竟牢牢记住了，现抄录如下：

“打竹板，迈大步，眼前来到了棺材铺。掌柜的棺材做得好，一头大来一头小，装上死人跑不了。嘿，装上活人受不了！”；
“打竹板，响叮当，眼前来到了煤油庄。掌柜的煤油给得多，光管点灯不管喝。傻子跟他较较劲，喝了一口布饰味。大掌柜的你不信，喝了煤油准出殡！”

大集上有个“叫花子部落”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每次随爹赶集，总是见到这些各式各样的“叫花子”，不断地来到一些摊位面前，有的要吃的，有的要小钱。我看见一个“叫花子”，手持一把小刀，比划在自己的额头上，向摊主哀求道：“老爷，给点填肚子的小钱吧！有老爷的大恩大德，我这把小刀子就不必见红了”。

说着，他那刀尖已经抵在了自己脑门上。我心里顿时吸了一口凉气，小声叫道：“他可别插进去呀！”嘿，那摊主也想到这点了，便忙着开恩，给他个小钱打发走了。大人们给这样的“叫花子”，起了个好听的名子：叫“开光客”。我还见到一个“叫花子”，手持两根牛胯骨，上边栓着许多小铃铛，晃荡起来“叮当”作响。他走到一个大摊位面前，先是豁着劲地用鼓点节奏要把起那对牛胯骨，接着大唱道：“你不给，我不走，在你摊前丢丢丑！你不给，我不要，在你摊前上了吊！”那摊主知道这“耍骨头”的套数，丝毫不敢怠慢，忙着给个小钱了事。为这事我就问爹：“为啥别的要饭者都是提篮走街串户，他们却要在集上这么干呢？”爹说：“这都是讲究的哟！如今蒋介石统治的中国少数人特富，多数人特穷，要饭吃的人多了去啦！那些走街串户的一天下来，只可以糊口保命。而这种‘开光客’和‘耍骨头’的叫花子，自我要求就高些了。他不光要糊口保命，还要积个小钱。这也是一种穷人的算计呀！”

下边顺便说点题外的故事，在抗日的大环境下，我们都学会和听懂了日本鬼子常用的口头语，大家用快板记下来了：“‘巴格牙路’是混蛋；‘迷戏迷戏’是吃饭；‘勾干勾干’是换换；‘大八沟的’是烟卷……”

第3章 日寇“新国民运动”的破产

下面讲到的纪实故事，除了我亲身经历的事件，更深层次的背景材料是我做了记者之后，采访曾是区武委会主任的大哥高枫和表兄——任丘县党史办主任苏尚义记下的。

那是1943年阴历9月初，日本特务头子山奇和衡委一伙来到任丘县城，与汉奸县长王直平、伪军司令李弼臣、伪警察局督察长张介夫、伪新民会长李运孚和伪政府秘书王九贞等，多次研究用“新国民运动”摧毁共产党八路军的战略战术。李运孚这个卖身投靠敌人的狗头军师，向来以培养亲日的“新国民”为己任，他向山奇献了这么一计：

“卑职运孚对共产党的存亡形式有这样一个比喻：中国的老百姓是水，共产党八路军是鱼，只有把水掏干，才能将鱼捉尽。因此，依卑职之见，把重点放在教化老百姓上。只要老百姓都占到皇军一边，共产党八路军就无处藏身了。我们就可以像拾鱼干似的收拾他们。这时候，天皇陛下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战略目的，就会牢固地实现。”

“约戏约戏”，山奇高兴地夸奖道：“李会长的乃出类拔萃的文人，皇军非常欣赏你的教化百姓的方略。请你具体讲讲这教化百姓的方案。”

听到山奇的如此夸奖，王直平、李弼臣、张介夫、王九贞几个人都纷纷点头喝采。李运孚受宠若惊，忙着胸有成竹地说：

“卑职起草了一纸‘反共誓约’共六条，可以发到农村去。七岁以上人手一册，由村长教授学习、背诵。能背过并实行《反共誓

约》者，就称为‘新国民’，发给‘良民证’。背不过来，要严厉惩罚，砍头活埋。这种先礼后兵的作法，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老百姓容易接受。”

“约戏约戏”，山奇急不可待地说：“李会长的快讲讲《反共誓约》六条的内容。”

李运孚旋即从衣兜里掏出一张已经用毛笔书写清楚的文稿，一字一板地念道：“第1条，皇军及中国军警到村庄时决不逃避；第2条，对皇军及中国的各机关决不做虚伪的报告；第3条，今后绝对反对共产党八路军所约集的一切破坏行为；第4条，今后要协助皇军及中国军警讨共，并提供共党活动的确实情报；第5条，严守本《誓约》各项条款，做‘大东亚共荣圈’内的新国民；第6条，违背‘反共誓约’条款，甘受任何惩罚。”

衡尾听到这儿，他没等山奇说话，就点动着白胖的娃娃脸，肯定道：“李会长所拟《反共誓约》6条内容，大大地好！皇军还愿意做这样的表示：凡是严守《反共誓约》有功者，太君大大地有赏，金票的大大地奖励。皇军还要给他立正敬礼。诸位可以宣传皇军这一善意的姿态。”

这次会后，伪县政府行动很快。一时间，印有《反共誓约》六条的布告和传单满天飞。伪区、乡政府和村里的维持会也采用开会或培训的形式，宣讲《反共誓约》六条。最蛊惑人心的，莫过于10月18日即农历九月二十日要求各村选拔《反共誓约》的背诵如流者、到县城参加示范大会、皇军要大大奖励的故事了。百姓之中竟然真有些人天真地相信。当时就流传着这种天真的说法：“叫咱背六条咱就背，背过来落个‘新国民’，背不过来落个老笨，咱再接着背，只要鬼子不烧杀抢掠就行了。”中国共产党任丘县委和抗日

县政府，通过内线了解到敌人的险恶用心，针锋相对的揭露敌人“钓鱼上钩”、瓦解中国人民抗日斗志的阴谋。号召百姓们不要上当。同时，为了挽救受骗上当者，各村的“青抗先”还在半路上设岗，进行劝阻教育。这么一来，山奇、衡尾导演的《反共誓约》示范大会，总也开不起来。没办法，山奇、衡尾只得下令采取强制措施：一是派出小股特务到地里密捕农民，捕到后就用所谓“到城里开会”的名义，秘密押走。我爹高胜甲就是在地里干活时被这么抓走的。二是点名到村，下死命令给维持会长，如果农历9月20日不到县城参加示范大会，就烧杀全村。这样连抓带压，一个20万人的任丘县，竟然有万数人被圈唬到了县城东南角的广场。在大批鬼子、汉奸荷枪实弹的包围下，伪军司令李弼臣向山奇建议，先给老百姓来个“下马威”，再让示范者背诵《反共誓约》六条，然后发动民众举报共产党八路军，有明显立功者，当场发“良民证”和金票。山奇同意李弼臣的主意。他立刻命令广场的百姓们低头，然后命令机关枪手在百姓头顶的上空扫射。在一片恐怖的枪声响过之后，伪县长王直平宣布由山奇太君亲自点试。只见山奇用塾练的汉语开始点试被叫到跟前的二十几个农民，他点第一个问道：

“《反共誓约》六条会背吗？”

“不会。”

“学过了没有？”

“学了。”

“学了为什么不会？”

“因为脑瓜子迟钝。”

“那么——八路军共产党的事知道不？”

“不知道！俺村大多是庄稼人，还有些在外边做买卖。”

“巴格牙路！撒谎的大大的，死了死了的有！”

山奇气急败坏。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侵入中国六年，从东北到华北，亲自收买了一批又一批的汉奸，培植了一批又一批走狗政客。但他没有想到这些平头百姓竟如此顽固。便给李弼臣下了格杀勿论的命令。但是，李弼臣一连杀了 200 多人，打伤 300 多人，那些平头百姓竟没有出现一个变节者。衡尾看到这一切，心里有点嘀咕了。他和山奇搭档有年，山奇在军事上落了个“狠”字的大名；他则在政治上落了个“硬”字的大名。便跟山奇耳语道：

“山奇君，杀人到此，我想换一种招式。”

“啊，衡尾君有何高见？”

“高见么，倒不是我的”，衡尾谦虚道：“冈村宁次大将最近教诲我们，对华征战要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我们不妨用‘政治’打一回头阵，这样对赤化的任丘刁民或许会有些作用。”

“政治——打头阵……咦，具体如何作法呀？”山奇也看到了，这么杀下去并没有杀出一个“新国民”，他倒愿意尝试一下这“政治”的力量。

“组织感化院。”衡尾干脆道：“共产党一向善于感化。老百姓爱听共产党的，并不是共产党的军事力量有多大，而是他的思想感化力量大，我们为什么不用用这个法宝呢？”

“只是……那是共产党对自己的百姓感化。大日本皇军对中国百姓又如何感化呢？”山奇抬眼询问着衡尾。

“还是冈村宁次大将教诲我们的：‘以华治华’呀！由中国的文化人出面，我们躲在后边……”衡尾说到这里诡秘地一笑，山奇点头称是。便命令王直平、李运孚谋划组织感化院去了。

感化院设在任丘县城西门里路北的天主教堂内。敌人从示范大

会的万人中挑选了 2000 名青壮年进住，称作“感化生”。因为教堂内院子虽大，却只有十几间瓦房，最多能容纳三百人，便在院子里搭了几个大棚子，地上垫些杂草，叫人们挤着睡地铺。伪新民会长李运孚亲自登台讲大课。这家伙煞费苦心画了一幅挂图，上面有木船和泥船各一艘。木船上的青壮年喜气洋洋，泥船上的人惊恐万状。这时，李运孚以“教师爷”的口气开讲了。只见他加重了口气说：“大家瞧一瞧呀！这木船代表了中、日亲善之路，船上的人们游玩自在，正奔向美好的明天；那泥船呢？则代表抗日死亡之路，上了泥船的人们都一个个愁眉苦脸，沉船在即呀！聪明的朋友和兄弟们，我们都上木船好不好？”

会场一片沉默，无人应声。

“我说弟兄们呀……”李运孚一看这情势，忙又变一下口气，套近乎说：“皇军对咱这些感化生们够优待啦！管吃管住管学习，大家要是再不响应，把皇军惹火了，兄弟我可就再也帮不上忙，那后果不堪设想呀！现在，我再问一句：抛弃泥船，登上木船，走中日亲善之路好不好？”

会场上仍然是一片沉默。倏忽间，有人大喊：“不好！”接着便是连片地大喊：“不好！不好！”、“我们不当亡国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李运孚被这惊天动地怒吼镇住了。好一会儿，他猛地瞧见房沿上的皇军们正在转动机关枪，便一挥手大叫道：

“古人云，听人劝吃饱饭。你们这样顽固不化，那就等着死亡好了！”

说完，李运孚离席而去，再没有露面。这时候换上了任丘县维持会长赴彩臣。这家伙早在 1939 年 3 月 12 日本鬼子侵占任丘县城的时候，他就举着日本膏药旗，毛遂自荐，当了县里的维持会长。

不过，伪县长王直平还是更看中有文化的李运孚，他对赵彩臣这个“棒锤”式的人物从来看不上眼。可是，他哪里知道，赵是亲自向伪军司令李弼臣“请战”，又经山奇、衡尾同意到这来一显身手呢！

赵彩臣一登台就气魄不凡地对“感化生”们说：“李会长的好话你们听不进去，我这个人可没那么多深情大理跟你们讲。咱家的脾气一向是直来直去。我要问你们：响应中日亲善不？实行‘反共誓约’不？谁响应，谁实行，皇军立马发‘良民证’、奖金票。谁不响应，谁不实行，本人倒不想跟你们动枪子动刀子，我就来一个‘饿’字，直到饿得你醒悟了！噢，要是饿死我可不管，你们听清楚了没有？！”

台下无人应声。

“我再问一句，听清了没有？！”

赵彩臣急了，声音都有些沙哑。

台下仍然一片沉默。

赵彩臣“啪”地一拍桌子，大吼道：“小子们不吃敬酒吃罚酒，老子们先饿你们七天再说！”

10月21日即农历九月二十三日，即下令不准各村送吃的和饮水！老话说：“七天不吃饭会饿死，三天不喝水会渴死，”两天后一些弱点的青壮年就饿得顶不住了。吃树叶的，啃树皮的，喝尿的都出现了。到了第三天，更多的人饥饿难捺，连树叶树皮都吃光了，只得吃鞋底子，吃袄套。吕公堡乡张庄村的张树春饿得实在不行了，竟爬到厕所吃屎充饥。到第五天已有五百多人倒地不起，奄奄一息。这时有汉奸就趁机敲竹杠、发死难财啦！他们暗地里出售大饼，买一张要100块钱；一个玉米窝头要10块钱；一小瓶水要5块钱；一个白菜疙瘩要3块钱。等把人们身上那点有限的钱榨干了，还是逼

问“响应中日亲善不？”、“实行《反共誓约》不？”来胁迫青壮年们就范。但是，大家宁肯饿死也决不变节。这中间，中共任丘县委和抗日政府通过内线了解到感化院的情况，一方面乘着黑夜，隔墙用投扔大饼和窝头的办法救助群众；另一方面利用内线关系，派人打入感化院，发动青壮年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终于在第七天头上，一千多名青壮年奋起抗议，同声怒吼：“要杀便杀，老百姓的人格不可辱！”、“立即管饭，允许家里送被子！”、“不准用冷冻和饥饿折磨人！”东关张村村民陈卜，怒急难耐，冲向前去，夺了一个日本鬼子的枪，同时用砖头砸裂了鬼子的狗头。虽然最后陈卜壮烈牺牲，但赵彩臣和李弼臣这两个汉奸头目还是有点害怕了。他俩担心引发更大的暴动对自己不利呀，便由李弼臣出面，答应允许已奄奄一息的五百多名青壮年由家人接走。这五百多人当中，有二百多人或着死在半路或者死在家门口，另三百多人虽然救活，也都留下了这样或那样的残疾。留在感化院的近千名青壮年，李弼臣答应由皇军管饭，允许家人送被子，但要答应他一个条件：同意参加操练。这一点，中共任丘县委很快通过内线摸清了底细。原来李弼臣经请示山奇、衡尾同意，要通过军事训练的办法，把这近千名青壮年划整为零，编入汉奸皇协军内。做到虽然没有摧垮共产党，却也达到了壮大皇协军的目的。据此，中共任丘县委做出秘密指示：可佯装同意参加操练，但要在操练结束后，乘着编队交接混乱的机会，寻机逃出城外，届时将有抗日的县大队接应。青壮年们对县委的指示心领神会。大家表面上顺从，心里却琢磨着逃出魔窟的办法。李弼臣在视察操练时见青壮年们个个“积极”，心里非常得意。可是，等到1944年正月十七操练结束，正要向皇协军交接的时候，被我县大队改造过来的汉奸看守刘玉光却大开城门，这近千名青壮年

一下子就跑光了。伪军司令李弼臣和山奇、衡尾最后策划的这个“得意”的阴谋，也彻底破灭啦！

第4章 日本特务头子山奇的疯狂和覆灭

1943年，日本特务头子山奇和衡尾，在河北省任丘县导演的以推行《反共誓约六条》为核心的“新国民运动”在县城破产后，并没有就此收场。他俩决定有分有合的到农村去检查背诵“反共誓约六条”的执行情况，指望能在哪个村庄找到理想的示范点，也好回到北平向冈村宁次大将交帐。不过，俩人对这次出行也很担心。因为他们发现任丘这块地方，“共党基础强大”、“土八路厉害”，稍不防范，就会死无葬身之地。为此，二人多方策划，实行了谍报队侦察、骑兵突袭和皇协军包围三位一体的战略战术。他们第一个包围的竟是我们那个百十户的小村——袁果庄。

袁果庄地处津（天）保（定）公路北侧，西邻一里地高阳县的出岸村就是鬼子的据点，东邻一里地北漕口村也有鬼子的炮楼。1943年农历10月3日上午，在津保公路上行进的鬼子骑兵本来是经常看到的。这次却有60多骑兵突然下道，拐弯向北飞快地向袁果庄冲来，搞得“青抗先”的步哨措手不及。老百姓发现了想往北逃，又看到出岸据点的皇协军从西边和北边包抄过来，袁果庄第一次叫敌人铁桶般地包围了。很快就有人敲锣大喊着：“皇军来了，全村青壮年和七岁以上的儿童，到高老瑶家大院集合开会。”老瑶哥家大院方方正正，南边的一溜平房是磨粉条的作坊，北边的一溜平房和“对面笑”的东西厢房是住人的。中间的空地有二、三亩大，人们来到这里才发现两边房沿上都支着机关枪，东西两侧的空地更有荷枪实弹的汉奸，正虎视眈眈地盯视着，好像随时都会开枪杀人。我第一次见到这样恐怖的阵势，开始还真有点害怕。可是等我看见

村长李白和副村长王玉祥，完全是一幅镇定泰然的样子，他俩甚至还跟汉奸头目有说有笑，不断地把收藏完好的鸭梨送到他们手中，我心里便一下塌实下来了。因为我们都知道李、王一直是抗日村长呀！他俩和据点打交道，很有一套应付的办法，常常把敌人唬弄住，闹得敌人想抓他俩的辫子都难……我心里正这么思谋着，突然，一个汉奸头目宣布山奇太君讲话。这山奇的恶名大家都听说过。但真见其人这还是第一次。只见他矮矮的墩实个儿，腰里别着一支圆不溜的“王八盒子”，还挎着一把耀眼的东洋刀。嘿，这家伙中国话讲得蛮流利呢！只听他说：

“诸位村民，我今天到贵村来检查《反共誓约》的执行情况。现在，我不急着点试你们背诵《反共誓约》六条，也不急着听两位村长的报告，先点点名再说，快拿《点名册》来！”

一个汉奸头目把《点名册》递给他，他第一个点的竟然是我的父亲高胜甲的名字。我心里猛丁一闪：“爹早就被他们抓走了，为什么还要点名呢？莫非他知道了我哥是区武委会主任？这又是哪个坏蛋捅给敌人了呢……”我正这么使劲地想着，山奇厉声问道：

“高胜甲到了没有？为什么不应声？”

“到！”我从人群中站了出来。

山奇一看我是个七、八岁的孩子，又问道：

“你是谁？过来的干活，过来的干活！”

“我是他的儿子高老民（作者的乳名）。”就这么随口回答着，来到了山奇的面前。

“你的父亲为什么不到？”

“前些日子皇军讨伐，父亲被皇军抓去，现在任丘。”

山奇“嗯”了一声，接着又点到我哥高恩普的名字，我立刻干

脆回答：“哥哥高恩普在天津做买卖。”

“撒谎的太大的！”山奇一把抓住我的脖领子，像捉鸡一样往上一提，眼里射出吓人的凶光，又喝道：“他的八路的太大的，说！”

“不是，就是不是！我哥在‘天津顺昌车子行’当学徒，村长知道，大伙都知道！”我急赤百烈地大声辩解着。

“那你回家拿《证明文书》来，拿不来的死了死了的有！”

山奇说着，使劲往后一搯，把我搯了个趔趄。我顺势颠颠地跑回家去。因为我清楚地知道，去年鬼子搞“五一”大扫荡，哥哥被党疏散隐蔽到天津，《证明文书》早就办好了，就在橱里锁着呢！像这种应付敌人的假证明，村里每个抗日军属和干属都有，全是抗日政府通过各种关系办来的。等我一进家门，娘惊喜地问：

“鬼子走啦？”

“没走，正在老瑶哥家大院里点名查八路呢！山奇要验我哥那《证明文书》，快给我……”

娘忙拉开橱柜，把一张盖着日本天津驻屯军大印的《证明文书》交给我。她生怕我路上丢掉了，干脆摘下我那“三块瓦”的棉帽，又把那《证明文书》要过来放进帽子里。接着，往我头上严严实实地一戴，叮嘱道：“快去吧！这保险丢不了啦！”

我回到老瑶哥家大院，山奇还在点名查八路呢！等我摘下帽子，取出哥哥的《证明文书》递给他，他只简单地看了一眼，就带着笑模样发话说：“约戏，约戏！”只是他没有再把那张《证明文书》还给我。“呀，我得把那《证明文书》要回来呢！不然，那天再来一拨鬼子查验怎么办呀……”我正着急地这么想着，就见山奇转身冲李村长走去了，他大声喝道：

“李村长，你们既然交不出一个共产党八路军，那就把共产党八路军的‘册子’拿来，我要过目！”

“太君，你这就叫我作难了，我这里八路的没有，怎么会有八路的‘车子’呢！”李村长把“册”字的发音听成了“车”字，微笑而又坦然地回答着。

“八格牙路！”山奇大吼道：“册子的交不出来，死了死了的有！”

“太君你别着急呀！”李村长照样微笑着说：“你既然喜欢‘车子’，我就派人去村民家里找找……”

“约戏，约戏！”山奇见李村长终于“就范”了，脸上也顿时露出了笑容。

不一会儿，李村长派人还真找来两辆破旧的自行车，连推带搬地放到了山奇面前。“自行车的——什么的干活？”山奇见来人并没有交出参加八路的名册，却搬来两辆破自行车，便疑惑不解地朝李村长叮问。

“太君的不是要车子吗？”李村长仍是那么笑模悠悠地说道：“袁果庄村穷，没有新车子，只有旧车子，太君喜欢就凑合着用吧！”

“巴格牙路！”山奇气急败坏，“唰”地抽出了东洋刀，怒叫道：“你的戏弄太君，死心塌地的共产党刁民，死了死了的有！”

李村长面对山奇抽出的寒光闪闪的东洋刀，毫无惧色，只见他凛然道：“山奇，我告诉你，我姓李的不怕死！只是你要知道中华民族有句老话，叫‘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血债你山奇是要用血来还的！”说完，他“唰”地把上衣扣子拉开，挺起红彤彤地胸膛，怒目相对。

“咦！”山奇一声狂叫，东洋刀猛地劈向了李白。李村长视死如归地倒在了血泊中。接着，山奇又猛地一刀砍下了李白的脑袋，放在一张桌子上示众。村民们看到这惨不忍睹的血腥场面，有的侧脸而泣；有的怒火填胸。我则紧闭双眼，咬紧牙关，默默地祷念：“八路军快来呀！来个反包围，消灭山奇狗日的……”我默念到这儿，山奇在一桶清水中涮了涮刀，又大叫起来了：

“诸位村民，你们看到了没有？李村长的不交出八路，也不交出参加八路的册子，落了个砍头的下场。在座的哪一位是聪明人，主动把八路点出来，把参加八路的名册交出来，皇军大大地有赏，金票的大大地奖励。”

村民中没有一个人回应。

山奇见没有一个人理他，就又喊开了副村长王玉祥。王玉祥，四十来岁，单名一个“署”字，是村里很有名望的文人，我们都尊称他为“署爷”。只见他一脸怒气地来到山奇面前，正要张口质问这个家伙，山奇却满脸奸笑道：

“我想王村长应该会比李村长聪明些，既知道砍头的滋味，也知道立功受奖的荣光。走哪条路，全看你的悟性了。”

“山奇，你不要拿‘死’来吓唬我！我王玉祥和李村长一样，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是孬种，更不是卖身投靠的汉奸，要杀你只管来吧！但是，我要正告你，上天古来有个铁律：今天你疯狂到底，明天就该你死亡到头啦！”王玉祥义正词严的说着，也“唰”地拉开了自己的薄棉袄，挺出红彤彤的胸膛，做出了视死如归的凛然姿态。

山奇刹那间被王玉祥那泰山屹立的英雄壮举惊住了。他没有想到这位文质彬彬的“先生”，竟然如此强硬，就缓一步问道：

“王村长的，你的真的不怕死？”

“本人对生死一向有着天经地义的看法，”王玉祥凛然道：“为中华民族而死，我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至于你么，我要再一次警告你：今天你杀了李村长和我，明天就一定会有正义之师杀掉你，你这个魔鬼就等着这一天好了！”

面对着王玉祥的义正词严，山奇感到灭了自己的威风。只见他狂笑道：“杀我？哼，你这个中国的‘文人’当不会忘记，我大日本帝国在中国这个‘东亚病夫’面前，将永远是胜利者！”

“但是，你也不要忘了人间有个颠覆不破的哲理，那就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咦——”山奇再也不想和王玉祥论战了。他抡起东洋刀连续猛劈过去，王玉祥也倒在血泊中，直到壮烈牺牲。

山奇环视了一下王玉祥的尸体，又砍下了他的头颅，命令汉奸放在桌子上，大声宣布道：“两个人头都装笼带走，到各村示众！”

就在这个坎上，一个汉奸头目出场了。他以讨好山奇的奴才口气对村民们训教道：

“太君今天走到这一步，全是你们不好好配合惹出来的。你们实在是太死心眼了。事情明摆着么，护着几个土八路全村受害；交出几个土八路，全村变成了“良民”，过太平日子。你们怎么就不知道哪头炕热呢……”

山奇这时一边用清水涮着刀，一边不住地四下里盯看，妄图找到新的突破口。这工夫，他发现一个村民的嘴唇蠕动了几下，像是有话要说，就连忙奸笑着冲他招呼道：

“咦，咦，你这位村民一定是有话要说，快快站过来立大功的干活！”

他指的这位村民叫高殿甲。高殿甲单名一个“勇”字，三十多

岁，我叫他“勇叔”。这工夫就见勇叔胆怯地走了过去，我心里禁不住一闪：“他要说什么呢？说谁谁是共产党？他肯定说不出来，因为共产党是保密的呀！说谁谁是八路军？这可是都知道呢！比方说高刀、高雄、高发生、高二宝、高德明、高恩普、董长增、李镇、李步鹤、张宝山……他们都是公开的呀！还有“青抗先”的民兵们，比如高善、高墩、高聚、高庄、高彪、李江、李壮……他们都是手提“独搬枪”和手榴弹多次配合区小队打鬼子哟！要是把这些都讲出来那损失就太大了……我正这么心情紧张地瞟着勇叔，就见勇叔突然大声地说：

“太君，我没想说话呀！咱是土里刨食的庄稼人，什么都不知道哩！”

“你一定是知道的。太君的眼力没错，今天该着你小子立大功啦！”

还是刚才那个汉奸头目在一边敲着鼓边诈唬。勇叔见山奇没有说话，忙朝那个汉奸头目申辩道：“老总，我确实没想说话。太君讲的那些事，我真的不知道”说完，勇叔转身就往回走。那汉奸头目急了，大骂道：

“站住！别他妈给脸不要脸。快跪在太君面前，好好地说！”

勇叔转过身来，眼睛直直地望着那汉奸头目，并没有跪下。那汉奸头目冲过去，猛地双手往勇叔膀尖上一按，继续大骂道：“你他妈的给我跪下！”

没想到勇叔猛的一个“拨甩”，竟把那汉奸头目甩了个灰歪。大概那汉奸头目发觉一个人制不服勇叔，他立刻命令几个汉奸过来一齐动手，强行按着勇叔下跪，没想到勇叔的力气突然变得出奇地强大，他一溜子左拨右甩，竟把几个汉奸甩到了一边。这时山奇发

话了：“闪开！你们的都给我闪开。叫这个刁民尝尝我这东洋刀的厉害！”只见山奇“咦——”的一声怪叫，举起东洋刀就向勇叔砍去。勇叔没有像李村长和王村长那样视死如归。他“嗖”地来了一个闪转，竟使山奇一刀劈空。山奇“哇哇”怪叫着，又举刀劈了过去，勇叔又一个腾挪，再次使山奇二刀劈空。就这样，山奇劈砍几次都没有得手。只得喘着粗气命令汉奸们把勇叔团团包围，用刺刀把他刺死。勇叔终于倒在了血泊中，腿脚偶尔抽动一下，山奇走过去，朝着勇叔的身子猛踢一脚，狂叫道：

“还有哪个刁民敢反抗皇军？我就让这把东洋战刀先歇歇，用刺刀把他刺死，用机关枪把他射杀！”

他的话刚刚落地，一个胖乎乎的鬼子官儿骑着快马从外边来到了院里。他从马背上跳下来，先和山奇互相敬礼，然后来到村民们面前，用温柔熟练的中国话说：“乡亲们！我是衡尾大佐，老早就在中国东北做买卖，也算得上半个中国人。后来奉了天皇的命令，参加了这大东亚圣战。但我一向主张中日亲善，共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杀人是不得已才有的事情。很抱歉，今天我来迟了一步，山奇君的作法回城后要严肃反省，希望乡亲们能理解我的苦衷，好好和大日本帝国合作，共存共荣。”衡尾说到这儿，转身向鬼子汉奸们一挥手，命令道：“撤！统统回城严肃反省。”

衡尾假惺惺地来了这么一手，敌人撤走了。大院里顿时一片哭声。民兵们到底经过战斗的考验，他们擦干眼泪，一方面急着收殓李村长和王村长的尸体；一方面急着抢救勇叔。勇叔前胸和后背挨了四、五刺刀，血流满地，竟然没刺到要命处，落了个大难不死。后来硬是用农村的草药完全控制了伤情，一天天见好。村里的乡亲都到家里去看望他，有人逗趣地给他编了个顺口溜：“高殿甲，

“爱” 说话，刺刀挨了四、五下，闪转腾挪斗顽敌，大难不死命真大！“在我写完这段纪实故事的时刻，禁不住想到我村当年的抗日儿童团长、任丘县抗日政府命名的“抗日小英雄” 高世卿，他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也写了我和山奇那段对话周旋的事，评论道：“这件事在袁果庄很有点震动，都夸老民不简单，把山奇给唬弄了。”

下边接着讲山奇制造了袁果庄惨案后，任丘县的县大队和区小队同群众相结合，就瞄上山奇的行踪了。是在县城收拾他还是在农村收拾他，都制定了方案。12月8日上午，县大队摸到山奇去了城北四十里的莫州据点，和莫州据点的杀人魔王“小久宝”带着一伙鬼子和汉奸，突袭了李庄子。它们把李庄子十岁以上的男女都赶到一个大院里。开口就要村民们交出共产党和武委会干部。如果不交，就烧杀全村。为了保卫村庄和百姓，李庄子抗日村长张树春、农救会主任赵克甲和共产党员张玉彬，仨人牵着手挺身而出，异口同声地对山奇喝道：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要较量就朝我们来，不准你们杀害百姓和烧毁村庄！”

“咦——”山奇震惊地盯视着站出来的三位共产党员，卖牌子道：“大日本帝国崇尚英雄！你们堪称是中国的英雄好汉。既然你们毫不惧怕皇军的刀枪，我也来个省事的，一律活埋，保你们的全尸！”山奇说着，命令几个汉奸把仨共产党员绑了，然后连推带拉地往一个坑里拽。这时三位共产党员异口同声地高呼：“共产党万岁！”、“山奇、小久宝不得好死！”、“抗日是一定要胜利的！”

三位共产党员壮烈牺牲了。但正如他们所预见的那样：县大队几十里奔波和莫州区小队一起，已经埋伏到了山奇和小久宝回莫州据点的路旁。等山奇和小久宝一露头，伏击战打响了。首先击毙了

山奇。那伙子鬼子汉奸除了小久宝和几个鬼子逃脱外大部份被消灭。这个胜利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县。各地墙上都贴上了这样的顺口溜：

“山奇杀人狂，任丘称魔王。烧杀八区乡，莫州见阎王。衡尾吓破胆，北平去躲藏。”1944年1月25日，小久宝带领鬼子和汉奸再次到东北方向讨伐，这个杀人魔王被我埋伏在小苟各庄村南的42区队和任丘县五区区小队击毙。这一仗，打死鬼子和汉奸30余名，20名汉奸投降，缴获重机枪一挺，长短枪十余支。

第 5 章 逃出魔窟的父亲

1944 年正月十七日，我们一家吃过晚饭，就早早地把临街的门闩上了。当时家里是东西相邻的两个院子。西边是个砖体结构的三合院。东边是准备盖一处新房的空院子。这里临街有个大门洞，是专门放马车用的，平时一般不开。那时为什么要早早闩门呢？因为兵荒马乱呀！不光有鬼子、汉奸为害，还有土匪夜间出没，既绑“人票”，又抢劫钱财。为了防土匪，村民们有个共同约定的小办法，即无论谁家遭到土匪攻击，就立刻猛敲洗脸盆。当时的洗脸盆都是铜制的，敲起来像锣一样山响。邻居们听到敲盆声，也拿出铜盆跟着敲，并且发出呐喊：“抓土匪呀！抓土匪呀……”这样，全村各家互相呼应，盆声震天，呐喊动地，形成一个以正压邪的强大阵势，土匪心虚，大多闻声逃遁。就因为这防鬼子、防汉奸、又防土匪，村民们对夜间有人敲门都非常警觉。如果是杂乱凶狠的踹门声，那不是敌人便是土匪。这天晚上，我家的门被敲响了，但敲得轻轻的，且有一定节奏，就像抗日的县、区干部和游击队夜间转移隐蔽到户时那种轻细而有节奏的声响，我忙着跑出去，闪到一边小声地问：

“谁，谁呀？”

“我，老民呀，我是你爹！”

“啊，爹，你可回来啦！”我听得十分清楚，忙大呼着去开门。

等我“嗖”地把门一拉，爹顺劲一推，“啊——”我惊叫着，竟然倒退了好几步。为啥呀？因为我影影绰绰地看到爹留起了妇女一样长的头发，胡子也札煞出老长，完全不是他那从不蓄须又喜欢

光头的形像呀！爹好像猜到了我害怕的原因，忙说：

“别怕，叫鬼子抓去三个月——没法剃头刮胡子哟！”

“噢……是的……”我已经看出爹那高大的身材、宽宽的肩膀和四四方方的脸庞。忙着扑上去抱住了爹。爹也使劲搂着我说：

“快把门闩上，到屋里说话。”

这时，娘、三姐和四姐听到我呼爹的声音，也忙着迎了出来。一家人簇拥着爹喜极而泣。我忙催着说：

“你们快到屋里去，我闩好门……”

等我插好门回到屋里，一家人仍是泣不成声。爹反倒安慰说：

“别哭了，我能活着回来就是不幸中的万幸呀！打死饿死在日本班房的多了去啦！少说也有五百人。我仗着身板好，难友们又互相帮助，县大队又通过内线关系送进一些吃的，总算没倒下呀……”

“看你都瘦了一圈，就显个大骨头架子了。”娘停止了哭泣，又说：“孩子们快去给你爹做碗长寿面吃！”

“不着急呀！”爹稳着劲说：“人虽然瘦了，可骨头硬啦！这三个多月真锻炼人呀！可以说是有生以来最残酷地考验。一个‘生’，一个‘死’，这两条道就在你眼前摆着：不怕死，不变节，就是牺牲了也死得硬气，死得光荣；怕死变节虽说当时能活下来，可以后肯定不得好死，还得遗臭万年。你们知道么，我们这被抓去的万数人都够硬气哩！在鬼子的屠刀面前没有一个变节的呀！后边有两千多人被关进了鬼子的‘感化院’，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人家公开威胁说：‘共党刁民不投降鬼子，就别想吃饭，直到饿死挖个坑埋了’！。你猜怎么着，我们被敌人硬是饿了七天，树叶树皮吃光了，鞋底子、皮带吃光了，饿死了不少人呀，没死的也都奄奄一息了，可也没有一个人投降。为这，抗日政府和县大队都表扬了我

们哪！咦，孩子们，除了做长寿面别忘了再加一碗‘杀窝头’呀！”

爹提到的这“杀窝头”，是农村平常吃的一种别有风味的小吃儿。作法十分简单，就是把玉米面窝头，切成红枣大小的块儿，然后撒上点盐，泼上点醋，放上一小把葱花，点上几滴香油一拌就成了。这种“杀窝头”吃起来香酸可口，颇多食欲。听老人们传说，玉米的来历很不一般呢！是明朝朱皇帝从南美州引过来的。当时来的少，只有皇帝才能吃上，所以称“御米”。后来引种得多了，老百姓也能吃上，就改写为“玉米”了。玉米面可以蒸窝头，可以贴饼子，也可以煮粥、做嘎嘎汤。谁也说不清这玉米内部涵有什么特殊玩意，反正是吃了既能解饱，又能消炎解毒，还能化解大便干燥。人们形像地把它称为“抗病米”呀！爹执意提出要再加一碗“杀窝头”，我猜想，他就是要驱除鬼子关押带给他带来的邪气和污垢哟！

在姐姐做饭的工夫，娘又问：“你们到底是怎么逃出来的呀？”

“咳，主要是县大队采取了一招过硬的行动呀！他们通过内线关系把看守我们的汉奸刘玉光给教育改造过来啦！便利用我们操练结束向皇协军交接的机会，刘玉光大开城门，我们没费多大劲就逃出了。当时县大队规定，西边这一块先到县大队驻地王家坞集合开会。嘿，县大队高政委和军分区魏司令员还给我们做了慰问讲话哩！两位首长还号召年轻人踊跃参加八路军，壮年回家支援抗日。当时就有几百人报名参加八路军了。”

说到这里，娘忙问：“你知道么？前些天鬼子汉奸到咱村检查推行‘反共誓约’的情况，因为逼交八路军的名册，李村长和王村长就是不办，被山奇杀了，他勇叔也挨了几刺刀……”

“我在王家坞听说了……”爹沉痛地说着又道：“不过，这是

山奇最后的猖狂呀！现在你们知道么？整个抗日的形势是突飞猛进地向着我们的胜利大转变呀！分区魏司令员说，山奇在制造了‘袁果庄惨案’ 没几天，就被咱县大队击毙。汉奸们一看这形势，也搭拉脑袋啦！现在正找后路要投过来呢……”

“咦，”娘接着问：“在王家坞见到奉军（我的姑表兄。他当时化名王万龙，任丘县早期的共产党员，解放后任任丘县委常委兼财贸部长）了吗？”

“见到了。”爹高兴地说：“他现在是大忙人哪！正和县大队谋划解放任丘县城的大事。咦，他又升了！当了吕正操人民自卫军驻任邱县的联络员，还负责孟庆山河北游击军第一师军需处的工作，日本鬼子正点名抓他，还说要烧杀的全家。奉军决定把全家搬到咱家来隐蔽，我答应了。”

“那叫他们快来呀！咱有吃、有住、还有地道，比王家坞更保险哩！”

娘说到这儿，姐姐做好的长寿面和“杀窝头” 拖着一股热气就端上来了。爹先吃那“杀窝头”， 只见他大口大口的嚼着，显出非常香甜的样子。正吃得上劲，外边的门又敲响了，还是敲得那么轻轻的有节奏的。我忙着跑出去，闪在一边问道：

“谁，谁呀？”

“我，老民快开门！”

我猛丁听出是哥的声音，心里又是一阵高兴。“他不是疏散隐蔽到天津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啦……”我这么急想着，忙着把门栓拉开。哥推门进来，后边还跟着几个人。我一边问着门，一边禁不住地问：

“哥，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爹也回来了，你知道吗？正吃饭

呢！”

“我已经听说了。”哥哥说着，竟没有回答我的问话，便大步流星地向北屋走去。我紧跟在后边。可是，哥并没有进屋去见爹，而是领着那几个人往东一拐，到地道口那屋里去了。这工夫，我猜到哥一定是有什么紧急任务……便跑到北屋把哥哥回来的消息告诉了全家。爹忙一摆手说：“不要打扰他们哪！我听说疏散隐蔽到外地的同志们都回来了，现在的形势大改变哟！是咱们开始大反攻，敌人就像乌龟那样，正抽脖啦！你们就等着听胜利消息好了。”

果然，哥哥他们在地道里捣腾了一会儿就出来了。他大步流星地来到北屋，连坐都没坐一下，就跟爹告别道：“爹，你逃出来的事，奉军表哥告诉我了。刚才我们取出了藏在咱地道里的日本军装，下一步有大用场哩！我要抓紧赶回白庄去”。

“去吧，快去吧！”爹摆手说着，又道：“你兴许知道了，奉军一家子要搬到咱家隐蔽一段，我把西厢房给他们整理一下。”

哥哥他们走了，表嫂一家三口第三天就来了。表侄大华和我同岁，二华小我两岁，我们很快就变成了亲密的“玩伴”和儿童团的“小战友”啦！

第 6 章 不动一枪一炮 端掉出岸炮楼

1944 年正月 25 日晚上，任丘县大队副大队长张玉虎和青塔区小队队长曹新来到了我家，说是和西邻的高阳县三小队商量端掉出岸炮楼的事。不一会儿，我的另一个表兄——高阳县三区区委书记兼区小队政委王杏仁也带着人来了。他们怎么商量的谁也不知道，只是临走给爹留下一句话：“等着听胜利消息吧！”

到了第二天过午不太长的工夫，果然胜利消息就传来了。只听“青抗先”的高汝周在高房上用大喇叭广播：“老乡亲们！告诉大家一个胜利消息，出岸炮楼被高阳和任丘两县的区小队给端掉了！希望大家有人出人，有力出力，帮助区小队打扫战场……”他这一广播不要紧，有的人连午饭都没有吃完，推小车子的，挑扁担的，还有背罗筐的，都涌出来朝出岸奔去。爹背上一个大筐，催着我说：

“区小队干得够利索呀！说个端也真快，没听到一声枪响就给端掉了。这打扫战场，咱可不能落在别人后边。再说咧，汉奸抢过咱家一辆自行车，这回咱要找回来呢！”

可是，等我们一溜小跑着来到炮楼跟前，出岸村的人们早就登上楼顶把岗亭拆掉了。我看大伙都是一股劲儿：就是先把炮楼拆掉，把砖拉走，敌人想再来也没地方住了。区小队的战士们则主要是忙着清理手榴弹。手榴弹好像是新运进炮楼的，大多是成箱的在仓房里摆着，也有不少散装的。区小队清这个都有点忙不过来啦！嘿，我看到儿童团长高世卿和副团长董迷正汗气腾腾地帮助区小队和“青抗先”运手榴弹呢！便跟爹说：

“咱也帮区小队运手榴弹吧！那自行车没法儿找呀，你瞧连个

汉奸的影子都没有啦！”

爹也改变主意说：“好！”

我俩也朝手榴弹下手了。爹背上了一箱，我搂抱着几个像金瓜大小的手雷，速速地走向吊桥。这时区小队侦察员马罐子跑过来大喊道：

“西边旧城的鬼子反扑过来啦！同志们，快撤！”

爹急赤百烈地说：“罐子，撤离好办，可这手榴弹不能再留给敌人哪！”

“那这样子吧！”马罐子也急想出一招：“先把运不走的扔进河里去！”

嘿，也只有这一招了。因为百步之外就是小白河，老百姓拉网捕鱼早就凿了许多冰窟窿。袁果庄的大水塘平时为牲口饮水也凿开了一段小冰河，用这一招还真顺手呢！大伙正这么捣腾着，马罐子又跑来大喊道：“同志们！情况有新变化，旧城的鬼子走到半路又窝弯撤回去啦！可能是怕中咱八路军的埋伏，大家还照原计划执行！”

就这样，半天的工夫竟把出岸炮楼给拆平了。出岸炮楼端得如此漂亮，没动一枪一炮，大伙都交口夸奖区小队“太神奇”啦！可谁也说不清这内里有什么奥秘，怎么猜测的都有。过后，还是高阳三小队的高参孙迪给大家做了一个报告，才知道是炮楼的汉奸们在区小队的威慑和改造下决定整体投降，他们跟旧城的鬼子巧妙周旋，出其不意，就这么不声不响地投过来啦！孙迪同志绘声绘色地讲了具体策划的经过，他说：“出岸炮楼端得这么漂亮，其实，最重要的是抗日的大环境变了。小日本在紧缩兵力，已经没有了四面出击的能力。比方说，过去出岸炮楼曾有过一个小队的鬼子，现在它已

经顾不了出岸这个地方，只得撤到西边五里去守旧城去了；再比方东边三里的北漕口炮楼，一年前就已经是‘人在曹营心在汉’，它表面上是汉奸，内里却听任邱县青塔区小队指挥。我们这次部署兵力，任丘青塔区小队埋伏在出岸东面，并不是防备北漕口炮楼，而是防备五里开外的庄家营炮楼会有什么异动。高阳三小队埋伏在出岸西边，主要是防备旧城的鬼子出动。这次端掉出岸炮楼保密工作做得比较好。汉奸队长周树之见小鬼子要败了，三番五次地秘密捎讯过来要投降，我们就选择正月 26 日这一天，通过出岸村维持会长任桂芬，以其设宴招待周树之的名义，我们边吃边谈，具体商定了它们投降的办法，就是不声不响地掐断同旧城日军的电话，把汉奸带过来。等小鬼子知道了，炮楼早已经拆平了。其实，小鬼子还是听到一点风声，它想反扑一下，但又无法摸清出岸炮楼的情况，硬是冒进又怕中了区小队的埋伏，只得走到半路又窝弯回去了。你们听听，我今天讲的这些，是不是抗日的大形势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大形势一变，我们收拾鬼子汉奸就不像过去那么困难那么复杂了。嘿，就像秋风扫落叶那样，东风一起，铁扫帚一到，敌人就完蛋了。同志们！下一步的抗日战争形势就是这么发展喽，让我们再接再厉迎接抗日的彻底胜利吧！”

1944 年阴历五月，麦子熟了。学校放了麦假。那时候的抗日学校为了配合农业生产，规定要放麦假、秋假和寒假。麦假半个月，秋假 20 天，寒假 20 天。这年的麦假，我们除了帮助家里收麦打场，区武委会给了儿童团一个临时突击性的任务：在“青抗先”的指导下，打捞扔在小白河和袁果庄水塘的手榴弹。儿童团长高世卿和副团长董迷水性是有名的，儿童团员们的水性也不差。我们接受任务后，“青抗先”队长高汝周又和高世卿给大家定了几条：一是水

性差的不准下水，防止出现溺水事故；二是摸到手榴弹要轻拿轻放，不得乱扔；三是遇到成箱的手榴弹要几个人合起来搬抬；四是捞上来的手榴弹要全部上交“青抗先”，不准留后手。这些我们都做到了，一共捞了十几个整箱和一百多个散弹。受到村“青抗先”和区武委会的表扬。这里有一个发生在我身上的令人后怕的故事，不得不告诉后人，即儿童团完成捞手榴弹任务的第二天，我和高白还有小宝剑又捞到三颗手榴弹，没有上交，就学着八路军扔手榴弹的样子，在村西高家菜园里试着投起来，以为投出去的手榴弹一落地，就准能炸响了。结果投了几次也没有炸响，我们仨人就讨论开了，是不是被水淹潮了就不能炸响了？越想越是这么回事，就拾了几把柴禾点着用火烤开了，正这么烤着，爹赶过来了，急着大骂道：“小兔崽子们不要命啦！”说着“大鞋底子”也抡了过来。我们仨个吓得急着逃散。后来爹扑灭了柴火，捡走了手榴弹上交给“青抗先”，才把我们找到一块，数落了这个我们干的令人后怕的蠢事。原来我们根本不知道扔手榴弹还要“拉弦”，也没见过“弦”是个什么模样。更不知道那手榴弹柄口的“弦”是被腊封住的。因为封得严严实实，水是无法浸入的。但打仗时却可以用手抠开，用手指拉住弦儿，使劲向远处一抛，落地就爆炸了。只是一一这手榴弹决不能用火烤呀！用火一烤是会爆炸的。你说我们干的这荒唐事该是多么吓人啊！后来我工作了，还常跟孩子们说起这段自己干过的蠢事，以儆效尤呢！

第7章 感触革命路上的一段曲折

1945年4月30日，任丘县城彻底解放。做为冀中东西南北公路交通的枢纽任丘县，成为全国最早获得抗日全胜的县份之一。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河北省的冀中、冀南和冀东三大块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虽然国民党蒋介石也派出军队四出抢夺我们的抗日成果，但在任丘县却没见到国民党军队的影子，也没见过国民党政府的官员。人民群众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安居乐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拨工换工、合作互助”的大生产运动。那时候，火线剧社有两个剧很有名：一个是《兄妹开荒》，另一个是《劳动英雄王秀恋》，其中歌颂王秀恋的主题歌，我至今还能够背唱。其歌词是：

“王秀恋呀，咬牙关呀！咬定了牙关大生产。嘿呀！嘿呀……”

我家的生产和生活，由于全家的辛勤劳动，更是蒸蒸日上。嫂子郝大省和三姐高恩荣还被评为全村的劳动能手。不过二年，爹又在北漕口村南买下三亩好地，成为村里比较殷实的农户之一。

1947年冬天，中共中央发布《土地法大纲》，并在任丘县搞起了土地改革试点。我们这些有点文化的孩子们，早就听老师讲过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故事，对搞土地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非常高兴。每天晚上，我们这些娃娃们都要站在高房上，用大喇叭筒做接力宣传广播。还在墙上书写了“亲不亲阶级分，贫下中农一家人”的大字标语。但是，让我一点都没想到的是：上边突然来了一个“搬石头”运动，一夜之间，竟把我那当区武委会主任兼本村副村长的哥哥高枫，从支援前线的路上带回来，关进了村贫农团设

立的“班房”。他佩带的匣子枪也被贫农团主席高龙珠叔叔收去。原来他领导的那些持枪民兵，也划归贫农团指挥。县、区派出的土改工作队，更是明令宣布：“一切权力归贫农团。贫下中农要打天下坐天下！”这一棒子可把我们全家打糊涂了。“为什么哥哥豁出命地打日本反老蒋，现在突然变成了阻碍“土改”的‘石头’？为什么龙珠叔有名的游守好闲、不务正业，一夜之间竟成了打天下坐天下的英雄？还当了贫农团主席……”一家子想来想去，怎么也想不通，就想到了去中共任丘县委告状。可是，等我去给哥哥送饭时把全家的意见一说，哥哥却表现得十分镇定和坦然。他让我给爹捎话说：“先不要告状。‘搬石头’显然是上边部署的一个运动，肯定全县都在这么搞。告状不过是白跑腿，没有用的。但是，我也仔细想过了，这‘搬石头’的作法肯定不对，相信党中央毛主席知道后会纠正的，千万要沉住气，不要犯急躁呀！”

回到家，我把哥哥的意见一说，爹和娘认为哥讲的对，赞成看一段再说。我的嫂子郝大省和三姐高恩荣还是主张要上告。如果硬是不同意上告也行，那咱就和贫农团来个大辩论。倒是四姐高秀珍另有一种看法，她说：“贫农团是土地改革的领导，贫农团领导土地改革是党中央肯定的。咱做为共产党员，首先要热爱和支持贫农团才对，有意见只可以心平气和地提，决不能搞什么大辩论。”爹也就势解疑说：“你们不要以为是你龙珠叔搞了什么‘搬石头运动’，他连自己的家庭小日子都不会过，哪有搞什么‘搬石头运动’的能力？你跟他能辩出个什么结果？我们就掌握一条好了，相信共产党相信毛主席！我估摸着这事毛主席还不知道。毛主席要知道，是决不会这么干的。我的意见，咱还是要等一等看。”

在爹的一锤定音下，全家算是“稳”下来了。我每天照样上学，

照样给哥哥按时送饭，哥哥也是照样那么坦然。

一天，冀中军区火线剧社来村演了一出《搬石头》的街头剧，其中有一段歌词是这样唱的：“搬了石头见晴天，穷人这才把身翻。贫下中农坐天下，人民江山万万年。”说真的，我一听这首歌脑瓜皮子都要炸了。“‘搬石头’都上了‘戏’编了‘歌’儿，哥哥这一案还能翻吗？肯定翻不了啦……”我这么急想着，回家就全讲了。这一讲不要紧，家里又争吵起来。特别是嫂子不顾自己身怀有孕、即将分娩，硬是要进城去找县委书记吴立人同志论理。爹一看这情景，忙着缓冲道：“找吴书记反映不是不可以，可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去。要去我去！再说了，这事还得跟当事人通通气，他在班房里关着，也不知有什么新情况没有，听听他的意见，咱再去不迟。”

这样，我在给哥送饭时又一次担任了“通气”的任务。没想到哥的回答却是更加自信。他象是没有任何沉重地说：

“不就是一个街头剧的一首歌儿么，那是编剧人编的。并不能肯定就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再说咧，剧本在演出过程中是要不断修修改改的。说不定那一天这歌词就改掉了。咱现在要看到一个铁的事实是：我不就是在咱贫农团设的班房里反省反省自己的错误么，贫农团并没有开什么斗争会整我呀！所以，我还是那句话：相信党中央毛主席，问题总会正确解决的。”

哥哥到底是出生入死经过大风大浪考验的干部，他的一席话我回家一说，就象一副镇静剂，又把全家稳定下来了。

谁知没有稳定几天，正当全家为嫂子喜生“千金”而高兴的时候，一场暴风骤雨猛烈地向我家袭来，贫农团宣布：把我家列入地主、富农的圈内，扫地出门！这真是晴天响了一声霹雳呀！我气的

都哭了。一家子更是愤怒异常，硬顶着不让贫农团封门的对策想过了；找贫农团辩理的方案想过了；到县委告状的路子也想过了。就在这举旗未定的紧急时刻，一位被全村盛赞为“明白人”又是贫农代表的庆祥伯来了。他一进门就带着十分关切地神色，劝导说：

“我想到你们一家子会气急生火，不能不过来看看呀！这个突发的事情我了解一点情况，是有些人看到咱村比较穷，没有名牌子的地主富农，他们又急着想在‘土改’中分点东西，便来了个‘矮子里选将军’，把你家哄喊成富农了。再就是恩普在工作中由于方法简单，伤害了一些人。这两股力量一拍即合，闹得工作队也把握不住了，他们生怕犯给贫农团‘泼冷水’的错误，就同意了他们的要求。我看这只是一个旋风，刮不了多长时间肯定就得纠正。所以我就想，咱家是人人皆知的革命家庭，对贫农团这档子事千万不要‘硬’对待，我担心有人就是想激你们‘硬碰硬’呢！怎么办？咱以革命家庭的肚量，对咱党领导建立的贫农团来个‘软’对待。就是先冷静下来，干脆先搬出去。我已经给你们选了个地方，搬到老瑶家那粉坊里去，他们也愿意你们搬过去。我再告诉你们一点消息，有的村还没到划成份这一段，就抢开人家的东西了，工作队已经出面制止啦！你们家的东西不是还没人去抢么！这也是个信号呀！咱一定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的政策最终是要落实的！我说这么多，胜甲呀！你是当家人，相信你会考虑的，我走了。”

有道是：“劝人劝不了心。”特别是分娩不久的嫂子，她死死地咬住一个人情理：“难道这怕风怕寒、正坐月子的妇女，也要不顾死活地往外赶吗？更何况我们救过八路、救过县、区干部，一家子除了老的小的都是共产党员，从来没有剥削压迫过任何人。这‘搬石头’、‘扫地出门’到底犯了那一条？叫贫农团直接找我好

了。我就是死活不离这个窝。这个窝不是夺来的抢来的，更不是剥削来的。”一家子听到嫂子这一席硬话，只是难过的围着嫂子掉泪和哭泣，一时间也不知如何是好。最后还是爹委婉地讲了自己的意见。他说：“都不要哭了，我何尝不心酸难受呢！说起这‘封门’的事，咱家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十五年前咱家窑场借了北漕口孙财主家的高利贷，一时还不了，人家就搬来警察把咱家的门给封了。那时封的是西门，警察不知道咱还有个东院连着，封了半天等于没有封住，老乡亲们也知心的帮忙，没有一个跟警察局通风报讯。就这么着混了半年多，直到借钱攒钱把高利贷还上才开封了。这次封门和上次警察封门截然不同呀！它是咱党领导的贫农团，又是党领导的工作队做镇，说到底是自己和自己斗呀！斗出事来伤不到蒋介石一根汗毛，损失的是我们自己。你们说我讲的这个理对不对？我看咱就照你庆祥伯说的办吧！说到底还是那句话：相信党中央毛主席是一定会有错必纠的！”爹说到这里，一家人都静下来了。便又冲着我说：“老民哪，这事先不要和你哥说，防止他年轻气盛，憋出什么事来。”

我默默地点点头。全家就冒着风寒搬到老瑶哥家粉坊去了。走时按贫农团的命令，只许带穿用的衣服、被褥和锅碗瓢勺，粮食却不准带。那么，吃饭怎么办呀？向亲友家借是一个办法，但这个马上来不及；来得最现实的办法是出去讨要。我和三姐、四姐都变成了不是“叫花子”的“叫花子”啦！好在像我们这样的“叫花子”，不论走到谁家都会得到同情和关心的接待，吃饭没遇到什么困难。最叫我无法忘记的，是我那儿童时代的“玩伴”小树，他竟像个当家人那样向我慷慨保证：“老民哥，你别愁也别怕，有我家吃的就肯定有你家吃的！”小树真是说到做到，那金黄的玉米饼子，

他一给我就是一兜子呀！这时候，我给哥哥送饭再也憋不住这窝在心里的话，还是把家里被“扫地出门”的事说了。哥好像知道了这事，他虎着脸沉默了一会儿，竟非常严肃地说：“他们更‘左’了，又犯了一个新的‘制造地主富农’的错误，阶级阵线搞乱啦！像袁果庄这样的穷村一个地主富农也没有！咱家这种经济状况我早想过了，定个“中农”最合适。最高也只能定个“上中农”。你告诉爹，不要着急上火，耐心地等等看。事物的发展规律都是这样：当错误积累到一定程度就肯定要转化了，这时就要有正确的东西来代替它。我们暂时忍受一点冤屈没什么了不起，这对共产党员来说，对我们这个革命家庭来说，也是一种考验呀！我们一定要经受得起这样的考验，相信党中央毛主席。我讲这些你听明白了吗？”

“明白！”我默默地点着头，心里十分佩服哥哥的政治肚量，更佩服哥哥以人间常理分析土改运动的思想水平。

天气渐渐变暖，春耕就要开始了。土改运动到了平分土地的阶段。这时村里传开一个爆炸性新闻：贫农团主席高龙珠挎上的那支匣子枪丢了。这可成了惊天大事呀！谁都知道，在全国国共两党敌我斗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下，丢失枪支，又说不清来龙去脉，就成为重大政治嫌疑问题。龙珠叔他搁不住这么大的沉重，竟吃“信石”自杀。在他痛苦挣扎的时候，我们一群孩子去看他。他正躺在地上，有好几个大人正在急火火地抢救，都劝他说：“龙珠呀，吃了信石必须吐出来才有救，咱没有反胃的药，只有用‘喝屎汤子’催吐的办法，你就喝点屎汤子自救吧……”我第一次听说吃了毒药用“喝屎汤子催吐救人”的办法，心里好生新奇。这时就见龙珠叔吃力地摆摆手说：“不灌不灌，再疼上两下子就进阴间了……”果然，他疼痛难忍地尖叫下一声，头往地上一拱，把地面硬是拱了一道浅沟，

便登腿断气了。

嘿，不过两天，我们全家真的等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宣布“搬石头运动”是错误的（注），并严肃批评了一些地方侵犯中农利益、扩大划分地主富农范围的偏向。还指出“贫下中农打天下坐天下”的提法不妥，强调加党的领导的重要性。工作队和贫农团执行的很快，立刻宣布给哥哥平反，并赔礼道歉。哥哥不仅官复原职，又新配了匣子枪，并以副村长的身份参加土改的领导工作。同时，贫农团承认把我家“扫地出门”的错误，并赔礼道歉。爹从来不是那种“有理不让人”的“厉害人”。他坚信这是人民内部一个小小的误会，把事情说清楚就完了。大家还是要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心地往前进。哥哥在群众大会上讲得更是入情入理。他诚恳地说：“虽然‘搬石头运动’不对，但不等于我本身没错误。过去这些年，我在工作作风和方法上有简单粗暴的错误，伤害了一些父老乡亲，我在这里向被伤害的父老乡亲赔礼道歉。今后希望父老乡亲们多多监督和帮助，以便把工作做得更好。”他还针对一些贫下中农没有分到实惠而引起的失落情绪，提出一个自己的动议，说咱村没有地主富农，但上中农还是有的。我们家愿意也有条件献三亩好地出来，分给无地少地的贫下中农。我还这么想：其他有条件的乡亲根据自主自愿的原则，能不能也发扬风格献点地，帮助无地少地的贫下中农……。他的讲话获得了群众热烈的掌声。

注：后来知道，“搬石头运动”是刘少奇在西柏坡担任中央工委书记时搞的。毛主席发现后对刘的这种“左”的错误进行了严肃批评并发出中央文件进行了认真的纠正。

第8章 冲开小农经济的羁绊

1949年开春，我继四姐之后进入了村东一里的北漕口高级小学。成为“高小生”了，家里便给我做了个海棠兰色的书包，哥哥送我一支自来水笔。书包挎在身上，头上顶着洁白的羊肚毛巾，到底比小学生帅气了许多，。虽说只是出村上学，因为有许多同学作伴，来来回回，欢蹦乱跳，却也十分快意。在我一门心思攻读学业的时候，一天晚上，爹跟我做了一次庄户人生的谈话。他说：“咱如今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过一段，咱把牛换成骡子，除了自耕自种，还可以搞点运输赚钱，日子肯定要更好。我和你娘想过了，将来你们哥俩做个分工，你哥在外边革命，你高小毕业回来跟我务农。当年你爷爷是秀才，跟你的学问差不多，可他把咱家的日子过到了村里顶尖的位置。一提到高先生，周边各村都知道的。你可不要辜负老辈对你的期望呀！”爹这充满期望和美好前景的话，虽说也有某种催人上进的力量，但并没有完全打动我。因为我心里这时想的并不是回家务农，而是想当一名解放军。如果一时当不成，也要像哥哥那样当一名共产党的干部。不过，我没有公开拒绝爹那庄户人家生来必有的衷言，只是默默地听着或着隐约地点点头。为的是不让爹难过呀！有一次，爹拉着我来到东边自家的空院，眉飞色舞地跟我述说他来年的大计。只见他双手比划着说：“将来咱是两处宅子，西院归你哥，他革命到了退休……回来也得有个宽宽绰绰的住处呀！这东院归你，也盖成三合子房，但正房要四破五的格局，外加东西厢房，老的少的住着都方便。这一回我倒公开表了态：“爹，你这计划不错，等我上出学来能挣钱了，

一不抽烟，二不喝酒，把省下的钱都给家里盖房。”爹一听我说这话高兴地咧嘴笑着，他好像没注意我话里那“省下的钱都给家里盖房”的深层涵意，仍是在发展自家小农经济上引导我。他说：“我还想把咱那窑场办起来，以窑场的收入盖房多方便哪！咦，还有一一再把你爷爷留下的祖传秘法派上用场。你知道么？过去祖传秘法是只传子、传媳不传女儿的。因为传给女儿等女儿一出嫁，就变成人家的秘法啦！如今是毛主席领导的新社会了，我要改掉老辈子留下的这一条，你哥、你四姐、还有你，都要学。学会了这招不光可以用药养医，还可以医养家、治病救人……”说到这里，爹见我静静地听着，好像入了迷儿，竟然向我暴露了一个秘密：“你还不知道呀！为了这一切，家里给你定了亲事。说起来你也熟悉，就是东边 xx 营村——你哥那老战友的妹妹，她大你四岁，过两年娶过来就能挑家过日子。”，

“我不结婚！”

爹没想到我会崩出这么一句。他忙点拨道：“长大了都要结婚的。你真是傻孩子说傻话！”

“那就长大了再说吧！我正在上学不能分心哩！”

我开始据理力争。

“用不着你分心，一切都是双方大人操持决定！”

爹搬出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老章法，我也不好再争辩下去。不过，这件秘密定亲的事，在我脑瓜里还真激起了一个小小的波澜。因为社会上流传着这样的谚语：“女大两黄金长，女大三抱金砖，女大四一根刺，女大五赛老母”，给我选一个大四岁的媳妇，会不会是‘一根刺’呢？我想来想去不会的。因为哥哥的老战友常到我家来，他很喜欢我，是一位非常好的人，那他的妹妹……

我想肯定也是错不了的。只是我根本没见过这个大我四岁的“未婚姐”，还谈不到有什么感情牵挂。到这年四月的一天，北漕口高小和 xx 营高小要举行文艺联欢比赛，我们一队 200 多人来到 xx 营高小的操场，村里的很多乡亲也跑过来祝兴啦！因为我心里装着那个“订婚”的秘密，还真看到周围观看比赛的乡亲们有人正朝我们的队列指指点点。“他们是不是在‘相’我呀！真是怕什么就来什么，我已经发现那几个女的指点的就是我，她们嘴里好像还议论着什么……”我这么想着，忙低下头……。结果，人家瞧了我半天，我也没有看准到底哪一位是自己的“未婚姐”。说来有趣，这件秘密订婚的事情后来很快逆转。据说是因为那个“未婚姐”自主性很强，她在“相”了我这个小小的“未婚弟”之后，以我“又黑又矮”为由，毅然决然地向家长提出退婚。我也谢天谢地，这个压根自己就没有想过的婚姻，竟以“定得快”“撤得也快”而告终。

为了实现我的理想和抱负，在学习上我不仅刻苦努力，而且特别关心政治，追求进步。1949 年四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召开了成立大会。其章程规定：“青年团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的群众性组织，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一切年满 15 周岁到 25 周岁的青年，只要承认团章，参加一个组织并在其中工作，按时缴纳团费，遵守团的纪律，就可以成为一名青年团员”北漕口高小高年级的共产党员兼学生会主席李惠普奉命筹建青年团组织，1950 年我便以虚岁 15 岁成为他亲自介绍入团的积极分子之一。这年 6 月 25 日，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谴责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坚决声援朝鲜人民反侵略的正义斗争。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纷纷响应我国政府的号召，走向街头和集市，进行游行示威，或登台发表演讲，揭露美帝国主

义的侵略暴行。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正是从这时候起，我便成为党的“宣传员”队伍中一名活跃的积极分子。进而当选为高小的学生会主席。

两年的高级小学，在整个学习生活中不过是短短的一段，但我取得了十分优异的成绩。六个学期的综合考试，我夺得了全班五个第一和一个第二，成为全校品学兼优的学生之一。到1950年底进入升学考试的时刻，升什么学校，到哪个地方报考？成为同学们热烈讨论的话题。这个时候，我却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我想考军事学校，也想考保定有名的一中……可爹有言在先，让我回家务农。怎么办呀？一个经济上没有独立的学生，父母的定夺常常是决定性的，我只能在很有限的范围内去努力争取。便试着问爹：

“爹，毕业后，我，我想升学。同学们都说，像我学习这么好，不升学，太，太可惜了。”

“你们哥俩，一个在外边革命，一个又要到外边上学，这家里的事业还要不要？”

爹心里想的嘴上讲的，还是搞他那小农经济的一套。我知道，就‘小农经济’讲‘小农经济’是说服不了他的，只有用社会化的大经济吸引他才有可能转变，就敲明掇响地说：

“爹，家里这小农经济靠我不行，靠哥哥也不行。爹奋斗了大半辈子也算是很能干的了，结果怎么样？还不就是这个样子吗！你也没上升到富农和地主呀！这说明靠一家一户单枪匹马奋斗，多数农民是没有致富的希望。”

“那……眼下不靠单枪匹马……靠什么？”

爹见我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跟他论开了大道理，有点带气，更有点惊奇。我则趁机像放小钢炮那样大声说：

“靠社会主义呀！我听老师讲过了，中国农民要想彻底翻身，过上幸福生活，就要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搞社会主义的大经济，办集体农庄，实行农业机械化。到那时候，我们就不是过一家一户的小日子啦！全村都变成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的新的社会化大家庭啦！”

爹听我讲了这么一大套，“喷”地笑了。他竟然夸奖我说：

“你真成了共产党的‘小宣传员’啦！爹也早就听说过这一套了。人家苏联那社会主义已经搞了几十年呢！我们才解放二年多点，那美好的远景谁知什么时候才能实现？我讲的都是眼前的实际的。你回来咱高家的事业后继有人，小日子同样过得圆满，你怎么就解不开这个理呢……”

爹说到这里有点愁眉苦脸。我十分理解爹的心情，就半顺着说：

“爹的安排我也不是一点没有想过。你知道么，我现在想去考的学校——不是外地的，就是咱任丘师范。师范学校是食宿、学费国家全包，每个月还发两块零花钱。毕了业就在本县教书，一年还有麦假、秋假和寒假三个假期，咱家里家外都耽误不了哇！”

“啊？竟然有这么好的学校？”爹沉思着又道：“要是这样……你倒可以去试试。不过，还得问问你哥，听听他怎么说哟！”

爹终于让步了。我忙着高兴地说：“哥现在是县政府的教育科长，师范学校就归他管。大伙都争着去考师范他都乐不得呢！知道么，咱村的同学书智、南漕口村的振远、北漕口村的金堂，还有田各庄的文忠都报名啦！”

“那……你也去报名吧！”爹说到这儿又嘱咐道：“考的时候你们几个结伴去，头一次进城有个伴好，碰到什么难事好有个照应呀！”

任丘县城离我家十五里。上了津（天）保（定）公路，一直向东下步走，用上两节课的时间就到了。可是，我从来没进过县城。书智、振远、金堂、文忠虽说比我大一、二岁，也都是没有离开过家门的“土老憨”。不过，那时候社会治安相当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也非常亲热。考试的那天，我们结伴来到县城，只稍事打听就找到了位于城关三街的任丘师范学校。这个学校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很破败，称作简易师范。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补充了师资，扩充了学舍，改称为任丘师范学校。我们报考的时候，已有一、二班和一些短训班、速成班几百名学生毕业，正在学习的三班还有一些速成短训班……再有半年也该毕业了。这次一下子又招四、五、六、七、八五个班，共 300 人。（而后边暑假还要按计划招一个三年制的师范九班和中学一班）。而这次报考者却高达 3300 人。为这，我们几个人心里都有点敲小鼓：“呀！十一个人挑一个，我们到底能不能入取哟……”不过，担心之余，我们也还是升腾出一股虎劲：“沉住气！北漕口高小也是全县有名的棒学校之一么，只要细心，不要大意，我们就不会败在别人后头！”几个人就这么互相鼓舞和叮嘱着，进入了庄严的考场。等考试下来，我们吞食着家里给烙的葱花饼，互相核对着答案的准确和疏漏，几乎都是六个字：“自我感觉良好。”其实这时候说考得多好，不过是自我安慰。到底能否考中，出水才看两腿泥。具体说，就是五天看榜，七天看“录取通知书”，才能一块石头落地呀！等到看榜的那天，我们又一起结伴来了。师范那高高的外墙上，用毛白纸楷书黑体字书写的录取人名单，正正规规地贴着，看榜的学生可谓人山人海，一个个踮着脚尖，探着脑袋，瞪圆了眼睛，都盼着能找到自己的名字。我个子矮，但眼力好，往前挤不进

去，就站远些看。开始密密麻麻的人名字，看着有点眼花，干脆给自己下命令：“沉住气，一行一行地看，一个人名一个人名的对……”这一招看似速度慢，却看得清楚而准确。只要看完 300 个人的名字，不光知道了自己的结果，几个同学的结果也就都知道了。呀！我终于找见自己的大名——高老民！霎那间，我激动得心热血沸，差点就呼出一声：“我成功了！”但是，我强抑住自己的激情没有喊。因为如此狂喊影响不好哇！我继续细心地看下去，真是老天爷保佑，我们五位，还有尹家左村的尹炳跃和出岸村的王若芝女同学没有一个失败，全部榜上有名。

1951 年春节，可谓双喜临门。四姐高秀珍以一个年轻共产党员的身份，进入河南安阳专区卫生局的护士训练班学习，我则以一个年轻青年团员的身份就读于任丘师范第五班。这第五班又俗称“小五班”，六十名同学大多在十五、六岁，三年半的学制要读四年师范的课程（即包括高师一年的课程）。是学校重点班次。其他班则分别是一年半或二年学制。分班点名的时候出了点没想到的“乐子”，因为不少同学是用奶名或昵称报考的，什么奇特的名字都有，比如李老臭，徐小四，郝轴子……，还有我的奶名高老民。只要我们回一声“到！”，就会引来哄堂的笑声。班主任刘希彦老师和蔼地建议说：“同学们毕业后要作灵魂工程师，自己的名字是不是也要文雅一些？自己改可以，请老师帮助改也可以。下一次点名时，希望大家都有个文雅的名字”。下课后，我就查开了词典。我有一本《中华小词林》，按照祖宗排下来的“恩”字辈份，我查到了“恩泽”一词，不仅涵意深远，语音读起来也好听。就去县教育科争求哥哥的意见。哥不以为然地说：“‘恩泽’这个词指的是皇上对臣民的好处，具有封建性呢！我意见不如改为‘恩浩’好，‘浩’

者，大也，多也，为人好处又大又多，正是一种高尚的品格呀！”

我却执着没同意哥哥的意见。遂辩解道：“‘恩泽’一词可古为今用，为什么不能泛指党的干部要为人民多做好事呢！”哥哥见我竟有这样开拓性的见解，转而思量着说：“你这样讲也是一种新意，自己的名字还是你自己决定吧！”从此我便以“高恩泽”做为自己的学名了。

第9章 十七岁上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一个百十户的小村来到县城读书，就像进入了一个陌生而新鲜的天地，视野一下子开阔了许多。我和同学们可以自由地到中共任丘县委驻地去看看。那里原来是任丘县城有名的油漆富商高太兴的大宅院，日本鬼子一占领北平，他全家就逃到南方去了。我们也可以到县人民政府驻地去走走。这里原来是国民党县政府的衙门，日本鬼子一占领北平，县长也倦席拔锅南逃了。更令同学们高兴的是：我们可以同机关干部一样，亲自聆听中共任丘县委书记王友林、县长陈省三和县委宣传部长王瑞林同志的报告。还可以和青年团任丘县委书记孙新江面对面的座谈。最难忘的一一要数听任丘县抗日的县大队队长侯太和讲抗日战争的故事了。他的故事很传奇，讲话也非常幽默。侯大队长见我们有同学戴着近视眼镜，像是很羡慕地说：“瞧，解放了，你们生活得多好、多幸福！小小年纪已经戴上了金边眼镜，我都快四十了还舍不得买幅眼镜戴呢！”逗得大家哄堂大笑。任丘县的文化古迹不少，是我们游览的好去处。街中心有文庙，历史上曾是纪念孔夫子的圣地。解放后扩展为县第一高级小学。西关城郊有革命烈士塔，碑上刻有为解放任丘而牺牲的烈士的名字。西北郊有任大将军墓，是一个几十丈高的大土丘。历代相传是汉朝平帝原始二年，派中郎将任丘到这个地方筑城，城修好了便以他的名字“任丘”冠其地名，后置任丘县。城东北郊有柴王冢，比任大将军墓更宏大，是一片近百亩大、酷似馒头的高大土丘。传说后周皇帝柴荣亲率大军北征契丹，决心夺回被契丹割去的“燕云十六州”，直打到幽州（今北京）城下，契丹守军吓得弃城而逃，

汉民举国欢腾。就在这个时候，柴荣皇帝不幸病故。棺木在运回首都开封时，路过任丘县城，全城居民倾巢而出，扶棺痛哭，恳求留柴王衣冠于任丘建墓，得到同意，便修了这个衣冠冢。后人不忘前人的贡献，每到清明节都到烈士塔、任大将军墓和柴王冢拜祭。城西几里到十余里以西南到西北的走势，是明朝四大尚书（相当中央部长）闵、刘、李、边的坟墓，因为是皇帝敕修的，规模巨大而豪华，都是松柏参天、碑楼林立，石人石马排列逾里，坟首均有一坐雄伟的石雕“寿龟驮石碑”。给人以神圣莫测的雄奇之气。因为这，世间有“明朝任丘半朝官”的美誉。我曾几次到这里探秘，发现坟场蒿草都有大腿高，野兔、狐狸竟然在碑楼里做窝。看坟人的房舍也是很排场的，他们是代代传下来在这里看守。当时我就想，旧社会那皇帝是“天字号”的作威作福，它下边的高官，也都是居高临下的“人上人”哪！死了还如此张扬，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难怪李自成要发动农民起义推翻明朝啦！（注：这些历史久远的古迹，除了烈士塔保护尚好。其他如柴王冢、四尚书坟、任大将军墓都没有保护完好。四大尚书坟在“四清运动”初期被彻底清除）

在任丘城内有一处令人特别肃然的地方，就是清真寺。那尖顶的砖房、怀抱粗的松柏和周围静谧肃穆的气氛，一直吸引着我们的新奇和关注。听说这里是回民活动的地方，我们总想进去看看却又不敢轻易进去。有一天，我们几个同学鼓足了勇气进去了，正伸着脑袋、隔着窗户，东瞧瞧西看看，还没有看清屋子里的格局，突然，被一位戴着白单帽的长者叫住了。只听他严肃地质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我带头回答：“我们是任丘师范的学生，想到你们这里看看。”那长者这时更严肃了，满带着教训的口气说：“看看可以，但要经过允许才行，怎么能私自闯入呢！？”呀！这时候我们

才知道自己做错事了，忙着检讨和道歉。嘿，这工夫那长者却“又喷”地笑了，说：“知错改错不算错。以后想来看看，事先打个招呼，我们会热烈欢迎同学们哪！”有了这次教训，我们还真长了个心眼：今后在社会交往和为人处事方面，一定要注意讲礼貌啊！

这里我想补充一条农村娃到县城不久出现的新时尚：过去，我们这些农村娃都是留光头的。见新中国的机关干部大都留“偏分头”和“大背头”，显得非常精神和帅气，大家便纷纷效仿，也高兴地把自己那头秀发留成了一色帅气的“偏分头”，后来被人们俗称为“青年头”或“学生头”。过去一到夏天，我们这些农村娃都穿妈妈、嫂子或姐姐做的白一色的老对襟“庄稼褂”，这工夫——也纷纷向机关干部学习，都穿上成衣局用缝纫机做的很时髦的“大尾巴褂”了。当然，这种新时尚很快也蔓延到农村。社会上就曾经流传这样一个描述新时尚的顺口溜：“留分头，拿电棒（指手电筒），身上穿个大尾巴褂！（注：这种大尾巴褂——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引进西装的模式才慢慢消失。不过，进入21世纪这种“大尾巴褂”由中国女青年带头又逐渐恢复起来了。）”这时的我1.75米的个头——小分头留得蛮精神，上身的大尾巴褂叫风一吹，抖动起来发出1（dao）、3（mi）、5（sao）的音符声，很是惬意。社会上竟为此衍生出一个“买个‘蹈咪骚’抖一抖！”之亟具开心的新谚语。而这时候，我就差一个闪着耀眼光束的手电筒了。正说要去买一个，一位相当要好的同学石金花说：“我有两个手电筒，送你一个吧！”从此，我美滋滋地手握石金花同学赠送的手电筒，参加校内夜间巡逻好几年。毕业工作后这个手电筒还一直放在我的身边，成为夜间出行必不可少的“利器”。

师范的学习生活是紧张而生动的。和解放军的战斗生活有点相

似。比如每天早晨听到钟声要出操。无故逃避要受点名批评。出操时松松垮垮，要命令出列，单个教练。听到上课钟声要及时进入教室。迟到者，要站在众人面前做自我批评。教室全部是 2 人桌。除了星期六和星期日，每天晚上都有自习时间。那时没有电灯，全部是大气灯照明。住宿都是两间相连的大通铺，每个大通铺住 15 个人。龕里备有煤油炮子灯。宿舍设斋长，负责编排值日和卫生安全管理。晚上九时听熄灯钟声睡觉。延误者要点名批评。夜间小便，备有木制尿桶。第二天早晨倒尿和冲洗尿桶由值日生轮流负责。如果尿桶出现异味，要追究值日生的责任。吃饭是六个人一组，打饭菜者每组二人，轮流值日。开始每月伙食费十元，吃八元另二元交个人零用。不久，便提到十二元，吃十元，另两元交个人零用。那时物价非常低廉：三角钱一斤鸡蛋，三角钱一斤大鲤鱼，三角五分钱一斤猪肉，八分钱一斤面粉，三分钱一斤醋，五分钱一斤酱油。每月挣四十元可养五口之家。所以群众都生活得安然美好。值得自我夸耀的是：那时候我极俭省，学校发的这两元零花钱我都没有用过，全部交到父母手里。如果我想买什么东西，再向父母提计划，经父母同意后再买。除此，由于朝鲜战争飞速发展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美国和蒋介石的特务不断潜入大陆破坏，学校还规定了学生要夜间巡迴站岗放哨，每班两个人，手持电筒、木棒和哨子，一个班值勤两小时，遇到紧急情况可吹哨报警。这一切，对于我们这些过惯了小农经济家庭生活的孩子们来说，其集体观念的提高和组织纪律性的加强，是一个极大的培养和锻炼。如果再加上那身花五块钱制作的从帽子到裤子的卡基布中山服，我们全然不像是十五、六岁的孩子，而俨然像个机关的“小干部”了。我的堂侄高世卿当时读大城县师范，就要毕业了，他那里没有成衣局，就委托我比照他

的身材，以我的同学刘增当“模特”量身定作了一套，穿上后竟真像个英姿飒爽的机关干部，他好“自豪”呢！写到这里，还有一件难以舍去的趣事不能不提一下：1951 年全国猛丁兴起了“穿苏联大花布衫”的高潮。那时中苏两国非常亲密友好。“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成为全国人民喊得震天响的口号。而从苏联进口的“大花布”又都是花型大样、鲜艳漂亮，且又十分便宜。中央领导号召全国男女老幼都要带头穿用。说也怪了，中国男人本来有着千百年穿黑、兰、灰深色衣裳的老习俗，这时候竟对穿历来专属女同胞的花衣裳没有出现什么思想障碍，大家都是积极响应呀！为这，甚至传开了这样的口头禅——“男人不敢穿花衣裳，那是封建思想作怪” 哩！任丘师范因为有着近千名男女同学都穿上了一色的“苏联花布衫”，曾被大家戏称为“县城最突出的‘花花世界’！”。至于社会上男女同胞风行穿苏联的“花布衫”，比起国家机关、企业和学校也毫不落后。一时间，竟成为新中国男女服饰变迁上特别美丽的一景。（注：到 1956 年，“苏共 20 大”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上台，颠覆了列宁、斯大林的马列主义路线，中苏关系开始交恶，这种穿用苏联大花布的热潮才快速淡化。

开始，每个班的班长副班长是由班主任老师指定的。半年之后，便实行班干部和党、团组织选举。我被选为班团支部书记、学生会宣传部长和团总支宣传委员（学生会主席是吕泽农同学、团总支书记是韩介华老师），并兼任《校刊》主编和学校演出团团团长。鉴于当时国家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和“抗美援朝”运动，学校的社会活动是非常活跃的。那时对学生的要求

是“三个好”，即学习好，政治活动好，身体锻炼好。公开批评不问政治、关门读书的倾向。因此，学校里搞“三反”不仅号召学生揭发贪污浪费的问题。就是对于学校揭发出来的“嫌疑人”，还要选择一些学生对其进行夜间监护，防止自杀。政府召开公审反革命分子大会，学生队伍、机关干部队伍和群众队伍，更是必然的三大块。至于“抗美援朝”工作，学生更是强有力的宣传骨干了。比如：我们在学校党支部的领导下，搞了一批街头剧、歌表演和讽刺美帝国主义的滑稽小品，到集市上演出，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赵金玲同学演唱的《王大妈要和平》，唱到哪里都会赢得一片热烈的掌声。当然，我本人除了主抓这方面的组织工作，还担任了每次集会的“时事报告员”。也因为我工作特别努力，被中共任丘县委评为“模范宣传员”。这里有一个至今难忘的小故事，值得一述：那是1952年秋末，我在学校门口发现了一位志愿军女战士。她身穿札了竖条的绿色志愿军军装，英姿飒爽。我便冲上前去，拉着她的手说：“你好！志愿军同志！我们天天在报纸上看到你们的英雄事迹，今天总算盼到你来到了同学们跟前，请你到学校给我们做个报告吧！”那女战士微笑着说：“实在对不起，我要赶车回部队去。你们想听志愿军的英雄事迹，不久就会有志愿军英雄和朝鲜人民军英雄报告团回来了，这个报告你们肯定会听到的。”可是，我还不肯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就退一步说：“那你到我们学校坐一小会儿，和同学们见个面，大家也会非常高兴的。”她见我的态度实在诚恳，就采取了个通融的办法，说：“小同学，我给你留个地址，咱们通信好不好？志愿军打仗虽说很紧张，但还是愿跟你们通信的。”说完，她立马给我留下了朝鲜志愿军某部卫生营的地址，并写下了她的名字“史书玲”。从她那亲切的乡音里，我又问清了她的老家是

任丘县北辛庄乡人。

说来有趣，经志愿军女战士史书玲这么一提议，我猛然联想到同学中也有亲人在朝鲜前线呀！比如八班李文静同学的哥哥李福印，在志愿军某部当医生；五班石金花同学的哥哥石信忠，在志愿军某高射炮团当团长。我就这个契机干脆发起了一个给志愿军写致敬信和慰问信的活动。志愿军的回信就贴在我们办的《校刊》上。学校副校长兼党支部书记苏鸿章老师发现了这一作法，他十分称赞这件事，专门跟我做了一次谈话。只见他十分亲切地说：

“你的情况我了解一些，可以说，你是在党的怀抱里长大的，也是新中国较早的一批青年团员。这二年学习也好，参加社会活动也好，都做得不错。一个大优点，是对党的意图理解比较快。这次跟你谈话，就是要求你不要骄傲自满，继续努力，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

“啊，入党……”我激动地重述着，又道：“苏校长，你说到我心坎里去了。我们一家子八口人，已经有四个共产党员，我早就盼着入党呢！只是我岁数不够呀！”

“岁数倒不是什么大障碍，”苏校长非常明确地说：“古人云，有志不在年高。我们都知道女英雄刘胡兰就是15岁入党的么！你们班里的钟沛棠、崔明泽还有八班李秉哲也都是十几岁入党的。主要看够不够条件。要知道，战争年代造就英雄，新中国的革命斗争环境同样造就人材呀！全看你在实践中怎么努力了。”

“苏校长，那下一步……我该从哪些方面努力呢？”

苏老师见我努力心切，就一字一板地说：“新中国的学生，当然首先要学习好，掌握好工作的本领。比方说，将来你毕业后要去教书育人，要把孩子们培养成共产主义的接班人。你没有学好本领，

怎么去教书育人呀！但是，你又是青年团员，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就不是一般的学生了。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更要站在党的远大理想和革命路线的高度，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带动同学，团结在党的周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具体地说，就是大公无私，自觉多做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事，多做有利于同学的事。一句话，把革命的大目标和脚踏实地的具体行动结合起来。如果一个人懒懒散散，得过且过，或者只是‘闭门读书、不问窗外事’，那样子不要说做共产党员，就连做一般人的本份也无从谈起了。”

我听着苏校长这深沉而有力的教导，心里更加明亮，便忙着说：“苏校长，我一定照你说的努力去做。”

从此，我便开动脑筋，除了在学习上加劲努力，就是在做好党的助手、坚持革命理想上做实打实的工作。比如，我是学生会宣传部长又是团总支宣传委员，还兼着《校刊》主编，就利用这个阵地，和各班宣传干事一起，搞起了全校的“读革命书，谈革命理想和实践”的活动。跟我一起办校刊的八班宣传干事李文静同学，十分积极和能干，她成为每期校刊的杠杆编辑。当时，大家读的热门中国革命书籍有：吴运铎著的《把一切献给党》、方志敏著的《可爱的中国》、丁玲著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外国文学作品有苏联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日日夜夜》以及捷克共产主义者伏契克的《在绞刑架下的报告》等，我们就一期接一期地发表大家的读书感想，引导和创造同学们追求理想、积极向上的革命气氛。这一作法受到团总支和党支部的表扬。

学校还有一个令校长和老师头疼的问题，就是十五、六的学生中有的开始谈恋爱，当时少说也有五对。因为搞恋爱常常晚上到校外去，敲了熄灯钟还不回来，不得不派出学生去寻找。因为搞恋爱

上课不静心听讲，竟偷偷地写情书和情诗，影响了学业成绩。更有的过于“开放”，公开在学校的花池中卿卿我我，造成不良影响。虽说就这么几对，可要简单地硬性压制，就可能压出严重后果。如果放任不管，就可能引发蔓延之势。为这事，不光老师和校长费了很多精力，就是团总支和团支部也常因为查询和堵截引发没有结局的口角和争端。怎么办呢？我就以一个团支部书记的名义，给《中国青年报》写信求教。报社对此很重视，很快给我发来一篇打印清楚的专文。此文从青春发动期的多变和承受能力的脆弱，讲到早恋的不稳定性。又从早恋的不稳定性讲到对青年心理和生理冲击的严重性。由此断定早恋是有害的。但是，对早恋发生的必然性又不要大惊小怪。专文提出：对这类事情的处理应该实行“既不提倡又不简单硬性制止”的方针。做为老师和团组织，对于早恋的学生不要歧视和讽刺，而应该采取正面教育的因势利导、规范道德观念和纪律观念的办法，使之逐渐自觉走上趋于健康的轨道。看了这篇专文，我的心一下子亮堂了，忙着把这篇专文送给苏校长和班主任老师看了。他们都认为这篇专文论理深刻，方法得当，一致同意照专文的意见办。从此，我们再也不干那种查、找、堵、截的傻事了，改成满腔热情地关怀，倡导在长知识、长身体的学生阶段，发展学习上的互帮互助、生活上互相关心的友谊关系，争当遵守道德和纪律的模范。这么一来，早恋者的自制能力增长了，曾经沸沸扬扬的“早恋”现象开始进入正常的轨道。这里需要补述的喜事是：几对早恋者毕业后都适时结婚，而且相亲相爱到白头。

1953 年的春天，教授物理的高俊卿老师“悄悄”地病了，而且一病就是近月。高老师爱和同学们开玩笑，还经常参加同学们的体育活动。他为了培养大家的坚韧精神，常常用“冷了迎风站，饿了

挺肚皮”的豪言壮语鼓舞大家，同学们都很喜欢他。听到高老师病了的消息，大家都想去看望。可是，班主任边广义老师却总是委婉地劝阻。我去询问高老师的病情，边老师也有点闪烁其词，不肯细说。后来我到苏校长那里打听，才知道高老师并没有什么大病，只是裆里长了一个无名毒疮，比较顽固。多方治疗，不见收效，已经溃烂得不便走路。一听这情况，我立刻想到了家里治“瘰癧脖子”和毒疮的有特效的秘方，就对苏校长说：“我家有治疗恶性毒疮的祖传秘方，效果非常好，能不能拿来试试？”

“祖传秘法……”苏校长迟疑道：“知道是什么机理吗？有没有副作用？”

“听爹说它的机理是以毒攻毒，怯腐生机，没有副作用。”我肯定地说着，又补充道：“此方从我爷爷那一代执方施治，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还没听说有失败的记录。”

“啊？”苏校长惊疑道：“这么好的宝药为什么没进入药典？”

“听爹说，祖传秘法不得外传，历来如此。”

苏校长听我这么一说，沉了一下道：“要是进入了药典，就能造福广大群众了。这样吧，因为是非医院处方，我和高老师商量一下再通知你。”

第二天中午。苏校长通知我到高老师那里去一下。我一下子就猜到这事八成是成了。便一溜小跑着来到高老师宿舍。只见高老师仰卧在床上。见我进来，便吃力地想起来迎我。我赶忙上前扶着高老师说：“你别动，同学们都为你的病着急呀！希望你快点好了。”

“咳，我这叫什么病呀！”高老师苦笑着，用他那惯常的幽默口气说：“医生们也判定不了，我给它定了个名就叫‘无名毒疮’吧！你家那祖传秘法都是治过什么毒疮呀？”

“听爹说，只要是流黄水的毒疮都能治。治流脓的疮更是‘轻而易举’了。”

高老师听我这么一说，“嗨”了一声，朗声笑道：“我这毒疮还真是流黄水，从里往外烂，已经有枣大小的空洞了。快！给你钱，代我取药去吧！”

“高老师，不要钱的！”我执着的说：“听爹讲，我爷爷有训示，要是治好了你给传个名就行啦！”

“噢……”高老师顿悟道：“我明白了，你家一定是中医世家。咦，咦，这祖传秘法你学会了吗？”

“我现在还没学会。但是，我哥和四姐都学会了，下一步就该着我学啦！”

高老师听我这么一说，又朗声大笑道：“你哥掌握了这独门技术就是教育科长兼医生啦！祖传秘法也就成了大众良法了！因为他 是为人民服务的老共产党员嘛！”

高老师的几句话，对我触动很深。“是啊！任何一技之长如果不和为人民服务结合起来，则只能是有限的一己之利益，那还有什么造福于民的伟大的意义呢！我一定要想法把秘法送到卫生医疗部门去，变成服务大众的良方，造福于人民！”怀着这样的信念，我回家帮助爹配了两大瓶药膏。真是药到病除，不到一个月，高老师康复上岗，又开始为我们上课了。

无独有偶。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正当我参加的学校军号队训练休息时，一个约摸十一、二岁的小男孩，脖子上围着药布，歪着脑袋和其他孩子跑过来，观看我们那闪着金光的军号。我望着他那有点脏兮兮的药布，心里一热，同情地问：

“小朋友，你那脖子怎么啦？”

“长了鼠疮。”

“呀，鼠疮就是‘瘰癧脖子’呀！怎么治着呢？”

“不治了。没办法治。”

“谁说没办法治？我给你治。你叫什么？住哪？”

“我叫骆小小，就住在你们学校对门。”

“那你知道骆连宝街长吗？”

“知道，那是我爹。”

“回去告诉你爹，告诉你娘，就说有个姓高的学生能治。肯定能治好的！”

骆小小高兴地点头走了。可是，不知为什么一直没听到小小家的回音。有一天，我有事到校外去，正好碰上小小和他娘站在门口。就见小小指着我对他娘说：“娘，就是那个小叔叔说要给我治……”

“哎，他小叔叔呀！”小小他娘大声喊住我，又道：“俺听小小说了，总也没好意思找你张嘴。你说孩子这病有法治么？”

“能治。我爹就专治这个病，保证能治好！”

“那得花多少钱哪？”

“不要钱的。治好了你给宣传宣传就行啦！”

“啊，有这样的砝码？”

“有，这就叫‘为人民服务’！”

“噢，共产党就讲为人民服务，你家肯定是共产党喽！”

“是的。等我回家就把药给小小取回来。”

“那就托共产党的福，小小的病终于有救了。”

我又一次赶回家去，帮助爹给骆小小配了两大瓶药膏。一个月后，小小的“鼠疮”痊愈了。一家人感动得不得了。非要小小当我

的“干儿子” 不可，我坚决推辞，小小他爹骆连宝最后讨价还价说：“那就认你个干叔！”我说：“干叔也不当，就当个小叔叔吧！”

事情就这么定了。骆连宝夫妇总觉得还应该有所表示。一方面他们去找苏校长，为我表功；另一方面，带上点心，领着小小，来到我家表示了谢意。

1953年七月一日，在中国共产党建立32周年的喜庆之日，根据我入校两年多的表现，经锺沛棠、崔明哲两同志介绍，学校党支部大会讨论决定，17岁的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和我同时入党的还有17岁的女同学石金花。

第 10 章 前进路上突降重任

1954 年 7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建党 33 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对我来说是双喜临门：一喜是我的预备党员，经过党章规定的一年预备期考验，党支部大会顺利通过我转正；二喜是学校领导决定，毕业后的我，被留校做青年团专职干部兼教导处教导干事。和我同时留校的还有同学张书香。他分配做图书馆工作。书香同学长我两岁，早我一年入党。她是学校团总支组织委员，我称她为“老学姐”，工作上配合得相当好。这次共同留校工作，自然是一件互相高兴地事情。还有一件令人激动的事是：正赶上暑假，一下子发了两个月的工资，每月 45.5 元，两个月合计 91 元。我俩惊喜得简直不敢去接。因为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哪！按照那时候的货币价值，就是说，那非常非常低的物价，这 45.5 元是一个含金量相当高的数字。在机关工作七、八年的干部也不过如此。再加上我俩一不吸烟，二不喝酒，更不会下饭馆，勤俭的日子过惯了，这么多钱还真不知怎么花。最后两人不约而同地决定：“把钱全部交给家里，自己用钱再向家里提计划。其他同学都和母校告别，去当小学的人民教师了。我们几位要好的同学刘增、王振远、王树德、李志新五个人，跑到城东南角的河滩广场照了个合影像，至今六十多年过去了，由于老伴心细，放在保险箱里，仍保存良好。

九月一日开学，又传来师范和不久前筹建的任丘中学合并的决定。今后停止师范招生，以“任丘第一中学”冠名。中学校址就设在师范南边 300 米的地方。此处旧称“刘家花园”“”。因为战乱，花园的风光已不复存在，但留下一口甜水井，甚是有名。县城几家

茶馆，不论远近，都要推车到这里取水，卖的就是“刘家花园甜水井”的名气。任丘中学就在这里拔地而起。排列有序的教室和宿舍，宽大的操场，六个班的学生，再加上学习俄语发出的伊哩哇啦的声音，比原来师范更有一种崭新壮观的模样。那工夫，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特别祥和，教育兴旺，经济建设日新月异。人们干起工作来热情奔放，勇往直前，都有一股使不完的劲。

1954 年入冬，我做为刚上班不久的任丘县第一中学共青团专职干部，和韩介华老师一起赴京参观苏联农业展览馆。这次参观，是由天津专署根据上级指示统一组织的。任丘县的农民代表、机关干部代表和各方面的人士，组成十几个人的参观团，由农林局长带队。先坐汽车到保定，然后转乘火车进京。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更是第一次到保定进京城。火车上的一切，对我这个 18 岁的小青年来说，十分陌生和新鲜。那墨绿的长龙式的车厢，雄壮威猛喷着热气的火车头，干净得放光的米黄色硬座，铺有洁白桌布的临窗板桌，敦实厚重、白底兰字的陶瓷水杯，金属制作的卧式痰盂……还有我不敢轻易动摸的厕所把手。这火车上的厕所，因为没有进去过，又怕去了扭不开那开关的把手，只得靠近一点看别人去了如何拧法，直到看出门道，我才敢到厕所去“方便”。火车开进北京城，眼珠子滴溜溜转着，看这看那，真有点不够用了。那高耸的城墙门楼，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川流不息的电车、汽车……这是乡下人做梦都没见过的盛景。火车在前门总站停车后，团长宣布：“下车后到广场站队点名，届时将有北京的大轿车送往西山宾馆”。团长还特地嘱咐我：“小高同志，你年轻热情，替我张罗好大家，咱头一次进京，可千万不能丢下人啊！”我虽然高兴地答应了，可心里还真有点嘀咕：“我也是头一次进京呀！谁知会碰到什么想不到的情况呢……”

正嘀咕着，点名开始了，还真少了一位老农。团长叫我快去找找。呀，到哪儿去找呢？广场上人很多，大海里捞针谈何容易？猛然间，我脑瓜一拍有了主意：“他会不会去厕所大便？有些人大便不通畅，拉线屎，要费点时间哩……”我飞也似地奔向厕所，嘿，还真找到了。那老农正在厕所着急呢！他一见我便说：“哎哎，小同志，你快过来帮我一下……”等我凑到他的跟前，那老农苦笑着小声道：“我早拉完了，这里没土圪垯，就是擦不了屁户呀！你快来扶住我，干脆用自己的鞋底子擦吧！真丢人哩……”我忙扶住他安慰道：“这不丢人，农村和城市不一样么！等咱农村发展了，就跟城市一样也用卫生纸擦屁户了。”

我和老农返回队伍，大轿子车还等在那里。我扶老农上了车，就听一声马达轰隆，大轿子车直奔西山驰去。

西山宾馆一栋又一栋的大楼，十分端庄气魄。每个屋子都是全新的软床，扑脸的暖气。这下可难坏了我们这些睡惯了硬床土炕又穿着厚棉袄的乡下人。在屋里热得冒汗，干脆把棉袄脱了，睡软床稍一翻身就忽悠忽悠的，硬是睡不着，干脆下床躺到地毯上睡。但是，吃的却非常痛快和新鲜。“西红柿炒鸡蛋”，吃起来酸香可口，吃完了还想吃，因为那时农村还大多没种过西红柿呀！“葱头炒肉丝”，清香味美，百吃不厌，因为那时农村还没兴开种葱头呀！

“虾仁冬瓜汤”那浓浓的海鲜味道加爽口的冬瓜，也是喝起来没够，因为那时农村有得是西瓜和北瓜，却很少见到冬瓜。“大馅馄饨”肉嫩皮簿，像带翅膀的小包子，奥香扑鼻，吃起来像饺子又不是饺子，大伙也从来没见过，我们这些乡下人干脆就给它起了个形像的名字“片汤带馅”。

第二天，我们来到了苏联农业展览馆。在这所新建的西式建筑

的展览馆里，大伙开的眼界就更大了。这里有各式各样的农业机械化设备，还有苏联厨师掌勺的西餐厅。西餐厅桌上摆着杯盘和刀叉，我们都舍不得花钱享用，说真的也不会享用。只得看看人家叉叉又割的比划就退了出来。那些摆放有序的耕地不用牛、种地不用耩和收割不用镰的洋机器，成为我们参观的重点。原来认为拖拉机耕地是和犁一体的，一听讲解才知道，挂上犁具可耕地，挂上耙具可耙地。原来认为收割机无非是带替镰刀而已，听了讲解才知道，这收割机竟是收割、脱粒、装袋一条龙的作业。看了这玄妙至极的农业机器，我们一下子就瞧见了中国农民的美好前景：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走集体农庄的道路，用不了多久，中国的农业也一定会像苏联那样实现机械化。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在参观过程中，一位苏联专家主动和我攀谈。通过翻译我知道他叫茹科夫，他想和我座谈一下参观的感想，我高兴地同意，便来到了他的办公室。这是我第一次会见苏联友人，也是第一次享坐苏联的真皮沙发，更是第一次感觉坐沙发比坐硬板椅子舒服百倍。这时通过翻译就听茹科夫说：

“我已经知道，你是做青年工作的。青年工作天性活跃奔放，想听听你对苏联展览馆的印象。”

“苏联的农业机械太振奋人心了。她给中国农民展现了明天非常美好的前途。只是今天的中国农民，在毛主席领导下，刚刚开始走农业集体化道路，已经有了很多农业互助组和一批农业合作社。我这么想，如果苏联这样的展览馆多展览几次，让更多的农民看到中国农业明天的美好前途，就会产生更大的轰动效应，这对加速中国农业的集体化具有不可想像的战略意义！”

“你的意见是对的，”茹科夫说：“这些农业机械展览完毕，

要全部送给中国放到各地去搞示范。示范中农民有什么意见，希望你能写信告诉我。”

我忙着顺势说：“这个我完全能够做到。只是……还不知道我所在的县能否成为示范点。说心里话，如果有这个可能，我真想改行做一名拖拉机手，连我的驾驶体会都告诉你！”

“希望你能如愿！”茹科夫亲切地握着我的手说：“我们交换一下通讯地址。”在交换完通讯地址之后，突然进来几位穿裙子的苏联女技术员，茹科夫像

“嘟噜”了几句我们交谈的情况，她们便笑声朗朗地和我握手，嘴里说着“约钦哈罗绍”（谢谢的意思）。遗憾地是，事后任丘县没有定为苏联农业机械的示范点，我们之间的通讯也未能进行。

1955 年暑假前夕，学校接到专署总校部通知，说是暑假教职员不放假，要集中到杨柳青中学学习。学什么？没有讲。学校领导找有关方面摸底，得到的回答是：“还不清楚。”就在大家猜这猜那不知底里的时候，我却破天荒地得到了消息。详细情况是这样的：

一天上午，我意外地接到县公安局的电话通知，叫我立刻到局办公室开会。我有些奇怪。要说去团县委开会这是常有的事。这到公安局去开会真是第一次呀！等我骑车来到公安局办公室，嘿，局办公室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开会的迹象。这工夫，却见我早就熟悉的局文保股长杜兴才微笑着迎了进来，他热情道：

“说来就到了，快坐下。我给你倒杯白开水，咱慢慢说。”

“不渴不渴，有什么事你快点说吧！”

杜股长也不客气，他坐下来郑重其事地说：“今天谈的可是大事啊！中共中央决定，在教育系统开展肃清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暑假先从中学开始，全区中学教职员都集中到杨柳青中学。专区的领

导机构称‘中教学习委员会’，县里由中共任丘县委五人小组领导。任丘中学么，成立学习组，县委决定由你来担任组长！”

“啊？”我震惊道：“我哪能担起这么大的重任呀！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可那到底是动物界的事情。这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是天大的事呀！我参加工作不过一年，入党也只有二年，论能力和经验，我都难以胜任呀！咦，学校里不是有校长和教导主任么，为什么不让他们担起来呀！”

杜股长见我畏难推辞，这位 1940 年就跟日本鬼子打游击的老战士严肃地说：“这不是一般的教学业务。教学业务自然归校长、主任管。现在讲的是‘肃反’，是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就是要由没有任何负担的同志牵头负责。不要推辞了，你是共产党员。要坚决服从县委的决定！”

“可是，可是……”听完杜股长这严肃有力的谈话，从组织原则上已经没可说了。只是对这‘肃反’的来龙去脉我还不那么清楚哩！就小心地问：“几年前咱不是大张旗鼓地搞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吗！这‘肃反’和‘镇反’有什么不同吗？”

“‘镇反’是把那些明面上的敌人收拾了，‘肃反’是清理那些暗藏的反革命呀！从某种意义上说，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比镇压那些公开的敌人更复杂更艰巨。而暗藏的敌人对我们的无产阶级政权更具危险性呀？”

杜股长给我上了一堂触目惊心的敌情课，使我这个有点天真烂漫的小书生，还真把阶级斗争的“弦”给崩起来了。只是总觉得自己能力不够，就又要求道：“光是我自己还是太单薄了，总应该还有个帮手和最后掌舵的形成战斗指挥部呀！”

“这个肯定会有！首先县委给你作镇。我们培养骨干的数量

和重点嫌疑人的比例是 2 比 1。”杜股长说到这，又鼓励我道：“到时候你能领队冲得上去就行啦！”

“咦，咱县委都是谁领导？你得告诉我呀！”我又迫切要求道：“你知道，咱必须紧紧依靠领导才能打胜仗哩！”

这时，杜股长信心十足地掰着手指头说：“中央有个十人小组领导‘肃反’工作，县委有个五人小组具体负责。比如咱县委有李钦棠副书记、县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卢晓义同志、县监委郝宝兰书记、县团委杜长春书记……咦，事前的准备工作和接下来的实际工作么，杜书纪和我会具体帮助你。”杜股长讲到这里，我那信心还真鼓起来了，便催他道：“那咱就干吧！你是老内行了，说说这第一步怎么走……”

“先摸底，查档案，”杜股长思考着说：“有些要立即安排外调。在一般排查的基础上，进行筛选，确定重点嫌疑人。我这里有些材料你先看看。回头我还要找张校长和苏副校长谈一下，全力支持你的工作。”

七月五日，在经过一定的准备之后，全校 30 多名教职员来到杨柳青中学，同其他十几所学校的几百名教职员一起，分别住在通铺式的宿舍里。第二天上午召开动员大会。中共天津地委副书记刘铭西同志做动员报告。专署中教学习委员会负责人、专署教育科长张景山、地委组织部科长吴伯明分别讲了话。主要精神是讲“肃反”的重大意义，提高认识，认真贯彻党的“肃反”政策和规定。强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动员大会结束后，在学习讨论阶段，就有些教职员主动向组织交待自己的政治历史问题。有的是从来没向组织讲过的问题，其中到底隐涵着什么深层次的问题，必须进行深入的调查后才能作出明晰的结论。比如任丘组接到职员王 xx 的坦白交待，

还真令我大为震惊。他一直是学校的模范管理员，曾多次受到学校表彰，这次却主动交待自己当过卢龙县石门镇汉奸小队长，但不承认有罪恶。教师张 xx 交待自己的大舅哥是公安局处理的“国民党潜伏特务”，但不承认和自己有任何政治联系。教师王 xx，交待自己曾在国民党山东省滕县政府当过秘书科长，但只从事一般文牍工作，后辞职而去。教师程 xx 交待自己当过国民党青年军政工室下级军官，但时间不长就当逃兵。这些都不能先入为主，必须经过深入的调查之后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但那个时候，我们的思维总希望能揪出一批暗藏的敌人才算获得了重大成果。比如那个当过汉奸小队长的职员王 xx，他说自己为混饭吃当了汉奸小队长，不敢去祸害老百姓，大家都不信。更重要的是他隐瞒伪职，解放后又当了学校的模范，大家都认为他是“钻”进来的。自然对他又是教育性攻心，又是批判斗争，希望他能把自己的罪恶主动交待出来，得到坦白从宽的处理。只是斗了半天总也没有攻出一条“罪恶”来。我们只得去进行外调了，到卢龙县石门镇开了许多调查会。经过调查，当地群众都认识这个汉奸队长，说这王 xx 确实比其他汉奸队长好些。我们只得实事求是把王 xx 放下了。那个张 xx 最后交待一个细微的情节是：“大舅哥被公安局抓起来，我才知道他有问题，说他是潜伏特务也只是后来听说的，内里是怎么回事根本不知道。”这时我们就冷静对待了。又是通过提审他大舅哥、又是请专区公安处进行侦定，最后也证明与张 xx 无政治联系给予解脱。那个王 xx 和程 xx 也都是经过外调，没有发现大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解脱的。从这些斗争实践中，我们总结了这样几条重大收获：一是中共中央十人小组规定的“肃反”政策和判定反革命分子的标准是严肃的正确的。不能凭着想当然拔高或降低。从全国全省的角度讲，这场斗争下来，

我们确实攻克了一批敌人暗藏的堡垒，澄清了中教界的政治底数，这对巩固我们的无产阶级政权具有重要意义；二是要敢于实事求是。因为最终都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结论是否正确，就不要想当然的在“批态度”上斗来斗去，毫费了很多时间；三是做好正面的思想工作。曾经的“重点嫌疑人”虽然都实事求是地解脱了，但在感情上也留下某种“阴影”，要消除这些还是需要进一步做好思想工作的。

第 11 章 反右派和大跃进中的我

1956 年初，我得到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中共任丘县委组织部给任丘第一中学发来调令，调我这个学校团委的“专职干部”到青年团任丘县委工作。学校党支部专职书记王化明同志同意照办，张汝良校长却有所保留。张校长是一位原则性很强的老同志，他以中央一再强调的“要稳定教职员队伍”为依据，亲自和县委组织部进行交涉。同时跟我谈话，批评我不安心教育工作，想调到县委去。我感到有些冤枉，申明自己一直是安心教育工作的。本不知道要调动的事。但听说后确实很高兴，因为心里有那个“人往高处走”的传统思维，到县委机关工作肯定能扩大眼界，对自己的进步有利。便干脆直打直地把内心所思跟张校长说了，张校长最终理解了我，就抬手放行啦！到了县委组织部，卢晓义部长亲自跟我谈话，说：“你在学校是教职员体系，到团县委就转为干部体系了。组织上要重新给你定干部级。而你的工资是干部 23 级的数额，在机关干五、六年也不过 23 级，我们考虑你工作时间较短，想给你压低一级，定 24 级，保留 23 级待遇，不知你同意不同意？”我当即高兴地表示：“同意”。并说：“党的信任是最重要的，至于定多少级我不在乎。”

任丘县团委的名声，在全县和天津地区（1961 年划归沧州地区管辖）是很过硬的。它一直被誉为中共任丘县委和天津团地委“特别能战斗的劲旅。”也是一个出“人才苗子”的地方。第一任和第二任书记孙新江和张志新同志都直接调入团省委工作。第三任书记杜长春同志升任中共任丘县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第四任书记崔志明

同志后来奉派“援藏”，升任西藏中共那曲县委常委兼农村部长。我来到团县委，被分配到秘书室当干事，秘书王华新同志22岁，长我两岁，文笔很好，工作起来既热情又细致。其他同志包括书记、部长和干事们，其整体工作氛围，还真跟学校有点不一样。大伙都是那种生龙活虎式的“活跃派”。同志之间既亲密又爽直。比如团县委书记杜长春，就像个憨厚的大哥，因为皮肤黝黑，人们干脆就呼他“黑哥”。副书记崔志明、张根长，工作很有魄力和干劲，被称为身先士卒的“干将”。其他如部长和干事们更是“说打就上”的排头兵和战斗员了。我和华新同志在一间办公室里，整天和笔杆子打交道。以刻腊板为例，因为那时候印材料没有打字机，全是刻腊板油印，我俩从没分过你我，不论是谁，抄起腊板就刻，拿起滚子就印。然后一起把印好的材料装进信袋，送到中共任丘县委收发室，向全县八个团区委和若干小区团委发出，感到非常胜任愉快。有时我随书记下乡，一人一辆自行车，驮上自己的“被褥卷”，来到农民家里，和青年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发现有价值的经验，书记讲讲“思想”，我来书写“条条”，然后俩人再一段一段地润色修改，最后印成《通报》发到基层团支部。如此工作方式，也让我感到既亲切又富有情趣，还能提高自己的思想和写作水平。

2月27日，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这一天，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了重要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县委发出文件，各机关组织集中学习。大家在讨论中一致认为：毛主席在国内外新的形势下，深刻论述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繁荣文化艺术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对马列主义的新发展。它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因此，人们也

都觉得自己的水平又提高了一步：即在学会了掌握处理敌我矛盾的武器之后，又学会了掌握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武器。3月12日，又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中共任丘县委这天传达了毛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个讲话强调重申“放”的方针，并向与会者和各级党委打招呼说，共产党要整风，批评党内存在的“三个主义”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希望大家帮助。我们在深入学习讨论中，对毛主席讲话的亲切语气和宽厚精神，无不十分钦敬和感动。不久，中共任丘县委召开党的整风动员大会。县委书记刘志强同志做动员报告，表示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放”的方针。要求大家打消顾虑，大胆批评，帮助县委搞好整风。并发出邀请通知，请各部门准备意见，参加座谈会，县委领导要亲自倾听批评意见。团县委对此十分重视，几位领导和大家做了认真的讨论和研究，在肯定了县委对青年团正确领导的前提下，最后归纳了几条一般性的意见。到座谈会召开时，到底谁代表团县委去讲，大家又互相谦让了一番。开始是让我代表去讲，后来又换成华新同志去讲。华新同志是个办事爽朗而又诚恳的人。他在座谈会上提的意见更是简单明了：就是要求县委要按照青年特点领导青年工作，并注意听取青年团的建议和要求。他讲到这里，作了个通俗的比喻：“就像打扑克的某些游戏规则‘小管大’那样，有时‘小’可以管‘大’。”开会回来，大家都关心地询问座谈会开得怎么样？华新同志说：“开得比较活跃，大家提意见也很直爽，县委领导同志也非常诚恳。”事情就这么平平常常地过去了。这时候，全国各地，特别是知识界的鸣放正如火如荼，所提意见也更见尖锐、激烈。有些极端过头的鸣放都出来了。比如有人说：“‘三个主义’的根源就是‘党天下’！”还有的提出“共产党不能一党专政，应该和民主

党派轮流做桩”。面对如此极端出格的大鸣大放，我们都有点不知所措。心里说：“这是在善意帮助共产党整风吗？已经出大格了。如此极端过头的意见，到整风后期没法整改呀！”等到六月八日，风云一下子突变：这一天，党中央毛主席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出了震聋发聩的重要声音：《这是为什么？》，一场反击右派言论、打退右派分子进攻的全国规模的阶级斗争，就此拉开序幕。青年团做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自然就成为反击右派的突击力量。但是，令人想不到的是：就在团县委率领青年们奋勇回击右派的时候，中共任丘县委向团县委发出指令：“你们团县委内部也有右派，这个右派就是王华新！他在鸣放中散布反党言论，必须坚决进行批判，肃清流毒！”这个突如其来的指令，犹如晴天霹雳，一下子把团县委所有同志都打懵了。稍事清醒，所有同志都发出这样的不平：

“王华新同志从小热爱党，工作一贯勤勤恳恳，他怎么会是右派呢？座谈会上鸣放的意见也是大家共同的一般性的意见，对党只会有益不会有害呀！”“他讲的那个打扑克的‘小管大’游戏规则，只是一个希望县委要重视青年意见的比喻嘛！即使‘比喻’有什么不妥，也不能上纲到‘反党’上去呀！”为此，团县委的三位书记都到县委给华新同志讲好话，却受到县委领导的严厉批评。好在总共 12 个人的团县委，没有出现一个反戈一击的“风派”人物。大家都心照不宣地采取迂迴战术，对华新同志明批暗保，一门心思的盼着后边能出现好的转机。特别是我，当时县委还交给我一个硬任务：“要看好王华新，防止他自杀。”其实，我和华新同志在同吃同住中早已达成共识：一没有反党，二没有大错，为什么要自杀？自杀了反倒无法说清楚了。只是，我们在帮助华新同志的过程中，犯了一个“天真”的错误：即要求他尽一切可能深刻检讨，争取县委的谅解。

殊不知华新同志再怎么“深刻检讨”也没得到县委的谅解。到头来还是定成了“右派分子”。大家在同情难过之余，又要求领导出面斡旋，千万不能把华新同志发配到专署设在“团泊洼”的劳动营”。一是那里的劳动强度，他那书生般的文弱身子顶不住；二是他那老婆和两个孩子无人照顾。谢天谢地，这一条总算实现了。从此，华新同志被撵出了他一向热爱忠诚的党，又痛苦万分地离开了他生气勃勃地工作单位——青年团任丘县委会，被发配到任丘东边一个边远生疏的地方，开始了默默无闻但仍然努力工作的生活。现在请允许我用倒计时的办法，插述一下 20 年后我会见华新同志的情况：他已两鬓霜白，但“乐天派”的音容笑貌依然未改。1978 年他的“右派冤案”得到彻底平反。接着，他被任命为任丘市水利局副局长。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他钻研业务，勇于实践，为人民服务得十分出色。同时，他在自己的业余生活中也显示出了多才多艺的潜能：成了书法、篆刻、剪纸诸门艺术的行家里手，被誉为任丘市艺术界老有所成的名人之一。

1957 年冬，随着整风整改的深入，团县委内部也发生了如下变化：杜长春书记升任中共任丘县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崔志明同志升任团县委书记。刘振国同志调来担任团县委秘书。同时，中共任丘县委为了整顿和改变一些落后高级社的面貌，决定抽调一批干部挂职到农业社任支部书记和社长。我被内定为惠伯口乡边关村农业社长，和我同时选定的还有任丘县煤建公司副经理杜伟绩同志，他内定为边关村农业社党支部书记。春节一过，县委为我们挂职下去的同志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少先队员为我们戴上了大红花。点名要去的那些农业社也欢欣鼓舞，都派来胶轮大车迎接！我们个个激动万分，表示不改变农业社的落后面貌，决不回来。显示了反右派

斗争激发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边关农业社是惠伯口乡两个最大的农业社之一，有 600 多户 3000 多人，土地 8000 亩。乡党委认为它比较落后，我和杜伟绩同志初步调查后，认为主要是村子大而散，底子簿，土地参差不齐，客观生产条件很差。以西边的洼地为例，近 3000 亩的大洼，古称“边关大港”，土地十分贫瘠。在有史以来“春旱秋涝”的规律下，春天无水灌溉，凑和着收一季麦子，亩产也就是几十斤。秋天就是水涝地了。这个占着总土地面积百分之四十的“边关大港”，自然拖住了生产发展的后腿。但这里的政治根基很好。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共产党的堡垒村，现任党支部书记孟满堂是有名的民兵抗日骨干。解放战争时期又是支援前线的模范。新中国建立后，他还是专署基层干部学校第一批接受培养的老支书之一。因此他也成为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带头人。论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他在农村干部中是属于上乘的。社长郭树山，头脑清楚，精明强干，完全称得上是村里的“能人”。其他相关部门如团支部书记钱淑云、妇联主任郭秀芬、民兵连长孟庚明，也都是有一定文化的青年人，工作很能干。根据这种情况，杜伟绩同志和我向乡党委建议：村领导班子不动，我俩内定的职务不公布。工作上，我俩采取从旁帮助的形式，这样对开展工作更为有利。乡党委同意了我俩的意见。那么，实际工作如何切入呢？经过和党支部、社委会商量，决定抓住影响生产的主要矛盾，就从改变西洼“边关大港”的生产条件入手。秋涝一时治不了，先解决春旱无法浇地的问题。打机井要花钱，一时打不起，就干脆打土井、挖水柜。用双手和汗水实现水利化。这时候大跃进的气氛已相当浓了。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指引下，边关村的干部、社员投入到比、学、赶、

帮的大跃进战斗中，个个干劲十足，确实有一种“一年等于二十年”的英雄气魄。当时青年中涌现了“尖兵连”、“突击队”、“铁姑娘排”；中老年中涌现了“老黄忠”和“佘太君”战斗组。他们高举红旗，在“吃在田睡在洼，不获丰收不回家”的战斗口号下，在西大洼“边关大港”安营扎寨，几天工夫，百十个土井打出来了，像水塘一样的大水柜挖出来了。看着那泉涌的清水，春旱的小麦第一次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春灌，大家激动得欢呼雀跃。中共惠伯口乡党委立刻抓住这个典型组织各农业社前来学习。我和杜伟绩同志也认为这显示了集体力量的创举。但是，在实践当中我们也发现：这种土井水柜的泉水，是有一定局限性的。它可以济一时，却不能济久远。而且因为井壁无法固定，后来大多塌掉了。看来，用这种土法是不能实现可持续的水利化的。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要搞好规划，用开渠引水（附近就有小白河）和机井供水才是科学的种田之道。

1958年5月，我奉调离开边关农业社到惠伯口乡担任乡团委书记。到1958年8月，不过几个月的时间，又奉调到《任丘日报》社做编辑兼记者。这时候，中央决定：全国以乡为单位实现乡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化。从此，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统称为“三面红旗”。我是经历了高举三面红旗的实践斗争和三年困难时期的全过程的。做为新闻记者的我，坚持“尊重事实、捍卫真理”是记者天职的原则，仔细梳理了大跃进的实际情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跃进运动取得了前无古人的伟大成就。比方说，今天大行天下的风力发电、沼气能和太阳能开发，不正是1958年大跃进中首先出现的吗！国内优良品种的培植、推广和引进，不正是在1958年大跃进中诞生的吗！当年传统的玉米品种“灯篓红”普遍改用优种“白马

牙” 和 “ 金皇后” ，单产由原来的 300 斤一跃增加到 800 斤。水稻推广优种 “ 水源 300 粒” 和杂交水稻，由原来单产四、五百斤，一下子增到 1000 斤。还有当年引进国外优种荷兰奶牛、巴克夏猪、澳洲黑和来客亨鸡，不也是在大跃进中发展起来的吗！这期间我们还修了八万座水库，大大遏制了水灾，优化了水利环境。这些完全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亲眼看到的呀！当然这只是农业方面的伟大成就。工业方面的伟大成就更是了不起啦！在当年全国电子工业几近空白的情况下，1958 年和 1959 年大跃进中诞生了我国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第一套电视发送设备、第一台内燃电动机车、第一台 130 吨交流电力机车。我国第一台 40 匹马力柴油拖拉机、我国最大的平炉在鞍钢建成出钢、最大的炼钢厂在武汉开工兴建、我国第一艘自己制造的排水量 2.21 万吨远洋货轮 “ 跃进号” 下水试航、我国第一座重型拖拉机厂建成投产、第一台液力传动内燃机车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座大型氮肥厂建成投产……等等，这些科技含量很高的项目，在新中国初建九年、基础仍相当薄弱的情况下，集中突出的在大跃进中诞生，确实让人看到了 “ 一年等于二十年” 的 大跃进气象呀！至于轰动全国的宝成铁路、鹰厦铁路、包兰铁路、黔贵铁路、兰新铁路逾 3000 公里建成通车，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划时代的交通基础，不也正是诞生在大跃进时代吗？还有一项诞生在 1969 年共和国廿年大庆的时刻，在世界产生了大轰动，就是 “ 大庆油田” 的发现和开发。它一下子摘掉了中国被西方国家长期蔑称为 “ 贫油国” 的落后帽子。我国从此不再靠进口洋油过日子，第一次实现了全国石油自给有余，还有部分能出口创汇。这一切铁一般的事实，都是大明大亮地矗立在祖国大地和植根于人民的心中，是你邓小平瞪着眼说谎话，能否定得了的吗？当然，实事求是的讲，在我们创

造了这些伟大成就的同时，也确实受到了“左”的路线的严重干扰，导致国家出现三年严重困难。这种“左”的干扰主要表现为众所熟知的大刮“共产风”、“平调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和“强迫命令风”，世人统称为“五种歪风”。毛主席当时退居二线，他还是发现了这些问题的，不得不冲向一线多次通过开会和下发文件纠正“五风”，但阻力很大。最后，毛主席不得不破天荒地直接给省、地、县、社、大队、小队六级干部写信，要求他们要敢于抵制和纠正这五种歪风。直到1962年党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才算基本统一了认识，走上了健康的轨道。对于这一段的严重挫折，毛主席做为主席主动承担了责任，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但是，他老人家并没有点出党内那两位大刮五风的始作俑者，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的总书记邓小平。等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修正主义头子邓小平篡党上台后，为了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他不仅否定了社会主义的“三面红旗”的正确性，还把刘少奇和他大刮五风的“左倾”错误，一股脑地扣到了毛主席头上。这当然引起党内一大批老同志的反击。原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在他公开出版的《回忆毛主席》一书第72页有一段话，非常鲜明地还了毛主席一个清白。他这段话的原文是：“在大跃进运动中，开始自己因毛主席的再三嘱咐，还是比较谨慎。但到了六月份就随大流了。因为当时的形势是：把宣传口的中央领导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思想解放，敢想敢干’的呼声压倒一切，而毛主席的留有余地压缩空气的声音微弱。在当时中央领导层中，他是少数。所以我只好‘随大流’，跟多数中央领导走，特别是跟把宣传口的刘少奇、邓小平走。对于1958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鼓吹‘五风’的错误，应是把宣传口关的中央领导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负责。当然，虽然

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 1958 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感内疚”。这里我想再补述一句：邓修集团把他的改革开放吹上了天，真是太不要脸啦！如果没有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人民创下的这些前无古人的物质基础和强大的外交环境，你那个对内“改革”能用巧取豪夺的方式，把国家和人民的财富装入自己的腰包吗？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创下的强大的外交环境，你那个对外“开放”恐怕都不会有什么人理你。所以，正是你利用党和人民大众创下的丰厚物质基础，来了个投降主义的“和西方资本主义接轨，为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输送了天文数字的资源 and 利益，把好端端的社会主义中国变成了人家的附庸，人民在重尝二遍苦受二茬罪呀！

第 12 章 当记者和当社员的一些回忆

1958 年八月，适应大跃进形势的需要，全国各县都办起了报纸。我奉调担任了任丘日报编辑兼记者。做为中共任丘县委机关报的《任丘日报》，总编辑是县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杜长春，副总编辑是杨宝坤和崔建忠。后来杨宝坤奉调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日常工作就由崔建忠主持。我们这些刚刚进入新闻战线的人们，都觉得新闻业务很生疏。过去在单位写个报告、简报、通报和总结什么的，还没有难住过。要是论起怎么写新闻和《通讯》？怎么写社论和评论……可就真有点不知所为了。这时候，由共青团河北省委团校下放到任丘工作的刘凯元同志，因他曾在《河北青年报》工作过，就请他来给大家讲过一次新闻和通讯怎么写。凯元同志留下了一句写作方法的名言：叫做“写新闻消息是先‘总结’后‘过程’，写通讯是先‘过程’后‘总结’”，大家如获至宝，都牢牢地记住了这个简约的模式。有一天，河北日报记者芮英杰同志来任丘采访，领导又把他请进来当老师，要求他讲讲大家遇到的关于写作方法的难题。芮记者很是惊异，他一针见血地说：“我认为今天新闻记者的难题，首先不是什么写作技术或技巧上‘怎么写’的问题，而第一重要的是‘写什么’的问题。我们常常因为眼力不够，抓不住当前整个工作中的根本性问题、要害问题或关键问题，被领导批评为言之无物的‘白开水’或面面俱到的‘万金油’。至于新闻、通讯或评论怎么写的方法和技巧问题，那根本算不上什么大难题。大家完全可以用自己认为新颖的方法和技巧去闯练、去创新嘛！不必局限于千篇一律的模式，真要是那样子‘照模子脱坯’，就犯了毛主

席批评的那种封建社会流行千年的‘党八股’毛病啦！”大家听了芮记者的一席话，顿时受到很大震撼，一下子认识到：“要做好党的新闻战线的工作，首先是思想理论水平高不高、观察问题的眼力够不够的问题。为此我们摆到第一位的应该是：学习好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学习好党的大政方针，掌握好思想和理论武器。至于写作的方法和技巧，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勇于创新，形成自己新颖的风格和特点，而不必在‘照葫芦画瓢’上用这么大心思了”。

1958年10月，为适应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需要，全国兴起了“合并县”的运动。任丘县和相邻的文安、大城两县合并成任丘大县，刘庆详同志任县委第一书记，刘志强同志任县委第二书记，杨连甲同志任县长。郭厚坦、马歧山、陈建同志任书记处书记。任丘日报为此发表套红的头条新闻，其通栏标题是：《任文大三县合并，赛过桃园三结义》。这个标题，人们开始看了都觉得新鲜有趣，也都希冀三县合并后要像刘、关、张“三结义”那样亲密团结。当时没有人提出如此比喻有什么不妥。后来随着大家思想水平的提高，认为今日之任、文、大三县合并，不论是团结的对象和团结的思想基础，都跟刘关张所处的封建时代有着根本的区别。用这样的典故来比喻社会主义今天的“任文大三县合并”的关系，显然有失准当。对此，县委领导诚恳接受了大家的批评。

那个时候，在新闻报道中特别强调发现“新生事物”，进行大张旗鼓地宣传。而在那个发扬“敢想敢干”革命精神的大跃进年代，“新生事物”还真的涌现不少。这给记者采访增添了非常活跃的内容。但也出现了某些并非是“新生事物”却当做新生事物大肆宣传的怪事。比如任丘县出现了一个以“琴”字做名，姓氏却不完全相同的九个姑娘。她们冲破世俗的铁板式规定，以无比的勇气，组织

了一个给牲畜配种的“九琴配种站”。这件前无古人的惊人之举，自然引起了轰动效应。当时地级报纸和任丘日报都有相当份量的正面报道。对此，我做为一个新记者，也听到了一些干部群众批评的声音。这种批评声音认为：“牲畜配种做为畜牧事业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应该也必须有专业人员去干，但不宜叫九个姑娘出这样的风头。这种有违民意民俗毫无群众基础的荒唐事，只能热闹一时，绝无持久的生命力”。但是，这种批评只能在“地下”讲，不能公开谈。因为领导上肯定了，报纸上宣传了，你要是公开唱反调，就会被认为是“打击新生事物”，进而要受到批判。在这种社会氛围下，我却破天荒地听到新来的县委第一书记刘庆祥同志发了一通“反潮流”的意见。他虎脸对当时领导“九琴配种站”的县兽医站负责人说：“这当初是谁出的主意，要搞个‘九琴’配种站？妇女要干的工作很多，为什么要鼓动她们去做本不适合她们去做的事？试想换个位置看看，要是让自己的姐妹去干这样的事，你会同意吗？”那位负责人尴尬得无言以对。因为这个所谓的“新事物”正是他鼓动起来的呢！刘庆祥同志原是河北省民政厅副厅长，有着很高的思想水平和优良作风。他是河北省委特地选派到任丘县委做第一书记的。庆祥同志发现了这个只能说“好”的所谓“新事物”，公开以县委第一书记的身份慷慨陈言，令我十分震惊，也十分钦敬。便忙着把此事告诉了县畜牧局副局长周沛德。周高兴地说：“庆祥同志说到我心坎上来了，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只是不敢说呀！现在庆祥同志明确表态了，我立刻找马歧山书记说说，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很快，周沛德同志又告诉我：“已经和马书记商量好了，改‘九琴配种站’为‘九琴防疫站’，女孩搞防疫还是大有可为的”。不久，周沛德同志传来更新的消息：“‘九琴防疫站’的事

又有新进展，马歧山书记向地委汇报了，地委提出改成‘九琴畜牧工作队’更好。这件对我困扰不小的心事，总算是圆满解决啦！”

我还经历了刘庆祥同志另一件“反潮流”的事情。他下乡调研，竟然发现有些社、队成立的养老院，硬是把入院的老年夫妻分开住。还编成了班、排、连的军事编制，进行战斗化的学习和操练。如此荒唐作法竟也美其名曰“新事物”大肆宣传。庆祥同志禁不住非常生气地说：“这是谁出的主意？简直是胡闹！孤老人入院老有所养，这本来是社、队集体经济兴起的一件大好事嘛！我们应该给老人们创造一个安静、舒适和幸福欢乐的环境才对。怎么能叫老年夫妻分开住、还要搞什么军事化操练呢？！老夫妻在一起互相照顾，非常重要。比如挠挠痒痒、按摩腿脚、洗澡擦身……这些由工作人员去做就不如夫妻互相来做更好，难道连这点常识也不懂吗？”经过庆祥同志严肃批评，那些走偏的养老院都做了纠正。只是庆祥同志如此扎实稳健的正确思想和优良作风，在 1959 年那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中，却蒙受牵连。虽然他因心脏病正在休养，仍然受到任丘县委背靠背的批判后调走。

这一年在我的生命史上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即九月十六日我结婚了。爱人的名字叫刘淑琴，是任丘县汜水公社大王果庄的一位知识青年。说起这件终身大事，在那个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高高飘扬的火红年代，仍然是自由恋爱和传统的媒妁之言及父母之命并存。有一种介乎两者之间的成婚形式却相当普遍，这就是有人介绍，双方同意，父母做开明表态，不加干予。我俩的结婚就属于这一种。但开始见面的形式，却有点难以忘却的戏剧性。

那是几个月前的一天，团县委书记刘振国同志对我说：

“恩泽，你岁数不小了，该考虑找对象了，等我给你介绍一

个！”

“好啊！”我说。

嘿，刘秘书说完就放下了。好一阵子再没有提起过。有一天上午，他突然邀我到他老家大王果庄看看，我骑上车子就跟他去了。他家的二嫂大珍十分热情，除了斟茶倒水，便忙着下厨房去了。当然，刘秘书也不忘到厨房去张罗一通。不过，这次午餐没有上酒，只是先后端上了烙大饼炒鸡蛋。多少年来这已是农村待客的美食了。我俩高高兴兴地吃完，他悄声问我：

“喂，看清楚了吧？刚才给你端饭的姑娘，就是我要给你介绍的对象。”

“啊？”我惊异道：“你怎么也不介绍一下呀！真是的，我连句客气话也没说哟！”

“嗨，咱不搞那种客套，这算是我的一种‘创新介绍法’呀！先说说你的第一印象。有啥说啥。那姑娘不是外人，是我当院里的妹妹。她21岁，共青团员。小名淑谕，大号刘淑琴”。

刘秘书爽快地说完，一双有神的明眸望着我。说真的，因为没有相亲见面的思想准备，人家热情地把饭菜端上来，我哪能着眼细看呢！不过，大体的模样还是能回忆起来：比如白皙的“日”字脸型，苗条的身段，个头不低，还有一双浓眉大眼……总的印象很好。便爽直回答道：“可以吧！咦，只是不知道人家对我的印象如何……”

“据我了解，也可以吧！我看你俩有一种天赐的缘份。我这介绍人的任务算是完成了。下一步就靠你俩联络了。”

“呀！就这么简单吗？”我有点不解。

“对。刚才不是讲了我的‘创新介绍法’么！你是记者会写文

章，建议你首先发出求爱信……”

“那好！”

我不假思索地表态同意。这时，我猛丁悟到了“冥冥之中有定数”这个流传了几千年的古语。你想，人家一个有一定文化的大姑娘，并没有同我长时间的接触谈话，只是间接性的了解了一点，又看了我那么一眼，就独具眼力的认为“可以”，这不就应了社会上常有的那种“有奇遇必有奇缘”的幸运典故么！不过，后来用唯物论辩证法来分析，好像也没有那么多的玄妙。最客观的形势是：我俩第一都相信刘振国大哥的权衡和论断；第二他当介绍人对我们双方都很知底。这就构成了“轻轻一点成伉俪”的物质和思想基础呀！

事后我俩互相通信，又见过几次面，就顺利地把婚姻大事定了。中间没有交换任何礼物，也没付出任何彩礼。九月十六日，经组织批准，城关镇政府登记，我俩在任丘日报食堂举行了简约的婚礼。

县委常委兼办公室主任彭建之同志给我俩做了热情洋溢的证婚讲话。婚后，随着相互了解的深入，感情也更加深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爱人是一位知书达礼又勤劳勇敢的女孩。她出生在一个比较殷实的农民家庭。其伯父刘香久是中华民国大总统孙中山先生麾下的师长。姑父郭宗汾是国民党华北剿总傅作义司令的副手。1949年，他协同傅作义将军响应共产党毛主席的召唤，共同起义，走和平解放的道路，回到了人民一边。并担任了新中国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共同纲领》的制订。正是这些解放前后社会氛围的影响和教育，造就了她相夫教子和孝敬公婆以及谦和待人的美好品质。我们结婚不久，父亲即因身患血癌而卧床。当时求人理发不大方便，她便自己练习着用推子给公爹理发，此事

在亲友和乡亲中间一时传为佳话。1959 年九月二十七日，父亲不幸病逝。其时她刚刚生下长子建军，差三天不足满月。因为身体虚弱，身边亲人劝她就不要参加丧礼了，但她有自己的传统考虑，却毅然从县城赶来老家为公爹送终。后来我母亲患病，她又以一个孝顺儿媳的风范，侍奉在前。母亲两次转危为安，除了医疗方面的得力，儿媳侍候周到细致，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母亲每每跟我提到自己的爱人，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淑琴说的话我爱听。她做的饭我爱吃，干的活我看着痛快。今后你为人处事要多听听她的意见。”爱人在任丘县麻绒厂当工人，也是一个心红手勤的好工人，多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她们生产的麻绒是国家出口产品之一。

（注：我这段恋爱结婚的故事，2017 年 5 月 15 日的《书刊报》，以《没有彩礼的婚姻也幸福》为题公开发表。）

1959 年初，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指引下，党中央提出了继续跃进的口号。同时，毛主席发出了“三门”干部 下放劳动锻炼、实行知识分子劳动化和劳动者知识化的重要指示。我正是这种出了“家门进学门、出了学门进机关门” 的知识分子，当然要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过好知识分子改造这一关。便马上贴出大字报报名。领导经过研究同意了我的要求。县直机关包括我在内共批准了 20 位同志，组成劳动锻炼小组。任命县委宣传部干事栗满红为组长，我为副组长。来到城东的东大坞村。

东大坞村是个四百多户的中等生产大队，在抗日战争年代是我党有名的堡垒村之一。现任党支部书记张新同志，四十多岁，是一位经过战火考验又非常能干的基层领导骨干。他热情欢迎我们的到来。经过研究讨论，他把我们分成了两个班：栗满红同志带一班在街中小队，我带一班在西庄小队。明确了我们的根本任务：就是向

社员学习，进行劳动锻炼，当一名普通社员。对大队和小队的工作可以提出建议，但不能乱指挥，更不准包办代替。

我去的这个西庄小队基础不错。队长李长荣还兼着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工作很有气魄。副队长李铁同志年过半百，老成持重，做事细心。我们都称他李大伯。开始吃饭都是到分到户里“吃派饭”，社员们虽说不十分富裕，但总是变着花样，让我们吃饱吃好。到下半年，因为党内“五种歪风”的严重干扰，全局性的困难开始出现，社员们日子也艰难了。我们便和党支部商量自己起火做饭，也锻炼一下自己过日子的能力。那时国家供我们的食油指标是每人每月半斤，粮食 36 斤，补贴到 45 斤。因为副食品匮乏，干起活来，这 45 斤粮食也往往不够。但是，我们深深感到，这种与社员同甘共苦的劳动生活，一下子就缩短了知识分子和广大社员的距离。他们竟把我们呼为“老八路又回来了！”其实，我们哪能和当年的“老八路”相比？老八路把自己的生命和鲜血都贡献给了人民，而我们不过是流点汗水而已。但是，仅仅就这么一点，社员们倾注到我们身上的心血，却至今难忘。比如，他们怕我们吃不好，总是把他们仅有的也实在是不多的土特产品，送给我们吃；干活时，生怕我们体力不支，就千方百计地给我们安排更适合的活儿。就是干适合的活儿，也生怕我们累着，干脆主动上来帮忙。他们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儿子或兄弟姐妹。我们把他们当成自己的父母或姐妹兄弟。夏季一个风雨突来的上午，把我们在地里赶到了村边。这时队上的羊倌正赶着一群绵羊往村里走。突然一声霹雳炸响，就见甩着鞭子赶羊的羊倌顿时倒地。那群绵羊也不在走动，围着羊倌“哞哞”乱叫。我们到底有些触电方面的知识。猛丁想到羊倌在甩鞭头的时候，一定是潮湿传电的鞭头触到了雷电，被雷电击倒了。便飞也似地跑过去救他。

这时候，我们算是亲眼看到了雷击的厉害：羊倌的头部耳鼻溢出乳白色浓液，后背上掠过一道火烧焦黑的痕迹，已经断气了。为这事我们给社员们讲了一通防避雷电的知识。比如，告诉大家在雷雨时不在树下或墙根避雨；干活时遇雷雨不要把锨镐扛在肩上。社员们都听得津津有味。入秋，我和房东李长荣队长的弟弟长生住一屋。李大嫂为了给我俩熏蚊子，她把熏蚊子的“蒿草绳”点燃后，便放心地睡下了。没想到蒿草绳落到地上的余火连上了炕洞口的干柴。烧热了的火炕竟把我俩的褥子烤燃。直到火苗把我俩炙醒，才急忙用小盆端水把火扑灭。褥子虽然烧坏了一点，但没有殃及房屋和伤人。李长荣队长惊叹地说：“万幸万幸，不幸中的万幸呀！”由此，我和长生小弟弟结成了生死之交。后来长生参军并升了军官，部队就住在石家庄。我俩见面后又说起了这件唏嘘感叹的往事，长生苦笑着批评我说：“我这儿童团睡觉就够死的了，没想到你这“‘青抗先’（当年根据地“青年抗日救国先锋队”的简称）睡觉也傻死，一点都不灵呀！”

到年底，我们结束劳动锻炼要回县城了，又出现了一幕感人肺腑、动人心弦的场面：队上用胶轮马车送我们，满街筒子的社员出来送行。大家握手言欢，又禁不住热泪盈眶。等胶轮马车一动，社员们竟嚎啕大哭起来。我们赶忙命令停车，跑过去和社员相拥而泣。那种难舍难离的感情，我们都知道：社员们盼着我们留下，我们也真不想就这么走了。可社员们又都知道我们城里有家，不走，他们也会替我们分心。就是这么一种复杂的感情，牢牢地牵着双方的心。后来这种难舍难离的感情升华为来往不断的亲戚。副队长李铁大伯的女儿老体姑娘，经常骑着车子到县城串门，成为我们沟通感情的联络员。

笔者写到这里，总是忘不了重温毛主席号召“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和劳动者要知识化”的伟大深远意义。如果，我们的共产党和国家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总是和群众心连心的在一起，不搞特殊、不搞贪污腐化，真的而不是假的当好人民的公仆，群众该会多么拥护我们、爱戴我们啊！反之，又会是一种什么后果，这是任何一个正常人不言自明的。令人不解的是邓小平复出上台后，竟否定了毛主席“干部参加劳动”和“知识分子当社员”的具有反修防修伟大意义的好制度，弄得国家贪官遍地，黄、赌、毒、黑泛滥，假冒伪劣充斥社会，这是一个多么沉痛的教训啊！

第 13 章 “告急县”的斗争和精神

说起来令人十分苦涩。本来全国人民高举“总路线、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三面红旗，那是意气风发，干劲十足，形势很好。没想到刘少奇、邓小平一伙掀起的“五种歪风”，给好端端的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正气造成了极端严重的损害。在继续跃进的 1959 年下半年，任丘县竟变成“困难县”了。到 1960 年初，任丘县更恶化为河北省的“告急县”之一。之所以成为“告急县”，并不是任丘县有什么天灾为害。其根本原因，就是刘邓刮起的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和强迫命令风的铺天盖地的冲击所至。地里打的粮食并不少，因为一平二调，大轰大嗡，想快步“堆”出个“共产主义”，把整个集体经济搞烂了。开始，生产队的公共食堂搞得很火，因为物质生产轰起很大的浮夸，再加上一平二调以及征过头粮，好景不长就难以为继。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毛主席、周总理给各级领导下令：社员不准断炊！县委、县政府这时候再也不敢怠慢了，每天都拉着粮食局长安排粮食供应。但就是这样，因为粮油供得太少，竟导致大量社员浮肿，许多中青年妇女断经。类似任丘这种危急情况，全国各地都大同小异。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如此严峻的危急情况，在全国推出“有劳有逸，劳逸结合”和“低指标、瓜菜代”的渡荒方针。所谓低指标，即农民每人每天供到的粮食只能保到五两，食油常常没有。机关干部指标多些，每人每月也不过二十几斤，食油不过三两。不足部份要用瓜菜来补。瓜菜也没那么多呀！就靠野菜、树叶、水草、红薯蔓、玉米核……，凡是能代食的东西都要研究试验，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保住生命。河北省委、省政府对革命老区任

丘县十分关注，派来省财政厅长周政新和省广播局副局长李惠来指导任丘县委、县政府的工作。这时，刘庆祥书记因为在 1959 年反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受到批判而被调走。地委派来地委常委兼组织部长邓发同志担任县委第一书记。

我从东大坞劳动锻炼回来，任丘日报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决定撤销。我们这些人暂归到了县委宣传部。未几，县委决定成立畜牧部。为什么要成立这样一个部呢？原因是毛主席在年底对吴桥县魁星庄养猪的经验做了重要批示。批示要求各地“选一批有头脑，有干劲，又善于办事的人去抓畜牧工作。”县委认为，光是政府有个畜牧局大大不够，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力量。便决定县委常委卢晓义同志任畜牧部长、县委委员丁建勋同志和县政府秘书张俊德同志任副部长。另调农村部干事尚玉佩、汜水公社党委委员刘瑞庆和我担任畜牧部干事。同时决定王硕良同志任县畜牧局长。

畜牧部一开张面临的第一大紧急任务就是“保畜”，尽一切可能控制住牲畜和生猪因为饲料不足导致的严重死亡。有条件的地方要维持牲畜和生猪的繁殖。对于养猪，当时最响亮的口号是：“一头猪就是一个肥料厂！”那时化肥还没什么位置。农家肥还是农业的“当家肥”。养猪的存栏如果滑了坡，不仅农家肥难以为继，就是向城市提供肉猪也失去了基础。所以，尽管农村已经困难得连保人都很吃力了，县委还是要求要努力保护好大牲畜。有条件的地方要继续办好养猪厂。为此，我们这些人除了下乡搞调研的，就是拖着浮肿的身子，眼盯着统计科报来的存栏数字，一看哪个公社存栏下降了，就立刻追踪调查，弄清原因，研究解决的办法。后来困难得实在不行了，县委壮着胆子指示，把大牲畜和母猪放到集体事业心强又有某种条件的社员户里喂养，一户管一头，总比饲养员一人

管十头要好办得多。实践证明，这种委托户养的办法保证了集体畜牧业的持续。

俗语有云：“饥不择食”、“饿了糟糠甜如蜜”。这话一点不假。在那个极度困难的时期，，粮食杂以树叶、红薯蔓、玉米核……因为能填满肚子，就感到很满足呀！临近春节的时候，县委和县政府牵挂着农村社员的冷暖，以极大的努力让农村社员吃上了饺子。初三上班时，县委食堂又千方百计让我们吃上了包子。我和瑞庆同志不知道饿久了的胃口是不能多吃的，硬是多吃了几个。这下可把我俩撑坏了。胃口一涨一涨的——难受得好像就要爆炸，只得急报组织，去了县医院，经刘树生院长亲自治疗才逐步缓解下来。后来听说农村里过年，竟有人吃饺子过了头，硬是给撑死了。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感慨的教训啊！

古人有云：“家贫出孝子，国难出忠臣。”在那个持续了三年严重困难的日子里，应该说大多数共产党员和干部是经住了考验的，不论家里怎么遭难，也不论自己怎么浮肿，都做到了满怀信心，努力工作，不发劳骚，不说怪话。显示了顾全大局、勇往直前、革命到底的进取精神。但是，也确有少数党员和干部被眼前暂时的困难吓倒了。他们或不辞而别当了逃兵。或公然提出辞职，领导不批准就撒泼闹事，倒地不起，直到领导批准了立刻就起来走人。这些人回到家中摇身一变，成了倒卖粮菜、哄抬物价的投机倒把的商人，还真的发了国难财，被一些糊涂人夸为“识时务的英雄俊杰”。应该说，这种错误的看法和那些发了“国难财”的人，在当时还是有一定的蛊惑影响的。但是，我要说：以毛泽东思想为旗帜的中国，一个根本地钢铁般的大形势是：中共县委的坚强领导和威望完全稳住了局势。我们的县委第一书记邓发同志和他为首的县委书记处的

同志，便以其高尚的品德和与群众患难与共的模范行动，极大的感染和教育了广大同志。他们和大家同吃一锅稀菜饭。大家浮肿，他们也浮肿；大家下乡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也一样没有丝毫的特殊。正是这种有难同当的高尚品质和以身作则的榜样行动，使大家充满了战胜困难的信心，看到了必胜的希望。这里我讲两个身经其历的小故事，就可见干群同甘共苦之一斑：一个是县委第一书记邓发同志，他组织部分同志到白洋淀捕鱼，因为大家技术不高，费劲不小，一天下来只捕了十几斤鱼。他鼓励大家不要泄气，说：

“大家不要小看这十几斤鱼哩！这十几斤鱼包涵着重大意义呀！咱可以熬大锅鱼汤喝，每人每天喝上一大碗，就可以控制住浮肿病呢！”还真是这样，同志们每天有鱼汤喝，不仅控制了浮肿的蔓延，不少同志竟奇迹般的恢复到正常。为这，邓发同志一边喝着自己那碗鱼汤，一边深沉地说：“当时我看到那点鱼，心里说，要是炖鱼吃……咱机关百十号人没法吃呀！熬鱼汤这个办法却可以实现共享。瞧瞧，大家不是很满意嘛！今后咱一定牢记一条，不论办什么事情，看是对大伙有利还是对少数人有利，只要心里想着大多数人的利益，不搞特权，咱共产党就永远会立于不败之地哟！”我要讲的第二个故事发生在1960年初，那时天气还相当冷，我和周沛德、刘瑞庆同志晚上加班，仨人的肚子饿得咕咕叫，就想到办公室门前有一畦菠菜，本应该冻死却因为日照好，还有不少铜钱大小的绿叶伏在地面上顽强地生存着。就摘了一些洗净放在大塘瓷水杯里，用炉火烤煮。这种菠菜汤虽然没有放盐和其他作料，可开锅后冒出的清香之气还是十分诱人。我们小心地把炮子灯捻小，生怕别人发现了受批评呢！嘿，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这时还真有人轻轻地敲门了。我们仨人一抽脖，不约而同地嘀咕道：“坏啦，坏啦……”大概外边感到了屋

里迟迟未动，就说了话：“恩泽，开门，开门……”

“啊？”我们一听那标准的保定口音，就知道是卢部长来啦！芦晓义部长是“三八”式老革命。仁县合并前，他是中共任丘县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为人非常厚道。平时和大家工作在一起，他就像慈祥的老婆婆一样，没有一丝官架子。这么晚了，他又来到畜牧部，说明我们加班，他也在惦念着我们。我忙着把门拉开。卢部长见屋里腾着热气，便小声地发着保定口音问：

“你们干么呐？”

“咳，加完班肚子饿得不行，门前那畦菠菜竟没有完全冻死，还有点绿叶，就摘了点煮菜汤喝。”

我们仨人毫不隐瞒。卢部长憨厚的一笑，说道：“我也想喝一碗哪！够不？”

“够，够……”

我们仨人高兴地回答着，知道老部长跟我们一样，肚子里也饿得咕咕叫呢！他能和我们同喝一碗菠菜稀汤，该是多么令人心暖和欣慰啊！

后来，我曾多次跟人们讲这两个并不复杂的故事。为什么要念念不忘地讲呢？就是感到以毛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和群众之间这种水乳交融、同甘共苦的亲密关系，实在是太可贵了。可贵到怎么往高里估价都不为过哟！我常这样自问：“三年全局性的巨大困难，各人民公社都有粮站、银行营业所和商店，可全国的治安环境惊人的安定。没有听到过一起砸抢事件。六亿人民同心同德、共赴国难，硬是用一双铁手和肩膀克服了困难，迎来了胜利的曙光。何以也？除了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从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诚恳而又坚决地纠正“左”的错误，调整政策，取信于民外，共产党从战争

年代同群众建立起来的血肉般的亲密关系，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的好坏，甚至关系到党的命运和人民中国的命运。我也曾这样自问：“如果当年没有这种高度信任的亲密无间的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纵使承认错误，调整政策，人民群众怕是也不会谅解的。所以，我就想把时间拉到今天，邓修集团几十年来搞的那条“改革就是复辟；开放就是卖国”的极其反动的路线和道路，完全无视党的历史教训，抛弃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整天自己想的就是怎么捞钱发财、捞官、捞色……谋取并实现自己和子孙后代利益的最大化，甚至动用法西斯手段镇压敢于反抗他们的爱国学生和群众。我要说，镇压越烈，人民的反抗也越烈。他们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那一天已经不远了。

1960年十月，工业战线因为刘邓“五风”的严重干扰，打破了“有计划、按比例”的科学方针，一轰而上的重复建设，职工增长过量，就连保证工业生产的农业基础也无法承受，只得从浮夸的高指标的顶端退下来，实行工业紧缩，压缩膨胀过头的职工人数。为此，毛主席周总理号召职工顾全大局，为国分忧，回到农业战线去。工人阶级一向最听党的话，没费多大劲，压缩两千万职工的计划实现了。这其中也包括我在任丘麻绒厂当工人的爱人。爱人临走时对我说：

“别看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回到农村去了，有些人是表面响应并不真走，他们在千方百计地磨蹭着，等回去的机会呢！”

“不会！”我毫不怀疑地说：“大多是干部家属，哪能跟党搞两面派呢！”

结果，还是证明我犯了一个“天真”的错误。确实有几个等压缩结束，风头一过，便又拐变抹角地回到了工厂。为这事，我曾问

卢部长是怎么回事，老部长很深沉地说：“尽管我们党一向教导不让老实人吃亏，但事实上总有老实人吃亏，耍滑人总会利用各种权力关系占到便宜。这样的人虽然是个别的少数的，但影响极坏。我有这样两点认定告诉你：一是带头响应党的号召，是为国分忧的好同志，党永远不会忘记，历史是会记下他们为国担当的这一贡献的。二是国家形势正在好转，工业总还要大发展嘛！回去的人一定还有回来的机会，等等吧！”老部长的一席话，一直是我和爱人交谈的武器。不过，爱人是心地宽广而又坚强的。她回去以后承受了难以想像的困难。第一个大困难是房子。房子虽然不少，1956 年闹大水，浸塌了房子下边抗日时挖的秘密地道，导至房子裂缝漏雨。再加上父亲去世，母亲随四姐去了安阳，哥嫂一家又远在安次县工作，就她一个人带着刚满周岁的儿子，住在危机四伏的房子里。第二个大困难便是粮食。因为城市户口注销了，她原来享受的一线工人 45 斤的粮食指标，一下子变成了农村每月供应的十几斤，家里又没有一丝存底，就是低指标瓜菜代也难以渡过哩！好在村里的党支部因为躲过了“共产风” 和“浮夸风” 的某些干扰，村里还囤下了些粮食，便花钱买了一些，就这样凑合着过去了。这中间，爱人见过一次卢部长。老部长同情地说：“你这情况我清楚，也一直惦着。再等一等吧……”这一等就是七年才回到了工厂。值得骄傲的是，爱人在新的工作岗位——河北新华印刷二厂，仍然没有辜负党的希望，她不仅在 1976 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连续二十多年，直到 1988 年退休，年年都被评为先进党员和先进生产者。

第 14 章 我随张书林书记下乡

1961 年六月，原来合并的大县也开始退却了。任丘县和文安、大城两县分开，又回到了原来的建制。1958 年 12 月和天津地委合并的沧州地委也同时撤出。这时任丘县从原属天津地委领导改属沧州地委领导。地委派来新的县委第一书记张书林同志。其他书记处书记有王满刚、梁希琴、杜长春、郭中瑞。这时县委畜牧部宣布撤销，我被调到县委办公室做研究员。县委办公室主任张涛，是从河北省第二监狱副狱长位子上放下来的，思想水平相当高。不久，他又离开办公室去担任县监委书记。办公室日常工作由王书田副主任主持。办公室其他研究员有刘振国、李秉哲、王春元等。研究员的工作，主要是随书记下乡搞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撰写县委对上的报告和对下的指导性文件。我还较多的兼作新闻报道。这时候，全国在经历并纠正“刮五风”的“左”的错误之后，针对三年困难造成的巨大挫折，党中央开始实行“调整、充实、巩固、提高”的指导方针。周总理身体力行地贯彻毛主席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行了适时的有效的调整。比方说，人民公社的规模适当缩小，基本上退回到原来的一乡一社。生产关系也调整为公社、大队、小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曾一度取消的社员自留地，又宣布退还给社员，并宣布“几十年不变”。至于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中造成的“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则强调深刻检讨、彻底退赔！这种农村政策的重大调整和各级干部作风的努力改进，极大地鼓舞了社员克服困难、恢复生产的积极性。

我第一次随张书林书记下乡，是去城东边的畅支公社。书林同

志早在抗日战争中就在这一带工作。有一次，他在附近的邢村被日本鬼子包围。紧急突围时腿部被鬼子打伤，就住在附近杨各庄堡垒户杨大栓家疗养。后来腿伤算是治好了，但留下了残疾，变成了瘸腿。不过，他并没有向伤残屈服，硬是靠着坚强的毅力，锻炼得能骑自行车。这次出发前，为了减轻书林同志的负重，我便把他的被褥放在我的自行车上。当我俩快到畅支的时候，书林同志若有所思地说：

“咱先到杨各庄堡垒户看看吧！”

” 好！ “

我随着书林同志便来到了杨各庄。只见他轻车熟路把车子放在街边，就进了杨大栓的家门。家里的后生们显然有些生疏。他便自我介绍道：“我是张书林，来看看大娘……”我也忙着介绍说：

“这是县委张书记，来看大娘了。”这时大娘就坐在炕头上。老人家因为患眼疾已经双目失明。她听到院里有人说话，并且听清是来看她老人家的，就急着热情地问：

“啊，谁来了？”

“大娘，我是小张呀！”

书林同志说着，两手向大娘扶了过去，紧紧地握住大娘的手。大娘此时听出了书林同志的乡音，老人家禁不住热泪盈眶，激动道：“我那个儿呀！你可回来啦！”接着就眼泪汪汪了，又问上一句：“这些年你到哪儿去了？”

书林同志也禁不住热泪涌流，嗫嚅道：

“我调到沧州那边去了……”

“你那腿，没再……”

“腿恢复得还不错，能骑自行车啦！大娘，你这眼……”

“眼不行了，心还亮堂的呢！腿脚还能走动。咦，你这回来就不走了吧？”

“不走了，是党派我回来工作的。”

这时我插上一句：“书林同志到咱县任县委书记了，第一次下乡就来看大娘呀？”

“好，好……这些年，总是时不时想起你呀！我这身子股还凑合，你别惦着，一定要领导好生产呀！”

“是啊！我这次回来第一条就是恢复好生产。前几年出现了‘五风’瞎折腾，大娘，你们受苦了……”

“苦是受了，可咱没吓倒呀！八年抗战那么苦，咱都胜利了么！今后咱一定记住一条：只可以大干，不可以瞎折腾，就肯定能取得大胜利呀！”

“大娘放心吧！毛主席说了，今后谁在搞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老百姓可以‘打遍担’！以后地里种什么，怎么管理，都由生产队说了算。县里公社里只能为队里服好务，不准瞎指挥！”

“那就好。只是你那腿……到处跑要注意点，寸量着点呀！”

“没事。大娘你多多保重，过些日子我还会转过来看你呀！”

书林同志告别大娘出来，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他自言自语着说：“党的组织和干部如何保持和这些老堡垒户，还有军烈属、残废军人、退伍老战士……的亲密联系呢？一个地方的干部随时可能有调动，但这种亲密的联系不能断呀！这就需要有一个制度……”

回到机关，他专门把民政科的同志请来座谈这件事。最后确定每年春节前，各公社要派出慰问小组，对老堡垒户、军烈属、残废军人和退伍老战士进行慰问。书林同志特别嘱咐说：“他们当年为革命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并不在乎你有没有慰问品，更不在乎你慰

问品的多少，主要是在乎那份革命的感情联结。古话讲，‘人到礼不差’，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当然，带上一点慰问品，包括慰问信、对联、光荣牌什么的，就显得更亲切活跃啦！”书林同志回任丘工作近四年，这项制度一直坚持着。

我第二次随张书记下乡，是去城西偏北白洋淀边上的七间房公社。七月的天气，骄阳似火。但我们来到千里堤的柳荫之下，面对碧波荡漾、一望无际的淀水，还是感受到一丝凉意。七间房公社就座落在大堤顶的外坡。党委书记曹凤桐同志，当过县农林局副局长，是有名的‘泥腿子’式的干部。其说话办事更是有名的干脆加“直筒子”。书林同志请他谈谈恢复生产的大计，他好像对“五风”为害的气还没顺过来，就冷冷地说：

“咳，前边是水，后边是洼，你说这个穷家怎么当呀！”

“咦，”书林同志惊异道：“你老曹守着白洋淀，应该有更多的生产内容呀！”“有个屁！”曹凤桐说话更来气啦！接着就大吼道：“有多少东西也得叫‘一平二调’折腾光了哇！”

“咦，我说老曹同志，你这气该消消了。咱党中央毛主席不是彻底批判了那个‘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彻底退赔吗！现在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坚持按劳分配，杜绝共产风，这都上了中央文件和《条例》，当年那种瞎折腾不能也不准再有了。你这里有鱼、有苇、有藕、有水菜，还有个不缺水的粮食大洼，外加一条上通保府、下通天津的大清河，论恢复生产，谁能比你更前景广阔呀！”

“张同志，你说这个我老曹都承认。只是叫那个‘五风’闹的我都犯嘀咕了。你想想，毛主席亲自给省、地、县、社、大队、小队六级干部写信，讲得那么明确，就是煞不住‘刮五风’呀！今天

有些问题我得和你张同志砸对一下。比方说，社员在淀边下个虾篓，晚上下，第二天早晨就收获一盆虾，这还批成‘资本主义尾巴’不？小队里都能下网捕鱼，有时能捕千儿八百斤，运到保定、天津去卖，这还能批成‘投机倒把’吗？还有那白洋淀的笨菜，‘海’了去啦，人吃马喂都很好，每个大队、小队都可以办成大市场，这可以不？咱不是有个新提法叫‘大集体小自由’么，如果都行，我就算摸着县委的‘底’啦！你张同志就瞧好吧！别说是恢复生产，就是集体生产大发展都毫无问题！”

“当然行啦！你老曹用好了‘大集体小自由’这个武器，就盘棋局就搞活了。咦，刚才你老曹讲的都是水产，咱那堤外大洼的粮食生产可不能丢呀！那还是‘纲’哩！毛主席说过，不要怕社员家里东西多，‘藏粮于民’饿不死人哩！”

“好了，有你张同志这几句话咱就不细说了，下边就是一个‘干’字啦！你说那堤外大洼的粮食生产吗？我告诉你，那是宝地呀！种水稻比南方的水稻好吃，种大高粮吃那‘高粱米’，其口劲，比东北三省不在以下。嘿，要是卖给酒厂么，那收入会更高呢！”

张书记的七间房公社之行，像是春风送暖，点了一把激励思想、搞好人民公社大生产的烈火。到年底，七间房公社党委没有辜负县委的希望，成为全县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带头羊。

1962年春天，我随张书林同志来到城西出岸公社的东良淀大队。这里所称的“出岸”，相传在六百年前明朝开国的时候，白洋淀的南岸就在这里。又因为有山西省洪洞县的移民到此定居，开垦荒地，就定村名为“出岸”。东良淀本是白洋淀中的一个小淀，后来淀水不断收缩，东良淀和它西邻的西良淀，都变成了陆地，进而演变成了以此定名的村庄。张书林同志之所以要到这里看看，是意外地听

说这个大队受共产风、浮夸风和瞎指挥风的影响较小，当时全国那么困难，他们大队、小队和社员都过得比较殷实。特别是大牲畜的饲养，竟然鹤立鸡群，三年困难时期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以每年自繁十多头牲畜增长着。书林同志要解剖这个麻雀，他深入群众，从历史的发展到现实表现，都做了细致地调查。

原来，东良淀一直归高阳县管辖，1954 年划归任丘县。因为地处两县的结合部，早在抗日战争中就是两县游击队的堡垒村。1943 年，日寇搞所谓“新国民运动”，强迫人民实行所谓《反共誓约》，就在这里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惨案。那是十一月九日，日本鬼子突然包围了东良淀村，把男女老少都赶到了马家大院里。先是把村民董增拉出来，要他背诵《反共誓约 六条》，董增宁死不背，立刻就被推到土坑里活埋了。接着，又拉出四个农民，命令他们背诵《反共誓约 六条》，四个农民昂首挺胸，誓死不背，日寇又把他们推到土坑里活埋了。面对人民宁死不屈的壮烈情况，日寇改变了杀人的办法，又拉出两个农民，叫他俩指认共产党的干部，还利诱说：“谁指认了共产党的干部，皇军大大地有赏。要是拒不指认，立刻砍头地干活！”这两个农民回答得非常干脆：“要埋要砍随你的便。要问共产党的干部么，不知道！”日寇气急败坏，砍掉了两个人的头，大叫道：“如果再不交出共产党的干部，就开枪扫射，毁灭全村！”这时，共产党员、村武委会主任孟家之挺身而出，大步走到敌人面前，义正辞严道：“你们屠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是丧尽天良的魔鬼。八路军会惩治你们的。今天你们不是要找共产党么，我就是！动刀动枪朝我来吧！”敌人虽然杀害了孟家之，但看到群众怒火喷发的眼睛，还是退走了。

张书林同志了解到这段壮烈的历史，感叹道：“多么英雄的人

民！多么英雄的村庄！”正是从这壮烈的一幕中，他发现今天东良淀的村干部如党支部书记王明琴、田友和大队长王金才，都是抗日战争中锻炼出来的骨干分子，有着相当高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正是这一点，在当时“五种歪风”盛行的时候，他们头脑清醒，巧妙而有效的进行了抵制。以粮食产量为例，他们的优种玉米“白马牙”，亩产达到七百多斤，这在当时算是很高产了。可是，他们没有跟着盛行的“浮夸风”去捞个“先进”吹成千斤，而是留有余地只报六百多斤。对于“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他们总是能拖就拖，能少给就少给，或者干脆拐弯抹角地不给。上级如果严厉批评，他们从不硬顶，只是用好话“软磨”。就这样，在那全国最困难的1960年，他们仍给每头牲畜留了饲料粮200斤。至于上级号召大办的公共食堂，他们是明着开办，暗里仍保留社员的“小灶”。张书记对东良淀党支部在当时那种特殊严峻的情况下，能做到如此‘实事求是’、‘不随风跑’，甚为感动。他说：东良淀大队的集体经济，在三年困难时期仍然巩固，仍然有很大的发展，这是一个奇迹。其经验并不复杂，就是四个字“实事求是”。这也说明了一个更宏大的道理，即“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没有那‘五种歪风’的干扰，全国肯定不会出现‘三年困难’的重大挫折。中国将会是一个划时代的光明灿烂的图景啊！

“张书记特别指示我，就东良淀大队在三年困难时期持续发展大牲畜的经验，给河北日报发一篇报道。我立刻动笔，稿件发出后，河北日报很快就全文发表。

张书记在东良淀大队和社员同吃同住，社员们有什么心里话，都愿意跟他说。我俩住在社员何良家里。何良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复员回来的老战士，在八路军里，他就练就了一定的文化功底。他的

爱人张玉珍，是大队党支部委员兼妇联会主任。早在抗日战争中她就是村妇救会主任了。下边要说的故事，是她家发生的一场“以对联辩理”的“家务案”，却是何良亲自告诉张书记的。事情的缘由是这样：何良结婚后和父母分家各过，其父比较喜欢何良的胞弟，在各方面都加以照顾，对何良则多有批评。何良心里不服，对父亲的偏向常有微词，但双方从来只是“用文斗论理”，不动拳脚。这年春节，其父以贴对联的方式教训何良，上联写的是：“当初得子如瑰宝”，下联写的是：“如今成丁各为人”。横批则是：“养儿无用”。何良看了，眉头一皱，未动声响，便也以贴对联的方式回驳父亲。其上联是：“偏小灭大非父子”。下联是：“上梁不正下梁歪”。横批是：“为父不公”。这个父子以“对联”论理的故事，一时成为全村的头号新闻。张书记也觉得这个故事新鲜有趣，就问何良：“你父子之间‘以对联论理’，不动拳脚，这是一种进步呀！可是，贴完了对联这年还拜不拜呢？”何良笑着说：“当然要拜呀！咱是辩理归辩理，父子之间的老礼不能丢么！”张书记也笑着说：“好，好啊！古来清官难断家务事，你父子‘以对联说理’自断，算是开了新社会的新生面呀！”

我随张书林同志结束了在东良淀的调研，刚回到县委就碰上了母女二人的上访。其实，这位中年妇女和她那十四、五岁的女孩，曾经来过几次了，每一次都是要求见书记。我们虽然也知道一点情况，但具体情况还是不那么清楚。这次张书记让我去记录一下情况，我才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这是一件久拖不决的强奸案。事情发生在1961年五月初的一天中午，女中学生xxx在庄稼中间的一条小路上，被中共县委委员兼汜水公社党委书记孙再山强奸，女孩受摧残而致病。母亲领着女儿到县公安局报案，局领导极为重视。

以“铁包公”著称的局长刘志强同志，亲自挂帅组成了专案组，以其严谨的科学态度和侦察工作的丰富经验，通过受害人的秘密指认和用孙再山的鞋子与脚印的甄别对照，牢牢捉住了孙再山的尾巴。但是，这位曾当过大城县检察院检察长的孙再山，其反侦察能力也有一套。他一口咬定：公安局指控的作案时间，他正在一个大队里开会。证明人既有公社党委副书记，也有大队党支部书记。他与这起强奸案根本不沾边！刘志强局长洞察这位“孙书记”的鬼把戏，他结合县委监委书记，共同揭破了孙再山和公社某副书记及大队党支部书记“搞攻守同盟”的丑恶嘴脸。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原来合并的任丘大县又奉命分开了，这位“孙书记”又回到大城继续作官。两县为这事公文传递，认定不一，一拖就是近一年。张书林同志深知受害人的痛苦，更内疚于自己手执法律之剑，却无法从另一个县把凶手捉拿归案，便心情沉重地对母女二人说：

“案情已经十分清楚，公安局已经准确地履行了办案程序，就因为涉及两县，执行起来卡壳了。我意见，这回你母女去告任丘县委，就说任丘县委没有为民作主，和大城那边协调无力，致使凶手逍遥法外。”

“那样子不对吧？你张书记一直为这事是尽心尽力呀！”

女孩的母亲说着流下了眼泪。张书记又分解道：

“好心好意，尽心尽力，到头来还是没有把事办好，还是应该受批评呀！你这回写信直发省委，省委必定会批给两县查办，这样问题就一定解决了。”

母女俩总算明白了张书记的意思。果真，告状信发到省委后，省委很快批到了两县，而那位“钢嘴铁牙”的“孙书记”也被抓进了任丘县看守所。但是，专案组审了几次，这孙再山还是钢嘴铁

牙不认帐。刘志强局长认定，这时候该自己出马了。只见他不紧不慢地对孙再山说：

“孙再山，我们应该是老熟人了。你了解我，我也了解你。没有百分之百的证据，我不会把你关到这里来。你如果不想受到从严处理，就只有一条路，把态度放老实。我不想和你多讲，是想让你主动交待得到一个‘坦白从宽’的处理。”就这几句铿锵有力的话，把孙再山给镇住了。他完全了解刘志强局长的办案风格和功底，知道错过坦白从宽的机会对自己十分不利，就一改他那嚣张的气焰，小声道：

“我可以交待，老实交待，但我请求能给我一支烟吸。”

“可以！”

刘局长说到做到。孙再山终于如实交待了自己的罪行。任丘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孙再山八年徒刑，为受害母女讨回了公道！

第 15 章 我当地记者的头三脚

1963 年三月，我奉中共沧州地委组织部的调令，调入地委机关报《沧州日报》当编辑兼记者。这件事来得虽然有点突然，但我却很高兴。这种高兴跟当初调入刚成立的县级报《任丘日报》那种高兴，应该说是加了一个“更”字。因为这是一家有一定历史的地委机关报呀！其雄劲的报头，乃为大名鼎鼎的中国文学家和史学家、新中国首任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所题。我到那里工作，不论是活动空间和视野，可以更加肯定的是：都会陡然扩大。有一种“更上一层楼”的意味哟！

沧州日报总编辑兼社长魏亚明同志，我虽然不认识，但多有耳闻。他是一位经历过私塾教育又从事过教书育人的老知识分子，河间人氏。其兄魏明却是我党早期的一位革命者，新中国初期就是地师级领导干部了。当年受长兄魏明的革命影响，魏亚明同志在日寇发动的侵略中国的“芦沟桥‘七七’事变”后，便毅然弃教投入了沧州地区的抗日斗争。因为他文笔极好，又善毛笔小楷，被沧州政界誉为“第一才子”。我来到报社，亚明同志立刻热情接见并谈话。他招呼我坐在他的对面，高兴地说：

“欢迎你呀！高恩泽同志。你是我们选来的。过去看你投来的稿件，称你为‘本报通讯员’，现在要称为‘本报记者’了。我想你对新闻工作一定很有兴趣吧！”

“有，”我高兴地回答着，又道：“上学时喜欢作文，工作后又喜欢写材料，‘大跃进’的时代，我也干过一段任丘日报的记者，十分喜欢新闻工作呢！”

“喜欢新闻工作，这对当好记者来说，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亚明同志说到这儿，接着又道：“当然，要做好新闻工作仅仅是喜欢还不够。比方说，你在县委办公室工作，大主意是领导拿的，你很多时候是个‘参谋’。做记者当然也离不开领导，但因为是独自下去采访，这就要首先靠自己的眼力了，靠自己的审视能力了。没有一定的眼力和审视能力，就很难抓到有份量的问题。自然就流于平庸和一般化。而要提高自己的眼力和审视能力，首要的一条就是学习，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掌握好武器。接着便是深入采访，掌握第一手活生生的材料。有了这两条紧密地结合，写出来的东西才具有生命力和战斗力。所以，做新闻记者这个活儿，必须非常吃苦，懒人肯定是干不了的！”

亚明同志的一席话，给了我深刻的教育。再加上我在沧州日报又是一名 27 岁的新兵，要想站住脚根，就更得拿出十二分的劲头学习。这种学习，首先是读好马列主义的书和毛主席的著作，掌握安身立命的根本武器。再就是熟悉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必要的新闻业务。第三还要向新闻战线的老同志学习。学习时间，除了机关规定的每周两个半天之外，我每天晚上还要自学。因为不带家属，又不会打扑克、下象棋，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自学到十点。下乡采访虽然是个累活，可我从来就没有嫌过累，反而觉得累中有乐。那时候下乡采访，都是住到社员家，吃派饭。采访的形式大多是和干部社员同劳动中进行。所以“小白脸”都会晒得“黑红”。“包公脸”则会晒得更加“油黑”。就因为我经常下乡采访，亚明同志的夫人田素琴常学着她那小女儿平平的话说：“我那个‘下乡的叔叔’又走了！”、“我那个‘下乡的叔叔’又回来啦！”

记者的发稿任务没有硬性的指标规定，目的是保证质量。但是，

做为记者，每月至少应该有一篇到两篇有一定质量的稿件见报。如果一连几个月空白，不要说领导要谈话，就连你自己也要为“记者”这个称号感到不安了。当然，要是领导确定你多做一段编辑（因为那时的体制是编采合一），则另当别论了。

我接到的第一个采访任务，是选择一个干部参加劳动的先进典型，在报上做“重头戏”发表。这当然对我这个新兵压力很大。我倒不是怕别的，主要是担心这样的“重头戏”由我这个新兵来写，能不能写好呀？因为毛主席对干部参加劳动看得很重要，把它上升到“反修防修”的大计。他老人家还特别指出：干部腐化变质是从“懒”字开始的。懒——馋——贪——变，乃腐化变质的一大规律。我处心积虑的就是能不能把握好这个高度，写得更深刻一些。为此，我建议去两个记者，以便碰到问题有个切磋商量。领导同意了我的建议，加派了赵泽清同志。接着，我又到地委组织部了解全区干部参加劳动的整体情况和问题，从而使所选择的典型有更大的针对性。组织部副部长张玉刚同志给我介绍了一个先进人物，即吴桥县北董大队党支部书记李俊峰同志。玉刚同志介绍说：“李俊峰同志跟其他农村基层干部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始终一贯的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坚持和社员同劳动，每年都能达到 300 天。从不像有的人闹“一阵风”就完了或摆摆样子应付。他这种扎扎实实的思想自觉，很了不起呀！可不是任何一个农村党支部书记能够轻易做到的。李俊峰不仅是吴桥县干部参加劳动的模范，也是全区干部参加劳动的模范。正是因为他同社员并膀劳动在一起，汗流在一起，社员都把他当贴心人，有啥心里话都愿跟他说。如今北董大队在生产发展和生活提高上，也是全县拔尖的。“有了张玉刚同志的推荐，我和泽清同志很快赶到吴桥，又听了县委书记李汝梅同志的介绍，

便来到北董大队。开始，我俩住在李俊峰家里，实地观察他的生活起居并跟他一起参加劳动，后来又住到社员家吃派饭，同社员一起劳动，印证李俊峰参加劳动和工作相结合的故事，经过二十多天的深入采访，我俩写成了《劳动模范李俊峰》的长篇通讯，以一个整版的篇幅配发照片发表，在全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我采访的第二个典型，是黄骅县境内的一个养路工区。黄骅县是以抗日英雄黄骅同志的名字命名的新县城。又是沧州地区古来滨临渤海的盐碱荒凉地带。当年帝国主义的“八国联军” 侵占北京，黄骅这个地方也曾是登陆点之一。正因为这里有一个通往海外的码头，和内地的公路相连，来往客商络绎不绝。旧社会，很多土匪蹿到这里，截道绑票，甚至形成了明为村庄、实为土匪窝子的村落。有谚语曾经这样形容土匪的厉害：“杨三木（村庄名）吕家桥（村庄名），雁过拔根毛。男的不在家，女的也不饶！”解放后，经过剿匪反霸和农业集体化，净化了治安环境，也大大发展了农业和渔业生产。但是，多少年来一直喝苦水的历史仍然延续着。我采访的这个养路工区，在党支部书记高顺芝同志领导下，硬是强饮着难以下咽的苦水，啃着玉米窝头，把这段八十公里长的公路，维护得十分完好！不仅保证了公路的安全畅通，还成为过往司机师傅的家。有的汽车半路出毛病了，工区的同志会热情照应，帮助修好。有的司机突然病了，工区的同志就像待亲人一样，送饭喂药。我在这个工区跑了五天，亲自喝苦水，吃窝头，啃咸菜疙瘩，和职工们促膝谈心，深深感到：这些同志十几年如一日奋战在人烟稀少的盐碱荒凉地带，保证“先行官” 的快速安全，该是多么难能可贵，又是多么令人敬爱。我曾经这样问他们：“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工作，个个以苦为乐，干劲十足，一干就是多少年，是什么力量支持着你

们？”他们有的说：“是毛主席教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呗！毛主席教导我们干一行爱一行，我们不能辜负他老人家的希望呀！”还有的这样回答我：“苦是苦了些，比当年红军长征和八路军打仗那种艰苦好多了。再说老书记高顺芝同志和我们一样艰苦奋斗，大家还有什么说的呢！苦上几年，将来打了深机井，引来清甜水，情况就好啦！”多么淳厚的思想，多么朴素的语言。我在心潮起伏、感慨万分的情况下，几乎是不加润色地把他们的英雄事迹，通过报纸介绍给了全区人民。年底，这个英难的养路工区被评为沧州地区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

我接受的第三个重大采访任务，是到白洋淀“千里堤”报道几十万军民的抗洪斗争。当时领导上紧急决定让我去，是因为我来自白洋淀边的任丘县，熟悉那里的情况，对搞好报道有利。

那是 1963 年七月下旬，华北地区七天七夜连降暴雨，山洪爆发，九河盈槽。白洋淀这个蓄水缓洪的天然湖泊，大大超过了警戒水位，随时都有决堤横流，淹没天津，冲垮交通大动脉——津浦铁路的危险。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此十万火急地关注。河北省委和省政府以及河北驻军，还有白洋淀周围的安新、任丘、文安、大城等县的干部群众，更是进入了战斗状态。河北省分管农业的副省长郭芳同志乘直升机到白洋淀视察水情。中共沧州地委第一书记曹庶范、河北省水利厅副厅长戴哲夫及其率领的专家组，更亲自来到了抗洪斗争的第一线——任丘县设在千里堤段西大坞村的防汛指挥部，和解放军防汛总指挥朱志勇大校一起，指挥抗洪抢险斗争。我就是在这个紧急时刻，奉了沧州日报总编辑魏亚明同志的指令，火速赶到了自己刚调出四个多月的任丘县委，和老战友李秉哲同志借了辆自行车，飞也似地驰向驻在千里堤西大坞村的县防汛指挥部。一路上，只见

田间道路两边都是汪着无法排出的大量雨水。靠近千里堤的洼地更是碧波汪洋，已经甩穗的高粱只在水面上露出个小小的头儿。我禁不住惊呼：“堤外堤里，两水夹堤，真是无法想像的危急呀！”

来到防汛指挥部，正好碰上刚落脚的河北日报驻沧州记者魏含章同志，我俩便不约而同地去见曹庶范书记，请求指示。曹同志非常严肃而又沉重地说：

“你俩来得很好！情况非常危急，老天仍在下雨，洪水仍在猛涨。党中央和省委十万火急地指示我们：必须发扬不畏艰难、连续作战的革命精神，战胜洪水，保卫好人民的生命安全，保护好天津市和津浦铁路的安全。你们记者的任务，就是通过报纸给抗洪抢险的军民鼓劲、鼓劲、再鼓劲，务必夺取抗洪斗争的最后胜利！”

根据曹书记的指示，我俩马不停蹄地奔向千里堤的各个险段。这时才看清楚，传统的“堤防”已经变成了“埝”防。突破警戒线的洪水，实际是被堤顶新筑起的子埝挡着。这些子埝用土全是军民用肩挑手提，一筐一篮地从远处的高地取来的。为了防止子埝出问题，几乎是十步之内就有一个监视岗，手执马灯，昼夜盯住。一经发现浸水漏水，立刻抢险固埝，不准有一丝的大意呀！白洋淀的渔民们，航运局的运输队，这时，都自觉的把船舶开到防汛指挥部附近请求任务，有的运桩、运料，有的疏散淀内岛村的灾民。河北省军区和天津驻军的战士们，除了日夜守护大堤，还和社员们一起，打捞空投下来落到水里的大饼、咸菜，争先恐后地送到政府。在囚渡运输过程中，有的同志因饥劳过度牺牲了，却没有吃上一口大饼。灾民们看到牺牲者的高贵品质，在分配大饼时都是互敬互让，井然有序。薛栓力一家负责白洋淀枣林庄石坊院水文站的工作。一家人三班倒着观察记录水位的变化，每隔一小时向防汛指挥部报告一次，

给领导决策和指挥抗洪斗争提供数据，被誉为抗洪前线的哨兵。这一切，魏含章同志和我，都借助民工和战士的窝铺记录下来，以长篇通讯《千里堤上的日日夜夜》为题，用电话传给河北日报和沧州日报同时发表（注：这篇通讯的影响力不小，五十年后的 2015 年，我偶尔见到省委宣传部的原人事处长后升任河北日报副社长的李玉柯同志，他有点激动地说：“当年你老高和含章同志写的那篇《千里堤上的日日夜夜》，我至今记忆犹新，无法忘却。那时我还是一个中学生呀！）。

八月十一日，是一个更加令人焦急万分的日子。这天，白洋淀水位上升到 11.5 米，突破警戒水位几近一米。专家们以严酷的责任感，向中央和省、地领导建议：必须立刻分洪，方能化解洪水对天津市和津浦铁路的至命威胁。而要分洪就势必使下游的任丘、文安、大城、青县等地的大部份村庄和土地成为缓洪冲击区。这同样是个与人民生命财产相关的十万火急地问题。怎么办？省、地领导经过反复论证权衡，毅然做出了在任丘县出岸乡小关村堤段分洪的决定，《决定》同时要求下游相关各县县委和政府做好干部群众的工作和防洪准备，要顾全大局，安排好小局，尽一切可能减少洪水造成的损失。这一《决定》很快得到中央的批准。这里首当其冲的是中共任丘县委。县委第一书记张书林同志以对人民生命财产高度负责的党性观念，亲自向广大干部群众讲解大局和小局的关系，并对行洪涉及的村庄在守护和迁移方面做出妥善安排，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同时派出县委常委兼副县长杜长春同志，带领分洪队伍到防汛指挥部报到，聆听地委领导同志的具体指示。到下午十七时，小关堤段的开掘分洪顺利成功。洪峰掠过任丘全境，全县 300 多个村庄，由于护村埝打得牢固，四十万人民安全渡汛。与

此相反，和任丘相邻的文安县委第一书记李泽民同志，不顾大局，公开抵制中央和省、地领导的分洪决定，在干部群众中造成很坏的影响，受到了撤职处份。

分洪之后，随着洪水下泄入海，报社领导指示我继续抓好生产自救的报道。我决定到任丘县天门口公社了解情况。天门口，传说是宋朝杨家将穆桂英打击北国辽兵摆“天门阵”的地方，离西大坞防汛指挥部有十来里路。此刻因为到处是水，我向指挥部申请了一艘五仓船。船是西大坞村的。船老大和他的侄子见我急着要走，侄子不便拦，船老大却面带难色地说：

“高同志呀！听天气预告说，今天上午有八级大风，能不能下午再走？”

我想了一下，给他鼓劲道：

“要是现在就出发，划快点，赶在大风到来之前行不行啊？”

船老大见我变着法的要走，就建议道：

“那这样子吧：你和指挥部要领席，我做个席帆，顺着现在这四级的西北风，用不了多大工夫就到了。我们可以赶在大风之前靠岸。”

“那好办！”

我说着，就带他俩跟指挥部要了一领席。船老大“三下五除二”便把那席帆栓挂在桅杆上。小侄子拔掉拴船的桩子，稳好舵把，船老大摇身荡棹，木船便飞也似地向东南方向驰去。

真没想到八级大风竟来得那么快。我们约摸航行了二十来分钟，突然狂风大作。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八级大风在水上肆虐。只见大浪滔天，随风漫卷。五仓木船因为席帆兜风，向左倾斜，露出半边船底。我从没有见过这么吓人的情况呀！便下意识地死死一手抓住舷

沿，另一手抓住手提包。眼见木船如无法驾驭的野马，像箭一般地向前冲去。我正惊恐得闭眼低头时，突然“咔嚓”一声，桅杆折断，席帆铺天盖地，砸到了我的头上。这时就听船老大喊：“高同志，死活别离船！”我完全明白他的意思。这时候如果离开船，虽说我水性很好，也会被巨浪砸沉淹死。风浪再大，如果木船还没有倾覆，仍是保命的靠山。嘿，事情竟真的这么寸：当我死死地抓住舷沿不放、无奈的由死神安排命运时，突然船体一阵擦撞，慢慢停了下来。这时船老大又喊：“高同志，老天爷保佑，木船搁浅在灌渠的堤顶上了！”他俩下船，忙着揭掉盖在我头上的席帆。我们仨人稳住船体，任凭风浪再大，也不能让木船离开这灌渠堤顶半步。好在大风开始减弱，我们以静制动，等到上午十点，大风终于停了。仨人用水瓢舀出仓内的积水，念念不忘地感谢着这救了我们一命的灌渠堤顶，再次起航向天门口公社驶去。

到了天门口公社，我的老战友、公社党委书记周沛德见我提着湿漉漉的手提包，活像个落汤鸡，就惊讶地问：

“咦，你这是怎么咧？”

“嗨，遇上大风啦！叫浪头打的。”

“刚才那八级大风……你在船上？”

我默默地点点头，心有余悸地说：

“差点葬身鱼腹呀！多亏木船搁浅在灌渠堤顶上，才……”

“呀！你这命真够大的。”周沛德同志转而大喜道：“古人言，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去给你做碗长寿面，再换身干净衣裳，壮壮老弟的行色！”

“好！谢谢老兄了。”我也舒缓着说：“别忘了多加姜丝，驱驱寒气。”

这件水上遇险的事，已经过去几十年了。我每每谈起此事，仍是惊心动魄，唏嘘不已。

1963 年年底，中共沧州地委和地区行署联合召开全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我荣幸地被评为地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这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受到地级党委的奖励，心里漾起莫大的荣光和幸福。接着又传来家庭的喜讯：1964 年一月六日，次子亚军顺利降生，母子健康。只是我内心也涌起难以抑制的内疚之情。因为爱人生了两个儿子，我都不在妻子身边，一切劳累都落在了岳母身上。爱人每每谈起此事，总有一点微词：“我生了两个孩子，你都革命在外，真够得上工作狂人呀！”我除了诚恳地表示歉意外，还要由衷地表示几句：“感谢你和岳母对我工作的大力支持呀！说句心底的话，我也不是一点都不惦着你和孩子呀！当时红糖很紧张，购买要凭票，我写信求老战友刘相和同志给你操办了好几斤……”妻子对我这一贴心的行动也没有忘记，她绘声绘色地说：“那件事我永远也忘不了哇！人家相和大哥是骑着车子跑了几十里路送过来的。那个时候，副食品供应很紧张，这几斤红糖可顶了大事呀！”

顺便说一下我的家庭管理和孩子教育。说句“妻管严”的趣话，我那家庭的生活管理和建设，基本上都由爱人刘淑琴主导和决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她算得上讲究计划和勤俭持家的高手。而我在这方面却是相当愚笨的，只能甘当配角。她虽然在生活低标准上要求自己 and 全家很严，但对外的礼尚往来和对亲朋的迎酬上，却是做得十分周到和大方。正因为如此，她在高家本族和亲戚朋友的交往上，有着非常一致的好名声。

我们的两个儿子结婚后，爱人在处理婆媳关系上，也有令人佩服的独特章法。首先，她从来反对老辈流传下来的“婆媳是冤家对

头” 的错误说教。公开秉持自己的如下原则和理念：“即儿媳虽不是我亲生的，但我一定真诚地视儿媳为亲生的女儿来爱戴！决不能把儿媳当外人”。而且她完全相信，婆婆只要有这份真诚的亲情，就一定会收获婆媳互敬互爱的和美果实。她常跟周围的女同志这样介绍自己的经验：“我手里有了什么新鲜好吃的东西，心里一定要首先想着让儿媳吃到，这比你儿子吃到的意义要崇高百倍！比方说，我们老家常捎来白洋淀的特产，诸如熏鱼、松花蛋、咸鸭蛋、大鹅蛋什么的，我一定是先给俩个儿媳和她们的孩子送去。再比如我买来应季的毛豆和花生，煮好后，一定会先要请儿媳和孙辈们过来尝新鲜。如果来不了，我一定包好送过去让她们品尝。还有，儿媳在针线活上经验不够，我就亲自示范，手把手地去教。她们在织毛衣上很灵巧，我比不过她们，儿媳干脆就给我们织一件，展示自己的手艺和心意。就是这么一种真情实意的交流，一下子便把婆媳之间的距离冲掉了。我们婆媳可谓亲密无间，甚至超过了一般母女的感情。她们有啥心里话，都愿同我讲。也正因为我们互相知心，俩儿媳都是碰着心坎地关心爱戴公婆。她们有什么新鲜好吃的东西，或者出差看到公婆需要的某种物件。比如像刮脸刀、保健品、医疗器械和时尚的服装……都会不声不响地送到公婆面前，给你个惊喜……”。

我的两个儿子都是岳母带大的。岳母和爱人在管理教育孩子上，做得十分得体。她们疼爱孩子，又决不溺爱孩子。诸如对孩子们过分喜欢汽水、冰棍、糖果和面包，她们就从不惯着，总是不厌其烦地教育孩子，大讲汽水、冰棍、糖果吃多了对身体有害。多喝白开水对身体最好。吃家常便饭对身体最有益。岳母还有一个对孩子的养生经：“要得孩子安，受得饥和寒”。意思是说，决不要让孩子

吃得太饱，吃得太饱就要闹病。也不要穿得过厚，要适当锻炼孩子的耐寒能力，才能抵御风寒。因为她教育管理得体，两个孩子都茁壮成长，从没闹过什么大病。大儿子建军高中毕业，小儿子亚军初中毕业都争着参了军。当时有人批评我爱人说：“小刘，你对孩子要求得太狠了，那么小就叫他们去参军，孩子受得了吗？”爱人有她的理念，回答说：“我没有强迫孩子去参军，是孩子热爱解放军，非去当兵不可。我倒是认为，这当兵是锻炼提高孩子的最好方式。”实践证明，两个孩子在解放军大学校锻炼得都很好，建军由卫生员提高到军医，转业到河北第二监狱当了科长。亚军当兵三年便退武分配到银行工作，自学成才，成为银行没有职称的建筑和装修的高级工程师，他参与指导的国家工行和省行的工程项目，都搞得很好，受到银行领导的好评。两个儿媳也都是比翼双飞。大儿媳赵怡芹如今是省医院的副教授；二儿媳赵军是河北第二监狱的科长。她又自修了一门心理学，如今是河北小有名气的心理专家。常被请去给大学和其他监狱以及治疗心理病的专业机构讲课或提供心理咨询。孙女高婕也很争气，沧州高级医学专科学校毕业后，考入河北省医院当了护士。结婚后生下了胖胖壮壮的重孙子，使我步入了四世同堂的行列。孙子高晗北京化工大学毕业后，改攻金融，考入了国家工商银行，如今在国家工商银行石家庄卡中心工作地得心应手。我每每看到这一切，总会为全家蒸蒸日上、和谐美好的幸福日子，感到特别的开心和欣慰。

第 16 章 来到广播记者的新阵地

1964 年十一月，沧州日报根据省委和地委的决定宣布撤销。以总编辑魏亚明同志为首的共十四位同志奉调省级新闻系统。七位同志去了河北日报，亚明同志率我们六人，即徐炳跃、申伸、田素琴、赵泽清、刘庆丰和我，进了河北人民广播电台。

电台的格局比地委机关报要大许多。分编采、技术、行政几大块。编采方面有总编室、新闻部、农村部、科教部、通采部和文艺部。技术方面有技术处、广播网处和广播器材厂。行政方面有办公室和人事处。魏亚明同志被任命为广播局（台）党组成员兼农村部主任。徐炳跃分配去新闻部，申伸分配去文艺部，田素琴分配去总编室，赵泽清分配去人事处，刘庆丰分配去技术处，我则分配到农村部。

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和河北省广播管理局，实行局台合一，两个牌子，一套人马。总人数定编 128 人。局（台）长、党组书记陆达，副局（台）长、党组副书记白清，副局（台）长、党组成员吕克仁、杨晋北、李惠。省局（台）的地址在天津市八里台卫津路 95 号。这里本是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机关所在。河北省会由保定迁到天津后，省局（台）一时没有合适的地方，就搬进了天津台的大院。天津台风格很高，不仅给腾出了一座大楼，还腾出一批家属宿舍。双方住在一个大院里很和谐很亲密。

我做了河北人民广播电台的编辑兼记者，很快就发现了和报纸记者有着明显不同的特点。报纸是用文字、照片显示它的宣传功能，广播电台却是把文字变成声音体现它的宣传功能。对于一些实际场

面的描述，报纸用的是绘声绘色的形容词和照片，而电台却常伴有实况音响，很是真切和生动。由于这种不同的显示特点，这就要求广播电台记者不仅要会耍笔杆子，还得要掌握一点录放技术。那时给我们配备了从德国进口的便携式小录音机，用起来十分简便。更较之报社记者的照像机别具一种魅力。许多被采访者或单位听到自己的声音和其他实况音响，常高兴得拍手跳跃，激动不已。当时河北省还没有电视台，如果有了像天津电视台那更加动人的音像特点，就比报纸、电台更胜一筹了。

在河北人民广播电台这个新天地里，原来的老同志们总愿跟新来的人说些他们经历的轶闻趣事。比如保定解放后，河北党的领导就在原敌台的基础上，筹建自己的新的河北人民广播电台。一位旧社会的电台技工刘中一先生，在我党的感召下，自己主动组装了一台发射机送了过来。他从此就成了新中国河北人民广播电台的技术骨干。再比如一位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的周育琴同学，竟冒着生命危险，辗转来到共产党解放最早的城市石家庄，要求参加革命工作。当时的中共石家庄市委书记柯庆施同志亲自批示她到石家庄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不久，周玉琴同志又调来省台，成为令人尊敬和爱戴的技术骨干之一。还有省台直播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大会实况，在全省和全国产生了轰动性反响，也成为广播战士们引以为荣的谈资；电台有一台性能极好的钢琴，每次录制较大的文艺节目，都要派上用场。那是当年苏联老大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访问中国时赠给中国的。伏老一共赠了两台，其中一台就给了河北省人民政府，省政府又转而给了河北人民广播电台（注：因为这台钢琴质量亟好，文化大革命中，有某歌舞剧院因为他们几乎每天都离不开钢琴，竟向省革委提出要求，或调拨或长期借用这

台苏联钢琴，省领导找我商量此事，因为省电台录制文艺节目也离不开钢琴，被我婉言拒绝）。如今这台钢琴仍然用着，成为几十年鲜活的国际文物。当然，有些发生在电台并非正面的故事，也时不时地传进我们这些新人的耳朵。一位 y 男士，在自己的结婚典礼上，突然见异思迁，看上了伴娘。竟然在结完婚后立刻分手，娶了伴娘做妻子。此人后来调离电台，以至十多年过去了，人们仍在茶余饭后议论此事；一位 g 男士长得十分漂亮，其播音水平之高在全国有名，影响很大。他结婚后仍有其他女士追求。结果，在偷情之时被人撞见，竟羞怯难当，跑到铁路上卧轨自杀了。老同志们谈起此事大多不是谴责而是惋惜这位高才的烟灭；还有一位女士，粉饰得十分妖艳，舞也跳得极好。在电台引起一些人和某个领导趋之若鹜，竟公开爱称其为“高级糖”。后来此人因闹出沸沸扬扬的笑话被调出电台。领导也因此被免职调出。

在河北人民广播电台这个新天地里，对我来得最快也最令人难忘的收获，是结识了中国著名作家、《敌后武工队》的作者：冯志。他是电台文艺部副主任。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在我的家乡白洋淀周围八路军的九分区工作，对白洋淀人民感情至深。听说我是白洋淀来的“儿童团”，便以“同志加兄弟”的深情厚谊，邀我到他家作客。在天津南市他那并不宽绰的家里，我受到他和夫人苑莎同志的热情接待。冯志同志把他那誉满全国的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赠我一册，并签名留念。从此，我这个住单身宿舍的年轻人，便成了他家的常客。他的孩子玲玲、圆圆、菲菲、刚刚，自然而然地成了我十分亲密的小友。每次去了，几个孩子都缠着我讲故事。我讲的故事，大多是打日本鬼子的内容。冯志同志对此也很感兴趣。他也常凑过来旁听。有一天，他旁听后很高兴地说：

“小高，你很善长讲故事。你讲的故事录下来就是一篇好小说，应该录下来发表呀！”

“写小说是作家的事呢！”我未加思索地崩出这么一句，接着又道：“我这个新闻记者应该以新闻报道为本呀！”

“那你有点太局限自己了，新闻记者同时又是作家的并不少见。中国的战地名记者巍巍同志，就是记者兼作家么！你也应该有这样的抱负呀！”

“啊？”经冯志同志这么一点拨，我还真有点被触动了。就试着说：“练练小说也行，那得先拜你这小说家为师呀！”

“嗨，谈不到为师，”冯志同志慨然道：“我愿意尽一切可能帮助你！”

1965年八月十五日，是中国人民抗日胜利20周年。一天，我突然接到天津日报副刊版编辑的一个电话，说是根据冯志同志的推荐，邀我写一篇儿童团抗日斗争的故事，字数可长可短，但最好不要超过两万字。我一听可吓了一跳，心里急想道：“自己连一篇‘小小说’都没写过，哪能驾驭这超万字的‘故事’？”就客气道：

“你看这样行不——也别说写多少字了，我写一篇你们看着处理，怎么斧正都行。”

人家同意了，我心里仍然没底，就忙着去找冯志同志求教。他给我鼓劲道：

“你就壮起胆子写嘛！能写多少就写多少。报纸一次登不完还可以连载嘛！我敢推荐你，就是有相当的把握呀！”

“看你说得多轻松！我真要写上一大堆，人家又不好处理，那该有多难看呀！”

冯志同志见我嘀嘀咕咕，挥一下手道：“你不要考虑面子，更

不要怕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嘛！快去干吧，干完了先交给我看，我这儿过了关再送报社，这总可以了吧？”

冯志同志说到这个份上，还真把我的劲儿给鼓起来了。心里说：“有师傅手把手的指导，我又不是死笨，总会有出徒之日吧！”好在那时单身一人，家庭和孩子都不在身边，一连几个晚上，我硬是把初稿拼出来了。又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恭恭敬敬地送到冯志同志手上。只见他翻了一阵子，若有所思地说：

“小高，今天咱干一天。午饭在我这儿吃，一气呵成它！”

“要赶那么紧吗？”我生怕把他那并不健康的身体累坏了，忙说：“师傅还是‘悠’点劲来吧！你说怎么改我都照办。”

“不是我说怎么着——你照办的问题呀！文学的问题，只能是讨论，是切磋，是互补、共同提高的问题！这应该是繁荣文学事业的一个重要原则！快坐到我身旁来，咱说干就干！”

我被冯志同志这诲人不倦的精神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得坐在他的身旁，望着他一丝不苟地审稿，等着聆听他的修改意见。只是他并没有急着表态，而是看完全稿，沉思片刻，最后飞笔规纳了几条，虚心地说：

“小高，你看看，这是我的几条参考性意见。文学上最忌强加于人，你仍可大胆发挥的。改完后，我再看一遍。”

遵照冯志同志的意见，晚上我加班修改后，又誊写清楚，第二天便送到了冯志同志手上。没想到，他再一次打破自己习惯多年的午休，一气看完，紧接着给我打电话说：“小高，稿子看完了。只动了几个字。我认为这篇稿子有着浓厚的农村儿童语言的特点，肯定孩子们爱看，快送报社去吧！”

得到冯志同志的热情鼓励和肯定，我心里十分高兴。果然，送

到报社后，天津日报于十日十九日以《一个儿童团长的故事》为题，用一个整版的篇幅全文发表，署上了我的笔名：高飞。这是我自1958年担任记者以来第一次发表中篇小说。（注：冯志同志教我写小说这段故事，我摘出来以《冯志教我写小说》为题发给了《燕赵晚报》，该报于2017年5月14日全文发表。）这篇中篇小说，天津日报发来稿费48元。这是我生命史上第一次收到这么多稿费呀！嘿，就这48元稿费，日后40年还真衍生了一段有关政治经济学的评析故事。一位金融工作者听说了我这段往事，就做了这样一番解剖：“如果照今天邓小平改开以来的视角看这当年的48元，那实在是太不起眼了。但要照毛泽东时代经济发展的视角看这48元，其当时币值的含金量就要大多少倍啦！那时你全家是五口人，即你的老母亲加你们夫妇、两个孩子，就靠你那每月45.5元的工资生活，而且过得还相当不错。不仅自己购买了全新的“飞鸽”牌自行车，还买了价值151元的名牌瑞士“英纳格”手表。知道么，你当年这48元稿费挪到这邓小平改开以来的今天，要比邓氏今日币值的4800元，要硬多少倍哪！我们比比看：当年的48元，可以很从容的保证五口人一个月的生活费毫无问题。而邓小平改开以来物价昂贵，人民币持续巨大地贬值，不要说他这4800元养不起五口人，就是养三口人都紧紧巴巴的啦！”

下边接着讲一下我中篇小说创作成功的后续心情，我真的萌发了写两部长篇小说的念想。后来这个念想也真的没有落空。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已出版了两部描写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一曰《童侠彪子头》，上海少儿出版社出版；一曰《乱世斗群魔》，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

我到河北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工作，一开始便接受一项大任务。

那是 1965 年春天，在部主任魏亚明同志带领下，去石家庄地区平山县报道全国又一个大寨式的先进单位——南滚龙沟大队改天换地的英雄事迹。南滚龙沟大队位于平山县西部深山区。往西再翻过几道山梁便是山西省地界了。为啥要叫“南滚龙沟”呢？据祖辈传说，东汉皇帝刘秀在登基前，被篡汉的王莽追杀得东躲西藏，正好骑马跑到这个地方，因为山势凶险心里发慌，一下子从马背上摔了下来。马往前跑了，他却趁势钻进了附近的草丛，隐蔽得严严实实。等追兵远去，刘秀那跑到前边的马又折回到刘秀隐蔽的地方，载着未来的“真龙天子”，到百里附近一个叫“高邑”的地方登基。这里的百姓为了图吉利，便给自己的穷山村起了“南滚龙沟”这么个吉利的名字。当然，名子再怎么改，解放前的日子仍是苦不堪言的，抗日战争那些年，共产党的晋察冀边区有许多机关住在这里，和这里的人民一起搞过“大生产”运动。解放后，特别农业集体化的实现，以党支部书记李全寿为首的党支部，带领社员像山西大寨大队那样，进行了改天换地的艰苦奋斗，出现了几十名硬汉子，几十名铁姑娘，引山泉小溪的水，改造了老天不下雨就没办法的旱地，一跃而由缺粮队变成了对国家有贡献的余粮队。被誉为全国学大寨运动中又一个“大寨式”的先进典型。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亲自到这里视察，中国著名劳模、山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同志也到这里参观交流经验。我们抓住这个和大寨比翼双飞的先进典型，充份发挥广播逼真的音响效果，发了一篇全面介绍南滚龙沟的录音通讯。同时还发了几篇介绍南滚龙沟“硬汉子”和“铁姑娘”的专题报道。由此，我们和党支部书记李全寿、副书记闫志林、大队长王志义以及“硬汉子”队长李二宝，结下了无话不说的深厚友谊。

一天上午，我随李全寿书记来到一个叫“南山坳”的山头查看

情况。顺便问了他一个南滚龙沟人十分敬畏的问题：

“全寿同志，你们为啥把小溪里的鱼称为‘鱼神’呢？大家一不抓，二不吃，三不惊扰……”

“这是老辈子传下来的神话。因为这里水少为贵，鱼水又不可分，再加上这鱼是本地土生土长的，有点像‘娃娃鱼’呢！人们自然而然地把同自己伴以生存的水鱼尊为鱼神了。不光老百姓敬重，就连山崖上住的大鹰，也只吃兔子、松鼠，惟独不吃小溪中的游鱼。”

李全寿书记讲得头头是道，我禁不住又问：

“你真的相信它是鱼神吗？”

“我当然不信。共产党员哪能相信神鬼呢！只是人们多年来形成‘不抓不吃不惊扰’的习俗，我们党支部包括党员就只当做一种民间风俗对待了。”

“咦，这倒是一种很实际的作法。不过，我想建议你们再突破一步，教育大家把这项资源利用起来。我是白洋淀人，见过很多鱼种，像你们这里的鱼趴地而游，肥美异常，还不避行人，我真是第一次见到。要是把它做‘龙沟’鱼牌宣传出去，可能不比‘黄河鲤鱼’和‘白洋淀鲑鱼’差呀！”

李全寿书记听我这么一说，沉了一下，苦笑道：“你这个建议将来可以，现在要扭转人们的观念恐怕不容易。不过，我赞成你们外边来的同志先试试。头难，头难，开头了就不难啦！”

“那我先带个头吧！人类原始社会的文明，就是顺着河道搞渔猎活动开始的嘛！我想老百姓不会反对我吧？”

“不会的。实际上，抗日战争年代，驻在这里的八路军和政府机关的同志早就带头吃鱼了。只是你吃你的，我们不吃就是了。”

我有了这个底，就高兴地跑下山去，坐在一块卧牛石边，不一会儿就抓了一堆，用水草蔓子穿成一串串，送到了接待站食堂。人们吃上了肥美的“龙沟”鱼，真是鲜而嫩、嫩而鲜，香极了。南滚龙沟的年轻人见我们吃鱼如此上劲，他们也禁不住要尝尝味道，就这样，终于打破了辈辈相传了多少年的吃鱼禁忌，竟推出了南滚龙沟人炖鱼待客的新时尚。

“七打核桃八打栗，九月的柿子红了皮”。中秋时节，我根据农村部确定的对南滚龙沟先进典型要连续报道的计划，第二次来到这里，采访他们大丰收的红火气象。这时，包括中央来的新闻单位同行，还有全国和我省来这里参观学习的农村干部，几乎住满了县里建在这里的接待站。平山县城通往这里的山间公路也修好了。过去，南滚龙沟盛产的核桃、栗子、柿子、黑枣……只能靠人力筐背和肩担运出去一点点，现在大卡车已经畅通无阻了。我们这些各路来的记者，一边采访，一边和社员一起采摘土特产品。休息的时候，还要共同唱起不知是哪位词曲家谱写的《南滚龙沟战歌》。这里还有两支力量格外引人注目。一是北京的中央电影学院的学生们，他们编排了一部歌颂南滚龙沟干部社员的记录影片，社员们第一次参加排电影，大家都非常激动。二是美术界的许多画家，手执画板，“旁若无人”的坐在自己带来的马札上，聚睛会神地望着自己选好的景点写生。我跟这些画家也混得很熟。特别认识了河北美术出版社的编辑洪钊、玉文和刘端同志。他们竟不约而同地对我说：

“高同志，你能不能在写报道之余，给我们写个歌颂南滚龙沟事迹的《脚本》呀？”

“呀，你们要的《脚本》——我从来没写过呀！要写的话，诸位得教教我哩！”

几个人听我这么一说，都“喷”地笑了，他们七嘴八舌道：

“你肯定看过连环画小人书吧？就是图文并茂……咦，那‘图’是我们设计，‘说明词’由你写。只是一定要注意那‘说明词’必须有‘画面感’，不然画家就难以下笔了。”

“那我生手乍练就试试吧！希望你们带好我这个徒弟。”

他们看我态度诚恳，洪钊同志表态道：

倍“我和玉文同志做你的责任编辑，咱们签个合同。”

还真的就把合同签了，其中有一条规定倍感新鲜，就是先预支部分稿费 100 元。这一点，和新闻界的稿费发放是用稿后才发不同。但是，出版界这种作法有某种积极意义，你拿到了预支的部分稿费，撰稿的责任就板上钉钉了，必须用心写好呀！

结束在南滚沟的第二次采访，我来向李全寿书记辞行时，他有点犹豫地说：

“喂，高同志，能不能晚走一天哪！我有些心里话……想请你给反映反映。”

“可以！”我非常明朗地回答道：“你定个具体时间吧！”

“那……咱现在就谈！”李全寿书记望了一下四周，声音放小了说：“在办公室谈不方便，咱还是到‘南山坳’吧！”

来到南山坳，我俩坐在一个背静的山怀里。见我拿出了采访本，李全寿书记探询道：

“你们记者光写表扬稿吗？批评的稿子可不可以写呀？比方说批评上级的稿子……”“当然可以写！我们记者的肩上也负有这个任务呀！不过，总的讲，党的宣传工作主要还是正面宣传喽！但不知你想批评啥事……”

“我想批评的事……咳，还是非同小可呢！”李全寿同志陡然

加重了沉重的神色，

接着道：“县委派来了工作组，组长张新同志很厉害，说是为‘四清’做准备，

叫我们白天工作，接待记者和参观的人们，晚上接受工作组的审查，就是一个劲地叫你交待‘四不清’的问题，好像是带着框框来的，又不点明是什么问题，你回答得不对他的心思，就批你态度不老实。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根本看不出与人为善的意思。这样一种搞法我认为根本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知省委知道不知道这种情况？我内心很痛苦，想顶一下又怕落个‘反党’，可逆来顺受也不符合党的原则呀！为这，我常一夜一夜的睡不好，希望能听到省委的指示……”

“你们党支部成员都是这种情况吗？”我进一步询问。

“基本上一个样。但他们不敢向上反映，都盼着我去说……”李全寿说到这儿，又补充道：“工作组是县委派来的。我想过了，跟县委反映不行，就是地委我也不想找，还是直接找省委好。咦，这事你老高还得给我保密，不然，叫那个张组长知道了，我俩就肯定吵翻脸啦！”

“保密没问题，请放心。我想问一下，你最根本的问题是反映什么？”

“这根本的问题么，就是要求上级对党的基层组织要实事求是，要有个基本信任的估计。搞‘四清’不要紧，你就是‘清’得再厉害，最后的结果也总要实事求是吧！既然如此，上级对基层组织为什么不采取冷静慎重的态度？总是怀疑第一，‘有枣没枣打三杆’？按照‘怀疑’去挤问题，挤不出来，就批你态度不老实？要知道，这样的搞法是很伤同志感情的。所以，我请你把我些意见反映给省

委。省委要我去面谈，只要接到通知，我马上就去。”

我完全明白了李全寿同志的意思。同时认为：他的态度是诚恳的负责的，其批评的意见也是善意的建设性的。便用李全寿同志给省委写信的形式，搞了一份《内参》，回到天津，直接交给了台长陆达同志。陆台长看了以后，顺便跟我发了一通议论。他说：“我们的记者本来就有两种职责嘛！一种是公开的正面报道，一种是不宜公开的《内参》，做为省委指导工作的参照。你小高同志注意了这点，很好哇！我很快就送给省委。”

《内参》送到省委后，省委领导同志是怎么批示的我不知道。等到 1966 年春天，我第三次采访南滚龙沟时，因为发生了一个不愉快的小插曲，我才算知道了一二。那是我刚刚吃完晚饭的时候，驻南滚龙沟大队“四清”工作组张新组长，把我请到了他们的办公室。屁股还没坐稳，这位张组长当着几个工作组同志的面，就发出了厉声地质问：

“你这个记者可不是个简单的人物！过去我们认为你还不错，现在才知道你是个两面派！竟然回到省里告了我们。今天叫你来就是要把问题摆列清楚！”

我被人家搂头盖顶地来了这么一棒子，还真把我给敲明白了。我立马想到是那份发给省委的《内参》惹了祸。不过，我十二分的镇定。因为按照中央和省委的规定，这份《内参》是不会让被反映者看的。肯定是某个知道一点内情的人，违犯纪律掐头去尾的传给了他们。这种违犯原则和纪律的行为，谅他们不敢往桌面上摆。我便抓住这个要害，以攻为守道：

“你张新同志这顶帽子好厉害哟！可真把我给闹糊涂了！谁告你们啦？我姓高的根本没告你们呀！”

“你不要装糊涂！我们有证据。”张组长更加火冒三丈，接着又道：“给省委写信告我们的就是你，白纸黑字，你跑不了！”

我仍然以攻为守，挑战道：“既然有白纸黑字的证据，那就摆出来看看！你张组长敢吗！？”

这一手，我真把他张组长给“憋”住了。因为他完全靠的是“唬”牌，根本拿不出来么！就在这个叫他尴尬无比的时刻，宅北工委书记张玉良同志进来了。他有点着急地说：

“高同志，我正找你哩！”说着，他就亲热地拉着我往外走。我多少了解一些张玉良同志，他分管着三个公社的工作，是一位思想作风很好的同志。我来到他的屋里，玉良同志歉意道：“工作组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不对头嘛！上级批评了一下，改了就好么！可他们思想没搞通，还有点气盛，这是年轻人不成熟的表现。我的工作没有做好，需要继续加强教育呀！不过，请你相信县委对你们记者在这里的工作是支持的和满意的。”我完全理解并确信玉良同志的意见是真诚的。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俩一直保持着同志式的问候关系。

在结束南滚龙沟的第三次采访后，我来到驻在石家庄的河北美术出版社，交上了我那介绍南滚龙沟大队先进事迹的《脚本》。回到天津，又有好消息传来：李全寿同志在全省贫下中农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河北省贫下中农协会副主席，他还跑来电台看我，言谈之中多次表示了他对河北人民广播电台的衷心感谢。

在我结束这一章的时刻，请允许我把时间拉到后边的 1969 年党的“九大”以后，斯时我已经是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兼河北省广播局（台）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一天上午，省革委主任李雪峰同志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一下。我到了雪峰同志的办公室，一下就看到中共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同志正坐在那里。雪峰同志介绍道：

“这是纪登奎同志，你小高认识吧？”

“认识认识，在电视上见过多次了。”

我笑着说迎上前去，登奎同志起身和我热情握手，拉我坐在他的身边，朗声笑着说：

“我就喜欢你们年轻人。听雪峰同志说，你管着河北的广播电视，今天我要给你派个任务，给中国又一个大寨式的先进单位南滚龙沟拍个电视记录片。我刚从南滚龙沟调研回到石家庄，觉得你来干这件事很就劲。记住：要原汁原味，不要刻意粉饰。南滚龙沟的改天换地跟山西大寨一样，就是靠着勤劳的肩膀和一双手嘛！这是我们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最突出的革命形像，用不着添枝加叶，拔高抹粉。那样子就把本来朴素美丽的姑娘变成‘三仙姑’啦！”

我听了登奎同志这段指示性谈话，心里虽然很受鼓舞，可也顿时敲起了小鼓：“河北电视台刚刚戳起不过几个月，只有省直机关赠送的几个很陈旧的便携式小录像机，搞个简单地电视新闻可以，真要搞个严肃的电视记录片还是不行……”就忙着委婉道：“登奎同志，你派的这个任务太光荣了，只是河北电视台刚戳起几个月，设备和经验都很差，这一点雪峰同志很了解，这个担子我怕挑不好呀！咦，我有个建议，请登奎同志指示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来干这件事，他们肯定会干得很好！”

“呀！你小高同志可是差点气魄呀！缺了点造反派的脾气哩！就是觉得自己实力不够也不能退却么，你可以提出和中央新影厂合作搞么！”

“合作搞当然是件好事。可我们还属‘小字辈’呀！最好是当他们的小弟，这样对我们来说更实际一些。”

这时，雪峰同志插话道：

“小高想当小徒弟也好啊！我了解他们眼下的实力，确实不够。还是请中央新影厂来干比较好呢！”

这个故事过去不久，省革委第一副主任刘子厚同志找我，说河北想搞个电影制片厂，由省科协主办，你们电视台协助。先搞一些科教片，在电视台播放。以后再逐步扩大到历史和现实的……包括革命战争等领域……听他这么一讲，我立马高兴道：“这个建设项目太好了，我们广电部门不应该只是协助呀！应该是全身介入建设才对哟！”子厚同志摆摆手说：“那是下一步考虑的问题。眼下还是协助比较好！”这件事，到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我那个由广电部门全身投入建设和管理的意见才真的落实了。

第 17 章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我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以毛主席在人民群众中无与伦比的崇高威望，绝大多数人即使对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还不一定有更深层次的认识，但基于对毛泽东思想的坚信不移，还是很快就动员起来投入了战斗。当时，战斗的中心在北京。一是邓拓（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吴晗（北京市副市长、《明史》研究教授）廖沫沙（北京市委统战部长）搞了个《三家村夜话》，在北京市委理论刊物《前钱》上长期连载，用借古讽今的黑话，从事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活动；二是吴晗搞了个《海瑞罢官》的剧本搬上舞台，影射我党撤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的决议。这种用白纸黑字掀起的反动思潮一经揭露，立刻引起广大工农兵和革命知识分子的极大愤怒。我做为吃党的奶水长大的红小鬼，又是新闻战线的积极分子，自然要冲锋在前，每天都要深入工农兵和知识界组织批判“三家村”和吴晗《海瑞罢官》的稿件，进行广播。但那时我对这场伟大斗争的认识却有相当大的局限。竟肤浅的认为：我们面对的不过是一伙反党小丑在文化领域掀起的黑潮而已，打退它们的进攻指日可待。等到 1966 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著名的《五·一六通知》，公开点了包庇吴晗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的名。我顿时惊得打了个冷颤：“呀！可不是几个反党小丑在向党进攻呀！后边竟有这么大的保护伞哟！”《通知》里有这样两段更加令人警醒的话：“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有些已经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完全没有被识破，有些还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务必充分注意这一点。”就更使我那肤浅的认识提高了一大步：即文化大革命不仅是思想文化界的大革命，更是一场要全党全民参加的涉及党、政、军这些国家重器的政治大革命。这时候，我对自己正在谋划的那个“攻下一、二部长篇抗日小说”的念想，虽然有的已经搭起了架子，还是决定停下来，要全身心地投入这场更高层次的阶级斗争。

这时的河北省广播局（台）领导，正在密而不宣地准备着或进行着在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比如大家看到机要秘书张 xx 被换掉了，小道消息说她丈夫犯过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吴 xx 的打字员被换掉了，小道消息说她丈夫历史上有所谓一般性历史问题；罗 xx 的播音员被换下来了，小道消息说她父亲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还有一个动向，局（台）长、党组书记陆达，神秘地到北京参加华北局召开的“五月扩大会议”，机关的工作宣布由副局长（台）长、党组副书记白清同志主持。编辑部还派了徐炳跃和杨宝申两同志驻在北京当联络员，为陆达同志传递准备开展“文革”的内部材料。这工夫，白清同志突然以主持者的名义，宣布成立局（台）“文革筹委会，没有经过群众酝酿讨论，由他和人事处长张辉同志亲自点名崔德申（技术处副处长）、齐英林（人事处秘书）、赵泽清（人事处干事）、王根旺（农村部编辑）、张冠军（文艺部编辑）五同志为候选人。那时候，群众对党组织有个多年形成的坚信不疑的习惯定式，再加上这五位同志平时表现也不错，举手表决时大多数都高高举起了赞成的手。我也是其中的一个。等到主持人

询问“有不赞成的吗？”谁也没想到：这时文艺部编辑、老复员军人阮德才同志“嗖”地站了起来。他带着一口怒气举手大声说：“我反对！你们这是操弄群众、‘运动’群众，妄图由你们主宰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走向”。就这几句硬棒棒的壮语，一下子把整个会场震得凝固了，与会者大眼瞪小眼的望着阮德才，也瞧着主持人，不知道下面这个“场”会怎么收。这时主持人好像胸有成竹，他根本不回答阮德才同志的怒声谴责，竟简单地来了个挥手宣布：“选举有效。散会！”

就这样，大家带着阮德才同志那几句“一时解不开的壮语”散去。第二天就宣布了崔德申同志为“文革”筹委会主任。这时，我想到了毛主席讲过的一句名言：“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里！”第二天就去走访了阮德才，我握住老阮的手用敬佩的口气说：“你老阮真是英雄虎胆哟！等于把白清和张辉的‘底’揭了个底朝天呀！”老阮却严肃地回答说：“你小高胆子也够大呀！自我攻了他们那一炮，还没谁敢来这么公开的访问我呢！其实，这不是小秃脑瓜上的虱子——明摆着的问题吗？人人皆知的是：他们根本没有经过群众酝酿讨论，就钦定了候选人，完全是‘运动’群众么！还有一条我还没讲，华北局五月会议结束了，河北的与会者回到保定接着召开落实‘五·一六通知’的工作会议。中央又公布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16条规定和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文化大革命的对像和方法都讲得清清楚楚，陆达台长就住在河北饭店参加工作会议，白清竟背着陆达自作主张，急急忙忙推出个‘文革筹委会’。党组成员魏亚明同志告诉我，他也对此一无所知。这完全是搞非组织活动嘛！你小高整天忙于到外边采访，不注意台里复杂激烈的斗争动向，千万别落个‘灯下黑’的糊涂人呀！”

听了老阮这一席话，我还真感到自己有点“灯下黑”了，就说：

“你提出的问题很重要，是我见识太迟了。要不这样子——我以记者的名义给省委写个《内参》报告一下？”

老阮好像有更多的了解，他说：“陆达台长已经向省委讲过了，省委没有表态。你写《内参》恐怕也会石沉大海。当前最主要的，我看还是靠我们自己起来斗争！”

“好！我首先坚决支持你的革命行动。”

离开了阮德才，一出门正碰上技术处长高瑞奎同志。这高处长素有“小钢炮”的大名，说话直来直去，颇有正义感。在抗日战争中是冀中军区机要处的“红小鬼报务员”。他一见我竟禁不住怒气冲冲的说：

“白清副台长胆大妄为！竟敢公然违犯规定，昨天在电台最机密最要害的控制室开了‘二十多人的秘密会’，咦，你小高去参加了吗？”

“啊？”我震惊道：“本人根本不知道这个事呀！咦，白副台长是有名的‘深沉明白人’……他因为什么特殊的紧急需要……非要去解放军有专岗保卫的控制室开会呢？”

“什么‘紧急需要’？他开的是‘电台红卫兵成立会’，这显然不正常么，我要向陆台长告他！”

高处长匆匆地走了，我再一次陷入了深思：“电台控制室，一直是有解放军设专岗保卫的张口就可以向全国和世界直播的最机密最要害的部位，外国搞政变就先要夺取电台，为的就是用最快速度发布夺权公告嘛！我们全台也只有几个关键同志可凭证进入，其他人连在门口逗留都不允许，白副台长咋敢在这里召开二十多人的会议？还有，红卫兵这种新的群众组织是北京大、专院校首先兴起来

的，还没听说有哪个行政机关这样搞啊！白副台长亲自组织自己的红卫兵队伍，他到底是为了什么……”

不过两天，又一件具有惊天效应的“政治事件”在电台爆出：“陆达台长在河北会议上因临时回电台办事，被电台刚成立的“红卫兵”围堵在了楼道。不由分说，就挂上“反党集团头目”的牌子，宣布“揪出”示众，然后关进了禁闭室。接着，电台“文革”筹委会举行全台大会，宣布：揪出了“陆达反党集团”，其集团成员有：农村部主任魏亚明、技术处长高瑞奎、文艺部副主任（中国著名作家）冯志。要求大家要积极投入揭批“陆达反党集团”的斗争，夺取电台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副局（台）长、党组书记白清作镇大会并讲话，他毛遂自荐地说：“在陆达台长被隔离审察期间，由我来主持全面工作。希望大家要坚守岗位，积极投入揭发批判‘陆达反党集团’的斗争。服从命令听指挥，努力工作，确保安全广播不出问题。”白清副台长的这段作镇讲话，使我感到一种有别于更多同志的震动。因为他们抡出的‘陆达反党集团’，其中两位成员，即魏亚明和冯至同志，同我有着十分亲密的同志关系，白清会不会株连到我头上，我必须要有足够的警惕和迎战准备了。

因为这个“事件”来得“惊天动地”，又太突然，太诡异，当时会场上，除了静寂还是静寂，没有谁窃窃私语，当然也没有掌声。会后呢？出现了三种情况：一是那些御用“红卫兵”积极跟风。支持“文革”筹委会的大字报大多是他们贴出来的。二是相当一个多数处于困惑状态。既不愿表态支持，也不敢表态反对，处于观望中。三是有少数清醒的同志，比如，阮德才同志公开发表谈话，揭露白清、张辉搞政变夺权，认为陆达台长和魏亚明、高瑞奎、冯志同志是革命领导干部。另有共产党员编辑王恩瑞和爱国华侨子弟谢志强

两同志找到我，说他们同意阮德才同志的看法，要成立一个“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用组织起来的力量和电台成立的御用“红卫兵”展开斗争。我当即以“观察评论员”的身份表态支持。王恩瑞和谢志强对我这个表态不大满意，俩人不约而同地激火道：“你当的什么观察评论员呀！干脆来我们兵团当勤务员指挥战斗吧！”我看他俩用那火辣辣的眼睛望着我，只得来了个干脆表态：“好！我来当咱‘兵团’的参谋长。”

也就在这个当口，被抽到河北省直机关“文革”运动办公室工作的秦廷珠同志有事回来了。他是来自天津市几乎是同时和我调进省台的，也分到省台农村部当编辑。我俩早就结为志同道合的亲密朋友。一见面，他就主动和我交谈电台出现的问题，有点气愤地说：

“白清副台长原来认为是个‘老实老头儿’，没想到他竟如此混丈！怎么能张口就抡出个‘陆达反党集团’呢！搞得省委也很紧张，刘子厚同志刚升任省委第一书记，也不知如何处理为好了……”

“这事有这么难处理吗？”我有点不解地问：“刘子厚同志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刚任命的省委第一书记，应该有相当大的权威哟！依我看，子厚同志只要大胆领导，照原则办事，发个指示文件就解决了嘛！”

“看来不是那么简单呀！毛主席一方面讲要党委‘敢’字当头的领导，可‘文革’《16条规定》又提出‘群众要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我想子厚同志还没把握好这盘大棋怎么下呀！他还在观察群众运动的走势。我认为，咱们这些平头百姓也得在大风大浪中学习游泳。噢，我已经酝酿了一张大字报，等写好了你看看，咱就贴出去。”

“好。那就快动笔吧！你现在的‘省直文革办公室’身份有点

特殊优势，我想会一鸣惊人哩！”

斗争在激烈地进行着。陆达和魏、高、冯同志不愧是抗日战争中成长起来的老同志，有看守传出消息说，他们在禁闭室里态度强硬，拒绝交待任何问题。而那些御用“红卫兵”贴出的揭批大字报，基本上又都是空洞的批判口号，毫无实质性内容，对陆达他们没有任何震慑作用。这时白清和他那个“文革”筹委会就有点气急败坏了，决定动“铁手腕”，就给他们四个所谓“反党分子”用白纸做好了高帽子，又把机关的铜锣拿来，强迫他四人一边敲着，一边自己高喊：“我是反党分子xxx！”开始他四人拒绝就范，“红卫兵”就强拧硬揍，他四人无奈只得对受蒙蔽的“红卫兵”作理解状，便违心的照做了。除了对陆达他们四人铁腕“杀威”，接着是对阮德才同志下手，实行“红卫兵”推搡式的大围攻。但阮德才言善辩，一百个不怕。“红卫兵”没办法了，转而把跟阮德才跑的一位胆小天真的女同志抓来审斗，这位女同志迫于压力，终于反戈一击，她揭露说：“老阮搞了个叫‘红少数’的群众组织，已经有十来个人了，还没有公开……”这一爆料，“红卫兵”好像逮住了有“把”的西瓜，他们反过来又去围攻阮德才。老阮这回干脆公开宣布：“我确实成立了‘红少数’战斗队！这是宪法给我的结社权利。你们要敢干涉，我立马进京到中央告你们！”说来这些“红卫兵”也大多来自退伍战士，他们还真有点怵这位转业老兵，只得互递眼色做鸟兽散去了。在如此白色恐怖下，电台却涌现了一个侠客式的英雄——共产党员大学生编辑：杨盛发。他毕业于北京某大学中文系，是有名的“刀子嘴”，还兼有草莽那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脾气。他看到御用“红卫兵”用污辱人格的野蛮方式，强迫陆达和魏、高、冯三同志戴高帽、敲铜锣游园，公开大骂道：“这完全

是法西斯行径！电台谁不知道陆达他们几位是跟着毛主席出生入死的老革命呀！用这种法西斯行径迫害折磨他们，难道就不怕遭报应吗！”“文革”筹委会很快得到了密报，立刻决定对杨盛发展开大批判，但要选择另一个茬口入手：即杨有一张穿西服戴领带的照片，常拿出来叫人们欣赏，就以此把他定性为“崇洋媚外资产阶级思想的吹鼓手”，这个指令一发出，那些御用“红卫兵”们更会添枝加叶，干脆给杨琢磨了一个“美国记者”的滑稽称号，一场大字报批判高潮便铺天盖地朝杨盛发袭来。其时，杨盛发的爱人杜明华正带着儿子杨涛在例行探亲，就住在电台院里的一间房子里。大字报竟然像挂帘子一样，把这间房子的门窗糊了个严严实实，杨盛发和爱人出来进去，都要小心翼翼，生怕把挂着的大字报弄掉了。不过，这件事闹得如此“蝎虎”，杨盛发却毫不在乎。他有自己对付的小办法，即每天照样大摇大摆，见人只是微笑而过，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有个御用“红卫兵”李xx对杨的如此作派很恼火，他决心要用拳脚惩罚他一下，就瞅准机会把杨逼进了一个晃旌，铁拳也杵过去了。没想到杨一个“骑马蹲裆式”，来了一招“出手下取”，硬是攥住了李xx的睾丸。只听李xx尖叫一声，疼得猛蹲在地上，接着便连声求饶。杨盛发这时冷笑着警告说：“你这小伙子仗着自己五大三粗，就要猖狂欺人。我刚才这一手给你留了点余地，只是叫你疼了那么一下，你再二次欺到我的头上，我会拿出更厉害的招数叫你尝够！”这个传奇故事因为几分钟就结束，以至谁都没有看到，杨盛发却告诉了我。我就势鼓励他说：“你不要这么单打独斗了，干脆入伙，参加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的战斗！”他同意了我的意见，并成为兵团的勤务员之一。

秦廷珠同志要写的大字报，经过我俩切磋，正式贴出来了。这

张大字报其实很简单，只是言简意赅的向白清副台长提了这么几个严正的质问：白副台长你也是 12 级的老干部了，什么原则不懂？怎么能张口就抡出个‘陆达反党集团’ 呢！如此重大事项为啥不向省委报告？你做为二把手和一把手陆达一向配合得不错，为啥竟一夜翻脸，跟多数党组成员连个气也不通，由你个人密秘操作夺权？你执掌电台大权也有些日子了，为啥没有公布陆达和魏、高、冯自己的交待？你白副台长也没有揭出任何实质性的“反党”问题。白副台长打算如何收场？我认为省委已经了解了一切，正等你回头是岸，如果死不回头，就只有靠革命群众运动解决问题啦！就这么几个严正地质问，击中了白清“造乱夺权”的要害，在全台一下子炸锅了。就连他组织的“红卫兵” 队伍也在开始裂变。这时，我们经过和“红少数战斗队”紧急会商，共同叫阵“文革” 筹委会：立即公布所谓“反党集团”的“反党问题”，如果拿不出实质性问题，就是公开的无耻的栽赃陷害。这一炮把“文革” 筹委会打懵了。他们急来抱佛脚，搜罗一些材料打印公布，竟然都是些鸡毛蒜皮式的问题。这便更大的教育了处于困惑中的群众。许多人纷纷加入“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接着，我们又抓住白清个人决定一切，搞出“陆达反党集团”这么大的事，其他党组成员如副台长杨晋北、李惠和办公室主任刘斌竟然也一无所知。便强烈要求召开“党组揭盖子会”。白清一下子被我们逼到墙角了，他只得摆开了“肉头阵”，对我们的强烈要求置之不理。进入十月，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出指示，公开点名批判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指明刘邓反动路线的实质：就是矛头向下，镇压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扭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指示中还特别指出，各级党委不准整群众的黑材料，已经整了的要全部当众销毁。这一指示立刻变成

群众手中的强大武器，大家纷纷贴出大字报，要求白清给阮德才同志、杨盛发同志平反，要求立即销毁整群众的黑材料。白清还是摆他的肉头阵：置之不理。这工夫，“文革”筹委会资料组的杨金兰同志“起义”了。他挺身而出，把白清密秘派人调查高恩泽的黑材料端了出来。王恩瑞和谢志强同志立刻找到我报讯：

“你小高还不知道吧？人家密秘调查你的事，杨金兰同志公开揭出来了……”

“啊，调查我？我家是革命家庭，老堡垒户呢！我从小喝共产党的奶水长大，有什么可查的？”

“咦，你不配合人家白清的反动路线呀！人家当然要查你的底细，我们兵团同志刚才讨论过了，说你是反动路线密秘侦察的受害者，不应该只当咱兵团的参谋长，要当兵团的一号勤务员才更合适。快走吧！大家正等着欢迎你走马上任呢！”我无法拒绝同志们的盛情，就在这样这样一个当口，我成了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的一号勤务员。

事后，我专门找到“文革”筹委会主任崔德申同志，质询自己被密秘调查的事。因为老崔是军队转业的老同志，一向为人厚道，不说瞎话。对我的质询他一点都没有遮掩，张口就说：

“有这事。主要是有人发现你对电台的“文革运动”不积极，不表态，好像是有自己的看法。再就是估计你家庭上可能有什么问题隐瞒着……就派人调查了一下，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咦，这事你千万别往心里去，没问题就完了嘛！”

“老崔呀！我俩的同志关系一向不错，但我不能同意你刚才那种简单的认定哟！毛主席批判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其中就说到他们‘矛头向下，镇压群众’，你们不是也整了阮德才同志和杨

盛发同志吗？我听说你们还围攻了魏亚明同志的爱人田素琴同志，命令她和自己的丈夫划清界限。要知道，田素琴是十二岁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呀！她义正辞严地拒绝了你们的命令。还有，高瑞奎同志在保定三中读书的孩子高祥明，你们也派人到三中讲他是‘黑帮的儿子’，‘共产党的中学不能培养黑帮的孩子’，硬是把孩子的被褥给扔了出来。这些不都是把矛头指向群众吗！单就这几件事，说你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那是一点不为过的。我希望老崔同志不要执迷不悟了，赶快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你小高讲的这些，我现在也感觉到不对了，但这都是奉命行事呀！你要给我上到路线错误上去，我还真有点不服。因为整个安排都是局（台）领导白清同志部署的，路线正确与否，应该由他负责呀！”

“我理解你老崔的意见，你们和白清之间应该有所区别。”

两军对战到这个节点，白清的“肉头阵”有了一个新变化。他好像发现自己组织的红卫兵，只会打打杀杀，不像“红少数”战斗队和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机动灵活，总会拿出得心应手的策略，便采取了两项新的战略措施，一是把各地区记者站的二十三位记者调回来，参加台里的“文革”运动，以壮大自己正在败落的势头。二是授意军队转业干部齐林同志也成立了一个群众组织，取名叫“红色造反总部”。原来那些御用红卫兵就不再以红卫兵名义行事，而变身为“红色造反总部”的成员。顺便说一下这位齐林同志，本来也是来自解放军大学校的好同志。我俩之间也有着很亲密的同志关系，但他有一点哥们义气的弱点。白清副台长就是看中了转业军人大多是“服从命令听指挥”这一特质，便把他推出来当了炮灰。这“红总部”一亮相，就明显透着白清那种主宰一切的极左狂霸，竟

宣布十七级以上干部全部靠边站，今后这些人如何工作也将由“红总部重新安排”。我们一看，这口气实在太大了，不光是杀气腾腾，还透出要夺取电台大权的信号。就立刻讨论了四项应对之策：一是严正声明，党的干部包括 17 级以上干部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必须坚决保护。“红总部”口出狂言，命令全台 17 级以上干部立刻靠边站，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形左实右思潮的又一次大暴露，我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坚决反对。并要求 17 级以上干部坚守岗位，照党中央公布的“文革 16 条”做好工作；二是我们兵团欢迎 17 级以上干部参加我们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更欢迎你们参加我们兵团的工作。凡是进入我们学习班的同志，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会以实际行动，保护大家的人身安全，不准任何人强行拉出去乱批乱斗；三是“红总部”声明他们将重新分配 17 级以上干部的工作，这是狂妄而又非法的变相夺权。我们严正声明，广播电台是党的机要单位，任何群众组织都无权夺广播电台的权；四是在“文革”中因亲属或家长的历史或现实问题而被边缘化的同志，我们希望他们放下包袱，欢迎到我们兵团参加战斗。兵团将以战友的名义保护他们的安全。就这样几条反击措施，一下子便把 17 级以上干部的大多数吸引团结到我们周围来了。副台长、党组成员杨晋北、李惠和办公室主任、党组成员刘斌，还有老人事处长梁建业同志，都高兴地到我们兵团报到（注：副台长、党组成员吕克仁同志，“文革”开始不久，被省委调出）。一些被边缘化的同志更报名加入了我们兵团。但是，被白清打成“陆达反党集团”的几位同志却没有来。经过询问，我们才知道，他们是担心引发两派的争夺战进而造成武斗的后果呀！不过，就上边这些有点轰动效应的气势，已经叫“红总部”抓耳挠腮，有点无所措手足了。他们内部竟冒出一伙子人，大喊大

叫着要抓一位副台长和一位老处长的所谓“作风”问题，并威胁要给他俩戴上“流氓”的帽子。这两位老同志很是不安，立刻向我报告。我立马找到“红总部”一号勤务员齐林同志交涉。指出：两位老同志的一般“作风”问题，是早已正常处理过的陈年旧事，不是“文革”要处理的问题，你老齐同志应该明白这一点。如果你们为这硬是要挑起事端，我们会坚决制止。齐林同志紧紧握住我的手，严肃表示：“这是少数人的偏激意见和行动，我没有同意，一定会做好工作制止，你小高请放心。”接着，齐林同志又热情地提议道：“咱哥俩应该有个君子协定，观点分歧可以交流，也可以心平气和的辩论。但千万不要影响咱俩的同志关系。”我高兴地接受了他的提议。

从齐林那里回来，便碰上阮德才同志来访。这位常有独到见解的仁兄，开口就冲我说：

“你们在声明中反对‘红总部’要夺权的观点，我有自己另外的意见。它‘红总部’是‘保字号’的，根本没资格夺咱电台的权，而我们是革命造反派，却完全有资格夺电台的权嘛！咱商量一下，你小高能不能改变看法？”

“老阮兄，我们那个声明的观点是大家讨论形成的一致意见，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我们不会改变。你是老转业干部，我倒希望你老兄能理解并赞成我们这一观点的正确性。”

“我无法理解你们这种极其保守、怯懦的观点，我甚至怀疑你们是不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好了，看来我们不是一条道上的战友，咱今后各行其道吧！”

说完，老阮竟拔腿离去。

说起来，这世间事情的发展还真有某种“定数”存在着。“红

总部” 第二天便正式公开宣布他们夺了电台的大权啦！其夺权的方法是既奇特又荒唐，一伙子人闯进机要室抢了电台的大印，接着抢了各处的公章，便向全台发出命令，一切听他们指挥。在这个重大问题上，老阮虽然说过他的决绝意见，要和我们“各行其道”，但在反对“红总部”夺权上，红少数战斗队和我们却是一致的。我们共同研究了一个切入点：即抢劫电台的大印和公章是非法的，立刻向省公安厅报了警。事情也真“寸”了，那位带头抢大印和公章的杨xx，在他写的一张《祝贺‘红总部’夺权》的大字报中出现了重大政治性笔误：即把“打倒刘少奇”误写为打倒伟大领袖。大家愤怒至急，一伙子同志冲进“红总部”要扭送杨xx到公安派出所。杨xx闻讯逃跑，大伙便猛追。杨xx跑上四层楼顶，大伙又追到楼顶。杨xx从楼顶搂着外墙的铁皮泄水管出溜而下，把大伙惊呆了！因为弄不好会摔死呀！就在这时候，公安厅刑侦队来了，又是照像，又是调查。齐林同志吓坏了，他哭啼着找到关系不错的杨处长求救。说：“你快帮帮我们吧！这抢章夺权搞砸了，大家都反对，公安厅都介入了，怎么办呀……”杨处长批评道：“你们这是荒唐夺权呀！我给你出个主意，要快点知错改错，主动把大印公章交回去，这样子大家会谅解，公安厅也会谅解的。”这个闹剧还真就这样轻而易举的解决了。那位造成重大政治性笔误的杨xx，也吓坏了。不少人抓住他还是“抢章夺权”的带头者，强烈向公安厅要求按“现行反革命”处理他。我们则认为：小杨同志在部队是好战士，来电台表现也好。他抢章夺权是奉命而为。其造成的重大政治性笔误并不是有反革命的动机，而是属于仓促书写造成。建议公安厅以“批评教育的方法”结束此案。公安厅同志同意了我们的意见。为这事，齐林同志非常感动地对我说：“我这是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撞南墙

走麦城’呀！教训太大了。谢谢你们对我的宽宏和大气，今后要向你们学习哟！”从此，“红总部”一蹶不振，竟变成了一个“观潮派”式的松散组织。

第 18 章 我当选为革委会副主任

“红总部”夺权败北，落了个灰头土脸，给我们提出的召开“党组揭盖子会”提供了更加有利的条件。这时又涌现了一位了解内情的干将：局（台）党组书记张庆林同志终于站出来，宣布参加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开始，他曾迫于白清的压力，不得不表面上跟着走，但是却极少讲话。现在，他向我们提出建议：“不必再要求白清开什么‘党组揭盖子会’了。我们群众组织就可以召集所有党组成员揭么！我想除了白清、张辉不愿参加，其他同志都是愿意参加的。我做为党组书记要第一个发言”。这使我们一下子开了窍，和红少数战斗队一通气，老阮也很高兴。开会的公告立刻就发表了。照说被白清强行打倒的陆达台长和魏、高、冯同志也会高兴地与会，利用这个机会行使自己的辩护权呀！令人没想到的是，他们四人却有另外的理念：“即白清制造的‘反党集团’事件，已经在全台群众中造成分裂，我们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党组揭盖子’的机会和白清动口舌，可能会加剧这种分裂。再一条，白清制造了如此重大的政治事件，相信群众最终会有公断，我们当前最迫切的是期望听到省委的声音。”嘿，再一个令人没有想到的是，白清和张辉本来一直拒绝我们提出召开“党组揭盖子会”的要求，这工夫却不请自来。还有一件趣事，出现在刚回来的各记者站的记者们身上。他们一进门就成立了自己的“记者大队组织”，明确提出不能单听台领导的一面之词，要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做出记者大队独立观察分析的结论。因此，对这次党组揭盖子的会议，他们决定以“记者大队”组织的名义，派出代表王万杏和杨新中同志参加。由

我们兵团主导的党组揭盖子会，就在这样一种大好形势下开始了。照原来的安排，首先请张庆林秘书发言。他慷慨激昂地说：

“我本来是没资格在党组会上做什么发言的。但今天开的是群众组织力促召开的‘党组揭盖子会’，我这个党组书记过去一直是党组会议的记录者，了解党组会议的意见交换和争论，便有权利和责任讲讲自己的意见了。我今天只想介绍这样一个铁一般的事实：即党组书记陆达同志和副书记白清同志基本上是配合得很好的。即使有一些不同意见，也属于正常工作范围的不同意见。绝然不可能有把陆达定为‘反党集团’打倒，进而夺权这种荒唐离谱的事情发生。我实在不明白，白清同志竟一夜翻脸，搞出这么个反常的大动作，到底所为何来？如果就是为了夺权，在今天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能允许这样荒唐离谱的夺权办法吗？这一点，在座的党组成员我想会有更深刻的解析，我这个发言算是抛砖引玉吧！”

党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刘斌同志接着发言说：“电台党组是在三年前省委做了一番整顿改组，重新建立起来的领导班子。除了李惠副台长是电台的老人，党组的班长陆达同志和副班长白清同志，是省委下功夫分别从唐山地委和张家口地委选来的。其他如杨晋北副台长来自省委宣传部、张辉处长来自人民解放军、魏亚明同志来自沧州日报，我认为大家团结和相互配合得很不错，省委对电台的工作也是比较满意和放心的。白清同志突然抡出个‘陆达反党集团’，把我惊得打了好几个冷颤。心里说，白清同志得神经病了吧？这不是在胡闹台吗！退一步讲，即便陆达有重大问题，也只能由省委做出决定和宣布呀！怎么能由二把手用‘政变’的铁腕手段打倒一把手，公开的自行宣布夺权呢！这里还有一丝党性原则可言吗？这里我要检讨自己的错误呀！虽然我看到这一切，心里是明亮的，

但我怕引火烧身，却不敢站出来表态。这一点，我不如红少数战斗队和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的同志。他们敢于揭露、敢于斗争，是我学习的榜样哟！”

“杨晋北副台长接茬道：“我和刘斌同志有相同的意见和错误，下一步在‘斗私批修’讲用会上我还要深刻检查。这里我想解剖一下白清同志错误的实质，他决不是得了什么神经病，也不是头脑不清醒犯了什么‘无限上纲’的认识错误。他是有着个人算计的，就是借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兴起，人们还不清楚到底怎么个搞法，胆大妄为地践踏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有计划、有目的、有手段的来了这么个‘造乱夺权’。应该说，他一时间还是得逞了。他之所以一时间能够得逞，就我们党组同志来说，最大的教训是：我们这些老同志对毛主席关于社会阶级斗争和党内路线斗争的思想和理论，没有吃透学好。一碰到白清‘政变夺权’这样的事，竟然是先震惊，后胆小，接着就是在患得患失上打转转，不敢或不能用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光辉思想做出清醒的分析论定。就因为这种状况，白清自行密秘决定、公开用‘政变’手段夺权，人家跟我们连个气都不通，我们却没有谁敢找到他头上去质问一句。虽说多数党组成员没有公开表态支持白清，但却只是沉默静观。毛泽东思想这个显微镜和照妖镜，我们喊了这么多年，到关键时刻却没有派上用场啊！”

李惠副台长素有“小钢炮”的名声，这次他是有意听听大家的意见再发言。他说：“其实，我对白清和陆达同志之间的关系，比较起来可能多一点了解。两位班长之间，总的讲，这几年合作得不错，但有两个问题的争议一直也没有解决。一个是陆达同志讲，根据省委宣传部的建议，提拔魏亚明同志任副台长，白清同志有不同

意见，他认为要提拔副台长，张辉同志更合适。并怀疑陆达同志是打着省委宣传部‘建议’的旗号，和魏亚明同志拉帮结伙；二是有人向省委宣传部告状，说高瑞奎同志有‘作风’问题。经过调查，结果是属于诬告。诬告者还受了处分。白清同志认为，是陆达同志背后做了手脚，袒护包庇了高瑞奎。对于这两件事，我一直做着沟通团结的工作，虽然双方没有掰面，却也没有达到和美解决。我现在要讲的是：这两件事，你不论怎么宣染，终究还是属于正常工作范围内的不同意见，要解决最终也只能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办。白清同志千不该万不该对此无限上纲，给陆达同志戴上‘反党集团’的帽子，组织一批所谓‘红卫兵’用铁手腕打倒，实在是大错特错呀！还有一件事也觉得很奇怪。冯志同志是全国都承认的著名工农兵作家，更是我们河北电台的自豪和光荣。陆达同志敬重他、关心他这完全可以理解嘛！你白清同志硬是把冯志同志定成反党分子，还说他是‘周扬的徒子徒孙’，这简直是胡说八道了，我希望白清同志能回头认错。你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认为这也属于毛主席讲的‘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范围，这对维护党和群众的团结肯定有重大意义！”

李惠副台长结束了发言，我本以为白清会照样玩他的“肉头阵”，不予置理。没想到他竟接茬开口了。只听他用惯有的慢声细语说：“同志们批我暗箱操控、‘政变’式夺权，践踏了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我也几番想过了。除了感到把矛头指向群众、压制不同意见，做得不大妥当外，对陆达的问题，到今天我仍基本坚持自己的看法。因为我用心思考了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说过，文化大革命不只涉及文化思想领域，它还是一场政治大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革命。我体会这‘政治’两个字的深意，就是要打破

现实的政治秩序。用群众运动的大民主形式，改造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既然有个‘改造’的任务，诚如李惠同志提到的那两个问题，我就改造到陆达头上去了。说心里话，开始我想给他定为‘宗派主义活动’，但考虑到宗派主义可大可小，既可定为思想方面的教育问题，也可提高为‘分裂党的活动’，我干脆就给他定为反党集团啦！所以，你们认为我是搞‘政变’，我则认为这是搞‘革命’。你们认为我违犯了传统的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我也承认。但我是实行了毛主席提出的更高的‘反潮流原则’，这大家是不是也应该理解？总之，我们现在牵涉到的是理论上的大是大非问题，我赞成双方在大辩论中来探讨解决。真理总是越辩越明嘛！如果我确实错了，我愿意服从真理，检讨我的错误！”

这次党组揭盖子会议，张辉同志没有发言，他表示，自己也在总结思考，容后再讲。我觉得这次会开得不错，就公开讲了一些点评意见。首先指出白清同志终于承认整群众‘不大妥当’，这是一点进步。而他愿意在大辩论中探讨自己的是非，比起他自诩‘政变夺权’完全正确，也是一点进步。张辉同志愿意总结思考自己，也算有了个好的态度。我们认为，这个经过斗争得来的一些正面转变，对于保证全台开展健康的“要文斗不要武斗”创造了一个好的氛围。

会议比较顺利地结束了。我很感谢老阮兄给了我很大的面子，他没有挑起别的什么事儿。但是，他会后却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你小高那个点评结论太‘机会主义’了。三个党组成员给白清的‘政变夺权’定了性，你一声令下把他‘揪’出来不就完了吗？还跟他继续辩论个啥？下一步就是我们夺权了！”

“哎呀！你老阮兄这个批评意见，我可绝难接受哟！今天我们批判的是白清和张辉搞的资产阶级反路路线。按照毛主席的指示，

党内路线斗争是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白清和张辉同志的路线错误我们一定要批判到底，但他们有一丝进步，我们也应该鼓励和肯定。怎么能把我们促成、人家来正式参加的会议上‘揪’人呢？他们搞突然袭击，用‘政变’手段抓人和用野蛮惩罚的方法侮辱人格，已经把自己搞臭了嘛！我们怎么能干那上不了台面的事？你刚才又提到要夺权，做为你的老战友——我再说一遍，电台是党的机要单位，不同于其他党政和企事业单位，这个机要大权任何群众组织都不能夺，也不准夺！”

“你小高一味地反对夺权，看没看到电台已经乱得近乎瘫痪？我们革命造反派能袖手旁观妈！”

“那——在这种情况下我有个建议，可以商量停止自办节目，全天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

“你这是改良派的作法，我们红少数战斗队绝然不会同意！”

“那——你老兄硬是要夺权，就把我逼上梁山啦！我们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要公开举旗，坚决反对！”

“那我也把丑话说在前头，你们真要反对，就别怨我对你们不客气了！”

老阮说完，气呼呼地拔腿离去。记者大队的代表却向我表示了支持的意见。

说话到了 1967 年一月十八日，一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传来：河北省军区奉中央军委命令，由军区参谋长尚素子同志带队，一行五人，来到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在全台大会上宣布：对河北电台实行军管。并决定停止自办节目，全部转播中央台节目。听到这个喜人的消息，同志们立该报以欢迎的掌声。接着，尚参谋长宣布：省军区保卫处长马继联同志任军管组长、省军区宣传处副处长白光同志

任副组长。省军区参谋宋进义、王道清同志和干事李连生同志任军代表。希望全台同志在军管组领导下，服从命令听指挥，努力工作，保证安全广播。值得注意的是，被白清打成“反党集团”的陆达和魏、高、冯四位老同志，都打破原来的某种顾忌，面带笑容的参加了大会。大会结束后，高瑞奎同志还主动同办公室刘斌主任、王子恺副主任一起给军管组安排了办公地点，并同电讯参谋王道清同志切磋了技术环节方面的工作。我们则忙着在四层办公楼上悬挂了“热烈欢呼河北电台实行军管！”的大字标语。记者大队和“红总部”也同时贴出了欢呼军管的大字报。但是，谁也没想到“红少数”战斗队竟发表声明，公开发出了反对的声音。他们的理由简直荒唐透顶，竟宣称“河北省军区属于资产阶级司令部，没有资格军管河北电台，军管组应该主动退出去！”！我一听这个，当时就急了，兵团的同志们更是愤怒异常，强裂要求出战，和“红少数”的反军行径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一场两军对战已经无法避免。这时我突然想到：“今日之电台已不同于昨天，现在已经是军管组领导下的电台，群众组织如有重大行动应该而且必须向军管组报告。”便忙着向大家招呼道：“同志们要冷静冷静，容我向军管组请示报告后再采取行动”。大家是非常相信和热爱解放军的，听到我的招呼很快就冷静下来了。等我来到军管组把群众的怒火和我们的意见一说，马继联组长表现得非常镇定，他十分平缓地说：

“大家对‘红少数’的错误，表示要进行义正词严的批判和斗争，这是完全正确的。但现在有个情况，我已经派人和老阮同志谈话去了，方法是先进行亲切的规劝和批评。你们都知道，老阮同志也是我们的老转业军人呢！估计他那些很难听的话，可能是一时的认识偏激，经过思想教育可能会改正。我倒想建议你高恩泽同志也

不妨先用用我们的办法，以群众组织负责人的名义和阮德才同志去进行面对面的规劝和批评？我认为这在斗争哲学上也是一种方法呀！”

听了马继联同志这既亲切又严肃的一席话，我还真觉得有一种突破性的启发。心里说：“老阮毕竟曾是我们批判‘资反路线’的老战友呀！他现在对省军区冒出这么个严重的问题，我要先去进行面对面的善意规劝和批评，总会比立刻展开两军对战应该说是个有益无害的主意。如果这样真的做通了他的工作，不就花好月圆了吗……”便回去向我们兵团同志进行了传达讨论。没想到这个讨论并不顺利。大家七嘴八舌地说：“红少数阮德才才是公开举旗反军呀！人家记者大队、‘红总部’都站出来批他了，我们更应该公开亮明自己的拥军立场，展开斗争。不这样，咱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军管组的作法跟我们不同，这应该理解。他们那样做是体现一贯的爱民作风嘛！你小高要和阮德才去谈话，虽然也是斗争哲学的一种方法，但在阮德才发起恶性挑战的情况下，总觉得这可能就会模糊我们兵团的斗争形象和原则精神”。我看一时难以统一思想，就退一步提议道：“咱等一等军管组做工作的进展行不行？历史上不是有‘先礼后兵’这一说么。如果军管组做不通，我们就展开面对面的大批判、大斗争……”大家最终同意了我的意见。

一月二十三日，省会保定又爆出头号新闻：中共河北省委机关的群众组织——“省委红色革命造反兵团”，简称“省委兵团”，没有跟另一个群众组织——“省委红色造反总部”通气，便打着学上海“一月夺权”的旗号，独自宣布夺了省委的大权。“省委兵团”一号头头郭振生，原是省委宣传部的干事，他把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同志擒获后，给他穿上剧团里的龙衣蟒袍，在保定市游街示众。

郭振生还滑稽的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郭子厚”，坐上了刘子厚的“伏尔加”专车，招摇过市。保定的老百姓对此非常反感，我则认为这是一场令人哭笑不得的闹剧。理由是：上海发起革命造反派夺权的“一月革命风暴”，是全国文化大革命发展应运而生的必然阶段。她之所以一举成功，震动全国，跟河北这种一个群众组织独自把省委书记一抓就宣布夺权，是没有任何可比性的。首先，上海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有着自己强大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基础。最根本的是，有着长期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挺身而出，在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老干部的支持下，形成了广泛地革命大联合，具备了军干群相结合战胜走资派的主导力量。河北这时是个啥情况呢？群众组织正在开始裂变成誓不两立的两大派，派性十足的“省委兵团”突然用抓省委书记的野蛮办法，抢先独自宣布夺了省委的权，还用招摇过市的荒唐办法大造舆论，这不是闹剧是什么？我想到这里，就去和马继联组长汇报自己的看法：

“马处长，你知道的，人家上海市搞了‘一月夺权’，给全国带了好头，那是在党中央具体领导下搞的，有着严肃的章法和规则呀！今天‘省委兵团’闹出夺省委大权的闹剧，你说这不是儿戏吗！”

“是啊！”马组长严肃认真地说：“他们这个突然冒出的夺权中央没有认可，河北省军区和驻保陆军第 69 军也没有承认！现在省军区接到党中央命令，全盘接管中共河北省委的工作，把领导全省的担子挑起来了。”

“这好啊！我认为，这对稳定发展咱河北电台的形势也非常有利呢！”

“噢，我们对阮德才同志的工作还没有做通，他很有一套歪理

呢！你去同他会谈了没有？我总是希望你能跟他好好论论。群众组织的头头之间论战起来，可能别有一番效果哟！”

“哎呀！我还没有去呢……叫你这么一催问，干脆我现在就去会他。”

说完，我拔腿就去了老阮的办公室。他一见我，就闪着怪怪地眼色道：

“你小高是来当说客的吧？”

“不错，我确实是受了许多同志的托咐来劝劝你老兄哩！你也看出来了，我们兵团同志至今还是把你当作老战友的，总忘不了咱并肩战斗批白清‘资反路线’的日日夜夜！忘不了你老兄勇敢战斗的贡献哟！不过，我怎么也想不通你这个老转业军人竟然对省军区有那么大的误解。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你老兄真要不回头，那要犯政治上的大错误了！我真不想看着老兄在咱们即将胜利的一刻，导至功亏一篑呀！”

“你小高别来这一套，咱俩的着眼点不在一个地方。你是叫‘拥军’两个字迷住了眼睛。我是叫军队的‘问题’惊醒了头脑。毛主席在《五.一六 通知》里说，党、政、军里都有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今年的红旗杂志“八一”社论又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战略任务。这两条我是和省军区对了对号的。他们和原省委有扯不清的关系，这是其一。二是这次省委兵团夺了省委的权，他们又不支持，你说他们是属于哪个司令部的？”

“你讲的这两条中央的指示，我都知道。中央《五.一六通知》里的那段话是泛指，你不能如此确指河北省军区就是属于资产阶级司令部呀！红旗杂志“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我听说毛主席已经否定掉了，老人家还生气地说：‘这是毁我长城！’，你难道没听

说？“

“我听说了，但我不信！你一定是听军管组说的吧？”

“是。但我要告诉你，河北省军区已奉中央命令，接管了河北省委的全部工作。这正说明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信任河北省军区呀！你老阮兄要想想这一点，就该立刻悬崖勒马。现在认错回头还不晚哟！”

老阮听我这么一说，有点气急败坏了，猛一挥手，下逐客令道：“去去去，

咱俩是‘道不同，不相为谋’！”

我就这样被老阮撵出来了。只得复命向马继联组长报告碰壁的情况。马组长指示：“那这样子吧：我们照毛主席教导的，对于毒草和错误的思想，决不能让它自由泛滥，要立即展开批判和斗争！”我立马回去到兵团做了部署。就在这个时候，“红少数”的反军活动进一步升级：他们强行从维修间枪走一台广播机，又在楼顶安上高音喇叭，以“红少数”广播站的名义，向东邻一墙之隔的河北省军区天天点名大骂：“河北省军区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走卒”、“河北省军区公开支持河北黑省委，否定革命造反派‘省委兵团’的夺权斗争！”、“坚决揪出河北军区一小撮！”。因为高音喇叭音量很大，传得很广，社会上和“红少数”持相同观点的一些群众组织，不仅冲到电台里来声援“红少数”，还有一批又一批的人群冲进省军区无理取闹。使得省军区首长政治部主任谷奇峰同志和参谋长尚素子同志，不得不亲自和阮德才同志谈话，做思想工作。但是，固制的阮德才不为所动。这便使得电台本来已经开始向好的形势，由于某些社会反军势力的介入，出现了更加复杂和激烈的乱象。

临近春节，我接到家中的电报，说“母亲病危，速回”。我忙

着请假赶回任丘县老家。这时，在安次县师范工作的大哥高枫，也接到同样的电报，一家人都赶回来了。母亲得的是肺心病，喘得非常厉害。我们请来了出岸镇医院医术很高的李文芳和田汝梅大夫，经过几天的连续紧急抢救，终于转危为安。

1967 年的大年初三即二月十一日，我赶回电台上班。一进大院，映入眼帘的是一派“肃杀”景象。院里几乎看不到人，墙上挂着十分醒目的大标语，上书“坚决支持红少数夺权的革命行动！”等我来到自己住的大集体宿舍，呼啦啦一群同志围了上来。为首的王恩瑞、王金桓闪着渴望的神情，激动地说：

“你可回来了，人家红少数大年三十夺权啦！”

“啊，他敢夺军管组的权？”

“人家跟社会上的一股反军势力勾在了一起，哗啦啦冲进了很多不认识的陌生人，个个头戴安全帽，手持木棒子和扎枪，不光要夺军管组的权，连省军区都受到了冲击。你是不在呀！那白色恐怖比白清那伙子厉害百倍：第一个就是强令解散老对立面‘红总部’。接着，因为咱兵团反对人家夺权，也被强令解散。谁要敢说个‘不’字，轻着煽耳光子，重者就要挨棒子。就这样，“红总部和咱兵团都被冲垮了。接着就是把白清、张辉和他们的追随者，拉出来几十个人，强按他们跪下向毛主席请罪。谁不请罪就煽耳光子……”

“他们这样胡搞，咱军管组没有采取制止行动？”

“只采取了说服教育的行动。负责警卫的解放军实行的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纪律，‘红少数’那是无法无天，毫不理会呀！我们就盼着你回来扭转局势呢！”

“我？我回来还不是一个人，能有多大力量？”

“我们分析了，”王恩瑞信心满满地说：“只要你举旗领头，

百分之八十的人都会聚过来响应！”

“那好，我愿意领这个头！”

接下来，我和王恩瑞、王金桓又串连了杨盛发和高新华，五个共产党员，共同朗读了毛主席的一句诗词“无限风光在险峰！”就宣布“险峰战斗队”成立了。并用大字报贴出声明，严正指出：红少数和社会反军势力勾结，不顾军管组的劝导和警告，贸然动用棒子扎枪和煽耳光、罚跪的野蛮手段，武力夺取电台的大权，不仅是犯了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而且是严重违犯党规国法的（注：中央规定，军管的机要单位不准介入社会上的文化大革命，也不准社会力量介入军管机要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立刻改弦更张，纠正错误，回到正确轨道上来！“，同时号召全台同志和险峰战斗队一起，高举拥军的伟大旗帜，同“红少数”反军的丑恶行径斗争到底，直到最后胜利。还真是如同志们所分析论断的那样，这个声明一贴出，原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的同志们呼啦啦都来到了险峰战斗队旗下。这时候，军管组也发表严正声明，说“根据毛主席‘解放军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指示’，我们经过考察认为：险峰战斗队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希望广大同志要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就这两句明确而有力的话，就连被冲垮的原“红总部”的人们，包括原“红总部”的一号头头齐林同志，也站到了险峰战斗队一边。“红少数”变得十分孤立，他们本来就没有超过二十人的兵马，这时竟剩下不到几个人。

就在“红少数”四面楚歌的情况下，一个突然的“意外”事件冲进了电台：一辆大卡车，载着“北京政法公社”的大学生，没打任何招呼，进门就要见军管组长。马继联组长会见了他们。领头人很气粗，直言道：

“我们是进驻保定地区公安处的红卫兵，专门负责打击反军的反动思潮。你们这里有个狂徒阮德才，公开反对解放军。反军就是反革命！我们要把他带走，绳之以法！”

“啊？你们要抓阮德才同志——这可不行！阮德才同志思想是有点偏激，对军队的态度有严重错误，但他是老转业军人，根本没有反革命的动机呀！我们一直在进行批评教育，你们怎么能不和我们招呼一声，就跑来随便抓人呢！”

“我们可不是随便抓人呢！你瞧，我们有正式的逮捕证。”

那领头人说着竟拿出一本子逮捕证。马组长看了看禁不住笑了，规劝道：

“同学们，你们还年轻，逮捕证不是这个用法呀！这太不严肃了。再说，你们对‘反革命’的认定也太简单化了。请你们等一下，我让你们听一听这里群众组织的意见。”

马组长忙着出来把我叫了过去。我多少了解一些学生乱抓人又不听劝的情况，就把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讲给他们：“老阮同志对待军队的态度上有严重错误，但是属于思想认识上的错误，照毛主席的指示，只能用批评教育提高的办法，不能用‘抓反革命’关监狱的办法。我们正在这么进行着，请相信我们能用批评的办法、批判的办法处理好这个属于人民内部的问题……”这位领头人不等我继续讲下去，就指挥他身边的人：“立刻控制阮德才！我们没时间和他们进行这马拉松式的讨论！”就这样，他们仗着人多势众，硬是把阮德才抓走了。

马继联同志立刻向省军区袁捷副司令员电话报告了这起抓人事件。袁副司令员严厉命令道：“不论是谁，随便抓人是违法的，你要立即和公安处交涉，做‘政法公社’的工作，从速放人！马组长

一方面和公安处交涉，一方面还要做阮德才同志家属的安抚工作。郑重说明阮德才同志的错误，是思想偏激的认识问题，不是反革命，‘政法公社’强行抓人是违法的。电台这里不会影响阮德才同志的工资待遇和福利，把家属安定下来了。

保定地区公安处实际上已被“政法公社”的红卫兵全面控制。公安干警和身为省军区保卫处长的马继联同志本来相当熟悉和信任，可这时候要他们说通这些红卫兵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马组长还惦着阮德才同志在看守所的安危，几天后就邀我一道去看守所探望阮德才同志。老阮一看我们俩来慰问他，非常感动。他很诚恳敞亮地说：

“进了看守所，干警们对我很关心。我也第一次塌实下来通读《毛选四卷》。现在我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是犯了极左的错误。”

马继联同志看老阮精神状态不错，他再一次申明道：“我们军管组和高恩泽同志从来不认为你是反革命，你就是思想方法偏激，怀疑一切，‘左’过头了嘛！这个也算是学游泳吧！有错改了就好。我们正在和公安处交涉着，做‘政法公社’红卫兵的工作。很快就叫他们放你回去”。

不久，老阮回到了机关。他一改原来的狂妄，确实冷静下来了，每天都在看书学习，也没有再恢复他那已经散了的“红少数”的组织活动。

1967年二月，中央军委决定驻保定的陆军第69军移防山西太原。驻吉林省通化的陆军第38军进驻保定。38军开始对河北和保定的情况不了解，在支持地方和左派广大群众方面，是和河北省军区站在一起的。鉴于当时河北省广播局（台）已进入安定的斗、批、改阶

段。省军区党委决定，依照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 16 条的规定，在省广播局（台）组织巴黎公社式选举，建立“老中青”和“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具体事宜由驻电台军管组实施。军管组在经过一番候选人的酝酿讨论之后，于 1967 年 3 月 7 日，举行了全台选举。河北省军区和 38 军都派代表前来祝贺。顺利选出了 10 名委员。他们是：军管组马继联；革命老干部杨晋北、刘斌、高瑞奎、王子恺；革命群众代表高恩泽、王恩瑞、王金桓、杨盛发、高新华（女）。杨晋北为革命委员会主任，高恩泽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电台革委会成立后，省军区党委立刻报北京军区党委备案。从此引来不少省、市电台军管组打电话了解情况和经验。其中询问最多的是：革委会成立后和军管组是怎样一种工作关系。马继联同志回答说：“革委会因为初建，主要抓广播行政和事业建设以及技术工作，保证安全广播。而政治运动的指挥权、人事任免权和其他重大事项的决定权，仍由军管组掌握。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了领导工作的岗位。

一天，河北省军区政委、老红军曾美少将和我进行了亲切热情的谈话。他曾这样问我：

“高恩泽同志，你二十几岁了？”

“我都三十啦！”

“三十岁升到了师级，进步很快嘛！我二十八岁已升到军分区司令员了，但那是战争年代。在当今和平的年代，你们是在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斗争中锻炼培养出来的！”

“我的能力和经验都不够，在文化大革命中主要的还是靠了省军区党委的领导和军管组的培养呀！”

“军管是一个特定的阶段。等河北省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军管

就要逐步撤销了。你要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老同志的经验，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本领，把革命的班接好啊！”

“请首长放心，我一定会努力的。”

写到这里，我讲一段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后，阮德才和我都先后退休了，却发生了一个和谐的小故事。有一天，我正要走出省电台家属院的大门，老阮从后边快步赶上来，大喊道：“小高，等一下，等一下……”他上来就握住我的手说：“想告诉老弟一件喜事呀！我入佛了，今后就是与世无争，专做善事。咱俩之间要把过去你争我斗的事忘了。后半生咱就是一条：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我现在整天练书法和绘画。请你抽空到我家去一趟，商讨一下艺术的发展好不好？”我高兴地答应了他。不久，传来他爱人赵雪文同志因病逝世的消息，我忙着前去慰问。老阮不忘拿出他的书画册让我欣赏，我真没想到他已发展到一个可喜的高度，就表彰道：“你老阮不简单呀！老了老了一一迎来大器晚成的光彩，我得向老兄祝贺和学习呢！”从此，我俩捐弃前嫌，成了畅谈艺术的朋友。

第 19 章 我亲自经历和听到的难忘新闻

1、林彪整“杨余傅” 受到无声的抵制

1968 年 3 月 25 日晚上，中央突然爆出了个 “杨、余、傅事件”。我同省革委、省军区领导同志参加了林彪副主席亲自主持并声讨“杨、余、傅”的内部电视直播大会，林公开宣布“杨余傅”是“反革命两面派！”我当时听了非常震惊和困惑。“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余”是军委空军政委余立金；“傅”是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三个人中的两人即杨成武和傅崇碧大家再熟悉不过了，那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国有名的紧跟毛主席的老革命嘛！余立金的名字不大熟悉，但林彪在讲话中说“反对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而这位吴法宪人们却没什么好印象，都叫他“吴草包”。林副主席缘何一下子就宣布“杨余傅”为“反革命两面派”，立刻就打倒了呢？当然，会上也揭露了一些“杨余傅”的所谓“罪行”，但我总感到那些都属于“鸡毛蒜皮”，根本构不成什么“反革命两面派”。会上的气氛非常沉闷，没有人交头接耳，更没有人窃窃私语。散会后大都是默默离去。我却有点耐不住性子，就去问省革委第一副主任刘子厚同志，想听听他的看法。没想到他也在困惑中。只听他十分慎重地说：“这事来得太突然了，我一点都不了解。不过，这是军队内部的事情，做为地方我们不必急着表态，可以看看再说。”第二天，我又去问了省军区首长曾美政委和马辉司令员。他俩同刘子厚同志一样慎重，告诫我说：“你们年轻人要镇静，不要乱表态。这件事中央还没发文件，要等等看么！”因为林彪主持的大会北京军区团以上干部都参加了，

“杨余傅”事件很快就在社会上传开了。我爱人刘淑琴听说了这事，也跟我一样感到震惊，但却没有我那种困惑。她就直接了当地跟我说：“我看林彪有问题！这个事件说明中央的阶级阵线不正常了。林彪一句话，忠臣一下子就成了奸臣。这太可怕啦！我看你赶早退出官场，当个编辑记者算了，省得有一天会大难临头！”

“啊，退出官场？那不是逃避斗争吗！子厚同志和马、曾首长的意见是要镇静、要观察……我们就冷静观察一下，等一等毛主席的指示嘛！”

就在大家冷静观察的时刻，中共中央的《红头文件》下来了，竟然肯定了林彪对“杨余傅”三同志的处置。大家心里不通也只能组织上服从了。直到二年半多一点，即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摔死在外蒙温都尔汗，毛主席承认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伤害了杨、余、傅同志。他老人家在做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之后，亲自提议为杨、余、傅三同志平反。

2、“文革”初期，基层曾出现“乱斗”

1967年春节我回了一趟老家任丘县（今任丘市）。因为我在任丘读了三年半师范，又在县委工作了十多年，对任丘县的领导和母校是多有了解和感情的。而这时正值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也不清楚那些老领导怎么样了，就决定去县城看看他们。爱人刘淑琴有点担心地劝我：“你最好还是慎重点，弄不好会被人家打成‘保皇派’呀！”我说：“凭党赋予我的记者职责，不会有人说我是‘保皇派’的。再说咧，县里负责‘支左’的是武装部，张书荣部长是我熟悉的老革命，我先去看他，提前跟他打个招呼，不会出事的。”

果然，我一到武装部，张部长就热情道：

“恩泽，哪阵风把你刮来了？”

“想你们呀！”我笑着说。

“想我？”张部长警觉道：“你是……有什么公事吧？”

“确实没有公事。就是想看看老同志。你算看到了。咦。张玉刚书记、王满刚县长，还有办公室王书田主任、中学苏校长……我都想看看呀！”

“哎呀！如今他们全倒了，都在停职检查，接受群众批判呀！你这个时候去好吗？”

“咳，就是礼节性的看望一下，不涉公事，应该说没啥问题吧！”

“你要非去不可，那我有句话得嘱咐你哟！你是省电台的记者，有一定的影响力，千万要注意，别掺和老家的‘运动’呀！你要是卷进去，就叫我为难啦！”

“不会的。你就把心放在肚里吧！”

“那你去吧！只是张玉刚暂时不在，还在乡下接受批判……”

我先到了王满刚同志的平房。他正趴在桌上写检查，见有人进来，一向刚强的他，竟下意识的起身来了个“立正”。我很震惊，一个 14 级的抗日老干部，咋被整成了这个样子？等他一看是我，才闪着不解的神色，小声问：

“咦，恩泽呀！你怎么来了？”

“我回来过年，也不知你们是啥情况，心里惦着，就跑来看看你，还想看看办公室书田主任、中学苏校长……”

“呀，你敢来看我？胆子不小哟！人家没阻拦你吗？”

“没有。我同张书荣部长说好了，他同意了的。”

“那好。不然，人家给咱扣上一顶‘黑串联’的帽子，那我又

要挨斗了。其实，‘四清’搞得那么‘左’，也没查出我有啥问题，还照样当县长。后边我对‘四清’提了点批评意见，就给我戴上了一顶‘四不清回潮’的大帽子，宣布停职反省啦！再后边就接上了文化大革命，嘿，‘四不清回潮’再没有人追问，却又传来一顶‘走资派’的大帽子。不过，我心里很亮堂，咱缺点错误不否定，但决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咦，我——你别惦着，身体还可以。你倒是要好好看看书田同志，他心小胆小，没经过这么大的运动，还真怕他憋出点什么事来。”

从满刚同志屋里出来，我又推开了书田同志的屋门。书田同志也正趴在桌上写检查。见有人进来，他竟然下意识的战战兢兢地起身、立正、低头，还像是习惯性的说：

“我有罪，我有罪……”

“你哪来的罪呀？”

“啊？”书田同志听出了我的声音，头是抬起来了，可能还猜不透我何以会在此时出现在他的面前，仍然呆呆地看着我。见我微笑着上来和他握手，才小声地说：“你怎么来了？我在隔离检查呀！人家让你进吗？”

“我来看看老领导，情理中事。张书荣部长同意了的。”

“咳，还说什么老领导啊（注：书田同志也是抗日战争中的老战士）！”这时，书田同志拉我坐下，眼泪汪汪地说：“人家批我是走资的‘二县长’呀！你知道，我多年来就是从事办公室工作，根本没权力和能力‘去走资’呀！可你不承认这点，就别想过关了。”

“过得去的！我了解你，没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嘛！无非是一些

缺点、、弱点和错误。毛主席说了，有错误认识了改正了就好。你千万不要有这么大的压力！”

他见我说话棱角分明又充满感情，忙摆手小声说：“这阵子光听‘上纲’的话了，压得喘不过气来。听你这么一说，我的心还真宽了些。到底是到省里工作了，说话办事和下边不一样呢！”

离开了王书田同志，我便去看望苏鸿章校长。他也在闭门思过，一脸的愁苦相。原来，他叫红卫兵弄来的一顶“托派分子嫌疑”的大帽子，给压得抬不起头来。整天逼着他写交待材料。他要硬顶着不写么，怕红卫兵说“态度不老实”，要揪出去批斗。而他那文弱的身体是搁不住折腾的。而要交待又实在写不出来。看他那痛苦不安的样子，我忙安慰性的问他：

“苏老师，你真的参加过‘托派’吗？”

“哪能呀？这‘托派’是怎么回事我都不知道呀！当的那门子‘分子’哟！”

“要是这样——我去和武装部张部长谈谈。你可千万要把心放下，别把自己憋病了。”

“在这个坎上……你去谈……人家听吗？”

“张部长是抗日时期的老革命，我和他很熟。我要去说兴许会有些作用。因为我了解咱河北的情况，至今也没抓出一个‘托洛茨基’分子嘛！你一个在农村执教多年的老教师，根本和‘托派’挂不上钩嘛！”

“要是那样……你去说说也行。可我又担心把你卷进去呀！”

“不会的。我是以记者的角度说事，不涉派性，这属于记者的正常职责呀！”

苏校长听到这里，脸上顿时出现了笑模样。等他高兴地把我送

出大门以外。我却突然一个闪念：为啥不去找找任丘县造反组织的总负责人杜兴才同志呢？他早在抗日时期就是我们区小队的战士。解放后升任任丘县公安局副局长。1955 到 1956 年，我俩一起搞了二年的中教和小教“肃反”，彼此是相当了解和信任的。所以，我俩一见面，没有任何客套，就直接切入了主题，把苏校长的处境讲了。看来他也了解一些情况。非常明确的表态道：“‘托派’是学生们捕风捉影瞎怀疑。苏校长德高望众，多年来一直负责学校党的工作，我都了解。你放心，我一定做好红卫兵的工作，把苏校长解脱出来。”没想到这件事竟做得如此顺畅。后来苏校长给我传话说：“红卫兵还是懂得实事求是的，他们在知道真实情况后，主动把我这一案撤掉了。”

我之所以要讲一下“文革”初期出现的这种“无限上纲”的“乱斗”，是想让后人记住：那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侮辱人格、残酷斗争”的形左实右路线，是刘少奇和邓小平煽起来的。因为毛主席主持制定的《“文革”16 条》，明确规定，“要文斗不要武斗”；“要团结干部和群众的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列位想想，全国各地成立革委会后，中央大力解放干部，百分之九十五的领导干部不是都解放了嘛！上边提到的任丘县几位领导同志也都全部站了出来。从这种一会儿倒下，又一会儿复出的大反复中，做为革命者不该从中汲取到有益的经验教训吗！

3、“‘操练’政治口号化”的终结

河北省军区老政委、老红军开国少将曾美同志离休后，我常去看他。他给我讲了一段“‘操练’政治口号化”的小故事，令人哭笑不得。那是 1968 年春天，河北省革委已经成立了，保定却又发生

了抢枪武斗，中央决定省军区和 38 军共同组织群众组织的代表进京办学习班。曾政委任班长，李光军军长任副班长。当时社会上传来一股风，叫作“‘操练’政治口号化”。其内容是：领队喊一声“向右转！”队列则齐呼：“打倒刘少奇！”；领队喊一声“向左转”，队列则齐呼：“紧跟毛主席！”；领队喊一声“立定！”，队列则齐呼：“立场坚定！”；领队喊一声“起步走！”队列则齐呼：“紧跟毛主席——永远干革命！”当时觉得这种基本动作和政治口号相结合，有一定的创意性，学习班在早晨操练时也照着做了。没想到，在当时“‘派性’严重”的情况下，这一套刚一实行就变了味儿。今天有人当场检举某某把“打倒刘少奇”喊成了打倒人民领袖。明天又有人有同样的检举。几天下来，竟爆出几个所谓的“现行反革命”。两位班长很快就悟出了这种闹派性的“花活”，也认识到这种搞法有损政治口号的严肃性，便立刻宣布停止这种“操练的‘政治口号化’。”被派性检举的几个所谓“现行反革命”也一律平反。1976 年“文革”结束后，两位首长都到北戴河休假，交谈中又提起了这事，俩人都不禁唏嘘感叹，苦笑不已。

4、“文革”后期，毛主席对文艺政策调整的内情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为了彻底解决“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充斥整个戏剧舞台的问题，中央采取了严厉措施，把那些旧的戏剧和有封、资、修问题的电影和曲艺都封禁了。全国只剩下八个革命样板戏，即《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龙江颂》、《红灯记》、《沙家浜》、《红色娘子军》、《杜鹃山》和几部革命电影，即《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和《平原游击队》等。“文革”中虽然也诞生了《春苗》、《创业》、

《海岛女民兵》等一批新电影，，但群众还是抱怨数量太少。我做为主管广播电视宣传的一员，对此也有同样的感触。当时南京电视台开创了“儿童文艺节目”，孩子们的唱歌、跳舞、诗朗诵和小品剧……很受群众欢迎。全国的电视台包括河北都随后跟进，群众很高兴。国家文化部为进一步活跃文艺生活，也采取措施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如越南、朝鲜、阿尔巴尼亚等进口了若干电影上映，群众也曾高兴了好一阵子。但仍难以满足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社会上曾流传这样一个顺口溜：“中国的《新闻简报》（指新闻记录片）、越南的飞机大炮（指和美国侵略者作战的纪录片）、朝鲜的哭哭笑笑（指朝鲜忆苦思甜的故事片）、罗马尼亚的搂搂抱抱（指欧洲的见面礼节）、阿尔巴尼亚的莫名其妙（指其蒙太奇的电影手法）。”就透出了对整体文艺现状不满意的批评味道。就在这种大背景下，我听到了毛主席的一个重大信息：那是1973年秋后，中央广播局副局长董林同志来河北视察，我奉命陪同。他有点神秘地对我说：“不久前，毛主席把中央台封禁的老戏、老电影和其他文艺段子，点名调去了一批，每天晚上要亲自审听审看。我们派人陪着毛主席审听审看。咦，这里边就包括你们省的河北梆子《挡马》、《宝莲灯》和《窦娥冤》。老人家看了非常高兴，说河北梆子是‘燕赵之声，慷慨激昂’。他听了侯宝林的相声《关公战秦琼》，竟禁不住捧腹大笑。这个重大动向表明，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了，毛主席要调整文艺政策了。对过去被封禁了的若干东西，经过审查属于健康的就要开禁了。我再告诉你一件喜事，这次清理中央台的旧带子，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宝贝：毛主席在开国大典上的讲话录音找到了。那声音非常宏亮而有力，听了令人意气风发，催人奋进呀！”我听了这两个令人鼓舞的消息，忙试着问：

“那件毛主席审听老戏的信息，我可以报告省委吗？”

“你可以跟省委主要负责同志露一露。”

我便把董林同志的谈话写了一个简要材料，送给了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同志。刘子厚同志一向重视文艺工作。他立刻也仿效毛主席的作法，把我们河北台封存的一批老戏带子调到他的办公室审听，意在为解禁一些旧的文艺节目做好准备。我们也派电台办公室副主任崔庆才同志陪子厚同志一道工作。当然，这件令人鼓舞的信息，我也禁不住透给了河北梆子著名表演艺术家王瑞楼。毛主席看的那个《挡马》就是她主演的。她曾三次在北京、天津和北戴河为毛主席、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表演过。瑞楼听到毛主席又调看了她主演的《挡马》，竟激动得哭了。

令人没想到的是，当我在电台记者会上也讲了这件令人鼓舞的事时，有记者竟高兴的传到社会上去了。这便引出了一段关于我的曲折故事：河北省公安厅听到了这个消息，认为这是一个“重大政治谣言”，遂下令彻查。结果，查来查去就查到了我的头上。公安厅便通报给省委宣传部严肃查处。大概因为这个案子又大又急，省委宣传部管人事的副部长杨惠城同志，竟直接找到我的办公室，亲自核查这个“大案”。我不得不苦笑着告诉他：“这不是谣言，更不是政治谣言。完全是正常渠道过来的正确消息。是中央广播局董林副局长讲给我的。公安厅不知此事，你也不知道。我有正式报告遵嘱直接送给了省委刘子厚同志，子厚同志也仿效毛主席的办法正在这么做着，你找他一问就清楚了。”惠城同志听我这么一讲，顿时如释重负，再也不问了。接下来，公安厅追查‘政治谣言’的事，也戛然而止。

后来，也就是到 1974 年 7 月 14 日，毛主席有个内部谈话，我

是从中央广播局听到的。他老人家说：“现在戏剧产品少了，百花齐放没有了。”“文学上缺少小说、缺少诗歌、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我们倡导的繁荣文艺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也执行的很差”“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二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只是毛主席这个内部谈话没有公诸社会。到1974年7月25日，毛主席在《创业》编剧张天民给他的一封信上做了如下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份了，不利于调整党内文艺政策。”应该说，毛主席这个对国家文化部严肃批评的《批示》，是第一次向社会公开调整文艺政策的指示。

1975年春天，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先是点名调河北梆子著名表演艺术家王瑞楼主演的《挡马》剧组原班人马进京，到中央电视台做彩色录相（因为原《挡马》电影是黑白的）播出，进而拍成彩色电影。1976年春天，著名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裴艳玲、齐花坦主演的《宝莲灯》剧组原班人马进京，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成彩色电影播出。在这同时，全国有一百多部原班人马的国宝老戏，都拍成了彩色电影。从此，封禁了八年的老戏开始解冻，中国再次迎来了文艺的春天。

（备注：王瑞楼，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河北梆子非遗传承人。她的学生马红格、勒向冲、郭荷菊、马利静，曾在《挡马》《红桃山》《小放牛》的表演中，多次在河北获奖。王瑞楼也因此荣获河北《优秀园丁奖》和《优秀育花奖》。）

附录：1954年我在任丘师范附小实习时，曾和王瑞楼有过一个月的师生之谊。那时她12岁，是附小少先大队长。工作后我们仍保持着密切联系。2017年3月20日，我在《书刊报》发表了评述文

章：《屡创第一的刀马旦王瑞楼》，全面介绍了王瑞楼的感人事迹。现全文附录如下，供今人和后人分享：

王瑞楼，河北梆子剧院著名表演艺术家，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共党员，汉族。她 1942 年 9 月生于河北省任丘县（今任丘市）城关镇三街。早在 1954 年她就读任丘师范附小时，就显示出能歌善舞的天赋，且酷爱老戏。遂于 1955 年夏天，拜任丘县有“戏包袱”雅号的边来僧先生为师，习“刀马旦”。我做为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老新闻记者，从头到尾一直关注着王瑞楼的艺术生涯，深情见证了她创立的河北“四个第一”的光辉业绩。

那个年代学戏，各方面条件都很差。王瑞楼师傅家只有一个大院子，三间土坯房。没有排练场，更不用说地毯，就在院子里铺上麦秸练。尤其是在初学《红桃山》时，困难更多。因为这个戏是刀马旦武打基础戏，里边的基功、毯功、刀、枪下场技巧很多，不苦练完不成这样的重头戏。她那时就下定决心：“既然要学就一定要学出个样来！决不给师傅丢脸，让父母失望。”就这样，不管是严冬酷暑，她都咬定钢牙地练着。大雪天把手冻破了，她不顾；身上经常摔得青一块紫一块，她没有叫过一声苦。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下来，其武功和艺术水平飞跃提升，成为边来僧先生科班的佼佼者。1956 年她随师调入天津专区少年梆子团，成为小有名气的主演之一。

1958 年，河北省委决定建立河北青年跃进剧团（即后来的河北梆子剧院），经河北省委书记兼省长刘子厚和副省长张明河亲自审看演出，拍板首选天津专区少年梆子团和省戏校一、二班学员为青年跃进剧团的基石。从此，王瑞楼步入了更广阔的天地，在全省崭露头角。她主演的《红桃山》、《虹霓关》、《取金陵》、

《打焦赞》、《英杰烈》等戏剧，红极燕赵，被誉为“小刀马”！

王瑞楼敬业精神极强，她丝毫不满足已经取得的成绩。为了提高自己的技艺，1959年，她进京拜京剧派传人任志秋先生为师，学习《汉明妃》；向叶盛章、张春华先生学习《挡马》、《小放牛》。随后又向郅承鸾、周仲春、王楷先生分别学习《宝莲灯》、《杨门女将》、《穆柯寨》等剧目。她主演的《挡马》之杨八姐、《杨门女将》之穆桂英、《红桃山》之赵月娥、《宝莲灯》之三圣母、《小放牛》之村姑，均一炮打响，成为震动河北剧坛一颗耀眼的新星。其中《挡马》被河北省委省政府和国家文化部推选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剧目。更令人激动的是：1959年9月，毛主席到天津视察，王瑞楼主演的《挡马》奉命在天津市干部俱乐部为毛主席演出。毛主席在林铁书记和刘子厚省长的陪同下，边看也议，兴致勃勃。由此，王瑞楼以《挡马》主演的身份，第一个成为河北梆子剧院为毛泽东主席演出的幸运者；1959年10月，王瑞楼主演的《挡马》又来到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和全国政协礼堂，为中央领导同志演出，受到毛泽东以及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她又一次成为河北梆子剧院以主演身份在中南海演出的第一人；王瑞楼还有第三个创第一的光彩记录，即1960年，天津电影制片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分别以《蓓蕾初开》和《再生记》为题，把她主演的《挡马》拍成了电影，在全国放映，反响巨大。河北梆子剧院的伙伴们为自己的优秀剧目第一个登上祖国的银幕，感到十分振奋和骄傲。那年她只有17岁。王瑞楼还有第四次创第一的幸福回忆。那是1961年7、8月间，正在北戴河演出的她，应邀和伙伴们到中央领导休息的地方参加联欢舞会。她在和刘少奇、朱德副主席跳完一曲后，非常运幸地迎上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便第一个邀请毛主席跳舞。毛

主席步法稳健，兴味盎然。在和王瑞楼亲切热情地交谈中，还特别讲到了对河北梆子的高度评价：“河北梆子唱腔高亢，是燕赵之声，慷慨激昂呀！人们听了看了会受到很大的鼓舞和震撼。这个剧种还应该广泛开拓，推陈出新，大力发展。”毛主席的教导，为促进河北梆子的进一步大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第 20 章 面对“内战”，我提了个惊人的建议

河北省广播局（台）革委会成立后，军管组明确指示，在斗、批、改中，必须严禁乱批乱斗和武斗的无政府主义现象。全台只批判副台长白清同志伙同人事处长张辉同志践踏组织原则和纪律、支持“文革筹委会”夺权的严重错误。但不能乱扣“走资派”的帽子，是什么错误就批什么错误。对“文革筹委会”成员，因为是奉命行事，且又多系一般同志，主要是进行批评教育提高觉悟，不准乱批乱斗。尽管军管组的指示是严肃的，但总有某些“鲁莽勇敢的人”，做出动手动脚的出格行为。对此，军管组的态度是明朗而又坚决的。比如一位刘 xx 用水果刀扎了一下女播音员的屁股，造成了轻伤，军管组就责令刘向女播音员赔礼道歉，并在“斗私批修”会议上做了触及灵魂的自我批评。一位张 xx 出手野蛮，打了两位老同志的耳光子，军管组就责令他深刻检讨并赔礼道歉，并当众保证今后不准再犯。一位王 xx 在批判白清副台长时，用手象征性地在他脸上“擦”了一下，也当众受到军管组的批评和警告。

1967 年四月，我开始发现河北省军区和 38 军在“支左”问题上出现分歧。38 军一位首长在接待群众时公开讲：“省军区和地方党委一向关系密切，他们支持的往往是‘保守派，而不是造反派。我们 38 军来到保定，没有任何框框，坚决支持造反派‘杀’出来。这么一讲，保定的群众组织本就出现的裂变，一下子变得更厉害了。那个时候，在舆论倾向上，一般认为“保守派”是“保字号”的同义语，“造反派”才是“革命派”的代名词。不过，在普通群众心中却有另一杆公平秤。他们对那些“貌似革命”，却一贯乱砸乱

抢、不断挑起武斗的所谓“造反派”，认为是搞乱“文革”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毛主席号召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革命两字根本不沾边。而被称为“保守派”者，他们心里装着党的光辉形象和严肃指示以及国家法令，一切照党和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认真坚持文斗，坚决反对武斗。他们才是革命的正确力量，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因为两军观点的分歧，舆论观点的分野，社会上不仅很快形成旗鼓相当的两大派，而且内战升级，抢枪杀人、攻楼断电断水都出现了。当时号称造反派的一方，以河北农业大学“革命造反团”为头领，头头叫崔士林，简称“农造派”。后来毛主席号召“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他们就改称为“工人总部”派，简称“工总派”，一号头头是保定变压器厂工人杨连甲。被称为“保守派”的一方，开始以保定市评剧团一个称做“革命红楼”的战斗队为龙头，首领人物是颇具头脑的女洋琴手刘学兰。后来根据毛主席关于成立工代会、农代会和红（红卫兵）代会的指示，改称为“工代会筹委会”派，简称“工筹派”，一号头头是保定市房管局建筑工人张学武。两派的斗争口号都有那么一点近乎荒唐滑稽的味道：“工总派”每天游行示威的口号是：“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刘子厚（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枪毙李悦农（保定地委书记），千刀万剐黑老鳖（对河北省军区司令员马辉同志的诬称），气死“保鳖兵”（对拥护马司令员的工筹派的诬称）：工筹派游行示威的口号是：“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刘子厚，枪毙李悦农，千刀万剐侯玉印（保定市法院院长），气死“保侯兵”。瞧瞧，两派要打倒和枪毙的人都一样，唯独最后一位——工总派要千刀万剐的是老红军、抗日名将马辉司令员。他们的理由非常简单，就是因为马辉司令员不支持“工总派”的分裂行动。而工筹派要千刀万剐的

侯玉印，是官职不过处级的市法院院长。他们的理由也不复杂，就是因为这位院长公开跳槽，站出来支持“工总派”的分裂行动，反对“工筹派”。我虽然对两派那些近乎荒唐滑稽的口号有自己的看法，但在当时那种双方派性都很严重的情况下，还不敢公开站出来品头论足的。如果那样的话，轻者，我可能挨顿群殴。重者，就可能被乱拳打死。更令我不安的是：两大派的内战很快反映到了我们河北电台内部。虽然按照规定，军管机要单位不介入社会上其他单位的“文革”运动。但这时“反军思潮”也越演越烈了。这个规定早被冲得无影无踪。那位沉静了一段的阮德才同志复又冲上了内战的前线。他不仅公开到社会上广泛串联，还重新聚拢了已经散掉的“红少数”战斗队，公开声明：不承认由省军区领导、军管组主持、经过“巴黎公社式”选举产生的广播局（台）革命委员会，却坚决支持“省委兵团”郭振生对省委的“1.23”夺权。一天上午，“红少数”的一位女士突然闯进了我的办公室。这位女士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位没什么心计和主见、办事却有点莽壮的“女子汉”，平时我俩之间的同志关系还不错。这次她像是奉了什么指令而来。开口就怒斥我道：

“高恩泽，你有什么资格夺权？”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电台的大权是随便能夺的吗！军管组是照中央的规定用‘巴黎公社式’选举产生了革命委员会，你不是都积极参加并投了赞成的一票吗？”我尽量控制着自己的情绪，站起来回答她。

“那是我被军管组迷惑了，相信了资产阶级司令部河北省军区导演的假选举。今天，38军才是支持造反派的中流砥柱。你姓高的要是还有点自知之明，就赶紧主动下台！”她说着，已经大步冲到

我的面前，急眉横眼地威胁道：“你要不下台，我就把你拉下马！”说话间，她两支胳膊已经伸过来，像是要抓我的脖领子。怎么办呀？就让她这么大喊大叫着把我揪出去，群众一看就闹不清是咋回事了。我急中生智，用手猛一拨她的胳膊，严正道：“你想跟我动手吗？那我告诉你：凭我的力量可以对付你这样的仨个。但是，咱俩前世无冤今世无仇，没有必要动拳脚打架。再说咧，本人向来尊重女同志，别说是动手动脚，就连粗话也没说过一句。”

咦，也不知是她被我说动了，还是见我有了应战的准备，她竟一个转身，气呼呼地走了。

写到这里，请允许我插述几句后话，也就是二十年后，我在石家庄裕华路上巧遇了这位女同志，她感情激动的握着我的手说：

“小高，多少年不见，我们都老了。回想那些年闹派性，打得不亦乐乎，落了个什么呀？落了一大堆教训呀！今后咱没别的了，就是一条：要互相关心，互相体贴，求个健康的身体，安度晚年哪！”我也激动地说：“你总结得不错。大家本来都是好同志嘛！叫资产阶级派性闹的，就变成‘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啦！”

保定两派的内战正在更加恶化的发展着。河北省军区担负着“支地”、“支左”的繁重任务，到底如何指导“文革”运动的发展，实现两派的革命大联合？像上海那样成立革命委员会？马辉司令员为此召开了一个座谈会，我是特邀与会者之一。会上，马司令员点名让我先谈谈，我就大胆地讲了一个惊天的意见和建议。主要内容是：现在保定到了一个跳出“两派是非争斗”的关键时刻！客观一点讲，当下两派天天大喊的“打倒”这个、“枪毙”哪个、还有什么“千刀万剐”……总觉得是某种幼稚可笑又荒唐滑稽的乱

批乱斗！其结果只能是互相伤害，不可能有光明的前途。那么如何跳法呢？我的建议是，寻找一个新的突破点，通俗的讲，就叫“牵牛鼻子”，在新的基础上，实现重新组合，也就是毛主席讲的，实现两派新的革命大联合。那么，这个新的突破点，这个要牵的“牛鼻子”是什么呢？就是选择一位毛主席信得过的能在河北站脚的革命领导干部，让他站出来亮相。这一手抓准了，两派的乱批乱斗就会立马降到次要的地位，进而就会出现新的分化组合。这个新的分化组合，就会成为两派革命大联合的基础。为此，我就想到被打倒的刘子厚同志，是“文革”开始后，中央在罢免原省委第一书记林铁的同时，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正式任命为新的省委第一书记的。

“省委兵团”一个群众组织用绑架抓人的办法，把刘子厚扭到卡车上来了个游街示众，然后关进禁闭室，就这么简而单之的被打倒了，被夺权了，这不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政治笑话吗？我认为：照中央的组织程序加以分析，刘子厚同志无疑就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如果我们“敢”字当头，把这个真相摆给群众，明朗而又细致地去做群众工作，我想保定的形势就肯定会出现新的转机、新的局面。我这个有点“另类”的发言，一下子引起了全场的震惊。当时我猜想，大家可能无法想像我这种极为大胆的意见和建议。但是，我也发现一个微小而又重要的细节：马司令员却对我的发言轻轻的点了点头……虽然他没有公开表态。

座谈会结束后，省军区宣传处长、三八式老革命张顺兴同志和省军区办公室的正副主任何连水、张芳阁同志，都前来同我热情握手。他们认为，我讲了一个极具胆略又极需认真思考的重要建议。

1967年六月二十三日，是一个令人难忘的“黑色日子”。这一天，“农大造反团”勾结社会上的所谓“造反派”，封锁包围了

对立面的“农大联总” 居住的大楼，用棒子队和断水断电的野蛮行径攻克了大楼。造成死亡四人、多人受伤的惨案。省军区副司令员、老红军杨友山少将率队到“农大” 制止武斗，竟被“农大造反团” 猖狂 围困。杨友山副司令员还被扯掉军帽和领章进行游园示众。紧接着，不过几天，省军区政委、老红军曾美少将的家，被“工总派” 抄了个“底朝天” 。马辉司令员被歌舞剧院的所谓“造反派” 强行绑架，像扔“麦个子” 一样的扔到一个大卡车上，还美其名曰“扭送北京军区发落” ，直到北京军区政委陈先瑞同志见状大怒，厉声谴责，马司令员才被释放。七、八月间，“反军” 狂潮发展到顶点，“工总派” 一举占领了省军区办公大楼，在院内院外的墙上画满了“王八老鳖” ，贴满了“打倒河北省军区一小撮” 的大标语。省军区首长被逼得转入“地下办公” 。在这种“反军” 黑潮登峰造极的时刻，“工筹派” 义愤填膺，要结队到 38 军辩论讲理，被省军区首长极力劝阻，并苦口婆心地嘱咐大家说：“不论遇到怎样的情况，我们都要咬定钢牙，高举“拥军” 的旗帜。这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标志之一。任何把矛头指向军队的行为，都会是不得人心，最终会失败的！” “工筹派” 的群众正是听从了省军区首长的教诲，在对待 38 军的举止上，一直坚持了“礼貌拥军” 的 姿态。这时候，在电台内部又冒出两个小的群众组织，一个叫“劲松” ，一个叫“东风” ，里边大多是被“红少数” 催垮的“红总部” 和“文革” 筹委会的人。不过，他们此时却和“红少数” 有了共同的社会观点，即自我标榜为“38 军支持的革命洪流派” ，主战场放在了社会争斗上。有时他们在电台内部也挑起一点小风波。比如，军队系统传来江青同志的指示，借调电台文艺部副主任冯志同志到中央文革文艺组参加新样板戏的编创工作。军管组认为是军队系统

下达的，又没说有传达任务，就跟冯志同志做例行谈话，冯志便满心欢喜地进京了。这一下，便吊起了“劲松”和“东风”两个群众组织的顽固派性。他们大喊大叫着质问电台军管组和革委会：

“是谁放跑了‘周扬的徒子徒孙’冯志？强烈要求冯志回来向群众交待紧跟周扬的问题！”军管组副组长白光同志没有急着回答他们的鼓噪，而是借着另一次开全台会的机会，十分郑重地说：“我想借此机会做一点答疑解惑的工作。我台有些同志强烈质问电台军管组和革委会，是谁放跑了冯志同志？我现在郑重宣布：不是谁放跑了冯志同志，而是江青同志通过军队系统下达指示，点名借调冯志同志到中央文革文艺组，参加新样板戏的编创工作。这件事，我认为它是河北电台的骄傲、自豪和光荣，这也雄辩地说明，冯志同志是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忠诚战士，和周扬那个反对鲁迅的革命的大众的文艺路线根本不沾边。我建议某些同志给冯志同志扣的那顶‘莫须有’的大帽子，还是快点主动摘下来为好。晚了，就太不厚道啦！”白光同志这段铿锵有力的话，犹如一枚重磅炸弹，使那些死抱住“派性”不放的人，就再也没有吭声。第二天，我就奉军管组委派进京去看望冯志同志，冯志同志精神极好，他高兴地给我介绍了同时参加新样板戏编创工作的著名作家、《欧阳海之歌》的作者金敬迈；《野火春风斗古城》的作者李英儒和《平原游击队》的作者邢野。我们热情握手后，冯志同志又大声道：“我们的这位小高同志，是白洋淀的‘儿童团’，他也喜欢文学，已有中篇小说问世。‘文革’中他很有胆略，是公开保我的！”我忙着回答一句：“革命的作家为什么不保？这应该是我们年轻人的本份嘛！”

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看到保定这种急转直下的混乱局面，八月中旬命令河北军区马辉司令员和38军李光军军长，率领两派群众组织

的代表，以进京汇报的形式，谈判停止武斗，实现革命大联合。省军区首长要求选一位善于谈判联合的地方同志，做代表团长或称首席谈判代表，省军区支左办公室经过讨论推荐由我担任，马司令员欣然同意。我们到了北京，先是住在赵家楼，即“五四”运动时爱国学生“包围赵家楼、痛揍卖国政客”的地方。后来又移到北京军区大院 85 楼。汇报和谈判的地点则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接见并领导两军和两派的中央首长有：周恩来总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第一副组长江青、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以及军委空军首长罗元发、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和副司令员肖文玖等。汇报和谈判为了实现有序进行，规定汇报时先由中央首长点名，点到甲派就由甲派同志发言，点到乙派就由乙派同志发言。汇报过程中，中央首长插话指示，对有争议的问题达成共识或者都同意中央首长的指示，才由双方的首席谈判代表进行落实并签定协议。

当时谈判的焦点问题主要是武斗升级；把矛头指向军队和对老干部的解放问题。我作为“工筹派”首席代表，主要是协助省军区指导代表团日常工作的刘海武处长，统一大家的认识，规范大家的行动，确定正确的方法和策略。刘海武同志是省军区组织处的老处长。他思维缜密，处事稳重。更重要的是他对两派都出以公心，关心爱戴。虽说谈判工作既紧张，又劳累，有时还很艰难，但总的进程我们还是主动和愉快的，几次汇报受到周总理的好评。比如，在汇报到“工总派”冲击占领省军区对军区首长抄家绑架时，我们只是原则点到，不搞“口水仗”，把我们拍到的在省军区墙上画“王八老鳖”的照片以及拿到的反军传单，直接递给周总理。周总理看了非常生气，当面指令 38 军要“工总派”立刻撤出去。再比如对待老干部的定性和解放，原来两派都以自己的派性划线，站到自己

一边的就是好的，站到对立面的就是坏的。我们仔细体会毛主席“要革命老干部站出来工作”的指示，决心从“派性”的小圈子跳出来，对“工总派”支持的老干部，像原保定专署副专员杜森尧同志，我们也敢于表态肯定。与此相反，“工总派”对“工筹派”支持的老干部却不敢做这样的表态。对此，周总理表扬“工筹派”是顾全大局的。此外，我们在选择汇报发言人时，从不在“能说会道”上下功夫，而主要是启用朴实厚道的老工人出场。他们虽不具灵牙利齿，但语气平和，以理服人，中央首长都很爱听。就在汇报谈判不断前进向好的形势下，我“工筹派”代表团的顾问之一、空军保定航校组织科长王建山同志，从空军那里获得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毛主席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同马司令员和李光军军长谈话，问他俩：“林铁不行了，刘子厚也打倒了。都要打倒吗？看看刘子厚同志能不能站出来呀？”马和李回答：“现在两派都坚决打倒他，暂时还有困难。”我听了这个极为重要的信息，禁不住高兴地跳了起来。忙建议道：“应该立刻向马司令员求证，如果是真的，我们应该在两派谈判中采取主动提议的行动”。王建山同志和“工筹派”代表团的另两位顾问省军区张顺兴处长、新华社河北分社记者周至清同志，也同意我的建议，我们四人便立马去见马司令员。嘿，简直太碰心坎了！马司令明朗回答：“有这回事。我和38军李军长当时认为两派都坚决打倒刘子厚同志，就暂时没有传达。”

“现在应该传达呀！”我们四位异口同声地说：“特别是在两派谈判停止武斗、实现革命大联合和“解放干部”的今天，更需要把毛主席的声音传达给群众，公开进行推动刘子厚同志站出来的工作。“又是一个大碰心坎，马司令员同意我们的建议。但他指示我以群众代表的身份，先向代表团透透，听听反映。我马不停蹄地讲

出去了，还真引起了大家的激烈争论。一种意见说：“这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这个信息实在是太重要了。我们‘工筹派’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应该紧跟照办哩！”另一种意见干脆不相信。竟公开质问我：“你是不是暗藏的刘子厚保皇派？在向大家假传圣旨？”我平静地回答：“绝对不是。如果你们不信，可以去求证马司令员。”嘿，还真有几个人去见马司令员了。他们回来一讲，形势陡然大变，公开推动刘子厚同志站出来，竟成为“工筹派”代表团一致的战略行动。更有趣的是：我们把此事传给了“工总派”的代表们，顿时也引起了他们内部的裂变，都纷纷找李军长求证。李军长的回答竟和马司令员相同。应该说，这件应运而生大喜事，较之即将签署的“两派停止武斗、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具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它为两派形成“共同推动刘子厚同志站出来”、加快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提供了一个根本性的有利条件。

九月底的一个晚上，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把我和“工总派”首席谈判代表宋景辉，召到了人民大会堂一个小会客厅。宋景辉同志是保定日报记者，我俩过去不熟悉，鉴于职业上的相通，又在双方谈判中打了交道，一见面便有一种和谐相敬的良好气氛。我俩热情握手后，和陈伯达坐在了一个长沙发上。陈伯达坐中间。他瞄了一眼右手的宋景辉，又转脸看了看我，用浓重的福建口音说：

“今天把你俩请来，是办一件和解的大事。两派代表谈了一个月，条件基本成熟啦！应该签定一个正式的协议共同遵守。你二位赞成不赞成？”

“赞成！”我俩几乎是同时回答。

“好！”陈伯达面带笑容地又道：“我对你们二位这种友好相见的气氛，十分高兴。”

接着，陈伯达展开一纸《“工筹” 和“工总” 停止武斗、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草案。这个草案经过两派你来我往的切磋，已经几易其稿了。陈伯达一条一条的念，念完一条就叮问一句：“有不同意见吗？” 如果没有，就接着往下念！当念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拥军” 时，本来下边还有几个“不准” ，即不准冲击军事机关，不准冲击军管单位，不准侮辱军队官兵……陈伯达没有再往下念，像是担心地拍着我的膀尖说：

“这一条你们比较主动，他们比较被动。但他们已经表示要改正错误，你不要抓住不放好不好？” “

“好！” 我响应道：“有错改了就变成正确了。我只会鼓掌，决不会揪住不放的。” “你讲得很辩证。不怕犯错误，就怕不改正。改了就是好同志。如果你们对这个协议草案都赞成，那就在《协议》上签上你俩的大名。”

陈伯达说到这儿，微笑着瞥瞥宋景辉和我。我俩自然高兴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陈伯达站起来，分别同我俩握手，又风趣地让我和宋景辉同志握手。这时，陈伯达兴奋地说：

“《协议》一签字，就意味着两派变成一家人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知道了会很高兴的。北京军区郑代司令员说了，实现了大联合，国庆节就让你们上观礼台。”

那时候，能够参加天安门国庆节观礼，是一件无上光荣的大事，我俩当然都非常激动。就不约而同地说：

“我们不是已经签字了吗！”

“是啊！那还得要郑代司令员知道哇！”

回到北京军区 85 楼，关于谈判代表要参加国庆观礼的消息，我

俩都急不可待地喊出去了，双方代表都激动沸腾得无法入睡。第二天吃午饭时，郑维山代司令员来看望大家，我们一致有节奏地欢呼道：

“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

郑代司令员挥着手高兴地说：

“同志们，你们大联合了，是保定的大喜事，河北的大喜事。周总理、伯达同志说了，十月一日，全体代表都上国庆观礼台！”

他的话，激起了全体代表经久不息地掌声。十月一日上午，我们来到西观礼台，饱览了游行队伍的壮观，看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向我们招手的光辉形像，大家激动得流下了幸福的热泪。

现在我不得不补述一笔的是：当年汇报谈判代表团的工筹派顾问、省军区宣传处长后升任省军区副政委的张顺兴同志，以及空军保定航校组织科长后升任副师职的王建山同志，离休后又同我聚在一起。

第 21 章 同地方和军队领导交往的故事

保定两派实现大联合了，借着这个相对安定的大好形势，我奉马辉司令员的指示，以“群众报告员”的身价，在省军区礼堂举行了几次报告会。主要是宣讲毛主席希望刘子厚同志站出来的指示，介绍刘子厚同志是 1926 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他在革命和建设中多次受到毛主席的表扬。其一生中没犯过大的错误。主要是对“文革”不理解，执行了一段“刘邓的资反路线”。毛主席批评后，他做了数次检查，并在接受群众的批判斗争过程中，又做了进一步的检查，态度是诚恳的。我们支持刘子厚同志站出来，就是在上海“一月无产阶级夺权”引领的新形势下，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伟大领袖毛主席期待着我们把这件事做得又快又好，如今保定两派实现了革命大联合，河北省军区和 38 军都支持我们做好这项工作，我们没有理由不能做得更好啊！我的报告获得了热烈的掌声，在两派大多数群众中赢得了共识。但是，也有反对的声音冒出来进行干扰，比如“农大造反团”、“省委兵团”和“市直总部”的一些头头，仍认为“刘子厚死不改悔”。但总的形势已不可逆转。（注：原河北省委秘书长后任河北省委副书记兼省政协主席的尹哲同志曾对我说过，他当时正在“靠边站”，也去听了我的“推动刘子厚同志站出来”的报告，认为我的报告逻辑严谨，立论正确，有很强的说服力和动员力。还说我当时没有讲稿，口若悬河，像个训练有素的演说家。我认为尹哲老同志这个评价，对我的溢美之词可以忽料不计。重要的是他反映了当时省委机关一大批地厅级和处级领导干部的意见和要求。）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应北京军区黄振棠副政委的邀请，

省军区首长委托我进京汇报推动刘子厚站出来工作的进展情况。黄副政委是负责华北地区建立省级革命委员会工作的。他听了我的汇报，高兴地说：“你们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总的基础夯实了。现在请你们做最后一件工作，就是对刘子厚同志的全部历史和工作做一个基本的调查。这样的调查北京军区是有的，但不能代替群众组织的调查。记住：选择调查组的人，必须是正派、正直、党性强的。闹派性的人绝对不能用。你们有了这个客观真实的调查报告，刘子厚同志就可以顺理成章地亮相了。”回到保定，我向省军区首长汇报了黄副政委的指示，又经过多方筛选，组成了由秦廷珠（河北电台记者）、张国堂（保定市评剧团干部）、刘作田（河北农大学生）、何瑞武（原省委组织部干事）、张福增（注：原省委组织部干事。我后边补录了自己发在网上的一篇文章，专门介绍张福增同志的情况。）、李绳式（原省委办公厅秘书）等十人的调查组，跑遍了刘子厚工作过的河北、河南和湖北等地，较快又较好的拿出了一本关于刘子厚全部历史和工作的调查报告，省军区和北京军区都相当满意。

十一月间，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视察保定、石家庄和天津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情况。他在石家庄的一次会议上，点名批判保定的“省委兵团”和“农大造反团”是“大杂烩”，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做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他的话具有相当的威望和威信，被点到的这两个组织顷刻瓦解。一直支持他们的38军也接着表态拥护陈伯达同志的重要指示，同时检讨自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十二月的一天，又一个更加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周总理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委托，指示北京军区李雪峰政委和郑维山代司令员，

接刘子厚同志进京，名义是参加学习班，实际是筹备建立省革委的工作。同时抽调一批原省直厅局长和地市委书记进京，由北京军区和河北省军区组织学习，为新的省革委和地市革委准备干部。令人惊喜的是，我们河北省广播局（台）长陆达同志也在其中。这个不大也不小的组织行动，给我们以巨大的安慰。陆达同志被无端打倒后，终于讨回了自己的正义和清白。也证明我们维护党的原则，反对非法夺权，做了正确的斗争和有益的工作。

这里我讲一段接送刘子厚同志进京的故事，是主办此事的省军区保卫处长马继联、宣传处长张顺兴和作战处长贾玉珍先后告诉我的。马处长说：“接送刘子厚进京的事，曾美政委和马辉司令员非常重视，那时保定虽然相对平静了，但下边各县的派性斗争还相当厉害。断道或设卡盘查、武斗……两派是经常发生的。为了保证万无一失，两位首长责成省军区宣传处长张顺兴同志先一步进京联络安排，接着令作战处长贾玉珍同志带一个班的战士，乘一辆军用卡车，到保定胶片厂“保护”刘子厚的秘密住处——洗相室去接刘子厚同志。，贾处长第一个进去，简单明确地说：

“刘子厚，跟我们走，有事情谈。”

子厚同志见来人是一位穿军装的老同志，沉思了一下便试着问：

“还带刷牙缸子吗？”

“带，该带的都带上。”

刘子厚收拾一下自己的手提包，竟不忘把自己吃剩下的一个玉米窝头装进衣兜里。等子厚同志被扶上军用卡车，他才发现车槽里铺好了厚厚的被褥。贾处长小声道：

“你就躺在这里，像个老病号似的。没有招呼不要起来。”

子厚同志点点头。汽车在战士们的护卫下，向北开去。到了高

碑店，省军区宣传处长张顺兴和北京军区的同志，正守在一辆轿车和一辆吉普车旁迎候着。双方默契交接后，刘子厚被扶下军用卡车。一位北京军区的军官走过来向子厚同志立正行军礼，然后道：

“刘子厚同志，根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奉李雪峰政委和郑维山代司令员的命令，接你进京商谈要事。请上车吧！”

刘子厚同志习惯了一年来“批斗——劳动——反省——批斗——劳动——反省”的生活，第一次听到毛主席周总理的声音，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竟禁不住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迎接子厚同志的小型车队到达北京，住进解放饭店。吃午饭的时候，子厚同志又掏出自己那个玉米窝头，掰成小块放进汤里泡着吃。陪同的同志却劝他：

“剩窝头就不要吃了吧！”

他倔犟着说：“窝头是好东西，不能糟塌哟！”

我第一次和刘子厚同志谋面并交谈，是1968年一月十六日在北京军区召开的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会议上。参加这次筹备会议的有全省省直、十个地区和军队领导干部以及群众代表180余人。我是与会的省直群众代表之一。在这次“老中青、军干群”济济一堂的会议上，我有幸结识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军区政委李雪峰、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副司令员肖文玖以及华北驻军38军军长李光军、政委王猛；63军（驻石家庄）军长张英辉、副军长徐信和闫同茂；65军（驻张家口）军长符先辉、政委贺明；24军（驻唐山）政委廖鼎林。这些久经沙场的老首长同河北省军区的老首长一样，对我们这些年轻人非常热情和关怀。他们总是直爽地指出我们的缺点、弱点和错误，鼓励我们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的本领，做合格的革命接班人。省里站

出来的几位老同志刘子厚、王金山（河北省原副省长）、马力（原唐山地委第一书记）谢辉（原河北省副省长）、刘英（原河北省委宣传部长）、王常柏（原承德地委第一书记）、杨磊之（原河北省经委主任）等，每天中午或晚饭后，就和我们这些群众代表一起散步或聊天，思想感情的交流十分亲切活跃。有一次子厚同志和我做了一次深谈。他讲了两个问题，至今令我难忘。他非常严肃的问我：“假如你进了省革委，是做人民的勤务员，还是做一个‘派’的代表？”我非常明确地回答：“当然是做人民的勤务员呀！”子厚同志说：“你回答得完全正确！我认为，这次会前存在的两大派，因为已经实现了大联合，那个这‘派’那‘派’的观念，就应该变成翻过去的历史啦！今后做为省革委的一员，再去讲这派那派，甚至为‘派性’服务，为‘派性’当官，那要犯大错误的。”子厚同志还讲到了他自己。心情有些沉重地说：“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对我们这些老同志来说，永远是个首要的问题！照说革命几十年了，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走什么道路不应该成为问题呀！可事实上问题还真不小哩！中央就出了刘、邓这么大的走资派，他们对我们这些人不是没有影响的。毛主席一再讲，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我们照着讲可以说是滚瓜烂熟，但却没有真正领会它的内涵。这就很难自觉抵制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浸染。毛主席多次批评我们的‘官气、暮气、骄气、娇气’这四种歪风，在领导干部中相当普遍的存在，讲起来大家都承认，可是并没有自觉地去改。这次群众起来斗我们，才知道群众对我们搞特权、骄傲自大、高高在上，没有了战争年代那种鱼水般的干群关系和钢铁般的革命精神，非常气愤。我们确实大大的脱离群众了。再这样下去，就真的会变质，变成高高在上的

官老爷。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景象呀！我今天跟你讲自己这些亲身感受，是想告诉你们可能要走上领导岗位的年轻人，也要高度警觉这‘官、暮、骄、娇’四大歪风的浸染。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

‘存在决定意识’，要当心自己的地位变化了，意识形态也要随着变。不向好处变，就向坏处变，二者必居其一。希望你们从我的感受中得到有益的教训。”子厚同志这意义深远的谈话，我一直牢记在心。如果说我在走上领导岗位十二年中，能在严于律己方面有一定的自觉，那是包括着得益于子厚同志这种将心比心的教育的。

下边我讲几个严于要求自己的小事情。1、河北电台在斗、批、改过程中，根据省革委的指示，有一批同志到了毛主席号召成立的“五·七干校”进行学习和劳动锻炼。虽然进干校要带着组织关系，学习结束要由省革委政治部或人事局重新分配工作。但电台军管组和革委会认为，我们这些同志大多熟悉广播业务，学习结束后应该继续回电台工作。为此，奉军管组指示，我两次到干校去看望这些同志。并明确表态：学习结束后，欢迎同志们都回电台工作。后来除了少数同志因家属和其他个人原因不愿再回电台工作，大多数同志都回来了。这件事，当时在电台内部有所震动。因为曾经有人怀疑我高恩泽会排斥曾经是“文革”对立面的人。事实证明，这样的问题没有发生。最服人的标志是：原“文革筹委会”的五个委员，除崔德森同志因家属在保定不愿再回来，其余四个同志一位没有去“五·七干校”，三位去干校的都回电台工作了，我们一直相处得不错。2、我走上领导岗位后，和爱人刘淑琴商定，要咬定纲牙严于律己。比如国家规定我出差可以坐飞机，也可以坐火车软卧，但我除了参加中央广播局会议集体包机坐过一次飞机外，从没有坐过飞机和火车软卧。有人笑话我“理当坐之而不坐”是“傻瓜”，我却

认为和一块出行的同志坐火车硬座，不仅是个节俭问题，更是个群众观念问题。3、我的家庭管理比较严。电台当时有一部轿车和儿台吉普车。我和爱人商定，她和两个孩子都不准沾轿车和吉普车的边，她们都做到了。有一次，电台一位女同志从唐山带来一套陶瓷茶具，说是唐山军分区韩副司令员让她捎给我的。我当时不在家，爱人很警觉。等我回来，她就急着要我和韩副司令员通电话，询问是不是他给的茶具。得到韩的肯定后，爱人说：“我这是对你在实行家庭监督呀！就是担心电台同志给你送礼呢！”4、1969年我母亲逝世，像我这22级的干部每月五十挂零的工资，是可以也应该申请困难补助的，因为这是一般的惯例。也有同志劝我写个申请书。但我和爱人商定，自己省一省可以过去，决不给组织添麻烦。顺便说一句，我的爱人刘淑琴在国营新华印刷二厂工作，她的母亲和父亲先后病逝，照一般惯例，她一个每月不到40元工资的工人，是可以而且应该申请困难补助的。但她作为老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坚持严格要求自己，扎根就没想提出申请。爱人心红手勤，在工厂二十多年，年年都被评为优秀党员和先进生产者。退休后在社区居委会继续被评为优秀党员。

注：补录作者发表在网上一篇关于张福增同志的文章：

从“红小鬼”张福增之死看河北党内路线斗争之尖锐

张福增，河北省外贸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他出生在白洋淀安新县一个农民家庭。因为家里是抗日战争的堡垒户，经常掩护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干部，受革命熏陶的他，1945年十三岁上便参加了革命，被革命老前辈称为“红小鬼”。张福增1948年加入共产党。新中国建立后，曾任河北省供销社科长、省委组织部干事。文化大革命中，做为组织工作干部，他一贯反对武斗，反对打倒一切老干

部，拥护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号召革命领导干部站出来工作的关键时刻，他应河北省军区之邀，参加了对原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同志的调查工作，为刘子厚的复出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八十年代初，刘子厚调离河北，任国家计委副主任。中央派国务院秘书长金明同志任省委第一书记。因为金和第二书记江一真在对刘子厚和原省委的评价上发生分歧，被江说成是“第二个刘子厚”。在江的公开号令下，省直机关出现一股揭批刘子厚、反对金明同志的狂潮（注：这股狂潮背后得到邓小平和胡耀邦的支持），使金明同志处于难以控制局势的困难境地。此时张福增也做为刘子厚的“爪牙”成为被审查的对象。但审查的结果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便以“提拔过快”为由，免掉其外贸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的职务，分配到省供销社当科技处长。张福增凭着党性到供销社赴任，并积极进行科技开发工作，河北省广泛推广蘑菇生产就是从这开始的。不过，叫他没想到的是：1982 年河北省以金明为第一书记的省委被中央改组，中央另派高扬任省委第一书记，刘秉彦、张曙光、邢崇智为书记。这个新班子坚决执行邓小平、胡耀邦“清理‘文革’三种人”的指示，推翻了金明那个班子的决定，硬是把张福增定为“四人帮”体系的“三种人”，撤掉科技处长，开除党籍。张福增据理力争，但毫无作用。他心里窝了一肚子火，曾仰天大哭一场，还是贴心的老伴王秀花和周围同志力劝，才平静下来。只是又一个让他想不到的是：一向身体硬棒的他，要命的癌症正向他悄悄袭来。到检体时才发现胰腺癌已进入晚期，只得立刻住院手术。手术引发大出血，生命处于垂危之中。福增同志认定自己来日无多，便用颤抖的手为自己的冤案给河北省委写了近万字的申诉书，要求省委在他生命结束之前能够平反他这个冤案。事情引起省直许多老同志的同情和关切。曾

经和张福增一起工作过的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陈治平同志，冒着被省委一把手邢崇智怪罪的风险，亲自把张福增的申诉书交给了邢崇智书记，但是遭到邢的严词拒绝。张福增在绝望之中于 1991 年 6 月 3 日在极大的政治痛苦中逝世。

张逝世的消息传开后，在省直机关引起很大震动。到家慰问和送花圈的同志络绎不绝，以至花圈在院里放不下，都摆到大门外的街上来了。最令人难忘的是：河北省副省长郭宏歧同志，他不顾邢崇智的严酷表态，除了两次看望病危的张福增外，还亲自到张家里对其夫人王秀花进行慰问。

张福增的遗体告别仪式确定在石家庄殡仪馆进行。省委书记邢崇智指令省直机关领导不准参加，并派出武警小分队到殡仪馆布控。即使在这种恐怖的情况下，参加告别仪式的同志仍有九百多人。最令人激动和安慰的是：一些党政军的高级首长都给张福增同志献了花圈。他们是：原河北省常委、时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袁捷；原河北省委书记、时任河北省军区司令员的老红军马辉；原河北省常委、时任河北省军区政委的老红军曾美；原河北省常委兼组织部长、时任省军区副政委的谷奇峰；原河北省委书记、时任山东省副省长的王金山。以儒将著称的袁捷副司令员还为张福增写来一幅挽联。省直机关一些厅局级负责人，不顾邢崇智书记的禁令，也亲自来到了殡仪馆。他们是：省政府副秘书长穆涛；省化工厅副厅长、省委常委徐纯性同志的夫人梅雨；省劳动局负责人、省政协主席尹哲同志的夫人刘嫣。

接下来令人无法理解的一幕发生了：就在告别仪式正要进行的肃穆时刻，张福增同志的儿子、省公安厅干部张晓辉，突然从外边大哭着进来给大家磕头，一边磕着头一边哭着说，他受到上级严厉

的指令，取消公众的告别仪式，请诸位长辈和同志们为了他的安全和前途，就接受上级的指令吧！我和在场的其他同志听了无不义愤填膺，纷纷谴责邢崇智毫无人性的指令。但是谴责归谴责，看到张晓辉那非常为难的处境和连续磕头恳求的样子，也只得无奈地离去了。

第 22 章 没有想到的任命

1968 年一月下旬的一天，母亲又犯病了，我不得不请假离开正在进行的筹备河北省革委的会议，赶回老家。好在那时的医疗服务很到位，经过紧急抢救，母亲又从死神的折磨中转危为安。服侍在旁的亲人们都非常高兴。二月一日上午，院里有人喊：“客人来了！”我忙着迎出去，原来是省军区的同志开着专车来接我，到石家庄去参加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第一次全会。这工夫我才知道：经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我已经成为河北省革委常委了。一下子当上省革委常委，这是我作梦都没想到的。当时心情非常激动。一个刚刚进入而立之年的共产党员，能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如此信任，实在是太光荣太幸福啦！当然，我也有些不安。

“这么重的担子，我的能力能担起来么？如果担不好，那不就辜负毛主席的希望了么……”我这么想着，就听军区来的同志说：“中央决定河北省会由保定迁往石家庄，河北电台肯定也要随着走的。”这又是一个令人高兴的事情。因为石家庄有“京广”和“正太”两条铁路“十”字贯通，交通比保定更发达。电台迁到那里是顺理成章的事呢！我怀着这满心欢喜的心情，忙着进屋向母亲报告并辞行。没想到母亲却连连摆手，公开说：“你不能去，谁不知道你是‘傻老民’（我的奶名叫老民）呀！写写字还过得去，当官肯定不行！”在一旁的岳母说得更绝对：“当官是个担惊受怕的差事，宁可回家种地，也不要当官！”我当然无法接受两位老人的说教，只得好话相劝：“你们说的那是旧社会的道道。今天当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咱只要好好干，不胡闹，肯定会平安无事的。再说咧，如今

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培养咱哪！我们怎么能辜负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希望呢……”说到这儿，两位老人心里不一定通了，但也不在拦阻。我只得嘱托爱人为我承担家里老人的服侍，随解放军上路了。

到了石家庄，到处可见喜迎省革委成立的新气象。各种颜色的的标语，五彩缤纷的横标，以及正在操练的秧歌队和大鼓队，把这个“天下第一庄”打扮得既生气勃勃，又绚丽多姿。最突出的是解放路（今中山路）上的“东方红服务楼”（今中山东路天府宾馆），已搭起了主席台和观礼台。人人皆知，北京军区首长和新的省革委领导将在这里和群众一起欢庆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并发出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致敬电。当然，最使我激动不已的是：一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的关于成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红头文件》。我郑重地把《红头文件》放在案上，一页一页一行一行地细看。只见第一页的顶端，清晰地显示着“毛主席已圈阅”的墨迹。行文中有一句让我永志不忘的话：“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军区和河北省军区认真执行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个明确而又深刻的结论，虽然指的是军队，但我们一直在北京军区和河北省军区领导下工作、斗争，毫无疑问，也是对我们这广大的地方群众的肯定。我能不万分激动吗！“红头文件”的最后，是省革命委员会委员名单。按照军、干、群三结合的原则，委员共 121 名。其中军队代表 26 名，地方领导干部 25 名，群众代表 70 名。委员会设常委 31 名，其中军队代表 8 名，地方领导干部 7 名，群众代表 16 名。省革委主任由李雪峰同志兼任。第一副主任刘子厚，副主任马辉（河北省军区司令员）、曾美（河北省军区政委）、张英辉（63 军军长）、耿长锁（饶阳县五公村党支部书记、全国劳模）、刘殿臣（石家庄国棉一厂工人）。在 31 名常委中，我

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我的名字下面，“职业”一栏填的是“编辑”，显然是属于“知识分子”代表。我也看到了保定“工筹派”一些很熟悉的名字。他们是：赵登元（河北省公安厅干部）徐维京（省委干训队干部）、吴中发（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工人）、朱秀欣（保定化纤厂工人）、刘学兰（保定评剧团洋琴手）。常委里边没有“工总派”的代表，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但仔细一想，也事出有因。因为那一派的主要头面人物总是“唯我独左”、“唯我独革”，还曾经是“反军”的急先锋，脱离了群众。不用说，在180多名代表协商中没有入选。

在石家庄又见到了许多参加北京筹备会议的同志，他们还把中央首长接见筹备会议代表的情况及首长讲话的记录稿送给我看。那是一月三十一日晚上，中央领导周总理、谢富治副总理、陈伯达、康生（中央文革顾问）、江青、姚文元（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等，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河北省革委筹备会议的代表。周总理宣读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红头文件》。其他几位首长都发表了热情的讲话。康生同志说：“我对华北军区（北京军区原来称华北军区）和河北省军区取得的巨大成绩表示祝贺！”江青同志说：“开春了，望大家搞好春耕生产！”姚文元同志朗诵了毛主席的诗《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以此做为自己对成立省革委的热烈祝词。

1968年二月三日上午十时，庆祝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隆重开始。首先三呼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接着，全场高唱《东方红》。第三项是宣读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致敬电。谁来宣读？这

里发生了一个小故事：开始安排由河北人民广播电台男播音员陈新（学名樊振藻）同志宣读。因为他的音质和音量都相当好，有中央台著名播音员夏青的风格和味道。但是，63 军副军长、省革委常委徐信同志对我说：“选一位红卫兵代表宣读，是不是更具有代表性呀？”他并推荐了一位最佳人选，即河北化工学院红卫兵王继英同学。我认为徐信同志的提议很有创意性，就让陈新同志试了一下她的音质和音量，果然很好。两人又切磋了一番播音技巧，也很相通。就这样，王继英同学正式登场了。她那极富感情的语气，十分甜美的音质，底蕴充足的气势，以及她那端庄秀丽的形象，都给全场群众留下了美好难忘的印象。更为有趣的是：陈新同志和王继英同学也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进而由友谊发展为爱情。一年之后，随着王继英同学走上工作岗位，他（她）们结为美满幸福的夫妻。

到庆祝大会第四项李雪峰主任发表重要讲话之后，游行队伍大检阅开始。解放军队伍、工人阶级队伍、农民阶级队伍、红卫兵队伍、文艺工作者队伍……四十万军民，以整齐雄壮的步伐和节奏有力的口号，或手执红绸，或手擎毛主席语录，热烈而又深情的在主席台通过。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和老首长们一起参加检阅，更是第一次目睹石家庄革命队伍的壮观。记得游行队伍在通过主席台时，有这样两句节奏分明又十分响亮的口号：“热烈庆祝，河北省革委成立！”；“请首长代我们，向毛主席问好！”老首长们对此都频频点头，报以会心的微笑。我们这些登台的年轻人，则回以热烈的掌声，展示自己无比的振奋和幸福。

庆祝大会结束后，第二天便举行省革委第一次全会。全会采取常委轮流主持的办法。我有幸第一次主持庄严的首次全会并做了讲话。河北日报以专版报道了这次会议。我的名字第一次以“省领导

成员”登上了报纸。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华北山河一片红——热烈欢呼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全会又进行了认真的学习和讨论。最后以通过《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群众运动的决议》而圆满结束。

省革命委员会做为掌管河北党政财文大权的新权力机构，按照毛主席的要求，要建成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要打破重叠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李雪峰同志在全国五个大区的第一书记中，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最得力而唯一没有倒下的革命领导干部。他极具胆略的提出，省革委的组织架构编制 80 人，最多不超过 100 人。这在长期以来形成的庞大臃肿、人浮于事的习惯架构下，显然是一次轻身瘦体的大革命。省革委领导机关的部门只有非常精干的五个：即政治部、生产指挥部、秘书组、办事组和保卫组。政治部主任由省军区政委曾美兼任；生产指挥部主任由省军区马辉司令员兼任。其他如秘书组组长姚德（北京军区干部）、办事组组长黄夷（华北局干部）、保卫组组长卢克（河北省军区副政委），也都是很过硬的老同志。其思想水平、工作作风和工作效率都十分出色。在工作接触中，给我们这些年轻人以很好的带动和影响。全会结束后的一天，雪峰同志和子厚同志同我谈话，问我电台搬迁有什么困难？我直爽回答：“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主要的问题是选址要适当。其他如搬迁和技术方面的问题，我们会努力解决好的！”两位领导高兴地说：“选址问题找石家庄市，他们会大力支持的。具体有什么问题，请刘英同志（省革委常委兼政治部副主任）协调一下。争取六月份能在石家庄开播。”回到保定，我立刻向军管组和革委会汇报省革委领导关于电台搬迁的指示和要求。军管组负责人白光（这时马继联组长已调任公安厅军管会副主任）

组织相关同志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讨论，并制定了具体的落实规划。广大同志对电台搬迁欢欣鼓舞，表示坚决完成省革委部署的任务。但是，就这样一个党中央和省革委决定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留在社会上的那些以“革命洪流”自居的四十几位同志，竟然公开反对。他们公开说，把省会迁往石家庄是在“搞派性！”不仅公开拒绝参加搬迁工作，而且声言不到新的省会去。好在这四十几人拒绝搬迁，无奈大局。在军管组的领导下，立即组成我和老台长陆达、技术处副处长程忠顺“三人先遣小组”出发了。

到了石家庄，我们首先会见了省革委常委兼政治部副主任刘英同志。在他的指示下，我们又分别会见了地、市革委会主任阎同茂、马炳衡和段焕商同志以及市生产指挥部副主任卢凤燕同志。几位领导都高兴地说：“支持省会搬迁是中央和省革委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省电台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舆论阵地，更要安排得妥妥贴贴。石家庄的四面八方，你们都去看看，哪里合适咱就定哪里！”卢凤燕同志更是亲切风趣。他说：“我给你们当个兼职的后勤部长，吃住方面有什么困难，我包起来！”石家庄市城建局还送我们一张石家庄地图。我们仨人就开着车转开了。考虑到电台的文化内涵，我们把重点放在了石家庄的文化区范围。开始相中了师范大学南面的一大块空地，因为平地起楼时间太长、毫费太大，只得忍痛舍弃。最后选中了河北交通学校的地盘。这个学校已迁走，院内有一座三千多平米的三层大楼，楼上住进了中科院地理研究所的几十位同志。还有两幢宿舍楼花插住着一些单位的家属。总面积八十亩，有连接三个街区的大面积空地，发展空间很大。院内桃、李、梨、杏……果树很多，生态良好。我们把此方案报给领导，刘英同志高兴地说：“此处很好。电台搬来要立刻播音办公，有个现成的办公楼很好嘛！”

你们还有些家属要来，有两幢现成的宿舍楼也很适合需要。至于院内的其他住户再慢慢调整。将来广播电视发展了，还有那么多空地可资利用。好！太好了。你们三位老中青相结合，做了一件圆圆满满的大好事呀！”市生产指挥部副主任卢凤燕同志知道我们定在了原省交通学校，当即拍板道：“我们盖了几幢家属楼，是为军队家属安排的，称为“拥军楼”。现在先拿出一幢，供你们调整院内家属用。总之，就是尽量给电台创造一个肃静的环境。“我们当即激动万分地表示了感谢。

选址问题定下来了，紧接着就是设备搬迁和安装。原来电台的传输系统是以保定为中心，由此辐射到河北的东西南北。如今要以石家庄为中心，这在技术衔接上要做根本性调整。好在我们有一个发射台就在获鹿县（今鹿泉市）的封龙山上，以此为基础，进行枢纽建设，整体效果肯定不错。只是，当时上封龙山并没有公路。海拔 800 多米的高山，只能从羊肠小道攀爬上去。但是没有一个人叫苦喊难，一箱箱机器，一盘盘电缆，硬是靠肩背手抬和一双脚板运上去。就这样，经过三个月的艰苦奋斗，到六月一日，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在新省会石家庄胜利播音。这件事，在过了二十年后，当时军管组分管广播技术工作的军代表、一位解放战争中参加革命的六十九岁老人宋进义同志，用一个很长的标题《我知道的——热爱广播事业、为建设发展河北广播电视做出过贡献的高恩泽同志》，为我写下了一篇文章。现摘录其中的两段：

“1967 年元旦过后，根据中央军委通知和省军区党委的布置，我以军代表的身份，随军区保卫处长马继联同志到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实行军管，我分管广播技术工作。驻电台军管组先后更换过两位负责人，即白光、蔡宝峰同志。1968 年八、九月间，工人解放军毛

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河北电台，我也在。因此，对省台的情况和高恩泽同志是比较了解的。我对高恩泽感触最深的一点，他热爱广播事业，为建设发展河北广播电视做了大量的工作。”“1968 年二月，河北省会由保定迁往石家庄市。省台搬迁工作是一件要求速度快，又不能简单从事的大事。这项任务落在了高恩泽同志（分管播出业务的副主任）头上。他愉快的接受了任务，立即和原台长陆达、程忠顺（技术处负责人）同志赴石家庄，在当地革委的协助下，经过选择和论证，最后确定省台进驻原省交通学校（已迁走），此处条件较好，经呈报省革委会，很快得到了批准。六月一日，经过三个月的艰苦奋战，播出、传送、发射等环节全部调试好，人员到位，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开始在新省会——石家庄播音。因此，受到省革委政治部的表扬。但是，在文革这样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电台从搬迁到正常播出，谈何容易，要做难以想像的大量艰苦、细致、深入的工作，还要有付出和拼搏精神，更需要有爱业、敬业和奉献精神。”

宋进义军代表后来又参加了全省彩色电视会战的工作，成为一名穿军装的“电视迷”。我每每读到他关于我的见证文章，想起省革委领导对我第一炮主抓搬迁工作的表扬和肯定，心里总是漾起无限的欣慰。

下边我补述一下和电台同楼办公的地理研究所搬迁的问题。因为他们先于电台进驻原省交通学校，我们一到就和电台职工强调要搞好双方的团结。再加上地理所老所长刘树森同志曾在河北省公安厅工作，又和我是白洋淀老乡，不论是同志关系还是家属关系，都相处得很好。后来地理所要建办公楼，地址就划在了我们共有的空地上。这显然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做为机要单位的电台，两个单位

长期在一起是不合适的。而此时地理所已开始进料，怎么办？我请示军管组决定和气相待，并责成我找省革委秘书长王金山同志协调。最后双方在省革委主持下，经过友好协商，由省财政拨专款 30 万元给地理所，又责成市革委给他们划一块好地皮，和和美美地完成了地理所的搬迁工作。事情都过去几十年了，双方同志在街上碰面，仍热情握手交谈，十分亲密。

第 23 章 三次难忘的公差

1、赴天津会商河北仓库被查封事

1968 年 2 月 3 日河北省革委成立，我当选为河北省革委常委，但仍主管省广播局（台）的宣传和全省广播事业的建设工作，几乎没有出过另外的公差。一天，省革委第一副主任刘子厚同志，把我和生产指挥部副主任马力（原唐山地委第一书记）、省革委秘书组副组长甄树楠（时任北京军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叫去，面色严肃地说：“天津市划离河北成为中央直辖市后，突然查封了河北在天津的一些仓库。现在正值春耕，已经影响到生产了。你们三位带省革委的公函，去找天津市革委主任解学恭同志商谈拆封的事。天津早于河北建立革委会，今天突然出现查封河北仓库的事，我想得有点复杂，到底是造反派的无政府主义使然，还是与某些老干部或军队同志的地方主义有关，目前尚不清楚。你们三位去了要注意对口了解情况，细致工作，务求圆满解决。”我们遵命乘北京吉普出发。心里没有多少底数。但有一条，天津市革委主任解学恭同志原来是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马力同志与他十分熟悉，估计问题解决当不会有太大的困难。这全要看天津驻军和造反派的态度了。

我们到了天津，习惯性地住进了原是河北宾馆现已改名为天津宾馆（注：天津中央直辖后，同河北达成协议，河北宾馆划归天津）。然后去见解学恭同志。马力同志和解主任握手言欢。随后便与甄局长和我热情握手，气氛甚佳。等马力同志递上省革委的公函，解学恭同志看了，却十分惊讶地说：“竟有这事？我一点都不知道哇！怎么能这样干呢？天津永远都离不开河北，河北也离不开天津，

是一家人么！你们放心，我立刻查问，全部拆封。”解学恭同志说到做到，问题竟出奇顺利的解决。

我们要回去复命了。正在天津宾馆留守的原河北宾馆保卫科长王玉圃同志来了。他着急地说：“三位领导先别走，我这里还有压手的大事向你们报告呀！原来河北和天津双方协议，宾馆仓库里的用品运回石家庄，省革委以此组建新的招待处。现在人家不让我启运，还要动手揍我。请三位领导快点和市革委说说呀！”我们三位认为，这事和查封仓库同出一辙，也只能找市革委疏通了。便又向解学恭同志通报，解主任也对此事一无所知。他立刻命令天津宾馆照协议办事，问题遂迎刃而解。

我之所以记下这两件事，是想说“文革”以来，毛主席讲“要斗私批修”已经好几年了，这个思想和革命的伟大战略工程，就像登山爬坡、逆水行舟式的前进呀！稍有松懈就会滑下来。瞧瞧天津这两件事，不正是明目张胆的私利当头的地方主义和小团体主义做怪吗！

宾馆的争议也解决了。我们正要往回走时，河北驻津省直机关领导小组组长、北京军区的杨部长又赶来了。他说省革委成立后，这里省直机关干部“派性”还很厉害。有人公开攻击省革委是“派委会”、省军区是“支派不支左”，公开抗拒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决定。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收效不大。想请三位领导给大家做个形势报告……“马力同志听到这忙说：“我站出来工作没几天，情况了解得很少，讲不出啥来，看看他们二位……”甄局长回绝得更爽快，他接茬道：“我这个穿军装的，还不如你杨部长这个穿军装的知道得更多呀！”杨部长一看这情况，就转而要求我讲一讲。还说：“小高同志是群众代表，讲起来会更有代表性。”照一般官

场客套，我也可以推一下。但是，我没有推辞。因为按照党的原则和毛主席倡导的斗争哲学，对这种公开指向省革委、省军区和党中央的派性攻击言论，我们有责任给予严正的批评。就请马力同志和甄局长代我向子厚同志请假，我要晚回去几天，进一步了解一下驻津省直机关的情况。经过调研，我在省直驻津单位的干部大会上做了一个当前形势的报告。这个报告赢得了掌声。我回到石家庄向子厚同志做了汇报。子厚同志说我讲得很好。

2、一次不寻常的战备视察

——北京军区首长视察石臼坨采访记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后，为了防备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中国军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那是震后我们还在紧张抗震救灾的一天，北京军区政委秦基伟、副政委迟浩田和参谋长徐信一行，要到唐山乐亭县的“石臼坨岛”视察。河北省军区某部政委刘冰斋、乐亭县武装部长陈俊菊和我（时任河北省革委常委兼省广播局（台）革委副主任）一行三人，乘渔船登岛迎接。事先知道，三位军区首长是乘“云雀”牌直升机前来，驻岛战士早已割掉一米多高的蒿草，清整出一片平平的百米见方的降落地，做为直升机的停机坪。当时，我这个书生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警觉：乐亭县管辖的一个小岛，为啥竟引来北京军区三首长亲自视察？它一定是有着不同寻常的战备意义吧？说来不怕列位见笑，我这个已经干了18年的新闻记者，竟对这个小岛的前世和今生一无所知。直到这时我才从刘政委和陈部长嘴里知道，在我们河北渤海边上还屹立着这么一个并不很小的“华北第一大岛”。岛的面积有2.34平方公里，呈长条型，南北长3公里，东西宽1公里。位于乐亭县城西南40公

里处。历史上唐太宗东征高丽（注：当时高丽国占着我辽东大片土地），因为在此岛囤兵驻蹕十九天而得名“十九坨”。后因其岛形状——周围沙阜隆起，中凹似石臼，又改名“石臼坨”。岛上草木丛生，绿色植被达百分之九十八。并有梦泽湖，淡水十分丰富。岛上有明朝万历年间初建、清朝乾隆年间重修的古庙“朝阳庵”。庵前尚有一石碑矗立。古庙分前殿和后殿，还有普通房屋十一间。县志上有这样的记载：当年佛事兴旺，朝拜上香者络绎不绝，至清朝光绪年间才开始败落。新中国建立后，河北省军区十分重视此岛的战备地位，一直派有军队驻守。

上午十点，直升机像个大青蜓直飞而来。我们三位站在停机坪的边上迎候。我是第一次看见这玩意。等直升机徐徐降落那一刹那，才知道其旋转扇页搅起的风力十分强大，差点儿就把我们三位吹倒。待直升机停稳，我们才迎上前去，和首长热情握手。三位首长中，我认识徐参谋长，他原是驻石家庄的 63 军副军长，也是河北省革委常委，我们常在一起开会。他很关心河北广播电视的发展，曾同我讲过不少建设性的意见。他见到乐亭县的陈俊菊部长块头亟为胖大，少说也有 180 斤重。就开玩笑说：

“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它们瞄上了你们这个‘石臼坨’，要空降占领……你陈部长要揍它，就你这么大的块头还跑得动么！”

“小跑还行吧！不过，我手下有几万基干民兵，都是‘飞毛腿’。可以说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它空降下来，我们就像‘包饺子’那样，把它吃掉了！”

陈部长的几句气壮山河的硬话，把三位首长都逗笑了。我却从徐参谋长的话里引出了很大的震惊：“石臼坨离北京不远，苏修竟想到这里空降，其战略目标显然是要直取首都北京呀！”就问徐参

谋长：“人家要空降石臼坨，那不就直接威胁到北京了吗？”没想到徐参谋长气魄更大，他说：“是啊！但是，我们不怕它威胁北京！也不怕它威胁石家庄。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思想就是人民战争。老人家早给苏修布下了一个大口袋，苏修军队不论到哪，都会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叫它有来无回！”

在接下来召开的驻军官兵座谈会上，大家主要讨论一个主题：要学会打“苏修”的“空降”。现代战争表明，用飞机成规模的“空降”军队，小者说，可以轻易阻断交通线，大者说，可以轻易占领一座城市。像苏修的现代“空降”能力，完全可以短时间内空降一个团或一个师。我们决不能轻敌，必须有陆军、空军和海军全方位的备战行动方案。当然，石臼坨的驻军就首当其冲了，大家首先要练好向空中射击的本领，不等它降落伞落地就击毙它！乐亭县的民兵主要是协助部队参加围歼。总之一句话，它要空降下来，我们不是打散它，也不是打跑它，而是歼灭它！驻岛官兵对石臼坨的攻防方案讨论得非常热烈，个个摩拳擦掌，表示要用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主义，歼灭一切来犯之敌！这时候，我这个书生以记者特有的敏感，从三首长亲自视察和部署石臼坨岛的战备中，进一步领悟到毛主席应对国际阶级斗争的伟大战略思想。解放初期，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一直打到鸭绿江边，在它要把战火引入中国的紧急时刻，毛主席发起“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反侵略战争，打败了美国侵略者，粉碎了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罪恶阴谋。苏联变修后，妄图通过和我国建立联合舰队和电台控制中国，被毛主席严词拒绝。再加上我党在国际共运中高举了反对苏共修正主义的大旗，苏修叛徒集团亡我之心不死的邪恶阴谋比之美帝国主义更甚。它们公开在我国北部边境（包括我国同外蒙的边境）陈兵

百万，做足了向中国开战的各种准备。但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洞察了美帝和苏修的狼子野心。他老人家高瞻远瞩，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要全民皆兵”、“搞好西南三线战备建设”、“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极具深远意义的准备“大打”的战备方针。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正是贯彻落实了这个伟大战备方针，我们不仅构筑了地上强大的海陆空军和广大民兵相结合的攻防网，而且构筑了遍布全国的地下长城。以石家庄市的地下空防战备工程为例，其地道之宽可以对头通行两辆卡车，并且和地上各个单位相通，同郊区农村相连。正是我们实现了这种有备无患、敢打必胜的伟大战略思想和行动准备，迫使苏修集团猖狂大喊了六、七年的所谓“突袭中国，占领北京的斩首行动”，却始终未敢出手。最后，竟像乌龟的脑袋那样缩回去了。

北京军区首长和战士们一起吃了午饭后乘直升机离岛。刘政委和陈部长陪我浏览了一下石臼坨的地貌风光。使我惊异发现这个战备“大岛”的独特之处：即这里的草长得特别高。一种名为“白毛草”，竟高过一米。另一种名为“台草”，高过一米半。还有一种“蒿草”，更超过了两米的高度。果树也有好几种，比如桑树、酸枣树、李子树……都是原始土生土长的。果子也很好吃。岛上还有很多不知名的水鸟，它们那各种不同的叫声，在果树草丛中鸣唱，犹如一台悦耳的交响乐。梦泽湖还是候鸟南北迁移休息饮水和捕食的中转地。战士们讲，草丛中有大量各种花色的鸟蛋，繁殖力亟强。他们随手就给我拾了几个花色和大小不一的鸟蛋，做为我登岛的纪念。

3、《一份珍贵的原始记录》

——记山西省抢救唐山地震伤员的动人事绩

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发生后，祖国的四面八方都伸出了热情的援手。其中山西省救治地震伤员3083人。十月初，中共河北省委和省革委派出了以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王玉同志为团长的赴山西慰问地震伤员的代表团。我做为陪同在侧的副团长之一，走遍了山西救治伤员的几十家医院，所闻所见，令人十分感动。

这是我当时书就的一份慰问时的原始记录，觉得十分珍贵，一直留存至今。时不时的翻出来看看，都禁不住热泪盈眶。为毛主席开创的社会主义中国那种人民之间“同志加兄弟”般的深厚感情，赞叹不已。现在全文录在下面，供大家分享：

山西省委和省革委对唐山地震伤员的救治非常重视。河北省慰问唐山地震伤员代表团一到太原，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主任王谦同志为首的领导班子，立刻与慰问团举行会见。省卫生局负责人向慰问团汇报了救治情况，慰问团长王玉同志代表河北省委、省革委和全省人民表示了感谢。山西省委、省革委这时也组织了一个由党、政、军代表参加的慰问小组，同河北慰问团一起参加慰问地震伤员的活动。因此，慰问团每到一处，医院所在地的地、市、县委和革委主要负责人都出面迎接并陪同慰问团一道活动。王玉团长也周到的对各地领导表示了感谢。

到山西省的地震伤员都是八月五日到九日，用飞机十八架次运来的。其中男性伤员1436人，女性伤员1647人。按职业分类，农民1680人，工人771人，干部122人，学生251人，军人37人，市民116人，其他106人。分别安排到省、地、市及军队的医院。计省直医院704人。晋中地区医院335人。晋东南地区医院342人。忻县地区医院223人。太原市医院582人。阳泉市医院389人。长

治市医院 308 人。军队医院 200 人。伤情分类为：四肢骨折 784 人，脊椎骨折 276 人，骨盆骨折 206 人，头部创伤 85 人，脑震荡 30 人，截瘫 105 人，肠外伤 273 人，多发性骨折 44 人，其他 1280 人。由于山西党、政、军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医护人员的辛勤努力，治愈率很高。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五日出院 739 人；九月十八日至十月一日出院 1299 人。死亡率很低。到十月四日共死亡 15 人。

中共山西省委、省革委一听到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就提出了“灾区任务我们帮，灾区损失我们补”的战斗口号。伤员未到，党政领导便带领群众组织了担架队和护理队。许多单位向上级表示：

“要人有人，要物有物！”当时某些药品和器械有缺口，山西省立即向商业部、卫生部和化工部求援，都很快得到了满足。许多放了暑假的学生，也组织起来到医院做生活护理员。由于地震伤员都是抢出来的，他们衣着单薄，缺这少那。山西省革委规定，每天每个伤员基本伙食标准七角钱。重伤员实行特补，根据需要提供牛奶和罐头。除此，每个伤员还发了绒衣、裤头、帽子、卫生纸和三元零花钱。零花钱供伤员买小日用品和吸烟用。忻县奇村大队在大热天给伤员们送来 1000 斤西瓜和 300 斤西红柿。定襄县色织厂工人送来了 30 多斤鸡蛋，伤员们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都满含热泪地高呼：

“毛主席万岁！”“社会主义好！”住在忻县医院的伤员们还写了一首饱含深情的诗：“糖甜不如蜜，棉暖不如皮，爹娘恩情深，不如毛主席！”

医疗单位的同志们更是精心治疗，细心护理。因为地震伤员“一级”护理多，各医院都提出了三个结合，即医生和护士结合；中医和西医结合；不同科室之间结合。还提出了三个保证：床位少先保证地震伤员；医生少先保证地震伤员；药品少先保证地震伤员。

确保了地震伤员的及时治疗和尽早出院。比如荫营矿医院在治疗伤员张志义右小腿骨折时，曾产生两种意见：一是截肢，一是保护。令人想不到的是，张志义也要求截肢。这一下倒使持截肢意见的同志更慎重了。最后经过细致讨论，终于达成一致，实行保护疗法，成功的保住了张志义的小腿。长治医院收了一个女伤员伍书贞。伍书贞怀里还抱着一个四个月的婴儿。不仅治疗很不方便，就是她喂奶也十分困难。护士赵帮荣看在眼里，急在了心上。她经过和伍书贞商量，把婴儿抱到自己家里，和自己六个月的婴儿一起喂养，还给了这个小客人三套衣服。直到一个多月后伍书贞伤好出院。为此，赵帮荣同志被誉为“白求恩式的好护士！”

第 24 章 在“既不脱产又要工作”的道路上

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文化大革命中建立起了“老中青和军干群三结合”的全新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我认为这是马列毛主义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毛主席在这里还特别指示，参加革命委员会的群众代表，要“既不脱产又要工作”。这是继曾经出现过的伟大的前所未有的“巴黎公社”模式后，毛主席开创的具有反修防修深远意义的制度设计。我做为河北省广播局（台）革委会副主任和省革命委员会常委，正是以群众代表的名义参加的。如何落实并做好“既不脱产又要工作”呢？这对我来说或者对其他同样的人来说，却是个生疏而又新鲜的问题。我对此是很动了一些脑筋的。说“既不脱产”，我认为就是不离开本职的“普通一兵”的实际工作。说“又要工作”，我认为就是在不脱离本职实际工作的前提下，根据党的领导和安排做好新职务所承担的工作。开始，社会上有顺口溜曾这样形容群众代表：“看戏坐前排，开会上主席台，工作带头干，做官不发财。”这个顺口溜从表面描述来看是不错的。但就其内涵加以分析，我认为要当好一个优秀的群众代表，只是“工作带头干”和“作官不发财”就大大不够了。它至少要必须保持这样三个特征才行：1、最根本的是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确保自己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听从党的指挥，照党指引的路线和方向前进；2、要高度自觉的坚持不脱离本职的实际工作，保持普通劳动者和工作者的本色。成为廉洁奉公，团结群众一起劳动和工作的带头人；3、既是还要做一定的领导工作，那就必须认真

切实地学好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决不能沾染那种“作官当老爷高高在上”式的养尊处优、颐指气使、搞特权腐败的令群众痛恨的邪恶毛病。同时要学好党的规章和工作方法，提高自己解决和处理所承担之领导工作的能力。

应该说，我在军管的属于机要单位的河北省广播局（台）工作，是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的。从上头来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河北省革委主任李雪峰和省革委第一副主任刘子厚同志，非常重视广播的宣传和建设，两位首长亲自嘱咐我：“你的工作主要在广播电台，广播的声音不仅是对内的，而且直面世界，这是和国内报刊宣传不同的重要一点。你一定要注意把好宣传口径，严格照中央规定的两报（指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一刊（指《红旗》杂志）的宣传口径办事，确保安全广播。其他拿不准的重大问题，因为你们是机要单位，与一般业务单位不同，更要注意请示报告，不得自作主张。”两位首长如此面对面的嘱咐，就像烙印似的刻在我的心上，我当然会咬定钢牙不越雷池半步啦！有一次雪峰同志到电台视察，他问我：“你们广播的稿子是手写纸稿，还是打印？”我答：

“是手写的纸稿。”雪峰同志很严肃地说：“如今已不是困难的战争年代，你们完全有条件用打印稿嘛！这样子播音员看得清楚，也更能防止差错。还便于长期保存。”雪峰同志对电台工作关心到如此细致的程度，令我感动不已。我立刻向军管组报告并向省革委政治部请示，为电台调配了六个打字员，实现了广播稿全部打字化。因为电台军管的这种特殊体制，省军区党委也要定期讨论和决定广播局的重大问题。比如，广播局军管组较早的实现了两派群众的革命大联合，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军管的电台中，最早照中央规定用“巴黎公社”的办法，选举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省军区党委批准后

报北京军区备案，竟引来许多兄弟省电台军管组来电求索经验。再加上省军区政委曾美将军是河北省革委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分管着包括广播局在内的所有宣传单位，老将军对电台的工作也十分关心。时不时的把我叫去讨论一番。省军区司令员马辉将军担任着省革委副主任兼生产指挥部主任，我们申报建设广播电视技术大楼，当时省里经费紧张，计委立项有困难。蔡宝峰组长和我便直接去找到马司令员汇报。马司令员非常亲切地说：“你们的技术大楼是该建。能不能采取个变通的办法？比如省广播局挤一点，你们再请求中央广播局支援一点，先把‘项’立起来。后边的缺口再由省财政托底……”这个办法我俩觉得很有可行性，便由我亲自向中央广播局汇报。到了北京，我立刻得到董林副局长的接见。因为和董林同志很熟悉，他热情地说：

“小高，你怎么连招呼也没打就跑来啦？”

“来不及招呼哩！”我笑着说：“咱家是来要饭呀！”

“要饭？”董林同志好象猜透了我的来意，又笑着说：“要饭也没看看时间？”

“饥不择食呀！就不考虑时间啦！”

“快说说有啥急事？”

我把省革委要建广播电视技术大楼的意见一说，董林同志恺然道：

“好！省革委如此重视广播电视的发展，中央局更应该支持。本来这事应在年终前考虑，你们是立项的紧急需要，咱现在就拨！你们计划要多少？”

“40万吧！”

“那咱就这么定啦！”

那时候 40 万不是个小数。立项问题就这么解决了。再后边省财政又拨了 100 万元，大楼圆满落成。由此，我同曾政委和马司令员也结成了亲密的工作关系，一直得到两位首长的亲切关怀。至于广播局（台）军管组的同志，都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锻炼出来的老领导和老同志。他们有着解放军大学校铸就的优良思想和作风。在军管工作中，正是他们悉心地培养我、支持我、信任我，我则决心争气，紧紧依靠军管组的领导和指挥，既努力做好了本职的实际工作，又比较好的履行了自己所分管的领导职责。比如，军管组确定我分管全局的广播电视宣传和全省的广播事业发展，我就既没有丢下做为编辑兼记者的工具——笔杆子，也认真履行了“三审制”（指编辑一审、中层二审、台领导三审）中我做为台领导审稿的职责。1969 年党的“九大”以后，河北省广播局（台）成为省直机关整党的试点单位。整党结束时，军管组长蔡宝峰同志当选为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我当选为副书记（注：1970 年全省整党结束后，党委改为党组，蔡宝峰同志任党组书记，我任党组副书记。党组成员有高瑞奎、邹金沧、冯光、张光、林章，王欣、魏亚明和周振峰。后又补张玉刚为党组成员、副书记）。因为领导责任更大了，我被确定协助军管组管好全局（台）的工作。

在军管七年的工作中，我深深体会到：正是军管组同志悉心地一步一步给我加担子，有力的锻炼提高了我的工作协调能力和攻关进取能力。以广播局（台）从保定迁往新省会石家庄为例，因为这项工作比较复杂，军管组独具匠心，确定由我牵头负责，却同时配备了老局长陆达同志和技术处副处长成忠顺同志，和我一起到石家庄勘察选点。此事因为发挥了“老中青三结合”的优势，选点和搬迁都做得相当顺手和漂亮，受到省革委政治部的表扬。再比如

1968 年初，毛主席提出“我们也要搞彩色电视！”全国以四机部和中央广播局为首牵头，决定以北京、天津、河北、四川和上海为战区，用自己的力量攻关，搞全国彩色电视大会战。而那时河北电子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和其他四个战区的实力相差甚远。但李雪峰同志有着迎难而上的强大魄力，他要借这个东风把河北的电子工业搞起来。便拍板由省革委常委兼省革委工业交通办公室副主任的省军区副司令员袁捷同志挂帅，组成由省计委，省广播局、省邮电局、省电力局、省国防工办等部门参加的全省电视会战领导小组。袁副司令员任组长。省广播局军管组再一次独具匠心，决定由我代表广播局参加河北省会战领导小组为组员。这个河北的彩电大会战当时称为“721 工程”。顺便在这介绍一下袁副司令员这位有着“儒将”美名的风采：他小时候就是抗日儿童团长，1938 年参加八路军。不仅是抗日的战将，解放战争中消灭蒋介石王牌军 74 师的孟良崮战役，正是他率部攻入 74 师指挥所击毙了王牌师长张灵甫。他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不仅有军事著作问世，还是国内和军中著名的书法家。列位看过 1959 年“国庆十周年”大庆的电影吗？在天安门毛主席检阅的海陆空军方阵中，那位走在最前面英姿飒爽又极其伟岸的首席“领队”，就是袁捷同志。那时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外开放的模范师师长。试想想，由他来抓彩电会战，那肯定会是战无不胜啊！在三年的彩电大会战期间，因为我一直跟随在他的身边，便深深领悟和学习到他实行毛主席提出的“群众路线”的真谛和“大搞人民战争”的伟力。袁捷副司令员首先决定由“搞社会主义大协作”最拿手的省计委和堪称广播电视人才“大本营”的省广播局出人，组成了强有力的参谋部。接着就是大张旗鼓地面向全国和全省，广泛寻找合作伙伴，招揽电视人才。因为是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

不论是工人还是知识分子都热烈响应。河北师大、河北大学、河北工学院、张家口师范学院、河北新医大学、唐山矿业学院、石家庄邮电学校等搞电子教学的老师纷纷报名登场；省市科研所、包括中央在石家庄的重量级的十七和十九研究所专搞电子研究的工程师也竞相出马请战。一批年轻的学电子的大学生和“电视迷”更成为冲锋陷阵的尖兵。河北新医大学物理系杨贤等几位老师，主动请缨攻关生产电子枪。邯郸汉光机械厂是专门为海军潜艇做潜望镜的，他们非常愿意承担做彩电分光棱镜的镜头。华北药厂玻璃分厂是做各种药瓶的，他们非常愿意承担研制彩色显像管的的任务。国防工办的3302机械厂和太行机械厂，则非常愿承担彩电需要的机加工件、摄像机云台和机柜。袁副司令员还有独特的一手，就是派专人到最强势的北京战区和上海战区，同他们一块攻关，既当小学生又担任沟通技术创新的联络员，确保河北的彩电技术水平和质量向先进看齐。这么一来，基础簿弱的河北省，一下子竟众志成城，涌现了一个全方位攻关彩电体系的老中青三结合的亟富生气的战斗团队。按照各配套环节制订的方案，大家比翼齐飞，攻关进度更是出乎意料的快。比如省广播局以重量级高级工程师黄嘉礼和周玉琴为核心的技术团队，他们承担的彩电发射机、彩色摄像机和电视电影机的攻关任务，不过半年就出成果了。汉光机械厂只三个月就拿出了分光棱镜。华北药厂玻璃分厂只五个月就拿出了彩色显像管。以“爱钻研”出名的省广播局技术员杨振生，被派往全国走在最前列的北京战区学习并参与攻关。当时北京战区正热烈论证中国彩电发展采取哪种制式。工业先进的美国、法国、西德和日本，都有先进可靠却又各有千秋的彩电制式，比较起来大家都认定中国实行西德的pal制式较好。我们的杨振生同志见识极为敏感，闻此，他竟率先一步

进入角色，硬是在一没西德样品、二没西德图纸的困难情况下，靠着彩电制式原理的指引苦心钻研和测算，成功地用自己的头脑和双手，结合中国实际拿出了西德 pal 的制式样品。为彩电事业的整体推动，特别是确保接收机的匹配生产提供了前提条件。从这样的发展速度来看，河北战区下半年完全有信心完成各配套环节的联通测试。身在这个红红火火大会战中的我，虽然不是什么电子专家，但在袁副司令员的麾下，却锻炼成了一位能够有效进行“人际攻关”的组织者和协调者。

1968 年九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对广播的题词：“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中央广播局立即响应，建立“6895 工程”。发射阵地就设在了石家庄西部的太行山区。为此，中央广播局副局长董林同志就“6895 工程”的管理问题，征求我的意见。他说：“美帝、苏修开动广播机器对准中国，妄图用它们的腐朽思想和修正主义来腐蚀中国人民。我们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以更大的广播机器‘6895 工程’，对准美帝、苏修。这个工程战略意义重大，平时对这个工程的思想政治管理和外围的治安管理，我们想由河北省广播局代管，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大，代表省广播局表态应该慎重。就进退有据的表示：“如此重要的工程建在河北境内，是对河北的重大信任。凡是用得着我们的事情，我们肯定会大力支持。但就这个重大工程的代管，我倒有点另外的想法，因为其中涉及治安管理，我个人意见，还是请省革委决定。如果省革委责成当地革委代管，我想会比我们代管更为有利。”董林同志最终同意了我的意见。在请示报告省革委政治部后，决定由石家庄地革委党的核心小组代管。

1968 年九月初，刘子厚同志给我打招呼说：“根据毛主席‘工

人阶级要占领上层建筑’的战略部署，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军宣队”）要进驻你们新闻系统，领导斗、批、改的全部工作。这是文化大革命涌现的又一伟大新事物。你们一定要有高度的自觉，热情欢迎，积极配合，以小学生的身份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千万不能出问题。中间遇到什么问题，要及时向省革委请示报告。还有，河北电台仍有一些同志滞留保定闹无政府主义，七、八个月了，就是不到石家庄来。雪峰同志和北京军区郑维山司令员，已指示保定38军做他们的工作，送这些同志过来。我想38军一出面，不用说他们就来了。来了就好，来了就要热情欢迎，不能有任何歧视。要在工、军宣队的领导下，搞好大联合，搞好斗批改。”

其实，我对子厚同志的招呼和指示，早有一定的准备。因为“工军宣队”在北京的教育战线和科技战线早已先行一步进驻了。河北新闻战线进驻只是迟早的事，便诚恳表示：“请子厚同志放心，我一定努力做好。”

事情来得真快。九月八日，在李雪峰和刘子厚同志亲自支持下，工、军宣队进驻了省直新闻单位——河北日报、河北电台、新华社河北分社。因为河北美术印刷厂有印制毛主席像和画报的任务，政治上比较敏感，也归入了新闻系统，由工、军宣队进驻。工、军宣队的阵容很大。由井陉煤矿和石家庄国棉三厂的几十名工人和解放军干部组成。总指挥由井陉矿工人、省革委常委赵书茂担任。军队方面由63军某炮团团长高振龙担任指挥部政委。63军某独立营政委刘永君和省电台军管组负责人、省军区宣传处副处长白光任副政委。国棉三厂强秀英任副总指挥兼河北日报工宣队长。井陉矿工人王海镇任副总指挥兼河北电台工宣队长。三家新闻单位和美术印刷厂都

召开了欢迎工、军宣传队大会。表示衷心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和工人师傅的再教育。工、军宣队负责人则宣布接管与斗批改有关的全部权力。尽管我们对此都有相当的思想准备，但有些问题思索起来，在实践上，军管组和我本人还是有点解不开的难题。比如，工、军宣队的权力实际上是领导一切了，这和军管组原来的“领导一切”又如何统一？再比如电台 1967 年三月成立了革委会，它和工军宣队的工作又如何协调？还有，电台的主管上级是省革委政治部，它和工、军宣队指挥部之间又如何衔接……好在我和赵书茂总指挥早在省革委常委开会时就熟悉了，说话也不隔口。便和他进行了沟通。没想到我们想到的难题，在他那里根本就没有挂号。他猛丁抛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指导思想：“你们过去的一切框框要统统砸烂！河北日报和河北电台合并，一个班子领导，一套稿子同用，既精简了机构又减少了人！”听到他有如此惊心动魄的盘子，我一下子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了。心里说：“莫非雪峰和子厚同志也是这么想的？可我同他俩接触不少，从来也没听到他俩有这样的想法呀！我和中央广播局的领导也有一定的接触，同样也没听他们露过要和人民日报合并的意思呢！再说咧，广播和报纸虽同属新闻单位，但各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和特点，斗批改怎么能如此简而单之的搞合并呢……幸运的是，驻电台的工宣队长王海镇同志却相当稳健。他很尊重军管组和革委会。我们一见面就洋溢着亲切和谐的气氛，根本看不到赵书茂总指挥那种‘统统砸烂’的气魄。”就委婉地告诫他说“你小赵同志是不是太勇敢了？如此惊人的指导思想和动作，我劝你还是慎重点好。多开点调查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单是你那‘统统砸烂’的提法就不辩证呀！也很难行得通。比方说，电台革委会是去年三月成立的，省军区党委批准并得到省革委承认的，

你也要砸烂吗？”

“当然要砸烂重来。你那里边没有工人阶级嘛！”

“没有工人阶级可以补充，但你却无权砸烂。如此重大的问题，我建议咱俩去请示雪峰和子厚同志！”

“可以！”

赵书茂敞快答应。这事很快就拿到了雪峰和子厚同志面前。在场的还有省革委常委、63 军副军长徐信同志。我俩分别汇报情况之后，徐副军长是军人脾气，开口就批评赵道：“革委会是文化大革命的新事物，你怎么能随便砸烂呢？”赵一听这话马上退却了，忙推说：“我没说砸烂革委会，只说砸烂一切旧框框……”徐副军长又批评道：“旧框框也要分析，不能统统砸烂呀！”雪峰同志和子厚同志没有明打明的对赵进行批评，只是和蔼的正面引导。最后雪峰同志结论道：“斗批改是伟大的战略任务，希望工、军宣队胆略要大，但步子要稳。过去的规章制度也是一定实践的结果，不能统统砸烂。要有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分析。要砸烂和破除的只是不符合需要和发展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这就需要做细致的调查研究，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决不能简单从事。你们可以到上边跑一跑，到兄弟省跑一跑。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样我们确立的改进和改革才有生命力。至于工、军宣队的领导问题，根据广播电台的实际，可实行分工合作相结合的原则。军管组主要负责电台的内外安全，确保安全广播；工、军宣队全权负责政治运动和斗批改的领导工作；革委会主要是配合军管组和工、军宣队抓好行政事务和广播事业发展及技术业务。但分工不是分家，一定要密切合作。希望你们创造三位一体、团结合作的经验。”对雪峰同志的指示，我们心领神会。出现在萌芽的不同认识遂迎刃而解。回到电台我向军管组和工、军

宣队汇报了雪峰同志的指示，大家都很高兴。在后来的工作中，三家分工合作得很好，被省革委政治部评为“三位一体团结战斗”的先进单位，河北日报发文做了表彰。

九日十二日上午，滞留保定的四十位同志除少数几个人外，全部乘火车归来。我们在工、军宣队领导下，到车站热情迎接。我第一次感受到毛主席支持的工、军宣队的巨大威信和感召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车站到电台不过半小时，原来誓不两立的群体，就在座谈会上，满涵热泪的各自进行自我批评，握手言和。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工人师傅急匆匆地过来，默不作声地把我拽走。一路上，他小声对我说：

“快走，快走，冯志同志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我急着问。

“他，他上吊了。”

“啊？”听工人师傅这么一说，我震惊至急，大叫道：“救下来没有？”

工人师傅没有直接回答我，只是说：

“白处长、海镇队长……还有公安局的，都在那里呢！”

他领着我大步流星地往前走。等我来到冯志同志的宿舍，就见冯志同志平稳地仰卧在床上，双目紧闭。工军宣队副政委白光同志、工宣队长王海镇同志、电台业务处长杨泽仁同志，都心情沉重地守候在旁，还有两位公安局的同志正在例行公事。我急切的问：

“救过了没有？”

“发现得晚了，没救过来。”

白副政委、王海镇队长和杨泽仁处长异口同声地说。接着白副政委给我介绍了两位公安局的同志，其中一位是法医。这时我又禁

不住问：

“法医同志，能不能再进一步抢救？”

“不行了。”法医同志郑重道：“已经做了力所能及的抢救。”

这时，另一位公安局的同志说：“各位领导都到了，我们共同检查一下死者的遗物。”他先是从冯志同志的胸兜里掏出了一张白纸和一封没写完的信。大家轮流看了一下。白纸上写的是写给大儿子玲玲的遗书：“玲玲，爸爸身体实在顶不住了，不得不走这条路。你千万不要埋怨任何人，要好好学习，为人民服务。”那封没写完的信，是写给他的爱人苑莎同志的，两句基本的话我至今记得：

“苑莎，你不听我的话了，老在外边跟着 xxx 跑什么……”除了这两纸文字，冯志同志的宿舍因为是照顾夫妻关系临时安排的（注：当时电台刚迁来不久，宿舍十分紧张，只能先临时安排）的一间房子。屋里除了两张床，没有更多的东西。公安局的同志说：

“冯志政治上有什么问题没有？”

“没有。他刚刚从省革委办的学习班回来，就要工作了。”

我们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

公安局的那位同志接着说道：“看来冯志是属于意外的自杀死亡。你们可以通知家属前来处理后事。”

遗憾的是，苑莎同志接到通知后并没有前来，尸体火化是组织上代为办理的。

这件事，工军宣队指挥部政委高振龙同志也非常重视。他反复了解冯志同志自杀前后有何异常变化。众多的同志说：“到车站迎接保定回来的同志，冯志也高高兴兴地去了。结果，等保定来的同志一下车，他发现自己的爱人并没有来，脸色就变得忧郁了。在大家回到电台举行座谈的时候，他便离开了座谈会场，当时都认为他

去“方便”啦，谁知他……“

苑莎同志一直没有回来。还是后来见到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的一个批件，才知道她在上访，控告电台工军宣队和革委会迫害死了冯志同志。江青同志在她送的材料上批示道：“冯志这个人我不认识。他的书我读过，是写得好的。不过，我总感到冯志死得不明不白。”河北省革委见到江青同志的批示不敢怠慢，便组织强大的专案组进行彻查。不用说，电台的工军宣队和革委会也成为被审查的对象。专案组的同志和我们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问道：“冯志到底受了怎样的迫害，你们要如实地向组织交待！”

我们当然以对组织高度负责的态度如实回答：“冯志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具体就是 1966 年八月到十一月，被电台一个所谓的官办文革筹委会以‘周扬的徒子徒孙’和‘陆达（电台台长）反党集团分子’的罪名揪了出来，挂牌子戴高帽游院示众，冯志同志不服，曾多次被批斗，关押近三个月之久。”

“请你们回答电台革委会和工宣队是如何迫害冯志的？”

专案组一下子非常明确地点到了革委会和工军宣队头上，我们也非常明确地回答道：

“工军宣队和革委会没有迫害过冯志。当时工军宣队进驻电台不过三天，冯志同志刚从省革委学习班回来，就要工作了。工军宣队正忙着准备迎接保定回来的同志，做革命大联合的工作。没有任何理由和时间去迫害一个已经站出来就要工作的同志。至于革委会，它一成立就是旗帜鲜明公开保护冯志同志的。送他到省革委办的学习班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再往远一点说，从关押大屋里解救他，到支持他去中央文革文艺组去编写革命样板戏，也都是参加革委会的军代表、群众代表和革命老干部顶着某些人的派性逆风进行的。这

一点，不仅电台的群众知道，就是苑莎同志本人也十分清楚。既然这种无中生有颠倒黑白的帽子已经扣了过来，我们欢迎并要求上级彻查到底，还蒙冤者以清白。”

有道是，“事实胜于雄辩！”河北省革委专案组进行了彻底的严细的调查，终于洗刷掉了泼在我们身上的污水，再一次确认了市公安局开始做出的结论。后来，我听工军宣队指挥部白光副政委说：“专案组和苑莎同志见了面，公布了调查的结论。苑莎同志对自己听信传言做了自我批评。”顺便补述一笔的是：河北日报记者张 x 华同志在 2005 年九月十四日发表的文章说，“冯志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迫害致死。”这完全是违背历史真实的。我要非常明确地说：“江青同志是高度信任和肯定冯志同志的。‘文革’中借调冯志到中央文革文艺组编写革命样板戏，正是江青同志点名通过军方给河北省军区驻河北电台军管组下的命令。何来‘四人帮’‘迫害致死’一说？”

现在回过头来，继续说毛主席讲的“既不脱产又要工作”的题目。就在我们的电视发展攀登新台阶的关键时刻，总工程师黄嘉礼同志突然找到我，说他想调动一下工作，要求我帮助他和军管组美言几句。还说要去的地方是天津市广播局。我一听这个顿时惊诧不已。心里说：“老黄工作得一直顺风顺水，他咋会突然提出要调动的要求呢？”就大感不解地问：

“咋回事呀？你老黄一直工作得好好的哟！，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解不开……咱俩交交心好不好？，如果是我们有啥做得不对头的……就敞口批评，我们一定努力改正么！”

老黄忙摆摆手说：“噢，我对领导没意见，只是我的两个孩子一直在天津，就是想换换环境……”

“如果说老兄只是想‘换换环境’，那我诚恳地告诉你，省广播局（台）军管组和革委会对你是既信任支持又关心热爱的。认为你是新中国诞生后较早参加河北广播建设有贡献的知识分子之一。这样的政治和生活环境肯定不会比天津差呀！今天，让我把话说白了：河北的广播建设非常需要你呀！就你个人来说，我想——老兄也难舍这个自己洒下了大量心血和汗水的河北广播阵地吧？就凭这两条，我决不会答应你走，我想军管组也决不会同意你走。你看——咱俩达成一个君子协定好不好？我也别和军管组说了，你老兄就干脆彻底地放弃那个想调动的要求吧！”

“那——你小高说到到这个程度……”老黄苦笑道：“我还能说啥？只得按照党性原则，同意你的意见啦！”

不久，老黄的爱人罗捷同志的工作问题出了点差头：她当时和省广播局的一批同志正在省唐庄五·七干校学习锻炼。省广播局军管组和革委会不只一次的表示：同志们学习锻炼结束后，欢迎大家继续回省广播局工作。但当时省毛泽东思想展览馆落成，罗捷同志被首选为毛泽东思想解说员，罗捷本来也很高兴。可突然间展览馆变卦了。老黄为这事很着急上火，就跟我说了。我安慰他道：“你别着急上火。展览馆那里变卦了没关系，罗捷就仍然回咱广播局工作么！”后来，罗捷同志回到了河北电视台，主持少儿文艺节目，搞得有声有色。再后来又搞电视剧编导，她成为河北勇于进取的优秀导演之一。

河北省的彩色电视大会战，到1968年十一月，我们靠自己的双手成功完成了从彩色中心指令到传输发射，再到彩色接收的科学联通，且图像质量很好。这时，中央通知五大战区携自己的全套设备于12月1日进京演示。既是向毛主席12月26日生日的献礼，也是

五家比学赶帮、取长补短的技术交流。袁副司令员指示由我带队。省广播局军管组再一次独具匠心，又加派了我们的总工程师黄嘉礼同志全程协助我。这一个月多的演示证明：五家可谓各有特点和专长。而河北有一项鹤立鸡群的震动，即我们的彩色传输制式能保证彩色还原质量，彩色显像管能耐 21000 伏的高压（其他战区只能达到 18000 伏）。当然各战区都有一个共同的本质，即它是中国自力更生建设和创造的属于中国自己的彩电事业。因为召来北京逾万人的参观，此事震动很大。都为祖国有了自己的彩电事业而欢呼雀跃。演示结束，我们胜利归来。又向省会石家庄各界进行了演示，省革委李雪峰主任等领导同志和大家一起参观，雪峰同志并发表重要讲话，要河北彩电会战再加一把劲，彻底夺取河北实现彩电化的全胜。

因为我分管全省广播事业的建设，在那个时候，广播在农村最普遍的工作是发展以县广播站为中心的有线广播网。从 1974 到 1977 年，我们以现场会的形式，在临漳、获鹿、望都、固安、故城和围场召开了六次全省农村广播网会议。每次我代表省广播局在会议上的主题讲话，都是先由省局党组讨论初稿，然后报省委宣传部审定。因此，全省农村广播网的发展是迅速而又健康的。到 1977 年底统计：农村有线广播专线 109761 公里，比 1969 年增加三倍以上。全省公社放大站发展到 3637 个，县至公社通播率为 99%；生产大队通播的 47597 个，通播率为 94.8%；入户小喇叭 584 万只，入户率为 60%。在全国居上游。一位台湾来的商人在看了我们的农村广播网后，激动地说：“大陆农村几乎家家通广播喇叭，这是完全的信息传播现代化，堪称世界奇迹呀！”

第 25 章 突然迎来筹建河北电视台的光荣任务

1968 年九月的一天，我迎来一个令人鼓舞的光荣任务——筹建河北电视台。这里有一段相当传奇的故事，直接涉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北局第一书记兼河北省革委主任李雪峰同志。而故事的缘起则是来自中央广播局的一个电话。

这天上午，中央广播局军管小组组长刘路明同志给他过去的老战友——时任河北省革委办事组组长的黄夷同志打电话说：“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停办，学校有一套电视设备和一批技术人员，完全可以办一个电视台。有几个省想要，我们的意见先紧河北，你们能不能捷足先登呀！”黄夷同志是从中央华北局调入河北的，他不了解河北的广播情况，就回答说：“河北广播的情况我还不熟悉，等我和省广播局谈一下，再告诉你。”放下电话，黄夷同志就用电话找到了我，把刘路明同志来电的情况一说，我竟高兴的回答道：“这应该是求之不得的天大的好事啊！现在全国有二十几个省都还是电视空白呢……”黄夷同志听我这么一讲，忙说：“那你们快给中央广播局军管组回个电话。”

我在当时全国正在进行的彩电大会战中，早就和中央广播局军管组副组长戴征远同志熟悉了，便立刻就把电话拨给了他。他一听我说到这个问题，就乐哈哈地说：“有这回事。这套设备也有别的省想要。但我们讨论了个意见，先紧你河北省。咦，你们要的话，还要付四十万元的设备费。有 16 个电视技术人员要随设备调给你们。”我一听要付四十万的设备费，还要随设备调入 16 位技术人员，这事太大了，就慎重道：“请戴副组长给我一点时间，容我请示一

下，下午上班我就向你报告结果。”放下电话，我先向军管组请示报告。军管组负责人白光和军代表宋进义、李连生同志，竟高兴地异口同声表态：“这太好了，河北就要有自己的电视台了么！不过，涉及四十万元拨款和扩大 16 个人的编制，咱们无权定夺，你得快给省革委写个请示报告。”

“写报告传递有点慢了。”我忙着建议道：“为防止夜长梦多，出现别的变数，是不是用‘急事特办’的惯例，我亲自跑一趟，直接向李雪峰主任报告。”白光同志说：“你这个建议很好。而且你直接去还很合原则。不过，为了防止其他变数，我意见在雪峰同志拍板后，我们要派技术处成忠顺副处长持省革委公函，到中央广播局砸实此事。”大家也都觉得白光同志的意见很好。这时候已经到中午 12 点了，我简单吃了点东西，就给雪峰同志的秘书黄道霞同志拨了个电话。把这件“特办”的“急事”同他讲了，要求立刻就向雪峰主任汇报。黄秘书说：“雪峰同志已经午睡了，下午来谈好不好？”我着急道：“不行！我跟中央广播局讲好下午上班要报告结果。”因为我跟黄秘书特熟，就硬是缠着他不放。他终于答应立刻向雪峰同志通报。也真是幸运非常呀！雪峰同志竟立刻表态欢迎我过去。我驱车到了雪峰同志的办公室，只见他穿一件乳白色的睡衣，正端坐在沙发上等我呢！“

“对不起，雪峰同志！”我歉意地说：“打扰你休息了。”

“不要这么讲呀！工作第一嘛……”雪峰同志招呼我坐在他的旁边，又道：“我很喜欢你们年轻人这种急事快办、雷厉风行的朝气！”

我直入主题，详细汇报了中央广播局军管小组正副组长来电的内容和省广播局讨论的意见，雪峰同志明确表态：“这是一个难得

的机遇。你们很敏感，抓住了就不撒手，这很好么！我认为：不论从哪个角度讲，包括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社会进步，电视台较之其他新闻媒体，会发挥更大的推动作用。请你们向中央广播局转达我的意见，感谢他们的大力支持。16 电视技术人员我们都要，四十万元拨款我们财政照付。还有，你要亲自跑一趟，把设备拉回来，把技术人员接回来。把新同志的生活安排好，还要开个欢迎会。”

听雪峰同志这么一说，我高兴极啦！忙说：“是否请黄秘书把你的指示和意见通报给省相关领导同志和部门……”

“不，你是常委么！由你去亲自通报。这样会使其他领导同志和部门更加了解你们，更加支持广播电视的发展。”雪峰说到这儿，又嘱咐了我一句：“我这意思……你明白了吧？”

“明白，明白。”我不由得站起来告辞道：“一定照雪峰同志的指示办。现在上班时间还差点，你再休息一会吧！”

“不，今天中午不休息了，我们再扯扯这电视发展的意见。”

雪峰同志这么一说，我忙着又坐了下来。只见他面带思索地像是对我又像是自言自语道：“我们排排位，现在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我知道北京、上海、天津……有电视台，其他省还有哪有呀？”

“还有广州吧……我们建起来应该是第五位了。”

“那……我们要注意向他们取经，力求办得快些，办得好些。现在设备和技术人员都有着落了，是不是还得盖些房子，进点缺口设备？”

雪峰同志想得如此细致，我非常感动。只得意向性地回答道：“我们有个初步意见，院里有个旧礼堂可以改造使用，先因陋就简

地办起来，叫省会周围县区看上电视。下一步再设法扩大发射功率，扩大覆盖范围，建规范的广播电视技术大楼，进些必要的缺口设备。”

“好啊！从初级到高级一步一步向前发展。盖技术大楼就要从长考虑了。比方说，现在是黑白电视，下一步要进入彩色电视了。现在全国正在搞彩电大会战，估计速度会很快。你们要有个目标规划……”说到这里，雪峰同志好像又想起了什么，他探询着问：

“电视台建成后怎么称呼呢？北京电视台是中央的，它称‘北京电视台’，后来才改称中央电视台。我们这个河北的，我看也仿效中央的模式，可先叫‘石家庄电视台’，等发展大些了再改称河北电视台。”

听了雪峰同志这些具体而深刻的指示，我的思想就像长了翅膀，一下子飞到了北京，飞到了波光闪烁的电视机房，飞到了高耸入云的发射铁塔。这时候我十二分的确信，不管筹建中还会遇到什么困难，一个平地而起的新的电视台，必将诞生在我们手中！

回到电台，时值下午三点。我简要地向军管组做了汇报，便立即给中央广播局军管组戴征远副组长打电话，转述了李雪峰同志既明确而又干脆的意见。并代表他和省革委表示了对中央广播局的感谢。戴征远同志谦虚地说：“雪峰同志讲话了，我们就是一句话，全力支持和照办！你们来办手绪好了。”落实到这样的程度，为了万无一失，我们还是派了技术处副处长成忠顺同志，持省革委公函到中央广播局的主管部门砸实此事。看来这一手还真做对了。成忠顺同志来到做具体工作的主管部门，他们还真是另有所想。说：

“设备并不完备，拉去也不能用”。还说：“有的省想要的请求比你河北要早，领导上需要再商量”。成忠顺同志非常执着。他据理

力争没有说下对方，就执意要见军管组长刘路明同志。当时找不到刘路明同志，他就去食堂等候。终于等到了刘路明同志前来就餐。刘组长再一次明确表态：“此事早定了，你们不要听信他们的那些说词，就是给河北！”从此，这个小小作梗的插曲立马烟消云散。

落实了北京了这头，我又打电话给省革委政治部谷奇峰副主任和省财政局王局长，就 16 名技术人员的编制和四十万元的财政拨款，传达了李雪峰同志的指示，得到的回答是“全力支持和照办！”接下来，我采取走访的办法，逐一会见了省革委的副主任刘子厚、马辉、曾美、张英辉、杨磊之和秘书长王金山同志，他们听了河北就要建电视台的喜事及雪峰同志的指示和意见，竟是皆大欢喜。都是一个字：“好！”并且异口同声的嘱咐我：“这是一件大事、新事和喜事，希望早日建成、办好！”。

有了省革委如此强大的领导和支持，雪峰同志的每一项指示和意见都在紧锣密鼓地落实着。我们首先委任了张庆林、徐丙跃和北京 16 名技术人员的“领队”王平福同志为电视台的临时负责人，并组织筹备班子，进行旧礼堂改造的基建和新电视技术人员的培训。而北京来的 16 名技术人员，则成为河北电视台的首批骨干力量。他们做出的创始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现在我把他们的名字列下：王平福、翟世德、陈增来、陈殿武、刘录海、黎德章、谢永贤、胡恩海、于明川、杜时雨、张吉庆、庄兆英、阮万豹、钟树帮、吴文霞、李国然。这 16 位同志在河北电视台的创建史上留下的光荣一页，后人将永远铭记。其他建设性工作都是依靠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在相关部门和单位的大力支持下展开的。比如拍电视片需要摄像机，当时国产摄像机尚未过关，省计委便安排计划拨外汇进口；交通工具不够，省机关事务管理局立即拨给一辆“北京吉普车”。架 75 米

高的发射铁塔，因技术难度较大，石家庄市工交办公室推荐实力强大的煤矿机械厂奋勇上阵。就是靠了这种群策群力、奋勇进取的实干精神，不到半年，一个使用一千瓦发射机、覆盖石家庄周围郊县的“石家庄电视台”于1969年二月十六日晚上正式建成播出。这一天正是农历的大年三十。这个双喜临门的消息一传开，省会观众看到河北自己建设的电视台开播，欢呼雀跃。当时电视接收机还很少，各机关、学校和企业都把自己的电视机搬到大门外供群众观看。省广播局更把自己购到的部分接收机放到了大街上，形成了“长龙式”观看的一景。一位名叫郭树基的“电视能人”，看到小小的屏幕前人头攒动，十分拥挤。他突发奇想，连夜组装了一个四面都是屏幕的电视接收机，同时可供一百多人收看，成为当时轰动的新闻。这种对电视节目如饥似渴的现状，使我们认识到，必须用最快的速度提高发射功率，扩大覆盖面积，进一步满足全省群众收看电视的愿望。就在这时，我摸到中央广播局有一台报废的7.5千瓦的电视发射机正在仓库里“躺”着，我就同技术处成忠顺副处长和总工程师黄嘉礼同志商量，咱能不能要来加以改造修补，为我所用？成副处长和黄总都说：“可以，虽说改造修补会费点劲。但要是把它搬到咱307中波高山发射台作业，肯定会事半功倍，一下子就能覆盖到河北中部的广大地区。你小高同志可以出出马，把它要过来，咱们破破这个题！”我立马进京找董林副局长索要。董副局长笑着说：“你小高消息好灵通呀！还想着那个没有搞成功的‘老废品’，我都把它忘了。你们却想着要废物利用，这倒是件大好事哩！你们可以把它拉走！”

这台没搞成功的“报废”发射机很快运到石家庄，交给了以总工程师黄嘉礼为首的技术团队。大家提出了“奋战半年，用7.5千

瓦发射机转播北京天安门国庆20周年庆典的战斗目标”。就这样，经过大家开膛破肚式的改造修补，真的奋战了半年便大功告成。我们把它搬上了设在获鹿县（今鹿泉市）海拔八百多米的封龙山 307 中波发射台，又在山顶竖起了 30 米高的电视发射塔，就选择十月一日这个光辉日子，第一次以 7.5 千瓦（比原来的一千瓦高 6.5 倍）的大功率，转播了首都军民游行庆祝国庆 20 周年的盛况。让广大人民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招手检阅的光辉形像。咦，实践也真的证明，它完全实现了覆盖河北中部广大地区的目标。为此，省革委李雪峰主任、马辉、曾美、张英辉副主任都来电话表示祝贺。省革委政治部主持全面工作的副主任赵江同志（原解放军炮五师政委），还专门到省广播局进行慰问。称赞省广播局是一个团结奋斗、勇于攻关的战斗集体。指示河北日报发了表彰消息。写到这里，我要补述个人生命史上的另一件大事：在国庆 20 周年大庆的前夕，我被省直系统以“优秀知识分子”的名义，评选为国庆观礼代表，光荣地登上了北京天安门的观礼台，看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工农兵大军的盛况，并应邀参加了周总理举行的国宴，进而同全国的观礼代表一起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

有了改造修补 7.5 千瓦中型发射机成功的创举，这使省广播局军管组长蔡宝峰同志很开脑筋。他对我说：“我们有了改造成功 7.5 千瓦中型发射机的经验，完全可以借全国彩电大会战的东风，向中央电视台看齐，搞个 20 千瓦的大型彩电发射机嘛！一步到位实现覆盖全省的宏伟目标！”我非常赞赏蔡宝峰同志的建议。他的建议也正碰全局干部和技术人员的心坎。以黄嘉礼为首的技术团队再一次上阵，奋战五年，终于靠自己的双手，自行设计，不用一个进口件，把全国第一个省级 20 千瓦的彩电发射机研制成功。全局上下，从军管组

长和军代表，到革委会委员和主任，还有省革委宣传组组长苏跃先老同志，都亲自出马和群众一起，用手提肩扛的办法，攀登着羊肠小道，把设备的大小部件搬到了封龙山顶。特别是那个 100 米长、碗口粗的馈管，因为不能打弯，竟是 100 多人一溜长蛇阵的扛在肩上艰难攀爬运上去的。这里我还要讲一个动人的小故事：当 20 千瓦彩电发射机在高山顶机房调试的时候，省粮食局牛振国局长了解到技术人员的食油指标很低，立刻给批了四十斤食油送到了省广播局。就是靠了这么一种众志成城的威力，1975 年元旦我们以极其优良的性能和质量正式开播。成为全国第一个和中央电视台同样功率的大型电视台。这件事引起很大震动。新华社河北分社副社长、资深记者刘方辰同志闻讯后，他以十分饱满的热情前来采访，并向中央发出了《内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姚文元同志立刻在这份《内参清样》上作了批示：“请中央广播局去看一看，如属实要推广他们的经验。”中央广播局看到姚文元同志在《内参清样》上的批示，副局长董林同志立即率专家前来考察。在对 20 千瓦发射机的性能和质量给予充分肯定后，中央广播局以“河北省高山建大功率发射台”为典范，在石家庄召开了全国现场会议进行推广。

就在省局 20 千瓦大型彩电发射机轰开局面后，省革委秘书长郭志同志前来慰问。他在表彰了省广播局（台）广大职工创造的光辉业绩后，问我还有什么问题需要省革委解决？我提了几条：1、建议省财政拨点款，给 307 高山发射台修一条简易公路；2、再增配一辆上下山的越野车；3、事业大大发展了，人员编制需要扩大一下。家属宿舍太紧张了，需要改善一下。郭秘书长全部答应。这里出手最大的是人员编制一下子扩大到 500 人。家属宿舍由省财政拨款连续给广播局盖了五座家属楼。正在兴建的省革委同意托底的广播电视

技术大楼，建筑面积 8491 平米，这时缺口资金差 100 万元，我找到分管宣传的省革委副主任马杰（驻石家庄 27 军政委）同志，要求拨款，他高兴地问：“你小高就要 100 万呀？要 200 万也应该支持哩！因为你搞的是百年大计的事业，而不是楼堂馆所呢！”这座能防八级地震的广播电视技术大楼从 1972 年 10 月破土动工，到 1977 年落成，一下子改变了原来那种因漏就简不能适应广播电视现代化发展的迥况。因为在全国是领先的，北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等省市广播局长都前来参观取经。

顺便说一下，河北省的彩电会战在彩电接收机的生产上出现突破性进展。省会战领导小组顺势责成华北药厂的玻璃分厂建立了石家庄“彩色显像管厂”和“石家庄玻壳厂”。同时责成石家庄市电子工业局以原广播服务部和像章厂为基础，充实彩电技术力量，建立了石家庄电视机厂（即后来的环宇电视机厂前身）。应该说，石家庄电视机厂的建立，是当时中国继上海和天津批量生产彩电接收机厂的第三家。1973 年秋，石家庄首批用国产件生产的彩色电视机，应中央四机部和中央广播局的要求，送到了北京中南海，供中央领导观看。这么一来，石家庄生产的彩色电视机，名声鹊起。在当时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因为群众彩电需求量极大而生产厂家又很少，群众想买个彩电比登天还难。竟至“走后门”求购彩电成风。为此，河北省委不得不做出煞风的规定：有“个别的特殊需要者”必须经省委批准才行。这年十月，我到长沙参加全国广播网会议，湖南省广播局副局长韩晓瑞同志找我，要求给他们价拨两个彩电。我为难地说：“你要早点讲，我还能做到。如今‘个别的特殊需要’，批准权已经拿到了省委，我可不敢保证哩！”韩副局长说：“那你可以和省委请示一下嘛！我们要的这两个彩电，一个是工作用机，

一个给韶山毛主席的老家，我想河北省委会照顾的。”韩副局长讲到这个程度，我只得当场给省委常委尹哲同志打电话请示，尹哲同志立刻高高兴兴地批准。韩副局长便高高兴兴地笑了。

写到这里我想告诉大家，就在新中国彩电事业突飞猛进的辉煌时刻，华国锋武装政变、邓小平复辟上台，又开始实行刘少奇那个“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洋奴路线。宣布废止毛主席提出的“我们也要搞彩色电视”的自力更生路钱。从此，日本、美国和欧州的彩电生产线和产品充斥中国。不仅让外国资本家赚足了中国的钱，更要命的是窒息了社会主义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动力和能力。这又是一个改革开放造就的沉痛教训啊！

这一章我讲得有点过细和拉杂，是因为进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年代，河北省广播局 1995 年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公开出版了一本《河北省广播电视年鉴》。这样一本应该严肃和严谨的史书，竟然不顾马列毛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修史必须“坚持客观真实”的根本原则，硬是把广播局当年轰轰烈烈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粗暴地开除了“史籍”。全书对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整整领导省广播局七年的军事管制小组和由军管组主持通过“巴黎公社”方式选举诞生领导了十年的广播局（台）革命委员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竟不著一字。虽然对这十年的建设项目和事业的飞跃发展都提到了，但用了个模糊概念，好像这些成就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产生的。明眼人一看便知：即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河北省广播局好像没有发生过，七年的军事管制体制和十年的革命委员会权力机构没有存在过。一句话，河北省广播局（台）十年之中竟成了没有任何权力机构的奇特空白。难道这是邓小平控制的特色党中央有这种指令要把“文革”开除“史籍”吗？我想不是。因为邓小平虽然

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但他却从来不敢否定和抹掉高举文化大革命的党的“九大”和“十大”的历史合法性！而在这个过程中，邓小平曾复出并高升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并兼任了军队总参谋长。有趣的是：邓小平在 1977 年复辟篡权后，仍然没有忘记把这些“文革”中的升职做为自己的光环正式载入史册而大加显示。那么，是不是邓的干将河北省委对省广播局有如此指令呢？我想也不是。因为河北省委组织部和省档案局联合出版发行的《河北省组织史》，文化大革命形成的河北省革委、省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及其负责人名单和各地、市革委、党组及其负责人名单，那是一应俱全的刊登着。“河北省广播局一栏”也毫不例外地刊印着我们的职务和名字。这一切证明：把文化大革命开除史籍，显然是那位兼着省广播局编辑委员会主任的局长于振华自做主张决定的！正是这位局长先生在河北电视台每十年要大张旗鼓搞一次庆祝电视台诞生和发展的活动，也从不提她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更不提为此付出了巨大心血的省革委领导集体和为此付出巨大努力的广播局（台）军管组和革委会。当然，就是仍然健在的军管组和革委会负责人也被他拒之庆祝活动的大门之外。我不知道这位局长是“史盲”，亦或是因为他政治观点上有自己的另外想法，非要把文化大革命开除史籍不可，但客观存在的铁一般的历史事实总不能用这种“鸵鸟办法”和“掩耳盗铃”的手段取消吧？正是因为本人对此有这种理所当然的不平，我不得不先后在 1998 年 10 月 23 日和 2017 年 1 月 16 日，分别以《河北电视台与李雪峰同志》和《河北电视台诞生的传奇》为题，在《石家庄日报》和河北《书刊报》发表文章，讲明了真相。今天，在我的回忆录上又多写了这么一段，可能有人会说我在给自己贴金。这个，我不想辩解。下边让我赘言摘录几位老领导给我写下的表彰

文字以正视听：92 岁高龄的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主任、中共中央八届、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刘子厚同志说：“高恩泽同志我是了解的。他是我党培养的知识分子。文革初期在省电台军管组和省军区领导下工作。省革委成立后，在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和河北省委领导下工作，工作是好的。”八十一岁高龄的省委常委兼省委组织部长王玉同志说：“高恩泽同志出生在革命老区任丘县一个堡垒户家庭，1953 年他 17 岁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对党和毛主席有深厚的感情。在电台工作时有开拓精神，为发展河北的广播电视事业做了大量的工作。”河北省军区政委、省革委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老红军曾美将军说：“我了解高恩泽同志，他性格开朗，热情好学，是个有进取心的知识分子。文革期间，省革委成立后，他任省革委常委、省电台革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在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和省委领导下工作，工作是有成绩的。”七十三岁高龄的抗日老战士、省广播局（台）军管组长蔡宝峰同志说：“老高同志工作积极热情，事业心很强，一心扑在办好广播上。1969 年二月办起石家庄小型电视台。后他觉得这个台太小，只能覆盖石家庄地区的一些县，而且也只能搞一些自办节目，却不能转播中央电视台节目。为解决这个问题，他从中央广播局要来一台报废的 7.5 千瓦电视发射机，组成了以黄嘉礼为骨干的技术力量，改装、调试这台发射机，要求十月一日以前完成……由于全体同志的一致努力，按时完成了任务，及时转播了二十年国庆，受到省革委的好评。河北日报作了报道，发了消息。在高山建发射台，获得了较好的效果，成了一个新发现，受到中央广播局的好评。这之后又适时的提出组装彩色发射机……他跑省革委、省委，找领导汇报解决问题。为向全省各地传送广播节目，增扩调频发射功率；为建战备台；新建广

播电视技术大楼出了力。”

在写完这一章的时候，我想补述一件河北省广播局参加援外的事情。那是 1976 年九月间，中央广播局副局长董林同志打电话给我，说中央决定给欧洲社会主义的明灯阿尔巴尼亚修建电视台。中央广播局考虑到河北广播局技术实力和组织能力较强，提议由河北局副局长张光和总工程师黄嘉礼挂帅，赴阿进行援建工作。我当即表态，这是中央对河北的信任，也是河北广播局的光荣！我会立即转告局党委和省委宣传部，并做好组织工作，请中央广播局放心。十月初，张光和黄嘉礼同志按时赴阿，经过一年的努力奋斗，胜利完成任务回国。

第 26 章 记忆犹新的一连串“事变”

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就我个人的经历来说是安全而又顺畅的。但在新闻单位担负一定的领导工作，又不同于其他一般业务单位。新闻单位有“党的喉舌”的天职，既有责任向党反映各种情况，更有责任向群众宣传党的声音。在历史上，新闻记者有“无冕之王”的尊称，意思是说它管事很宽，虽然没有官帽子，但国家几乎所有的事他都可以介入，并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一般说，老百姓喜欢它，当官的大多很怕它。我党从来不赞成“无冕之王”的说法，只强调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这样的理念下，特别是我当了河北省革委会常委以后。有些过去在任丘老家和沧州地区的老战友和老同事，不断有人找上门来，求我为他们那里的这一派或那一派站台讲话。我当时很清醒，决不陷入派性，利用手中的权力去支一派压一派。就是鲜明地只对他们说两句话：“一是要坚决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二是规劝两派不要‘打内战’，要搞革命大联合！”但是，对老家任丘县和其他地方出现的违犯政策的乱批乱斗和武斗伤人事件，凡是找到我反映的，我却决不推诿，一定要遵照党性原则和政策规定认真处理。下面有几件这方面的事件我是如此面对和处理的。

1、电台三位革委会委员突遭审查

1968 年九月工军宣队进驻电台后，仍有清理阶级队伍的任务，并且首先审查革委会委员。特别是参加革委会的“革命老干部”（因为新中国参加工作的大学生和年轻同志没啥可审的），虽然这

些抗日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都经过 1955 年逐个的“审干”，每个人都有党组织的一纸“审干”结论。文革中他们又经历了群众性的“清理阶级队伍”，参加革委会前军管组又对他们做了一番审查。我并不担心工军宣队会审出什么问题，不过是走个例行的过场而已。但是，我这个想法错了。一个多月后，省电台军管组副组长兼工军宣队副政委白光和和工宣队王海镇队长同我谈话。王海镇队长严肃地说：

“经过调查，有人揭发革委会主任杨晋北当过‘国民党区分部委员’，革委会委员王子恺曾加入过‘国民党’。另一个革委会委员高新华历史上有‘自首行为。’为了纯洁革委会必须采取一定的组织措施。你们革委会要首先应该有所表示，比如发个公告，澄清自己的立场。”

我一听这个，脑瓜子“嗡”地一下胀大了许多。心里震惊道：“这可能吗？这会是真的吗？我从来没听说过呀……如果革委会有这样三位人物，这问题可就‘大’了去啦！决非革委会发个公告澄清立场那么简单。但我又不能公开否定工军宣队的调查，只能委婉地叮正道：

“调查砸实了吗？”

“有人证”

“有几个人证？”

“一个！”

“哎呀，‘孤证’靠不住呀！1955 年我搞过中小学教师的‘肃反’有过这样的深痛教训。历史上，对有争议的问题，一向有‘孤证不立’的原则。我建议还是要‘四面见线’进行再查证。一句话，还是慎之又慎为好。”

“这个，工军宣队指挥部已经定了，专案组立刻和本人见面。他们不能再履行革委会委员的职责，你们革委会必须有个态度！”

事已至此，我只得委婉地再做最后的力争：

“审查总是要和本人见面的。但审查的时间长短却不是主观愿望能够确定的，有时要用很长时间。定性问题就更不简单了，有时会有几次反复。历史的经验证明，冷处理比热处理好，后期处理比前期处理好。我建议你们再考虑考虑我的意见并向工军宣队指挥部转述我这个建议”。

最终工军宣队指挥部接受了我的部分意见，对杨晋北同志和王子恺同志答应做进一步审查。而对高新华同志的“自首”行为，则认为其档案里有材料，清理出革委会不会有错，革委会可先行发表公告。

我这个人有时也很倔犟的。竟又提出：“档案里的材料也要分析哩！是自我交待材料？还是查证材料？亦或是组织的《结论》材料？也都需要慎重解析，做出力求准确的鉴别。”这时海镇同志敞快地说：“是组织的《结论》，但指挥部认为当年这个《结论》对‘自首’行为的论断太轻了。”

海镇同志说到这个程度我不便再争论下去，只得照办。

几天之后，杨晋北、王子恺和高新华同志分别找到我反映自己的不同意见。杨晋北同志讲，说他曾是“国民党区分部委员”完全是别有用心的陷害；王子恺同志讲，说他曾参加过国民党，是无中生有的栽赃。但他俩竟然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意见：“对毛主席支持的工军宣队我们是打心眼里热爱的、尊重的和全力支持的。但他们手下的专案人员总因为我严词拒绝这种子虚乌有的指控，被批判为‘态度不老实’，弄得我很为难，这涉及到贯彻落实毛主席实事

求是的思想路线呀！希望小高同志能以省革委常委的身份，向李雪峰主任和刘子厚第一副主任反映一下。”高新华同志则眼泪汪汪平静地诉说“自己的自首行为上级党委早就做了审查结论。”接着，她给我讲了事情的经过：“那是 1942 年我 15 岁上，正是日寇扫荡最残酷的时候，在我们安国县因为自己所属的区委书记叛变投敌，把全区的秘密共产党员名单，交给了日本鬼子的据点，日寇便发了一个布告，要全区共产党员自首。开始大家都躲着不去。后来县委派来了新的区委书记。新书记有个指示，可以应付性的自首一下，但决不能变节投敌。我在大哭了一场后，就跟着村长到据点登记了自己的名字。日本鬼子不知是因为我这个‘共产党员’岁数太小，还是别的什么，也没有多问就回来了，继续在党的新区委书记领导下工作。抗日胜利后，在审干中我如实向党交待了自己的自首问题。党委经过调查，做出了‘属一般自首行为，不给处分’的结论。这么多年都过去了，现在又旧帐重提，重新处理，这到底合适不合适？希望省革委说句话。如果因为我曾有过这么个问题，不适宜作革委会委员，免掉委员就是了么，没有必要再重新处理一次呀！”我听了他们（她）们的意见，只能是劝慰他们要沉住气，相信事情总会实事求是落实的。解放军和工人师傅都是新来的同志，他们没有抱成见办事的基础嘛！

我之所以没有照他们的要求直接向雪峰和子厚同志反映他们的意见，是因为，这时我和工军宣队指挥部政委高振龙和副政委刘永君同志也熟了，再加上同白光副政委和王海镇队长有着良好的工作关系，我完全可以同他们直爽、通畅而又相知的交谈，并且常常会达成共识。比如我同王海镇队长做了一次长谈后，海镇队长三次派人做“四面见线”的调查。最后也弄清楚只是“同一个揭发人”

在叼着不撒嘴。其不正常的“馅”就要漏了。不幸的是，这时杨晋北同志心脑血管病爆发，住进了医院。我和技术处长高瑞奎同志去看他，他的嘴神经被栓住已不能讲话，就是拉着我俩的手呜呜大哭。我俩郑重地安慰他：“不要难过，要相信组织，问题会实事求是解决的，你现在就是要安心养好病哟！”接下来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平稳降温，那个咬着杨晋北同志不放的“揭发人”，承认“乱咬害人”撤掉了自己的揭发材料。杨晋北同志高兴了，但他的病并没有因此而好转。到1973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不幸逝世。省广播局为他举行了全局同志和其他生前好友参加的追悼会。按照省革委的规定，正厅级同志逝世，河北日报要发表消息。我为此专门找到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生堂同志照章指示河北日报发了消息。无独有偶，王子恺同志的所谓“参加国民党问题”，最后也是那个“乱咬害人”的“揭发者”主动撤掉了自己的揭发材料而宣布结束审查。高新华同志的“自首”问题，工军宣队也纠正了重新处理的作法，宣布维持原来党组织的结论。后来她调到河北化工学院党委宣传部工作。我专门去看她，对当时奉命把她清出革委会表示自我批评和道歉。

2、“老顽童”记者雷文治被咬成“新国民党”

比之杨晋北和王子恺同志被咬成“旧国民党”问题更具戏剧性的，是电台驻石家庄记者雷文治同志被咬成了“新国民党”。这里有一段滑稽的小故事，令人哭笑不得。

有一天，我因公出差回来，约摸上午十点左右，一进门正碰上雷文治一个人在院内劳动，便忙着打招呼，并热情地上前同他握手。没想到一向以爱开玩笑出名的“老顽童”记者却连连倒退着摆手，并苦笑着说：“小高，别，别握手，我已经被揪出来了！”

“你开什么玩笑！？”

我硬是冲上去抓住了他的手掌，使劲攥着摇了起来。他却往回抽着手掌一本正经地说：

“这是真的！不是开玩笑。你出差了还不知道呢！”

“啊？快说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我困惑地询问着，心里猜测：“老雷长我两岁，和我一样长在红旗下，他肯定不会有什么历史问题。弄不好是爱开玩笑说错话……”正这么想着，老雷一脸苦色地说：

“咳，飞来的横祸呀！我不想跟你讲，你上楼问问工宣队就知道了。”

我来到办公楼上，还真的找到王海镇队长去询问。海镇同志很直爽地说：

“这事还真叫人震惊呢！雷文治同志过去 当过教师。他原来学校的教导主任供出自己组织了‘新国民党’， 还发展了一批新国民党党员，其中雷文治算一个。可雷文治坚决不承认，说那小子是胡说八道。一时又弄不清楚，咱得接受扬晋北和王子恺被‘乱咬受伤’的教训，等等再说吧！咱也没怎么雷文治同志……”

“既是这样，那别的‘新国民党党员’ 对雷文治有指正吗？”

“没有。据那个教导主任交待，他自任书记，都是个别秘密发展，单线联系。‘新国民党党员’ 之间不发生横的关系。”

一听这个，我立刻想起了当年做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不也是这么如此神秘吗？国民党蒋介石被赶到台湾去了，一直叫嚷着要反攻大陆，它们会不会也要来这一套呢？工军宣队在这件事上既警惕又慎重，我认为是做得很得体的。

过了一段时间，我去省革委开会，李雪峰同志一开始就非常感

慨地讲起了邯郸地区邱县大抓所谓“新国民党”的事。说有不少共产党的支部，一夜之间被咬成“国民党的秘密支部”。只要抓出一个“新国民党员”，就像拉串马一样咬出一大片。甚至带头抓“新国民党”的共产党书记，也被咬成了隐蔽更深的“新国民党”。阶级阵线全乱套了。他指令邯郸地区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解放军炮六师政委徐士信同志，要立即煞车。省革委同时也派出强有力的工作组，帮助邱县党政领导甄别平反。我听到这个情况，立刻连想到雷文治同志被咬成“新国民党”的问题。回来就把李雪峰主任的讲话向工军宣队传达了。王海镇队长立刻派人到案发地核查。这时候，那位自供为“新国民党书记”的教导主任，全部推翻了自己的供词。在被问及为什么要编造这样的荒唐故事时，他懦懦地说：“我受的政治压力太大了，只得胡说，以求过关哪！”

雷文治同志这突然飞来的所谓“新国民党”问题，顺理成章的解决了。他又恢复了爱开玩笑的“老顽童形象”。后来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复出平反所谓冤假错案，有人找到雷文治挑动道：“老雷呀！工军宣队把你打成‘新国民党’，你得跟他们算算这迫害人的大帐呀？”老雷镇脸拒绝道：“不能那么办！人家工军宣队完全是按正常程序进行正常的审查，并没有迫害我，何必耿耿于怀？那样做人就太不厚道啦！”

3、震惊省城的“河北日报 9.30 事件”

1968 年九月三十日，发生在河北日报的所谓“9.30 反革命事件”，应该说是震动省会和新闻界最触目惊心的事件了。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九月二十九日，当时最亲密的社会主义国家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到中国访问，河北日报在摘编新华社稿件时，

把我国出迎的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的名字漏掉了，有人抓住这个问题无限上纲，硬说河北省有人暗保已被‘林彪副主席撤职的代总长杨成武，不承认新上任的总参谋长黄永胜。’检举信以机要特快的速度送到了党中央。也同时送到了河北省革委。省领导按照处理事故的一般程序，指示省革委政治部和河北日报做例行性检查。河北日报不敢怠慢。又是检查又是座谈，积极认真的总结经验教训，要求全体同志引以为戒。

这天上午，河北日报总编辑马耀章同志被叫到了省革委政治部。因为怕电台在广播时也发生类似事件，我（时任省广播局（台）革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主管宣传工作）也被通知参加。分管宣传工作的省革委常委兼政治部副主任刘英同志，摊开河北日报那张报纸，非常认真地同我俩讨论事故的严重程度和定性，并从思想和作风上深挖原因，进行检讨。讨论来讨论去，我们三位一致认为：造成事故的原因是工作疏乎所至，并无检举信上所认定的那种政治因素。即便是漏掉黄永胜总长的名字，也只能提高到“政治上不够严肃”，属于“政治性事故”而已。最后就照这个基调给省革委写了检查报告。雪峰和子厚同志并未对此报告表示异义。都以为这事就过去了。没想到他二位参加国庆观礼并留在北京开会期间，李、刘两位领导同志为这事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严厉批评。《批评》指控“河北日报出现的问题，是阶级敌人制造的一起反革命事件！对待黄总长的态度就是对待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你们到底是站在无产阶级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并责令李雪峰和刘子厚同志立刻回去，严加追查和惩处。这种形势的逆转在当时是保密的，我和马耀章同志毫不知情，刘英同志也不知情。待到十月十日下午两点，雪峰和子厚同志乘飞机赶回石家庄，稍事研究和部署，即通

知新闻系统工军宣队指挥部，召开报社和电台全体人员大会。我当时觉得这个会来得突然而又紧急，估计是有什么重大事情要讲。下午两点，我遵照工军宣队指挥部的通知，以军事编制带队来到对过的河北化工学院礼堂。只见马跃章同志已带领河北日报人员落坐了。我和马耀章并肩坐在前排，俩人忙着沟通了一下情况，竟然他也不知道这个会的内容是什么。不一会儿，工军宣队总指挥赵书茂来了。我走上前去问他：

“小赵同志，开什么会呀？竟如此突然和紧急？”

赵书茂沉吟了一下，像是不愿说，可又不能不给我个答复。就支应道：

“等等雪峰和子厚同志，开起来就知道了。”

稍顷，雪峰、子厚和徐信（驻石 63 军副军长、省革委常委）同志就来了。按照礼节，我和马耀章同志立刻起立迎上去，想和领导握手寒暄几句。可一见他们，个个神情严肃，径直走向了主席台，并没往常那种见面要握手寒暄几句的意思，我俩也就知趣地退回到原来的坐位。大会首先由雪峰同志讲话，接着便是子厚同志讲话。俩人的讲话大同小异，但都亟具火药味。其大意是“河北日报 9.30 事件是阶级敌人制造的反革命事件”“阶级敌人在背后捅了我们一刀”“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立刻动员起来，揭露和批判阶级敌人在新闻系统的破坏活动！”“这是一场保卫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阶级斗争！”子厚同志在他讲话的最后宣布：“负责宣传工作的省革委常委兼政治部副主任刘英停职检查；河北日报总编辑马耀章逮捕法办；（14 日，组版编辑吴语同志祯又被逮捕法办）；河北日报不定期的停刊整顿。”他的讲话刚落，我和马耀章身后就冲过来几个便衣警察，立刻把马耀章擒住，架到外边的吉普车上送走了。这种有某种

恐怖气氛的捕人，在会场引起巨大震动。很多人想不通，心里质疑：

“因为工作疏乎，漏掉了黄总长的名字，就是反革命吗？”“马耀章过去是子厚同志的秘书，思想作风一向严谨纯正。又是做为过硬干部选派到河北日报做总编的，他怎么就因为一篇稿子漏掉了黄总长的名字，转身就变成反革命了呢？这以后谁还敢做新闻工作呀？”大伙心里是这么说呀！在当时那种严峻的政治形势下，还没有谁敢公开站出来讲。我和大家有着同样的意见，便按照程序和原则，晚上跑到子厚同志办公室去讲了。子厚同志一见我，他第一句话就问：

“咦，你河北电台是否也广播了河北日报那篇稿子？”

“没有。河北电台全部转播中央台节目，地方报纸的稿子一律不播！”

“那太好了。你要广播了它们那篇东西就砸锅啦！”说到这，他又问：“大家对上午的大会有什么反映？”

“反映么，我估计不小。但大多憋在心里，不敢公开讲呀！就以我为例，我只能按程序和原则来向你申述个人的意见：漏掉了黄总长的名字，再从严检讨也就是个‘政治事故’，怎么能定成反革命呢？你和雪峰同志说是中央领导同志这么定的，但不知是哪位中央领导如此混淆性质无限上纲？要是这样，今后谁还敢做新闻工作？”

子厚同志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话。只见他面带沉重之色，用低沉的语调说：

“咳——这也是省革委没有办法的选择呀！中央领导同志批评的很厉害，给我们上到了站在哪一边的高度。也只有先这么处理了，以后再相机纠正吧！”

子厚同志说到这个份上，我就没有再谈下去。便一直等着省革委“相机纠正”的措施快点到来。

不久，我到省革委办事，见到了省革委秘书长王金山同志，就憋不住地问他：“金山同志，你认为这样处理河北日报‘9.30 事件’对么？”王金山同志不便直接回答，就拐个弯说：“毛主席不是讲过么，‘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呀！”

“噢……那我这个‘群众代表’想去看望一下刘英同志，可以吗？”

“你去看看，当然可以了。”

我旋即来到刘英同志隔离审查的办公室。门外有公务员小吴正在值班。我和小吴很熟悉，他小声地问：“高同志，你这是……有事？”

“没事。我和金山同志讲了，就是来看看刘英同志。”

“啊？噢……”他四下里看了一下，微笑着小声道：“去吧！”

我推门进去，见刘英正趴在桌子上写着什么。不过，还没等我说话，他却苦笑着说：“小高，你胆子不小呀！敢跑到我这来沾包……”

“什么‘胆子不小？’不过是同志式的看望而已。而且得到了金山同志的支持。怎么样？你身子股还行吧？”

“身体倒还顶得住。不过是迎酬批斗而已！‘文革’初期这都尝过了么！你那里怎么样？”

“我那里还比较平静。只有一张大字报批评我‘按兵不动’。河北日报倒贴了一些大字报，大多是表态支持一类的应景话，实质性内容不多。他们都印了，工军宣队给我们发了一些，我给你带来

一本……”

“咳，现在不是我怎么检查的问题了。问题是上边有了成见，我就是把心掏出来也过不了关的。不过，我相信那句老话：‘心里没病死不了人’！”

“这是句富有哲理的老话。你千万保重，只要身体没事，就一定能看到光明的一天！”

后来，刘英同志被批斗了若干次后，送到位于邢台地区的省唐庄五·七干校学习锻炼去了。因为河北电台和河北日报的许多同志也在这里学习锻炼，我奉军管组之命也几次到唐庄干校去看望。顺便就看望到了刘英同志。没想到刘英同志不仅是高超的宣传家，还是有两手的炊事员呢！他在干校的食堂里劳动，竟然多有改进，受到广大学员的好评。

现在，我把年历翻到1971年5月17日，河北省召开了“文革”以来新的党代表大会。子厚同志当选为省委第一书记。因为我是省党代会的代表之一，看到子厚同志情绪相当高涨。到“9.13”林彪自我爆炸的这一天，总参谋长黄永胜接着也倒台了。

这时，刘子厚同志那个“相机纠正”的措施便开始了。他代表省委首先是恢复了马耀章和吴语祯同志的自由。接着任命马耀章为省财办副主任，吴语祯不敢再做编辑工作，分配到省体委去了。刘英同志又回到了省革委，被任命为省邯邢钢铁基地指挥部副总指挥。而总指挥是省委书记马辉同志。但这一切，都是以谨慎的低调进行的。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宣布平反。直到1972年的3月23日，子厚同志主持省委常委会算是正式而又公开的做出了平反的决定。《决定》说：“马耀章和吴语祯同志的事故，由于政治责任心不强、工作不细所致。属于工作中严重的政治性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但

其对错误的认识较好，免于处份，分配工作。刘英同志在事故中是有严重责任的，但对错误的认识也较好，免于处份，另行分配工作。”省委这个平反决定同时报告了中央，得到了中央的认可。不久，根据刘子厚同志的提议，省委决定并报中央批准，刘英同志升任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2000 年春节，我去给刘英同志拜年，他在一阵谈笑风声之后，对我 1983 年被高扬为首的河北省委打成所谓“四人帮”的帮派分子，忿忿不平。很忧愤地说：“我已 76 岁了，说话的机会很少了。我要写几句话给你，表示一个‘三八’式老共产党员对你的看法！”我听了十分感动。现在，我把他亲笔写的一纸文字录于下面：

“我是于 1968 年二月省革委成立时和高恩泽同志认识的。当时我和他都被结合了省革

委常委。从接触中他给我的印象是：热情、正直、性格上爽朗、快言快语。河北‘9.30’事件发生后，他对林彪、黄永胜等对干部的迫害忿忿不平。他不随声附和，是个有思想的人。”

写到这里，我想补充两点后来知道的新闻：一是据刘英同志后来听到的消息说，周恩

总理知道了河北日报的所谓“9.30 事件”，打电话给李雪峰同志批评道：“这件事是批评你们的，要你们总结经验教训。不要往大处里搞的了，更不要搞到下边去。”从这里我便联想到，中央这次认可了河北省委给“9.30 事件”平反的决定，正是公开否定了当时某些中央领导同志“混淆性质无限上纲”的错误。二是据 2005 年 4 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刘子厚传记与年谱》一书，其 209 页披露了把“9.30 事件”打成“反革命”的内情。《年谱》说：

“在中央文革小组一些人的强大压力下，宣布‘9.30 事件’是反革

命事件，错误的决定逮捕报社负责人马耀章和组版编辑吴语祯；《河北日报》停刊整顿；省革委政治部主管报社工作的刘英停职检查。”这说明子厚同志进一步讲清了内情，端出了中央某些领导同志把“9.30事件”定成“反革命”的错误。

4、接待几起家乡传来的“案件”

我和生我养我的任丘老家感情是很深的。特别是我在任丘县城读了三年半师范，又在中共任丘县委机关工作了八年之久，和共过事的领导及同事有着无法割舍的同志式的亲密关系。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提拔为省广播局（台）领导和省革委常委后，内心里曾下过这样的决心：即全心全意抓好自己分管的工作和省革委特别委托要办的事情。其他领域的事情不介入，以防犯“乱插手”的大错误。可在“文革”那个“天下大乱”的特殊情况下，老家来人向我反映了几起人命关天的案件，我要是置之不理就不符合党性原则了。只得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本份，同任丘县党、政、军部门做了负责的沟通和建议。

告状之一：有一天上午，我接到任丘县原县委办公室研究员王春元同志的电话，他非常急切的说：“恩泽呀！你快救救李秉哲，他正被一伙子人蒙着眼睛围攻殴打，打得很厉害。上边如果不下令制止，就要出人命了！”

“县革委不是成立了么，为什么还武斗打人？”

“问题是县革委刚成立，武斗并没有停止呀！”

接了春元同志的电话，我一点都不怀疑他会故作玄虚。因为他是有口皆碑的直正人和老实人哪！我俩一起在任丘日报和县委办公室工作多年，因为志同道合，那是心心相印的“同志加兄弟”的关

系。李秉哲同志是在抗日战争的 1945 年他十二岁时入党的。他的爸爸李宝恕大叔是“三八”式老革命。我和秉哲在任丘师范同学，毕业后又都调入了任丘县委。“四清”运动中他升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在任丘县直机关是有名的思想作风纯正又忠厚老实的人。我怎能容忍这样的好同志遭如此恶运呢？便立刻给县革委办公室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吕志民同志，也是我很熟悉的老同志了。他听我一讲情况也很震惊。马上说：

“这事我们一点都不知道哇！我马上追查、处理。”

虽然吕志民同志态度是明确的，但我又怕他压不住场，接下来便又给县革委会主任杜兴才同志打电话。他听我电话中讲得很急，忙安慰我说：“谁不知道李秉哲是好同志呀！竟有人敢蒙着双眼群殴，恩泽你放心，我一定马上追查处理！”

事后过了多少年，我见到了秉哲同志。这这时他已升任了任丘县（后改县为市）政协副主席。说起他那次挨打的事，他平静的说：“春元同志跟我讲了，兴许你那急救的电话起了作用，打着打着后来还真的就不打了，避免了出人命呀！不过，后边县革委怎么处理的，我也没有再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后以后，邓小平在全国追查打人的事，说要算细帐严处理。任丘市委的调查组找我调查挨打的事，我一看那劲头有点过。就淡化说：‘这么多年了，到底是谁打我了，因为蒙着眼也不知道是谁。我看就算了吧！我做为一名老党员，受这点委屈算不了什么。你们也不要抓住不放了。还是顾大局讲团结对党的事业有利哩！’调查组的同志对我的表现不大满意，见再谈下去也话不投机，便悻悻地走了。”

告状之二：也是一天上午，我正在机关大院劳动，传达室的同志跑来说：“你的一个本家侄子来了……”我过去一看是二堂侄书

代。他急切地对我说：“老叔呀！家里出事了，大堂侄光泰叫造反派抓走了，一夜都没有回来，都担心给打死呀！你得快救他……”我一听这个，真有点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就急问道：“他不是县里树的知青回乡的模范么？跟造反派有什么纠葛呀？”书代说：“任丘是四清试点县，他要保卫四清成果，反对造反派夺县委的权，还带头组织了个战斗队。可新的县革委都成立了，他还反，这不是对着干嘛！”我听到这里有点明白了。知道那时公社革委会的主任，大多是公社武装部长担任，这件事向县武装部求助来得最快。便立马去了省军区支左办公室，请他们用军线过问此事。省军区支左办公室很负责任，马上致电任丘县武装部，命令他们立刻查明情况，保护好高光泰的生命安全，并向省军区报告结果。三天后问题解决了。侄孙高光泰遭受了几顿皮肉之苦回到了家中。后来他接班担任了袁果庄村党支部书记、出岸人民公社副社长。

这里也有一段花边新闻，是后来县革委主任杜兴才同志告诉我的。他说：“出岸公社造反派抓高光泰那个事，我们不知道。还是省军区打电话命令武装部追查，我们才知道问题严重。仗着省军区连二并三的打电话，我们穷追不舍，才把高光泰救了出来。不然，可能真的就会乱拳打死了。”

告状之五：那是 1968 年入冬的一天，我正在省里参加三级干部会议。任丘县边关大队的会计主任王友安同志来找我。他是为两位村党支部书记“生命告急”专程跑来求救的。只见他带着恐惧的声调说：“你老高快救救俺们支书孟满堂吧！你是最了解他的。如今他被打成‘走资派’了，整天挨斗挨打，不定哪会儿，一拳失手就打死了。社员们都知道你升了省里的官儿，让我来求你，你可千万得管管这事呀！还有一个是庞许庄支书李丑同志，也打成‘走资派’

了，整天挨斗挨打受不了，逃到了外村，又被抓了回来，不知怎么竟给关进了任丘监狱……你也是最了解他的，无论如何得站出来救他呀！”我一听这个脑瓜皮子都“炸”了：“他们怎么会是走资派呢？我曾在这两村长期蹲点，搞调查研究。他二人都是相当模范的支部书记呀！不论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改斗争、农业合作化……都是我党的基层骨干和带头人。跟走资派不沾边哩！”想到这里，为了给王友安同志一个定心丸，就平静地说：“你放心吧！他二人的情况，我马上就去跟任丘参加‘三千会’的领导讲。请相信我，也相信县里的领导，会实事求是处理的。”

王友安同志放心地回去了。我来到了沧州地区任丘县与会者的驻地。见到了刚调整为县革委主任的武装部长张书荣和副部长刘国瑞，以及革命老干部、县革委副主任王满刚同志。因为我们之间特熟，寒暄几句后，便切入主题，提出了孟满堂和李丑被打成“走资派”、直到今天孟满堂还在挨斗挨打而李丑竟被关进监狱的问题。张部长因为跟我特熟，他直棒棒地说：“恩泽呀！你在上边对下边情况不了解，我劝你少管为好。还是相信那里的群众吧！”

“老部长兴许不清楚，我在这两个大队长期蹲点，对满堂同志和李丑同志的情况非常了解，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说，他们都是紧跟毛主席路线的好同志。建议你去那里亲自调查一下，一定会得出和我同样的结论。”

“那不一定，我还是那句话，要相信那里的群众。”

“可我的意见也是群众中来的呀！边关大队的同志专门到会上找我反映群众的要求，我没有矛盾上交，而是直接来告诉你们，就是相信老家的领导能处理好这个问题呀！”

这时，王满刚同志说话了。他作为任丘县的老县长到底有比

较清楚的底数，就打圆场道：“我看你俩别争了。散会后咱到两个大队去看看，妥善处理就是了。不过，我得给张部长说句公道话，恩泽你不清楚哩！把李丑同志送到监狱，那是张部长的一种善意的巧妙保护呀！”

“哎呀！我的老部长，保护是对的。可弄到监狱去保护不是好办法呀！上到纲上这属于侵犯人权呢！”

“不瞒你小高说，我这是‘急来抱佛脚’的笨办法，庞许庄造反派打人确实厉害，不这么保护李丑，真有可能把李丑同志打死呀！……”

说到这里，地区革委会主任、沧州军分区司令员朱志勇同志进来了。他好像知道我们在争论，就拍板说：“你们争论的这事不难办，回去调查一下当地的两条路线斗争史，如果两位支书是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的，就支持他们站出来革命。如果不是，或者有错误，批判可以，但不准打人虐待。在这方面，我们军队干部仓促介入，总不如地方同志熟悉，要注意听取他们的意见。”

大家都同意朱司令员的指示和意见。“三干会结束后，任丘县革委通过调查研究，肯定了孟满堂和李丑是紧跟毛主席路线的好支书，都分别被任命为公社的副业办公室主任。

上面这几段公案，任丘县政协副主席李秉哲同志，于1998年12月专门为我写了一篇文章，现附录如下：

《高恩泽是一位有革命正义感的人》

我和高恩泽同志从建国初至1963年，先后同学、同岗工作达13年之久，对他的学识和人品了解甚深。他脑子聪颖，能写善讲，性情直爽，对党忠心无二。尤其他那种高度革命正义感更使人钦佩。他不仅平时表现突出，就是在“文革”期间被推为省革委常委要职

之时仍然如此。比如在 1967 年夏，他听说我在任丘被视为顽固走资派遭毒打时，立即给任丘县造反派头头、县革委副主任杜兴才等人打电话，严厉提出质问。又如他听到任丘县惠伯口乡边关村（高曾在该村蹲过点）老支部书记孟满堂被打成反革命痛遭毒打的时候，他立刻找到在任丘支左的武装部长张树荣，让他严加制止，并给予纠正。当他听说任丘县汜水乡庞许庄村老支书李丑被关押的消息，他毅然找到在省开会的任丘县革委正副主任张树荣、王满刚，要他们立即释放。又如当他听说任丘原县委书记张玉刚被打聋时，他同样对任丘县造反派和革委会负责人提出质问。特别是出岸乡曾有一半脱产干部只因同任丘造反派观点不同想乱棍打死的消息传入他耳时，他又一次出面严加制止，使这位同志免遭其害。受他保护的这些人，都是苦大仇深，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入党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党员、老干部，都是从小就跟着共产党卖命工作的好同志。这些人是永远不会忘怀的。就当时情况讲，社会是那样的混乱，矛盾是那样的错综复杂。恩泽同志能把个人放之脑后，敢于大胆地站出来，为这些人讲话，确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没有高度革命正义感的人是做不到的。他之所以能做到，我认为这与他从小就受党的培养教育和受他大哥高枫（老党员老干部）的影响的结果。他的品格和大无畏精神，体现了对党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

李秉哲 1998 年 12 月

（注：李秉哲，66 岁，1945 年 12 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任丘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沧州专署农业局副局长、任丘市政协副主席。已离休，住任丘市政协宿舍。）

第 27 章 严守对空宣传口径是广播的第一准则

我们同地方报纸宣传不同的首要特点，就是要严守广播对空宣传的口径。因为广播电视的传播没有国界限制，它的“散射反应”漂洋过海或越过山巅，可以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以河北广播电台为例，我们就收到过东南亚华侨收听后寄来的书信。因此，中共中央历来规定，严守中央规定的对空宣传口径，是广播电视宣传必须遵守的首要准则，不得越雷池半步。在文化大革命的传宣中，广播电视的宣传必须以中央两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一刊（红旗杂志）的宣传口径为准，违者要追究责任。除此，中央还规定广播电视的技术环节也必须安全运转，确保安全广播。因为技术原因造成停播 30 秒者，就要列为事故记录在案，并进行必要的处理。从这个特殊意义上说，广播电视战线上的同志，其肩上的“政治担子”要比地方报纸沉重得多。

河北省自己的电视宣传，始于电视台建成开播的 1969 年 2 月 16 日。省广播电台从“文革”后的 1967 年 1 月 18 日停止自办节目、全部转播中央台节目，直到 1970 年 5 月 23 日才恢复自办节目。虽然当时自办节目不多，比如，除了群众文艺节目和革命样板戏，每天只有六十分钟分两次播出的节目“新闻联播”。尽管如此，其严格把关、防止出错的要求并没有丝毫的降低。我们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监听组。不仅录音后审听，播出时还要用收音机监听。如果播出时发生技术性停播或音质音量不好的情况，我们会立刻知道，并采取补救或其他善后措施。

开始，广播、电视两台的稿件都是我一个人最后签发。碰到拿

不准的稿子，我总是和军管组长蔡宝峰同志商讨。这位抗日战争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虽然没上过大学，但思想理论水平相当高，对文字更长于精雕细刻。每每商讨一篇稿件总能达到相通或互补，取得一致意见。比如 1970 年 6 月，河北省召开下乡知识青年代表会议。闭会前通过的《给全省青年的倡议书》，要求河北日报和河北电台照发。我在细看倡议书时发现有这样一句话：“伟大壮丽的共产主义社会，将由我们这一代来实现！”感到这种提法不准确，因为共产主义社会并非这一代青年就可以实现的，便把倡议书拿给蔡组长看。他也认为这句表述有失准确。并客观地说：“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这一代青年做不到，要经过五代甚至十代人的努力奋斗才可能成功” 我俩取得共识后，经请示雪峰同志同意，电台没有照播。

后来，随着自办节目的增加和丰富，两个台的稿子都由我一个人审定签发，实在太累，我几乎没有休过节假日。编辑和记者的力量也日感不足。军管组长蔡宝峰同志提议采取组织措施加以解决。经省委同意，1974 年前后，我们先后选拔了几位文字功底和思想水平很好的老同志，计有老报人魏亚明、省委党校教研室原主任冯光、省建工厅党委原宣传部长张光、省委《共产党员》编辑室原主任林章、老县委书记张玉刚、省财贸干校原教导主任王欣，担任省广播局（台）副局长或党组成员，同我一起负责广播电视节目的审稿把关工作。为了加强技术安全的保险系数，同时提拔技术处老处长高瑞奎为广播局（台）副局长、选拔张家口电台台长邹金沧任局党组成员兼技术处长，统筹负责全省广播电视技术的发展和运转工作。对于编辑记者的缺口，我们到省五·七干校和各地、市选拔，先后补充了 30 多人，进一步强化了编辑一审、主任二审、局（台）

长三审的制度。当然，就是这样严细，也还是担心自己水平不够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比如我就碰到过一件令人后怕的事：省革委常委、63 军副军长徐信同志对我说，无极县农民文艺宣传队用铁锨、锄头等劳动工具，编创了气势磅礴的舞蹈，群众很欢迎，你们电视台应该去看看，好好宣传一下。我听了觉得很新鲜。心里说，舞蹈本来就是劳动形式的再现和升华么！有这样的典型应当去看看。就派人去了。结果不巧，这个文艺宣传队应邀到北京去演出了。接下来，令人始料不到的是，我就听到了江青同志对这种舞蹈的严肃批评：“耍大锨，抡锄头的舞蹈我看了，简直是粗枝烂造，算不得什么艺术。不过，不要批评农民同志，停下来就是了。我这里主要是说领导同志要懂艺术。”这件事对我来说虽然有惊无险，却使我想了许多。如果电视台当时拍了片子，进行了广泛的宣传，这会引出什么后果呢？再如果把片子交流到兄弟省市（那时各省市间是有这种交换机制的）广而放之，又会引发什么后果呢……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怕呀！

说起这一类把关的话题，在广播电视宣传中会经常碰到。比如 1969 年 8 月 24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题为“抓紧革命大批判”的社论，河北省革委立刻进行学习和讨论，并制定了进一步开展革命大批判的措施，向全省各级革委发出了《关于认真学习、落实中央两报一刊社论的通知》。这次大批判的部署，除了全国性的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外，在河北省要批所谓走资派林铁（原省委第一书记）、闫达开（原省委书记处书记）裴仰山（原省委书记处后补书记）、胡开明（原张家口地委书记）。同时要求新闻单位做出自己的发稿计划。因为涉及对空口径，我只得向雪峰和子厚同志请示，只能按中央两报一刊的调子批判刘少奇和

邓小平，河北省的几位却不能在广播电视中播出。雪峰和子厚同志表态同意。不久，雪峰同志又接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要河北省大张旗鼓地批判河北著名作家梁斌和他的长篇小说《红旗谱》，说他描写的“高（阳）蠡（县）爆动”是歌颂王明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雪峰和子厚同志不敢怠慢，忙着把河北日报和河北电台负责人招去，就如何落实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进行讨论，我亲自出席了这次会议。看得出来，雪峰和子厚同志都不是那么情愿。只见雪峰同志对子厚同志说：

“如果说‘高蠡爆动’是王明左倾盲动路线的产物，那你子厚同志不是也搞了‘冀南爆动’么，这又该怎么看呢？”

刘子厚同志苦笑着说：“何止冀南爆动呢？共产党领导的爆动多了去啦！这些又到底如何看呀？”

两位省领导虽然都露出了自己的保留意见，但按照组织原则还得执行。便责成新闻单位做出批判计划，报省革委批准后展开。这件事又涉及广播电视宣传的对空口径，因为中央两报一刊没有进行这样的批判，我们当然也不能参加。雪峰同志同意了我们“不介入”的意见。

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判一个接着一个，大多是先内部以不同的保密级别进行批判，而后才公开在群众中进行批判。这使得我们在把握“对空口径”上十分用心。1970年8月底到9月初召开的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政治局常委陈伯达在华北组发言，吹捧林彪，鼓吹“天才论”。李雪峰以华北组长的身份，在华北组二号简报上刊登了陈伯达的讲话。此事被毛主席抓住。老人家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判陈伯达是“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说华北组的二号简报是“反革命简报”。197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

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首先在党的领导机关展开了“批陈整风”运动。12月16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由周恩来总理主持，在首都京西宾馆召开了包括全国其他省党政军负责人 620 多人参加的“华北会议”，不仅批判陈伯达，还揭发批判了李雪峰和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追随”陈伯达的“严重错误”。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年1月24日，导致李雪峰、郑维山被撤职。会议虽然是在秘密情况下进行的，但风声还是传了出来，在保定重又引起动乱升级，以至后来发生了保定造反派冲击省革委的严重事件。在这样一种复杂多变的情况下，电台和电视台涉及“批陈”的宣传，一丝不苟地要按照两报一刊的口径，只泛批“刘少奇一类骗子”，泛批“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不得暴露陈伯达的名字。1971年“9.13”林彪叛逃自我爆炸后，虽然我们较早得到了消息，但又得到特别指示，要严格保密，凡涉及林彪的事，在宣传上要严格照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的口径办。为此，我们不得不照抄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的句子和段落，打印成册，发给编辑记者套用。省革委政治部宣传组发现我们摘编的这个册子很有用，每期也高兴地索要一本。直到中央公开“批林”后，由于中央文件上有一句“林彪曾在历史上做过有益的工作”，这就使我们在宣传上很难把握，就更得照两报一刊的口径办。不过，即是如此严格，也还是出了一个大问题。即周总理开头指示要批林彪的极左，两报一刊也照着办了。后边中央政治局常委张春桥同志致信毛主席，指出“批林彪的极左不妥，这可能要批到文化大革命头上。林彪的要害是极右，和孔孟之道一脉相承，右得不能再右了。”毛主席同意张春桥同志的意见。两报一刊立即改变调子，大批林彪的极右。广播电视宣传自然也照着照办。

最令人哭笑不得的一次“口径变迁”，发生在1973年3月邓小

平站出来工作之后。这位有名的“全国第二号走资派”，经过几年的反省检查，三番五次的在写给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反省信》中，表示“永不翻案”。得到了毛主席的认可，又恢复了其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之后，又根据毛主席的提议，邓小平被任命为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四届人大又当选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协助周总理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由于邓小平在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学习理论、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指示的时候，自作主张的把三项指示上升为“三项指示为纲”，大张旗鼓地搞所谓“全面整顿”，即他整天挂在嘴头上的整顿军队、整顿地方，整顿工业、农业、商业、文教、科技……并说“整顿就是革命”，就是“全党和全国的中心任务！”对此，两报一刊的宣传也曾经是紧跟的。我们的广播电视宣传也不例外。比如，我们就在省委宣传部的帮助下，专门请省委党校等单位的学者，在电视台搞了八期讲座，集中突出地大讲“整顿就是革命”的重大意义和取得的巨大成绩。可是，不过一年，形势急转直下。毛主席发现了邓小平的“整顿”是在搞“右倾翻案”，进而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复辟资本主义。中央“两报一刊”做为党中央的喉舌，当然要立即转舵，先是大张旗鼓地批判教育战线修正主义的“回潮”，继而批判科技战线大喊大叫的奇谈怪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批判邓小平的。但并没有点邓的名字。对这种微妙的形势，就连我们的省委领导也有自己的“困惑”。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我和爱人刘淑琴同全国人民一样，沉浸在无限悲痛之中，两眼都哭红了。这时我从中央台了解到两条重要信息：一是周总理生前留下遗嘱，不保留骨灰，要求把自己的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大地；二是周总理的追悼会，要由邓小平致悼词。这两条信息

当时尚属机密，我立刻报告了刘子厚、尹哲和宣传部长徐纯性同志。他们也认为这两条信息很有份量，专门把我叫去，过细地询问：“总理为何不保留自己的骨灰呢？”我把听到的情况如实汇报：“中央没有解释原因。下边的人有两点分析：一是总理想为丧葬改革带个头；二是总理可能怕什么人日后扬灰，自己而为之。几位领导似乎对邓小平要为总理致悼词看得更重。他们认为，这一点反映了毛主席对邓仍然信任。但对“两报一刊不点名的“批邓”火力频频升级又感到很困惑。几乎三番五次的嘱咐各新闻单位负责人，要叮紧中央两报一刊的步伐，了解兄弟省报纸的反应和动态。中央两报一刊的文章要及时转发，自己的评论类文章要控制，总之，“要摸着石头过河”，谨言慎行。2月2日，中央发出了1976年一号文件：“任命华国锋同志为国务院代总理。陈锡联同志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河北省委2月5日早晨收到文件，刘子厚同志一上班就主持召常委会。我被通知参加了这次会议。只见于厚同志手执文件，非常严肃地说：“传达一个重要文件，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我来念一下，中共中央通知……”念完文件，当时会议室的空气一下子凝固了，人们好像没有一丝准备。接下来要进行的讨论，因为与会的大多是老同志，他们心里的“嘀咕”更多，竟没有人发言。这时我的钢炮性格上来了，禁不住问了一句：“咦，怎么不是邓小平当总理呀？”话音刚落，王金山秘书长瞪了我一眼，制止道：“不要乱讲！”子厚同志可能也怕引起“乱讲”，干脆他带头讲了起来：“早晨收到文件，我们接着就开会。对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陈锡联同志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省委常委一致同意，完全拥护。我们要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在国务院领导下，在中央军委领导下，以阶级斗争为纲，

认真学习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团结一致，努力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争取更大的成绩。省委要给中央发个电报，表示我们的态度。”子厚同志这么全面深刻滴水不漏的一讲，大家这才讨论开了。当然都是非常明确的一句话：“完全同意和拥护党中央的决定！”接着，子厚同志讲了文件的传达问题，还严正告诫大家：“要警惕阶级敌人的挑拨、造谣，如果碰上造谣，传小道消息，要批要追，不信不传。我们就是听毛主席的，听党中央的，这是对我们每个干部的考验！”

1976年2月12日，又传来涉及“口径”的惊人消息，这天的《北京日报》发表了署名“梁效”的重头文章，题目是《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文内公开点明：“那个最大的走资派，是右倾翻案的总代表，总根子。”不用说，这是非常明确的对邓小平不点名的点名了。可是按照传统的党内的原则和惯例，一个北京市的地方报纸，如此公开大胆地指向仍是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完全超出和突破了中央两报一刊的宣传口径，就党报的组织纪律来说也是不允许的。河北省委闻报这一不正常的举动，异常震惊，责成宣传部尽速弄清文章的“来龙去脉”和兄弟省的动向。广播电视则要紧盯中央两报一刊的走向。后来查明，“梁效”是江青同志支持的北大和清华两大学写作班子的笔名。没有江青同志的支持，北京日报是绝然不敢登的。也正是因为这个重大背景，兄弟省经过一阵短短的迟疑后，便责成自己的机关报转载此文。河南日报、湖北省长江日报——2月14日转载；山西日报、天津日报——2月17日转载。河北省委见此情势，不敢再顶下去，遂责成河北日报于2月18日转载了“梁效”的文章。而我们河北电台和电视台仍坚持照中央两报一刊的口径办事，经省委同意没有照播。2月

25 日中央召开了有各省市负责人和各大军区领导参加的以“转弯子”为目的的“打招呼”会议，印发了毛主席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河北省委才于 3 月 6 日召开省直机关处以上干部大会，正式开始了批邓。3 月 9 日，批邓才扩大到了县级。到 4 月 7 日，中央公开发表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广播电视才照中央两报一刊的口径，展开了大张旗鼓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

第 28 章 奋战在唐山抗震前线

1976 年 7 月 28 日凌晨 3 点 42 分，唐山发生震级为 7.8 级的大地震。当时强烈的震感也传到了远在 300 公里之外的石家庄。我在睡梦中被震醒，忙着招呼爱人刘淑琴和两个孩子跑到院里。这时，整个家属院的人们都给震出来了。大家焦急地议论着：“一定是什么地方（当时还弄不清震源所在地）发生了大地震，谁知损失怎么样呢……”上午一上班，省委宣传部传来消息：地震发生在唐山、丰南一带，电讯全部中断。派飞机侦察，唐山市不见了，变成了一片废墟。这一惊人的消息，使每个同志的心情都非常沉重。等技术人员奉命打开收音机寻找唐山 680 千赫电台时，已经听不到一丝讯号。毫无疑问，唐山电台被震毁了。我们局党组决定立即派人前往唐山了解情况。就在这时，省委宣传部召开紧急会议，部署新闻单位到唐山采访报道。我们组织起报道小组，正紧急准备出发时，29 日下午四时，省委宣传部新闻处长骆志安同志，奉省委和宣传部领导之命来到广播局，对局党组书记兼局长史一凡同志和我说：

“唐山大地震把电台和广播站都震毁了，刘子厚同志说那里听不到党中央的声音。要广播局立刻派人前往，迅速恢复广播。你们二位商量一下谁带队去？”

“我去吧！”没等商量，我就表态道：“广播局几位局长都是老同志，身体都有毛病，数我年轻力壮……”

一凡同志说：

“恩泽同志业务熟悉，身体也好。他去了可以把‘恢复电台’和‘宣传报道’一起抓起来。”

“那好！”骆处长表态道：“恩泽同志就立刻行动吧！越快越好。”

送走了骆处长，我们立即召开党组扩大会议进行部署。与会者一听说去唐山抗震救灾，都纷纷请战，一下竟进入了战斗状态。首先确定：由我和技术处负责人成忠顺、李春树组成了指挥小组。接着按工作和技术环节，进行面对面的人员和物资落实。鉴于唐山电台损毁情况不明，为了万无一失，必须从最坏的情况做准备。确定广播设备、电源和工作人员全部由省局足额带去。计有一千瓦发射车一辆；配备全套播控收转设备和录音复制设备的大轿车一辆；48千瓦轮式发电机组一台；1.5千瓦汽油发电机组一台；用于运载燃油、木杆、工具、器材和牵引发电机的卡车三辆；负责联络的吉普车一辆。人员配备：计有发射技术员5名，播控录音员4名，播音员两名，天线工4名，发电机工1名，汽车司机、行政人员9名，共计25人。由于我们的战备发射车和天线工具还在太行山战备基地，决定先遣队伍和后续队伍分头前进。我和成忠顺处长率队于下午5时出发。令人始料未及的是，路上去唐山救灾的车辆甚多，再加上重要交口没有警察指挥，许多车辆拥挤混乱，常常闹得三鱼争头，裹步不前。这时我们早有心计的杨玉栋同志，带着指挥交通的令旗，便以义务警察的名义指挥交通，倒也相当有效。7月30日下午2时，我们赶到了丰润。这时，通往唐山路上的车辆更加拥挤。杨玉栋同志的令旗也指挥不动了。我们的车队夹在中间，慢如牛车，30里地整整走了四个小时，才算来到了唐山郊区。这工夫，有两位中年妇女手里托着大海碗迎住了我们，神情悲怆地说：

“同志们，快喝点水。到了市里就没水喝了。”

我和成处长连声感谢。然后关切地问：

“家里的人们还平安吧？”

“郊区好些，市里伤亡很大。非常感谢各地对唐山的支援……”

两位中年妇女泪流满面地说着，指了指旁边的大坑，就哽咽着再也说不下去了。我顺着她们的手势往大坑里一看，因为正值黄昏，光线并不清晰，但仍然看见坑里躺着数不清的尸体，有穿背心裤衩的，有光膀子的，个个都发得胀胀的。我心里禁不住一酸，猜测着：

“这尸体肯定是从市里运到这里来的……”

告别了两位中年妇女，我们向唐山机场——省抗震救灾指挥部进发。到了机场，才知道省领导刘子厚同志、马辉同志和马力同志都住在帐篷里。宣传部卢振川副部长见我们到来，非常高兴。他忙着领我和成处长去见子厚和马辉同志，两位省领导闪着疲惫的神色，异口同声地说：

“你们来得好啊！快点把电台恢复起来。具体有什么事情找老卢商量。人们现在最盼望的是听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

接下来，指挥部拨给我们一个帐篷。大家在简易食堂里吃了“只记帐不收钱”的饭。就在机场的大院里简单地看了看。因为输电线路全部震毁，大院里一时无法照明，也就很难确定电台选址的意向。第二天也就是31日早晨，我们顾不上吃早饭，又转起了大院里的空地，希望能找到理想的建台地址。这时，我们发现了新大陆——田间还树着有序的电线杆子！便猛然想到：既然电线杆子没震倒，那么，原唐山台的发射铁塔也可能存在。如果原来的铁塔能用，就可省去重新架设天线的工作，使恢复广播的时间大大提前。于是便决定到唐山发射台去看看。吃过早饭，我们向唐山广播局进发。一路上映入眼帘的除了坍塌的房屋，就是扎眼的断壁残垣。正在清场抢救的解放军战士和各级干部群众，个个都是挥汗如雨，拼命用

翘杠挪动着沉重的预制板，抢救可能压在下面的伤者。严峻的面孔已经没有了泪水。这时，我们也发现有几个人被群众扭住，绑在了路边的树上。原来这几个家伙趁着震后的混乱，去抢劫百货仓库，被群众“专政”了。

来到唐山广播局，已经看不到原来的模样。围墙和房子全塌了。职工在废墟的空隙里搭起了一个个七扭八歪的小棚子。我们在一个狭窄得只能容一人小棚子里，找到了局长田禾同志。他已经身负重伤。老伴在地震的最初几分钟，还在隔着地板与田喊话。突然，“轰隆”一声，地板塌陷，就再也听不到老伴的声音了。田禾同志强忍着悲痛，支撑着不能行走的身体，用声音指挥同志们抗震救灾。见到我们他热泪淌流。说：“局里的设备都砸到下面了，人员损失很大。发射台或许还有能用的地方，你们去看看，恢复广播要紧。这里有我顶着呢！”

我们赶到距唐山 30 公里的团山子发射台，这里表面看房子没倒，天线铁塔尚存。但仔细检查，情况也不大妙。机房损坏严重，外墙水平方向断成三段。内隔墙向北倾斜了四、五度，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机房大厅内装着两部 7.5 千瓦、一部 2 千瓦发射机。机箱内较重较大的元件，如变压器、槽路线圈等大部移位，元件之间的拉线断了很多。也有一部分元件被拉坏了。更令人担忧的是，那部 2 千瓦发射机随时都有被内墙砸毁的危险。但是，比较起来，这里有水，有天线，还有修理工具和部分元器件，总是比在机场选新址优越得多。定了这个主意，我们遂向指挥部马力同志和卢振川副部长请示，不在机场范围内选址了。就以团山子发射台为中心，恢复唐山台的广播，很快得到了他们的批准。

后继车队经过近一天的准备，于 7 月 30 日下午 3 时出发，昼夜

兼程，用最短的时间和最快的速度，于 31 号晚 7 时到达团山子发射台。当晚我们召开了全体人员大会，我向大家做了动员。成处长和发射台的同志介绍了现实基础情况。然后群策群力，制订方案。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7.5 千瓦发射机耗油太多，不能长期坚持。2 千瓦发射机的机件损失较轻，恢复起来较快。再加上频率是原来的，不用重调，又有原来匹配好的天线，可以很快开播。缺点是因为余震不断，可能随时有被砸的危险。这个问题，我们又研究了“预警装置”和“一主一备”两种维护安全的办法。因为天色已晚，又无照明设备，便决定明天大干了。

8 月 1 日天刚亮，省局来的同志和唐山发射台的同志冒着危险进入机房，恢复器件位置，焊接被拉断的线路，这时，我们在机房安装好的自造的“自动报警器”，在维护人员安全上发挥了作用。，房间只要稍有震动，报警器就马上响铃，人员可立刻撤出。好在余震的震级不大，警报一过，大家又进去抢修。

抢修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8 月 1 日上午，仅用半天便把机器元件、导线等全部复原了。下午开始加电，逐级调试，逐级排除可能出现的障碍。与此同时。一部分同志抓紧对广播车上的播控设备进行了仔细检修，安装了临时复制间，把要试播的节目也录制好了。到晚上 8 时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进行试播。我们经过在市区收测，播出效果良好。唐山台的电波信号在废墟上空平稳回荡——我们的唐山台在震毁五天后，又胜利地恢复播音啦！

“立刻向省指挥部报告！”我在长舒了一口气后，立刻同成忠顺处长飞车直奔省抗震救灾指挥部。把这个喜讯告诉了子厚、马辉、马力和卢振川副部长。几位老领导连声说：“好！好！好！要继续努力，千万要防止发生新的问题。”

回到团山子发射台，传达了子厚、马辉、马力和卢振川同志的指示后，同志们又是革命加拼命，调试好了战备车的 1 千瓦发射机。这么一来，唐山台的发射机就实现了一主一备“双保险”的安全条件，也为后边搬出处在一定危险之中的 2 千瓦发射机提供了时间。再加上三部柴油发电机组轮流供电，我们可以信心百倍地说：“唐山台的安全广播进入了万无一失的阶段！”

广播恢复后，由于人们手中的接收工具——收音机太少，其舆论的作用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这时省局送来 52 台三用半导体电唱机十分受用。这种三用电唱机，使用干电池，能讲话，能放唱片，能收转电台广播。如果配上高音喇叭能同时供几十户收听，十分适合唐山震区的需要。8 月 6 日上午，刘子厚同志对我说：“这种三用电唱机很不错，争取配上 1000 台，唐山政治空气一下子就活跃起来了！”我说：“我们没这么多，需要向中央广播局求援。”刘子厚同志一拍大腿说：“那你们就快去，代表省委向中央广播局求援呀！”

下午，我和成处长乘北京吉普向北京驰去。路上来唐山救灾的车辆仍然很多。为了安全，汽车不能全速前进。到了晚上 8 时，我俩来到了中央广播局。这时邓岗局长为首的领导班子仍在办公。他们是根据北京也不断有震感出现而实行非常办公制度的。听说我和成处长来，这位我早在全国电视会议中熟悉的老局长，便立刻听取我俩的汇报。当我俩讲到唐山大地震造成 24 万人死亡和巨大财产损失时，邓岗局长甚为悲痛。他说：“老高同志，河北省委和广播战线有什么需要我们办的，你只管讲。中央广播局一定急唐山所急，尽一切可能满足。”我们讲了刘子厚同志的意见和要求，邓岗同志立刻指示身边工作人员：“马上给上海唱片厂打电话，要他们把库

存的三唱机全部拨给唐山。已经拨到别处的要尽最大努力追回来。一定给唐山震区凑够 1000 台。”邓局长说到这儿又对我俩说：“这些只记帐不收钱，属于无偿支援。你们还缺什么物资和器材，拉个单子，中央广播局尽量帮助解决。”

我俩汇报结束，成处长拉了一个器材需求的单子，邓局长收下后又嘱咐道：“现在你俩去咱招待所休息。明天我要随你们去唐山慰问，看看需要买些什么慰问品呀……”我说：“买些罐头、咸菜、饼干即可。这个好存好放，用着方便。”

当晚，我俩把中央广播局邓岗局长大力支援唐山抗震救灾的情况，以及第二天他还要亲自到唐山慰问的事情，用电话报给了省抗震救灾指挥部。8月7日早饭后，我俩便陪邓局长驰向唐山。到了唐山机场，刘子厚、马辉、马力和卢振川副部长，立即中断开会，代表河北省委、省革委，对中央广播局的大力支援表示感谢。并责成卢振川副部长和我陪同邓局长视察灾区情况，慰问广播电视职工。唐山广播局的同志，对邓岗同志亲自到灾区慰问，感动得热泪盈眶。都表示要战胜困难，重建家园，为建设一个新唐山而努力奋斗。邓岗局长此行还慰问了战斗在唐山抗震救灾第一线的新华社、人民日报和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记者。

唐山震区所需要的 1000 台三唱机，由于当时通往唐山的铁路中断，全部由廊坊广播局代为转运。一辆又一辆满载三唱机的汽车源源不断地开往唐山。震区上空到处响起广播的声音，成为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一道令人振奋的风景线。

在恢复了唐山电台的广播并对震区做到了有效覆盖之后，我又把精力转向抗震救灾的宣传报道。这次集中突出的报道与以往不同的是，除了保证首播新华社、人民日报的通稿外，我们积极进取，

搞了大量的地方特色广播，拍了许多新闻片和资料片。这些片子发回后，曾放给在机关工作的同志观看，使他们了解唐山地震的实情。据省委宣传部后来升为分管新闻宣传的副部长骆志安同志所撰回忆录《今生无悔》记载：“河北电台播出抗震救灾稿件 162 篇。其中具有广播特点的录音报道、录音讲话等 67 篇；河北电视台抢拍记录片 3.5 万多尺，其中公开编辑播出 69 条，大部分留作可贵的历史资料。

（注 1：河北《书刊报》2016 年纪念唐山大地震四十年，曾发表了笔者专稿《唐山大地震的广播战斗》一文，计 2500 字，对河北台及时修复震毁的唐山台实现正常播音，做了介绍。）

（注 2：上边一章，被中央最大新闻媒体新华社之新华出版社，于 2018 年 7 月出版的《唐山大地震往事》丛书第五卷全文发表，其对河北台及时修复震毁的唐山台及做好抗震救灾的宣传报道，做了详细的介绍。）

（注 3：河北人民广播电台为纪念建台 60 周年，于 2009 年编辑制作了大型精装画册《辉煌六十年》。其中对 1976 年 7 月 28 日唐山发生 7.8 级大地震后，河北台帮助修复震毁的唐山台和做好抗震救灾的报道工作，用了一个页面做了图文并茂的表述。但是，我做为当时最早率队出战的主要负责人（其他负责人为成忠顺、李春树副处长），在三个领队和参战人员都健在的情况下，竟发现这个《表述》，不论在出行时间和人员组成上，都存在重大差错。单是《表述》上面录下的左右两张参战同志在唐山的合影，就露出了明显的问题。比如其合影的说明词称：是“河北台第一批派出的前方报道组。”而其右边那张合影的背景画面，大门旁挂着唐山市革委

和抗震救灾指挥部的牌子，门额的大字横标却明显写着《庆祝国庆》四个大字。这显然说明：它不是“第一批派出的前方报道组”，而是地震两个月后派出的后续报道组了。那么，河北台第一批派出的修复唐山台的团队及其抗震救灾的宣传报道工作，真实情况如何呢？读者只要细看一下上面一章新华出版社发表的全文，就一清二楚了。）

第 29 章 感触党内斗争的点点滴滴

我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经历了马继联、白光和蔡宝峰三任军管组负责人和杨晋北、蔡宝峰和刘原生三位革委会主任，做为省电台革委会副主任的我，一直和他们保持着和谐的工作关系和战斗友谊。1974 年 10 月原生同志调任廊坊地委当书记，我就亲自找省委副书记尹哲同志，要求尽快派一位革命老同志到电台做一把手。后来省委决定史一凡（时任省委组织部组织处处长）同志到省广播局（台）任局长兼党组书记，我还亲自到省委组织部去迎接。开始，我和一凡同志相处得很不错。觉得他是一位朴实而又有点倔强的老同志。慢慢又发现他性格有些孤僻，工作方法有时简单、生硬和主观。再加上他文化不高，当过多年的县委书记，有一种“一把手”勇于“拍板定案”的习惯定式，跟其他几位文化和理论水平较高的副局长，常有磕碰。竟然有同志哭着报委屈，说“老史同志说话太难听！”那时，我一直维护老史同志的威信。总以其“性格直爽”，要求大家理解。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俩之间的磕碰也出现了。第一个叫我惊异的是：他突然提出把自己的办公室从二楼挪到一楼去。说二楼有几个副局长办公，群众到自己的办公室谈问题很不方便。我当时很震惊：“他怎么竟有如此防人的心理？”可我又不便硬拦，只得礼节性的劝阻两句不成，就叫后勤处帮他搬下去了。接着出现的是：有一次局党组讨论电台的形势，他不等大家发言，猛丁就冒出一句：“都说电台搞得怎么怎么好，我看没有那么好。这个好，那个好，都是刘 xx（指电台某革委会主任）胡吹出来的！”我一听新来的一把手对电台的形势竟是如此看法，照我那一贯的

“钢炮”脾气，立马就得顶回去。可这回我却硬是强压下去了。我想老史同志刚来不久，对电台情况还不大了解，经过实践他一定会改变的。但大伙就没那么容忍了。有几个同志就直面进行反驳。我一看，这么下去，有可能形成“对垒”，这“场”就不好收了……咋办？我只有讲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道理，才有可能把气氛稳下来。就说：“老史同志刚来不久，在调查研究中，他一定听到了这种反映，想讲给我们大家知道。这对我们更加一分为二的看问题总会有好处哟！我建议办公室把省革委政治部赵江主任和中央广播局董林副局长关于对河北电台的评价讲话，送老史同志看看。这些老史同志还没来得及看，我们平时交谈沟通汇报得也不够嘛！”我这么一说，争论的气氛还真的平静下来了，但老史同志对我的意见并没有正面回应。他好像怀疑我是用自己的“小办法”在拉帮结伙对付他……接下来，我俩在一些具体工作上也屡屡出现了不同意见。比如，他曾用一种很朴实的口气对我说：“这电台广播每个节目前都有个《开始曲》，有什么用呀！我们的任务不就是宣传么，干脆把《开始曲》去掉，多播一些实际内容好不好？”我听了只能委婉的回答：“那可不行呀！这节目前的《开始曲》不仅有那个节目的某种象征意义，还可以给听众留出收听节目的准备时间。国内外电台都是这样呀……”老史同志听我这么一说，不以为然道：“那我们就不兴改革一下？”我只得说：“全国的电台还没谁带这个头，我们还是‘稳’一点好呀！”很幸运，老史同志后来再没有提起这件事。再比如，电台一位老同志的孩子是残疾人。过去曾多次要求领导安排进电台工作。因为电台进人有严格规定：招工人要省劳动局批准，调干部要省革委政治部同意。还有一——当时国家也没有安排儿女进父母单位的例行规定。这些情况本来都和这位老同志说清楚

了，可他趁着老史同志新来乍到，就写了一个申请书递了上去。老史同志大笔一挥就批示同意了。并指示局政治处李瑞民主任送我和管人事的党组副书记张玉刚同志阅。玉刚同志和我都提出了不同意见。并把有关规定和情况做了介绍。老史同志听完，显得不那么高兴，但三个书记两位表示了不同意见，他也只得作罢。不过，此事留下了一个后果，这位为儿子求职的老同志把我和玉刚同志恨透了。还有一件类似的事是：电视台丢了一台电视机。政治处保卫科组织了专案组，怀疑是电视台某副台长偷的，写报告要求对该副台长立案审查。老史同志批示同意，送我和张玉刚同志传阅。我俩都问送件的政治处李主任：“有证据没有？”李主任说：“没有。只是怀疑。因为电视机很重，没有汽车偷不走。而这位副台长有调动汽车的条件……”我俩认为，这种“怀疑式”的立案法太简单化了，一旦立案审查就可能要限制人身自由。如果搞错了又如何收场？此事我俩只得又摆到老史同志面前讨论。结果又是三个书记两个不同意。老史同志虽然不大高兴，也只得作罢了。这事，后来因为有知情人举报破了案，竟是车队一个司机所为。老史同志倒也唏嘘感叹，好像总结了教训。另有一件想不到的事，就直接和我有关了。电台有两个年轻人，一个是打字员，另一个是播音员，表现不错。党支部列为培养入党的对象，局党组同意了。到1976年9月已培养了近一年，支部党员大会同意入党，要求党组审批。当时老史同志已轮换去了唐山抗震前线。我就主持党组开会同意了支部的意见。后来省委宣传部长徐纯性同志为此找我谈话，说：

“你们批了两个年轻人入党，事先没跟老史同志通气吧？”

“没有。”我一听就知道是老史同志告了我的状，除了照实回答，随后就问了一句：“这在原则上有什么问题吗？”

“原则上没问题。我是说，你和老史同志事先通个气不是更好吗！”

“这怨我太大意了。我觉得那两个年轻人做培养入党的对象，都是党组一致同意的。批准时八个党组成员，除了老史同志不在，七个都同意，又写进了党组会议记要，就有点粗心大意了。我接受批评，今后多注意吧！”

谈话很顺畅的结束了。不过，我心里还是想得有些：“老史同志对此有批评意见，咋不跟我谈谈呢？还要告到徐部长那里？今后即使是原则上没问题，也一定要记住多通气多酝酿多讨论了。那怕延长些时间，也力求达成圆满的共识。。比如 1977 年春天，省委宣传部在保定召开全省宣传工作会议，老史同志代表省广播局参加。会上表扬了一批新闻工作者，其中有电台的编辑兼记者 w 同志。省委宣传部在报道会议的新闻中，要求全省新闻工作者向这些模范同志学习。电台的同志们听到这个消息舆论哗然。因为大家从来没有评选过该同志当什么模范人物呀！编辑部主任林章同志很惊诧地问我是什么回事，我做为在机关主持工作的党组副书记，又分管负责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宣传工作，竟也是一无所知，就找来分管人事的党组副书记张玉刚和政治处主任李瑞民同志询问。他二人竟也说不知道。不用说这件事是与会的老史同志个人提议的。怎么办？立马找老史同志交换意见，他当时仍在保定的会上，显然不现实。为了稳住群起质询的不满情绪，在机关的党组同志，采取了内部冷处理的方法，便立刻报告了宣传部。宣传部立刻采取措施闸住了对该同志的表扬宣传。这样一种处理办法，后边我没和老史同老再提起过，但我相信老史同志会从中得到自己的教训。而群众方面由此引发的不满情绪却因为宣传工作会议的果断处理从而得到稳定化解，这个

结果也还是不错的。再比如毛主席号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既要各级党委加强一元化领导，不搞串连，不搞战斗队；又要求各级党委要联系实际。而这两方面的结合并不那么好把握。再加上各级领导对邓小平复出后“既翻案又复辟”的所谓“各行各业的整顿”，虽然邓小平一直批评许多领导班子“懒、散、软”，跟不上他。可大多数领导还是用心跟了的。而要联系实际，就不可避免的要引火烧身，做自我批评。说心里话，这对当时的领导包括我自己都有相当的压力啊！比如我分管广播电视的宣传。就在省委宣传部的支持和帮助下，搞了八期“整顿就是革命”的讲座。虽说这是顺着“两报一刊”的势头搞的。但从认识论上讲，自己见识很迟，直到毛主席讲了“阶级斗争是纲，其他都是目”之后，才警醒到邓小平那个“三项指示为纲”的说教，是其妄图“搞翻案复辟”的大阴谋。我难道不要对此深刻检讨吗？就是在这么一种复杂的心态下，我主持党组讨论“联系实际”时也是煞费苦心的。当时党组讨论出两种意见：一是老史同志不在，联系到电台全局性的问题不好表态处理，最好等他回来再正式开展；二是认为，如此消极等待不符合毛主席的指示，也不符合省委的部署。想慎重行事，可采取走一步看一步的“随大流”办法。最后大家决定照“随大流”的办法办。这么一来，群众当中五花八门的大字报都出来了。其中既点到了我分管的那个“整顿就是革命”的讲座，是方向路线错误；也点到了老史同志对电台大好形势的否定，是给文化大革命抹黑。但大多是批评领导思想作风方面的问题。如果按数量分析，列到老史头上的比我要多。这些办公室都写了《简报》，报了省委并下发到电台的党支部。就在这时，老史同志回到了机关。他看了“批邓联系实际”的简报，特别是看到一个革委会委员王xx批评他“否定

电台大好形势”的大字报，十分恼火。公开对我说：

“联系实际联到了我的头上，你恩泽同志为啥不跟我通气就印发《简报》？是不是在鼓动群众把矛头指向我？”

“哎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并联系实际’，这是毛主席领导的全党和全民参加的重要政治运动，电台发出的《简报》只是反映咱机关‘联系时际’的情况，这完全是例行公事，并没有什么定论嘛！有许多大字报不是也点了我的名么，这很正常嘛！你咋能往这方面去想呢？”

“我这个人说话从不遮掩。你恩泽同志为啥不寸量点？难道不怕‘你出一拳，我要还回一脚吗？’

“老史同志，你要这么认定，我有八张嘴也说不清了，只有听便……”

谈到这个程度，我开始尝到：“党内斗争”的存在，它不是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这种“党内斗争”有时表现在思想范畴，有时表现为路线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不可避免的。

1976年3月29日到4月22日，我奉命参加毛主席批准召开的全国电视工作会议。同去的还有省委宣传部的新闻处长骆志安同志。以及河北电视台副台长徐丙跃、编辑组长杨兴盛和新闻组长白守义同志。我们一行五人3月27日报到，住在北京前门饭店。28日举行预备会，我被确定为华北地区的“招集人”。29日正式开幕。中央广播局长邓岗同志致开幕词。他说：“这次全国电视工作会议，是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召开的，是由中央文革和姚文元同志直接领导的，研究讨论广播电视的发展问题。出席会议的共有200人。会议预计开三周，前两周在北京举行，后一周到上海参观学习。会议开始的几天，首先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进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

风的斗争。要求各省、市、自治区都要有代表发言。我代表河北发表了讲话。因为会议期间，正赶上“清明节”，天安门出现以追悼周总理为名实际上反对党中央的“四·五”反革命事件。当时天安门人山人海，花圈林立。河北省委对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很挂劲。他们虽然估计到了这是“党内斗争”的一种反映，可又无法清楚地认定各方的态势，就指示骆志安和我利用开全国电视会议的当儿，到天安门广场去了解一下，并走访河北调到中央的老同志，摸一摸内里的实情。我和骆志安处长照办了。4月5日傍晚，我俩从北京广播局借了一辆“菲雅特”轿车就去了。在人丛中，我俩看到许多挂在花圈上的诗文，并非是悼念周总理，而是在攻击江青和张春桥同志，影射伟大领袖毛主席。就在这时，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对天安门广场的人群发表讲话，指出：有一小撮阶级敌人以追悼周总理为名，制造反对党中央的反革命活动。请广大同志提高警惕，主动撤离天安门广场。我俩看到许多人往外撤了，也忙随着离开。骆志安处长第二天赶回石家庄向省委做了汇报。当天又返回北京开会。4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两个决议：一、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到这时，各级领导机关和广大群众才洞见了“党内斗争”竟是如此的激烈和残酷，原来邓小平竟是制造天安门“四·五”反革命事件的黑后台。

等我开会回来，全国声讨邓小平、批判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已经进入高潮。电台在这种大形势下，也是紧紧跟随的。谁也没想到1976年9月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突然逝世了，大家都觉得像塌了天似的，举国痛哭呀！我和爱人在哭泣之中，她担心地提到：“毛主

席逝世了，中国怎么办呀？”我信心百倍地说：“毛泽东思想早已深入人心，我们继续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前进呀！”她却看得不那么简单，说：“邓小平能鼓动多少万人，在清明节闹出那么大的举动，你不能小看邓小平的势力呀！我看邓小平的后边会有一批同路的大人物支持哩！”我还是信心百倍地说：“邓小平搞右倾翻案不得人心，它已经被批得臭不可闻了。谁还不看头势去跟他？如果邓小平再闹，就一定会开除他的党籍，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啦！”爱人见我十分乐观，只得说：“我看咱还是清醒一点为好，来个静观，静观，再静观吧！”

真是中了爱人的说法：10月6日，华国锋（注5：本文后边补录了作者发在网上的两篇揭批叛徒华国锋和邓江湖修党集团的文章）发动军事政变，抓了毛主席培养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四位文化大革命的旗手，说这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这一下子把我震得懵特了。因为这“四人帮”一词，我和爱人从来没听说过呀！。就忙去找八届的老中央委员、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同志寻问。他竟然也不知道中央有个“四人帮”。不过，他告诫我说：“华国锋同志是毛主席确定的接班人，我们只能相信，不能有其他想法呀！”

我回到家就把子厚同志的“告诫”同爱人讲了。她不以为然道：“本人和你们这些当官的不同，你们得照‘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表态支持。我是普通女工和一般党员，则要照‘独立思考’的原则。要继续静观一段再说，咱谁也不要勉强谁可以吧？”

“可以。”

我说是用“可以”淡化了两口子之间的分歧。但我在爱人的严正态度面前，还是禁不住做了一些逆向思考：“华国锋说，江青折

磨毛主席的身体，破坏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大革命，搞‘四人帮’是要篡党夺权……这会是真的吗？这可能吗？谁不知道毛主席和江青是革命的结合呀？咋会折磨毛主席的身体呢？我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听过江青同志的一些讲话，一向认为她讲得很有水平和战斗力呀！至于张春桥和姚文元，那是人人皆知毛主席非常信任的马列主义政论家，他们发表的重要文章都是经毛主席亲自审阅过的……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反党集团’了呢？如果她们变成了‘反党集团’，全国跟他们冲锋陷阵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包括我自己不就都成‘反党爪牙’了吗？不行！我们还真不能叫华国锋给蛊惑了，凡事都要留个心眼哩……”想到这里，我便给自己定了两手策略：即一要尽量少出头少讲话；二要细心观察华国锋的各种表现。我终于看出了华国锋的一个大破绽：10月23日，河北省会石家庄在举行万人大会游行庆祝粉碎“四人帮”时，打出的横标有“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而且这个话也是华国锋政变成功后向全国人民公开讲过的。可等到中央政治局委员纪登奎（注：纪曾经是毛主席生前非常信任的领导骨干。党的“九大”时，毛主席高兴的呼纪是自己的“老朋友”）看到石家庄的游行录相有“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横标时，竟立刻给刘子厚同志打来电话说：“已经打倒‘四人帮’了。你们怎么还打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横标呀？这不符合今天的宣传口径嘛！你们要再举行一次游行示威，不准再有‘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横标！”刘子厚也是毛主席十分信任和喜欢的老同志，他1926年参加革命，比纪登奎要早得多，不知为啥，他竟未和纪登奎辩解就照办了。10月25日真的就又照纪登奎的指示，搞了这么一次没有“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横标的示威游行。虽然纪登奎的电话指示是保密的。当时绝大多数人都蒙在

鼓里，但我在第一时间就知道了。心里就做出了这样的判断：“纪登奎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指令河北制造的这个政治明示的小插曲，绝对不会是纪个人的意见。照当时中央大喊的华那个‘英明领袖’的桂冠，肯定是执行的华的意旨。这恰恰说明，华国锋高喊的那个粉碎‘四人帮’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完全是唬人的谎言呀！”

只是——华国锋后边又来了一手“建毛主席纪念堂、永远保留毛主席遗体供人民瞻仰、并出版《毛选五卷》”的大举动。这让我心里猛丁闪了一下：“咦，华这两手很厉害呀！他是用以收买人心呢？还是想用这个标签宣称他是毛主席的阵营中维护毛泽东思想的一派呢……”其实，还没等我费神细想，华国锋就又来一个充满杀机的“清理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大运动。那是“过筛子又过罗”拉网式的清查，简称“揭批查”。公开对参加“文革”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搞血腥的反攻倒算！这时候，应该说以刘子厚同志为首的河北省委是清醒而又巧妙地进行了抵制的。子厚同志认为：“揭批查”名为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实际上是清算“文化大革命”的。而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九届、十届和十一届党代会都是高度肯定的。如果不顾这个最根本的政治前提去大搞什么“揭批查”，那肯定会搞乱阶级阵线，最终是把整个社会主义颠覆掉呀！于是，他便采取了“表面讲两句，实际上应付不做”的巧妙办法。正是他的这种清醒，对河北“文革”中曾经出现过的两派，他既没有像其他省那样，挑动这一派揭另一派，更没有在整体上做实质性的号召和动员。河北的整个形势总体稳定。但是，却在我们河北电台出了点意外：省广播局长史一凡同志在一次座谈会上讲：“跟‘四人帮’能牵连上的人和事，小罗卜头是不会沾边的，只有像恩泽同志这样的省革委常

委级的同志才有可能。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估计，到底有没有事，还得过过罗网才能知道……”他虽然讲得貌似很“辩证”，还是把原来一些“派性未泯”的人给勾起来了，有些人就挑头要求“高恩泽应主动交待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对此，我平静如水，只是在党组扩大会上，郑重做了这样一个回应：“现在有同志让我交待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我愿意诚恳地负责地向同志们申明：本人根本不知道中央有个‘四人帮’。为这，我还找老中央委员刘子厚同志去了解过，他竟然也不知道中央有个‘四人帮’。所以，在十年‘文革’中，我前七年是在军管组和省军区党委领导下工作。后三年直到今天是在中共河北省委领导下工作。本人在政治思想和工作方面的情况，他们都是很清楚的。欢迎组织调查。”我这样一讲，多数同志相信我的表态，也有部分同志认为我是“故作姿态”，想堵住“揭批查”开辟的口子。这么一来，竟然出现两种不同观点的同志，都有人向省委宣传部去反映自己的意见。宣传部见此，立刻派出调查组进驻河北电台，进行调查研究。省委副书记尹哲和管人事的常委谷奇峰同志以及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安耀光同志，也分别找老史同志和我谈话，几位老领导定了几条非常明确的原则和要求：一是史、高都不要批评对方，自己的错误和毛病由自己主动讲；二是文化大革命中，高恩泽同志参与主持电台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史一凡同志调入电台后的工作成绩也是主要的；三是粉碎“四人帮”前批邓联系实际中涉及史一凡同志是错误的。粉碎“四人帮”之后“揭批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涉及高恩泽同志也是错误的。希望史、高二同志各自多做自我批评，并向群众公开检讨，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几位领导讲完这些原则和要求后，还特别叮正我俩：

“你二位同意不同意？”

“同意！”

我俩异口同声的回答。就这样，我俩握手言和。在落实了省委的指示和要求后，整个电台的形势和团结状况很快就有了向好的发展。

1977 年秋末，省委按照轮换办法每年向农村派出学大寨工作队的制度（时间一年），在省直进行了动员部署。我带头报名参加。宣传部徐纯性部长和吴庆诚副部长都不同意我这一批去，我三番五次的请求，最后终于答应了。我们这支工作队一行 25 人，派驻河间。队长是河北省农行行长牛云龙同志。副队长是宣传部副部长杨惠成、省展览办公室副主任高无际和我。我带省广播局的薛星明（副处长）、赵玉斋、安富余、于文运、孙旭东、绪瑞英（五位均为编辑）张映珊（文艺组副组长）、刘述（播音组长）簿清怀、任国瑞、孙思建（以上三位均为干部），来到河间县西北二十多里的东堤大队。

这个大队紧靠古运河。相传乾隆下江南路过此地，纳了一个妃子，但只睡了一夜并没有带走。以后就由官家出钱好吃好喝地养着，直到老病而死，在东堤运河边上给她修了个像模像样的“娘娘坟”。尽管村里守着大运河，又有这么一点和皇上沾边的风水，可这里经济发展比较慢。我们进村时算是公社比较穷的大队。用社员的话说，叫“靠鸡屁户银行” 支撑日子。实际就是靠养几只鸡下蛋卖点小钱。我们经过调查研究，发现村里的基本情况并不差，大小队干部没啥大问题。只是能力差些，工作力度比较软弱。我们没有采取通常使用的“大换班” 办法，主要是帮助他们提高驾驭工作的能力，研究开拓生产门路的办法。有效地安定了干部队伍，提高了他们发展集体经济的积极性。春节前夕，根据省委指示，工作队要移风易俗，

打破传统习惯，留在农村和社员一起过春节。我们本来都有了这种思想准备。可等到临近春节，省委又指示工作队回机关过年。我们匆匆赶回石家庄，过完春节即返回东堤大队。

工作了没几天，机关给我们送给养的同志传出一个不可想像的大道消息：说是河北电台文艺组编辑平国田没有把好关，播出了几句“批邓”的歌曲，这还了得！邓这时已经是华国锋、叶剑英之后的中央第三号领导人，这个事故被列为“政治事故”，平国田受了党内警告处分，还为此改组了广播局领导班子，宣布把省局一、二把手史一凡和高恩泽调走。由省委宣传部长徐纯性同志兼局长，调省文化局赵纯同志任常务副局长……。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震惊。但更多的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电台稿件的播出历来实行的是‘三审制’呀！负责一审的文艺编辑平国田同志没有把好关，那二审一级、三审一级干什么去了？如果责任编辑只受了个‘党内警告处分’，缘何要改组省局领导班子，把广播局一、二把手都调走？还要开个新纪元——由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去兼省广播局长？如果省委想追究一下电台领导人的责任，我已下乡工作达五个月之久，这个事故又与我何干？退一步讲，就是想无端追究一个远在四百里之外毫无干系的二把手，也应该跟我谈一谈呀！河北省委做为高级的领导机关，省委组织部和宣传部做为高级的主管部门，都是非常熟悉党的组织原则和优良传统的行家里手，缘何却对我斩而不宣？难道其中出了什么“泰山压顶”的紧急情况，无法去顾及党的组织原则和优良传统吗？我百思不得其解。便去找和我同时来的却不在一村包队的宣传部副部长杨惠成同志去打问。他是一直分管宣传系统人事工作的。我想他对此或许有某种程度的了解。令人始料未及的是：他却回答得十分有趣和简单：“组织上既然不跟你

谈，你就别理它。安心咱那学大寨就是了！”我又去找工作队长牛云龙行长说这事，老行长竟和杨惠成副部长讲得一样有趣。他说：“上边不跟你谈，一定是省委有什么难言之隐，不好跟你开口呀！你干脆不要理他，继续干咱的学大寨！”

听了两位老同志的话，我还真的硬着头皮不再捣咕这事了。两个月后我回去换季，见到了到电台刚上任不久的赵纯同志。他客气而又委婉地说：“史一凡同志早已经去了省科协，当副主席，正主席由一位科学家挂名。你的情况我还真不清楚。组织上突然一个命令我就过来了。你想了解底细，就去找徐部长谈谈。”

这时候，我的思想有了新变化：“人家老史同志早去省科协上班了，我再这么‘闷’下去干那‘学大寨工作队’，总觉得也不是个正常的作法呀！就去找了宣传部长徐纯性同志。徐部长见了我十二分的亲切。他说：

“电台这事你可能听说了。平国田编辑没有把住第一关，并不是他没做‘把关’的工作，而是他消磁灭迹搞得不干净却误认为干净了，结果露出了两句‘批邓’的歌词。是工作粗心造成的。谷奇峰同志批示要总结经验教训，马辉同志批示要严肃处理，宣传部就是照这些指示做的。组织上最终也只是给了平国田一个警告处分。最后升级到要调整省广播局一、二把手的工作，是省委决定的。我想到了你会有意见，就没有立刻通知你，想冷却一段再谈可能好些……”

“其实，这事是无法冷却的。这么大的事我要轧根不知道，你冷却一段还行。我很快就听说了，却没有省委领导和主管部门领导跟我谈一句话，这无法令人接受呀！更难理解的是：“一个普通编辑造成的普通政治事故，连在家的二审和二审都没追究，却要追究

到了一个已经下乡五个月之久的二把手头上，这到底是为什么？”

“小高，这个你就别细追了。省委不就是调整了一下你俩工作么，并没讲你俩有啥问题呀！我意见你有啥想不开的，可以跟我讲，也可以跟组织部去谈。最后还得要照省委的决定办是不是？”

“个人服从组织的原则我懂。但问题不分清是非，那就使本来正确的原则规定也要变味了。”

“咱不讲那么多了。你愿回‘学大寨工作队’干一段也可以。不愿回去就休息一下，我跟组织部商量一下你的工作……”

“好。我现在就去组织部谈谈！”

我接着就去了省委组织部“干部一处”（负责管理高干的处）。处长何瑞武同志是老熟人了。他一直享有“忠厚、老实、直言”的好名声。我跟他慷慨激昂地讲了一通自己的困惑和意见。没想到他回答得非常简单：“你觉得委屈冤枉，老史也觉得委屈得不行，他那么一大把年纪了，竟在我这里大哭了一场。其实有啥呀！不就是调整一下你俩的工作，并没给你俩扣什么问题嘛！你小高还年轻，省委的意思，是让你挂职下放去锻炼锻炼，去二年就回来……”

“什么？挂职下放？我下放锻炼还少吗？我挂职下放县委让我去当一个农村高级社长，还当过一年的公社社员，你难道不知道？”

“但你还缺工业方面的锻炼！”何瑞武同志振振有词：“有了工业方面的锻炼，你的能力就比较全面了。”

“如果是在平时，省委想提高我的综合工作能力，下放到工业战线去，我会高兴的理解。今天放到‘改组’这么一个当口，而且又是斩而后宣，我认为就不正常了……”

这时，何瑞武同志苦笑道：“如果我说的你想不通，你可以跟谷奇峰同志去谈谈。”

不过，我没有去找谷奇峰。他肯定和何瑞武同志是一个调门。便在第二天一早去了省委二把手、省军区司令员兼省委书记马辉同志家里。马辉同志虽然不具体分管人事，但协助刘子厚同志负责省里的全面工作，在省委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再加上他一直关怀我的成长，没有什么心里话不能对他说。等我来到他的家里，老将军还没有起床。听说我来了，他立马起床到客厅见我。我照样讲了自己的困惑和意见，他以军人的气质直言道：

“我理解你的意见，但是我做不了这个主。这是省委决定的。”

马辉同志这两句话，顿时使我彻悟：“这一切，一定是刘子厚同志主导决定的。我一定要找刘子厚同志去谈！”

照说，我和子厚同志一直有着很好的同志关系。十年“文革”中，因为工作上的事，我到 he 那里去请示或汇报，不用事先招呼，推门就可以进去，那是非常顺畅而愉快的。我感到他对我是十分信任的，总是用心培养我、支持我的工作。但华、叶、邓上台后，省里想见高层领导就有严格规定了。比方说河北省委就规定，下边部门负责人想见省委主要领导人，要先向办公厅挂号，待安排后才能会见。我自然得照规定办事。谁知也不知是子厚同志太忙，还是另有别的原因，我给办公厅挂号后左等了右等，就是没见成。有一天，我见到了另一个省委书记、全国著名劳模吕玉兰同志（注3：后边补录了作者发表在网上一篇关于吕玉兰蒙冤病死的文章），交谈中说起了我这件感到困惑的事，她很关切地对我说：“你还真得找子厚同志谈谈，有人给他递了个材料，说你‘反对刘子厚’。我和马司令员都不信，说这是造谣诬蔑，挑拨离间。可这个材料——子厚同志并没让书记们传阅，也没有当做公案去调查处理。我想你找他谈谈有好处……”听玉兰同志这么一说，我实在难掩对那种卑鄙小

人造谣诬蔑、挑拨离间的愤怒。但我到底还相信子厚同志为人处事的基本水平，他还不至于那么简单的就听信小人之言受骗上当的。又有一天，我和爱人刘淑琴上街，在青园街口碰上了子厚同志的夫人刘东同志（时任省科委副主任），她热情地握着我的手开玩笑说：“瞧你们两口子，一个是胖子，一个是瘦子……”我哪有心思和她说笑，忙说：“噢，拜托刘主任个公事，我想和子厚同志谈谈，给办公厅挂了号，总谈不成……”刘东同志不等我说完，就非常开朗地说：“你还挂什么号呀！你什么时候去都行。”

刘东同志虽然讲得敞快，可我也不能“越规”前去呀！爱人刘淑琴看到这前前后后的一切，她抛出了一个惊人的见解：“我看你不要找了，干脆给省委写个辞职报告，不要任何官职，也不要搞那个挂职锻炼。就当个普通编辑。这是你的一技之长，对党和国家，对你个人有益而无害，省委没有理由不同意的。”

“辞职？”我震惊道：“共产党还没有辞职这一说呀！跟组织闹辞职有‘对抗组织’之嫌呢！”

“就说你是‘对抗’又怎么着？”爱人坦荡道：“无非是给你个处分。叫我看，宁可背个处分，也要干自己所长。更何况党一直是培养你当个好编辑呢！人家那个陶渊明比你这个共产党员厉害，连五斗米的俸禄都不要了，硬是去了自己喜欢的‘世外桃源’……”

“你这是说的哪儿去咧？亏你还是共产党员呢！共产党员能跟陶渊明类比吗？”

“可能我类比得不对。但我那个建议是不是有点可取之处呢？你可以再考虑一下，我不勉强你。你最终就是去挂职锻炼，我也一定当好你的后盾。”

两口子就这样在党性原则的指导下达成了统一。

后边我终于在宣传部主管报社电台的副部长骆志安同志（注：后边补录了作者一篇发在网上的关于骆志安同志的文章）那里，了解到刘子厚同志处理上述公案的实情。骆副部长说：“2月16日徐部长向刘子厚同志汇报后，受到子厚同志的严肃批评，质问宣传部为什么不赶快处理？为什么不赶快向中央报告？为什么不改组电台的领导班子。你们要拿出安排意见，明天省委开会研究，徐部长在和省委组织部研究后，正式发出了《关于调整省广播局领导班子的通知》，该《通知》的原文是：‘为了加强省广播电台的工作，建全省广播局领导班子，我们已责成省委宣传部帮助省广播局进一步检查工作，整顿队伍。并决定对省广播局的领导干部进行组织调整，将原一、二把手调出，另选派适当人选担任一、二把手。在新配备的一、二把手到职之前，省广播局的一把手暂由省委宣传部长兼任，另派一个副局长（党组副书记），主持日常工作’。”列位，看看这个紧急书就并上报中央的《通知》，其文书格式和措词含义，是不是有几个令人费解之处？我冒昧地做了如下粗浅的分析：1、名义上说是省委发的通知，整体看起来，却更像是省委向中央表明心迹、从重处理“事故”的紧急报告。但是，如此严肃的《通知和报告》却没有“主语”。就是说，它讲了半天并没有明确点出省广播局（台）到底出了什么要省委如此紧急从重处理的“惊天”问题！如此奇怪的行文模式，透出了省委领导同志思维的某种紊乱，也露出了省委领导同志有“小题大作取悦邓小平”之嫌；2、刘子厚同志把他内部讲的显示问题严重的、要对电台领导班子“改组”的二字，突然在这个上报中央的《通知》当中，改成了具有某种正常意义的“调整”二字，这种调门的突然降低，我可以认为是子厚同志对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了某种程度的回归，也可以想到是他

要给调离电台的一、二把手一点小小的安慰，以减少其善后工作的难度。或者说这两者兼而有之；3、这样紧急的《省委通知兼向中央的报告》，文中要把调出的一、二把手的名字点出来，本也完全顺理成章。但文中却没有点。这种“葫芦”手法，不论怎么分析，我认为子厚同志还是给电台的一、二把手史一凡和高恩泽留了一点善意安抚的面子。不过，尽管子厚同志用心良苦，我还是要对子厚同志做出自己的严正批评：首先，子厚同志对整个问题的认定和处理，原则上有违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二、子厚同志在其内心深处，有“害怕邓小平怪罪下来殃及自己”的“私字”作怪，少了一点革命老领导那种应有的担当。20多年后的1998年10月18日，我和河北著名表演艺术家王瑞楼女士，到河北省医院看望同样是劫后余生的子厚同志。已经九十高龄的他，因为感冒住院疗养，但其身体仍然硬朗，思维敏捷，声音宏亮。令我感动的是：他对我仍然还是那么一往深情的关心、信任和爱戴。在谈笑风声中，他高兴地说：

“我已经被中央列为‘中共党史人物’，中央党史出版社要出一本《刘子厚年谱与传记》。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编。我已邀了几个人明天到这儿来研究，你也来参加一下吧！”

“哎呀，我来不了哩！明天我要去山西大寨采访，正写着一部长篇小说……等你的传记出来我一定拜读。不过，你老被胡耀邦整得那么厉害，今天终于翻了身！真是可喜可贺呀！但不幸的是，我们这些跟你干的还是‘紧跟林彪和江青的帮派分子’呢！”

“什么紧跟林彪、‘四人帮’？这是天大的笑话！你跟林彪、‘四人帮’毫不沾边嘛！一直是在河北省军区和河北省委领导下工作，工作得蛮不错嘛！不过，我犯了个‘天真’的错误：以为我的问题解决了，你们的问题会迎刃而解。结果蛮不是那么回事。中央

组织部给我正名的红头文件，河北省委根本不传达嘛！咦，我要给你写几句话，你拿笔记着。我这手抖，但还可以写大字签名……”

临别时，子厚同志邀我和王瑞楼女士到北京他那里住一段，我俩高兴地答应。

注 1：《刘子厚年谱与传记》已于 2000 年四月，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

注 2：复录中共中央组织部给刘子厚同志的平反信：

刘子厚同志：

你写给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信转到中央组织部后，我们做了认真的研究。你在来信中说，河北省在批判你时，有的同志和省报把您说成是“四人帮”的人，说您坚决彻底执行了“四人帮”的路线，还说河北有一个“刘帮”等。根据中央有关文件和资料的记载，中央对您几十年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同时，对您在“文革”中的表现和“文革”后在河北工作期间的情况，也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您自 1958 年到河北工作，20 多年来对河北的工作和建设做出过很大贡献，为河北人民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河北人民是不会忘记的。中央从未认为您是“四人帮”的人，也没有说过您“坚决彻底执行‘四人帮’路线和河北有一个所谓“刘帮”的话。至于当时省里有的人以及地方报纸说过一些与中央对您的分析和评价不一致的话，不能作为依据。这些事已过多年，现在也只能本着宜粗不宜细的精神处理，望您不要过多去想。现在，河北广大干部、群众在党的十四大精神指引下，正在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争取经济上新台阶，夺取新胜利，形势很好。希望您能继续为稳定河北、振兴河北，作出新的贡献，为建设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新贡献。

对您的来信，我们将把它存档备案。我们给您的这封信，同时也抄送了河北省委。祝你健康长寿！

此复，

中共中央组织部

1993 年 8 月 17 日

注 3：江山同志为劳模吕玉兰作传：

披露这位女中豪杰蒙冤病死的真相

1998 年四月的一天，新华社高级记者、全国著名劳模吕玉兰同志的丈夫江山同志来到我家，邀我参加他撰写的新书《吕玉兰》发布会。做为江山和吕玉兰同志的老朋友，我当然高兴地答应。来到发布会的现场——省委小礼堂，已经有几百人落座，大家正高兴地翻阅着这本以毛主席和吕玉兰亲切握手大照片为封面的新书。省委老常委兼宣传部长、时任省政协常务副主席的徐纯性同志见我来了，忙招呼我坐在他的身边，俩人一边翻看着新书，一边进行交谈。在发布会主题讲话后举行的座谈会上，同志们纷纷登台发表着各自的感想和意见。许多人讲到吕玉兰高小毕业回乡务农，1955 年 15 岁上当选为农业社长，被誉为新中国最年轻的社长，在全国知识青年中影响很大。1960 年 20 岁的吕玉兰又当上了村党支部书记。她身体力行，带领党员和社员战天斗地，艰苦创业，硬是把临西县她那个东留善固穷山窝，变成了林茂粮丰、五业兴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一举成为全国著名劳动模范。文化大革命中，她虽然也受到很大冲击，但她坚信党和毛主席，不久就在革命群众和解放军的支持下，担任了人民公社和县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党的“九大”上她当

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接着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分管全省农业工作。但是，到 1980 年初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同志被调走后，她就开始挨整了。“八大”莫须有的罪名扣在了她的头上，省纪委一审查就是三年。虽然最终审查结论没有任何问题，可长时间的政治压仰，吕玉兰终于抑郁成疾，于 1990 年不治逝世。当时大家都对这样一位女中豪杰英年早逝而难过。今天也为玉兰同志蒙冤得到昭雪、有这么一本厚重的传记留给当代和后世感到安慰和高兴。

但是，在这个座谈会上也出现了一点杂音。一位到会的号称“省报评论家”的名人登台大讲道：吕玉兰最大的悲剧是不该当省委书记，她本来是个当劳模的料，中央提她当省委书记是害了她。如果她只是个劳模也不会有省纪委审查她这一锅。看来过去把一些劳模提到领导岗位上来，这是一个教训。邓小平、胡耀邦同志拨乱反正，让这些劳模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也是批“左”的一个方面。我听了这位“评论家”的发言，不禁火起，立刻登台发言道：“中国是毛主席开创的堂堂社会主义国家，做了主人的工农大众的模范人物和代表，为什么不可以提为领导？吕玉兰同志能模范地领导一个公社、一个县，为什么不能提为省委书记？难道还要走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的老路才是正确的吗？毛主席、周总理正是让陈永贵这样的劳模当国务院副总理，让吴桂贤这样的工人劳模当政治局委员，才开创了无产阶级管理国家大事的新纪元。吕玉兰同志当省委书记干得很出色么！我要毫不夸张地说，吕玉兰当社长是好样的，当县委书记是好样的，当省委书记同样是好样的！”老常委兼宣传部长徐纯性同志，这时也起身登台发言道：“我发现现在有一种不好的倾向，一提过去就扣上一个‘左’字，好像什么都‘左’，包

括我们的干部政策也‘左’。甚至跟石家庄叫‘左’家庄。其实这是一种戴着有色眼镜的偏见。实事求是地说，过去有‘左’的东西，也有右的东西，但决不是都‘左’。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应该是实事求是的分析，有‘左’批‘左’，有右批右。吕玉兰同志做为省委书记协助刘子厚同志主抓农业是干得蛮不错的，算得上是出色的省委书记。她蒙受无端的审查并被免职，是一种政治上的偏见所致，并不是她不称职嘛！大家看一看，直到今天仍有一些劳模在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工作，比如天津市长李瑞环、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还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倪志福、中央后补书记郝建秀等等，中央并没有‘一刀切’么！”

散会后，我回到家里仔细阅读了《吕玉兰》，才清楚知道，做为中共中央委员、尚未免去河北省委书记的她，1980年11月3日省委一位领导找吕玉兰谈话，说“有人告状，说你有八大问题很严重”，但是什么问题这位省领导又不明讲，只是说“要进一步审查”。江山同志就此写道：“那天天空阴沉沉的，北风一阵紧似一阵。玉兰从省委大院回到家里，脸上失去了平日那红润的光彩和生动的脸形，没有血色，没有表情，像傻了一样。她晚饭也没有吃，就进了卧室，躺在床上……”等江山问清了原委，多方安慰她时，玉兰忧郁地说：“有的人长期搞诬告，啥事干不出来？万一俺回家当农民或是进监狱，你和孩子怎么办？”她一边说着一边哭，整整谈了一夜，也哭了一夜。1980年12月6日，也就是一个月另三天之后，中共河北省委发出通知：“经中共中央批准，免去吕玉兰同志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的职务，下放锻炼。”看到这里，我从字里行间发现了极不正常的问题：吕玉兰是中央管理的干部，不要说省委的某个领导，就是省委集体也无权决定对她的审查。河

北省委的那位领导咋就凭一封告状信，说越权就越权对吕玉兰进行审查呢？这个家伙如此胆大妄为，我想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奉了中央顶级大人物的指令，才敢如此放肆地甩掉严肃的组织原则，而毫无顾忌地横冲直闯。等我后边看到江山同志采访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金明的记录，才算进一步认定了我的这种推测。曾经任过国务院秘书长后来担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的金明对江山说：“吕玉兰可是个好同志啊！她文化程度不高，可是忠诚、老实、厚道。吕玉兰同志多次找我谈过她的问题，觉得自己受了冤枉，有时还边谈边哭。吕玉兰这个人老实，不大活动。她带着‘八大问题’下去，心里难受，心情不舒畅。我鼓励她，安慰她，我也不好多说，当时没办法。我是尽量保护她。我不是故意保护她，因为事实不对嘛！不应该那么对待吕玉兰，但是‘很多事情有阻力’，我‘受到很多限制’，没做到。吕玉兰的家里不是那个情况，工作上面没什么问题，没什么失误。不要说没有犯大的错误，就是小的错误也没犯过。她的病跟这次打击有关系。她是受冤屈得的病。也就是说，他心里窝着一肚子火。金明说到这里，已经热泪满面。”从金明这诚恳而又不能深说的谈话里，可以看出，做为河北省委第一书记，他竟无法按照组织原则主导或着实事求是对待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对吕玉兰的审查问题，其处境已经到了不能实施正常领导的困难程度。金明不便点明的那个“很大阻力”来自何方？那个“很多限制”来自何方？列位想想看，除了中央的顶级人物邓小平、胡耀邦，还能是别人吗！笔者写到这里，干脆说白了：因为玉兰同志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太紧了，又跟邓、胡反感的刘子厚同志配合得不错，改革开放后又不会搞两面派，更不当投降派，修字号的中央那是非收拾她不可的。

注 4：《贴大字报获罪

——省委书记赵一民如此报复骆志安同志》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共河北省委分管组织人事的书记赵一民，就因为“文革”中曾经给他贴了几张大字报而动用非组织手段整倒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骆志安的事，省委大院的同志可谓尽人皆知。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王玉和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徐纯性，以及骆志安同志本人都跟我讲了这件事的经过，我这个老新闻战士责任所系都记下来了。

骆志安同志是毛主席、共产党培养的“红小鬼”。他老家在天津市宝坻县。解放前家里非常贫寒。十几岁的他就投奔共产党，参加了抗日战争。日本投降后，宝坻县又成为国共激烈争夺的拉锯区。骆志安同志做为中共的区委书记，带领全区党员和群众，支援前线，在险峻恶劣的环境中几次和死神擦肩而过。解放后，他调河北省天津地委组织部工作，一直被誉为思想好、作风好、工作好的模范。五十年代担任河北省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的赵一民，对骆志安同志印象极好。六十年代初，赵一民上调中共中央华北局任组织部副部长，他亲自点名把骆志安调到自己身边工作。到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号召革命干部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冲党内走资派开火，骆志安也和其他同志一样，参加了战斗队，并被推选为一个小头头。当然，他给华北局的书记、副书记，包括组织部的部长、副部长，都写了一些大字报，这其中包括批评赵一民的大字报。赵一民不能正确对待群众，也不能正确对待自己。他把骆志安写大字报这笔账记在心里了，准备秋后算账。1968年2月，河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同志兼革委会主任，他带来一批华北局的同

志参加省革委的工作，骆志安同志也在其中，被安排到河北日报工作，担任领导小组成员。后又调省委宣传部任新闻出版处长，参加部党委为委员。“文革“结束后又升任宣传部副部长。这时候，赵一民又回到河北担任分管组织人事的省委书记。1981年6月，中央做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邓小平提出清理“文革三种人”。赵一民认为清算骆志安的时候到了，便派出调查组调查骆的问题。不过，骆志安同志经得起调查，他除了根据毛主席的号召给赵一民等领导贴过几张大字报，并没有任何其他“违规”或“出轨“的问题。这期间，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徐纯性同志建议他和赵一民交换意见，以求沟通思想，解决歧见。骆说他从调查组的强横口气里已经感受到自己在劫难逃的命运，就是自己恳求和赵面谈，赵也不会接见。即使勉强接见了也不会有好的结果。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王玉同志一向主持正义，他则直接找到赵一民提出了自己不同的意见：

“一民同志，骆志安同志那点事不就是给你贴了几张大字报么！当时同志们贴大字报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我们哪位领导没被贴过？后来群众贴大字报的权利还写进了宪法，党的‘九大’、‘十大’和‘十一大’都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正确和群众有‘四大’的权利。你不能拿今天的中央文件去追溯否定二十多年前发生的符合中央决定和宪法的大字报问题，那样子是不合法理的。况且骆志安同志当初是你非常信任、亲自点名调到你身边的，就是你有点不高兴的事情又能有多大？我看你就算了吧！”

王玉同志的一席话，赵一民虽然硬着头皮听了，但没有触动一丝他那铁了心的“报复欲”。只见他丧着脸霸道地吼道：

“算了？看你说得轻翘！‘清理文革三种人’是邓小平同志亲自部署的，要求清理一切可能的隐患。骆志安的问题我比你清楚，

他的问题由我亲自处理，你不准介入！”

赵一民真是说到做到。不久，一个冒着省委名义的文字通知送达宣传部：宣布骆志安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撤销宣传部副部长职务，并给予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

骆志安看到这个文件非常震惊。他不相信省委常委会做出这样荒唐的决定。因为他知道，对赵一民的错误作法，常委中至少有三位公开反对，即省委分管宣传的书记尹哲同志以及王玉同志和徐纯性同志。再加上宣传部党支部也没有讨论过这样的处分，他认定有充足的理由和赵一民这种明目张胆的非组织活动抗争。便去找自己的部长徐纯性同志申诉意见。而此刻徐纯性同志也处在震惊之中。老部长不禁抓起电话质询省委办公厅：“省委常委什么时候讨论了对骆志安的处理问题？”对方回答：“常委没有讨论过。”徐部长又问：“那为什么以省委名义行文？”对方分析性地回答：“那是不是省纪委会常委讨论过？你可以问问省纪委。”徐部长旋又打电话给省纪委书记张克让。张克让非常干脆地回答：“省纪委没有讨论过骆志安同志的问题。”此刻情况完全清楚了，是赵一民自己烂用权力，玩了一手冒用省委名义把生米做成饭的卑鄙伎俩。徐部长对骆志安沉重道：“这可能是个马拉松式的官司呀！赵一民是个通天的权势人物，河北省委这个班子的政治生活又很不正常，你在省委告他不会有结果的。如果向中央申诉，据我所知邓小平有指示，有关‘清理文革三种人’的案子，对申诉者一律不接待、不甄别。你可能只有等邓小平死了再说啦！”

骆志安同志有严重的心脏病，尽管他有百分之百的理儿，却没有气力跑到中央去告状。便拿起笔做刀枪，用写回忆录的形式，除了把自己革命和战斗的一生详细叙述外，那个走资派赵一民报复整

人的全过程也详详细细地写入了书中。回忆录以《今生无悔》为书题，印了寸厚的一大本，分送给省委大院的许多老同志。我也有幸得到了一本。只是不幸的是：2007 年春节，骆志安同志因心脏病突发逝世。许多老同志为他在有生之年未能讨回公道都忿忿不平。

笔者附言：其实，人们总是习惯性地要求修正主义集团给诸如张福增、骆志安这些紧跟毛主席的好战士平反昭雪，我看这是犯了一个“天真”的错误。人家搞复辟整的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他们怎么可能会把自己整下去的人平反昭雪呢！这绝然不可能嘛！我认为应该做另一种革命的思维：即被修正主义者和走资派打压、整掉或者关进监狱、牺牲的同志，这是做为毛主席革命战士的一种光荣！哪天新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胜利了，马列毛主义的红色政权，就会以革命的名义，涤荡修正主义的污泥浊水，把每一位受到修正主义迫害的同志写入光荣的丰碑！

注 5：

一、华国锋死后盖棺定论了吗？

2008 年 8 月 21 日，新华社用一个小小豆腐块发了这样一条消息：“新华社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华国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08 年 8 月 20 日 12 时 50 分在北京逝世，享年 87 岁。”

笔者看了这条代表修字号中央发布的新闻，虽然很简短，但它用“以假乱真”的手法，以所谓“传统”的溢美之词对华国锋做了相当高的评价。我不禁有点好笑。立马想到一个真实的故事：中国有名的大右派茅于軾公开向新闻媒体说：“我看胡锦涛总书记也不

一定相信共产主义！”此话引起舆论哗然。但胡锦涛听了竟沒有一声回应。网民们对胡的暧昧态度十分愤怒。试想想看，一个对共产主义信念都不敢担当的胡总书记，他审定的对华国锋的溢美之词，还能有真实可言吗？上边那条新闻还有一个明显的破绽，更露出了修字号中央的阴暗，即通过军事政变夺权后集党的主席、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于一身的华国锋，本应该称为“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职务”才符合实际呀，怎么变成“重要”职务了呢？如果华只是“重要”领导人，那么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又是谁呢？是列在华后边的副主席叶剑英么，显然不是。是列在叶后边的副主席邓小平么，更不应该是。可“猫腻”就恰恰就出在了邓小平这儿。因为邓小平以“太上皇”的身份给中央划了“代”呀！他说“毛泽东是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他自己是第二代中央领导核心”。华国锋虽然在毛泽东之后戴了几年“三权集一身”的“党和国家以及军队”主要领导人”的桂冠，但这在邓看来，华只不过是个“垫脚石”式的小小“过渡性”人物而已，他根本够不上什么“代”，更沒资格在邓复出后实际上主宰中央的情况下，称华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正是因为有邓小平这么个钢铁般的《遗旨》在，胡锦涛不敢越雷池半步，只有用微妙的文字手法把华国锋从“主要领导人”的位子上搬掉了。

倒是右派的代言人对华国锋的评价，比修字号中央“以假乱真”的官腔说得更直白，且更具有实际的意义。一位自称右派的香港评论员在凤凰卫视发表评论说：“如果简单地用好人和坏人标准来衡量华国锋，我认为他是好人。华虽然文化不高，能力也不大，但他敢于在毛泽东尸骨未寒就逮捕毛泽东信任的‘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应该说还是有非凡胆略的。华还有一条可圈可点，即他虽

然不同意邓小平鼓动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也不高兴邓小平批判他的‘两个凡是’，但华毕竟没有动用他党政军一把手的权力去阻挡邓小平。最后虽说很不情愿，但还是提出辞职，让邓小平指挥一切，开创了改革开放和西方资本主义接轨的新时代。我知道邓对华很看不起，不过，有一点邓心里明白，华和他在右的立场上是相通的。华恨‘四人帮’，他也恨‘四人帮’么，没有华打倒‘四人帮’，他邓小平根本站不出来么！邓站出来才有了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风光呀！正是这种在右的立场上的一致，不久前闭幕的党的十七大上，胡锦涛把华做为特邀代表请上了主席台。胡今天较之邓更看重华的‘垫脚石’的巨大作用，并认为着力宣传华的这种‘垫脚石’的重大作用，对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大业和自己的‘科学发展观’都有百利而无一害。正是胡有这种认识高度，使得华在死后比他生前被晾在封闭的角落里风光了许多。”笔者之所以说香港这位右派评论员的评论更直白、更具有实际意义，是要揭露一下修正主义集团内部对华这个“修正主义头目”所搞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伎俩。胡锦涛认为现在举一举华国锋对自己的统治有好处，就使劲举一举。但胡对十一届六中全会罢免华国锋时给其定的几大罪状：比如华搞“两个凡是”，“阻拦邓出来工作”；华搞经济上的“穷过渡”和大轰大嗡式的“大跃进”；华“搞新的个人崇拜，又制造了一大批新的冤假错案”……等等，胡锦涛显然仍在维持邓做出的原判，并没有说一句为华平反的话么！

最后，我要响亮地说，还是中国的广大左派网民旗帜鲜明地给华国锋做出了准确的定论：华国锋是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耻叛徒！是践踏党章、宪法，用血腥的军事政变夺权的法西斯黑帮！是伙同邓小平葬送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复辟资本主义的罪

魁祸首！他将和邓小平一起永远被革命人民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二、剖析《华国锋生平》之我见

2008年8月31日，修字号的中共中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华国锋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中央九常委、江泽民和在京政治局委员以及退下来的前中央领导人都到场了。9月1日，新华社发表了由修字号中共中央审定的《华国锋同志生平》。应该说，其追悼的规格和评价都是相当高的。笔者读了《华国锋同志生平》，认为这是一篇今日之修正主义者自作多情又自相矛盾的奇文，现把我的剖析意见列下，以求教于今人和后人。

1、中央对华的整体评价，除了那些溢美套话“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之外，有些具体评价和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那个时候大不相同。比如华的《生平》里说：“在他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期间，先后主持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大、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重要会议，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拨乱反正，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动员组织广大干部群众投入经济建设各项工作，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他根据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开始复查平反冤假错案。他强调千方百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请列位注意：那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钦定的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头的党中央，一直说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主导的，并吹为开创了中国的新纪元，从来没提过华国锋一个字呀！虽然那时候按照中央正式公布的领导人的排序，邓只是华、叶后边的第三把手，

更不要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白纸黑字的写着“华国锋同志主持了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但胡、赵、江、胡四位总书记的讲话和他们签发的中央文件，都一脉相承地把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导者，包括《生平》中写的那些“华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等所谓“闪光的业绩”，全部加到了邓小平身上。连华国锋的一个字都没提过呀！人们更记忆犹新的是，邓小平在搬倒华国锋后对其曾有个广而告之的结论：华粉碎“四人帮”有功。但在政治上推行“两个凡是”的极左路线，阻挡邓小平出来工作，阻挡给刘少奇和薄一波等冤假错案和“天安门四·五革命运动”平反；在全国对自己搞新的个人崇拜并又制造了一大批新的冤假错案；在经济上搞“大轰大嗡”的“穷过渡”，导致了经济的进一步失调。为此，邓公开宣布靠华领导拨乱反正是不可能的，他必须下台。列位看到邓小平和胡锦涛这前后两个不同的结论，特别是胡正在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今天，你不觉得有点惊愕吗！？其实仔细分析也不要感到意外。搞“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本来就是修正主义者的固有特征之一，谋取最大的私利永远是修正主义者不二的出发点嘛！众所周知，当邓还没站出来工作时，他写信给华肉麻的高呼“华主席万岁”、“英明领袖华主席要领导我们进入二十一世纪”……等他出来工作了，要当“太上皇”的私欲立刻就支配了一切，便罗列了几大“罪状”把华赶下台。邓的这种娴熟的两面手法如此，如今胡的有点扭捏的两面手法也如此，这完全是修正主义营垒内部不同时空的不同策略使然。

2、《生平》对华 1967 年 7 月到 1976 年 10 月“文革”期间在湖南省和中央做领导工作的表现，都是充份肯定和褒扬的。什么“致力于新湖南的建设，为改变湖南面貌、造福三湘人民付出了心

血和汗水”，什么“重视经济建设，关心群众生活，主持兴修了洞庭湖排涝、韶山浚区等大型水利工程，致力于发展煤炭、钢铁等基础工业，积极支持发展地方工业，支持发展杂交水稻，对湖南的工农业生产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于在中央工作期间，华虽然是毛主席提议调来的，《生平》却别有用心地写道：“他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参与处理林彪集团的工作”、“协助周恩来主抓农业工作，使全国粮食生产保持比较稳定的增长”、“在进口成套化纤化肥技术设备、输油输气管道建设，保证市场供应和物价稳定等方面 做了大量的工作”。华担任常务副总理后，“主管政法和科技等方面的工作”“认真贯彻中央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精神，在分管的部门解放了大批干部。他注意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技术人才的培养，并领导和支持高端国防项目的研制攻关工作。1976 年 1 月 8 日，周恩来同志逝世，二月，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同志为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同年四月，根据毛泽东同志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我不吝笔墨抄下这大段褒扬华的话语，是想提醒列位注意：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不论是修字中央文件、领导人讲话，还是新闻媒体，几乎天天在大骂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可唯独对华在“文革”期间，其在湖南省和来中央工作的盖棺评语中则是一派赞歌，没有了一丝“浩劫”和“崩溃”的影子。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华当时负责的湖南省和他调来中央的一段工作不是在毛主席领导之下？难道胡锦涛健忘了华一直是始终领导湖南省“文革”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并几次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如果胡锦涛不敢否认这种人人皆知的客观事实和领导关系，那他为什么要单为华划个“世外桃源”来大唱赞歌呢？

笔者认为这是修正主义者惯用的以“自己”为中心划线的“双重标准”。华国锋既是修正主义营垒的大头目，和胡就是属于一个战壕的“战友”么，胡锦涛当然要肯定要讴歌。君不见，邓小平在“文革”后期的1975年搞了二年右倾翻案的“整顿”，修字号的中央在公开彻底否定“文革”的同时却把邓这“二年的整顿”单独列出来，做为邓的“丰功伟绩”来歌颂嘛！

3、《生平》对华任湖南省委书记时的表现，破天荒地引用了毛主席评价华的语录：“华说实话，是个老实人”。为啥说是破天荒呢？因为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中央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体整天喊的就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几乎从不提毛主席的名字和语录。今天突然在华的评价上引用了毛主席的两句话，显然是另有所图。胡锦涛图啥呢？我认为他听到了群众否定华是“老实人”的强大声音，不得不借用毛主席的崇高威望，来为华解围，也稍带着给自己涂一点迷惑人的“红色”。但是，群众尝过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新三座大山”的苦头，已经不那么好唬弄了。人民都发出这样的质问：华践踏党章和宪法，用见不得人的阴谋和血腥的军事政变手段逮捕党的副主席王洪文、政治局常委张春桥和政治局委员江青、姚文元，开创了我党历史上破坏民主集中制的最卑鄙、下流和无耻的先例，这能说是“老实人”吗？华口口声声说他继承毛主席遗志逮捕“四人帮”，请问毛主席什么时候说过要逮捕“四人帮”？根本没有这回事么！华国锋是假传“圣旨”的大政治骗子，已是人人皆知，你胡锦涛再怎么美化华国锋，他也不像个“讲老实话”的“老实人”哪！套用群众的一段话：“华国锋是表面老实、内心黑恶又极其自私贪婪、卑鄙无耻的阴谋家和野心家。他和邓小平一样，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最大的叛徒。”顺便再补

叙一句：即便毛主席过去讲过华是“老实人”的话，那也只是过去一时的评语，丝毫不能抵消和掩盖华国锋 1976 年十月发动军事政变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

4、《生平》对华的辞职有一段简约而又微妙的断语：“1980 年九月，华国锋同志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1981 年六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他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在华的个人品格风范方面，还有“他自觉维护团结，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得失，光明磊落，作风正派”“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充满信心”的溢美之词。华国锋真的是“自觉维护团结、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得失”的辞职了吗？非也！据原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长邓力群《回忆录》披露：华的辞职可不是在六中全会上辞的。他在 1980 年底邓小平导演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这位身为党的主席兼军委主席在自己还是主持者的情况下，突然被邓小平端了出来。会上万箭齐发，揭发 和批判华担任党主席后犯下的种种“严重错误”，逼他辞职。华虽然变成了一个四面楚歌的“孤家寡人”，却硬是单枪匹马站在主持者的位子上，苦苦挣扎，决不就范。就这么马拉松式的僵持了二十五天。弄得邓小平、胡耀邦也没办法了，只得请叶剑英出面斡旋。叶很会作戏，他老泪横流，几至哽咽地对华说：“我愿意承担粉碎‘四人帮’后这三年工作出现的失误和责任，并辞去党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叶的这假惺惺的一招还真奏效了。华在感动之余总算答应辞职，但有个讨价还价的要求：“请叶担任党的主席”。叶忙摆摆手斩钉截铁地说：“不可以，不可以！我已经表示过了，辞去党的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彻底休息！”（註：叶玩了假辞职，华下台后他积极配合邓胡一直干到病死）。邓小平这时接茬表态：“党的主席由胡耀邦同志担任。

军委主席我来当。就这么定了！”邓、胡虽然大权到手，但出于对党内和国内外保密的需要，会议决定由华仍顶一段空名，到六中全会再正式宣布。华就这么无奈而又尴尬地顶着党主席和军委主席的空名，直到 1981 年六月的六中全会正式宣布。但是华也留了一点后手，他始终拒绝胡耀邦要他写出《书面检查》的指示，并明确表示不能接受会上那些批评和指责。这一点，华国锋硬是没留下一纸“检查”，应该也属党史上的一大奇观。列位看到这里，应该有个客观的判断了吧？不管胡锦涛如何美化华国锋，他那种自作多情又自相矛盾的翻云覆雨的政客手法，只能是安慰他自己而已，对工农大众和革命知识分子已经不起作用了。

补遗：新华社一位资深老记者给我讲了个小故事，是说华被赶下台后不久就当上了中央的 1981 年的例行春节茶话会。胡耀邦以内定党主席的身份要华顶名主持这个茶话会，华以身体不适加以拒绝。胡立刻报告邓小平，邓要胡向华传达他的同样的指示，华根本不给邓这个面子，第二次以同样的理由加以拒绝。这下子邓发怒了，气愤道：“他华国锋不配合，好嘛！剔他光头！”原来华答应下台后，胡建议给华安排个党的副主席，邓小平开始不同意。还是胡一再求邓才答应下来。胡见邓要剔华的光头，便又苦苦要求，说安排个副主席对你对我总比不安排要好，那怕是只挂一段也行。到 1981 年六月的六中全会总算是推选华当了副主席。不过，邓对华拒绝他指示的那口怒气一直未消。到 1982 年党的十二大上，邓一锤定音，把华的副主席撵掉了，从此华变成了无影无踪的寓公，再没有媒体面前露过面。

第 30 章 记下两段难忘的经历

一、紧急建立战备台和战备车队

1969 年春天，中国和苏联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在北部边界已经发生了兵戎相见的“珍宝岛事件”。苏联在外蒙和我国接壤的边界已陈兵百万，蠢蠢欲动。我们在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备战，备荒，为人民”、“要准备打仗”的号召下，也积极行动起来，随时准备投入抗击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做为党的机要单位的河北电台和电视台，虽然有人民解放军昼夜守卫，我们还是一方面派人参加开挖省会的地下战备通道；一方面建立自己的民兵营，我自兼营长，责成转业军人徐玉章同志指导军事训练。为了使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掌握实战武器，我专门找省军区马辉司令员批了八支自动步枪，进行雷打不动的定期操练。一天，省革委第一副主任刘子厚同志把我叫去，非常严肃地说：

“你们都知道了，现在战争危险已非常严峻。苏修随时都可能打过来。毛主席已有部署，要准备敌人长驱直入。当然，对我们来说，则是主动诱敌深入。要准备敌人打到北京，打到石家庄。如果敌人真的把河北电台炸毁了，你们还能发出党中央和省革委的声音吗？”

“能！”我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信心十足地说：“我们已经在保定西部山区凿洞，建起了一座战备台。军管组和我都去过好几次了。其保险系数不仅能对付常规战争，就是敌人甩原子弹、放毒气也不怕！”

“你想得有点脱离现实了。我们河北省会早已经迁来石家庄。

河北省革委要在石家庄西部山区建立战备指挥部，你这个战备台远在几百里之外，是不是就有点远水不解近渴呀？”

“噢……”我顿时明白，忙说：“我们还应该在石家庄西部山区建一个战备台。咦，咱省革委战备指挥部设在哪儿？”

“在咧咧水。”

“那我们在咧咧水附近选个山沟……”

“咦，你不能离我们太近了。但也不能离我们太远了。太近了，敌人的导弹会追踪电台这个目标，可能殃及省战备指挥部。太远了联络上又不方便。我看咱距离百十里地比较合适。”

“好！我们照你的指示，立刻进山选点。”

“你先别急，我的话还没说完……”子厚同志沉思着又道：“我们要从最坏处着想。如果敌人和我们打起了运动战，你电台又如何随省战备指挥部运动？”

听子厚同志这么一问，我深深感到经过战争考验的老领导，对战争问题想得十分深远和细致。就应对道：“我们已经组装了一辆战备广播车，只是还不配套。要机动灵活地动起来，需要有一个战备车队。”

“好！这样的战备建设才是从实际出发了。”子厚同志点点头，又拍板道：“你回去抓紧搞个方案和预算，报省革委批准后就干。”

我回到机关，立刻向军管组和革委会汇报。经过研究和讨论，责成技术处老副处长成忠顺同志先拿出方案和预算。成忠顺同志是抗日年代冀中军区的电讯骨干。转业到河北电台后，几个山区发射台和战备台，都是由他提出方案经领导批准后具体运作的。是我台技术过硬、经验丰富和作风扎实的实干家。他听了子厚同志的指示意见，非常高兴。第一步就建议主要领导和技术干部到山区考察。

从地形、地貌、地质到水源、树林和道路情况，进行多方面的比较测量，然后拿出合适的方案。大家同意成忠顺同志的建议，组成了以军管组长蔡宝峰同志为首的考察小组，我一个，还有技术处处长高瑞奎和副处长成忠顺同志，立刻随蔡组长进了太行山。既实地看了省战备指挥部的位置，又在百里周围跑了几条可供建台的山沟，最后在冠南庄附近选中了一座合适的山峰，再加上集录音、播音、播出、发电为一体的战备车队系列，经过测算，投资预算约 160 万元。省革委很快以代号“114 工程”批准了这个方案。我们旋即又分别选派有干劲和业务能力强又强的刘玺章、雷文治两同志带队进山，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凿洞工程。战备车队的配套建设，在成忠顺同志的努力下进展更快，不到三个月，我们就兵马到位，进行了在山区“实战广播式”的拉练试播，取得了圆满成功。为此，我向子厚同志和马辉司令员初步报喜，受到好评。不过，几十年过去了，随着中、美、苏三角鼎立战略格局复杂而又微妙的变化，战争并没有打起来。战备台和战备车队只能用于和平目的。1976 年发生在唐山的大地震，造成那里的广播全部中断，我们的战备车队立马就派上了用场，保证了党中央和省委声音的传播，也受到了子厚同志和马辉司令员的表扬。

二、我参加了国庆廿周年天安门观礼

1969 年 9 月国庆廿周年前夕，中央通知各省、市、自治区选派英模人物到京参加国庆观礼。这在当时是件无尚光荣的事情。河北省工农战线的劳动模范和优秀干部、知识分子，一行五十人，就要在省革委秘书长王金山同志率领下进京。很荣幸，也以省直系统“优秀知识分子”的名义，成为参加国庆观礼团的一员。行前，省

革委秘书组的张顺兴（时任河北省军区宣传处长）同志对我说：

“这次选派省直参加国庆观礼的代表，经过横向比较，你在知识分子当中是比较突出的一位。主要是发展广播电视事业、安全广播搞得很好。你快去见见金山同志，他有事找你。”

我来到了王金山秘书长的办公室，他高兴地说：

“你被推选参加国庆观礼，知道了吧？”

“知道了。”

“我找你——是要给你加点任务，帮我这个观礼团长做点行政组织工作。你来兼个观礼团的办公室主任。什么记者来访、组织座谈或进行参观这类事……你帮我张罗张罗。”

“行。只是我一个人有点单……”

还没等我说完，金山同志说：“我还找了一位解放军同志，他是万全县武装部政委、又是模范的县革委会主任王郡同志。你俩都是办公室主任，到北京住一个套间。观礼代表有啥事，找你俩也方便。”

我们进京住进了前门饭店。这个饭店在当时算得上北京一流的大饭店。代表们从来没住过这么高级舒适的地方，竟高兴地坐不惯那“忽悠悠”有点弹软的沙发，也睡不惯那“忽悠悠”突上突下的“席梦斯”软床。当然最叫大家激动的，还是参加国庆观礼的无上光荣感；就要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比幸福感。好多人憧憬着首都军民游行庆祝的盛况和毛主席向自己招手的情景，竟致激动得彻夜难眠。

9月30日上午，观礼代表们都收到了周恩来总理用洁白信封装来的《请柬》两张，信皮上写着观礼代表的名字。我仔细看了自己那个大号信封，上面用钢笔写着“高恩泽同志”。信封内第一张

《请柬》为白色硬铜版纸折叠式。封面正中印着庄严的国徽，下面印一行红色数字：“1949——1969”。打开折叠即见红色楷书体《邀请文》：“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订于一九六九年九月三十日（星期二）下午七时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招待会请参加。周恩来”。信封里同时附有一纸座位号和注意事项。上面用黑体楷书写着：“1、此次招待会，你的席位在第二区第 176 桌，请提前由人民大会堂东门入场，按标定桌号入座。2、请柬请勿转让和遗失，如有遗失请立即通知接待组。第二张《请柬》封面为绿色，正中为国徽。下边一行烫金楷书：“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下边中间位置一行阿拉伯数字烫金字“1949——1969”。打开折叠，左页为红色楷书毛主席语录：“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右页为国庆节筹备小组的《邀请文》：“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定于一九六九年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群众庆祝游行大会，请参加观礼。”下面括号内书有“凭柬上灰观礼台西二台”。这几张珍贵的请柬和入场卷，包括信封，我都保存下来了。

下午五点，王金山秘书长让我和王郡同志把代表们召集在一起，他再一次嘱咐大家：“我们就要去人民大会堂了，大多数同志是第一次参加国宴。明天，我们有的同志要上天安门城楼，大多数要到观礼台观礼。这都是非常光荣的时刻。请同志们一定注意，保存好请柬，因为进入大会堂和观礼台，都要检验。此外，参加招待会要肃静。但需要鼓掌时一定要热烈。宴会开始后要遵守规则，注意国际影响。可以愉快地交谈，也可以高兴地碰杯，但不能行酒令，不能喝醉，更不能说醉话。河北的同志可能坐在一起，也可能和其他

省市的同志坐在一桌，大家要互相关照，维护好自己的形象……”

其实，这些谆谆的嘱咐，早在进京前座谈时都提到过了。大家当然一致保证：严格自律，为河北增光。接着，我们乘大轿车来到人大大会堂东门。其他省市的观礼代表也大体同时到达。现场指挥者要求大家：高举请柬，以省市为单位各呈一路纵队向大会堂大厅行进。到了大厅内立定，宣布两个不同省市的观礼代表，面对面的互相检验请柬，互相检查对方身上有无危险品，就是水果刀也不准带进。互相检验完毕后，便鱼贯进入宴会大厅。我按照请柬附页上标明的桌号，找到自己的位置 176 桌，原来和我同桌的都是北京市的劳模。大家互道姓名后，一致推举我为桌长，还请我介绍参加国宴的经验。我忙谦恭地说：“参加国宴我也是头一次呀！大家互相关照点就是了。”

人们虽说坐稳了屁股，可两眼都禁不住东瞧西望，觉得什么都新鲜。几个人都想领略一下大会堂厕所是啥样的，一个人都不敢去，怕找不到或找到了不会用，便结伴去寻觅。等进入了厕所，才知道那里整洁无比，还有一股微香的味儿。特别是那贴墙的立式小便器，一色的洁白陶瓷，用起来十分便当。大伙看了高兴地说：“等咱农村发展了，厕所都变得这么整洁，还有点微香的味儿，就是共产主义啦！”回到餐桌，人们又盯住了盘子里放着的那秀美而又闪光的刀子和杈子，有人竟拿到手里爱抚地摸着，疑惑地问：“这是干什么的呀？”服务员回答说：“这是西餐具，请不要……”没等服务员说完，那位老农模样的同志说：“用这个吃饭咱可不会。要是做个纪念品欢赏倒不错。”过了一会儿，服务员端来了哈密瓜。大伙看了很新奇，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就问服务员：“这是啥玩意？怎么个吃法呀？”服务员微笑着说：“这是新疆产的哈密瓜。和西

瓜的吃法一样。”有人惊讶道：“这瓜可没见有籽呀！和西瓜不一样呢！”正这么说着，见周围桌上的人们早已经“啃”上了，我们也便随着大流“啃”了起来。正这么美滋滋地啃着，麦扩风里传来了周总理要发表讲话的声音。大家顿时正经坐好，心也静了下来。周总理讲话简短有力，不时引起热烈的掌声。讲话结束，正式的宴会开始！这时人们才知道，国宴非常俭朴。都是冷拼盘，没有热炒菜。烟酒却是国产名牌“大前门”和“茅台酒”。茅台酒贵为国宴酒，我们谁也没有喝过。一沾嘴就觉得和一般酒不一样。真可谓酱香扑鼻，回味绵长，三钱的高脚小盅，连着碰杯十次，竟没有一个人头晕，当然也不会有人说醉话。

十月一日上午八时，我们乘大轿车通过故宫西门来到天安门北侧。然后持柬步行出南门向右转，登上西观礼台二台。这种阶梯式观礼台，可坐可站。往前看，可以尽览游行队伍的壮观。往左看，可以看到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人。上午十时，当盛大的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大家招手的时候，我们都激动地站起来，连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则高呼“人民万岁！”许多人喜极而泣，哗哗流淌的泪水挡住了视线，竟然有同志着急的大喊：“我的泪太多了，看不清啦！”另外有人急着回应：“别哭啦！越哭越泪多，更看不清呀！”

十月二日开始参观。我们先是看了正在建设中的北京“地铁工程”。大家看了高高的标语牌上写着毛主席对北京地下铁道“要精心设计，精心施工”的指示，大家都为北京就要有自己的“地铁”而感到自豪。接着看了北京东方红炼油厂。这个现代化的石化大厂上空，高悬着毛主席的指示：“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拚命。”由此，我联想到解放前中国被世界列强戴上了“贫油国”的

帽子、石油全靠“鬼子油” 施舍的可怜状况。正是毛主席号召的“革命加拚命” 的战斗精神，1959 年，我国石油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发现了自己的“大庆油田” ，一举摘下了世界列强给我们戴上的“贫油国” 帽子。新中国不仅实现了石油自给，还能有一定数量的出口。东方红炼油厂的诞生和发展标志着，它不仅会使全国人民获得更多的石油产品，而且也会有更多的石油产品向外国出口，创造可观的外汇收入。除此，我们还参观了北郊木材厂、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和北京、清华两所大学。那时候，这些单位被誉为“文化大革命斗批改的带头羊。”即使是外国来访者也争着要看一看呢！

十月五日晚上，我们应国庆节筹备小组的邀请，到大会堂参加了文艺晚会，入场卷人手一张，均为粉色。上书红色粗体字：“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中间为红色五角星。下边为邀请文：“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于十月五日晚七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文艺晚会，演出革命现代剧《红色娘子军》，请参加。”左下角注明二楼（请进东门）。我的入场卷编号为0002492。

十月十一日下午，我们接到通知，伟大领袖毛主席要在大会堂会见全体观礼代表。粉红色的入场卷很快发到了每个观礼代表的手上。这张入场卷较之前三张请柬要小些。上书毛主席语录：“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中间为一个红色的小五角星。下面楷书三个红色大字：“入场卷”。底下注明时间 1969 年十月。我的入场卷编号为 0002364。

下午四时，我们准时进入大会堂万人大礼堂。主要是固定好每个代表的座位，确保会场有序。我有幸坐在了离舞台最近的第一排 30 号。这工夫，表面上人们都在静心等待毛主席的到来。实际上，每个人都是内心沸腾，脉搏跳动不知加快了多少。五时二十八分，

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到来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陪同下，健步来到了舞台前沿，向我们频频招手致意。代表们全体起立，先是鼓起热烈的掌声，接着便是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到五时三十四分，会见结束。虽然只有短短的六分钟，但人们内心的激动却久久不能平静。许多同志立刻拿出笔记本，就地记下了这难忘的一刻。我却随手在入场卷的背面，用红色原子笔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记下最幸福的时刻》

“1969年10月11日下午5时28分到34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以及周总理、陈伯达、康生和其他中央首长，在人大大会堂接见了参加国庆观礼的全体代表。我坐在第一排30号，幸福极了。高恩泽10.11.5.35分”。

回想当年那种激动万分的心理内涵，群众对共和国领袖毛主席是既热爱又崇拜。今天看来，我上面这段话的内容已发生了重大政治变化，比如林彪已变成了叛国贼，陈伯达已变成了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但做为当时的历史，我还是照录下来，供后人研究历史时做为参考吧！。

10月12日，观礼代表们就要回省了。河北省革委主任李雪峰和第一副主任刘子厚同志来看望大家，并向王金山秘书长指示：“代表们回到各自的单位时，单位要举行一定的欢迎仪式。”我对此有自己另外的想法。因为光荣不属于我个人，成绩也不属于我个人。没有军管组的领导和广大干部、技术人员的努力，我是一事无成的。所以，一到石家庄我就躲到了省招待处，避开了单位的欢迎仪式。顺便说一句，这次国庆观礼因为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并参加敬爱的周总理举行的国宴，这在我的生命史上意义重大。因此，所

有请柬和入场卷我都收藏在一个加锁的保险箱里，四十多年过去了，爱人刘淑琴保护得很好。今天能影印到上边，供后人阅览，对后辈了解那段历史，也有一定的意义吧！

第 31 章 参加外事活动的若干片断

1978 年 6 月，我在河北省广播局（台）负责宣传和事业发展 12 年后，省委决定我到石家庄煤矿机械厂挂职锻炼，任副厂长。这是一个有 4000 人的大厂。国家煤矿的钻探机械都是这里生产的。解放前，早在日寇统治东三省时期，这个厂子就在吉林省通化市建立。解放后，成为新中国支柱性的钻探机械大厂。于 1958 年奉命迁来石家庄，一直是国家煤碳部的定点厂，有铁路专线通往祖国的四面八方。厂党委书记顾清廉同志是抗日时期的老干部，曾任中共石家庄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厂长任志光同志也是抗日时期的老干部，曾任中共承德市委常委，分管矿业工作。我到这里名为“锻炼”，其实对生产和技术根本插不上手。这两项支柱性的工作，早有行家里手负责多年，并且都是很过硬的高级工程师和专家。经过厂党委研究，认为外事工作是我的长项，就确定我分管外事工作。虽然这个厂子是石家庄市对外开放的几个大厂之一，但每年不过五、六宗对外接待任务，毕竟任务不大，便又确定我和另一位副厂长张铁刚同志，共同分管基建和行政工作。铁刚同志也是抗日战争的老战士，是从解放军某师参谋长的位子上转业过来的。工作甚有魄力。我俩在一起合作得十分愉快。

这一章，不是单说我在厂里的外事工作，而是要整体介绍我在省里参加外事活动的若干片断。

外事工作，我本来不大熟悉。经过一番学习和实践，深深感到：它同国家外交部的工作相辅相承，是党和国家的一条非常重要的战线。周总理说过：“外交无小事！”因此，县以上的各级政府和企、

事业单位，大多和外交部相匹配，都设立了“外事办公室”。但是，根据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情况，哪些地方和单位对外开放，哪些人参加外事活动，党和国家都是有严格规定的。特别是伟大领袖毛主席1974年2月提出“三个世界”的光辉理论之后，外交和外事工作更具形像地上升到推动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的高度。毛主席说，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属于妄图称霸世界的超级大国。欧州的英、法等和亚洲的日本是发达国家，属于第二世界。我们和亚、非、拉广大的独立不久的国家为第三世界，称做“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的绝大多数。从这个全球的阶级现实出发，我们的战略方针是：依靠第三世界，团结第二世界，抗击第一世界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因此，中国外交和外事的全部工作，就是遵照毛主席“三个世界”的光辉理论，建立和发展抗击美、苏两个霸权主义国家的统一战线，推动世界革命向前发展。

我被确定参加外事活动，介入国际交往是1973年春天。这项工作，对我来说首先碰到的，竟是一个衣冠整洁的问题。代表新中国的形像，表示对外宾的尊重，决不能衣冠不整啊！当时有一个惯例，就是都仿效中央领导人，要由专门的缝纫师做一身灰色的中山装。这种颜色被誉为既朴素又典雅。后来灵活一点了，也可以做成黑色中山装，但决不能做西服。我那身接待外宾的衣服因为是国家出钱做的，平时根本舍不得穿，只在接待外宾时用一用。我共接待过九个国家的外宾。其中朝鲜、英国、巴西、札得来的都是新闻界人士。其他五国除了墨西哥和柬埔寨来的属政界和军界人物外，来自加拿大、日本和伊朗的则属于民间组织。这里记忆深刻、内涵丰富的要数参加接待墨西哥总统和朝鲜新闻代表团了。现在，我撇开口述历史的风格，把自己为此曾发表在报纸上的两篇纪念文章，搬到我这

本回忆录里来，请后人分享。

一、奉命参加接待墨西哥总统

我这篇《赵县雪花梨和墨西哥总统》的纪念文章发表在 1998 年 9 月 25 日石家庄日报的副刊版上，全文如下：

对我来说，这是一段难忘的故事，一段每逢品尝赵县雪花梨时总要念及的话题。

那是 1973 年 4 月 23 日下午 4 时左右，来华访问的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和夫人，一行 169 人，在山西大寨访问后，又在周恩来总理和夫人邓颖超同志陪同下，分乘两个专列来到石家庄，然后转乘飞机赴上海。当时省市领导确定：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主任刘子厚、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革委主任张建尧和我（时任省革委常委兼省广播局革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到车站迎接。我们从车站陪同客人来到石家庄大郭村机场一个会客厅交谈。厅内整洁朴素。除了摆放有序的盆栽鲜花和放好袋茶的乳白色水杯，最显眼的便是摆在大瓷盘里的雪花梨了。那金黄色的雪花梨，个个都有一斤多重。虽然已进初夏，回为储藏良好，都泛着鲜亮的光泽，十分诱人。埃切维里亚总统谈笑风声，一下子便把话题转到了雪花梨上。他非常钟爱地抚摸着—一个雪花梨，像是试探地问：

“这种水果的名字——”

“这种水果的名字叫雪花梨。”张建尧同志热情回答道：“是我们石家庄地区赵县的名贵特产。按照这里的迎客习俗，很高兴总统先生和诸位来宾亲自品尝，分享石家庄人民的深情厚谊。”

“噢……”埃切维里亚总统点点头，接着道：“雪花梨！雪花梨长得如此之大，世界上少有，至少我是第一次看到。它一定很甜

喽！”

“很甜。”张建尧接着伸出两个手指头，引伸道：“比其他梨的含糖量要高出一到两度。”

“只是雪花梨的个头太大了。”埃切维里亚总统有点面带难色地说：“这么大的雪花梨，一个人怕是吃不下的。”

“那不要紧的。”张建尧同志建议道：“可以两个人，或者三个人分吃一个。”

“好，好……”埃切维里亚瞟瞟夫人和新闻发布官，幽默地说：“你们来做我的吃梨伙伴吧！”

会客厅服务员熟练地把硕大的雪花梨削皮，然后又切成三块，分别递了上去。客人们啧啧地品尝着，赞不绝口。这时，那位坐在我身边的新闻发布官探过头来，小声对我说：

“局长先生，这么好吃又这么大个的雪花梨……要是在我们的墨西哥，可以想像，它会受到非常的欢迎，得到非常的喜爱。”

我会意地点点头，马上把这个信息告诉了张建尧同志。张建尧反应极快。他对埃切维里亚总统说：“总统先生喜欢石家庄赵县的雪花梨，我们非常荣幸。请允许我高兴地代表石家庄人民提议，把这种包涵民间乡情的雪花梨，做为友谊的礼物带到墨西哥去，让贵国人民品尝。”

“我非常感谢主任先生的盛情，非常赞成主任先生的提议。”埃切维里亚神采飞扬，旋即又感情凝重地宣布道：“让雪花梨这种名贵的乡间特产，成为连结墨中两国人民友谊的又一条纽带！”

总统的话顿时激起了宾主一片热烈的掌声。这时服务在一旁的工作人员却有些着急，因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装梨的纸箱。埃切维里亚总统看在眼里，禁不住抬手指了指洁白的桌布，做了一个两手

一“兜”的手式，笑着说：“墨中两国一家人嘛，就不要拘泥那复杂的礼节了。”张建尧同志反应更快，连声说：“好好！照总统先生的办法办。”服务人员很快就用一方桌布把几十斤雪花梨包了起来，由我和新闻发布官一起护送到总统的专机上。

一晃 27 年过去了。这段动人的墨中两国友谊的佳话，不知传播了多少遍，总有一件事还挂在心头：我们的雪花梨是否已经飘洋过海，到了大洋彼岸的墨西哥？如果到了的话，它对如今健在和已经逝去的人，都会是个莫大的欣慰。

二、一次难忘的欢迎朝鲜同志的宴会

我的这篇纪念文章《难忘的宴会》，就是讲的欢迎朝鲜同志的那次宴会。发表在 1998 年 12 月 25 日石家庄日报的副刊版上，全文如下：

这是一个别开生面的欢迎宴会，以至事过 25 年之后，我仍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那是 1973 年 9 月的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以朝鲜劳动党中央候补委员、朝鲜中央通讯社社长金声杰为团长的朝中社代表团，一行五人，在我国新华社副社长石少华同志陪同下，来河北省会石家庄参观访问。当时省领导确定，由省革委副主任王路明同志牵头，我（代表河北省广播局）和新华社河北分社副社长刘方辰、河北日报副总编辑肖和同志参加，组成接待小组。

那是在一个相当朴素而又秀气的小餐厅里，我们正好十人围坐一桌。大家无拘无束，有说有笑。除了宾主双方的第一杯祝酒辞外，那种涉外宴会的客套礼仪就全免了。宴会以“老朋友聚餐”的活跃模式进行着。这时，服务员在上过一道凉菜拼盘之后，又不失时机

地端上了一盘“糖醋鲤鱼”来。这条“糖醋鲤鱼”个头不算小，溜圆的背上浇满了酱红色的稠汁。一股清香之气早已冲进鼻孔，真可谓色、形、味俱全。金声杰社长微笑着看看王路明同志，说：

“在我们朝鲜有个风俗，吃鲤鱼要吃头呢！”

“中国也有这个风俗。”王路明同志更引伸一步：“古谚语中就有‘鲫鱼背，鲤鱼头，鲶鱼尾巴一填兜油’的说法。好！我们先吃鲤鱼头。”

可是。当宾主的筷子触到鲤鱼头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更没有看清这盘“糖醋鲤鱼”是没有头的，而且只有半片。大伙顿时懵了。王路明同志更显出一种不解的尴尬。这时，感情默契而又善解人意的朝中社国际处长李成夫，忙着转变题目。他瞟着桌上的茅台酒和中华牌香烟，用熟练的汉语说道：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茅台酒是国宴之酒，中华牌香烟是国宴之烟，今天，我有个提议，大家喝茅台酒，吸朝鲜烟，怎么样？”

“那怎么行呢！”王路明同志接着李成夫的话茬回答道：“到我们这里当然要喝茅台酒，吸中华烟，这是中国同志的心意么！”

“可是——”李成夫处长忙着回道：“吸朝鲜烟却另有一层新意。我们带来的香烟——它的过滤嘴是在中国加工的。你们能尝一尝朝中合作生产的香烟，我们该会多么高兴呢！”

“好好！”王路明同志一听这番意思，确有一层新意，立即表态：“我们同意李成夫同志的意见。只是我有个要求，希望朝鲜同志多喝一点茅台酒。茅台酒喝多点也不会上头的。”

李成夫同志回应道：“本人不是自吹，比试起喝酒来，在坐的同志中，怕是不一定能找到我的对手。”

“你有多大酒量？”我探询着问。当时我 37 岁，还有点年轻气

盛的劲。为了创造更热烈的气氛，我干脆挑战道：“我们俩比试一下如何？”

“好！你俩年岁相当，可以对词比酒，也可以对歌比酒。严泰龙同志（朝鲜随行记者）做你俩的评判员。”金声杰同志竟喝起彩来。王路明同志照样微笑着。我的两个同行刘方辰和肖和同志却是心里赞成没有明讲。因为他俩知道我是有点酒量的。便用掌声表示支持。

“那就请高局长上场吧！”严泰龙说着离开了餐桌，把我和李成夫引到了大圆餐桌前面，对面而立。他则站在我俩后边的中间位置，以观察检验双方的酒杯是否真的喝干。按照朝鲜比酒的游戏规则，谁最先提出比酒的挑战，谁就出词先喝。在服务员给我俩每人斟满一杯酒后，只见李成夫同志首先举杯，和我的酒杯碰了一下，郑重道：

“敬祝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然后我俩一饮而尽。因为这一杯是敬祝领袖的，桌上的其他同志也随着起立一同干杯。严泰龙“评判员”认真地验过我俩的酒杯，满意地示意服务员再一次给大家斟满。我便举杯过顶，和李成夫同志的酒杯相碰后，郑重道：“敬祝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万寿无疆！”

这一杯同样是大家起立，共同干杯。严泰龙“评判员”见我俩比试诚恳，没有一点耍滑的意思，就提议以比试双方为中心，简化程序，加快速度。李成夫同志领会其意，旋即举杯道：

“为朝中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干杯！”

下边接的出词和答词分别是为两国军队、两国工人阶级、两国农民、两国新闻工作者之间……的友谊干杯。正好是比到 12 杯这个

当口，我俩相互一笑没词了。评判员严泰龙同志裁决：“双方出词得当，思维敏捷，面不改色，比成平局。可以说是十二分的敬祝领袖长寿，十二分的祝愿人民之间的友谊长存。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祝贺朝中新闻工作者的共同胜利！”

掌声过后，金声杰社长兴犹未尽。他又望了望王路明同志，提议道：

“再来个对歌比酒好不好？”

王路明同志看我举止自然，言谈准确，知道我的酒量还有潜力，便应声答道：“好！”只是他心里有点嘀咕，怕我的歌喉达不到一流，闹个五音不全，煞了刚才美好的情景。刘方辰和肖和同去却不担心这一点，他俩早就知道我是个唱歌能手。评判员严泰龙同志开始宣布对歌比酒的规则：“李成夫处长若唱朝鲜歌曲、高局长则唱中国歌曲。李成夫处长若唱中国歌曲，高局长则唱朝鲜歌曲。”叫他这么一讲，王路明同志和我的两个同行可都有点挂劲了。因为他们认定我唱中国歌毫无问题，会不会唱朝鲜歌却是一点底也没有。这工夫，只见李成夫喝一口茶水润润嗓子，说道：“我唱一支《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曲》。接着便引吭高歌：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华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雄赳赳，气昂昂……

大家双手打着节拍合唱着，气势雄壮而热烈。他唱完了，我向评判员严泰龙同志提议，等我唱完一支朝鲜歌曲，再一起干杯。严泰龙评判员同意了。王路明同志和我的两个同行，见我宣布要唱朝鲜歌曲，也笑着释然的点了点头。接着我也学着李成夫的样子，不慌不忙地喝了一口茶水，润润嗓子，向大家开口道：“我要唱一

支《金日成将军之歌》。这支歌，我十五岁的时候就会唱，那时是唱给朝鲜人民军英雄访华报告团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回国报告团的。如今二十二年过去了，这支歌我仍然牢记在心中，唱得很亲，唱得很熟。今天我唱给朝鲜中央通讯社的同志们，如果有机会，我要到‘三千里江山’，唱给伟大的朝鲜人民。”讲到这里，我发现金声杰同志和代表团其他成员，神情激动，眼圈泛红，热泪盈眶。等我引吭高歌时，他们全体起立，和中国同志一道，双手打着节拍，脸上淌着热泪，同声高唱：

“长白山，绵绵山岭，沾满血印。鸭绿江水曲曲弯弯，漂着血恨。今天自由朝鲜光荣花环上，灿烂的放射着神圣光芒。啊——英明的将军，敬爱你——金日成，啊——我们的领袖，我们的领袖——金日成……”

唱毕，大家又一次同干一杯酒。之后我和李成夫处长热烈拥抱。大家又一次长时间的烈烈鼓掌，宴会发展到如此高潮圆满结束。

朝鲜同志回到房间休息了。王路明同志和我们几位还挂着那个“半片无头”的“糖醋鲤鱼”，百思不得其解，就找餐厅的负责人询问。这一问才知道，原来我国的涉外宴会，根据毛主席、周总理一贯强调节俭的指示，是有着严格规定的。招待外国部长级干部，每人平均餐费只有六元人民币，随意超出标准属于违纪，是不允许的。那天有两个同级别的涉外宴会，而这条鲤鱼又较大，掐头去尾，切成两片分桌上席，绝不是简单应付，而是做了可行性核算的。还有，这种烹鱼作法，与菜谱中的“糖醋鱼块”、“糖醋鱼片”有异曲同工之妙，绝无失礼之处。

一个年代有着一个年代的象征和印记。写到这里，我倒想起今天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内宴会和涉外宴会，常有讲排场、铺张浪费的

情况，实在应该重温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力戒奢侈，把我党倡导并实行多年的节俭之风，发扬光大。

三、接待非洲札得国家通讯社长和电台台长

1974 年夏天，非洲国家札得通讯社长和电台台长来石家庄访问，省革委秘书长王金山和我负责接待。因为非洲国家争取和巩固独立的运动正处在高潮中，我们对脱离法国殖民者而独立的札得贵宾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双方在一起交谈得十分亲密。札得贵宾十分崇拜毛主席。说：“当今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毛主席那样勇敢地真诚地无私地支援非洲国家的独立运动。毛泽东的中国不把帝国主义放在眼里。他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也是世界人民争取解放的领袖。”王金山秘书长表示：“目前札得国内局势动荡，相信札得人民会妥善解决自己的问题。特别要警惕法国殖民者不甘心退出自己的领地，做出或明或暗的挑动和干预。”两位札得贵宾同意地点头。

中午，王金山同志和我在石家庄交际处（即今河北宾馆）设宴款待札得贵宾。两位贵宾提出要求，要换一换衣裳。他们说：“出席朋友的宴会，按札得的风俗，必须撤下西服，穿自己的民族服装。”到宴会开始，札得贵宾换上了一身肥大的白袍。我心里琢磨说：“非洲炎热，穿上这种肥大而洁白的袍子，肯定比别的颜色要凉快许多。这种民族服装是适应环境的产物。”到互相敬酒时，那位札得通讯社长微笑着声明：“我不善饮酒，请允许我以茶代酒。中国的香茶是世界茶叶的祖宗。我以茶代酒完全可以和你们的茅台酒相媲美。”王金山同志表示同意他的意见。我则想设法调动一下他的饮酒兴致。他说“不善饮酒”肯定还是能喝一点的。用什么办

法调起他的兴致呢？因为我事先对他的背景有所了解（注：中国驻外使馆对来华访问者都事前向我们提供一些背景材料），他毕业于沙特阿拉伯的利雅得大学，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他的岳父是札得有相当名气的资本家。而他则是有名的“模范丈夫”，对妻子是高度尊重和热爱。我便笑着对他说：“社长先生，今天我要用法语和英语表示对你夫人的良好祝愿！”他一听立刻就显得非常高兴，好像也有点惊讶，没想到我竟也是一位通英语和法语的同行。其实，我刚学习英语，知道“夫人”一词，英语和法语的发音是一样的，就举杯道：“wish your madam good health!”意思是说：“祝你的夫人身体健康，干杯！”接着又补充一句：“这一杯，社长先生应该喝茅台。夫人知道了这一点，她会非常高兴的。”这位通讯社长完全理解了我的用心和好意。他双手一摊，苦笑着说：“谢谢台长先生的美意，你祝福我的夫人，借你的吉言，这杯茅台酒我一定干了！”说完他一饮而尽。

那位札得台长和我这个中国同行也到了“无话不说”的地步。他指着餐桌上的一盘“油吃对虾”问我：

“台长先生，在我国吃鱼头是有讲究的。这虾头也可以吃吗？”

“虾是油炸过的，虾头质地焦脆，也可以吃。不过，这全看个人的喜好！”

听我这么一说，他点点头，竟把虾头放进嘴里，嚼得嘎嘎作响。接着他又问：

“鱼汤泡米饭，札得人民非常爱吃，你们也喜欢这种吃法吗？”

“喜欢。”我接着引伸道：“看来中札两国人民的饮食习惯也是相通的。”

那位札得台长听到这儿，竟毫不系外地把清香的鱼汤倒进自己

的米饭碗里，如吞蜜般吃了起来。札得的通讯社长见我十分活跃，大概又见我皮肤油黑，身体胖壮，就开玩笑说：“台长先生，你真像一头令人喜欢的壮牛！”

王金山同志听到这儿敏感道：“你讲的‘壮牛’……在札得有什么典故吗？”

这位通讯社长爽快道：

“壮牛是勇敢、勤劳和力量的象征，在我们札得是一个褒奖的称号！”

“好！”

王金山同志拍手道：“我们这又是一个相通。中国也有‘孺子牛’的美称呢！”

四、与英国记者坦率交谈

1975 年夏天，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博纳维亚来石家庄访问，住在石家庄交际处。省外事办公室提出由我牵头，并请新华社河北分社社长米荣运和河北日报副总编辑刘山同志参加，组成接待小组。博纳维亚，三十几岁，皮肤白皙，身材灵巧，甚是健谈。他会讲英、法、德、苏、中五国语言。并熟悉中国的闽南语和粤语。在交谈中，我们看得出来，他常抢占先声，又极善联络感情，拉近距离。意在了解中国政情。比如，他同我们见面握手后，就侃侃大谈起自己的记者生涯，说：

“做为一名驻外记者，只会一种语言是不行的。我已经学会了五个国家的语言，还觉得不够。我在中国的广东、福建和台湾采访，可以自如地用粤语和闽南语同当地农民对话。因此，我发的稿子总有生动的内容，没出过废品。就是本报因故不用，也肯定会有别的

报刊采用。所以，我的绩效稿费非常丰厚。咦，你们记者发稿有稿费么？”

“中国记者只有工薪，不发什么绩效稿费。”

我这么一说，他惊讶道：“你们没有绩效稿费，那记者能有积极性吗？”

“有！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大家的工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记者采写稿件是份内的事情，不需要额外再发什么稿费的。”

“那你们刊登读者稿件……给稿费吗？”

“‘文革’前发适当稿费。‘文革’后取消了。”

“呀！那怎么刺激读者的投稿积极性呀？”

“我们的理念和西方国家不同，社会主义中国的理念是革命。投稿是革命工作的一部份，并不是为钱才投稿的。”

博纳维亚发现我们的交谈“话不投机”，就变个话题道：

“我们可以到街上去看看吗？”

“可以。”

我们一行驱车来到了石家庄的中心，也是最繁华的中山路。这位英国记者好像一眼就发现了“新大陆”，他惊奇地问道：“咦，瞧许多单位的大门口都挂着‘xx 革命委员会’的牌子。而有些单位的牌子上却没有‘革命委员会’几个字，这是怎么回事呀？”

“这一点都不奇怪哟！”我接着说：“政府机关挂牌一定要有‘革命委员会’这几个字，因为它是文化大革命诞生的新的权力机构嘛，企业和事业单位也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但在单位牌子上是否显示，可以自便。”

他好像不大相信我的说法，又提出：

“我可以进去看看吗？当然，如果‘不方便’那就算了……”

看来他很了解中国政府的规定。我也简单而又礼貌地回答：

“对不起，这不方便！”

中午回到交际处，我们设宴招待他。餐桌上摆的是茅台酒。他热情地提议：

“我们今天不喝茅台酒好不好？我带来了英国的名酒‘威士忌’，希望大家品尝品尝……”

我们几个异口同声地回答：

“那不合中国待客的礼节呀！到中国来的客人一定要喝茅台酒的。哪天我们去英国泰晤士报做客，就一定要喝你们的‘威士忌’了。”

博纳维亚一看他的热情提议通不过，又来了另一个热情提议：

“那这样子好不好，我做为你们的同仁，把我带来的‘威士忌’做为友谊的礼物，送给石家庄同仁们品尝……”

“这也使不得呀！”我带头谢绝道：“在中国有非常严格的纪律，不准收礼和送礼。我们三位只能说声‘对不起’，由衷感谢你的美意了。”

“我倒是知道一条，中国的服务单位和职工是严格拒绝国际上通行的‘收小费’制度的。没想到这礼尚往来的‘送礼制度’也不被允许呀！不过，要从人类文明的发展角度讲，我认为毛泽东的中国取消‘收送礼’和拒绝‘收小费’的制度，是一种超俗的崇高文明。开了国际社会的新纪元呀！”

在杯盏交碰的宴会中，为了创造热情友好的气氛，我不忘用刚刚学会的几句英语祝酒词，拉近和博纳维亚先生的距离。一并祝福他和他的夫人身体健康。他也热情地向我们祝福。还说了一句更深情的话：“按照英国的时差，此刻我的夫人正在熟睡的午夜，她一

定会做一个美梦，回应诸位同仁的祝福。”

会见白求恩的两位外甥女

1975 年秋天，著名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共产党人白求恩的两位外甥女，应邀到中国访问。她们先是到河北唐县拜祭了白求恩墓，然后来到白求恩创立的设在石家庄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访问。

河北省革委对此很重视，委托我以省革委常委的名义，会见了这两位白求恩的亲人。陪同会见的有：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王永宽、副院长李润兰。我在代表省革委和工农兵群众表示了对白求恩的崇高敬仰和对两位亲人的热烈欢迎后，双方进行了亲切热烈的交谈。

两位外甥女三十岁上下，很开朗，很健谈。在参观医院白求恩纪念馆时，两外甥女热泪盈眶，激动万分。她们说：“正是从这些珍贵而又感人的照片上，才真正领悟到舅舅受到中国人民热爱和毛主席崇高评价的根本原因。我俩没有舅舅那样高大，但决心以舅舅为榜样，做发展中、加两国人民友谊的架桥人。”

两位外甥女还披露了白求恩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她们说：“妈妈经常谈起舅舅工作起来很拚命，常常忘了休息，忘了照看家中的舅母，舅母为此很有怨言。后来舅舅得了肺结核，这病在当时世界上属不治之症，为了不传染和不连累舅母，舅舅毅然决然地提出和舅母离婚，舅母为此大哭了一场也没能够挽回。但是，舅舅并不惧怕肺结核这种不治之症。他决心从自己做起，攻克这个世界性难题，竟破天荒地用药物注射器，直接刺入自己的肺叶，硬是用这种直击病灶的方法，把自己的肺结核治好了，成为世界上用手术治好肺结核的第一人。舅舅到中国后，仍惦着分手的舅母。在他生命

的最后一刻，还留下遗言，把自己为数不多的遗产分给舅母一部份，这一点也显示了他的人格多么高尚”。

两位外甥女带来一盘电影资料，是白求恩在加拿大的同事、朋友包括他早期的恋人缅怀白求恩的故事。我委托河北电视台复制了一套，做为永久珍贵的纪念。

（注：我这篇回忆文章，在白求恩逝世 67 年纪念的日子里，由河北报业集团的《书刊报》于 2016 年 12 月 5 日转载）

五、和巴西作家畅谈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1976 年 1 月，巴西一位红色记者兼作家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翻译黄佳宁同志陪同下，来到石家庄。他旗帜鲜明地宣称：“我是为撰写《毛泽东传》来中国座谈情况和搜集资料的。希望能会见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学者及政治理论宣传方面的记者和作家。省外事办公室认为，他访谈的题目严肃而又重大，最后确定由我来接待。

我和这位巴西作家一见面，发现他思想非常开放，性格非常开朗。公开对我说：

“高同志，这次座谈的题目很宏大。但我意见又不固定具体题目，完全用海阔天空自由讨论的形式。但学术味道要力求浓一些。你以为如何？”

“主随客便。”

我表示同意他的提议。其实他好像胸有成竹，心里已经有了一定的题目。只听他说：

“现在中国正兴起‘批邓、反击右倾案风’的革命运动。我发现毛主席对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和发展，有两个重大武器，一个是在阶级斗争的关键时刻发起革命的群众运动；一个是文化大革命运

动中群众创造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的武器。这跟西方资本主义对政权的巩固和发展，采取所谓‘民主选举’ 的办法更换政府，是完全不同的。我认为这是毛泽东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列主义的新发展！”

“我同意你的论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这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论断：即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及其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马列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但是，我们不能把毛泽东捍卫科学社会主义革命的群众运动和群众手里掌握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这些新式武器，简单他去同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民主选举’ 相类比。前者是革命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行动。后者是资产阶级用虚伪的所谓‘民主选举’ 窒息工农革命、巩固自己统治的鬼把戏。两者没有可比性呢！”

“我赞成你的意见。但是，现在国际上有一股号称普世的强势潮流，就是宣扬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选举’ 是有史以来的最高文明，已经保证了资本主义世界几百年的稳定发展。毛主席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已经退出历史了。不知你怎么看？”

“我认为应该做出这样的分析：资产阶级在当年反对地主阶级专政的斗争中，其民主武器是具有革命意义和先进作用的。但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反过手来剥削和镇压工农群众，就走上腐朽和灭亡的道路了。现在就连头号资本主义的美国，工农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都如火如荼，怎么能睁眼不看这几千年的阶级斗争史和眼前严酷的阶级斗争现实？毛主席有一句名言：哪里有压迫，哪里就一定有反抗。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可以改变的。当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就一定会成为必然，成为不可避免的铁律。因此，我要肯定地说：毛

主席的这一英明论断并没有退出历史，也没有过时！”

这位巴西作家对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革命委员会很感兴趣。他说：“这种新型的革命委员会，并不沿用资产阶级的那种虚伪的‘选票法’产生，而是在革命群众运动的基础上进行协商和选举的产物。它很像是当年马克思高度评价的法国‘巴黎公社’在中国的再现呀！但是，它又比‘巴黎公社’升华了一步。比如说那个‘军、干、群’和‘老、中、青’三结合，可以说是无产阶级政权建设最具深邃意义的创举。这里最让我叫好的是一个‘军’和一个‘群’，这两者紧密结合在了一起，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最直接、最集中和最有力的崇高表现嘛！”

“我非常感谢你这位大洋彼岸的红色作家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有如此深刻的理解。毛主席倡导的革命委员会，我本人做为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群众代表’的一员，已经亲自尝到了它的优越性。比如说，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委员是 121 名，其中解放军代表 26 名，地方领导干部代表 25 名，群众代表却有 70 名。它的工作人员编制也只有八十人，实在是再精干不过了。而其中的群众代表又实行毛主席提出的‘既不脱产又要工作’的规定，这就从制度上防止了群众代表蜕变成官僚主义者的可能性。你熟知的那位山西省大寨的劳动模范陈永贵，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国务院副总理，他照样拿农村自己那个生产大队的工分过日子。那位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工人劳动模范吴桂贤，也照样拿她原来所在的棉纺厂的 60 多元工资过日子。我这个代表知识分子的群众代表，身为省革委常委仍拿原来一般干部 50 多元的工资。这一切完全是为了落实马克思讲的‘人民的公仆’不能变成‘人民的主人’的崇高理念。正是有了这个崇高理念，毛主席的战士都是忘我战斗，勇往直前，不怕牺牲的。”

双方座谈结束后，我表示希望他早日完成《毛泽东传》的撰写，为世界革命人民做出贡献。他回应说：“谢谢，我一定努力！”

六、会见并观看伊朗国家足球队与河北足球队的比赛

1976年7月23日到26日，伊朗国家足球队来石家庄与河北足球队举行友谊比赛。在省委主持日常工作的省委常委王世惠同志做出批示：“伊朗是我国的重要朋友之一，请省革委常委高恩泽同志牵头组织好接待工作。”

接到王世惠同志的指示，我还真有点煞费心思。因为我对国际国内足球界的情况不大熟悉。怎么办呀？只有实行群策群力的办法了。因为陪同我会见并接待的石家庄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革委主任张建尧、市警备区副司令员石振魁、省外办副主任马建勋、市外办主任邢绍彬和省体委主任闫欣、副主任秦长怀以及省足协负责人王伯清，他们都是有名的“足球迷”。完全可以充当我的老师和“高参”。大家在讨论比赛的形势时，都不约而同地讲到：伊朗国家足球队是亚洲的一支数一数二的“劲旅”；河北足球队曾荣获国家全运会冠军，是中国足坛上有名的“铁军”。双方实力可谓旗鼓相当，有可能赛个平局，既发展了中、伊两国之间的兄弟友谊，也显示竞赛双方各有千秋、不相上下的竞技水平，出现一个皆大欢喜的热烈场面。说心里话，当时大家都是自我感觉良好，没有一分为二的想到可能出现的“失利”。所以，我们在做战地动员时，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助长了“轻敌”、缺少了“迎难”的战略准备。我们几位在接见伊朗足球队领队和教练时，我有意讲到伊朗足球队是世界足坛著名的“劲旅”之一，人家很谦虚，领队就当即指出：“常委先生过奖了。我们在世界足坛够不上‘劲旅’。只能说在亚州足坛有

一点小名气，还要好好向河北足球队学习。”

7月25日过午，各界观看足球比赛的人们如潮而至，石家庄体育场座无虚席。四时三十分比赛开始，到六时三十分，连续赛了五场，我省足球队竟以难以想像的败北0：5输给了伊朗。观众心里非常憋气。我们的队员更是难过异常。好在当时观众的大局观念和组织纪律性很强。再加上中央广泛宣传的国内外赛事要坚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指导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并没有引发任何不愉快的事件。

尽管如此，我们几位负责接待的同志在内部主动承担责任，总结经验教训。特别要抓住这个机会向伊朗足球队好好学习，弥补自己的弱点。我还特别带头向伊朗足球队的胜利表示了祝贺。其领队谦虚地回应说：“其实，河北队的实力并不比我们差。你们主要是缺乏国际比赛的经验，特别是对伊朗足球队的战术不很了解。如果河北队了解了我们的战术，伊朗队想取胜就不那么容易了。”晚上为了促进双方队员的友谊和技术交流，我们破格举行了双方队员参加的便宴。大家欢声笑语，交流活跃，成为一次难忘的盛会。

七、会见日本民间访华团

1978年秋天，日本民间访华团一行20人，在日本著名左派报纸《朝日新闻》驻东京分社社长牧也武先生的率领下，来石家庄煤矿机械厂参观访问，厂里是第一次接待这么多外宾，我们不得不做出详细的接待方案。因为他们要参观厂办的车间、食堂、医院、学校、托儿所、幼儿园、图书馆、俱乐部、家属宿舍……和员工广泛交谈，市外办很难派出那么多翻译。我却发现这个历史上的老厂竟有几十位懂日语的技术骨干，干脆就由我们把翻译工作兜起来了。牧也武

团长激动地对我说：

“没想到贵厂竟有这么多人会日语呀！我把它看成是贵国的一个奇迹！这对中日民间的交流和合作太方便了。”

“你讲到中日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我顺便告诉你——牧也武先生，日本东京钻探机械竹事会社的代表很快就会过来，同我们商谈技术交流和作的大事。”

牧也武高兴道：“这是应运而生的喜事，祝你们成功！”

当然，令牧也武团长和其参观团团员更惊羡的是：中国工人竟有如此高度丰厚的福利待遇和服务制度。牧也武团长用比较的口气对我说：“世界上有一批像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但要论到对工人的福利待遇和全方位服务，解决好工人的后顾之忧，我看谁都比不过中国。你们这里除了食堂要交点伙食费，住房由国家提供，只交点低微的租金，其他如医疗、教育、托儿所、幼儿园、图书馆和俱乐部……都是由厂里免费提供和服务的。这在上也堪称创举呀！我们搞新闻媒体的都知道，社会主义有一句名言，叫‘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认为单就贵厂的工人福利和服务制度来说，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年春天，以日本东京钻探机械竹事会社技术课长大河内嘉门为领队的技术交流小组，一行四人来到了石家庄煤矿机械厂。他们在详细参观了我们的全部生产流程、操作技术和产品后，对我们的实力和水平有相当好的评价。在技术交流会上，令大河内课长震惊不已的是，几十名技术人员都能熟练的用日语交流。其交流的认真、活跃和亲切，就像是老同事那种直率切磋一样。

晚上，我在河北宾馆设宴招待日本客人。没想到大河内课长用日本固有的礼节向我赠送礼物。这时，改革开放的中国已经出台了

涉外互赠礼物的规定。我只得遵规在表示感谢之后，愉快接受。只见大河内先生行过九十度鞠躬的大礼之后，把一块用秀美宝盒装着的“精工舍”电子表，亲切地戴在了我的手腕上。接着，又赠了一盒电子计算器和一盒原子笔。待大河内先生访问结束时，按照友好对等的原则，我以煤矿机械厂的名义，赠他一套精美的《红楼梦画卷》，他也在感谢之后高兴地收下。事后，根据国务院的新规定，电子表由我出资 70 元购买自用。其他两盒礼品交公，统筹配备使用。

八、在柬埔寨蒙难之际，欢迎柬飞行员来访

1979 年冬天，民主柬埔寨受到越南的侵略、全国正处在危急的时刻，正在石家庄空军航校接受飞行训练的学员一行 20 人，来石家庄煤矿机械厂参观。市外办指示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声援柬埔寨人民反对越南侵略的斗争，鼓舞柬埔寨飞行员的士气。”我们研究的接待方案是：一、客人进厂要举行夹道欢迎，宏扬抗越援柬的浓烈气氛。二、客人在参观车间、医院、学校时，参与交谈的员工和学生们要首先表态支援柬埔寨人民的抗越斗争，显示出中国全民抗越援柬的气势。就这两条，极大地感动了埔寨的学员们。其飞行员领队尼亚瓦在跟我交谈时，激动的流着热泪说：“在我们祖国最危难的时刻，只有毛主席缔造的新中国最有效的援助了我们。这是柬埔寨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

第 32 章 恶运向我悄悄袭来

按照当年省委的意见，我在石家庄煤矿机械厂的挂职锻炼将在 1980 年六月结束。而在这前夕，又传来国家煤碳部要把石家庄煤矿机械厂收回部里直接管理的风声。我不愿离开河北建制，又临近锻炼届满，就给省委写信说明心意。省委书记尹哲和省委常委马辉司令员传回话来，同意我的要求。照一般情况和例行规定这是没什么困难的。但是，我左等右等，省委的调令并没有下达。我不知问题出在哪里，就请新闻界一位老同志替我打听了一下。他很快就把情况反馈给我。说：“1979 年中央给河北省派来了第二书记江一真同志。他一来就好像戴着有色眼镜，说以刘子厚同志为首的河北省委存在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并说这条‘黑线’渗透到上下左右各级组织，必须开刀动大手术才能解决。他还宣称自己手里‘握着一个谁上谁下的名单’，进行公开的恫赫。问题更为严重的是，江一真同志的这种十分严重的错误观点，如果要在省委班子内部交换意见，进行讨论，或许经过一段实践考察，有可能逐步达到认识上的一致。但江一真同志不顾党的团结和大局，竟把他的这种错误看法公诸于社会，从而导致一些‘共鸣 人物’群起响应，形成一股势力，最终造成省委领导班子的分裂。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和胡耀邦主持的党中央，于 1979 年年底决定把刘子厚同志调离河北，派来国务院秘书长金明同志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调来原陕西省长李尔重同志任河北省委书记兼省长。这两位老同志到河北后，清正廉洁，工作十分艰苦细致。就连给刘子厚同志送行吃顿便饭，都是自掏腰包。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他们对原河北省委的工作进

行了科学分析，采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即对刘子厚同志主持省委工作期间，做得对的就明确表态支持。做得不对或不完全对的，就坚决加以改正或做必要的调整。决不搞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的形而上学。这种思想路线和实践本来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江一真同志却我行我素，一意孤行。公然反对金明和李尔重同志的正确做法。说什么‘赶走了一个刘子厚，又来了两个刘子厚！’‘金明和李尔重执行的是没有刘子厚的刘子厚主义！’，再一次把省委内部的分歧公诸于社会，导致反对刘子厚、金明和李尔重的‘闹派’越演越烈。使得金明和李尔重同志的工作也困难重重……”说到这里，这位老同志闪着沉重的神色又道：“河北这种极不正常的情况已经殃及下边，我想不可避免地也会殃及到你。你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其实，这位老同志反馈的情况，我也多少有点耳闻。但没想到会有这么严重。既然已经闹到如此势不两立的地步，我认为问题根子已不在河北省委本身，而在中央肯定有重量级权势人物支持江一真在河北搅局。而这样的权势人物是谁呢？我想不会是华国锋，也不会是党的副主席李先念。因为李先念曾代表中央在1979年夏秋之交，召开了“河北汇报会议”。以华为头的党中央向全党批转了这次的《会议纪要》。明确指出：“河北省委在林铁同志主持期间成绩是主要的。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后在刘子厚同志主持期间，成绩也是主要的。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既然刘子厚被江一真轻易赶走，金明和李尔重同志又被江一真搞得困难重重，而华国锋和李先念虽然还顶着党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的帽子，却是一声不吭，他俩显然也已经失势了。在中央和省委乱得如此严重的情况下，剥开表皮看实质，显然主要不是他们在工作上有多大的分歧，而是在对待毛主席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上势不两立。邓小平和胡耀

邦提出要清算所谓“四人邦”的“帮派分子”，而刘子厚、金明和李尔重同志却公开发表了不同意见。正是在这一点上划线，凡是拥护刘子厚、金明和李尔重的同志都要整下去。哪一天殃及到我的头上，我认定那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这一天，“恶运”终于向我袭来。那是1980年九月的一天下午，我正在会见第二次来访的日本客人大河内嘉门。党委书记顾清廉同志不顾外交礼节，突然地把我叫了出来。我刚刚坐定，一贯稳健行事的他，就很不自然地说：

“老高同志，有个事跟你谈一下。接上级通知，免去你副厂长的职务。你现在仍回去接待外宾，下来咱在细谈。”

因为顾清廉同志一向做事细致，作风稳健。他在这样一个当口，用这样一种不寻常的形式，跟我谈这样一个严肃的人事问题，如果不是上边有什么特别的指令，以他的工作作风和习惯，是决然不会这么干的。我虽然对他一向十分尊重，但这一次却没有遵令再回去接待外宾，而是努力克制着内心的不平，叮问他道：

“免职的理由是什么？”

“说你极左思想严重。”

“请问谁说我极左思想严重？有文件认定吗？”

“当然是上级啦！市委……”

“我是中央和省管干部，市委无权对我做出这样的决定和认定。”

“省委组织部也有话……”

“省委组织部？谁说的？有文件吗？”

“文件么，说后边会来的。”

“一个严肃的人事问题，能够这样‘儿戏般’地搞吗！你当过

多年的组织部长，职务任免都必须得有文字通知的，这应该是常识吧？”

“现在咱不说那么多了，你还是先回去接待外宾，下来咱再详细谈。”

“老顾同志，请翻个过想一下，假如是你——这种毫无组织原则的不正常作法落在了头上，你会接受吗？”

之后，顾清廉书记多方安慰我。讲了一些“干部要能上能下”“服从命令听指挥”的大道理。还特别关注我说：

“这两年我们合作得不错。希望你能留在煤机厂工作，党委会很好安排的。”

“谢谢你的关照。现在我想的不是这个。而是要对这种公然践踏党的组织原则的恶行，亲自去省委讨个说法。今天算是向你请假吧！”

第二天上午，我直接来到了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王玉同志的办公室。这是一位“三八”式的老革命，长期负责河北省委的组织工作，思想作风口碑极好。他一向关心我的成长，在我担任河北省革委会常委主抓河北广播电视宣传和事业发展后，同我有着亲密的工作关系。他一见我便热情迎上来握手道：

“哎呀！好久不见了。哪阵风把你给吹来啦？”

“这阵风可够厉害哟！你们省委组织部连个招呼都不打，一句‘口风’就把我给免了，我来找老部长问个究竟呀！”

“啊？竟有这事？”王部长震惊道：“我一丝都不知道呀！”

这工夫，组织部副部长魏章同志进来了。他转脸就势问道：

“老魏同志，刚才老高同志说我们组织部把他的职务给免了，哪有这回事？你说哪有这回事呀……”

魏章同志皱皱眉头说：“你最好问问王家树同志，他那里……”
魏副部长说到这，欲言又止。

这时，只见王玉同志若有所思地说：

“老高，你先回去。省委组织部不知道免你职的事，我查查再说。”

不过，刚才听魏副部长点到王家树的名字，我心里立刻打了个闪：“这王家树副部长可是个活跃异常的人物呢！听省委大院的人们说，刘子厚同志主持河北省委期间，王家树一直过头地崇拜刘子厚，人们都觉得这人不正派。江一真当了省委第二书记，他见江有来头，又大肆吹捧江一真，并成为他公开揭批刘子厚的左膀右臂。江一真说他手里有个“谁上谁下”的名单，人们风传就是王家树提供的。其实，王家树本来也是很尊重王玉同志的，自打靠上了江这棵大树，俨然是第二部长，就不把王玉同志放在眼里啦！

我从王部长办公室出来，顺便到了负责高干管理的干部一处。何瑞武处长正在办公。他好像知道一点“小道消息”。就笑着对我说：

“好长时间不见了。你是没事不来吧？”

“是啊！”我把向王玉同志汇报的情况简要说了一下。

“免你职的事儿，我们不知道。但听说省委内部有个‘密秘渠道’背着省委第一书记金明同志和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王玉同志，正在非常强势的干着这件事。小徐（指省革委常委兼团省委副书记徐维京同志）正挂职下放到石家庄国棉一厂任党委副书记，这个‘密秘渠道’就强势命令她主动辞职。如果不主动辞职，就强行免职。小徐没敢像你这样还跑到组织部来讨说法，她干脆主动辞了。”

“这种非组织活动如此横冲直闯，公然践踏党的组织原则和纪律，难道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也能容忍吗？”

“咳，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现在的共产党已不同于毛泽东时代，就是这么一种极不正常的局面呀！金明同志和李尔重省长，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水平都很高，工作能力也很强，好像也夯不动人家这股势力。”

“王玉同志已经跟我讲了，他要追查此事，让我等等看。”

“王玉同志一向维护党的优良传统和组织原则。对省委内部这种乱象，他一直在据理力争，但收效甚微。你等等看也许是个办法。”

出了何瑞武同志的办公室，我径直回家。爱人刘淑琴见我脸色不好看，就小声地问我：

“问清楚了吗？”

我把王玉部长和何处长谈的情况复述了一遍。没想到她讲了一通更令人震惊的意见：“现在的共产党已经不是毛主席领导的那个共产党了。你在毛主席领导下，属于‘优

秀的知识分子’。又是参加国庆观礼，又是参加周总理的国宴。古人讲‘一朝天子一朝臣’。毛主席已经逝世了，你们这些毛主席的铁杆干部人家必然要撤下来。你读了那么多书，应该看得透这个大道理呀！所以，我意见你不要再等王部长去‘追查’了，干脆给省委写个申请，什么官职都不要，就去当个小小的编辑。这是你的一技之长嘛！老话说‘无官一身轻！’，你要是没有毛主席圈阅批准的‘省革委常委’这个官儿，人家会这么用劲蹂搓你吗……”

我当然不能完全接受爱人的意见。就回她道：

“做为毛主席培养的共产党员，难道不应该对这种非组织活动

进行斗争吗？”

“当然需要斗争。但斗争有多种形式。你换个位置，像鲁迅先生那样，用笔做刀枪同样也是战斗嘛！”

“啊？”爱人的话，这回对我产生了天翻地覆的触动。

回到工厂，我如实的向顾清廉书记做了汇报。他听了省委这种不正常的情况，也显得非常惊讶和无奈。再加上他们也总没收到省委免我职的文件，也不便再对我讲什么了。就这样，做为一个双方都不愿声张的“悬案”，干脆就“悬”了起来。一悬就悬了两个月。这时，爱人又劝我：

“你看这事都‘悬’了两个月啦，王部长也还没有追查出个结果，可见王部长也碰到了不小的困难。想想看，你还有多少精力跟这种非组织活动斗下去？我这样设想，如果给你两个月做编辑写书，可能一本几万字的中篇小说就出来了。这不仍然是给人民做的一份贡献嘛！你是不是觉得这样被人家免了，有点面子上难以接受？我告诉你，汉朝司马迁当年受了不能言说的‘宫刑’，人家并没有顾及自己的面子，而是发奋著书立说，真的就写出了传世大书《史记》。你没伤一根汗毛，身体壮壮的，去为人民编书和写书该是一件多么高雅和光荣的事呀！再说了，你给省委金明书记和尔重省长写信，不要官职，只求当个编辑也是一种文人的风格嘛！他们如果同意了，这跟那些卑鄙小人免你职的勾当是本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么！”

这工夫，我彻底被爱人说服了。提笔就给金明书记和尔重省长写了一封信！接着又来到了王玉部长的办公室。老部长没有等我说话，就率先严肃道：

“关于你的‘免职’问题，现在已经变成了党内的一场‘官

司’。不要急，这场‘官司什么时候打完，现在还没有时间表……’”

“王玉同志，我这次来是报告自己的新意见：决定主动向省委提出申请，不要任何官职，就去当个编辑。你了解，当编辑和记者是我的长项，党一直是培养我干这件事的。如蒙组织批准，我会高高兴兴的去干。因为这样的决定，我认为是履行的光明正大的组织程序，跟那些卑鄙小人践踏组织原则的非组织活动，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所以，我给金明书记和尔重省长的信已经写好带来了，请老部长务必帮忙替我转交。”

老部长收下了我的信。他大概看到我既诚恳又坚定，没有再说什么。

十一月初，王玉同志和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徐纯性同志找我谈话。徐部长率先说：“省委决定了，同意你的请求，初步商定你去河北人民出版社当编辑。你是老编辑了，到哪儿当编辑也不会有问题。看看你有什么意见？”

“我完全同意省委的决定和安排。一定会努力做好编辑工作。看看两位老领导还有什么嘱咐的？”

“我来传达一下尔重同志对你的期望。”王玉同志接着说道：“尔重省长是著作等身的大作家，这你一定知道。他很理解你的要求。说‘你一辈子喜欢玩笔杆，这是文人气质嘛！相信你今后在文学上一定会做出新成绩的’。”

“谢谢尔重同志的关心和鼓励。我一定不辜负尔重同志的希望！”

调令很快按组织程序由省委组织部干部一处发到石家庄市委组织部干部一科，再到煤矿机械厂党委。谢天谢地，一切都十分顺畅。我高兴地到河北省出版局的人民出版社报到，分配到少儿文学编辑

室。

只是这背后也曾发生过一个我不知道的小插曲，是省委宣传部的一位同志密秘告诉我的。他说：“省出版局主持工作的副局长燕英同志，听说你要来出版社当编辑很不高兴。竟跑到宣传部公开拒绝。理由是你根本当不了编辑，更当不了出版社的编辑。宣传部顾问余信同志严肃回答他说：‘这是省委的决定，你出版局无权拒绝。至于你说高恩泽同志当不了编辑，更当不了出版社编辑，那是你不了解情况。高恩泽同志 1958 年就开始当编辑兼记者了，文字功底是很强的。’因为余信顾问做了秉公而又有力地回答，燕英只得悻悻地回去了”。

其实我对燕英同志也有一定的了解。他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就是唐山地委秘书长，还当过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后来调任河北人民出版社社长。文化大革命前夕，因为他拒印毛主席著作被河北省委免职，省委派河北日报副总编辑陈洁民同志接替了他的职务。文化大革命中他占在了保定某派当中，成为活跃的名人，得到了保定驻军代表的支持。省革委成立后，他虽然对刘子厚同志曾免过他的职耿耿于怀，但子厚同志并没有用派性对待他，仍任命他为省出版局副局长（一把手由军队同志担任）。因为我们同属宣传系统，经常在一起开会，讨论问题，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他同我关系还不错。今天，昔日的大环境已经彻底变了，他敢于无视省委的决定和拒绝我调入出版社，毫不奇怪，是其过去反对刘子厚而今又反对金明的资产阶级派性使然。

第 33 章 在当出版编辑的岗位上

我当儿童文学编辑，说来并不生疏。因为我 1965 年 10 月在天津日报发表的中篇小说《一个儿童团长的故事》，就是从儿童文学开始的。有了这样一个如鱼得水的环境，我确信自己不仅能为孩子们编出好书，还可以通过自己的手笔写出儿童喜欢的长篇小说来。

儿童文学编辑室当时共八位同志。都是毛泽东时代培养的大学生。主任穆书法、副主任王吉祥，以及编辑郭明志、栾宝群、杜福山、刘英民、韩季华、贾雪琴，都是非常能干的编辑。他（她）们对我很热情，使我一进门就感到了同志式的感情和温暖。

不过，通过两位主任和编辑们介绍的情况，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儿童文学同成人文学相比，在全国是处于弱势的。不论是搞儿童文学的作家，还是创作的文学产品都相对较少。正是因为这种现状，国家出版局不得不在稿费标准上向儿童文学作品做出优惠性倾斜。当然，这种相对弱势的现状，也反映出儿童文学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完全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一场。

出身于新闻编辑的我，虽然和出版编辑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但细做比较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比方说，编新闻稿首要的一条是紧跟形势，现实性要很强。而编一部书稿，特别是大部头的书稿，则必须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出版以后则不仅有现实意义，更重要的是要有历史久远的生命力。而要做到这一点，编辑必须具有敏锐和深刻的洞察力。这就涉及到自己思想观念的新旧和知识面的宽窄。到这时候我才猛然感到：自己虽然可以编出一篇合格的或优秀的逾千字的新闻稿，印之于报低，传之于电波，但却不敢说能编出一部优

秀的能传之于后世的大作。想到这一点，我的压力陡然升大。怎么办？我想首要一条是如饥似渴的学习。学习好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掌握好分析世界和观察社会的武器。这一条抓住了，就能解剖书题，洞穿内涵，不至在政治方向上迷路。第二就是向新老编辑学习，从他们那里吸取营养和知识。这一条我很快尝到了甜头。少儿室的几位大学生郭明志、杜福山、栾宝群、刘英民等同志都乐意帮助我。编辑室的领导穆书法和王吉祥同志，则对我这个“老编辑”“新出版”多方创造熟悉业务的条件。比如，他们没有给我定什么发稿的计划指标，先用“练兵”的办法介入出版业务。这时，少儿室自定了一个选题，要编一本河北省儿童团的抗日战争故事，干脆就由我这个“新兵”来干。我非常高兴的投入了组稿工作。经过给各地区文联打约稿电话，接着下去，面对面的一人一篇的具体运作和筛选。大家都非常热情实干，几个月下来，一部 20 几万字的《儿童团抗日战争故事集》便合成了。为了吸引孩子，书题取了其中一篇故事的题目《神笛子小五》，便送到印刷厂发排，很快便出版上市，我这第一炮打得还不错。经过到书店和学校调查，此书受到孩子们的喜爱和欢迎，我心里感到非常欣慰。

1981 年 6 月 27 日至 29 日，邓修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举行。通过了两项令人震惊的决议：一个是《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个是曾被邓小平呼为“英明领袖”和“万岁”的华国锋下台，给了个副主席的差事。全会选举胡耀邦为党的主席，邓小平为军委主席。这两件惊天动地的新闻，虽然在全国引起重大反响，但我却没有感到意外。因为在 1980 底，新华社一位老同志就提前告诉我“华国锋已经内部下台了！”他还绘声绘色地给我讲了这次逼宫政变的经过，说：“当时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还是华国锋主持。

这位搞武装政变上台的主席，竟然没想到邓小平、胡耀邦突然发难，说他顽固坚持对毛主席的‘两个凡是’，叫他辞职下台（注：华国锋“两个凡是”的原话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其实，华打这个旗号，完全是蒙骗群众以巩固其统治地位。他把毛主席撤职的邓请回来彻底复辟，就已经公开背叛了毛主席的决策和指示么！邓则一直认为华上台只是过渡性人物。要彻底否定毛泽东思想、复辟资本主义，只有他邓小平主宰中国的一切才能做得到。因此，他们之间的争权其性质是修正主义营垒内部狗咬狗的斗争。）。

这时参加会的几十位要人，都异口同声支持邓和胡的提议。华傻眼了，他有气无力地苦苦要求‘希望给他时间，改正错误，弥补不足’。但引来的却是异口同声的批判。华没办法了，就摆开了‘肉头阵’，不管你怎么批，就是不辞职。会上僵持二十几天，弄得邓、胡也作难了。最后只得搬出党的副主席兼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搞‘苦肉计’。叶剑英老泪横流哭泣着说‘华主席上台后，国家出现的错误主要应该由我承担。我现在带头辞职，彻底休息。’这一招还真奏了效。华有些感动的说：‘我可以辞职。但我有个建议，请叶帅担任党的主席。’叶剑英忙摆手说：‘使不得，使不得。我刚才表态了，就是彻底辞职休息！’这时邓小平赶紧发话：‘华国锋同意辞职了，我提议由胡耀邦做党中央主席，我担任军委主席。’会议一致通过。这时刚上台的主席胡耀邦转身指示华国锋，说：‘这件大事要对国内外严格保密，请华国锋同志顾全大局，你还要顶名干一段，待十一届六中全会时正式公布。华国锋扭扭捏捏地同意了。”这位新华社老同志讲完这段故事，觉得意犹未尽。过了些天，他又补述了两个关华国锋的政治故事，我也记下来了：1、华国锋挨了二十几天的

批判下台了，但没有写出一份正式的检讨，胡耀邦要他写一写，至少写个说明也好。华这次没搞“肉头阵”，而是干脆给胡写了一封便信：“耀邦同志，你要我做自我批评或者做个说明也好，我认为怎么做也不会满意，不写了。华国锋。”2、1981年中央举行春节招待会，胡指示华仍以主席名义主持，以对内对外显示国家领导人没什么变化。华却以身体不适加以拒绝。胡对此急得没法，只得搬出邓小平施压，华照样拒绝。邓小平大怒道：“他华国锋不配合，好么，剃他的光头！”（注：原来邓、胡内定，华辞职后可安排担任党的副主席。）这剃光头的意思就是不再安排他当副主席了。胡这时有点侧隐之心，多方劝说邓还是不要剃他光头。那怕让他挂一段副主席再剃也好。邓小平总算同意了。

至于那个《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六中全会虽然在邓、胡的高压主宰下通过了。但内里的尖锐斗争也是很激烈的。据新华社那位老同志说：“《决议》彻底否定毛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否定大跃进，完全是邓小平的长官意志决定的。意在给自己的修正主义路线正名和讨好那些曾经受过群众批判的人。其实上点岁数的人都知道，搞文化大革命是党中央毛、刘、周、朱、陈、林、邓七常委和全体中央委员都积极支持、举过手的，党的‘九大’、‘十大’，还有四年前华、叶、邓召开的‘十一大’都是肯定的嘛！邓小平几次给毛主席写检讨信都是高举文化大革命并保证永不翻案么！1958兴起的大跃进运动，成绩是主要的，全党包括今天持否定态度的邓小平和陈云也没反对过嘛！，现在一个十一届六中全会就用出尔反尔的流氓手段把‘案’给翻了个底朝天，硬是把三届党代会的决议都踏在了脚下，这种胡作非为又如何向参加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运动的广大党员和人民交待？上到纲上，这是公然反毛、

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呀！”我则认为：“邓和胡跟着毛主席干了几十年革命，现在看来其本质上还是个跟着走的同路人，内心世界观仍然是资产阶级的，在这个关头彻底暴露了。我想提出一个简单的质问：他们在毛主席身边这么多年，竟然一丝都没记住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哲学观。连‘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都是‘形而上学’、违背‘一分为二’的哲学思想都不懂呀！粗暴而又武断的就做了这么荒唐的决议，这要受到历史的惩罚呢！还有，邓小平整天大喊文化大革命搞得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怎么就忘了他亲自主持起草并由周总理宣讲的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公开庄严的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宣布：中国是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就忘了 1979 年他那个打击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越南的所谓‘自卫反击战’，花了多少个亿，难道那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我们俩个的讨论只能是这种同志式的私下讨论，按照邓小平那个修字号党中央规定的“必须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政治纪律，是不能公开讲的。好在我的编辑工作比较顺手，这种党内的重大变动当时还没影响到我的本职工作。

就在这个时候，省人民出版社根据少儿编辑室的建议，决定创办《儿童世界》月刊。这是河北省为少儿办的第一个综合性刊物。其内容相当丰富。设有儿童小说、革命故事、民间传说、童话寓言、科技之窗和连还画诸栏目。为了适应当时通俗文学兴起的潮流，室里责成刘英民同志和我写一部杨家将穆桂英的书，在《儿童世界》上连载。我俩又是钻图书馆，又是我老艺人，广泛搜集资料。出刊后每期发四、五千字。孩子们倒也爱看。

为了给自己今后的工作创造更好的条件，我向领导提出走出去

搞点调研，领导很同意，并决定派对儿童文学界比较熟悉的郭明志和贾雪琴同志一块去。我们一行进京，先拜访了《儿童文学》和《东方少年》编辑部，会见了团中央负责少儿教育的老同志陈模同志和童话作家郑渊杰。接着访问了中国儿童文学界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著名的泰斗级的童话作家严文井和张天翼。严文井的《小溪流的歌》、《南南和胡子伯伯》和《下一次开船港》；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秃秃大王》和童话剧《大灰狼》，在中国童话史上属久负盛名的里程碑式佳作。只是张天翼同志因病导致至嘴神经障碍不能讲话，但头脑还非常清楚。我们汇报一些情况和想法，他总是热情微笑着用点头和摇头表示意见。他的夫人文学修养很高，不时的在一旁插话，阐发张天翼的创作思想和思路，给我们很深的教育。本来我们还想通过严文井先生搭桥去见儿童文学的泰斗叶圣陶老人，严先生说：“我今年 68 岁，叶老比我大 16 岁，眼下身体不大好，下一次再见吧！你们可以去见见他的儿子叶至善，叶至善是中国少儿出版社社长，也是搞儿童文学的老手了。”我们便去拜访了叶至善社长。几番走访请教收获巨大。最大的收获是对儿童文学的现状和发展前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大家一致认为：在少儿教育和出版处于弱势的情况下，应采取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即文学产品必须确保一定的量，以尽力满足广大儿童的需要。但同时也一定要有精品不断问世，不然就和我们这泱泱大国不相称了。大家对当时冒出的武侠、言情和凶杀类作品到处泛滥，给儿童们造成了极大的毒害，表示了强烈的愤慨。认为这是背离社会主义文学的一股黑潮，革命的儿童教育工作者必须动员起来，进行针锋相对的抵制和斗争。我则禁不住暗下决心：不仅要给孩子们编出一部部好书，而且要亲自动手写出一部好的长篇来。

事情有时会有惊喜出现。我突然收到一本署名张嘉鼎的簿簿的书稿。书题为《曹雪芹的传说》。还真把我给惊住了。大家都知道《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给世人留下了这么一部意义深远百读不厌的大作，但对他个人的历史经历和思想理念，因为史书几无记载，人们却知之极少，为这，竟成为国内外“红学家们”苦苦求索的难题。那么，这本簿簿的书稿会否打开了解曹雪芹的神秘大门呢？我心里立马涌起迫切的期待。等我细细地一读，呀！每一篇都是宝贝呀！再一看书稿的《后记》，才知道书稿整理者是北京广播器材厂的一名工人。其祖父是京城一位说《莲花落》的艺人。在他说的段子中有不少流传下来的曹雪芹的故事。有心计的张嘉鼎同志就把它整理出来，发给了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主办的刊物《民间文学》连续发表，一下子引起了全国的震动。张嘉鼎就把它集成了这本簿簿的小书发给了河北人民出版社，要求出版。我了解了这些极有价值的背景情况，决心抓住不放，就立马拿着书稿找到本社民间文学的老学者康迈千先生和总编辑宋梦寅同志求教。他二人翻看了书稿竟异口同声地惊叹道：“这是宝贝呀！你老高抓住宝贝了，赶快去会见张嘉鼎同志，争取搞得更丰满些出版。”我回到编辑室，正式把宋总编和康老的意见，向领导和同志们做了汇报，大家热烈地进行了讨论，都说：“你老高干脆就这个契机，搞上一套《中国古代文学大家传说故事丛书》吧！中国有那么多文学大家，孩子们都渴望了解，而史书对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思想理念又极少记载，只有靠世代口耳相传的民间传说了。而这种民间传说目前成书的还没有。”室领导综合大家上述意见向总编宋梦寅同志报告，很快得到批准。

我再一次进京。首先会见了张嘉鼎同志，讲了出版社的看法和意见，他完全同意。接着在北京市著名民间文学工作者张宝璋同志

引荐下，会见了中国历史博物院胡德平副院长。胡是国家领导人胡耀邦的长子，对文学大师曹雪芹有相当的研究，并有专著问世。他听说我们要出《曹雪芹的传说》非常高兴。亲自陪我到北京西郊看了当年曹雪芹写书的遗宅。又听说我在研究北宋杨家将的历史和传说，希望博物院能同我在这个专题上进行合作，我当即表示同意。最后，我还想会见中国民间文学的泰斗钟敬文教授。钟先生是中国著名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家、教育学家、散文家和诗人。有中国“民俗学之父”的美誉。能见到他老人家并争求教诲自然是我莫大的荣幸。非常幸运的是：这件事我得到了老朋友、钟老的优秀弟子李稚田教授的热情引荐。

钟敬文先生当时还兼着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主席。我来到他的书房，整个房间就是一个书的世界。其写字台和坐椅十分朴素。我向他汇报了河北人民出版社要出版《曹雪芹的传说》并进而出版《中国古代文学大家的传说故事丛书》，他非常高兴。说：“你们在做前人只有口碑而没有著述的大事。说明河北同志眼力很强。我拍双手支持你们。”并建议我去中国民研会谈一下，说：“一定要让他们在《民间文学》刊物上发个消息，让全国都知道河北这一重大举措。”根据钟老的嘱咐，我又去会见了中国民研会其他负责人王一奇、吴一虹和吴超同志。真可谓文人所见略同，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回到出版社不久，《曹雪芹的传说》在张嘉鼎同志的努力下，经过我紧锣密鼓的编辑工作，送印刷厂发排，同时请中国著名画家、后来的河北画院院长王怀琪先生为此书插图作画。中国《民间文学》要发的消息也适时刊出。

我享受着工作的幸福和快乐，马不停蹄地筹划并进入中国古代几位文学大家传说故事的约稿工作。首先列入计划的是：《三国演义

义》的作者罗贯中、《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唐代诗仙李白、《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镜花缘》作者李汝珍、《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这些都要到诸文学大家的故乡去搜集材料和确定撰稿人，可就在这个时候，河北省委内部又传出爆炸性消息。即从1981年12月11日到27日，河北日报用本报评论员的名义，以“批前省委主要负责人的严重错误”为题目，连续发表六篇批判文章，从思想、组织、作风各个方面，对原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同志进行了系统的揭发和批判。其火药味之浓，上纲上线之高，实属罕见。我做为刘子厚那段工作时的省革委常委之一，自然非常关注此事。平心而论，我并不认为刘子厚同志是完人，但他在河北的整个工作的主流还是不错的，应该充分肯定。做为河北省委的机关报《河北日报》，以自己的“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对刘子厚同志进行如此全面系统的大批判。以我从事新闻工作多年的经验分析，这是极不正常的。因为这么重大的问题，不要说必须有今日之河北省委的决定，按照今日修党中央的规定和纪律，没有邓小平那个党中央的批准，河北日报是绝然不敢这么干的！难道邓小平那个党中央批准了河北日报这种极不正常的作法吗？尤其不能令人接受的是，那些文章都是以“帽子”压人，并没有令人信服的事实。即使点到某些具体问题，就我所知也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确信，如果河北日报敢和刘子厚同志核对一下，刘子厚同志肯定会怒不可遏的。不过，这件不明底细的怪异之事，我很快就从新华社一位老同志那里模到了底：原来这么一个严肃而又重大的问题，以金明同志为第一书记的河北省委根本就没有讨论和决定。主管宣传的省委书记尹哲，还有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徐纯性更是对此一无所知。而按照省委的规定，这样重大的文章要发表是必须要送省委审

查批准的。奇怪的是，等报纸上白纸黑字登出来了，金明第一书记和书记兼省长李尔重，以及主管宣传的书记和常委尹哲、徐纯性同志，竟对自己管理的河北日报无可奈何。直到刘子厚同志得知此事（注：一位有正义感的同志，亲自把六张“批刘”的河北日报送到了北京刘子厚手里。）向中央告状，中央批评了河北日报的做法，才制止了河北日报继续要发表的“批刘”文章。但是，又一个怪异的问题出来了：中央只是做了批评和制止，并没有对河北日报这种严重违犯组织原则和纪律的问题做进一步处理。事隔 20 多年后，具体分管报纸和电台宣传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骆志安同志发表回忆录《今生无悔》，才算委婉地讲清了这件事。他在回忆录 314 至 315 页中这样说：“这些重点文章发表以前，并未经过省委研究讨论，也未按正常渠道送审（注：其正常渠道应该是：省委宣传部——省委分管宣传的常委——省委分管宣传的书记——省常委会。那么不正常的渠道是谁呢？只能是省委第二书记江一真了。），连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徐纯性、省委主管宣传的书记尹哲事先都不知道。”骆副部长的回忆录继续说：“（因为）‘我认为在报纸上公开批判不妥，影响了我和林放（河北日报总编辑）同志的关系’。”“又因为我俩的办报观点不同，我也不好再分管报社的工作。所以徐部长告诉我说，今后你可不再管河北日报的事情，让林放同志自主负责。并让我抽出大部分精力，抓一抓全省的党员教育工作。”“（从此）我就正式分管党员教育工作了……”。

列位看看，上述这种“强权欺真理” 的黑暗现象严重到了何种程度！一向有着“党风严正”好名声的金明书记、李尔重省长和尹哲、徐纯性同志，竟然到了在“小人强权”面前，既无处讲理，也无法落实党的原则的无奈困境！刘子厚同志到中央告状，虽然挡

住了江一真利用河北日报继续“批刘”的“壮举”，但人家大整所谓“刘子厚分子”的步伐却一刻都没有停止。1982年春天，我因过度劳累突患“美尼尔氏病”，正在家中吃药休息。出版局机关党委副书记赵润玉同志和少儿编辑室杜福山同志来到我家。我开始以为是来慰问我这个病号的。等一谈话却似晴天炸响了一声霹雳。赵副书记很不自然地苦笑着说：

“老高呀！我这次来是履行一件公事。省出版局党组决定调整你的工作，调你去省新华印刷三厂，要立刻办手绪。”

“不对吧！老赵同志……”我压着火理直气壮道：“我到出版社当编辑是省委决定的，局党组有什么权力推翻省委的决定？”

“咳，老高同志就别说那个了……”赵副书记继续苦笑着说：“你现在不是受出版局管了么，就要受出版局支配呀！局党组说了，你要顶着不去，组织上就会强行把你的组织关系开过去！”

我听到这里可就真的火了。因为从我17岁入党29年党龄了，还没见过哪个共产党组织会如此荒唐而又霸道的行事。就公开声明道：“我不去！党组织想开什么手绪听便。不过，请你转告党组，我不会饿死！”

赵副书记见此，没有再多说什么。因为他是奉命行事，只得苦笑着说：“那我就回去复命吧！”

他离开我家时间不长，一位对此看不公的正直党员来到我家，急切地说：“要赶你走的是出版局党组副书记（此时出版局没有党组书记）燕英干的。你快去找省委干预。不然，现在燕英一手遮天，他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

这时，我也顾不得有病在身，立刻就去了省委宣传部徐纯性部长的办公室查问。徐部长不解地说，他不知此事。嘱我快去尹哲书

记那里问问。我立马又去见了尹哲同志，他也说不知此事。还嘱我说，现在河北省委内部很不正常，你快去管人事的书记赵一民同志那里问问。好在我跟省委领导很熟，去了大多是推门则入。我来到了赵一民书记的办公室，一民同志不在。他的秘书王东进同志对我很热情，一听我查问被燕英要赶走的事，他立刻爽朗道：“出版局无权随便更改省委的决定。你先回去，回头我和一民同志说一下。然后和出版局谈，两天后我再告诉你……”。

王东进秘书说到做到。两天后他告诉我：“已经和燕英同志谈了，解决了，你继续在出版社当你的编辑！”

问题来的突然，解决的倒很快。但听说燕英很尴尬，心里窝了一肚子火病倒了。等我上班后，为了疏解双方的关系，我礼节性地去看望了燕英同志。几句慰问的话过后，燕英同志却急不可待的转变主题，气呼呼地说：

“你姓高的到省委‘告’我，不要高兴地太早了。我明确告诉你，省委的决定我只是服从，并没有同意。只要我主持一天工作就一天不放弃我的意见。”

“老燕同志——”我看他脸色都变了，生怕他引发心脏病，就平静地说：“你怎么说我‘告’你哩？是你先武断的推翻了省委的决定，我才理所当然的向省委报告呀！”

“但你不要忘了，你姓高的今天是在我出版局的管理之下，我是有权处置你的！”

“老燕同志你说话过头了。你有再大的权力能背离党的原则去履行吗？你是一位老资格的同志了，大原则你比我懂得更多呀！不过，我一直在想，你我之间也不是一般地熟悉，过去在宣传系统我们相处得也不错。咱可以说是前世无冤，今世无仇。只是……我怎

么也搞不通：你对我有这么大的成见，到底所为何来呀！”

“你姓高的不要装糊涂！怎么就不想想刘子厚当年怎么整我啦？欠帐要还嘛！我整不倒刘子厚，也得把你们这刘子厚的爪牙清算了。你应该有这个自知之明！”

燕英同志“嚣张”到这种蛮不讲理、公开报复的地步。我显然无法再和他疏通，更不宜跟他大争大论。仍平静道：“那你就行去吧！我原本是关注你的健康，就你这么大的火气，难免会有一天闹出大病来的。”

真的。他在折腾了一阵反攻倒算式的所谓“拨乱反正”之后，终于大病不起，见人便哭，直到气绝病故。

我照旧继续上班，积极投入我的邀稿工作。莫非苍天真有眼？我竟十分顺利地得到了《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家乡——江苏省淮安市文教局的鼎力支持。以靳全生同志为首的五人整理小组很快就寄来了部分稿件。同时，《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家乡——江苏大丰县（今大丰市）县文教局的张袁祥同志，也寄来了自己积累多年的稿件，内容均十分丰富感人。至于《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的家乡——江苏省扬州市民研会也非常支持，欢迎我去扬州洽谈。《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的家乡——山东省淄博市，有山东省未来出版社张寿鹏同志主动出面组稿，表示全力支持河北要出的这套丛书！

《镜花缘》作者李汝珍的家乡——北京大兴县，有人推荐三十年代就已出名的大作家端木蕻良先生，说他对李氏有多年的研究，我便专门进京和端木蕻良先生进行了商谈，他热情地答应考虑一下。比较困难的是《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他的传说故事流传较少。其家乡祖籍也众说不一。有说是太原人，还有说是杭州人，更有说是江西省吉安人氏。组稿一时没有落实下来。不过令人高兴地是，

《曹雪芹的传说》斯时已经出版面市。受到国家民间文学界的重视。中国民间文学的泰斗钟敬文老教授以及民间文学的著名学者张紫晨教授和李稚田教授，他们均预测说：“此书肯定会获奖！”河北省民研会的著名学者、河北文联文化志编辑室主任、河北通俗文学学会会长曹广志和省民研会方圆同志也主动上门索求样书，准备向全国推荐报奖。还有一点更令人欣慰，国家出版局决定将《曹雪芹的传说》之出版消息，做为要文收入《国家出版年鉴》。领导便责成我撰写了新闻，以我的另一个笔名“杲翡”刊发。这一切，自然都使我更加沉浸在一炮打响的幸福和喜悦之中。

第 34 章 我在政治阴影下的奋进

1982 年 6 月 21 日，河北省委发生重大人事变动。修党中央决定已离休的原国家农垦部长高扬，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同时任命张曙光为常务书记。刘秉彦、邢崇智、解锋、高占祥为书记。免去金明、江一真和李尔重在河北的职务，由中央另行分配工作。中央的决定是用机要电报通知的。电报特别指出：“河北工作没做好，金明同志负主要责任。”因为在第二天召开的欢迎高扬同志的处以上干部大会上，全文公布了中央的电报通知，会后引起群众广泛的街谈巷议。主流意见是：对像金明和李尔重这样人格高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又很高的同志被调走，十分不满。特别是金明同志在受到江一真严重干扰的情况下，仍忍辱负重地努力工作，却还要承担“河北工作没做好”的主要责任，认为修党中央打错了板子，是十分不公的。虽然江一真也调走了，但新班子里的张曙光（原团中央青农部长）、邢崇智（原团中央青农部副部长）、高占祥（原团中央书记）都是胡耀邦当团中央第一书记时的大将，认为胡耀邦当了党中央主席后在公开搞自己的宗派集团。新班子里的另一位书记解锋，1959 年曾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革”中又继续受到批判，早就对刘子厚同志耿耿于怀。不用说，这个高扬带领的班子，在“‘批刘’和‘批金、李’”及其追随者方面肯定会有“突破性”的大动作。我虽然也预料到了这一切，但因为我的编辑工作十分顺手，这个不祥的政治阴影还没有影响到我的本职工作。不久，从新华社老同志那里传来一个内部消息：说中央政治局委员聂荣臻元帅，看到河北新班子几位书记的排序，认为德才兼备、

水平颇高的刘秉彦同志排在张曙光之后不妥，遂致信政治局常委、党的副主席陈云同志要求调整。陈同意聂的意见，便指示发出第二封机要电报，把刘秉彦同志列到了张曙光前面，并由刘秉彦兼任河北省长。这个不大不小的变动，反映出修党中央在人事工作上的分歧和混乱。不过，刘秉彦同志尽管为人正派，但身孤力单，我想他要发挥更大的作为也相当困难。

这段时间，我因为组稿顺利，可以腾出手来写些历史研究方面的文章。比如，我在阅读地方史志中，发现宋朝杨家将在河北的事迹很多，而专门写杨家将在河北活动的论文却很鲜见。我便以《杨六郎河北事迹考》为题，写了一篇 7300 字的论文，发表在河北省社科院主办的《河北学刊》第二期上。这件事，听说在发表前曾有一段小小的风波：一位刚来到《河北学刊》的领导人直接找到《学刊》主编赵成章同志发难，说高恩泽是下台领导干部，不能发表他的文章。赵是一位极有正义感的优秀主编，他严肃地反问道：“不作官了，难道连从文的权利也要剥夺吗？”最后两人的官司打到了社科院院长石虹同志那里。石虹同志是一位坚持党性原则的老院长，他一锤定音道：“问题不在作官不作官，主要是看文章的质量，只要质量好就发嘛！”这位发难的权势人物根本不懂得论文质量的内涵，只得住口了。中国著名民间文学学者张紫晨教授看到了这篇论文，来信给我鼓劲说：“这是一篇力作。你对杨家将颇有研究，望发挥这方面的长处，继续写下去。”在张教授的鼓励下，我又开始撰写《杨家将传说考》。因为民间对杨家将的传说太多了，其领域涉及山西、河北、河南、江苏、天津、北京、安徽、江西诸省。自北宋以来，可谓历千年而不衰。只是，到底哪些属于史实？哪些属于附会？这其中又有哪些内在联系和区别？实在应该考一考，论一论。

《中国民间文学论坛》主编吴超同志听说了这个消息，来信要求稿子书就一定给他，我欣然同意。在我写出第一稿的时候，请河北省民研会曹广志同志看了，他表示：“此稿份量很重，建议参加 1983 年春夏之交的全省民间文学研讨会，我也高兴的答应。

我的编辑和学术研究正在一步一个脚印的顺利发展着。这时，河北又闹出爆炸性新闻，1983 年春节前夕，全国总工会的《工人日报》驻河北记者站，用整版篇幅，在工人日报上发表了《震撼河北省城的一场斗争》。其内容说的是：以“贿赂罪”和“贪污罪” 被捕判处八年徒刑的华北石油驻河北办事处主任刘伯平，如何向时任河北副省长的岳宗泰、兰凯民、洪毅送礼，而三位副省长又如何以权谋私，见利忘义。以高扬为首的新班子上台不过七个月，一下子爆出这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件，顿时舆论哗然。有云：高扬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要烧的是“反腐败”。也有云：这是河北党内斗争的继续。前一段没有搞倒刘子厚，现在要拿刘子厚时代的岳、兰、洪三位副省长开刀。因为我对这三位副省长很熟悉，他们的思想和作风都相当不错。猛丁说他们“以权谋私”、“见利忘义”，我很难相信。另一方面，以我对“刘伯平事件” 的了解及报纸揭发党内腐败的一般程序和惯例推断，我认定这里边大有“猫腻”。 理由是：一、“刘伯平事件” 在河北省纪委指示下 是开了公审大会的。我当时奉派到现场旁听。只见刘伯平因为腿疾拄双拐立于被告席上。他以大义凛然的气魄，严辞拒绝了石家庄市检察院对他的全部指控。并怒声抗议中共河北省纪委对他的栽赃和诬蔑。刘伯平聘请的三位有名的律师，更是多方论证刘伯平没有贪污和行贿，完全属于工作问题，应即无罪释放；二、刘伯平的领导机关华北石油总指挥部，也勇敢地站了出来，公开为他作证，说刘伯平没有贪污和行贿，属

工作问题。关于工作问题的责任，华北石油总指挥部愿意承担。单就这两点，只要稍有思维，就不能不对河北省纪委和石家庄市检察院的指控提出质疑；三、接下来，石家庄市中级法院宣布判处刘伯平八年徒刑，刘伯平不服判决，向河北省高级法院提出上诉。当时公审大会超过千人的旁听席上，就立马有点失控，群众都是大声呼喊：“市法院妄法武断，判决不公！希望河北省高级法院能主持公道！”；四、就是这样一件正在上诉并未定案的大事，工人日报也属于一张有影响的大报了，怎么竟毫不审慎的做为“定案”就轻易发表了呢？难道是受了中央紧急而又特殊的委托和命令？想想也不大可能。因为中央要有此举，指示河北省委去揭露那是更顺理成章呀！何劳工人日报驻河北记者站出马？嘿，不用再费心推测了。谜底很快浮出了水面：河北日报春节放假尚未结束，竟全身进入了这场闹剧的主角：全文转载了工人日报那篇“重磅”文章。更令人意味深长的是，虽是名为转载全文，但却有几处“独具匠心”的改动。正是这几处独具匠心的改动，暴露了河北有某些大人物在背后指挥此事。 这些大人物是谁呢？他们又是如何指挥的？河北日报副总编辑、老报人张石锁同志跟我讲了事情的详细经过。他说：

“那是 1983 年大年初一的上午，我正在总编室值班，突然传来省委常务书记张曙光要来拜年的通知。我当即把在岗的工作人员集中在一起，等候张书记的到来。大约十点钟，张书记来了。他在讲了几句拜年的慰问话后，突然话锋一转，讲开了‘刘伯平事件’。其实，‘刘伯平事件’ 大伙都知道，有的还参加了公审大会，听过刘伯平和三个律师的辩护词，都以为法院判决不公，盼着刘伯平的上诉会有个正确结果。可是，张曙光书记讲的不是这个。而是一溜子大讲刘伯平如何行贿，如何贪污。大约讲了一个小时，他突然转

到了‘刘伯平事件’与三位河北副省长的关系上，说岳宗泰、兰凯民和洪毅三位副省长如何接受刘伯平的好处，以权谋私，见利忘义。大概张书记生怕人们不相信他的话，又端出了工人日报那篇文章，说：‘中央的工人日报写了 12000 字的文章《震撼河北省城的一场斗争》，送我审查，我一个字也没改就发了。’说到这儿，张书记又近似命令地告诫道：‘你们河北日报这次要接受上次《柴晋川问题》的教训，那一次人民日报登了，你们没有转载，弄得自己很了被动（注：这次是省委第一书记金明同志不同意转载）。这一次要争取主动，赶快转载工人日报的文章。不光要转载，还要做个报道计划，要三个副省长做检查，三个副省长的检查要登报……’我听到这里，十分震惊。心里说：‘这像是省委常务书记讲话吗？那个《柴晋川问题》怎么能和三位副省长相提并论呢？这是涉及省委、省政府形象的的重大原则问题呀！怎么能在这样的场合乱讲一气？我可以肯定以高扬和刘秉彦为一、二把手的河北省委是不会这样处理问题的。事后，我忙把情况报告了总编辑林放同志。令人想不到的是，下午胡玉泉副总编就传达了林放总编的通知：‘初二晚上召开编委会，落实张曙光同志的指示，讨论转载工人日报文章和三个副省长问题的报道计划。’我又一次震惊不已。心里说：‘怎么，已经有过在报纸上批判教训的林放同志，仍然如此轻率呢？他到底想的是什么？如此重大的问题，没有省委的决定，也没有主管书记的指示，省委一、二把手高扬和刘秉彦又都在北京过年，张曙光一个即席的拜年讲话焉能成为必须执行的命令？这是有违党的原则的错误行为。’想到这里，我郑重表示：‘这次会我不参加，请向编委会转达我的如下意见：‘1、党中央早有规定，党报不能批评同级党委，而三位副省长分别是省委副书记、常委和委员；2、如果非要

转载工人日报的文章并批评三位副省长，必须有中共河北省委的决定，不能只凭某位负责人一席话就草率行事。’后来，我听到了会议的结果。我的两条意见在林放同志主持下，被拒绝了。河北日报不仅转载了工人日报的文章，还制订并铅印了整三位副省长的报道计划，更令人不解的是，转载的工人日报文章，竟然有几处‘为我所需’的改动，露出了不光明磊落的马脚。对此，我实在坐不住了，便跑到省委去了解底细。原来这一切竟是林放总编和省纪委书记王幼民秘密运做的。等到了春节过后，省委第一书记高扬和省长刘秉彦回来了，他俩发现河北日报转载了工人日报的文章并做出了在报纸上批评三位副省长的报道计划，十分恼火。因为早在春节前，省委就针对工人日报那篇靠不住的文章，请示了中纪委。中纪委明确表示：‘三位副省长的的问题不是见利忘义，而是工作问题，请三位副省长安心工作。’对此，做为常务书记的张曙光是完全清楚的。而做为省长的刘秉彦同志也跟三位副省长谈了中纪委的表态，并通过适当形式向下面做了传达，稳定了形势。待他俩了解到河北日报的新举动是张曙光主使后，便同这位自作主张、蓄意整人的常务书记对了话。也不知这位张书记感到了什么，他竟耍开了政治流氓，矢口否认自己在河北日报讲过的话。虽然有那么多人亲耳听了，又有落实张曙光书记指示的白纸黑字的报道计划摆在那里。更加令人奇怪的是：张曙光一个政治流氓式地‘矢口否认’，这件践踏党的组织原则的大事，就没有再进一步处理。可见张曙光的淫威有多大，以至连高扬和刘秉彦这样的老革命都无可奈何啦！”

为了完整的把河北省委某些权势人物制造的“刘伯平事件”厘清，我想沿着这个事件的历史轨迹多写几句。在刘伯平上诉到河北高级法院之后，以耿直出名的省高院院长张屏东，认真地进行了复

查，结果得出了“刘伯平无罪”的结论。他郑重地把情况报告了省委书记兼省政法委书记解锋。解锋书记公开维护省纪委的定论，指示张屏东不能更改。张屏东院长虽然在法律的公正性上没有退让，但他做为省高院党组书记则不得不捏着鼻子执行解锋书记的决定，痛苦地驳回了刘伯平的上诉。但刘伯平是个不信邪的硬汉子，他继续抗争，又上诉到国家最高法院。应该说，刘伯平这回很幸运，他碰上了一位不信邪的正直法官。这位刚直不阿的法官，经过几年的艰苦周折、反复查证，1988 年终于做出裁定，代表最高法院否决了石家庄中院对刘伯平的错误判决。宣布了刘伯平无罪，立即释放。可这时刘伯平的八年徒刑已服完了六年。华北石油管理局旋即委任刘伯平为华北石油学校校长。上海著名的法制刊物《民主与法制》，接着用重大篇幅揭露了这个滑稽案例的前前后后，用三条教训昭告读者：

一、石家庄市中院和河北省纪委混淆性质，在报纸上大造错误舆论。本来，刘伯平在华北石油指挥部的授意下，以批发价卖给了几位副省长使用的录音机、电视机和石油液化气罐，这在当时社会风气不正的大气候下，属于一种不正之风。工人日报和河北日报却奉命拔高为犯罪，大造舆论。在公众中造成一种先入为主的态势，为严惩所谓涉案人创造条件。此为酿造冤假错案的教训之一也。

二、干扰司法独立办案，造成严重后果。本来石家庄市中院经过多方审察，认为刘伯平构不成犯罪，但河北省纪委负责人曹幼民却指令他们以“党性”做保证，要做为罪行判处。石家庄市中院无奈，只得把省纪委定的几条罪状抄在判决书上宣布。此为党组织干扰司法独立办案导致错误的教训之二也。

三、认定是否有罪，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能

把党内的派系斗争加杂进去。河北省纪委负责人想通过自己制造的“刘伯平事件”，惩办和自己不是一派的或有不同意见的其他同志，严重地损害了党的形象和团结。此种用派系标准整人、置事实与法律不顾者，乃为造成冤假错案的教训之三也！

这桩滑稽案子经六年的马拉松周折，虽已其清如水，宣布了刘伯平无罪并立即释放。但那些制造这场冤假错案的高官们却仍然优哉优哉的作官升官，并未受到任何追究。由此，列位是否连想到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蓄意制造这个冤假错案的张曙光、曹幼民和解锋，都是省级高官。他们不仅没有真正共产党人的一丝党性观念，甚至连普通人的人性观念也没有。但邓小平和胡耀邦主宰的那个党中央竟然对他们一保到底。张曙光很快代替刘秉彦升任河北省长，进而又升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解锋也随着张曙光升任内蒙古自治区书记而升任河北省长。想想看，你不觉得那个打着共产党旗号的邓小平和胡耀邦都是反马列毛主义的政治骗子 吗？

1983 年四月，我荣幸的应邀出席河北省民研会在承德离宫召开的“民间文学研讨会”，在会上我宣读了自己了 13000 字的论文《杨家将传说考》，受到与会大多数学者和研究人员的肯定。很快，国家的《民间文学论坛》第二期全文发表了这篇论文。其编后话还有如下鼓励之语：“这是一篇有独到见解的文章，值得一读。”著名民间文学学者张紫晨教授看到这篇论文后，又来信给我打气：“又一篇学术力作问世。望继续努力，做出新成绩！”

这时候，河北省著名文化历史古城正定，正成为国家新兴的旅游热点之一，其中魅力最大的隆兴寺和千手大佛，香火缭绕，游人如织。各种千奇百怪的传说不胫而走。石家庄地区民研会的刘其印和袁学俊同志，邀我写一篇正定大佛寺的传说考证，供民间文学工

作者宣讲使用。我欣然命笔，以简约的手法写出了 1500 字的《正定大佛寺传说考》，发表在《滹沱文讯》第二期上。

五月，我按照自己的编辑计划，南下上海、南京、扬州、苏州、杭州、淮安和大丰。当时从财务室借了 5000 元差旅费。因为社会上风传南方偷摸抢钱厉害，爱人刘淑琴专门在我的内裤缝了一个装钱的兜兜，以防不测。第一站到了上海，会见了上海少儿出版社文学室主任姜英和童话作家兼编辑孟昭禹同志，主要是了解南方出版情况和进行必要的约稿。第二站便到了文学大师《水浒传》作者施耐庵的家乡——大丰县（今大丰市）。大丰县滨临黄海，是江苏省有名的鱼米之乡。北宋名臣范仲淹曾做过大丰知县，为防海水浸害农田，他发动百姓筑了百里堤防，后人赞称为“范公堤”。在大丰县，我受到了县文教局陈局长和文联王副主席的热情款待。《施耐庵的传说》撰稿人、县文教局干部张袁祥同志，陪我到白驹镇参观了施耐庵故居，拜谒了施耐庵墓。一路上，我们把《施耐庵的传说》稿子也洽谈妥当。第二天，县文教局陈局长邀我去看黄海。因为国内出了杀人要犯“二王”，即王宗芳和王宗玮兄弟，警方屡捕未获，不得不以重金悬赏，向全国发出通缉令。黄海也设了若干官卡，防止“二王”乘外国商船逃走。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经请示警方同意，还是照顾我这个北方客人，坐上武警的登陆艇在黄海转了一遭。饱览了波浪滔天的黄海风光。离开大丰时，祖籍东北的陈局长知道我不通苏南语言的困难，特派文教局干部、文学评论学者陈新民同志全程陪我介绍情况兼作向导。第三站我来到了《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的家乡——扬州。这一线的南京、苏州和杭州，都曾有过吴敬梓先生的足迹，自然应该去看看。在扬州，我首先同当地民研会的同志商定了吴敬梓传说故事的邀稿工作，进而参观了吴敬梓先生

曾经住过的地方。这一转才知道，扬州确实不愧为帝王向往之宝地。到处是一派鸟语花香、郁郁葱葱的园林格局和独具佛家特色的寺庙。许多园林和寺庙都挂有中国著名书法家、扬州书画院院长李亚如先生书写的题词、盈联和匾额。其笔锋雄健、意态动人、韵味隽永。而许多门面的对联和楹联大多为中国著名板桥体书法家许虹生先生所书。许氏的书法极具狂草刚锐之特点，令人看了心旷神怡。我便问扬州民研会的同志：“两位书法大家都是扬州人吗？”他们高兴地说：“是的。你一定知道历史上的‘扬州八怪’和大名鼎鼎的郑板桥。其实，今天这里仍是书画家荟萃的宝地。”我请求拜会扬州的书画名家，他们欣然答应联络。殊不知，这些书画名家更是文雅而又热情。我们稍事交谈，就成了无话不说的文友。我向诸位大家求字求画，他们都高兴的答应。李亚如先生重写了喜欢的他那幅给大肚子弥勒佛的楹联：“大腹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慈颜常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中国著名板桥体书法家许虹生先生，则挥笔为我书写了曹植的七步诗：“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瞧瞧，许先生这幅墨宝，让我们洞穿历史看见了大家郑板桥书法的独特雄姿呀！

画家董庆生老先生为我画了幅山水画《瀑布》，题名曰《幽壑鸣雷》。董老先生是中国著名前辈老画家徐悲鸿的优秀弟子，有山水“画魂”之美誉。他很幽默地对我说：“画如其人。我是照你的性格气质设计了这幅画的腹稿的。”

董庆生老先生的令郎羽丰，从小喜画，师承其父。是一个中学的美术教师。他极其开朗热情，非要给我画像不可。我哪敢当。但终辈不过他。

巾帼书法家李圣和同志，是中国老前辈著名书画家李梅隐之女，师从其父，其书法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好评。她把自己最喜欢的唐朝杜牧的名诗赠我欣赏。

画家朱旭同志是扬州画院副院长。他取法“扬州八怪”的传统又有鲜明的独道之笔。尤擅长仕女画。其工笔清新卓著、彩色明快、写意自然生动，享誉全国。他邀我到他家坐客，夫人亲手为我坐了一桌扬川佳肴，还上了著名的“扬州炒饭”和酱菜。吃起来真是别有一番风味。餐毕，他请我参观了自己十分朴素的画室。墙上挂着不少他创作的仕女画，幅幅维妙维肖，十分动人。见我看得入神，他幽默地说：“看样子你也喜欢仕女美人呵！”我笑着回答说：“其实，尊重和关爱妇女也是男人的一种美德！”“那好，”朱旭同志继续幽默道：“我就代表仕女们为你画一幅意味深长的仕女画吧！”他构思了一幅《泪洒相思地》的仕女画赠我，品味起来却也真的意味深长呢……

我走访了苏州、杭州、扬州之后，来到了《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家乡——淮安。淮安县城（今淮安市）也是中国有名的文化宝地。这里诞生了汉朝名将韩信，清朝爱国将领关天培和新中国人民敬爱的总理周恩来。遍布城区的名盛古迹比比皆是。我一踏进淮安县委的驻地，立刻就沉浸在厚重而又浓烈的文气之中。县委宣传部长尹金鹤同志和文教局的三位局长以及搜集整理吴承恩传说故事的靳全生、秦永明、张佩铭、秦九凤、金志庚都来了。他们安排我住进了刚落成不久的淮安宾馆。每天吃的都是淮安风味的饭菜。其中有一种称作“芦蒿”的类似芦苇的水菜，其他地方也有，但只可观赏却不能吃。唯淮安勺湖产的芦蒿既好看又好吃。他们都说这是天

公赐给淮安人民的一道美味。淮安还有一条其他县不能比的，就是县委一直办着自己的机关报《淮安日报》（注：其他县大多在 1960 年都撤掉了）。而且办得相当活跃。连我到淮安约稿，《淮安日报》都发了消息。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看到《消息》很高兴，专门过来同我共进午餐。在午餐中，我拿出河北名酒“刘伶醉”与大家分享，他们不同意。说：“河北的‘刘伶醉’是出口名酒，可留给我们收藏。今天咱同饮江苏名酒‘洋河’！”这时候，我才知道，河北的名酒“刘伶醉”已经是“钟在庙内音在外”有着了不起的身份了。接下来，靳全生为首的几位撰稿人陪我参观了吴承恩纪念馆，拜谒了吴承恩墓。在吴承恩纪念馆发生了一个小故事：人家备好笔墨纸张要我题词。我毛笔字一向写得不好，不敢应承。推让了好一阵，只得用钢笔题写才算过关。

我成功完成在淮安的组稿之后，又北上济南，和山东未来出版社编辑张寿鹏同志商定了《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传说故事的组稿工作。总之，近个月风尘扑扑的耕耘，汗水没有白流，很快就要见到成果了。

第 35 章 我终于在劫难逃

1983 年 5 月底，我从南方回到了石家庄。除了继续进行唐朝诗人李白的组稿外，对已经成熟的《施耐庵的传说》和《吴承恩的传说》，则通过例行的审稿程序找画家去进行插图。这工夫，我利用这个小小的空档，开始设计自己要写的长篇小说。

写长篇不同于写中篇和短篇，它需要设计一个大的框架。这里包括矛盾冲突的方方面面。比如，各色人物的思想差别、性格特点，以及他们之间的纵横交叉和前后呼应的情节深化。当然，最根本的是要明确全书的主题思想是什么。我的次子亚军，酷爱文学。他二十多岁为儿童们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书题曰《人朋狗友》，在河北少儿出版社出版。他建议我也写一部儿童读物，一定要来点“独出心裁”突破雷同。就是说，出书后要有一定的震动。那怕引起争议也好。我赞成他的意见。经过多方比较，我决定写一个少年侠客。从跟着爸爸流浪卖艺糊口，饱受欺凌，最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抗日的道路，成为一个优秀的游击队战士。我自信写这个题材是有基础的。因为我从小生活在沧州的武林之乡，听到过不少武林高手痛打日本鬼子的故事。比如，有一个剑客，力拨敌人冲过来的一个又一个刺刀，连续砍死 12 个日本鬼子的壮举。一个小小的卖艺者为八路军做小侦察员，任务完成后为甩掉敌人的追捕，乘着夜色用“猴爬杆”的特技，噌噌噌爬上了学校操场旗杆的顶端，敌人硬是没有发觉。一个马戏小演员，和鬼子的骑兵周旋，巧妙地骑走了鬼子的战马……这样的传奇故事实在是太多了，写起来不愁没有故事。只是有一条困难，我不懂专业的武术动作，描述当中少不了要说外

行话。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想来想去还是拜师求教。我的学生、河北省梆子剧院著名的刀马旦王瑞楼和她的爱人、戏剧武生杨玉华都答应帮助我。另有一个老同志的孩子，名叫杜争鸣，学的是武术散打。因为武功高超，曾协助警方徒手捉拿过歹徒。他也乐意帮助我。有了这样的有利条件，我抓住星期日和晚上的时间大干起来。一个多月下来，我竟干出了五万多字。省外贸局宣传处的老朋友王树正同志，是个很有特色的业余画家。他听说我在写长篇小说，高兴地跑来建议道：“我给你复印两套，先发给两个出版社来个‘投石问路’，听听人家的印象和建议，你说好不好？”我十分感激王树正同志的悉心关照，就把这五万多字发出去了。很快这两家出版社就回了信。说：“印象不错，望速寄全书”。我深受鼓舞，就把情况和本室编辑兼童话作家郭明志同志讲了。他立马建议道：“既然写的是‘童侠’，意向和反映又不错，为什么不发给上海少儿出版社呢？它是一家比北京少儿社资格都老的大型出版社。在全国的威信和影响很高。他们要是认可了，这书的档次就不一般了。你如果同意，我负责给你推荐！”听明志同志这么一讲，我心里是既想往高水平攀登，也同时感到攀登高水平所背负的压力。不过，想到明志同志如此鼎力的关心和支持，我决心鼓起胆略拼搏进取。

长篇小说的题目，开始取名《童侠》，后来因为小说的主人公叫彪子，艺名“彪子头”，最后定名《童侠彪子头》。

八月间，正在酷热中奋笔疾书的我，突然接到省文化厅党组副书记高无际同志的电话，叫我立即到他办公室去一下。因为是老熟人了，我随口问了一句：“有何公干？”他不大愿讲，只回了一句：“你来了就知道啦！”这时的省出版局和省文化厅已经合并，成为文化厅名下的省出版公司，下辖河北人民出版社、河北新华书店和

三个新华印刷厂。不过，高无际同志一改其下达指示的程序和惯例，未经过出版公司、出版社和少儿文学编辑室，就直接通知了我，这显得很寻常呀！至少露出了要谈问题的紧急和仓促。我俩一见面，高无际同志苦笑着握住我的手坐下，没有任何客套就进入了主题：

“老高同志，叫你来是谈一件不大也不小的公事……奉省委指示，对你在‘文革’中的问题进行审查。现在算是正式通知。”

“啊，审查我？要停职审查吗？”

“不，边工作边审查。”

“咦，你刚才说是奉了省委指示，有文件吗？”

“没有文件，是省委组织部王家树副部长直接部署的。”

“这就不对了。我在‘文革’中的表现，华、叶、邓主宰的那个党中央清理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过筛子又过罗，搞了那么大的运动，以刘子厚同志为首的河北省委不早做了清楚而又明晰的结论吗？接下来，金明同志主持省委工作后仍然维持这个结论嘛！还要审查什么呢？”

“咳！那是上两届省委的结论呀！现在省委是高扬为首的新班子了，要重新审查呀！”

听到这里，我一下子都明白了。高扬为首的新班子主宰河北后，遵照邓小平“不换思想就换人”的指示，继续对原省委刘子厚和金明同志的人马进行清洗。继省委常委兼秘书长邢安民 1981 年 7 月免职，调往甘肃；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王玉 1982 年 7 月免职，调任河北人大常委副主任；其他如常委尹哲、郭志、岳宗泰、刘英、兰凯民、马辉司令员、曾美政委和李永进，则都在 1983 年 3 月免去常委，去分管其他方面的工作。刘子厚和金明时的常委只剩下一个，即宣传部长徐纯性，算是摆个没有彻底大清洗的假样子。很显然，高扬

一伙到了彻底清算我们这些“文革”老战士的时候了。不过，我一丝都没有惧怕。老话讲“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嘛！就十分敞快的回他道：

“无际同志，其实我们互相都非常了解。你当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名将——河北省直机关文革委员会的副主任。我是你属下省广播局（台）文化大革命的骨干呀！今天，高扬为首的省委硬是要审查，无非就是用官僚资产阶级‘派性整人’的一套，罗织罪名，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力量下手嘛！我希望你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呀！”

“老高同志请放心，我高无际决不那样干。关于你的专案组已经确定了，都是选的思想正派的老同志，你都很熟悉，计有人民出版社党委书记韩晓明、省出版公司办公室副主任赵振录、省文化厅直属党委副书记赵润玉。工作人员是邓军革。看看，你有什么意见？”

“这些老同志都不错。邓军革同志年轻，也是解放军大学校培养出来的么！但我还是那句话：在今天的河北，主动或奉命‘用派性整人！’，已经是大行其道、明火执杖的事。”

“嗨，我一定会实事求是的。你老高同志就放心吧！”

高无际同志乐哈哈地说着，和我握手道别。

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思索这“专案组”组成的事。据我了解，改革开放以来的专案组，大都是居高临下、如狼似虎地对待被审查人，拳打脚踢那是“家常便饭”，怎么，高无际同志却要争求我对‘专案组组成’的意见呢？我真有点百思不得其解。但有一条，我心里十分明白：就冲这专案组的构成由三位县团级领导挂帅，毫无疑问，我已经被省委列为在劫难逃的“要犯”了。

第二天上午，韩晓明同志为首的专案组和我谈话了。老韩同志不愧是共产党的老同志，他像个十分温情的老婆婆，很和气地对我说：

“老高同志，厅里高无际同志同你都讲过了。你觉得‘文革’中有什么问题先讲一讲。一定要实事求是，有什么讲什么。党内有句老话：‘无话不可对党言’么！”

“这怎么说呢……”我也心平气和道：“文化大革命中，要说一点问题也没有，那也不是实事求是。毛主席有个评价叫‘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么！这一点必须分清楚。而这一点，刘子厚同志1977年和金明同志1980年主持的省委，都对我有明晰而又肯定的结论。我也一直在勤勤恳恳的工作。事隔三年，高扬为首的新省委又兴师动众的审查，这到底是为了什么？恕我直言，不就是要用派系标准整掉自己不喜欢的人嘛！”

“哎呀，你老高同志可不能这么讲哟！不论有什么情况，你做为一名老党员，必须正确对待组织的审查呀！态度端正很重要。我劝你千万不要在‘态度’上犯新的错误哟！”

“什么叫态度端正呢？”我禁不住问道：“难道‘顺杆爬’，专碰审查者的心坎，就是态度端正吗？我认为那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这时，赵振录同志插话了。老赵同志是个有名的直来直去、不会拐弯又颇具正义感的老同志。只见他笑模悠悠地吊着胃口问我道：

“老高同志！你说你没有什么大问题，这在上边可过不了关呀！省委组织部那里有你的一大摞材料呢……我要给你点一点，这可不等于你自己讲呀！那在处理上是不一样的。”

“本人毫不在乎那个处理的区别。我相信自己比别人更了解自

己。希望你敞开口点！”

我立马“将”了赵振录同志一“军”。赵振录同志还真点出了一件：

“你是否抓过一个叫黄宗监的人？关在你们电台的地下室里，亲自审问和殴打。据检举人讲，你当时穿着日本鬼子的军装，踏着日本鬼子的马靴，挎着日本鬼子的东洋刀……”

“这纯粹是无中生有的造谣诬蔑！”我一听这个就有点火了，接着正色道：“我郑重向你们专案组并通过你们向河北省委组织部声明：本人在‘文革’中，从没有抓过一个人，从没有打过一个人，从没有骂过一个人。我从来反对打、砸、抢、抄、抓的法西斯恶行。更不认识什么叫黄宗监的人。你们如果不信，我愿意站到街上，让这个叫黄宗监的人认一认我，看他认识我吗？”

“老高，你别急！”赵振录同志笑着说：“你可以拿出自己清白的反证吗！”

“你老赵这可有点强人所难了。根本就没影儿的事，你叫我拿什么反证？这样吧！我现在用共产党员的党性和我的人头担保，敢说这是卑鄙小人的栽赃陷害。当然，我也想请你们分析一下，在今天，除了剧团的道具有日本鬼子的军装、马靴和东洋刀，我一个在红旗下长大的共产党员和知识分子，有没有可能像疯子或神经病患者那样，到剧团搞来这些东西，然后‘武装’起自己去整人？这简直是天方夜谭嘛！”

局面一下子僵住了。赵振录同志只顾在一旁微笑，再也不说话。还是韩晓明同志打破冷场，劝导性地说道：

“老高同志，冷静一点，事情总归要实事求是的。咦，老高同志，这里也有个正确对待群众检举的态度问题呀！”

“喂，老韩同志，你别忘了毛主席的《两点论》呀！那‘栽赃陷害人者’又是一种什么态度呢？该不该批判？更别说古代的法律早有规定——‘诬陷人者要反坐’这一条呢！”

“我们现在先不讨论这个，下来都考虑考虑好不好？就这样吧！”

韩晓明同志完全是一派劝说的姿态。第一次见面就这样戏剧性地结束了。

第二次见面，主要是赵振录同志做主题谈话，他仍然微笑着问：

“怎么样？经过这几天的考虑，有点进展吧？我们总是希望你能主动讲些问题。这样，对你对组织都好！”

“你想要什么进展？”我也微笑着说：“咱还是实事求是吧！”

“既是这样，我干脆就把省委组织部的材料端出点来，直来直去地点一点，有么，你就把情况交待清楚。没有，你就提供些证据和调查线索，证明你没有。有人说，你指挥批斗过林铁（原省委第一书记）、裴仰山（原省委候补书记），还拉着王宝林（省委造反兵团头头）一伙人跪下陪榜。批斗完了就组织殴打。有没有这事？”

“没有，这纯粹是造谣诬蔑。我再一次郑重声明：河北电台是军管单位，不允许介入社会上的‘文革’运动。因此，本人从来没有指挥过任何一次对省委领导干部的批斗会，包括林铁、裴仰山。至于批斗完了还进行殴打，那就更是没影儿的事了。既然说王宝林同志陪过榜，那好了，王宝林同志我俩认识，找他一问便会一清二楚。”

“好了！”赵振录同志一摆手，又说：“有人说你整死了电台文艺部作家兼副主任冯志，冯志到底是怎么死的？你交待一下。”

“说真的，这件事只要你们到省委组织部和石家庄市公安局调

查一下，便会一目了然，根本用不着我来回答。因为冯志同志的死与我没有一丝关系。早在第一任省革委主任李雪峰时代，冯志同志的夫人苑莎就向中央做过这样的指控。李雪峰同志组织调查组查清楚了，并和苑莎同志举行了会谈，达成了一致。到第二任省革委主任刘子厚时代，苑莎复又向中央指控此事，江青做出重要批示，其中有一句话说：“我总感到冯志死得不明不白”，刘子厚同志不敢怠慢，复又亲自部署做了调查，但同李雪峰时的调查结论完全一样。到了金明同志主持河北省委，苑莎同志也没停止上告，但金明同志主持河北省委的调查仍维持了前两任领导调查的结论。整整三届省革委和省委的调查，都证明了冯志同志之死与我没有一丝关系，还需要我交待什么呢？如果非要我交待什么，我只可以做第三次郑重声明：“本人和冯志同志始终保持着深厚而又亲密的感情。在‘文革’初起，电台官办的‘文革’筹委会公开打倒冯志并关入禁闭室，我做为普通党员和群众，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就进行‘地下串连’坚决保冯志。在我当了一个战斗队的头头并控制了电台局势后，又公开从禁闭室解放了冯志。直到支持他到中央‘文革’文艺组去编创新的革命样板戏、回来又支持他去省革委办的学习班，学习班一结束就可以继续领导文艺工作了。但不幸的是，工军宣队刚进驻电台三天，正欢迎滞留保定刚刚归来的同志，冯志同志却发现保定归来的同志中，没有自己的爱人，就难过地回到宿舍出了这个自杀的悲剧。市公安局长安分局调查属意外死亡结案。”

“这意外死亡的档案材料在什么地方？你能提供一下吗？”

赵振录同志完全变成了调查研究的样子，我也配合道：

“河北省委组织部有。公安局监定的档案材料，在石家庄长安区公安分局。”

“还有一件事——”赵振录同志小心地说：“说你把一件很大的机器，送给了你岳父家所在的生产队，搞以权谋私……”

“什么机器？”我禁不住笑着问。

“检举人说不清是什么机器。”

“这仍然是天方夜谭式的造谣。本人和岳父家所在的生产队从来没有任何物质上的来往，更谈不到给岳父家所在的生产队送什么机器。这件事你们一查便知。岳父家住任丘县汜水公社大王果庄村。”

赵振录同志说：“今天我们谈得不错，先谈到这里吧！”

我对这次面对面的调查也相当满意。不知怎么，好长一段时间专案组没在找我。我估计他们去搞外调了。

1983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决定》中规定了这次整党的基本任务：“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领导，纯洁组织。”11月10日，河北省委召开省直机关整党动员大会。在第一书记高扬的主持下，省委书记邢崇智代表省委做动员报告。宣布11月10日开始，到明年6月完成整党。虽然在字面上冠冕堂皇的规定什么学习文件、对照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员登记、组织处理。但其实施的内涵，邢崇智并不隐讳主要是批判他们强加到毛主席头上的“左倾错误”，进一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所谓“罪行”。加紧其对“文革三种人”的清理。所谓“三种人”是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发出的三个并不清楚的“政治概念”，即“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到底什么叫“造反起家”的人？到什么程度叫“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又到什么程度叫“打、砸、抢分子”？邓小平并没有细讲，他控制的特色党中央也没有制订一个具体的标准。

其居心就是用这种“牛皮筋”式的清理和认定，使那些“文革”中曾经受过群众冲击和挨过整并没有接受教训的当权派，可以大行报复之道，说你是你就是。如果用马列毛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去分析，我认为，这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拉网式报复。邓小平的所谓批判毛主席的“错误”，其贼心是用“拆毛衣”战术，最后全部否定毛泽东思想，彻底复辟资本主义。当时有不少头脑清醒的同志对我讲：“邓小平那个中央的《整党决定》，第一条任务说要‘统一思想’他统一啥？，就是要统一‘反毛、批毛、去毛’的思想么；第二条任务说要整顿作风，其实，他们是给党内泛滥的封资修思想架起了保护伞。比如邓小平和他培养的接班人胡耀邦、赵紫阳就公开讲：不要对党内腐败现象大惊小怪，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腐败这个东西也有好处，它可以成为社会发展的润滑剂么！还说不要批判‘一切向钱看’，要实现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就是鼓励大家发财致富么！不向钱看能富起来么……。就因为他们这些奇谈怪论，机关、部队、学校和团体做买卖成风；领导干部贪污受贿比比皆是；买官卖官成为明码标价的潮流；崇洋媚外、投敌卖国的买办和汉奸，成为中国历史之最……你知道么，这些致命的毒瘤却都不在邓小平整党要解决的问题之列呀！整党的结果只能是：把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清出去，继续提拔那些修正主义者、走资派祸害国家。不可能有另外的前途！”

值得注意的是：河北整党的清理所谓“三种人”，并没有照邓修党中央部署的要等到后期进行。而是在整党前就紧锣密鼓地开始了。据我对省直情况的了解，立案最早并被定为“三种人”的是省委列席常委、省机械厅长张相华。高扬一伙搞的动作很大，责成河北日报发表了消息，河北电台进行了广播。但张相华同志斗争性很

强。他不仅坚决拒绝河北省委对他的错误处置。而且还到河北日报和河北电台找其负责人进行强烈抗议。官司最后打到中央组织部。张相华同志算是幸运。中组部长宋任穷在了解情况后，明确表态：“张相华同志不是‘三种人’，请河北省委重新处理！”这使河北省委和省委组织部十分尴尬（注：就是有宋任穷部长的明确表态，河北省委也顶了近三年才给张相华同志平反。）。接下来，立案审查的就多了。除了我，还有原省革委常委、省公安厅副厅长赵登元；原省革委常委、团省委副书记徐维京；原河北省革委委员、省机械厅副厅长吴武；原河北省建委副主任吕再天；原河北省外贸局副局长张福增；原河北省科技报总编辑朱正福。更令人炸舌的是：这些被立案整肃的同志都是因为曾经支持过刘子厚同志而获罪。而另一派却曾因反对过刘子厚同志而频频升官。就是曾经长期支持刘子厚见高扬一伙势力极大而反戈一击的风派人物，也立马被高扬一伙宠为“红人”而受到破格提拔和重用。

11月初，专案组又跟我进行谈话了。这回谈话地点有变，不是在出版社，而是更上一层楼，去了另一个大院——省文化厅的会议室。敏感地我立马感到：这决不是换个地点那么简单，极可能是整肃升级加快的一个大动作。果然，一落座就真的进来一个生面孔，是个女的，面色黑红，四十岁挂零的样子。韩晓明同志介绍道：“这是咱文化厅纪检组长张 x 刚同志（注：纪检组长是省纪委派出机构的职务，相当副厅局级）。”我见她丧脸盯视着我，竟没听清她叫张‘什么’刚，也不想盯问清楚，便礼节性的轻点了一下头。果然这娘们很厉害。他一开口就虎脸用质问的口气吼道：

“高恩泽，你的问题交待得怎样了？”

“咦，你是纪检组长，情况应该很清楚呀！”

“听说你拒不认错，还振振有词。我今天就告诉你，你文化大革命那么积极，还当了那么大的官，定你个林彪、‘四人帮’的帮派骨干，那是错不了的！”

“咦，你这官也不算小呀！怎么说话一点都不像个高官的样子？竟如此乱扣帽子，以势压人？”

“对你这号人，决不能客气！如果你还有一点聪明，就必须老老实实交待积极紧跟林彪、‘四人帮’的问题！”

“咦，本人向你声明，这‘文革’中积极不积极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我确实是很积极的。就是到今天我认为这种积极也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我倒想问问你：你这位女同胞‘文革’中不积极吗？你起来反对过？我在河北还没听说过有你这么一位反‘文革’的巾帼英雄呀！只是我郑重告诉你：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文革’16条和《五·一六》通知，党中央的毛、刘、周、朱、陈、林、邓七常委和全体中央委员都举了手，各省市都开会积极贯彻，亿万人民都积极响应。难道你这位女共产党员硬顶着没有执行？”

“高恩泽，你这是什么态度？”张x刚组长气急败坏，“嗖”地站了起来，大吼道：“现在我们审查的是你，明白吗？”

“但是你不要忘了——这审查和被审查双方的身份是平等的！至于你说这态度么，应该先说说你自己好不好？你张口就乱扣帽子，以势压人，像个纪检干部的正派态度吗？再说咧，我刚才问你这位女同胞，到底是不是当年‘反文革的巾帼英雄’？你还没有回答我呀！”

我也怒不可遏地说着，“嗖”地站了起来！韩晓明同志见我俩大吵起来，便忙着打圆场：

“老高同志，咱冷静点。张组长说来说去也是想帮助你，咱还

是心平静气地讲好不好？”

“我同意韩晓明同志要冷静的意见。但双方都应该冷静。刚才我问她当年是不是‘反文革的巾帼英雄？’她避而不答。看这样子她也积极过吧？现在我要心平静气地谈谈刚才张组长讲到的林彪和‘四人帮’问题。实事求是地讲，这文化大革命么，大家紧跟地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毛泽东思想。根本不知道有个什么‘四人帮’。我问过八、九、十、十一届都是中央委员的老资格的刘子厚同志，他也根本不知道中央有个‘四人帮’。至于林彪，他虽然有‘常胜将军’的威名，但叫他来发动文化大革命，我确信中国没有多少人会听他指挥。说句心底的话，就在林彪被确定为党的接班人时，我曾对他表示了怀疑，并私下分别向省军区曾美政委和田同春、袁捷副司令员讲了我的意见。三位老将军，前两位是老红军，后一位是‘三八’式。你们不是老让我提供调查线索么，那就请你们去问问三位老将军，一问就彻底清楚了。但我估计你们决不会去。因为三位老将军要是为我做了证，河北省委高扬一伙想把我整成‘三种人’就不那么好办了。”

我讲到这里，屋子里一下子寂静了。那位气壮如牛的张组长再没有讲话。还是韩晓明同志来了个“就坡下驴”，他忙着做了总结性讲话：

“老高同志，我还是那句话，‘大家都是为了你好’。这样子吧！下来你写个关于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检查。我意见一定要深刻。越深刻对你越好。怎么样？”

“咱还是要实事求是吧！不是那么回事，我决不会违心地去‘顺杆爬’。只是现在我的爱人有病，希望你在时间上要宽容一下。”

韩晓明同志见我有此要求，苦笑道：

“那就尽量快点吧！实在不行，你就加个班好不好……我不说了，反正我们都是为你好，将来你会知道的。”

看到韩晓明同志面带苦色，我想此时他也承受着上层的巨大压力，身不由己。就回答道：“我可以加个班。但有一点要核对一下，上次谈到的那几个无中生有的造谣，我还要不要再做澄清说明？”

“那个不要了，都已经查否啦！”

赵振录同志坐在一旁一直没有说话，这工夫他猛了插了这么一句。我接着质问道：

“那他们栽赃陷害一通就算拉倒了？”

赵振录同志仍旧笑模悠悠地大咧咧道：

“你说不拉倒还怎么着？审查的是你，还是正确对待群众吧！包括对待说错了话的群众。”

这个由文化厅张姓纪检组长牵头主导的“打态度会”，没想到她竟变成了蔫瘪的‘紫茄子’，后边再没说一句话，就这样，由韩晓明同志简而单之的“圆场”，宣告结束。

第 36 章 迎战“灭顶之灾”的斗争

专案组要我写个关于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检查，那是叫我交待“问题”的。而我一直是照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和规定办的。说句自夸的话，我是做得相当不错的。正是因为做的不错，我得到多数革命群众的信任和肯定，得到支左解放军——河北省广播局（台）军事管制小组，简称“军管组”的支持和关爱。在保定两派斗争极其尖锐的时刻，我高举了大联合的旗帜。曾被戏称为两派都能说上话的“高级泥瓦匠”。正是因为如此，在全局（台）举行的“巴黎公社”式选举中，我几乎是全票当选为局（台）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省革委建立时，在我不在场的情况下（因为母亲重病，赴家中服侍，中途离开了正在参加的北京军区召开的“河北省革委筹备会议”），仍被推举为省革委常委，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圈阅批准。也因为我在抓革命促工作中成绩显著，1969 年河北省革委以“优秀知识分子”的身份，把我举为省参加国庆廿周年的观礼代表，应周总理之邀参加了国宴，并同全国观礼代表一起，在人大大会堂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就是这么一个实实在在的经历，以修正主义者高扬为首的河北省委，对我进行反攻倒算式的“戴帽”审查，我内心是愤怒异常的。但因为策略使然，我没有公开拒绝修党对我的审查，而是拒理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正因为如此，我没有写那种他们要求的所谓“检查”，而是以《关于‘文革’中若干情况的回忆与说明》为题，写了约四千字。还请了新华社一位老战友征求意见，并进行适当修改。然后交给了专案组长韩晓明同志。韩晓明同志看了后对我急切地说：

“老高同志，你这‘检查’怎么能这样写呢？简直是给自己评功摆好呀！还是当年革命造反派的口气。上边肯定不答应呢！算是我劝你好不好：快回去重写。我不是说了么，就是检查你的问题和错误，越深刻越好，为的是给你争取一个好的归宿呀！你要这么顶着上，上边会严肃处理你呢！”

“老韩同志，你是共产党的老同志了。但你对我还是不够了解。我写成这样，还是努力照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解剖了自己的。不再改了。如果上边要严肃处理，那就听便吧！”

韩晓明同志没能说服我。看得出来，他有一种似乎是“好意”的“不安”。一天，省出版公司经理曹宗安同志，在路上碰到了我，他小声而又亲切地嘱咐我说：“老高呀！现在，我只劝你一句话：上边不论怎么处理你，老弟就是再思想不通，也一定要沉住气，不急不燥。这日子还长之哩，总还要过下去么，要从长计议哟！”我感谢了老曹同志的关心和好意。不过，从他嘱咐的话里，我已经感到：“灭顶之灾”很快就要降临到我的头上。为了让爱人有个思想准备，也为了让爱人看到我能够做到“泰山压顶不弯腰”，回家后，便立刻把这种严峻的形势告诉了她。没想到她比我更多一个坚强。只听她颇具气魄的说：“在党的历史上，好党员被错整、错杀的并不稀罕。你只要有了可能牺牲自己的思想准备，就没有任何可怕的了。更别说照毛主席‘一分为二’的观点看问题，你跟人家邓小平和胡耀邦本就不是一路人么，人家把你开除了，我看这未必不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好事。不要紧的，它们开除了你的党籍，我会祝福你这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它们要是开除了你的公职，我就和孩子们和你相依为命，靠我的那点微薄的工资喝粥度日。不过，我也看透了历史上有一个不可避免的定势：那就是前边搞错了，后边会来个

平反；或者前边定成了错误，后边又反过来定成了正确。只要你放开眼量，身体健康，说不定能亲眼看到这还你清白的那一天。别忘了，南宋高宗那个皇上杀了忠臣岳飞，20年后他儿子登基就给岳飞平了反。而那还是黑暗的封建社会呀！今天邓小平搞的这一套，比如说，他否定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残酷清理所谓‘三种人’。接着，又连续三年大搞了‘从重从快’严打‘刑事犯罪’的运动，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完全经不住历史的检验嘛！”

听了爱人这铿锵有力、眼光深远的一席话，我放心了。未几，人民出版社派来了新的党委书记冯希普。他原在省委宣传部当处长，和我很熟悉，感情也不错。当年，他甚至说过愿到省电台去和我作伴工作，我都表示了欢迎。没想到，他上任伊始，竟把我变成了他对上邀功取宠的“敲门砖”。这是一位正派的老同志告诉我的。他小声地对我说：

“老高呀，你可小心刚来的这位冯书记。他已经在你身上做自己的文章了。组织上还没说怎么处理你，他竟在一次座谈会上公布了要开除你的党籍，编辑也当不成了，还要调离出版社。你可要有个思想准备呀！”

“谢谢你。我已经做了最坏的准备。”

说是“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可我还是无法容忍冯希普这个“两面派小丑”般的疯狂。便径直找到他的办公室，严肃的质问道：

“老冯，听说你在一次座谈会上宣布要开除我的党籍，编辑也不能当了，还要调离出版社？有没有这事？”

“有。我是那么讲了，你说怎么着？”

“我能怎么着你这个‘党棍式’的书记呀！我只能正告你，出版社党支部大会还没开，你就公开宣布要开除我的党籍，这不是公

然践踏《党章》规定的组织程序和组织原则吗？试问谁给了你这种胆大妄为的权力？”

“没有谁给我这个权力。实话对你说：省委早这么内定了，我只不过讲早了一点，这在本质上说，我还够不成什么原则性错误吧？”

“啊？打着共产党旗号的河北省委，竟然对党员未审先判，拿着《党章》的严肃规定当儿戏，这还有一丝真正共产党的味道吗？”

“啊，你老高怎么对省委这样讲话？如此贬损和批判省委，你难道不怕受到更严厉的处理吗？”

“姓冯的，你不要忘了，本人今天仍然是堂堂正正的中国共产党员。《党章》的严肃规定，给了我批评省委包括中央领导人的神圣权利！”

“哎呀！你老高真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了。看在我俩曾经关系不错的份上，我还是劝你把态度放老实些，有什么意见慢慢说，我定不了的可以报告省委嘛！”

“那好！你宣布我不能当编辑了，我去咱邮购部当个发行员行不行？”

“这个，肯定不行。”

“那我到咱图书馆当个管理员总可以吧！”

“也肯定不行。”

“如果非要我调离出版社，那我就去新华书店当个图书解说员，或者去某中学当个语文教师……”

“算了。你老高就别说啦！我干脆把底告给你：省委已经内定决不再让你再沾‘文’的边儿。”

“啊？”我禁不住质问道：“那胡耀帮主持的整党委员会规定，

受处理的知识分子还要发挥一技之长，不算数了吗？”

“你老高怎么糊涂了？那只是个一般性的《规定》。对你这种能说又能写的特殊人物，那个《规定》就不适用了。”

“噢……既是这样，那我再问一句：我本人要业余从‘文’，河北省委还限制不？”

“你业余从文，组织上不管。”

冯希普就像是高扬那个省委的发言人，提前对我这个共产党员未审先判了。不过，在我了解了上层的全部底盘后，竟一下子塌实了下来。回到家里，我便把和冯希普有点近似黑色幽默的谈话，跟爱人刘淑琴讲了一遍。没想到她对此竟胸有成竹。只见她笑着说：“一年以前，燕英要把你发配到新华印刷三厂，那一定是受了某大人物的指使。只是那时省委主持正义的几位书记和常委还在台上，否定了燕英才没有得逞。现在高扬为首的新班子，基本都是批判刘子厚和金明同志的势力，我料定，省委开除你的党籍后，仍然会发配你到新华印刷三厂，落实他们那个不让你‘从文’的底盘。其实人家不让你‘从文’，你也别着急上火。这对你来说，可能会变成一件好事。你个人就完全可以甩开膀子‘从文’了。我还是那句话：司马迁受了‘宫刑’从文写出了传世的《史记》。屈原被楚怀王‘放逐’，写出了传世的《离骚》。你身强力壮，又有我们全家人配合你。如果将来真的去了新华印刷三厂，那是我们二厂分出去的一个厂子，也相当不错。那里好多人都认识你，你肯定也会过得很舒心的”

就在这灭顶之灾一步紧似一步向我降临的严峻时刻，河北省民研会的方圆同志不邀而至，他高兴地对我说：

“老高同志，我这有好消息报告呀。中国民研会把你责编的

《曹雪芹的传说》评为二等奖啦！要你出席全国的发奖大会，我现在来通知你。”

“啊？”我禁不住惊喜道：“你瞧，我在倒大霉的时候，这不是也有好消息吗！”

“倒霉？你倒什么大霉啦？”

“咳，你还不知道呀！组织上正在审查我，能否出席发奖大会，还得报上峰批准哪！”

“那我去跟你们的领导谈。”

“你去谈一下可以。但只做个客观的通知，不要为我出席大会费更多的口舌。”

“行。”

方圆同志把此事通知了少儿编辑室领导，室领导又请示了冯希普书记。冯的指示非常明确：

“高恩泽正受审查，不能出席！”

其实，出席不出席发奖大会，这个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以中国民间文学泰斗钟敬文先生为主席的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给了我这么一个重要的褒奖，真可是硬棒棒的给了高扬那个省委和冯希普之流一计响亮的耳光！冯希普虽然凭着强权一一可以护一下自己和上司的面子。但有另一件绕不过去的事，他仍无法回避：即省出版公司规定：凡编辑责编的书在全国受奖者，出版社奖励责任编辑100元，出版公司奖励200元。而我对这种理当取之的奖金，决不能因为自己正受审查而退让。便又理直气壮地去找冯希普。他一见我就好像早有预感地说：

“你一定是来说那参加发奖大会的事吧？”

“那件事你姓冯的不是早就卡死了吗？我现在要问你：出版社

和出版公司因此规定的对责编要发的奖金，对我还适用不适用？”

“当然适用。但现在不能给你。我们不能这边审查你，那边又给你发奖！”

“姓冯的你应该知道这是两码事呀！你们就是开除了我的党籍，也不能违背宪法规定的公民劳动权和组织规定的奖励权呀！”

“理是可以这么讲，但我们不能这么办。什么这‘法’ 那‘法’，党的领导有权决定一切，你还是等着处理完了再说吧！”

冯希普耍起了流氓无赖那一套，我再也不想跟他辩论下去，便愤然告退。

无独有偶。接着我又收到中国历史博物院的一封公函，邀请我进京商谈合作研究宋朝“杨家将” 的问题。这涉及到请假，我想过了，冯希普肯定不会让我去，但我又不能自行退却，那样就辜负了中国历史博物院对我的期望。便拿着博物院的公函去找他。他看了一遍公函，苦笑着说：

“老高呀！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可你还是不能去呀！理由还是……这你清楚。公函留在我这里，由组织回复他们。”

“可这是人家给我个人的公函呀！我有权也有义务给人家回音。”

“不要紧，我们回信后再把公函退给你。”

冯希普话是这么说了，但那封给我个人的公函，他一直也没有退给我。

进入 1983 年 12 月，出版社一位老同志小声告诉我说：“你还不知道吧？文化厅党组正在密秘培训出版社的党员，要大家必须在开除你的党籍上和省委保持一致，还说这是一条政治纪律，违者必究。为这还安排了对你进行批判发言的顺序。我已经毫无主动权啦！”

只得违心地服从组织。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苦衷。”还有一位同室的共产党员对我说：“人家何止是要整你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还要查你现行的‘反党’活动呢！把我们都叫去问了。结果，大家进行了异口同声的抵制，他们只得做罢。”我对两位关心我的同志表示了感谢。但请他们不要为我担心，我已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组织处理”我的一天终于来了。这天下午三点多一点，出版社党支部召开党员大会。会议的阵势极大。文化厅党组副书记高无际亲自坐镇会场。文化厅直属党委副书记赵润玉、出版公司经理、办公室主任和专案组成员都在重要席位上就座。大会开始，党支部书记韩季华同志首先宣布了对我文化大革命中所谓“问题”的指控。当时我就十分奇怪：为什么她只称为我的“问题”？而不称为我的“错误”呢？当然，她也没称之为“罪行”。我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处理人的模糊表述呀！其实，上边对我的处理是从来就没有模糊的。我猜想，上边之所以用“问题”来表述，是想搞一个“牛皮筋”式的模式，即随时可以拉大，往更重的高度定位处理，而决不是要缩小指控的程度。接着，韩季华在指控我是“保定工筹派”总口的“头头”后，便照本宣科地列举了我的六大“问题”：

一、高恩泽在文化大革命中，紧跟林彪、“四人帮”，拉帮结伙，造反夺权；

二、高恩泽迫害革命老干部。对批判副台长白清、李惠、杨晋北和人事处长张辉以及1959年调走的台长余信，负有领导责任；

三、高恩泽指挥杜希勋和刘鹏到保定抓捕职工高金城；关押职工王佳录并遭受殴打；批斗电视台负责人张庆林，限制其自由80天；以及职工高宝亮遭外单位人殴打事件，要负领导责任；

四、高恩泽领导的险峰战斗队摧垮了“红少数”战斗队，并把

“红少数”的头头阮德才关进监狱，致阮多病；

五、高恩泽 1968 年 9 月，到天津省直单位干部大会上讲话，挑动武斗，造成几十人被打，八十多人外逃。有的被打伤致死；

六、高恩泽在“批邓”联系实际中，批判台长兼党组书记史一凡，充当了“批邓的极先锋”；

听完韩季华的六大指控，我感到十分好笑。而这六大无中生有的指控，以韩晓明同志为组长的专案组却从来没跟我提到过。我清清楚楚地感到，凡是专案组跟我核查过的所谓“问题”，韩晓明同志和赵振录同志都明确告诉我：“那些问题都查否了。”老话说：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今天韩季华同志提出的这六大指控，不知是从什么渠道传来的。虽然这六大指控提出的所谓“问题”，远的已过去 14 年，近的也逾七年之久。但我仍记忆犹新，完全可以用铁的事实以正视听。谢天谢地，听说其他单位清理所谓“三种人”是不给被清查者辩护权的。出版社党支部还是“敢”字当头，给了我党章规定的履行自己辩护的权利。下边，就是我事后追记下来的自己那个辩护发言：

同志们！请允许我一条一条地回答韩季华同志不知从哪传来的“六大”无中生有的指控：

第一，其指控我是“保定工筹派”总口的“头头”，这简直是个天大的笑话！不要说它与事实根本不沾边，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它公然不懂“文革”的基本常识。稍微了解一点保定“文革”情况的人就该知道：“工筹派”的全称是“保定工人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它是响应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要建工代会”的指示而诞生的。其领导成员都是保定有名望的工人群众领袖。我一个小小的知识分子，根本就没有资格当“工筹派总口”的头头。

工筹派的大本营是有河北省军区支左的同志具体指导的。它们从来也没封过我是“工筹派总口”的头头。这件事很简单，最便捷的方法到省军区一问便知。想更细一点，到保定工代会（筹）的工人领袖当中一查便知。如果你们查过，那就请拿出人证和物证来我看看。不过，有一点我想补充一下：我做为省军区直属军管单位的群众组织头头和革委会副主任，受马辉司令员、曾美政委以及省军区支左办公室指派，曾给一些群众组织包括工代会（筹）、农代会（筹）和学代会（筹）的同志们做过辅导报告。比如支持刘子厚同志站出来，当时两派都有一定的反对意见，我就在省军区礼堂做过好几次辅导报告。但这和当过工代会（筹）总口的头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

第二、其指控我紧跟林彪、“四人帮”，拉帮结伙，造反夺权，这更是无中生有的栽赃陷害。我要郑重声明：本人参加文化大革命紧跟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为首的党中央。那时根本不知道中央有什么“四人帮”。更不知道林彪是反革命两面派，反对毛主席。如果要说到对林彪的态度，不是自夸，我还真和省军区曾美政委、田同春和袁捷副司令员私下表示过对林彪的质疑意见。如果专案组和党支部对我负责的话，现在就缓一步，找三位首长去查问，他们都住在石家庄么！如果你们不想去，那我就讲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今天邓小平和胡耀帮最公开的表态：这两位中央领导人物非常明确地说：刘子厚不是“四人帮”的人，北京军区和河北省军区也不是林彪的帮派体系。那么，我一个一直在他们领导下，并多次受到他们表彰的同志，怎么就成了紧跟林彪、“四人帮”的人？这不是一种奇怪的逻辑吗！说我“拉帮结伙”就更更是没影儿的事了。请问谁是我的“帮”？又谁是我的“伙”？为什么不敢点出名字来呢？

点出名字来不就更容易辨析了吗？我确信你们点不出来。因为直到今天跟我一起并肩战斗的班子成员，不论是革命老干部和与我同龄的同志，都没有一位被审查。他们都在平安的工作。如果将来整党结束，仍然还没有清出我的一个“帮”，一个“伙”，那你们的这个指控将如何向历史交待？又将如何面对我这个被诬陷的共产党员？至于说我“造反夺权”那更是颠倒黑白了。我在此郑重声明：本人和我负责的战斗队在文化大革命中，一贯旗帜鲜明地反对任何群众组织夺机要单位——河北电台的权。也反对“省委兵团”违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搞革命大联合又排斥军干群“三结合”的“闹剧式”的夺河北省委的权。倒是河北电台真的出现过三次夺权的闹剧：先是官办的“文革筹委会”，用绑架的办法关押了台长陆达同志，宣布夺权，我公开反对了。接着是官办文革筹委会领导下的所谓群众组织“红色造反总部”，冲进机要室抢劫了电台的大印，宣布夺权，我也公开反对了。第三次是“红少数”战斗队，在社会上同观点的造反派支持下，向军管组夺权，我更公开的反对了。这一切，我敢说电台曾经的两派都知道的一清二楚，不会有一个会站出来颠倒黑白的。你们是从哪儿弄来这么一顶“黑”帽子给我戴上了？那么，是否因为我当上了电台革委会副主任和省革委常委，就自然而然地认为我是“造反夺权”了呢？韩季华同志，你不能如此简单的认定呀！因为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这种新权力机构的诞生是规定了严肃的程序和办法的。前者是照中共中央通过的16条规定，在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基础上，由电台军管组实施通过“巴黎公社”式选举形成的，省军区党委批准了选举的结果并报北京军区备了案。后者是由北京军区召开的河北省革委筹备会议协商推举出来并报毛主席圈阅批准的。而这个会议我只参加了一半，即因母亲病重，回

家侍候，根本不知道自己被推举为省革委常委，直到省军区到老家接我去石家庄参加第一次省革委全会才知道。如果你们把这种光明正大组成的新的权力机构做为指控我个人造反夺权的依据，那完全是“指鹿为马”的强权霸道逻辑了。请同志们不要忘记：党中央当年通过的《16 条规定》中的那个“巴黎公社式”选举程序，今日仍然健在的中共中央常委邓小平、陈云、叶剑英、胡耀邦等都举过手同意了。不能因为他们现在否定了“文革”，就出尔反尔把当年具有权威和合法性的庄严规定当成非法而给当选入围者定罪吧？。

第三、韩季华同志的指控说：“要我对‘文革’中批判白清、李惠、杨晋北副台长和人事处长张辉，以及 1959 年调走的台长余信负领导责任。”这完全是不分青红皂白、乱扣帽子的认定。首先，我声明一点，本人从参加“文革”那一天起，就旗帜鲜明地保护广大的老干部。虽然我因为个人创作压身到 1966 年十月才投入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但我的观点非常明确：全台 25 个（不含余信）处以上干部，其中 23 位我都保。只批判副台长、党组书记白清和人事处长张辉。为啥要批判他二位呢？因为他俩早在 1966 年 8 月 25 日，趁着台长、党组书记陆达在省委开会回台办事的当儿，指挥他俩操控的“文革”筹委会，用绑架的野蛮办法揪出了陆达，夺了电台的党政大权。接着制造了一个所谓“陆达反党集团”，把农村部主任魏亚明、技术处长高瑞奎、文艺部副主任、著名作家冯志，做为反党成员揪出来游园示众，亟尽戴高帽、拳打脚踢之能事。这在河北省直机关是开了先例的。弄得河北省委和宣传部都无可奈何。我做为受党教育多年的共产党员，当然无法容忍这种公然践踏组织原则、目无组织纪律的行为，便以地下串连的办法，展开了对白清和张辉的批判斗争。1967 年 1 月 18 日，奉中央军委命令，河北省军区对河

北电台实行军管。派来以马继联同志为军管组长的军管小组，接管了河北电台的党政大权。开始对电台的文化大革命实行具体的领导。他们经过调查研究宣布：只批判白清和张辉践踏组织原则非法夺权的错误。其他领导干部都保，不准任何群众组织随意批斗。我做为军管组支持的险峰战斗队头头和后来的电台革委会副主任，是严格照军管组的决定办事的。时至今天，我认为：当时批判白清和人事处长张辉践踏组织原则、非法进行夺权，是完全正确的。是经得住历史检验的。至于说我要对李惠、杨晋北和余信的批判负领导责任，那简直是罗织罪名的“政治笑话”了。李、杨两位一直在我们战斗队参加学习，是我们公开宣布要保护的对像，不准任何人随便拉出去批斗的。更鲜明的事实是：我们还公开支持杨晋北副台长参加了革命三结合，担任了电台革委会主任呀！至于早在 1959 年就调走的余信台长，时间已超过八年，“文革”初期曾有个别人提出过批判余信，但电台两派群众组织扎根都没提出批判余信的问题，你叫我高恩泽负什么责任？倒是 1968 年 9 月“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河北省直新闻系统后，驻电台工军宣队批判过一次余信同志，这事我事先毫无所知。事后我听说了，是工军宣队指挥部下令部署的。同志们应该都知道工军宣队强大的领导权威，我虽然身居电台革委副主任又是省革委常委，但仍然照中央规定在工军宣队的再审查和再教育下，根本就不具资格承担批判余信老台长的责任呀！这件事你们为啥不去找工军宣队指挥部副总指挥兼河北电台工宣队长王海镇同志查一下呢？他后来留在了河北电台保卫科工作，就住在河北电台宿舍，一查就清楚了么！现在却无端地硬栽到我的头上，这不是无中生有的政治笑话吗！（注：2001 年 9 月 26 日，我见到了王海镇同志，说起我蒙冤的这件事。他说：“那是工军宣队

指挥部部署的。怎么能弄到你头上？我要写个客观的证明送你。）

第四、韩季华同志指控我说，高金城被抓、王佳录被审查和张庆林被批斗导致被限制自由 80 天，以及高宝亮同志被外单位不明身份的人殴打事件要我负领导责任的问题，我认为，其不仅对事实没有客观的分析和认定，更重要的是犯了“张冠李戴”的错误，一个最根本的前提被韩季华同志抽掉了，即电台是军事管制单位哟！军管的权方和革委会的权力是有明确分工的：即军管组在保证安全广播的大前提下，掌握政治运动的指挥权、人事工作的决定权和重大工作的部署权。而当时电台革委会只分管广播事业的发展、技术和某些行政事务工作。以领导政治运动而言，“文革”运动的前期是军管组领导，后期是工军宣队领导。上边发生的这几件事都属于运动范畴。我认为，军管组和工军宣队当时都做了负责的处理和认真的善后。事隔十四年后又翻腾出来，把领导责任一下子硬栽到我这个并不分管的革委副主任头上，请问这种毫不实事求是的作法，是真正的共产党所为吗？

为了让大家对上边几件事有个感性认识，我不妨把知道的点滴情况说给大家，供同志们分析：

1、高金城被抓问题。当时我听到的情况，是外单位的所谓同案人供出高金城是国民党特务，说得很详细。军管组很重视。而这时高金城仍自行滞留保定家中，长时间不到已迁来石家庄的河北电台上班。加上保定那地方派性很严重，军代表宋进义同志指示我，要采取措施把高金城叫过来接受审查，但又不能出现安全问题。怎么办？研究了半天，决定选派做事稳健的杜希勋和忠厚老实的司机刘鹏开车前去。结果，事情办得很顺当，高金城高高兴兴地来了。晚上，竟有两个年轻人拳头巴掌地揍了他一顿。虽然没造成严重后果，

但军管组还是很生气，责令两个年轻人做了检讨。

2、王佳录被打问题。王佳录解放前是国民党保定电台播音员。有人揭发她在保定解放前夕，还在广播中大骂解放军。军管组自然对他进行审查。又有两个年轻人出于过头的义愤，上前打了她两下子，军管组仍然没有放过，责令两个年轻人做了检讨。

3、张庆林被批判问题。据我了解是因为他无政府主义膨胀。张原是电台党组秘书，自认为造反有功，军管组安排他担任电视台负责人，他不满足，公开串联一些人反对军管组长蔡宝峰同志，意在把他撵走。为此工军宣队指挥部指示对他的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批判。在张做了检讨后，给了个警告处分。说关押他 80 天是根本没影儿的事。此事很好查。你们找一下工军宣队队长王海镇同志和工军宣队政委高振龙和副政委白光同志，稍事一问就清楚了，他们都住在石家庄么！

4、高宝亮被外单位不明身份的人殴打问题。那是迁来石家庄后发生的。因为涉及外单位不明身份的人作案，军管组特别重视。首先责成分管技术的军代表宋进义和我，对高宝亮同志进行了慰问。同时为此召开全台大会对做案者进行了公开谴责。并号召大家举报内部牵线人和打人者。但最终没有破案。为了防止再出类似事件，我建议军管组把高宝亮调入了有解放军警卫的控制室工作。

第五、关于摧垮“红少数战斗队”问题。我认为，韩季华同志这个“摧垮”的“立论”本身就陷入了严重的派性。“文革”中甲派摧垮乙派、乙派摧垮甲派或摧垮丙派……，是经常发生的。

“文革”初期，红少数战斗队确实被官办的“文革”筹委会摧垮过，但很快又恢复起来。这一回把“摧垮红少数战斗队”上升到我的一个问题，韩季华同志至少是犯了官僚主义错误啦！你老韩知不知道

那个红少数战斗队，此时已经摧垮了两个群众组织了？如果不知道，那你老韩同志照本宣科宣念的那个指控我的材料，肯定是戴着有色眼镜的上峰传达给你的。我现在告诉老韩同志，正是那个红少数战斗队，在电台最先借助社会造反派力量，用棍棒摧垮了“红色造反总部”。接着，又借助社会造反派力量和棍棒，摧垮了曾同他并肩战斗过的“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我是这个兵团的一号头头，当时正在老家服侍病重的母亲），并完全无视电台军事管制权威的存在，硬是胆大妄为的夺了电台的党政大权。我今天毫不讳言，本人从老家回到电台后，面对“红少数战斗队”制造的白色恐怖和非法夺权，毅然组织起险峰战斗队，对红少数战斗队进行了面对面的说理和批判。但我并没有摧垮他，我们的胜利只是从此团结了电台的大多数，红少数战斗队陷入了十分孤立的境地。就在这个时刻，占领保定公安处的北京政法学院的“政法公社”，以“反军就是反革命”的名义，开着大卡车，拿着逮捕证，闯进电台要抓“红少数战斗队”的头头阮德才。军管组长马继联同志态度非常明确：“阮德才同志只是思想偏激，不是反革命。我们正在进行批评教育，你们不能随便抓人！”马组长还叫我过来，以群众组织的名义，帮他一起说服学生。我主要是用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和“政法公社”的学生们理论。但最终没有达成一致。阮德才同志还是被“政法公社”抓走了。古话说：“树倒猢猻散”。剩下不到十个人的红少数战斗队就这么垮掉了。为了说明我反对抓捕阮德才同志，现在我提供两条实打实的证据，请同志们周知：1、我和军管组长马继联同志主动安抚了阮的夫人赵雪文同志。明确告诉她：老阮同志不是反革命，只是思想偏激，对军队的认识有错误，属于批评教育提高的问题。因此，老阮的工资福利照发。家里如果有其他

困难请随时告诉我们解决。2、我和马组长亲自到保定看守所探望了阮德才同志，阮很感动。他做自我批评说：“我学了《毛选》四卷，认识到自己犯了极左的错误”。马组长鼓励他说：“知错改错就不算错了。我们一直在和“政法公社” 交涉营救，你很快就回去了。这两件事情韩季华同志只要找阮的夫人和马组长去查一下，就会一清二楚，他们就住在石家庄，你们去查很方便嘛！

第六、韩季华同志指控我在天津省直机关干部大会上的讲话，煽动武斗，造成几十人被打，八十多人外逃，有的被打致死。我听了十分震惊。这不已然构成严重的违法犯罪了吗？如此大的“犯罪”事件，我这个当事人咋从来没听说过？其实这件事并不复杂。那是1968 年春天，天津市从河北划出变成中央直辖市后，有些人查封了河北省在天津的仓库，已经影响到河北的生产，省革委第一副主任刘子厚指示马力（省革委生产指挥部副主任）、甄树楠（省革委秘书组副组长、军人）和我去天津商谈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很顺利。这时驻津省直机关领导小组组长、北京军区来的杨部长要求我们三位给大家做个形势报告。他进一步汇报说：“省革委都成立了，有些人公开攻击省革委是‘派委会’。攻击省军区是支‘派’ 不支‘左’，思想有些混乱。你们给讲一讲对稳定形势有好处。”马力同志说他刚站出来不久，不宜讲话。甄树楠同志说，你这个穿军装的杨部长比我这个穿军装的局长水平高得多，我怎能班门弄斧？最后轮到我的头上。说实话，我没有推辞。我认为，做为省革委常委的党性原则，应该留下来回答这些错误的论调。便在干部大会上讲了一通“省革委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的。”“河北省军区被周总理誉为“认真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意在用最高指示，统一大家的思想和行动。回到石家庄后，我就自己留在天津给省直干部

大会讲话的情况向刘子厚同志做了汇报，他说我讲得很好。同志们想想，在大局已经隐定的基本形势下，我怎么会去煽动武斗、制造分裂呢？更何况我从来反对武斗、在保定两派赴京汇报谈判，我还被誉为促进大联合的带头人呢！还有一个背景情况值得同志们分析：华国锋上台，搞了“清理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运动，那是又过筛子又过罗，没有人向我提出这个问题。金明同志主持河北省委后，邓小平搞的“清理三种人”的运动，其中就包括清理“打砸抢分子”，也没人向我提出这个问题。但到了今天以高扬为首的省委竟抛出了这么个惊天的大问题。它到底有多少真实性呢？我们看看上边这几个吓人的数字，就可以想到其中的“猫腻”：它既没有点出一个被打伤和被打死人的姓名，也没有我涉案的具体情节，更没敢做为一个“刑事犯罪问题”移交司法部门，就是扣一项模糊视听的大帽子，用自己的铁腕舆论捏造事实强奸真理。如此行事，还有一点真正共产党的味道吗？我要声明：保留反诉的权利。

（注：1998年12月13日，我碰上了驻津省直机关大联委负责人、当年开国上将洪学智的警卫员兼司机王卫东同志。同他讲了我这件蒙冤的大事。他说：“我经历了驻津省直机关‘文革’的全过程，也听了你的那个讲话。你的讲话是正常的，符合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方针的。虽说驻津省直机关也存在零零星星、推推搡搡的小武斗，但没有出什么重要的事情。1968年2月省革委成立后，就基本进入关起门来‘斗批改’了。”他还说，我立刻给你写个证明，供你今后打官司用。）

第七、韩季华同志的指控材料说：“我在批邓联系实际的过程中，批判了电台台长史一凡同志，充当了‘批邓’的极先锋。”这个指控完全撇开了当时的历史条件 and 政治气候，批我“充当了批邓

的极先锋”，我倒想问一下，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我们“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有不积极的吗？可能有个别不积极的。但我是属于“积极”的那一部分的。不过，坦白讲，在“联系实际”上我也有一定的压力。因为在邓小平复出大搞“整顿”的时候，我在省委宣传部的直接指示下，积极地举行了八期《整顿就是革命》的电视讲座。群众写大字报批判了我的这个错误。当时我在主持广播局（台）的工作，史一凡台长轮换去了唐山抗震前线。批评的大字报中也有批史一凡同志的，说他调来电台不久，就否定电台的大好形势，攻击电台的成绩是刘 xx 吹出来的。这些我们都用《简报》的形式报告了省委。后边接着形势急转直下，粉碎了“四人帮”。史一凡同志从唐山回来了，就抓住这期《简报》未经他知道就送了省委，是说我在点火搞他。随后就在“清理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中，把矛头指向我。省委宣传部发现此情况派来工作组进行调查，认为我俩都属于工作问题和认识问题，要我俩各自做自我批评，并向群众检讨，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我俩接受省委宣传部的批评和建议，诚恳地握手言和，并向群众做了检讨，得到了群众的谅解。电台形势的发展越来越好。今天，韩季华同志用“木匠的斧子一面砍”的办法整我，无端的否定了省委宣传部的正确结论。它的正面意义在哪里？它的公正性又在那里？

我的辩护发言结束了。会场上一片寂静。这时，只见专案组长韩晓明同志率先起立，苦笑着对领导说：“把高恩泽批判副台长杨晋北一句去掉吧！”，几位领导都点头同意。我则立刻大喊着指出：

“晓明同志，你们的错误可不只这一处呀！……”

我本来想多讲几句，这时，支部书记韩季华同志忙着主持道：

“请党员同志们发言！”

咦！奇特的情况出现了。尽管文化厅党组做了那么严格的训练，连发言顺序都排定了，党员们却硬是没有一个人发言。整个会场就像凝固了一样。我心里却涌出禁不住的激动。心里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呀！他们正在用沉默拒绝省委那些对我的指控。那些在场的执行者该如何面对呢？”一幌十分钟过去了，场面继续冷却，无人发言。这时，我眯眼扫视了一下为首的几位负责人，只见他们个个变貌失色，慌神傻眼，全是一种不知如何是好的窘态。最后文化厅党组副书记高无际同志和赵润玉同志耳语了几句，赵便甩掉主持者韩季华同志，苦笑着来到我的面前，说：

“老高同志，咱商量一下，你出去回避一下好不好？”

“不行！按照党章的规定，我有权留在这里，听取党员们的意见。”

“你看——”赵苦笑着说：“你在这里大家都不发言，问题解决不了哇！”

“难道非要用破坏党章规定来解决问题吗？那样……”

赵润玉同志不容我再说下去，他来了一手连扶带搂的软办法拥着我，仍是苦笑着说：

“你老高就别讲那么多了。大家背靠背的讲也是一种办法嘛！”

就这么着，我被撵到了门外。到哪去呢？还是到自己的办公室吧！就在这个时候，党外人士刘同志进来了。刘同志是出版社有名的正义人士，勇于“暴打不平”。他非常亲切地对我说：“我知道人家在整你。咱家不是党员，他们管不着我。我陪你坐一坐。你现在大难临头，干脆就放开心胸迎接一切吧！我认为，开除你的党籍那算不上什么大事，实际上人家的内心更怕你……”

“谢谢你呀！刘同志。请放心，我早做好了最坏的准备，迎接

一切！”

大约我被回避了四十分钟。也不知他们发了多少号，下了多少令。等他们把我叫回去，韩季华同志立刻宣布：“经过党员讨论，一致同意开除你的党籍。调离你的编辑岗位，到河北新华印刷三厂工作。你有什么意见可以讲。”

“我坚决反对！”

“你可以签个反对的意见。”

“我要郑重声明：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错误的。将经不住历史的检验。……”

“老高同志，就不要多说了……”韩晓明同志好像生怕我讲出更难听的话，忙用劝说的口气道：“你至今也没有理解我们的苦衷。今后你一定会知道我们对你是好的。我希望你服从决定，到新的岗位开始新的工作。”

“新的工作么，我会以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态度努力做好的！”

“欢迎！欢迎！”

韩季华同志忙着做了总结性表态，宣布会议结束。

多少年以后，有些同志对我没有用壮烈的形式拒绝离开会场，表示惋惜。说：“你就硬顶在那里，叫它们开不成了，那不是更好吗？”我其实也想到了这一步。但当时我又想到，从文化厅党组副书记高无际，到专案组的几个同志和出版社党支部，他们都不是存心要整我的。而是邓小平和胡耀邦的干将——省委的高扬、张曙光和邢崇智，硬把这整人的担子压到了他们身上，不把我处理了，他们就要受到处理呀！虽然他们把我撵出去，可以用背后操作的办法完成高扬一伙压在他们身上的任务，但却犯了公然践踏破坏党章的大错误，从而铸造了一个胡作非为的没有一丝正当性的闹剧呀！单

就这一点，省委高扬、张曙光和邢崇智一伙，不是已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吗！

顺便说一句：那位冲在最前面的整人小丑冯希普，不知为啥却没有高升，而是干了不过一年就被调到一个叫做“社科联”的单位去了。

第 37 章 政治品质不同，思想感情迥异

第二天，我被命令在 12 月 26 日到新华印刷三厂报到。还特别告诫：“必须准时报到，不得有误！”我对这个没有一点余地的命令感到十分震惊。因为我手头还有一堆工作需要处理呀！便去找出版社总编辑宋梦寅同志请示：

“老宋同志，我手头还有一大堆工作需要处理呀！能否让我站好这最后一班岗？”

“不要了吧！”宋梦寅同志显然了解更多内情，只见他很难为情地说：“我劝你把这些工作交给别人，其他什么也别提，按时去报到。千万别因小失大呀！据我了解，‘上边’没往边远发配你，还保留你的干部身份，这已经属于万幸了。和你同时处理的几个人，（注：指省革委常委、省公安厅副厅长赵登元；省革委委员、省机械厅副厅长吴武和省建委副主任吕再天），你肯定都认识，他们不仅被开除了党籍，更破天荒地被开除了干部队伍，按工人待遇，还要离开省会，发配到外地。现在‘上边’正盯着你报到的时间，咱何必为这惹出更大的祸害呢！”

听到这里，我心里猛丁一闪：“这个‘上边’何以如此残酷无道？难道我把工作放到心上也不允许吗？”便又请示道：“就是交给别人也需要时间呀！”

“你说的也是。那这样子吧：你先去按时报到，把‘上边’这一关过了。然后我给厂里打个电话，再从工厂返回来交待工作。”

也只能如此了。我于 26 日上午拿到调动手绪，推上自行车，前往南郊的新华印刷三厂。这时，一位调入出版社的工人师傅 y 同志，

因为有绘画专长，跟我们编辑们很熟，常给新书插图作画。他大声叫住我说：

“老高等等，我要送你一程！”

“不要送了，我还要回来交待工作呢！”

“那也得送你一程。我还有话跟你说呢！”

我俩边走边谈。他主要是怕我想不开，就安慰我说：“你遇上的这一难可是大难呀！在毛主席那个时代，你是优秀的知识分子，先进的共产党员。到今天这个时代，正好翻个大过，上边就把你定成危险分子了。形势就是这么残酷呀！不知你看透了没有？”

“看透了。人家走的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不整我这样的人那倒成了奇怪的事情。”“你能看透这个，我就放心了。不过，我要给你交个底，三厂的领导和工人大体都不错，他们不会错待你的。”

“我跟三厂也很熟。你就放心吧！”

到了北道岔地道桥，y师傅和我握手道别。我骑车来到三厂，进门就碰上厂长庞文章同志。他上前握住我的手说：

“上边通知说你来这里，他们为啥把你整到这里来了？”

“就因为我参加了文化大革命，还当了头头呀？”

“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动和领导的，邓小平和胡耀邦都举手同意了么！如果现在改口说错了，那应该由中央负责。怎么能整下边呀！”

“你庞厂长可以这么说，人家整人者有权有势可不这么讲呀！”

“那你想干点什么呢？”

“咳，你知道，我玩了半辈子笔杆子，干别的都是外行……”

“党委书记倪兆英同志出差了，等他回来商量一下。你先到组

宣科报个到。”

我来到了组宣科。科长毛锦春以及科员李志惠和崔玉欣都认识。他们对我非常热情。交谈中，我请求他们多多指导和帮助。他们直爽地说：“这么多年的老同志了，我们完全相信你。”

正说着，旁边的电话响了。毛科长接过电话，不知怎么听筒里的声音很响。我完全能听清楚：

“喂，我是文化厅人事处。高恩泽到你们那里报到了吗？”

“报到了。”

“好！”

就这么两句话，电话结束了。毛科长冲我笑笑道：“上边盯得好紧啊！不过，你来到三厂不错，会平安无事的，你大可以放心。工作问题等倪书记回来研究决定。”

后来，我为报到被盯得那么紧，专门打电话给文化厅人事处询问。一位很熟的副处长直白地告诉我：“哪里是我们盯得紧，人家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家树也盯着我们哪！不过，你及时报到很好。不然，咱都得‘吃不了兜着走’哇！”

报完到，我返回出版社把未了的工作交待给了编辑刘英民同志。英民是位性格直爽又极富正义感的好同志。他见我平静了下来，鼓励我说：

“你老高肚量不小，能撑大船呢！我放心了。”

“咳，肚量是有一点，但愤怒之情是不会消的。不过，我确信那句‘不做亏心事，何惧鬼叫门’的老话。你嫂子信任我，两个儿子信任我，全家都很镇定呢！”

就在我交待工作的几天里，中共河北省委下发了关于处理我和赵登元、吴武、吕再天四人的《简报》。文件发到县团级。河北人

民出版社根据上边的指示，进行了比任何单位都要“严肃”的学习和讨论。每一个党员都必须表态，和省委保持一致。会议结束后，科技编辑室的一位年轻党员对我说：

“空气很紧张啊！谁不表态也不行，一个挨一个的来！快轮到我了，我来了一手——去厕所，希望能蒙混过关。可等我回来，支部书记的眼盯着我不放。我又来了一手，头一歪，躲过了她的目光，硬是没有说话。”

“谢谢你对我的一片铮铮之情。”我感激道：“你也要小心呢！千万别为我再招来对你的祸害呀！”

“没关系。不是官场上有个应付政治灾难的妙招么，一是不作声；二是住院养病。我年轻力壮，去不了医院，就来个三盯不开口，神仙难下手。”

另一个历史编辑也来看我。他以对历史人物的透彻了解，关照我说：“老高呀！历史上凡正直的知识分子，都遵循‘有道则出，无道则隐’的原则。现在中国的政治环境太凶险了。你已经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要学习陶渊明呀！但现在没有了‘世外桃源’，你要立刻割断各种社会联系，把嘴封严。千万不要再出任何茬口，叫人家抓住，明白吗？”

“明白！”

我说是明白，可又觉得很难做到。今天已经不是陶渊明的那个封建社会，人是社会的存在，要完全割断社会联系是不可能的。更何况要做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还要进行不曲不挠的斗争呢！好在形势仍有令人安慰之处，尽管省委那个《简报》口气很厉害，但仍有同志站出来发出勇敢的声音。省文物局的一位领导对我说：“我们那里讨论时，一位对你很熟悉的见过毛主席的老革命林同志，就

公开发出了不同声音，为你辩护。”省电台的一个同志告诉我：

“我们后勤部门讨论时，一位老转业军人朱同志，公开为你辩护，处长急了。怒斥道：‘你老朱怎么能这样讲话？’那位朱同志也很强硬，大吼道：‘我就这样讲了，你怎么着？’结果那位处长缩回去了，再没有讲话。”

还有一个情况，也令人安慰。过去有一种说法：叫“人被贬谪，门口长草”，意思是说，你的官职被贬谪了，就没人来了，门口要长草呢！但我的门口虽不如原来那么热闹，却也没有长草。还是有不少同志顶着和省委不一致的风险来看我，令我十分鼓舞和感动。他们是：

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员、老红军田同春；河北省军区副政治委员张顺兴；河北省军区原作战处长时任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贾玉珍；陆军第 65 军某师政委刘冰斋；中共河北省委警卫处长王化礼；河北省广播电视厅顾问魏亚明和夫人田素琴；河北省原广播局党组成员兼技术处长邹金沧；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厅的编辑、记者、播音员和干部陈运德、郭景华、雷文治、徐丙跃、杨树本、于文运、吴霞、赵胜琴、陈友仁、牛光荣、王文宝、许东升、平国田、唐彦君、王世平、王海镇、王景胜；河北省文物管理局副局长肖和及夫人王佩珍；河北省农业银行副行长刘顺义和夫人马桂英；河北省文化厅人事处副处长王洪章和夫人李建平；河北省社科院《河北学刊》总编室主任娄熙元；河北化工学院教授易达武和夫人、化工学院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张书香；新华社河北分社资深记者周至清；河北省民研会主席魏茂林、民研学者曹广志；河北人民出版社编辑刘英民、栾宝群和郭明志；邯郸地区煤炭局副局长何相存；任丘县副县长刘振国、县供销社主任刘相和及县农行行长刘恩兴；文安县政府技术协

作办公室主任尚玉佩等。

这里我特别要说一下原河北军区作战处长贾玉珍同志。“文革”中，他一直负责省军区直接军管的省广播局、省公安厅、省河北日报和省邮电局的卫勤工作，我们是经常见面的。在保定“文革”武斗最厉害的时候，他曾把我安排到最安全的地方加以保护，革命感情非常深厚。当他获悉我被河北省委高扬、张曙光、邢崇智一伙整肃时，已经升任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的他，震惊异常，专程从太原赶来石家庄看我。见我思想很镇定，临别，他高兴地说：“‘文革’中的斗争那么尖锐复杂，你经受住了考验，不愧是毛主席培养的好战士；今天邓小平大反‘文革’，在全国搞白色恐怖，你再一次经住了考验，保住了革命的晚节。不愧是毛主席继续革命的好战士，我完全放心了！”

当然，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件惊天大事，我必须主动的正式向当年的老领导报告。首先要通报的是河北省军区政委、老红军曾美和省军区司令员、老红军马辉。两位老首长这时虽然退出了省委的决策班子，但仍是军界德高望众的领导同志。当我来到曾政委家的时候，老政委已经知道了我被人家处理的情况。他深沉又不失热情地扶我坐下，进而严肃地说：

“你们的事省委发文件了。我很震惊呀！以一个省委应该有的思想水平，他们不该这样呀！我一看，省委竟是公然搞派性！文件中写你‘摧垮了‘红少数’。这是明目张胆的派性语言嘛！‘红少数’整天骂解放军，失去了人心，你不摧它也会自垮的。更何况你向‘反军’言行做斗争，这完全正确嘛！”

“我已经据理力争，但没有用。我建议他们到首长这里来调查，人家不来。”

“他们敢来吗？他们要是拿到了我给你写的证明材料，就整不成了。不要紧，历史将是公正的。这肯定是个大冤假错案，迟早要平反的。你要沉住气，相信真正的共产党会有那么一天纠正这个错误，还你以清白。”

“一位历史学者好意劝我割断社会联系，从此封口，尽量隐居，防止招来上边新的祸害。我左思右想，不能这样，还是应该向首长报告一下，就过来了。”

“你应该来嘛！你就是不来我也会找你。告诉省公安厅赵登元同志，请他也来一下。我在省革委也分管过一段公安工作，赵登元是好同志嘛！你们遇此灾难，完全是派性整人，根本经不起历史检验的。咦，这事你还要去报告马辉同志，他肯定也会很惦记的。”

辞别了曾政委，我来到了马司令员的家里。马辉同志仍是一派武将气魄，声音铿锵有力。他热情地招呼我坐下，高喉咙大嗓门地说：

“你们的事我已经知道了。我想问你，这个灾难你顶得住吗？”

“顶得住！老话讲，‘没病不怕冷粘糕’。我一点都没怕他们！”

“那我就放心了。咦，生活上有困难吗？”

“没有。”

“好！咱就擦亮眼睛看他们‘行’到几时。今天，他们已经把毛主席缔造的共产党遭塌得不像个样子了。先是给共产党抹黑，一风吹掉了共产党历史上的所谓一大批‘冤假错案’，接着，就是镇压毛主席培养的革命派，又制造了一大批新的冤假错案。我会向省委提出批评的。”

“我相信首长批评的力量。但我也认定他们不会改。不过，我

已安静下来了，准备写点革命的书，这是我的看家本领。”

“噢，下一步，我也要写革命回忆录，你找几个同志帮我谋划一下。”

“行！”

辞别了马司令员，一路上，我心热血沸，激动不已。心里说：

“高扬一伙主宰的河北省委给我扣了那么多黑帽子，但是，久经沙场的老红军、大兵团级的马、曾首长是完全信任我的。有这样德高望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肯定，高扬一伙那种派性整人的诬词还值得一提吗？”回到家里，我高兴地向爱人刘淑琴转述了马、曾首长的谈话，她也激动地说：“老高，你看清这天下大势了没有？中国现在是两大阵营在较量呀！一个阵营是邓小平和胡耀邦为首，领着一伙子走资派和资产阶级走回头路，他们人数虽然很少，但夺得了最高权力，几乎控制了一切。另一个阵营是毛主席思想统帅下的革命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和广大群众，他们手里有真理，掌握的权力却不多，正在勇敢的反抗和斗争。有点像过去蒋介石统治的中国、毛主席起兵反抗那种态势。但最终毛主席领导的人民群众胜利了。所以，我们不能浮躁，要放开眼量，既做长期斗争的准备，又不忘只争朝夕。”

我同意爱人的分析。接着，我向赵登元同志转述了曾政委的意见和邀请。赵十分感动。第二天下午五点，我和赵登元同志一起来到了曾政委家里。老政委设家宴款待，还亲自做了他拿手的“坛子鱼”。喝酒的时候，老政委风趣地说：“酒是助兴壮胆的。请你们喝酒就是要把那种挨整的压抑和郁闷打消，以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坚强胸怀，面对灾难。大凡一个人活在世上，总要有这样或那样的灾难和曲折。共产党的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所以，有句哲理很

深的话，叫做‘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你们遭遇的灾难肯定是冤假错案，迟早要平反的。在没平反以前，要以一个老布尔什维克的姿态接受考验。”

赵登元同志激动地说：“首长的嘱咐我完全能够理解，也完全可以照办。只是不经过那种挨整的过程，是尝不到那种荒唐无道、毫不讲理的味道的。我被他们开除党籍竟然全部是背后操作，没开支部党员大会，更谈不到照党章规定让我为自己辩护。就像扔布袋那样甩出去就完了。还是我一直向他们索要《处分决定》，才不情愿地让我看了看。那上面列的罪名没有一条能够成立。难道这就是邓小平和胡耀邦所谓‘拨乱反正’的成果吗？”

老政委听到这儿，也忿忿然道：“蓄意整人者从来是不讲道理的。当年，林彪死党黄永胜在‘华北会议’上整我和马辉同志，那就跟疯狗一样，我俩多次检查都过不了关。瞧那劲头，我俩肯定要被他们打倒了。后来周总理和毛主席说了话，才没有被被整倒。接下来河北又开‘批陈（伯达）整风会议’，竟又是把矛头指向刘子厚、马辉和我，你们也受到很大压力。不过，那时有毛主席、周总理健在，总还有个讲理的地方。你们今天的处境就不一样了。如果金明和李尔重继续主持河北省委的工作，肯定就不会是这样。金明、尔重同志马列主义水平很高啊！”

“金明、尔重同志对待河北的文化大革命和我们这些人，都有实事求是的明确结论。可他们一走，人家就来了个‘翻烧饼’，彻底翻个了。”赵登元同志继续说。

“今天这些‘翻烧饼’的人，轻着说是心术不正。要上到纲上讲，我认为完全是路线问题了。”

我俩聆听着老政委的教导，顿感心明眼亮。虽然杯杯热酒下肚，

却无丝毫醉人的感觉。

接下来，我又会见了两位老领导。一位是当年我在沧州日报时的总编辑、时任河北电台顾问的“三八式”老革命魏亚明同志。他很激愤地要我到中央告状。说：“那怕告上十年八年也要告。只要中国还打着共产党的旗帜，这个党的中央总得讲点道理吧？”另一位是时任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的“三八式”老革命徐纯性同志。他却劝我说：“千万不要告。邓小平已经下令，对‘文革’受处理的人，一律不接待、不甄别、不平反。你何必白跑腿浪费时间？我意见，你发挥自己的看家本领，学习司马迁，安下心来写书。如果你能写出几部好书传世，他们对你的那些诬词还能摆列吗？就只能是反面教材，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啦！”还有一位老战友——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娄熙元同志，一位解放军大学校培养出来的有深厚功底的文史学者。他长我三岁，已有多部学术著作问世，享受国务院特别津贴。他来看我竟和徐部长有着相同的意见。并亲自给我写了一幅两句话十个字的题词：《老高好为文 文穷而后工》。表示他对我的鼓励和祝愿。只是令人十分痛憾的是，当我动手撰写回忆录的时候，他的这幅珍贵的题词，几经翻箱倒柜，硬是找不到了。只得在2017年8月6日的一次战友聚会上，向娄老兄倾诉原委。老兄慷慨道：“没关系，我再给你重题一幅就是了！”。

现在，回过头来继续说——我没有辜负徐部长和娄老兄的希望。当时，对我的写作来讲，来得最快的是在民间文学、《民俗学》上发力，这是我的长项之一。很快一本《人称探源》十二万字写出来了，另一本《俗语探源》三万字公开发表了。更有一批民间的传说故事登上了省级的专业刊物。我先后被吸收为河北民俗学会会员、

河北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以及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会会员。这中间我在民俗考察上发生了一个突破性的小故事：即世间长期流传着一个《乞雨歌》这样说：“风来了，雨来了，和尚背了鼓来咧！”多少年来，老百姓每逢遇到大旱都这么传唱。近现代出版的一些民俗著作上也这样记着。而我却总感到这“和尚背了鼓来咧”一句，不仅与乞雨没有任何联系。就“和尚和鼓本身”来说，也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应该属于流传中的差错。为此，我曾找许多长者去寻问究竟，他们也认为没有道理，可又说不清为啥就这么流传下来了。等到我研究北宋年间流传下来的“杨家将的传说”，在阅览一本北宋出版的《随笔》时，猛丁发现有这首《乞雨歌》的原文，后边一句竟是《禾场背了谷来咧》，我一下子便顿开毛塞，原来是后人以谐音讹传导致“和尚背了鼓咧”的错误。我抓住这个千年前古书上记载的铁证据，忙着告诉老友、任丘市政协副主席李秉哲同志，因为他送我的刚刚印出的回忆录中有一章《民俗和歌谣》，对这首《乞雨歌》也是照谐音讹传记的。秉哲同志本也一直对此句的内涵不理解，有疑问，只是多次查询无果。听到我的考证，他惊喜异常地说：“这个疑难终于破解啦！”表示他在修订自己的回忆录时要改过来。

到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我的两部描写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童侠彪子头》和《乱世斗群魔》也正式出版。收入稿费一万元，对我的家庭生活有相当的补益。

带着这些丰硕成果向省委常委徐纯性老部长汇报。老部长激动地说：“太好了！太好了！你小高再一次站到了一个制高点上呀！这个制高点就是自己的命运完全由自己主宰。这说明你的胸怀很宽哩！就像容纳百川的大海。我要写几个字表示我对你的欣慰和展

望。”于是他便以一位老书法家的雄劲笔锋，挥笔先是写了一个“海”字，下边接着写了如下的话：“往事如烟 前程似锦 日出景好 晚霞更红 恩泽同志惠存”。我很快装裱后珍藏，并且不时地展开欣赏细品，享受着浓浓的温暖和幸福！到我进入七十岁后，又以电子版在网上发表了解剖邓小平改革开放的长篇反修小说《a省十二年》和新中国近七十年的长篇政治随笔《见闻所思录》，国内有八个网站连载。进入八十一岁，我又完成了自己的长篇回忆录《回望来路》，详述了我七十三年战斗春秋。据此，我要坦然地说：本人蒙难后的三十多年，我仍然一如既往朝气蓬勃、勇往直前地战斗着。实现了“日初景好”，“晚霞更红”。完全体现了徐纯性老部长的欣慰和展望。

古人有教：“人间自有真情在！”我的事在老家——中共任丘县委传达后，竟迎来家乡的关心和惦念。县长王书田同志稍信要我调回任丘工作，说“家乡人是完全相信你的！”。县委副书记崔庆才、副县长刘振国、县政协副主席李秉哲、郭立吉、县供销社主任刘相和、县农行行长刘恩兴等，则亲自来石家庄家中慰问。汜水公社老党委委员、庞许庄党支部书记李丑同志更打来电话，一再询问有什么困难。说“如果在石家庄不好呆，就到庞许庄来！”写到这里，我禁不住自问，还需要更多的关爱吗？不必了，仅此，我已十分欣慰和满足。

在出版社交待完工作，我回到了印刷三厂。这时厂党委书记倪兆英同志已经回来。听说他们为我的工作好费了一番心思。因为上边有令，不准安排到要害部门，也不准沾“文”的边。他们讨论来讨论去，只能去管吃喝拉撒睡的总务科。总务科老科长尹建业同志，1948年参军。抗美援朝时是志愿军连指导员，一直打到南朝鲜的汉

城。美帝在仁川登陆后，尹建业率领他的战士历经千辛万苦，爬山涉水回到了三八线以北，为此荣立大功。他和我一见面，便热情拥抱着我并拍打着我的后背，乐哈哈地说：

“欢迎你呀！老高同志。你的工作我有个大致的想法，比方说，管管卫生绿化、收收水电费什么的。想听听你的想法……”

“感谢领导的关照。我拿了半辈子笔杆，这些工作我要从头学习。刚才你讲到收水电费什么的，可能比较吃力，因我眼花又打不好算盘……”

“那好办！”尹科长不等我说完，就爽快道：“叫临时工负责查水电表，请食堂会计和行政会计打算盘，你只记录一下交财务科就行了。”

就这样，我开始了新的工作。

当时，石家庄市是国家有名的卫生城之一。为了保住卫生和绿化的光荣帽，市、区两级爱国卫生委员会，要隔三差五的进行评比检查。好的表扬，差的批评。屡批不改的要罚款，各街道办事处都有厚厚一本罚款通知书。就这一手，辖区各企业、事业和行政单位都很挂劲。我既然负责了三厂的卫生绿化工作，就不能辜负三厂领导和群众的希望。说来比较顺劲，不过两个月的时间，我和各科室、车间的卫生绿化负责人以及食堂、浴池、锅炉房和厕所等相关的管理人员，都成了一呼百应、配合默契的同志和朋友。每逢我厂所在的彭后街办事处进行单位间的评比，三厂都居上游。

临近 1984 年春节，河北人民出版社少儿编辑室刘英民同志打来电话，要我去少儿编辑室领奖金。我不禁惊问：

“什么奖金？”

“少儿室第四季度的奖金。”

“呀，我还以为是责编《曹雪芹的传说》发奖了呢！”

“那是两回事呀！那个奖因为对你的‘政治歧视’拖下去了。这个奖坚持了‘天道酬勤’，少儿室的领导和同志们要保护你的劳动福利权呀！”

我去少儿室领到 60 元的奖金，心里又禁不住搅了几个过儿：“奖金虽然只有 60 元（当时 60 元还相当值钱），却反映了一种天经地义的法理观念。同样都戴着共产党的帽子，都顶着‘领导的乌沙’，上层的官僚却无视这种天经地义的法理观念，搞政治歧视，硬是拖着不给。而下层的共产党和领导却把这种应得之奖金，视为保护公民的劳动福利权。多么奇特的反差啊！”我正这么想着，英民同志小声地对我说：

“告诉你一个可靠的小道消息，我想你能承受得了。就是你责编发排到工厂的那两本书——《吴承恩的传说》和《施耐庵的传说》，两校都过去了，上峰突然下令，要从书本封底‘责任编辑’一栏，抠掉你的名字。据说为这还请示了中央宣传部。少儿编辑室的领导和同志们对此很看不惯。一致认为，抠掉你的名字也无法推翻你对此两本书的劳动权。所以，少儿编辑室决定：发行此书例行规定的样本书仍然归你所有。”

“谢谢少儿室同志们在异常严峻的困难情况下，坚持了公道！”尽管我努力控制着内心的气愤，还是讲了两句释放气愤的话：“叫他们‘行’去吧！这除了显示他们恶性膨胀的阴暗心理，却无法从实质上消灭我做为‘责任编辑’这一铁一般的事实！”

1984 年春节到了。我照惯例去给省军区和省里的老领导拜年。第一站先去了曾美政委家里。老将军和我握手共贺新春之后，又讲到了我遭遇的灾难，关切地说，你这事，我要和省委管整党的书记

邢崇智谈一谈，不要着急。第二站到了马司令员家里，他则讲了同前来拜年的省委书记张曙光，解锋的一段严肃的对话。老司令质问他们道：

“整党中，你们为什么搞‘派性整人’，专整一派？”

“马司令呀！这，这，你不了解情况，两派的经历不同嘛……”张曙光急着辩解。

“我自信要比你了解得多。听说你们还诛连家属！”

“咦，没有诛连吧……”解锋忙着插话。

“怎么没有？你们不是要把赵登元同志的家属调走吗？”

“这个……”解锋忙说：“我过问一下。”

原来省委决定发配赵登元同志去衡水后，还要把在劳改局当医生的爱人刘惠兰也发配去工厂。组织谈话、联络去处，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自打马司令指责他们诛连后，发配刘惠兰的事便悄悄拖下不再提了。

我拜年的第三站来到了原省委书记时任省政协主席的尹哲同志家里，老书记心情沉重地说：

“你们那事，省委没让我参与决策。文件下来后我十分震惊。怎么能把你们打成‘三种人’呢？既然邓小平和胡耀邦都讲刘子厚不是‘四人帮’的人，你们在刘子厚同志为首的省委领导下，工作都是很不错嘛！前些天，中央调查组来河北考察，争求我的意见，我明确讲，河北在一风吹掉所谓历史上的一大批‘冤假错案’后，又制造了一大批新的冤假错案。这些冤假错案是现在平反好？还是日后平反好？我意见现在平反更有利。调查组把我的意见记下来了，等等看吧！”

听了老首长和老书记这些关注和信任的谈话，我和我的爱人都

感到莫大的安慰。虽然这个春节仍有挥之不去的阴影笼罩，但全家的气氛甚是祥和温馨。

三月的某日，我接到北京军区副司令员袁捷同志的电话，他要回石家庄看看，叫我在他石家庄的家里坐客。袁捷同志早在河北军区任副司令员时，就是十分关心我成长的首长之一。他在省革委兼任工业交通办公室主任，并挂帅担任全省彩色电视会战领导小组组长，我是主持日常工作的组员，因为会战成果显著，受到中央四机部和中央广播局的表扬。后来他调任石家庄陆军学校校长，进而升任北京大军区副司令员。他不仅教育训练军队卓有成就，而且擅长书法，酷爱文学，有专著问世，享有“儒将”之美誉。我来到袁副司令家里，他早在客厅迎候。待紧握我的手坐下，他感慨地说：

“我从中央的《内参》上看到你们被处理，心里十分震惊。所以，无论如何要来看看你。你大概是第一次遭此横祸，我担心你难以承受呀！”

“谢谢首长的关怀。”我笑着说：“还能顶得住，已经安静下来了。省军区马、曾首长和老书记尹哲同志都很关照，周围的绝大多数同志都很好。我已经塌下心来了，今后就是学习司马迁，争分夺秒，奋笔写书了。”

“好！我支持你，你写书我来给你题写书名。这次来我要赠你几个字，不知你有什么想法……”

“那我太高兴喽！第一部书一定要请老首长题写书名。你问我想要什么字么，还真有点想法呢！比方说，痛恨兄弟相残，我喜欢曹植的《七步诗》。畏于政治斗争难测，我觉得郑板桥的《难得糊涂》也有点道理……”

“你的这些想法，有可理解之处。但我都不大赞成。照我的想

法，是写几句评价你的话……”

袁副司令这么一讲，我自然更加高兴。因为有河北省委高扬一伙强加给我的一项“黑帽子”扣在头上，我是多么盼着眼前的大兵团级首长，挥起如椽的大笔，给河北省委高扬一伙小人一记响亮的耳光呀！便说：

“首长的意思当然更好！”

接着，我随首长来到他的书房。书房古色古香，藏书满橱。文房四宝，一应俱全。只见首长稍事运气，锁眉凝思，以极其稳健的笔锋，为我写下了《气正风清》四个雄劲的大字。我顿时激情难抑，鼓起掌来。接着说道：

“感谢首长对我的鼓励和褒奖，我要永远保持自己的气节和品位”！

中午，袁副司令及夫人张溪同志设家宴款待。席间，老司令又送我一句豪言壮语：“不管你受到怎样的迫害，我都要大声的说：

“你是毛主席培养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到新华印刷三厂后，我还接待了两起外调：第一起是北京来的，阵容相当巨大。共六个人，他们分别来自中央组织部、最高检察院、公安部，中纪委、文化部等，调查的主题是河北省文化局副局长简明，在“文革”初期被河北戏校学生打死的问题。大概因为阵容巨大，三厂党委副书记张顺欣同志也来做礼节性陪同。我被引进一间重新整理的房子，完全摆成了六堂会审的格局：即一溜长条桌，六位中央大员在后边威风凛凛地坐定。前边隔出一弓的距离，摆着一个小方凳子，那是留给我坐着接受审问时用的。我一瞧这阵式，本来怒不可遏，但我强仰着自己没有爆发。只是搬起小凳子往那位坐中间位置的首席大员面前，使劲猛丁一放，“咣”地一声，就跟

他两眼对峙上了。这位大员好像没料到我会作出如此抗议的举动，他顿时惊得变貌失色，但却没有进一步发作。只见他稳了稳神儿，开口说道：

“今天我们来找你，是调查简明副局长被打死的问题，你要老老实实向组织做出交待！”“什么？简明被打死的问题？你们搞错了吧？本人对此一无所知。”

“咦，你这是什么话？谁不知道你是分管文化系统的省革委常委？怎么能说‘一无所知’呢？”

“你又错了。本人扎根就没分管过河北省的文化系统！我只分管河北省广播局。”

“可我们经过调查，都说你是分管文化系统的常委，怎么能拒不承认？”

“都说？，具体是谁说了？你敢给我点出名来吗？如果你点不出名字，那你就是‘唬牌’胡猜！”

“你对组织——这是什么态度？”

“我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现在我要向你们郑重声明：如果诸位查的就是简明死亡

这件事，对不起，我对此毫不知情，恕我不在奉陪！”我说完就站起来了。

“你不能走！难道省革委讨论简明同志的问题，你这个常委没有参加过？”

“本人没有参加过。如果你们不信，也没必要问我，可去查省革委常委讨论记录嘛！”

说到这里，我转身拔腿而去。怪异地是，如此强大厉害的调查组竟未敢动粗阻拦。

坐在旁边的厂党委副书记也一言未发。事后我见到了厂党委副书记张顺欣同志，他是位抗日战争的老战士，为人非常正直。笑着对我说：“你老高真厉害，把中央调查组晾了个‘干’。他们面面相觑，半句话也没说就走了。”我回答道：“其实，不是我多厉害。是他们‘胡闹台’，把自己‘黑’得没有还手之力了。”

第二起是调查原省广播局办公室主任周振峰同志，前不久，周同志调回老家廊坊地区的大城县，担任县革委副主任。有人检举他在批邓联系实际的斗争中，写过几期《简报》。为此，中共廊坊地委组织部来了两人找我调查核实。我一听就禁不住笑了。问道：

“批邓联系实际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部署的，办公室主任写《简报》上报省委那不是很正常的工作么？”

“问题是，现在中央把整个批邓都否定了，就要追究周振峰的责任呀！”

“要那么追究会不会乱套呀！今天的叶剑英、陈云、李先念副主席，当年都支持过毛主席的批邓联系实际，邓小平也主动向毛主席做过检查，虽然检查没有过关，这都是历史事实呀！离开这样的历史条件，去追查下边一位县处级的办公室主任，这合理吗？再说咧，周振峰同志写《简报》是奉了广播局党委的命令，定稿权也不在他手里。如果说要追究什么责任，应该由我这个主持省播局全面工作的党组副书记负责。”

“哎呀！中央那情况咱不清楚！你老高同志敢给下边承担责任，我们很佩服。你，你只给我们写清这一点就行了。”

我速速几笔把证明材料写好交给他们，双方高兴地握手告别。

在结束这一章的时候，我想补述几个花絮小故事：

一是省军区曾政委有一天打电话找我，说石家庄一位老同志

（注：后来知道这位老同志正在受修头迫害）的女儿开办的“新大地酒店”要开业。还有张相华和吴武同志搞的肥料企业要开张，邀请他去看看，他提出请我和赵登元同志一块去，要我转告登元同志。我当时委婉提出这类视察性的活动我俩不宜去吧……。但老政委硬是不干。他说：“人是社会存在的主体，只要能走得动，就要参加社会活动。你俩怎么能自我封闭呢！”听到老政委的如此深意，我再没说二话就答应了。

上边提到的张相华同志是河北省委第一个打成的“三种人”。但张相华同志的斗争精神很强。他把河北省委告到了中组部宋任穷部长那里，宋部长否定了河北省委的决定，弄得河北省委很难看。张相华同志后来和另一位打成“三种人”的吴武同志谋划，办了个肥料企业，不仅邀请了曾政委去视察，还同时邀请了革命老前辈、河北省委副书记岳宗泰同志去看看。

二是马辉司令员 1995 年 12 月做“八十大寿”，专门派儿子马新华来请我参加。我和许多来宾都已经进入寿宴大厅了，马司令派省军区副政委张顺兴同志来叫我。我随张副政委去了马司令的休息室。原来没啥大事，就是让我认识一下前来祝寿的省委书记程维高和省长叶连松。我们相互握手后，稍事寒暄，便一起到了宴会厅。事后我问张副政委：“马司令让我认识程、叶有啥意思？”张副政委说：“邢崇智下台了，程、叶是新的党、政一把手，马司令是要他们惦记你一下。”我听到这，苦笑道：“马司令太天真了。人家是修头的干将，能惦记我么？”

三是 1998 年，马司令员写的回忆录《驰骋华北》（修改补充本）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正在发排中，老司令病危，他给老伴丁宝田同志留下遗嘱说：“我这身体可能看不到回忆录出版了，请你要代

我签名，把回忆录送给高恩泽和赵登元两同志。这算是我最后对他俩惦记的一份心愿。”1998年4月19日，马司令以83岁高龄在北京逝世。后边，当丁宝田同志把马司令的回忆录送到我俩手中的时候，我俩禁不住再一次流下了怀念老司令的泪水。

第 38 章 攻下长篇小说 引出苦涩的思考

我在新华印刷三厂大约干了半年，我们总务科的尹建业科长突然把我叫去，悄声说：

“哎哎，老高同志，我给你找了个好差事，估摸着你会高兴。”

“什么好事呀！快说说。”

因为尹科长有名的厚道而又直爽，我一点都没有掩盖自己的兴奋。这时，尹科长敞口道：

“我给你这个‘写家’ 找了个好差事呀！你在这无法发挥‘写家’ 的长处，我总觉得这么下去就把你给‘窝’ 了。正好彭后街办事处跟咱厂要人呢！主要任务是巡查辖区的绿化和卫生，事情比较单纯，空档时间不少。我就想派你去，这样你就有更多的写作时间了。老弟你想想，这是不是一件好差事呀！”

“当然是好差事啦！”我禁不住自己的激动。试想想，一个拿惯了笔杆的人受到如此贴心的关照，能不激动么？就问：

“什么时候报到？”

“你把工作交待一下就去，行动要快！”

我来到彭后街办事处，负责绿化和卫生的李燕华副主任热情地说：

“高师傅（当时对工厂同志的习惯称呼），你来得好。咱办事处组织了个卫生绿化巡查小组，十二个人。你来当组长，长征鞋厂来的李科长当副组长。主要任务是通过不断的巡查督促，发扬成绩，纠正不足。上边给你们权力，对屡推不动者可以罚款！”

说完，她把一本罚款通知书递给我。我看燕华同志是个快言快

语的痛快人，内心虽有点想法，没好意思地直说。什么想法呢？以我当时的政治处境，当这个组长不合适呀！等沉静了一会儿，我还是委婉地向燕华同志推辞道：

“李主任，你别让我当组长好不好？我做个跑龙套的一定会努力工作……”

“你不要推辞。我已经从尹科长那里了解了你的情况。你不仅能干，还特能写。咱们来个‘君子协定’，我支持你业余写作，你支持咱办事处搞好‘绿化卫生’，得空还帮我们写写总结报告，行不行？”

燕华同志说到这个份上，我又一次激动了：“一个基层的领导同志如此不忘发挥一个人的长处，而且给予高度真诚的信任。这跟高扬一伙把持的河北省委的阴暗心理，该是多么大的反差呀？”想到这里我立刻表示：

“完全照燕华同志的意见办！”

其实，等运作起来，这个巡查小组并不难带。因为大多是从工厂抽来的老工人，素职都相当好。更重要的是，这里边还有两个单位的行政科长，都是行政 19 级和 18 级的干部。我就用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发动大家集思广益，打好辖区卫生绿化的人民战争。鉴于罚款这一条常常引起被罚单位的不愉快，我们还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即对各单位要多沟通，多鼓励，尽量不用罚款的办法去解决问题。这么一来，我们和各单位的关系相处得比较和谐和默契。因此，每次市里和区里组织检查评比，我们彭后街办事处总居上游。在这样一个好的基础上，我们这 12 个人的小组又分成三个小分组，对辖区的八十多个大小单位实行包片巡查，一下子便大大提高了巡查的效率。使我们对个别客观环境较差和死角较多的单位，有条件进行

重点沟通和帮助。不用说，这给我这个组长提供了许多自如创作的时间。在我奋笔疾书长篇小说《童侠彪子头》的同时，我还应邀又撰写了《北宋时期河北水长城考略》，以 8000 字的篇幅发表在《河北学刊》1984 年第四期上。这篇论文的梗概，主要是讲北宋皇帝太宗赵光祚，为了抗击北国辽兵经常不断的进犯，又针对辽兵善骑射而不善水战的特点，发动群众从太行山发源的九河，用人工开挖连贯的办法，经白洋淀、大清河，到海河出海口，修了一条水长城。其间设水兵据点，巡逻把守。这道水长城和当年秦始皇修的劳民伤财的万里长城相比，不仅花钱用工少了很多，而且确实对阻隔辽兵南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休战期间，水兵囤田种地还解决了财政的部份供给。老百姓还可以引水种稻、捕鱼采藕，留下了一举两得的好名声。没想到，我这篇论文引起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注意。其白洋淀课题组的负责人朱宣清研究员立刻来访。他认为：白洋淀是汉朝以来人们开发利用、围水缓洪的成果，这包括你的论文所说的北宋年间水长城对白洋淀的开发利用。不同意某些科学家提出的白洋淀是第三纪地壳变动、退海造成的说法。朱研究员还用他发现的淀底有淹没多年的汉墓予以佐证。我不懂地质学，无法和朱研究员详尽讨论，只得以“双方进一步研究”共勉。1985 年春天，我在翻阅史书中发现今日之太行山，在唐朝以前书为“太型山”。兴趣所至，就进行了一番考究。原来此山从河北的拒马河谷向西南绵延至河南省之黄河边，海拔一千米以上，最高达两千米。因为山高坡陡，古人称之为“太型”山，意为“大型”也。后来随着交通的开发，发现太型山有“八径”，即东西相通较为方便的八个孔道，因以不同的距离排列成行，给东西两方的出行带来方便，从唐朝以后便简为同音“太行”，又渐渐呼为太行（hang）了。为此，我写

了一篇论文《太行太型辨》，以 3000 字的篇幅发表在山西省的《地名知识》1985 年第五期上。这年元旦的前夕，家里还有一件喜事，就是长子建军结婚。儿子是军医，儿媳赵怡芹，是河北省人民医院的护士。正好和祖上中医世家一脉相传，令人十分欣慰。婚礼照毛主席教导“一切从俭”，未事张扬，双方都很满意。1986 年 9 月 17 日，又一件喜事降临，孙女高婕出生，长得眉清目秀，胖胖壮壮，很讨人喜欢。

现在我把时间拉回到 1986 年春节。我去给老省委书记时任省政协主席的尹哲同志拜年，尹老的夫人刘嫣同志（时任河北省建材局长）给我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故事：原来邢崇智接班省委第一书记（高扬已宣布退下休息）后，正在秘密调查尹哲同志所谓“紧跟刘子厚的问题”。消息泄露后，尹哲同志非常坦然，等闲视之。刘嫣做为久经考验的老同志（“文革”前任省纪常委）却容不得这种专事整人的非组织活动。她直接找到邢崇智门上，理直气壮地质问道：

“老邢同志，听说省委有人正在调查尹哲，你知道不知道这件事？”

邢崇智被这猛丁的一问给“镇”住了。他嘴唇蠕动了一下，竟未敢做答。刘嫣同志这时严正道：

“这说明你老邢知道。但我要正告你：尹哲是中央管理的干部。他有没有问题，该不该调查，应该由中央做出决定。你们河北省委背着中央，秘密调查一位中央管理的干部，是公然违犯原则的非组织活动！”

邢崇智继续语塞，尴尬得不知说什么好。

刘嫣见此，只得甩给他一句话：“好了！看来此事你全部知情，

我做为中国共产党的

一名老党员，有权追究你搞非组织活动的问题！”

说完，刘嫣大义凛然，拔腿离去。

事后，这件秘密调查之事，大概因为见不得阳光吧？邢崇智悄然停止。

接下来，一件突如其来的怪事发生在我的家里。一天晚上，有两位陌生人来访。一位体魄高大，年岁稍长，自称是省劳动人事厅副厅长；另一位年轻些，自称是河北省王东宁副省长的秘书。他二人这时有个更大的旗号——说是奉了邢崇智书记之命，来和我谈心。等他俩客套地绕了个小圈子后，就询问我为什么不揭发刘子厚？也不揭发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世存？还貌似关心地提醒我：

“老高同志，刘子厚那船已经沉了，你太死心眼了，还是死死地站在那艘沉船上，难道就没有想到，这没有一点好处嘛！你今天如果能有积极的表示，省委邢书记会是非常高兴的。”

“哎呀！你二位要谈这个，我要郑重声明：本人和刘子厚是上下级同志式的工作关系。我没发现他有什么可揭发的问题。至于郑世存同志么！他虽是副部长之一，却和我没有任何接触，根本不了解。至于说我‘死死地站在刘子厚的沉船上’这话显然不对吧？刘子厚同志仍然是国家计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每天都在谋划国家发展的大计，何来‘沉船’一说？如果二位负有如上的使命，那就不要谈了吧！”

两位客人见我推得干干净净，还露出了逐客的意思，那位副厅长不甘心就这么走了，他苦笑着转向我的爱人：

“噢，你有什么想法也可以谈谈嘛！”

“我肚子里的话多咧！”爱人刘淑琴直爽道：“只是我这个人

直来直去，哪句话说得你们不高兴了，又要给我这个共产党员加罪呀！”

“不会不会。”那位副厅长忙笑着说：“你但讲无妨，恕你无罪！”

爱人刘淑琴一向说话干脆，只听他说：“你们省委说我们老高是‘反对党危害党的分子’，根据何在？他七岁参加儿童团，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做了那么多的抗日工作。十七岁加入共产党，一直是被表扬的积极分子。试问：他反对党危害党的思想基础从何而来？就说文化大革命吧，他虽然是一个战斗队的头头，可一没骂过人，二没打过人。既没批过林铁，也没批过刘子厚。就是电台的台长们，他连一张大字报都没有贴过。更没有登台批过那一位台长！试问有没有这样的‘三种人？’十年‘文革’，他上在毛主席领导下，下在省军区、省革委和省委领导下工作，一直被评为优秀知识分子。如今党中央说省委和省军区领导都不是林彪和‘四人帮’的人，却唯独说我们老高是，这是多么‘混盆’的逻辑？请问：这人间的真理在哪？社会的公正在哪……”两位客人见我爱人越说越生气，忙和颜悦色地说：“这样子吧！你们有什么意见给省委邢书记写封信，我们亲自转交……”

“没这个必要吧！”

我断然插了这么一句。二人讨了个没趣，遂握手告别。

下边，还是说一件对我来说更振奋人心的喜事吧！我撰写的长篇小说《童狹彪子头》，此时以十九万字脱稿，发给了上海少儿出版社。很快便收到文学编辑刘观德同志的回信。信中说，你的书稿总编辑郑马同志和我都看过了。一致认为：主题严肃而又新颖，故事情节紧凑而又传奇，语言也很适合儿童特点，基础框架相当不错。

如果再向纵深开拓拉长一些则更佳。刘观德同志还说，我奉总编辑郑马同志之命，将要去石家庄和你当面洽谈。我立刻回信表示欢迎。因为我和刘观德同志并不认识，信中约定，我在车站出口举一张报纸做为接头的标志。这个办法很灵验。当那天他来到石家庄的时候，一出站便微笑着向我招手。我高兴地迎上前去握手寒暄。中午，由爱人刘淑琴主厨，以白洋淀风味招待。河北少儿出版社编辑兼童话作家郭明志同志出席作陪。我们边吃边谈，刘观德同志说：

“你这部《童侠彪子头》有突破传统的新特点，问世后在少儿出版界会有震动，甚至会引起某种争议。但我们定了不仅要出，还希望你在这个基础上再丰满拉长，向纵深发展一下，搞它 20 几万字，不知你的想法如何？”

“我想过了，完全同意，而且一定努力写好。”

郭明志见我明朗表态，也发表评论道：

“一般出版社总是希望作品精炼缩短，上海少儿社希望作品丰满拉长，这显示了上海同志独有的远见卓识。你老高第一部长篇敲定并不想急攻近利，而是锐力进取，这显示了作者深沉的责任感。我要为你们鼓掌干杯！”

我们仨杯相碰，一饮而尽。

送走了刘观德同志，我和次子亚军商量小说丰富拉长的格局，他提出了很好的意见。我则趁热打铁、日夜兼程、争分夺秒地拼搏。因为过于劳累，我又一次犯了“美尼尔氏”病。爱人劝我歇歇，我哪里能歇得下去？只得一边吃药，一边疾书。仗着身体基础不错，只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便丰满拉长了四万字。这时，北京军区袁捷副司令员又来到了石家庄，邀我到他家作客。我高兴地向他汇报了写作的进度和上海少儿出版社的肯定态度，他高兴地放声鼓励我：

“好哇！你老高已经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终于冲破了官方‘不准从文’政治禁忌，写出了20几万字的长篇小说，我衷心祝贺你，要再给你写几个字！”

说完，便引我来到他的书房，挥笔就写下了《得失泰然》四个雄劲的大字。

其实，我对首长的鼓励和褒奖，不敢照单全收。总的说，我对大难临头没有怕，对著作成功也没有得意发狂。但要用高境界地《得失泰然》来衡量自己，还是有不小距离的。这时，我想起了请首长题写书名的事，忙就势问道：

“那书名题字写好了吗？”

“已经写好了，共写了六张，全在这里。”说着，他就拿出来展示给我看。并说：“你比较着选吧！”

我选了一张包好，决定与书稿同寄。中午，袁副司令和夫人再一次设家宴款待。席间，他关切地问我：

“第二部要写的长篇……有考虑吗？”

“有。写吕正操在‘七·七事变’后，挺进河间、任丘一带收编改造土匪，建立冀中抗日根据地。这段历史很重要也很传奇，目前还没有文学作品问世。”

袁副司令听到这儿，高兴道：“我和吕司令很熟悉呀！你要采访吕司令，我给你联系。”

“谢谢。到时候一定请首长帮忙。”

1987年春天，接上海少儿社编辑刘观德同志来信，说《童侠彪子头》已定稿发排，社里决定，从五月号开始，要在上海著名文艺刊物《少年文艺》上连载，每期刊登两章，到七月号共刊登六章，提前在全国造势。全书于七月初出版。诚如刘观德同志预测，在

《少年文艺》连载后，立刻在儿童当中引起热烈反响。我收到五十多封儿童来信。多数都说好。也有些批评意见。说：“‘童侠’这个名字不大好，我们要做共产主义接班人么！”我没有做为“问题”来回答孩子们的批评意见。我认为，这样的有些天真的批评，相信孩子们能在天真地争论中自己解决。接下来，上海相关部门的动作更是令人鼓舞：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在《小说播讲》频道，全文广播了这部长篇：上海美术出版社还把《童侠彪子头》改编成连环画册出版。还有一件趣事：长春电影制片厂一位叫常安的专业编剧，看到此书后，几番寻找，千里迢迢来到石家庄和我见面，他要求改编成电影剧本，搬上银幕，我当然表示同意。只是后来不知何故竟没有下文。

七月初，我收到出版社发来的二十本《童侠彪子头》的样书。新华社资深记者周至清同志立刻向我建议：“你先赠给河北省委的五位书记看看，听听他们有什么说法，因为是他们以组织的名义，剥夺了你‘从文’的权利么！”我同意周至清同志的建议，便给以邢崇智为首的几位书记，计有兼省长的解锋、管人事的书记吕传赞、管宣传的书记李文珊、管工业的书记岳奇峰，写了一封赠书的信。信的末尾仍要求恢复我“从文”的权利。为了防止邮件丢失，我特意委托解锋省长的秘书贾廷辅同志亲自分发。贾秘书做得细致周到。他很快把书和信传送到包括邢崇智在内的五位书记手里。而且五位书记都在我的信上画了圈。只有解锋省长在我的信上做了这样的批示：“吕传赞同志，我意见给高恩泽同志一个写作的机会。”贾秘书立刻把解锋省长的批示告诉了我。同时照程序通知了省委宣传部和省出版局（不久前，出版这一块又从文化厅划出，成立了新的省新闻出版局）。我对此非常高兴。更感谢贾秘书的尽职尽责。第二

天，我便去见省出版局长张春富同志。张原是邢崇智书记的秘书。我俩原来并不认识。但他对我很热情，诚恳而又周到地说：

“解锋同志的批示已经知道了。你考虑一下去哪个出版社。现在人民出版社分成了儿好几个出版社，即人民出版社、花山文艺出版社、科技出版社、教育出版社、少儿出版社、美术出版社。”

“我还是愿去少儿出版社。”

“好！我们研究一下再通知你。”

我辞别了张局长，一路上都沉浸在兴奋之中。但等我回到家里，把张局长的热情表态跟爱人一说，她却给我泼了一盆冷水。只听她有点忧郁地说：

“你是不是高兴地太早了？真正落实了再高兴也不晚么！依我看，四个书记只划圈没有批示，就解省长一个人批示了，怕是这里边还有变数哟……”

“可按照党内惯例，圈阅就意味着同意呀！更何况解锋省长是省委二把手、政府一把手哩！他批示了还能‘变’到那里去呢？”

我当然是从好的方面理解。不过，等了两天没消息，我还真有点嘀咕了，便第二次去见张春富局长。这一见不要紧，张局长一改上次热情而又诚恳的态度，严肃地说：

“解锋同志说给你一个写作的机会，也可以理解为在工厂为你的写作创造条件，而不必再回出版社工作。”

“不对吧？”我质问道：“既然是给我写作的机会，那就是给我一个写作的地方。工厂是搞经济生产的单位，那里有写作的‘机会’吗？”

张局长这回来了个直接了当，说：“那就请解锋省长再写个批示，明确提出让你回出版社。不然，我办不了！”

听张局长这么一讲，凭我多年的从政经验，一下子就悟到省委书记之间有不同意见了。张春富局长显然得到了不同于解锋省长的新指示。不过，我仍然没有懈气，便返身去找解锋省长。解省长住在红军路的别墅里，这个地方我曾多次去过。省委领导的门牌号码我都很熟。所以，一见解省长便自报姓名。解锋同志热情地握住我的手说：“知道知道。你的书我看了，老伴正看着，写得很好。应该说是河北同志问世的好书之一。”他把我引进客厅，正碰上老伴蒋同志，忙介绍说：“这是高恩泽同志，你看的那书就是他写的。”蒋同志旋即与我热情握手并安顿我坐下。我便直入主题，把省出版局张春富局长对《批示》的理解说了一遍，解锋同志惊讶道：

“在工厂怎么写作呢？我的意思就是让你回出版社么！”

“张春富局长说了，要如此，你必须再写一个明确的批示。”

“不用。我给宣传部长刘荣惠同志打个电话就行了。你明天就去找他。”

听解省长讲得如此有底，我也不便再说什么。第二天上午便去会见刘荣惠同志。因为和刘是老熟人了，谈话也不必客气。就直问道：

“怎么着？我回出版社……解省长批示了还不行呀？”

“咳，解锋同志的电话已经来过了，可他不知道我的难处呀！当初他要批明确些，就是让你回出版社，也可能不会有这么大的曲折。”

“五个书记不是都圈阅了么？按中央惯例，画圈就意味着同意呀！”

我努力据理力争。

“你老高说的那是中央的惯例。在河北省委这里已经变味了，

画圈就意味着‘圈套’呀！”“难道你们就这样拿一个知识分子涮来涮去吗？我到解锋同志那里，他答覆得热情而又诚恳。送我时走了 100 米才回去。你老刘当了部长连这点举手之劳的好事也不敢做吗？”“你老高不了解上边的情况。我确实很难。容我周旋周旋好不好？今天我学习解锋同志，对老兄来个 200 米相送。”

看刘荣惠那一脸苦相，我只得接受他送我 200 米道别。

这几遭奔波努力无果而终，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便去找省军区老政委曾美同志倾诉苦衷。曾政委安慰我说：

“不要着急上火。我明天就去西柏坡革命圣地参加一个活动，会见到刘荣惠，我跟他好好谈谈。”

果然，曾政委第二天下午就来电话告诉我：“见到刘荣惠了，我讲了你的要求和我的意见，他痛快答应给你办，你快去找他！”

曾政委办事一向深沉稳重。他在兼任省革委政治部主任时，刘荣惠只是政治部副主任赵江同志的秘书。就这个历史渊源，我相信老政委的话在刘荣惠那里是很有权威的。便利用晚上赶到维明路刘荣惠同志家里。荣惠同志和夫人代书惠同志很是热情。待说到正题，刘荣惠又一脸苦相说：

“曾政委哪里知道我的难处呀！可我又不敢拒绝老政委的意见，只能答应办哪！你看这样子好不好——你再去找一下组织部长曲维镇同志，如果他能给宣传部发个商量性的通知来，我俩就做主把你这事办喽！”

我明知道刘荣惠是在推。可又从这里看出他和曲部长关系还不错，组织部长能站出来为我说句话，也是一种顺理成章的助力，就答应去试试。正好是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我来到了师范街曲部长的家里。因为过去不认识，我照样自报姓名。曲部长很热情，他握着

我的手高兴地说：

“你的名字和情况，我知道一些。有事……咱坐下来说吧！”

我自然把要回出版社的事再说一遍。没想到曲部长的回答十分爽快：

“老高同志，你这个事我已经知道了。我认为，你这个要求是很合理的。这不仅是宣传部该办的事情。更是组织部该办的事情。只是我一个人主不了。你这样子，回去给吕传赞书记和我写封信。吕书记肯定会批到我这里来处理，到那时我就给你办啦！”

老话说，“有病乱投医。”我又照曲部长的建议办了。信写好后，为了快捷无误，我委托当年吕传赞的一位老上级把信送到了吕的案头。接着又委托当年吕的另一位上级替我摧办。他的这两位上级非常尽责，甚至把吕怎么收信和几次摧问的情况都告诉了我。但是，很不幸。吕传赞书记很顽固，不仅把我给他和曲部长的信压下不批，还跟三次摧办的他那位老上级决断道：“你就别再跑了，高恩泽那个事不能办！”

我听到这个消息，实在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吕传赞是由省“五·七干校”教师“坐飞机”破格提拔为省委书记的。他竟然毫不考虑省委二把手、政府一把手解锋省长的意见，显然是奉了省委第一书记邢崇智的指令。其实，我和解、邢、吕都不认识。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私怨。他们之间在我这么一个“发挥一技之长”完全合理合法的问题上，发生如此“针尖对麦芒”式的对立，说明邓小平控制的共产党，其政治生态已经烂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回头我便把情况告诉了曾美政委。他一听说是邢崇智在做梗，好像是不大相信。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

“老邢在我面前一直是很虚心的呀！他不只一次地对我讲，对

河北的工作及他本人有什么嘱咐，可以打电话，也可以叫他来，他一定努力去做……我看这样吧，咱再试一次。你直接给邢崇智写封信，由我这里用军队机要发给他。‘八一’建军节就要到了，他做为省军区第一政委肯定要来的，我再跟他谈一次。”

“这信——什么时候写？”

“现在就写。”

我照曾政委说的，不过十分钟就写成了。曾政委又细看了一遍，先是装进了军区特制的小信封，而后又套装进军区特制的大信封。老政委亲笔写上“河北省委邢崇智同志收”，便由军区机要交通送到省委去了。

八月一日下午，曾政委电邀我快来一趟，说有好消息相告。我高兴地几乎是飞车而至。老政委喜笑颜开地说：

“解决了，你那个要求解决了。邢崇智已经把你的信批转到省委宣传部办！”

“邢书记是怎么批的呀？”

这回我多了个心眼细问道。老政委便把他和邢对话的过程说了一遍：

“老邢同志，你知道高恩泽同志吗？他说知道。我又问他：‘高恩泽给你写了一封信见到了吗？’他说‘见到了，已经批转到宣传部办’！”

“哎呀！”我不安道：“应该问他批示的内容呀！防止他做文字游戏搪唬你。”

“他能跟我做文字游戏？他完全了解我对你的态度嘛！”

“正是因为如此，他才跟你耍滑头哩！”

“不说这么多了，你快去找刘荣惠吧！”

我又马不停蹄地赶到刘荣惠部长的办公室。刘嘎笑着说：

“我知道你会来的。邢崇智把你写给他的信批转过来了。他又跟我捉开了迷藏，只是画了个圈，就是不说明白话。我要真的给你办了，他就会以我‘违犯省委决议’收拾我。叫你老高说，我该怎么办？”

“你堂堂常委兼部长，应该知道该怎么办！。既然邢崇智‘圈阅’了，按照中央惯例，你总不能认为他是反对吧？”

“你老高其外不知其里的事呀！只要邢崇智不批示清楚，我是万万不上他这个套的。”刘荣惠说到这种“互相设防”却老死也不交谈的程度，和解锋省长同邢崇智书

记的矛盾状况，几乎完全一样。如果再从常委兼组织部长曲维镇对我的态度分析，他和自己的顶头上司吕传赞书记也大体是这种状况。这不禁让我想到：三年前他们在整文化大革命的所谓“三种人”时，那是何等抱团一致呀！今天闹到“互相设防、老死不相往来”的境地。我发现一个重大动向：邓修集团内部已经开始大裂变，裂变的双方已经到了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地步。我把这些情况和自己的分析，一五一十地向老政委曾美将军做了汇报。这一回，他好像是看透了底里。非常沉重地对我说：

“他们如此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害党误国，我担心，毛主席缔造的好端端的共

产党，就要彻底毁到他们手里了。”

我攻下长篇小说的消息传到省出版局，震动也很大。许多同志向我祝贺。特别是

曾任我的专案组长的韩晓明同志，他见到我非常热情地说：

“听说你写出了大部头的书，这太好了，你就使劲地写吧！你那个

事我们都清楚，是上边硬压下来的，我们想保也保不了你，被迫服从了……”专案组成员赵润玉同志跟我说得更敞快：“处理你是省委组织部下的命令，我们一直想保你，多次被叫去挨训。连处分你的《决定》都是上边事先定的！”出版社党支部书记韩季华同志在青园街见到我，握着我的手说：“整你是上边下的指标，我们支部不同意，被批为右倾。上边的每一次指示我们都写了‘大事记’。到哪天摆开，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更权威的透底要数当年文化厅党组副书记高无际同志了。他有一次在省电台宿舍见到我，双手和我紧握，痛苦地说：“整你是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家树下的命令，连材料都是他提供的。我们一查大多是假的。有的一时也查不清。便以文化厅党组的名义报省委组织部，建议按中央整党规定放到后期再处理，王家树不干，训我们多次。最后给你定的那几条都是王家树的意见。等着吧！只要中央有甄别这一说，你肯定平反！”后来在石门早市，我碰上了参与处理我的省委宣传部顾问余信同志，他正和夫人张俊卿一起逛市。我们一阵寒暄之后，我禁不住向这位1959年才调离河北电台的老台长发出诘问：

“余信同志，在我的处分决定上有一条，要我对你在‘文革’中受批判负领导责任，这是根本没影儿的事呀？你难道真的不知道我是保你的吗？”

“咳，批判我没关系，刘少奇是国家主席还受批判呢！批判我更算不了什么。”

“你老余说得文不对题呀！我要向你说明的是：你受批判与我根本不沾边。恰恰相反，我一直是保你的。这一点，你的老伴俊卿同志可以作证。她是我那个战斗队的骨干队员嘛！”

“对！小高是保你的，也是保护我的。这全台都知道！”

张俊卿同志这么一说，余信同志好像良心发现，忙握住我的手说：

“咳，闹成这个样子，我支持你向中央上诉！”

听到上边那些同志揭秘性的谈话和余信同志转而支持我上诉，我禁不住向青天发出了

这样的怒问：“高扬一伙指鹿为马，打着共产党省委的旗号对我栽赃陷害，这还是人民心目中那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吗？绝然不是了。他们是打着共产党旗号的‘假共产党’！毛主席曾经讲过：‘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就是法西斯专政’。高扬一伙的恶行，和希特勒的法西斯专政，何其相似乃尔！”

写到这里还是说点开心的事吧！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讲了我的长篇小说后，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和沧州人民广播电台也相继全文播讲了我的长篇小说。沧州台的台长白俊良同志为了感谢我，以全台的名义，赠我一部精美的收音机，直到今天我还在用着。更开心的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员袁捷同志，在读过《童侠彪子头》后，他以“儒将”的视角，为本书写了一篇深富感情和哲理的评论文章送我。

第 39 章 解读河北的权力斗争和民心向背

1988 年初，在读史和搜集民间传说过程中，我发现明朝大将戚继光在保家卫国斗争中，不仅在东南沿海打击倭寇战功卓著，而且在北方抵御鞑靼的侵扰，也有重要贡献。为此，我撰写了《戚继光与明代河北防御》一文，以 8000 字的篇幅发表在《河北地方志》1988 年第二期上。

这年二月，河北政坛的权力斗争又爆出重大事件。事件的缘由是：河北省委书记兼省长解锋任期届满，中共中央先行免去其省委书记的职务，进而内部指示其担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由省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决定。同时，中共中央还内部指示石家庄原市委书记贾然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亦由省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决定。出乎中央意料的是：经过 1600 名代表投票，解锋和贾然双双落选。原河北省副省长郭志（刘子厚时的省委书记）同志以绝对优势，当选为省人大主任。消息传开，河北省城舆论哗然。有曰“中央脱离群众，不知民意，闹出了河北建政以来官僚主义的大笑话。”也有曰“河北政坛权力斗争厉害！这是第一书记邢崇智和省长解锋长期矛盾的公开化。”我和解锋省长因为自己的工作问题有过一点交往，便借着到红军路省委别墅串门的当儿，顺便去看了看卸任在家的解锋省长。

解锋同志见我到来，以为还是谈工作的，就一摆手道：

“老高同志，我已经下台了，公事一概免谈。”

“下台的的事我听说了，我是专门跑来看望你的。”

“啊？看望我……好，好。现在看望我的人很少了，那我得谢

谢你呀！”

“要说感谢，我得先谢谢你呀！你对我工作的那个开明批示，虽然最终没有办成，但我永远也不能忘啊！”

“你说那个事……”解锋省长拉着我坐下，有点不解地问道：“我没想到邢崇智会对你有那么大的劲哟！”

“其实，我和邢崇智、吕传赞都不认识。可谓前世无冤，今世无仇。他之所以反对你的提议，是因为你从实际出发，要改变他主导的不准我‘从文’的省委决议。我认为，这姓邢的属于那种‘政治上阴暗透顶的政客’！”

“嗯，这几年我深有体会，这姓邢的是个‘心胸狭窄好记仇’的小人。我们之间只是工作上有些不同意见，他就仇恨在心了。这次我落选，都是他背后捣的鬼！”

“啊？邢崇智有那么大的能量吗？他在群众中威信很差呀！根据我的了解，主要还是代表们对政府这几年的工作不满意……”

“代表们不满意……我倒想听听你了解到的情况。”

“主要是说河北的工作是老和尚的帽子——平不塌。举的例子是环宇彩电开始在全国居上游，后来就越来越差竟垮台了；石家庄的‘中华维力饮料’开始在全国第一，是中国运动员的首选饮料，后来闹‘窝里斗’也垮了。大家有一句口头禅：说‘河北不干正事，只会整人！’”

“工作是没做好，只是叫我一个人承担就太冤了。我接的是张曙光的班，他干了三年留下个烂摊子，拍拍屁户到内蒙当书记去了，我就是神仙也难收拾呀！至于说我整人，那都是根据中央指示，由省委决定的。我只是分管过那么一段嘛！不过，整体评价起来，我认为河北清理‘文革三种人’是做得相当稳的，基本没有出现上访

和自杀事件。”

“这一点，单就你我之间的认识就很不一致。你说没有上访的？完全不对。是邓小平决定对因‘文革’问题上访的，一律不准接待。你说没有自杀的？请问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心底无私，缘何要自杀？你说遵照了中央指示，中央虽然否定了‘文革’，可并没有公开叫你们‘用派性整人’呀！”

“呀！老高同志，你到今天还这么看哪？这可是重大原则问题呀！”

“是重大原则问题！但我从来就是这样看的。今天我之所以跟你交心谈话，是因为你受到了‘重创’兴许还能听进点不同意见。我要再说一句，你可能更不敢承认。你们清理所谓‘文革三种人’，都是省委戴帽下达命令，强迫下边落实，根本没有一丝群众基础嘛！”

“我们现在不细谈这个问题好不好？就我个人今天的意见，我支持你向中央提出申诉。”

“你现在能有这样的态度，也算是一点进步。要是你仍然在台上，肯定就会批我个‘不老实’！”

“咦，你说这个还真是这么回事。整错了人要叫整人者认错那是很难的。去年石家庄解放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华北局原第一书记李雪峰同志来了，我主动去看望他，因为我这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就是他批的，本来希望他能有几句自我批评，可他压根不说这句话，你看多顽固呀！”

“这我们就有点相通了。现在要让你这整人者认错也是很难的。不过，我确信你们制造的这个‘冤假错案’，肯定 会由后人否定并平反的。”

说到这里，解锋同志笑着说：“那我们就相信群众相信党吧！”

1989 年，我迎来了六件喜事。第一件是次子亚军于六月六日结婚。儿媳赵军在省第四监狱作管教警察，儿子在市工商银行，都是很重要的单位。结婚仪式仍由毛主席倡导的“一切从俭”主导。但国家经济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商品昂贵，我记得买了一斤鲤鱼竟花了九块钱。次年五月二日，孙子高晗降生。可谓家有孙女又有孙男，尽享园满的天伦之乐，其他五件喜事是：由于我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方面的成绩，先后被吸收为河北省作家企业家联谊会会员、河北省民俗学会会员、河北民间文学研究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会会员。这一点说明一个政治动向：虽然政坛十分黑暗，但上述这些民间组织和团体却有着相当的开明和真情。尽管政坛黑暗，只要不得已允许人民或公众介入某个政治环节，却依然仍显示出百姓载舟和覆舟的人心向背。去年出现高官解锋、贾然落选是如此。今年——1989 年春天河北召开的人大和政协“两会”上，又有中央钦定的高官落选。不过，这次中央钦定更有点尴尬的戏剧性。中央内部批示刘荣惠担任河北省副省长，但事先不再免其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的职务，省得选举出现不测导致刘无官可作。果然，代表们投票选举时，以“刘荣惠善玩‘小鬼把戏，看风驶船，不干正事’”否决了他。那位在去年人大副主任增选中落选的贾然，这一次中央内部批示任省政协副主席，估计容易通过。没想到，全体政协委员投票时以贾然“工作大轰大嗡、整人有术”又否决了他。第三位被中央内部钦定要当省人大副主任的李某，在公布候选人资格后，竟引发群众进京检举的“群体”事件，中央无奈，只得取消了李某的候选人资格。我在电视上看到老熟人刘荣惠神态颓废，便抽空去看了看他。一见面，我先开玩笑说：

“你老兄当的什么副省长呀！你不管宣传了，欠我的帐还怎么还呀？”

“哪是我要当副省长呀！按照中央组织部惯例，我做为中央候补委员，早就该做这样的安排了。是邢崇智那小子一直拖着。拖到今天，他又涮了我一把，看中央怎么处理吧！”

“你老兄和邢崇智有矛盾，这我知道。但要说邢崇智把 1600 名代表当阿斗来耍，我不相信邢崇智有那么大的威信和能量。说到底代表们对你不满意呀！”

“代表们知道什么？我当宣传部长从来没得罪过代表们呀？”

“你可不能这样小看代表们呀，据我了解，他们都知道你们‘窝里斗’得厉害，还说你是‘善玩小鬼把戏，看风驶船，不干正事’！”

“这都是邢崇智那伙人给我安的脏。算了，咱不说这耍心事了。你那工作的事我没办好，你可千万别恨我呀！”

“恨你有什么用？还是寄希望于未来吧！”

我俩握手道别。

为了行文紧凑，主题集中。请允许我把历史推移到 1995 年。这时的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邢崇智，在连任两届之后，中共中央内定其改任省人大常委主任，由省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决定。在二月间召开的省人代会上，邢崇智一边以第一书记的权威实行着对人代会的领导，一边操作着 1600 名人民代表选举他担任省人大主任的工作。只是人不做美，又一次出乎中央的预料和邢崇智的把握，在庄严的代表投票中，坐在主席台核心位置上的邢崇智，竟然落选。消息不胫而走，如晴天霹雳震动了省城，也震惊了中央。中央组织部立即派一名副部长前来救驾。但代表们表示：“谁敢改变代表大会的选

举结果，我们就罢选！”这时，邢看到大势已去，要求中央同志尊重人代会的选举结果，不要再为他做代表们的工作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央对代表们罢官的领导干部，不是批评训诫，而是封官安慰。像对前省长解峰的封官安慰那样，都是立刻宣布到全国政协去当常委。

如果后人不嫌拉杂，我简要介绍一点邢崇智主政河北十年的简要情况。邢是河北涉县人。原是胡耀邦挂帅的共青团中央青农部副部长。“文革”结束后，胡耀邦当了党中央总书记，就把他派来河北任保定地委书记，接下来又升任省委副书记、书记。照说邢当了“父母官”，能力大小且不论，应该对家乡人有起码的公平吧？可这位邢书记却一头钻进了派性，来了个“木匠的斧子一面砍”！在整肃了河北省军区支持的一派后，又在自己支持的一派中大搞争权夺利，制造了新的派系火并。导致脱离了群众大多数，成为只会挥舞权柄的孤家寡人。邢在工作指导上也是靠着权力大棒“大轰大嗡”，喜欢浮夸。邓小平和胡耀邦号召各地“奔小康”，他邢崇智在全国第一个宣布保定地区进入了“小康”！报纸、电台和电视台吹上了天，结果是个假典型，闹出了“假新闻”的大笑话！邢心血来潮，指示全省“学山东”，两省之间你来我往、取经送宝，折腾了一阵子就烟消云散了，被群众讥讽为“半截子主义”！至于邢在他的老领导胡耀邦面前搞两面派，那是业内人士深知的。胡在台上，他张罗着电视台拍胡的电视片。到胡 1986 年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被邓小平拿下，他立刻停止拍胡耀邦的电视片，摇身一变，成为全国紧跟邓小平批胡的急先锋。1991 年，中央交流干部派河南省长程维高到河北任省长，时间不长，邢和程为争权夺利就成了冤家对头。二人各拉一派，越演越烈，互相倾轧到了势不两立的境地。

只是邢的后台胡耀邦下台了，程有后来当了总书记的老乡江泽民做后盾，邢虽然还是书记，但在程维高面前已经有气无力了。1995年邢离任后，程维高升任省委书记，继续收拾邢的党羽，邢则成了“上访户”，直接到中央告程维高的大状。以至江泽民南巡视察，其专列路经河北稍事休息时，邢崇智都要求直面状告程维高，但被江泽民严辞拒绝。2000年3月1日邢因病逝世前的一瞬间，他留下遗嘱：“要拒绝程维高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也不接受程维高献的花圈！”自然，程维高为此也知趣地回避，便下乡到沧州视察去了。

写到这里，我还想讲两句河北政坛日后的糜烂：第一书记程维高和接下来的第一书记周本顺、省人大党组书记杨崇勇以及省委常委兼秘书长景春华、常委兼组织部长刘滨、省委常委兼政法委书记张越、省人大副主任张杰辉、省政协副主席艾文礼等，都因为腐败透顶，先后在人民的检举下倒台入狱。有评论说：“山西省委班子塌方式腐败创全国第一，河北省位居第二。”笔者认为这个评论是符合实际的。

第 40 章 创作丰收 引出老将军访谈录

1989 年春天，河北新华印刷三厂调来了新厂长张劲同志。张原在河北新华印刷一厂担任党委书记兼厂长。年龄只有三十几岁，因为富有开拓精神，成绩卓著。他来到三厂这个新地方，继续施展自己的拿手本事，深入第一线参加劳动，搞调查研究。在掌握第一手材料后，也了解到我的情况，便把在彭后街办事处干了五年“帮办”的我，叫了回来，亲自谈话。他亟富感情地对我说：

“老高，回来干吧！我这个人当兵出身，祖辈上没有念书的人。所以，我对你们这些有知识的同志非常尊重和爱戴。我知道你善长写作，专门给你安排了一个非常清静的环境。我还要想法帮你出书。但你也要帮我做两件事：一是帮我写写总结、报告；二是有个别繁写字体的书，年轻人校对不了，你来校对一下。”

我听到张劲厂长这些热情而又诚恳的话，心里禁不住激动地说：“上帝保佑，我又碰上了一位开明的厂长……”便高兴地回答道：“行。一切照你的指示办！”

张厂长把我安排到三厂的客房里工作。这里有八间接待客户暂住的客房，进口处专门设了一道铁门，和单身宿舍隔开。因为远方来的客户不多，把门关上，就变成了自成一统的“世外桃源”。平时由一名女工管理。我几乎整天都可以从事写作。这时，国家民政部部署了一项“地名考察”工作，即把各地的村名来历考察清楚。我在读史阅志的过程中，对此有相当的积累。比方说河北的一些村、庄、营、拨……都是山西省洪洞县奉明朝廷的命令移民过来的。如范村、张营、李庄、叶拨等，就是以移民的“姓”冠名的。当然，

明朝移民河北者不独山西省洪洞县，还有江南各省和塞外与蒙古交界的地方。据此，我提笔撰写了《明代移民河北考略》的论文，以8000字的篇幅发表在《河北地方志》1990 第一期上。

就在我按照计划创作第二部长篇小说的时候，张厂长领着一位年轻帅气的编辑来了，并向我介绍说：

“他是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编辑张采欣同志，南开大学研究生院毕业。我说好了，你的书就请他编辑出版。”

多么体贴入微的好厂长啊！我简直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再一看这年轻帅气的张编辑，几句交谈，就感受到他温文尔雅的文学底韵和诚恳厚道的品格。张厂长嘱我俩好好谈谈，便起身告辞。我把正在撰写的吕正操将军挺进冀中、收编改造土匪、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全书梗概，简要向张编辑汇报了一下，他很感兴趣，并替我起了一个非常形象的书名《乱世斗群魔》。1992年10月，我这部《乱世斗群魔》的长篇，以28万字的厚度，用“桓子野”的笔名由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顺便说一下，张厂长对我后来的工作，又做了精心细作的安排。他以厂党委书记兼厂长的名义向我热情宣布：

“为了更好地发挥你的一技之长，调你去厂党委的宣传科，主编咱厂办的小报《印刷之声！》”不用说，我又一次登上了编辑兼记者的文职岗位，心里非常高兴。干了一年多，厂里因为改开形势的需要，决定新建一个开发部，并任命我担任了这个开发部的经理。又派来印刷业务的行家里手韩建平和王延年同志，协助我开展工作。尽管这项工作对我来说比较生疏。但我二话没说，就高兴地勇敢地努力地投入了战斗，直到1996年3月退休。

1992年11月，我带着自己出版的长篇小说《童侠彪子头》和《乱世斗群魔》，去省军区老政委曾美将军那里汇报。老政委见到

我赠给他的两部长篇小说，听了我创作前后的情况汇报，一向深沉稳健的老政委也激动了。他动情地夸我：

“高恩泽，你不简单哩！在上边政治环境如此严酷的情况下，你靠着百折不挠的力量仍然夺得了创作大丰收。这说明你完全有自己解放自己的能力哟！当然，有那么多好同志帮助你，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咦，今天咱俩商量个事，你歇歇笔好不好？我想让你给我我记点东西……”

“完全可以。老政委你只管讲！”

“这件事我是刻骨铭心的，新闻媒体还从来没有报道过。我实在不想咽在肚里，想通过你这个老记者留给历史，让后人知道。哪天你过来咱细细的说。我都有详细日记哟！”

第二天上午，我如约而至。老政委翻着他的日记，细声慢语地道来。下面就是他的谈话全文：

那是 1970 年 11 月 22 日，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扩大到师一级党委二人），在北京京西宾馆开幕。会议的任务，是贯彻同年八月党中央九届二中全会精神，批判陈伯达一类骗子。并根据毛主席对陆军第 38 军（驻保定）党委报告的批示，结合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和第一政委李雪峰所犯错误进行整风。世人又称之为“批陈整风”。会议后边扩大到参加军委会议的同志、各大军区、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领导干部，共 622 人。又改称“华北会议”。代表中央领导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总参谋长黄永胜、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海军政委李作鹏、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会议后期，又增加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林彪办公室主任叶群（叶是林彪的夫人）。

会议结束时，周恩来总理做了指示。我做为河北省军区政委、党委书记参加了会议的全过程。

会议的前段，“批陈”是重点。后边结合批“李（雪峰政委）郑（维山司令员）”的错误，我还没感到有什么不正常。只是觉得李、郑名为主持召开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却同时在接受批判，并且从会议主席台上拿了下來，和我们一起坐在了下边。觉得李、郑的问题可能‘升级’了。但是，到1970年12月30日晚八时，在京西宾馆三楼一个中会议室里，由黄永胜总参谋长主持，有大员把矛头突然指向了河北省军区，并且点了我的名，还要我站起来“示众”，厉声指控河北省军区：“给群众发枪6000支，要打38军，还要打到北京来”“北京军区成了反革命根据地”。还说“杨成武代总长早就打倒了，你们还在展览橱窗中摆着他的照片，这明明是反对新总长黄永胜同志嘛！”。我听到这些闻所未闻的胡言乱语，脑瓜子气得差点崩裂了。虽然这种惊天的指控，对我和河北省军区无异于“斩首”行动，但我没有一丝着急和惧怕。因为我坚信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我们是信任和支持的。这些胡说八道不过是别有用心杂音而已，即使今天摆上了台面也不会有人相信的。只是接下来的事态发展却更加严重。竟然责令河北省军区党委就“发枪问题”向大会做检查。河北省军区一下子竟成了继李、郑在大会上做检查的第三人。这时省军区党委常委就不得不严正对待了。马辉司令员、袁捷和卢彦山副司令员以及肖靖甫和苏国柱副政委，我们六位常委进行了严肃认真的讨论。大家回顾了发生在1968年春天的“抢枪”事件。当时，一部分“工筹派”（省军区支持的一派）群众，不堪忍受对立一派的枪击，确实抢了军区修械所一些维修的枪支，军区和修械所的同志进行了严肃地劝阻和坚决的制止，警卫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鸣枪示众。打死了一个带头抢枪的年轻人。事后我们又积极进行了收缴武器的工作。整个情况都向中央做了报告，中央并没有对我们的报告提出异议，这事儿，黄永胜是非常清楚的。为什么事隔二年又突然向河北军区发难？肖靖甫副政委对此怒不可遏，拂袖而起，拒不接受上峰要我们检查的指令，竟退出了会议。面对这种情况，我虽然完全理解肖副政委的愤怒，但做为班长的我，却必须稳健面对。1971 年一月二日。做为“工作问题”，我们党委常委还是拿出了一份实事求是的《检查》。我在大会上念了不到 30 分钟，就被连珠炮般的严厉批判给赶了下来。其中最难听的话是说河北军区“对抗中央 态度极不老实！”接着指令马辉司令员第二天晚八时到大会检查，马辉同志和我一样，检查了不到 30 分钟，也在连珠炮般的批判声中，被赶了下来。这次说得最难听的话是“河北军区捂盖子”，“河北军区是死水一潭，必须改组！”从此，我和马辉同志被挂起来，单等着上峰处理了。

但是，省军区党委常委是坚强的团结的。面对着如此严峻的压力，大家想到了要被改组，要被撤职，甚至想到了要坐监狱……但大家更坚信一条：只要有毛主席、周总理健在，就有说理的地方！我们要咬住“实事求是”不动摇！坚持斗争不懈劲！现在就做好准备，要把官司打到毛主席和周总理那里去！为此，我们又回忆起这之前曾经发生过的两件非常怪异的事：一是 1968 年五月一日上午，本来是一个非常喜庆的日子，我和马辉司令员根据中央的通知，都到天安门参加劳动节检阅活动。这时，陈伯达从天安门城楼把我和马辉同志叫到他的休息室，还没进门，陈伯达就厉声训斥道：

“你们省军区给群众发枪，发了大量的枪，必须做出检查交待！”

“伯达同志，我们已有正式报告给中央，这你应该清楚呀！”
我俩异口同声的回答。

“那个报告，你们说了假话，这个帐得重新算！”

“我们的报告是严肃的，实事求是的。据我们所知，党中央和周总理没有你这样的结论！”

我俩不约而同地据理力争。这时，毛主席的检阅就要开始了，争论才不得不停下来。等检阅完毕，马辉同志先一步走了，我又被陈伯达叫到了他的休息室。当时屋里还坐着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和政委陈先瑞，陈伯达竟指着我的鼻子，发着沙哑的声音大喊道：

“你这个人死顽固，为什么不承认发枪？”

“伯达同志你错了。不是我顽固，而是事实确非如此！”

令人鼓舞的是，郑维山和陈先瑞同志对我和陈的对话，竟未执一词。看得出来，陈伯达对郑司令员和陈政委很不满意。最后只得
不欢而散。

无独有偶。不久，同样内容的谈话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提起。借着一次开会的机会，吴法宪把我和我们的袁捷副司令员叫去，很和气地说：“你们怎么就是不承认发枪呢？承认发枪没关系么！全国都如此，明抢暗发，这谁都知道，承认了不会有事的。”不过，这位吴政治局委员兼空军司令与陈伯达那种“强批硬压”的手段截然不同。他始终是和蔼可亲、循循善诱的样子。虽然他诱了半天也没诱成功。但却引起了我们更深的思索：

“为什么中央早就认可了省军区的报告，陈伯达硬是要我们改口承认发枪呢？陈伯达的“强批硬压”和吴法宪的“循循善诱”，到底是一种什么内在关系？特别是，如今陈伯达已经倒台，黄永胜却仍然胆大妄为地高举着陈伯达那“强批硬压”的黑旗，向河北省军区

发难，他和陈伯达这又是一种什么内在联系？不过，他们都有共同的一点，我们还是看透了，那就是：想要我们自己颠覆自己给中央的报告，然后以他们新定的罪名，达到改组或摧垮河北省军区的目的。而河北省军区一直有着护卫京都的战略地位，是全国 29 个省军区中唯一没有被改组过的单位呀！他们这样干，难道单单是指向河北省军区吗？想到这里，我们又清楚地发现：以林副主席的铁杆金刚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和他的夫人叶群，都出席这次会议做镇领导，而他们却并不着意“批陈”，这使我们陡然悟到一个惊天的秘密：“陈伯达和林副主席肯定是一伙的！”不过，我们这个惊天的分析当时只能存于内心，静观着局势的发展，还不能公开议论呀！因为林彪副主席那时还在台上。像这样惊天的大事，我们必须等待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决断，听从最高统帅毛主席的指挥。

1 月 22 日晚上八点，周恩来总理亲自到会作指示，一个令人鼓舞的变化和信号传来：我被通知与会。这个信号明确表明，黄永胜把我和马辉同志挂起来听候处理的阴谋已经彻底失败。等我来到一个中会议室，便收到一个“与会者名单”，奇怪！名单上没有我的名字，却有一个叫‘曾姜’的名字。这是怎么回事呢？正疑惑着，周总理进来了。秘书旋即递给他那张“与会者名单”。总理溜了一眼，笑道：“曾美——怎么写成‘曾姜’了呢！错啦！错啦！快改过来！”

听到总理那亲切而又温和的话语，我心里顿时一热，激动道：“总理还记得我呀！可不是么，那是 1935 年遵义会议时，我就是奉了周副主席的命令，担任会议警卫参谋。连那开会的小楼也是我选好后报周副主席定的。1968 年元月底，周总理在毛主席批准河北省革委成立后一次会上，还曾特意询问到我，充分肯定了河北军区的

工作……”正这么高兴地想着，总理亲切地争询式地问我道：

“曾美同志，郑三生（陆军第 66 军军长）同志到你们那里去，欢迎不欢迎呀？”

“欢迎。”我立刻做了回答。

“你今年多大岁数？”

“我 56 岁。”

“我 54 岁。”郑三生接着我的话说。

“你大他两岁，很好么！”

周总理说到这，接着宣布了中央的几项干部任免决定：免去郑维山北京军区司令员、李雪峰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职务。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纪登奎为北京军区政委。免去李雪峰兼河北省革委主任的职务，任命刘子厚同志为省革委主任，郑三生同志为省革委第一副主任兼省军区第一政委，曾美同志为第二政委。至此，“华北会议”关于河北格局的安排，在毛主席决定和周总理的具体部署下，平稳落实。更为有幸的是，周总理在讲话末尾还郑重宣布：会议期间有些人发表的不当讲话、发言，一律不准印发，不准传达。听到这里，我进一步认定：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华北会议”的一切，“林陈反党集团”狼狈为奸的罪恶阴谋被揭穿，将是指日可待了。

1971 年 1 月 23 日，“华北会议”结束了。我们在日常工作中，一刻也没忘记观察陈伯达和林副主席“狼狈为奸”这件惊天大事。直到 1971 年的“9.13”林彪叛国出逃，摔死在外蒙古的温都尔汗，才算真相大白，落实了我们内心认定的“林、陈狼狈为奸”的这一铁案。为此，我们省军区党委一班人那真是喜笑颜开、满心的欣慰啊！

第 41 章 晚年再一次战斗在“反修”的阵地上

遵照河北省常委兼宣传部长徐纯性同志的嘱咐，我在完成并出版两部抗日战争的长篇小说和在国家及省级刊物上发表一批史志研究论文后，到 1996 年 3 月 13 日我正式退休，因为老红军、省军区田同春副司令员造访，我就把自己工作的重点从研究书写历史转移到现实的“反修”斗争中来了。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

记不得是哪一天了，河北省文化大革命的老领导之一田副司令员来到了我家。我当时不在。他便向我爱人刘淑琴自报家门：

“我是省军区田同春，特来看看高恩泽同志……”

“哎呀！”我爱人激动道：“田副司令的大名我早就知道……。你老这么大年纪了，还亲自来……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告他下午就去看你……”

“好！好！”田老高兴道：“高恩泽同志很熟悉我家，下午我在家里等他。”

等到下午我到了田府，他那宽敞的客厅里已经坐着好几个人。有的我认识，比如省邮电局老局长王志坚、省人事厅老处长王建国、工人日报驻河北记者站站长牛大其。也有两位不认识，经田老介绍，才知道是国家冶金部到河北休息的“三八式”老革命、中国稀土公司原党委书记许均开同志和河北师大马列毛主义学者高新发教授。接着，田老浏览了一下大伙，旋即开场道：

“高恩泽同志是毛主席和我党培养的老新闻记者，也是文化大革命中紧跟毛主席的老战士。今天我们把他邀来，就是一件大事：希望他参加我们的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团队，投入

到新的批判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凭着我对高恩泽同志的了解，我确信他一定不会辜负我们这个团队的希望。”

“没问题呀！”我朗声回答道：“前不久，我去看望省委的几位老领导尹哲（原省委书记兼省政协主席）、刘英（原省委副书记）和王玉（原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同志，他们都嘱咐我不要在故纸堆里费那么大劲了，赶紧回到社会现实中来。把改革开放中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做一番解剖，写出几部有意义的大书来。瞧，老领导的嘱咐和老司令的要求对上口啦！”

“噢，”田老接茬道：“你和省里的党政军领导都很熟，正好发挥你这个长项，经常到他们那里串串门，听听他们的想法和意见，这对我们这个团队的学习和工作会有很大帮助的。”

这时，许均开同志插话道：“我从田副司令那里知道，你也是受邓小平修正主义迫害的名人之一。但是，我要说：受邓小平迫害，正好显示了毛主席缔造的真正共产党员的光荣！这说明我们和邓不是一路人么！今天我们见面，先送你一套毛主席当年批判苏修的《九评》，重读当年的《九评》，我发现毛主席对今天邓修的复辟有着准确的预见性和鲜明的针对性。”

我高兴地捧回了一套《九评》，第二天便进入角色了。先是做了一个大的框架计划：首先买一台电脑，学会上网，以扩大视野，积累资料，强化自己用笔杆子反修的力量；二是在古稀之年完成一部全方位反映改革开放之中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长篇小说；三是写一部新中国毛主席领导的 27 年和邓小平改革开放 30 年相比较的《政治随笔》。田副司令和许均开同志支持我这个计划。为此，我遍访了省里党政军界的老领导。还亲自远行访问了毛泽东时代的农村红旗大队。第一站便是会见山西大寨党支部书记、全国劳模郭凤

莲和山西省管农业的副省长王文学同志。非常荣幸的是，老朋友、新华社高级记者、全国著名劳模吕玉兰同志的爱人江山和我结伴而行，同郭风莲和山西省副省长王文学同志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接着访问了河北晋县周家庄人民公社党委书记、全国劳模雷金河以及河南新乡市刘庄大队党支部书记、全国劳模史来贺和改革开放中顶着邓小平分田单干的黑风崛起的共产主义小社区——河南省的南街村。收获了许多有价值的生动材料，为我要写的长篇小说和《政治随笔》提供了重要依据和素材。这里有几个花絮新闻，我实在不愿舍掉，现录于下面：

第一个是关于河北省委书记兼政协主席尹哲同志的。他告诉我：那是 1983 年整党后，中央派来调查组，专门同省里的正职谈话，了解情况，他大胆地提了一条意见，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用“一风吹”的办法，平反了历史上许多所谓的“冤假错案”。但在揭批“四人帮”那场揭、批、查运动中，又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这些问题怎么办？是留给历史解决？还是现在就解决？我认为现在解决最好。调查组听了他的意见露出震惊之色，但没有表态，只是做了记录，答应回去向中央反映。我之所以记下这件事，是因为当时正是邓小平疯狂清理“文革三种人”、全国处于白色恐怖的时刻。尹哲同志有如此胆略是可钦可敬的。也正因为如此，他一直受到胡耀邦及其爪牙省委第二书记江一真和后来的省委第一书记邢崇智的打压，但他始终没有屈服。

第二个是关于河北省委副书记刘英同志的。有一次我到医院去看他，他猛丁向我提出一个问题：

“小高，我考考你，你说中国现在是什么社会？”

“邓小平不是讲了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呀！”

刘英同志诘问道：“我是要听你的看法！”

“你叫我说么：我认为是封资修大杂会的社会！”

刘英同志评论道：“你只说到了社会的表像，论到实质，中国现在是美国的附庸国。试想想看，今日之中国的改革开放不都是照美国意旨办的么！”。

第三个是关于河北省常委兼组织部长王玉同志的。2006 年 5 月我去王玉家里串门，他高兴地告诉我：

“喂，你知道么，省人大招待处那个夜总会被警方查剿了！”

“警方查剿夜总会的卖淫嫖娼……不是常有的事么？”

“这回可不平常呢！省人大招待处的夜总会是省委书记兼人大主任程维高下令保护的，警方从来不敢到此执法呀！如今敢查剿它，一向霸道的程维高竟未敢作声，这露出一个重大信号，程维高这个大贪官就要完蛋了！”

“啊，能完蛋吗？谁都知道，江泽民是程维高的保护伞呀！”

“那不假。可现在的总书记是胡锦涛了，江泽民那个‘保护伞’已经缩水了。这同样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信号呀！”

果然，2007 年 8 月，中央发出通知开除了程维高的党籍，由正省级降为副省级。虽然这个处理很轻，仍露出保护的浓厚味道，引发石家庄郊区农民的游行抗议。但对江泽民保了十三年的大贪官程维高，终于受到如此处理，也还是显示了邪不压正的铁律呀！

2003 年夏天，我在经过了多方面的准备后，便动笔写我那既定的长篇小说了。开始定的盘子较大。面上要写一个省，时间涵盖邓小平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书题么，老朋友、著名文史学者王焕春同志提议，可以仿照评书的格式，取名《邓小平改革开放演义》，老百姓一定会喜欢看的。我想的书题则是《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回声》。

等奋战三年半，写到十二年胡耀邦和赵紫阳下台，已经有 140 万字了。真要写三十年就得上到 300 多万字，我怕自己的身体顶不下来，就和小儿子亚军商量。亚军 20 多岁就出过一本长篇小说《人朋狗友》，有丰富的文学细胞。他看了看我的书稿，提议就此打住，后边留给后人续写，书名就叫《a 省十二年》。我同意了亚军的意见。

长篇小说完成后，我便进入第二部《政治随笔》的整理和撰写工作。本来我有百万字的积累，通过反复筛选定了约 220 个条目。开始用自己的笔名“杲飞”冠之，定书名为《杲飞视听录》（注：后来两本书都改冠另一个笔名“高飞”）。亚军翻看了书稿，认为书题有点简单化了，没有体现全书的政治内涵。他建议用毛主席诗词中的一句《故国人民有所思》引伸开来，叫《见闻所思录》更好。我认为改得不错，就这么定了。

只是非常遗憾的是，田副司令没能看到我这部长篇小说。因为他 2006 年就因病住进了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不便再叫他戴上老花眼镜去看这部厚厚的书稿。2007 年秋天，我同许均开同志去医院看他，他还关切地问：“你那部‘反修’的长篇小说……写完了能不能出版呀？”我说：“有一个出版社总编已经见过面了，人家说涉及中央领导人，得送中央审查，而审查肯定不会批准。”田副司令听到这里，慷慨激昂道：“出版社不能出，我们自己印刷出版！”许均开同志插话道：“我给你印！抗日战争年代我就在地道里印过《毛泽东选集》，根本就没找过什么出版社。”2007 年秋天，为了纪念毛主席逝世 31 周年，许均开同志安排在毛主席忌日九月九日前一天，即九月八日举行纪念毛主席大会。向田副司令汇报后，老人家不顾重病缠身，决定要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并提出要我给他起草讲话稿。主题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批判邓小平复辟资

本主义的滔天罪行。我很快就把讲稿写出来了。只是很不幸，九月八日，田副司令病情突然恶化，抢救无效，以九十四岁高龄辞世。

接下来，许均开同志用群众路线的办法，组织一批打字员，把《a省十二年》打印成册，并自己出资委托一个书社装成一本漂亮的大书，发给了几百名老中青同志。为了扩大宣传，许均开同志又把本书推荐给了北京东方红网和毛泽东旗帜网。两网站于2011年12月18日分别发表全书供网友下载，同时并进行连载，影响力相当不错。网友下载点击720，连载点击4800。2013年9月30日，《见闻所思录》书就，许均开同志用同样的办法，把这部40万字的《政治随笔》，装订成书，发给了老中青同志。令人十分鼓舞的是，东方红网继续连载了《见闻所思录》。《山丹丹红·中国网》、《中国红旗网》，分别于2013年6月和次年9月，先后跟进连载了《a省十二年》和《见闻所思录》。顺便说一句，中国最大的搜索平台——百度、360、搜狗和美国谷歌也分别转载并库存了《a省十二年》和《见闻所思录》。

当我就要结束这一章的时候，我必须用文字记下自己对革命老前辈、河北省宣传和捍卫毛泽东主义的领军者许均开同志的深深的谢意。是他对我的培养、教导和支持，让我在晚年为宣传毛泽东主义、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做了一定的工作。2015年春天，我去看望许均开同志，92岁高龄的他身体仍很硬朗，行走有力，思维敏捷。

我还要用文字记下对中国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李成瑞同志以及中国著名马列毛主义学者王子恺同志、孙瑞林同志深深的谢意，是他们挥笔为我的两部拙作题词，给予了热情鼓励和肯定，使我涌有了继续革命、年逾八十不停步的力量。现在把他们的题词录在下

边：

对《a省十二年》，李成瑞同志的题词是：“改开众生相，长河九曲图”；许均开同志对我两本书的题词是：“看了高飞同志的两本书很受感动，特留言如下：毛泽东思想做统帅，共产党员的好榜样，爱憎分明批伪冒特，立场坚定斗志强，紧握手中枪（笔），继续革命当闯将。”王子恺同志的题词是：“红与黑大较量的时代回声”；孙瑞林同志的题词是：“正与邪大搏斗的写真画卷”。

对《见闻所思录》，李成瑞同志的题词是：“耳闻目睹勤思考，揭开云雾求真知”；王子恺同志的题词是：“一部惊雷滚滚的社科大书”；孙瑞林同志的题词是：“决战前夜听雷声”。

当然，我还要感谢广大网友对我的鼓励、褒奖、信任和支持。